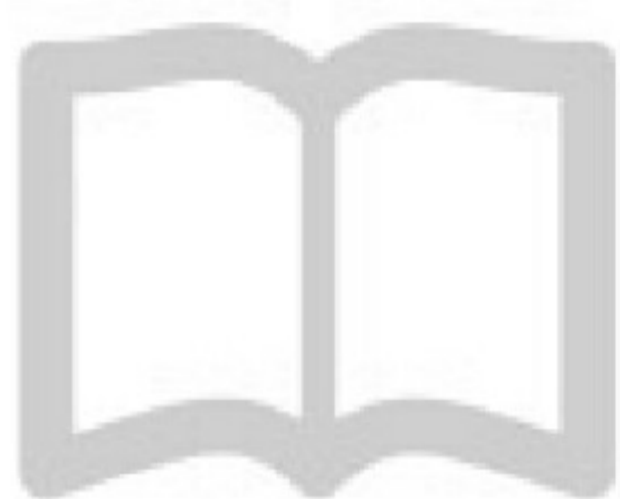


赵紫阳文集 1980 - 1989

第二卷

1983-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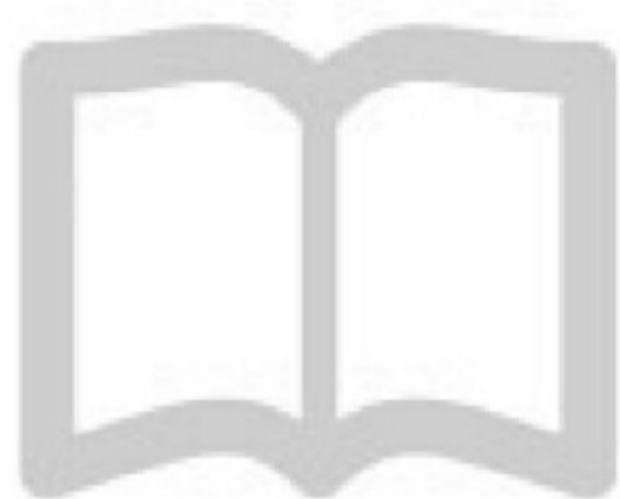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赵紫阳文集

第二卷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编

赵紫阳文集 1980 — 1989

第二卷

1983 - 1984



中文大學出版社

《赵紫阳文集（1980-1989）：第二卷（1983-1984）》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编

© 香港中文大学 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807-6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8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1980-1989), Volume 2 (1983-1984) (in Chinese)

Edited by Editorial Group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807-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出版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收录了赵紫阳自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至1989年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函、批语等，共498篇，180余万字，依时间顺序分为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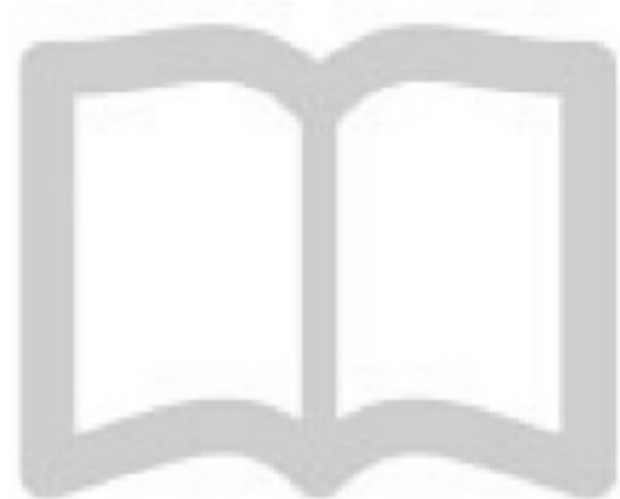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文集》涵盖经济、政治、党务、外交、国防、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展示了1980年代中国高层推行的各种政策主张、理论观点及相关政治博弈，呈现了改革开放最初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细节。

《文集》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原始文献编纂而成，来源可靠、编排规范、忠实于原件，多数篇目属首次公开或首次完整公开。《文集》虽非同期文献的全部，却是迄今为止最系统、也最具规模的赵紫阳文献汇编，为还原和理解早期中国改革开放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也极具文献价值。

《文集》出版过程中，本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文本考订、原件比对、史实核查、信息增补等工作，力求达至文献史料出版的最高准确度、客观度。除文字史料外，本社对视觉史料也极为重视，试图通过对历史图片及原始文献的搜集和选用，将其携带的历史信息传递给读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6年5月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编辑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主要汇集了赵紫阳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件和批语等，近500篇。其中有一部分曾公开发表过，大部分则在当时党政机关的文件、简报上印发或传达过，是首次公开出版。

文集所涉及的十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和奠基时期。当时，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四化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其间经历了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两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进行了国民经济大调整，制定并胜利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彻底扭转了文革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第一步目标(头十年翻一番)，从而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

这十年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由工业、商业发展到其他第三产业，从承包经营、股份制试点到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到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从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到实行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和保护环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从立足国内到坚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主动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勇攀世界科技新高峰。这套文集既见证了这十年

间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逐步重新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也反映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工作难度异常巨大，为政者甘苦备尝的秘辛。这十年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些不尽人意的遗憾；既积累了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有出现通货膨胀的教训。

从文集中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领导支持下，本书作者与胡耀邦、万里等同志一道认真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从而大彻大悟，立志为民，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崇尚法治，勇于开拓创新，努力遵循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在日新月异的新产业革命、新科技革命中尽心竭力，弃旧图新，不断探索新的为政之道、治国之策、兴业之本和强国之路，以掌握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主动权。这十年他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奉献给了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书中所反映的每一项巨大成就或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真实记载和深入研究这段难忘的史实和第一手文献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让历史告诉未来，促使我们进一步开拓思路，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融入世界，为实现振兴中华，攀登世界强国的新高峰而奋斗！

本书编辑组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组成。为保持文稿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编辑中均保持了原貌，编者仅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4年4月

目 录

一九八三年

海南岛要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一九八三年一月	11
工商企业的改革应采取不同形式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13
关于发展教育事业给钱昌照同志的复信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	15
在经济工作上要多看几步棋	
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	16
天时人事日相催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	19
加强干部的正规化培训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22
应在煤的转化和综合利用上下力气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23
争取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24
让中非友好事业世代相传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27
军队搞点农副业生产有利于丰富供给和减轻民负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40

必须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	42
搞好水利建设 发展旱作节水农业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48
发展农业要增强经济效益观念	
一九八三年三月	52
企业改革要优先保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	55
发展大好形势 继续抓好工交战线的工作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61
为推动南北谈判和加强南南合作而努力	
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	75
对钢材实行工贸结合和优质优价很重要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	79
地矿部是全国地质工作的综合部门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	80
要认真总结三十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	82
统一金融必须建立中央银行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84
提高工业生产经济效益要见到成效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85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86
节能工作要坚韧不拔地抓下去	
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	112
关于平朔露天煤矿项目审批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116

加快发展我国食品工业的意见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118
集中财力保重点 提高素质促转变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120
重大技术装备要开展国际合作与军民结合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129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值得研究和借鉴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131
引滦入津工程是重点建设的一个好典型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142
搞好社会治安是全党全国的大事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日	146
系统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素质等十个重要问题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	153
团结各族人民开发建设新疆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163
国营农场可以实行职工承包办家庭农场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176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是提高企业素质的关键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七日	181
援外工作要量力而行和尽力做好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187
团结一致 艰苦奋斗 夺取新胜利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	192
抓紧争取教育轻微犯罪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	195
关于调整化纤布和纯棉布价格给耀邦同志和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	196

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	
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	197
分步进行价格改革 逐步理顺经济关系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	206
停止生态破坏 实现良性循环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	210
二汽要在改革开放和提高效益中走在前列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216
关于汽车工业实行技贸结合的批语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228
发挥福建优势 办好经济特区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四日	230
军工技术转民用应予鼓励和支持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240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首先要制定规划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241
新型建材公司要搞成经济实体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245
发展大好形势 理顺经济关系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248
争取国际优惠条件建设好广东核电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六日	253
大型煤矿是否与外商合营值得重新考虑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	256
中国的科技体制非改革不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257
从中小学开始加强外语教学和普及计算机知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261

祖国建设需要精通世界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人才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262
关于推广河南省禹县平原造林经验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64

一九八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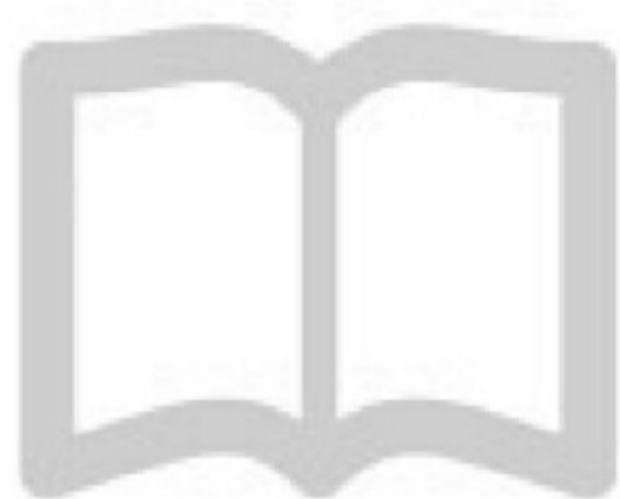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增进了解 促进友好 维护和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	269
对中央政法委“严打”部署征求意见稿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273
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	274
理顺经济和提高企业素质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	277
关于企业改革和技术改造等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280
加强行业协会 发展食品工业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291
重大技术装备一定要确保质量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295
视察重庆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日至五日	298
视察贵州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至九日	306
视察湖南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至十六日	313

给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复信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332
妥善解决经济工作和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333
关于怎样管好企业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	346
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	348
听取中国石化总公司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十三日	351
运用科学技术加快油田发展大有可为	
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	356
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潜力很大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	362
听取建材工业发展纲要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	367
在庆祝我国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	371
深化改革 搞活企业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373
应用科研单位应实行有偿合同制和课题承包制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三日	380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381
团结起来 发展石油工业战线的大好形势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403
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问题致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406

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九日	409
坚持改革 加速改造 使鞍钢做出新贡献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	412
扬长避短 革新改造 走出一条发展我国冶金工业的新路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	414
靠改革开放加快我国石油工业发展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	420
进一步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至十三日	427
关于机械工业领导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	433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436
我国汽车工业面临大发展的新形势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441
对《人口控制和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	446
三线企业调整必须搞军民结合型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	447
在欢迎参加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宴会上的祝酒辞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	451
对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草稿的修改意见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453
在安徽省党政军负责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	459
中国科技大学要为国家建设输送更多人才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	476

在江西考察听取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	479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	484
附录：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	490
团结起来 开创科委工作新局面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	509
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设方针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九日	511
对方毅同志开发有色金属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九日	526
给李德生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	527
接见出席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来宾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	528
给王震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531
贯彻中央《决定》 稳步推进价格改革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533
给薛暮桥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542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543
广东要继续在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中走在前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	546
深圳特区要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经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561

振兴上海 充分发挥全国经济中心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九日	563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573
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577
促进农业协调发展 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88
关于改造和振兴上海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595
关于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给中央的请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599
后 记.....	603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1984年12月19日，代表中国政府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中英联合声明》上正式签字。





左上： 1983年8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视察

左下： 1984年3月，在四川地方领导杨汝岱、杨析综、王谦等的陪同下
考察重庆嘉陵机械厂

右： 1984年3月，在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的陪同下考察湘西山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并全体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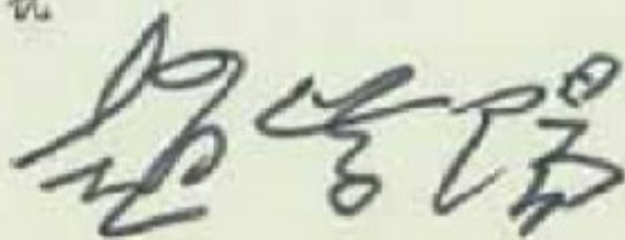
谢谢你们给我来信。

对于你们在信中所表达的赞成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爱国立场，我十分赞赏。你们出于对香港前途的关心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已交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研究。

现在香港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相信你们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香港的稳定繁荣不断作出贡献。你们也可以完全相信，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会符合香港同胞的愿望和利益。

谨 祝

学业进步！



一九八四年三月廿六日

1984年3月26日，就香港回归问题给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复信



1984年7月9日，庆祝鞍山钢铁公司开工三十五周年时的题词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同志
建議一件，請參閱。雖然他提出的辦法
不一定能治本，但卻提出了如何
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
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國各方面的情況都越來越
好，而且色和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
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
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

穩定性和連續性，固然是個重要方面。
但我國是共產黨集中領導下的社會主義
國家，只從國家立法上去考慮，恐怕還
不夠。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還是在黨
的領導制度上着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現在您和陳方同志健在，精力仍
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
倡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軌道，
當前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
一。正因為這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
以更多的精力，集注在考慮解決這一系列

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
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
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
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改变，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以上建议当否，请酌！

此致

敬礼

杨
奔 陈云同志

杨学阳

一九八四年

五月廿六日访谈

所文。

1984年5月26日致邓小平信的手迹，
收入本书时以《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
问题致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为题

茅須“计划经济为主”的“为主”
两字可改为“为主”
也。

我赞成。这个文件可印发三中全会，连同体
制改革的决定，一并讨论。

邓小平
九月十日

十月十日

赵紫阳同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 三个问题的请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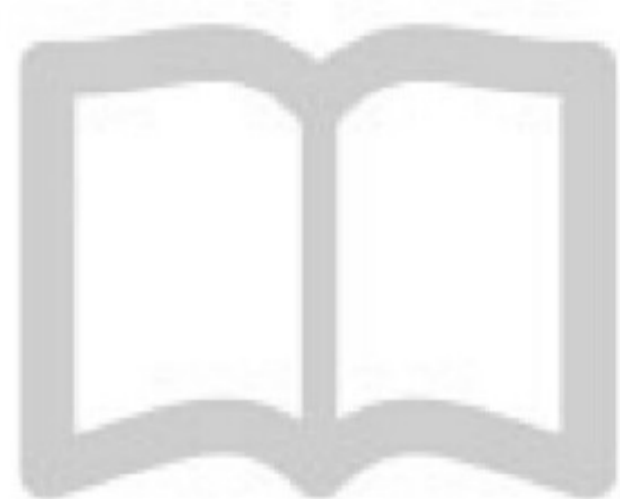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同志：

去年八月六日，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出了十个需要
调查研究的题目。向政治局常委报告后，常委各同志都有
指示，肯定了进行调查研究的必要，也肯定了提出这些问
题的思路和方向。

按照小平同志批示“希望如期实行”的精神，一年
来，各专门小组和有关部委就上述十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

1984年10月25日，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请示》上的批语，
《请示》一文收入本书时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
信》为题

一九八三年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海南岛要实行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一九八三年一月

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要充分利用当前国内外有利条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尽快地开创一个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比较慢，国家要给予支持和帮助，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港口、交通、能源等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解决，集中力量，搞成一件再一件，要下功夫抓出成绩来。海南岛要充分利用四周环海的优势，利用海运的条件，把港口交通搞上去。世界上许多海岛发展都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交通方便。海南岛把港口交通搞上去，内陆和国外的资源就可以利用。要鼓励和欢迎侨资和外资到海南岛来投资兴办各种企业。

全岛要加强纪律教育，反对无政府主义，特别要把自然资源保护好，把森林保护好，绝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破坏资源，破坏森林。只有加强了管理，把内部整顿好，才能给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谷牧同志和海南岛负责同志一道，通过调查研究和多次会议讨论，提出了开发建设海南的一些方针：

——给予海南岛以更大的自主权，在经济建设上让它能够因地制宜地

* 这是赵紫阳和国务委员谷牧访问非洲十一国归来后，在海南岛召开广东省委和海南区党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考虑决定全岛的工作。除了实行“以岛养岛”的方针外，中央各部门和广东省都要从财力上给予支持，认真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参照深圳、珠海的办法，更加放宽。

可以利用外资、侨资在海南投资建设，一切外资合作项目，将得到优惠待遇。

——加强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对外开放创造条件。可把兴隆、三亚等地逐步建成旅游中心。

——发展对内联合。欢迎内地各先进地区、工厂企业来海南岛投资、合作经营或独立经营，共同开发海南岛；要发展岛内现有国营企业同外资、内资的联合，充分发挥海岛农垦、铁矿等大国营企业共同开发海南的作用。

工商企业的改革应采取不同形式*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工业商业改革，要按照不同企业、不同生产水平，采取不同形式，不能采取一种模式，没有把握的还是要探索，搞不好，会给改革带来新的问题。

对工业企业采取何种包的办，要从实践中研究。农村改革比工业、商业改革，牵涉比较少一些。农村改革，是从最困难的地方开始，先在一亿二千万人口中实行包干。我当时也没考虑全国就搞包干。经过实践，效果是好的。农村包的形式，根据不同的生产水平，也互不一样。江苏无锡的包干形式，如果没有两年酝酿，也出不来。工业商业改革必须要有这个过程。要按照不同企业，不同生产水平，采取不同形式，不能采用一种模式。首钢的包干形式，饮食业、服务业就不能采用。比较重要的生产单位实行包干，确有一个国家计划问题，应当采取不同形式。要把体制改革放在全部工作的突出地位。体制改革现在还没有完整的模式，还是探索中前进。看准了的要积极，没有把握的还是要探索。要防止老是走不动，但也要有领导有步骤地搞。工业、商业改革，与农业不同。没有把握不要动手。搞不好，会给改革带来新的问题。饮食业、服务业一包就灵，主要突出经营责任制，这有普遍意义。但包干形式应有所不同。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已搞专业化，没有剩余劳动力问题。这种类型，专业分工与责任制如何结合起来。如果要四季青实行凤阳的办法，那肯定是倒退。体制改革要在实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经济形势时的发言。

践中解决。复杂的问题，步子稳一些好。看准了的，大胆一点，一步一步搞，可能會有突破。凤阳的办法推开以后，对东北也有影响。杨易辰讲，责任制要同东北特点相结合，东北机械化程度高。杨易辰讲的是对的。工业、商业体制要改革，主要抓经营责任制，联产承包。饮食业、服务业可以搞，大企业要有步骤地搞，采取不同形式。广东南方大厦搞包干，设分店。东方宾馆一九八一年以前最糟糕，一九八一年以后搞包干，情况很好。国家计划要与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依靠好的企业推动生产的发展。

我赞成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要灵活一些，但究竟怎样搞，要很好研究。知识分子搞些自由职业是可以的，但科学院的知识分子都到外面去搞承包，又会产生什么问题？科学院帮助工矿企业应当是有偿的，对有关人员应给予奖励，增加收入应征收所得税。科学院工作的是知识分子，国家机关科技人员也是知识分子。对第二职业，目前匈牙利也有矛盾，不怎么宣传。对技术人员退休后的待遇也要有节制，否则会造成国营企业老师傅大批退休。对知识分子，一可以自谋职业，二可以有偿，但报酬如何分配，要作研究。路子要一步一步走，否则会带来一堆不容易解决的矛盾。

军工部门人才潜力大，顾虑也大。应当研究如何鼓励知识分子到高原、到边远地区去。否则，知识分子会倒流。

我赞成从管理体制上解决人才的流动问题，一般地议论原则不行，要议上几条办法出来。

关于发展教育事业给钱昌照同志的复信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

钱昌照同志：

访非回国以后，收到了您的来信。您这样高龄，仍在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操心，这种精神使我深受感动。对教育工作，老一辈都十分关心。前不久，陈云同志曾对千家驹¹同志“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的文章和来信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提出方案。您信中提出的关于建立统一领导教育事业的机构和召开教育会议两项建议，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已请中宣部、教育部就此作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报书记处、国务院审批。今后您还有什么考虑，请不吝赐教。

春节将到，祝您健康长寿，阖家安泰！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

（此复信抄告中宣部、教育部）

注 释

1. 千家驹（1909-2002），浙江武义人。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国务院财经委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89年留居美国洛杉矶，2002年在深圳病逝。

在经济工作上要多看几步棋*

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

一、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需要做认真的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很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今年是非常重要的—年，如果搞得好，使胜利的形势继续向前发展；搞得不好，也会困难重重，带来很多问题，影响到今后。我们在经济工作上，要多看几步棋，至少要看—步。

当前有两个问题很突出：—是原材料、能源很紧张。在企业扩大自主权，有了积极性以后，原材料如果供不应求，就会出现抢购现象，价格就可能控制不住。生产资料价格—涨，可能导致消费品也得涨价，那就会使市场紧张。二是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问题。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轻纺工业开始出现速度下降甚至萎缩的现象。有些产品增产了，货不对路，造成积压；而—些优质名牌产品却又脱销。特别是由于重工业上得很猛，在原材料、能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势必形成基建挤生产、重工业挤轻工业。重工业上得很快，主要原因又是基建上得太猛。—九八二年基本建设总规模突破八百多亿元，—年增加—百四十多亿元，这在建国以后也是少有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加以注意，就有可能使这两年—步调整而出现的好形势好景不长，计划绷得很紧，原材料、能源、市场供应有可能全面紧张，改革也将受到阻碍。历史经验证明，我们的国家，再大的困难都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吕东关于召开全国工交会议和王丙乾关于财政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能克服；而出乱子，往往是在形势好转的时候。在经济工作上，危险并不在于继续搞活，而在于宏观经济方面是否会发生问题，决策、布置是否恰当。当前经济工作中很多问题还不清楚，如出现了哪些新情况，原因是什么，还潜伏着什么问题，发展变化的趋向如何，都应该认真研究，分析透彻，以便采取对策。计委、经委要组织有关部门、经济理论界讨论，并吸收地方的同志参加，提出看法，必要时报书记处审议。

二、工业商业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我们的方针是，第一要坚决改，不能犹豫观望；第二，要经过试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根据工业、商业的不同特点，寻找不同的形式，不能一哄而起，一刀切。这样做，可能会稳妥一些，如果搞得不适当，折腾几年也转不过来。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端，推行以承包为中心的经营责任制，既不能看得很神秘，也不能看得很简单。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有可能摸索出一条路子来，但不能设想几个月、一年就能解决。农业上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经过四、五年的时间。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有所不同，它比农业更复杂，需要有个反复实践的过程，在探索中前进。小企业好办，大中型企业如何搞，我们的经验还不足。作为一项改革制度，不仅要看一年，还要看几年。总的原则是要真正做到挖潜力，出效益，实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

对国营工业企业，除了极少数具备条件的大型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办法外，应普遍推行利改税的办法，税后利润还余下很多的，再采取各式各样的承包办法。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实行利改税，就把二者的经济利益基本上划清了。在企业 and 职工的关系上，实行各种经济责任制，就把职工的所得同企业经营成果挂起钩了。所以利改税，既能使国家的收入有保证，又能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这比利润分成的办法好，没有什么危险性。因此，首先要搞利改税，不要动摇，今年普遍推广。利改税的具体方案另议。

商业体制改革中，实行政企分开的问题，一下子还做不到，要积极创造条件。对零售商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可以实行承包的办法，逐步推开。大的百货商店不要全面铺开，先搞几个进行试点，取得经验。批发商业如何搞，另行研究。

三、工资改革要跟上，今年内要拿出全面改革的方案。在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划清后，企业劳动生产率真正提高了，从原则上讲，工资、奖金不应该封顶，多劳可以多得。但现在条件还不具备，尤其是大中型企业要谨慎。要防止有些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趁此放开肚子吃“大锅饭”，工资、奖金大幅度增加，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挖一块，而换来的效果并不好。现在的问题是奖勤可以，罚懒不容易做到。如果搞浮动工资，浮上去容易，浮下来难。目前这个办法也不能大面积地搞。要研究利改税后，实行各种承包办法，怎样合理解决工资、奖金的问题。要瞻前顾后，通盘考虑，提出方案。

四、必须控制财政赤字，实现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一九八二年的财政赤字一定要压缩到三十亿元以内，要认真检查核实去年财政收支情况。如果落实下来还有差额，再考虑用中国银行的结益上交一部分来弥补。一九八三年财政赤字也必须严格控制在三十亿元以内，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今后对中国银行可以采取结益分成办法，超过多少上交，定个比例。

解决财政问题，一是要开辟财源，增加税收；二是要控制支出，减少负担。现在，地方、部门、企业掌握的资金不少，而国家财政很困难。针对这一新情况，财政要研究如何开辟财源的问题，不要限制各方面搞活，但要增加一些税收。如对农村专业户和收入高的户，要搞个征税办法试行。要坚持按财政体制的规定办事，今后的支出也不能再由国家财政包下来，该由部门、地方拿的钱，或要共同分担的，都要分别按体制规定办。对地方的支出，特别是一些经济富裕的地方，要多加控制，以保证中央有一定的财力，保重点建设。

五、流动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供应和管理。同意今后财政部不再增拨流动资金，每年可以从中央财政减少二十四亿元的支出。目前八百亿元的定额流动资金拨给银行后，新、老企业苦乐不均的问题，将由银行来调剂解决。有些事情，光靠经委、计委在上面审批不行，需要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如认为不应多办的企业，贷款利率就要高一些；要鼓励发展的企业，贷款利率就要低一些；有些要限制发展的企业，甚至可以停止贷款。今后基本建设资金，还要再转一些作银行贷款。人民银行的权力不能分散，必须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领导下，指导生产，引导建设。

天时人事日相催*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举行一九八三年春节团拜。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在座的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向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和各界人士，向保卫伟大祖国的全体解放军指战员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全体公安干警，向退休、离休的老同志，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向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专家，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亲切问候！

当举国欢度新春佳节的时候，还有千百万劳动者和指战员，坚守在生产、工作和战斗岗位上，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愉快、健康和平安，忘我地劳动着。在这里我向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二年是我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年。这一年里，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通过了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符合新时期建设党纯洁党的要求的新党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新宪法，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我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继续向前发展。国民经济在调整、整顿和改革中稳步前进，欣欣向荣；农业生产持续全面高涨，粮、

* 这是赵紫阳在1983年春节团拜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的春节祝词。

棉获得创历史纪录的丰收；工业生产计划超额完成；市场繁荣兴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各族人民喜气洋洋，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决心在今后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去年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一不是我们党、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勇于改革得来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更加努力地沿着改革的方向前进。我们将完成省、市、自治区和地、市两级领导机构的改革，进一步在领导班子中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我们要在经济领域和其他方面加快改革的步伐，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经过试验，分期分批，循序渐进。既不能犹豫观望、等待不办，也不能一哄而起、一刀切。我们在农村进行改革，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了大约五年时间。由于采用了典型示范，先易后难，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在实践中探索、逐步统一认识的办法，使这场规模如此宏大、意义如此深刻的改革，进行得极为顺利、健康，效果十分明显，超出人们的预料。城市工商业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无疑将比农业方面的改革更为复杂。但是农业改革的成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城市工商业和其他方面改革的方向，增强了信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指导改革顺利、健康进行正确方法。我们要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领导好改革工作。

我们必须继续抓紧经济工作，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努力提高生产、建设、流通领域的经济效益。要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搞好重点建设，为今后的发展准备条件。

我们要大力加强教育、科学和文化工作，彻底清除轻视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知识分子，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加专心致志地从事四化建设，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们要从今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整党工作，整顿党的组织，扫除不良作风，纯洁党的队伍，增强党的战斗力，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中国人民任何时候都珍惜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不久前，我和国务院的一些同事到非洲十一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加强了我国同非洲国家的联系。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友谊，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乘机机会，把他们的热情和友谊传达给我国人民，并向他们再次表示感谢。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一如既往，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我们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开展友好往来，扩大经济技术交流。

在我们欢度春节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台澎金马和港澳同胞，深切怀念国外侨胞。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同心协力，把祖国的统一大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相信，结束中华民族被人为分割局面的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同志们、朋友们！今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们共庆佳节，辞旧迎新，一定要发扬破旧立新，勇于改革的精神，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新的进展，作出新的成就！新春伊始，祖国大地，一片春色，“天时人事日相催”¹。面临着新的光荣任务，我们要珍惜时日，振奋精神，艰苦奋斗，踏实工作，向着新的胜利前进！

祝同志们、朋友们节日愉快！

祝各位老同志、老朋友健康长寿！

注 释

1. 引自杜甫《小至》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飞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小至为冬至的前一日。

加强干部的正规化培训*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因为工作忙，不能参加这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了，深以为歉。请你们转达我对会议全体代表的问候，预祝这次会议圆满成功。

希望中央党校和各级党校认真总结经验，改革教学工作，加强干部的正规化培训，既要对于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的教育，又要丰富他们有关经济建设的知识，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和管理能力，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 这是赵紫阳给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的祝词。

应在煤的转化和综合利用上下力气^{*}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我同意这个报告的看法和建议。不久前，我已批过国家经委赴东德的煤化工考察团的报告。总之，认为煤化工、煤气化应当提到我国今后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最近，陈云同志告诉我，要注意保护环境问题，这个钱总是要花的，晚花不如早花。我看，今后我们在煤的综合利用和转化上下力气，就既充分合理利用开发了资源，也为保护环境、治理污染采取了根本性的措施。因此，应作为一个方针性重大技术政策问题看待。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许多部委的分工，涉及长期计划，涉及到今后这种联合企业的管理体制，因此，请国务院科技小组就此与有关部委讨论一下，提出先抓什么，后抓什么，如何分工的意见，报国务院审批。

印发国务院常务会议，科技小组、计委、经委、科委，煤炭、化工、电力、城乡建设部。

^{*} 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报告的批语。

争取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

在一九八三年“全民文明礼貌月”到来的时候，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祝愿这项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活动在今年取得新的成绩，并且希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积极、更加认真地参加和开展这项活动。

去年三月，我国第一次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一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社会风气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日益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有了明显的改观，广大群众和干部精神振奋，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事实证明，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是动员亿万人民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种好形式，对促进物质文明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党的十二大提出，今后五年内要在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同时，争取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为了推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中央决定把“文明礼貌月”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今年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内容，除了原有的“五讲四美”外，增加了“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这样就使“文明礼貌月”

* 这是赵紫阳就开展一九八三年“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发表的广播电视讲话。

活动，内容更加全面，目标更加鲜明，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为了加强对这项活动的领导，中央还决定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也将建立这样的委员会。

今年的“文明礼貌月”活动，是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良好的情况下开展的。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人民群众建设精神文明的自觉性正在不断提高。今年三月，恰逢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二十周年，又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各界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精神，积极实现第六个五年计划，在各条战线上开展改革的时候。所以，这次“文明礼貌月”活动要有更高的要求。要在去年着重治理脏、乱、差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优质服务、建立优良秩序、创造优美环境，绿化祖国大地，进一步掀起学习雷锋、学习先进的热潮，进一步开展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活动。还要继续抓紧抓好计划生育，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以上活动，在全国人民中形成更加坚定的共同政治信念，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风尚，更加发扬光大；使人们生活在安定、美好的社会环境和文明、健康的社会风气之中，能够心情舒畅、专心致志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要有改革、创新的精神，都要脚踏实地、讲求实效。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要根据各自的职责范围，从实际出发，制定具体规划，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好“文明礼貌月”的各项活动。每个公民都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从自己的岗位做起，发扬主人翁精神，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要自觉地改善学习、劳动、工作、服务态度，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维护社会公德，努力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的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在对外交往中，要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维护祖国的荣誉和尊严。对外国客人应以礼相待，一视同仁。党中央和国务院相信，经过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今年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一定会比去年搞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有实效。

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解放军指战员，要站在改造社会风气的前列，在“文明礼貌月”活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广大人民群众

一道前进。各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积极领导。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扎扎实实地做好这项工作，经过若干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能够取得伟大的成绩。

全国各族人民行动起来，搞好一九八三年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夺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

让中非友好事业世代相传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我和谷牧国务委员、吴学谦外长等访问了十一个非洲国家。一般的情况，新闻机构已经报道过了。现在我就有关这次访问的几个主要问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一、为什么访问非洲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我们前往非洲访问，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各条战线上普遍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在继承建国以来所确定的基本方针的基础上，我国的对外政策也逐步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从而更加完善、更加明确了。近几年来，我们在对外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行动。对苏联，我们坚决反对他们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揭露他们对我国安全的威胁，同时，同他们开始对话，进行关于改善两国国家关系的磋商。对美国，在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我们对他们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并不姑息迁就，对他们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等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斗争。我们明确地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维护第三世界的权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积极支持七十七国集团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关于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我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同印度的关系也开始有所改善。我国同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友好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国同日本、西欧的经济、贸易、技术等方面的往来正在稳步地扎实地发展。总之，由于对外

工作的方针更加明确更加完整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得更好了，加上国内政治局面日益安定，经济情况日益好转，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也更大了。

在对外活动中，我们经常讲两句话：一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超级大国争霸，受害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了解、友谊和团结、合作，是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独立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有一百二十多个，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非洲国家有五十来个，又占了百分之四十。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次访问非洲，就是想比较集中地加强对非工作，为开创对非工作新局面准备条件。所以说，这次访问，是贯彻执行十二大制定的对外工作方针的一个重大步骤。

二、为什么选择这十一个国家

这次访问，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还债”。一九六〇年以来，非洲有四十三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来我国访问过，其中，最近两年间来访的就有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以后，虽然李先念同志在七十年代也访问了非洲四国，但政府首脑没有回访过，“欠债”很多。这次不可能一下都还清。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几内亚、扎伊尔、刚果（布）、赞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十国。后来由于对方坚持要求，又加上了加蓬。其实，在我们访非的消息传出以后，就有不少别的非洲国家提出希望我们也去访问，实在难以一一安排，只好婉言告谢。

为什么选择这十一个国家？这是有考虑的。主要是它们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各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十一个国家，地处非洲的北部、西部、中部、南部、东部等不同地区，幅员有大有小，独立有先有后，政治倾向和经济政策各不相同，都是我国的友好国家。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人口最多，独立最早，同我国建交最早，1973年中东战争后同苏联关系破裂，

逐渐同美国接近，戴维营协议后它在阿拉伯国家中处境相当困难，但在阿拉伯地区有重要地位，在中东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阿尔及利亚在争取独立的七年抗法战争中，我国曾大力给予支援，它独立后与苏联关系较好，在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中影响较大。摩洛哥同美国关系密切，在非洲和阿拉伯“温和派”国家中有代表性。几内亚是黑非洲独立最早、同我国建交最早的国家，前几年与苏联关系较好，杜尔总统是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元老之一。加蓬同西方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扎伊尔是中部非洲的大国，与美国关系较多。刚果是中部非洲同我国建交最早的国家，同苏联订有“友好合作条约”。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都是前线国家，我国给予经济援助较多，卡翁达总统和尼雷尔总统都是黑非洲老一代的政治家。津巴布韦独立才三年，在争取独立的年代里，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给以大力支持，它对我国也特别友好，独立后执行种族和解和团结白人的政策。肯尼亚在黑非洲国家中属“温和派”，同西方国家关系密切，近几年来同我国关系有发展。

总之，这次访问的十一个国家，各有各的特点。访问这些国家，表明我们愿意同所有非洲国家积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有选择地访问各种不同类型的非洲国家，对于全面地、有比较地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学习他们的长处，进一步做好对非洲的工作，也是有必要的。

三、访问的主要成就

这次出去，二十九天，访问了十一个国家。日程很紧，主要是会谈。国际形势，非洲形势，双边关系，都谈了。我们和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回国之前，我对中国的记者同志讲了，至少在七个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点：第一，大家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第二，都反对大国主宰小国，反对强权政治。第三，都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第四，都主张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第五，都主张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第六，都主张采取实际步骤开展南南合作。第七，都愿意积极发展彼此间的双边关系。这些共同点，是今后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和协调行动的基础。因此，访问是成功的。

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共同点？是不是会谈“谈出来”的？当然不是。有两个大前提：一个大前提是，中国和非洲都属于第三世界，遭遇相近，

处境相似，利害一致。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共同语言。再一个大前提是，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采取的政策是符合中国人民、非洲人民、世界人民的利益的。否则，一驳就倒了，不可能有说服力。这两条是根本的。没有这两个大前提，访问不可能有这样好的结果。

当然，会谈也有会谈的作用。有些事情，不说不大清楚。当面谈谈，可以增进了解，消除隔阂。事实上，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有些不大放心，想知道我们的底。有些是带点共同性的，比如说，中国究竟是反一霸还是反两霸，中国是否继续重视第三世界的穷朋友？有些则是不同的。一些同苏联关系比较紧张、同美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对我们同苏联开始对话以及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对美国展开斗争不理解，怕我们的政策变了。另外有些国家，同美国关系比较紧张，接受苏联援助较多，怕我们简单地“以苏划线”，另眼相看。这次见了面，就针对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谈。当然，不能到这个国家谈这一套，到那个国家谈另一套。那不合我们的原则。我们是全面谈，实事求是地谈，把原则谈清楚。中国反两霸，不是反一霸，因为客观上存在着两霸，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搞霸权主义。苏联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等地搞霸权主义，美国在中东和南部非洲等地搞霸权主义，两霸都在全世界争霸，两霸都在非洲插手，这都是客观事实。苏联虽在局部地区被迫处在被动防守地位，但苏攻美守的总态势并未改变，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总估计也没有改变。苏联仍在威胁中国安全。我们侧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绝不意味着不反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坎昆会议上，在选举联合国秘书长问题上，在中东和南部非洲问题上，我们都同美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管哪个超级大国在哪个地区、哪个问题上搞霸权主义，中国都反对。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都支持。中国反对两霸，不是无原则地搞平衡，搞等距离，而是具体分析，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主持正义。从形式上看，在美国插手的问题上中国的政策似乎同苏联有某些接近点，在苏联插手的问题上中国的政策似乎同美国有某些接近点，这是不难理解的。同样，第三世界各国，有的对美国斗争多一点，有的对苏联斗争多一点，我们也是理解的。有些国家从苏联方面得到一些援助，这并不影响我们同他们的友好关系。当然，作为朋友，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他们，在前门拒狼的同时，最好也提高一点警惕，

注意后门防虎。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反霸；在双边关系上，我们愿意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中国当然应当维护自己的主权。苏联领导人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谈当然是可以谈的，关键是要有实际行动。即使国家关系不那么紧张了，能够睦邻相处了，只要他们不放弃霸权主义政策，我们就决不停止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在处理自己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时，不是从中苏、中美关系出发的，而是从第三世界的共性、共同利益出发的，因此，中国同他们的友好关系是稳定的，有牢固基础的，不受国际风浪影响的。中国永远和第三世界国家同命运，共呼吸。我们反对两霸的坚定立场和各项对外政策，就是从第三世界的共同利益出发的。坚持中非友好，是中国既定的国策。我们到非洲来访问，更具体体现了我们同非洲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决心和诚意。这次同十一国领导人会谈，他们都比较满意，比较放心。气氛很好，很亲切，开诚布公。谈了以后，彼此更了解更信任了。政治会谈所以成功，主要是靠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这样做非常主动，很得人心。如果简单地“以苏划线”或“以美划线”，这次访问决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同十一国领导人直接接触，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不少情况。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即使是同某一个超级大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也决不是同那个超级大国没有矛盾，更不是甘心受制于人。在双方领导人单独会谈的时候，这种情况表现得更明显一些。事实上，近几年来，不少非洲国家都在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逐步同两霸拉开距离，更加积极地奉行不结盟政策。我们在各次会谈中，着重阐明了我国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无求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在独立自主地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这一点，我看对他们是有启发的。处理国际事务，就怕依附于某个大国。一旦独立自主的潮流蓬勃发展起来，超级大国肯定会越来越陷入困境。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

刚才说了我们同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许多共同点。是不是我们同他们“毫无差异”了呢？那也不可能。关于某个国际问题，大多数国家同意我们的建议，但也有几个国家表示为难。我们表示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介绍了背景，讲明了道理，即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转不过弯来，将来在

一定条件下，对其中有些国家终究是会起作用的。我们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要给他们以继续观察、继续思考的时间，让实践来证明是非曲直。我们应当有风度，有气量，把眼光放远一点。

四、非洲的独立运动

非洲各国的独立运动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55年亚非会议时，非洲只有几个独立国家，现在已有五十来个。当然，独立了，还有维护和巩固独立的问题，这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非洲争取独立的斗争还没有最后结束。我所接触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对南部非洲的问题都非常关心。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纳米比亚争取早日独立的斗争，一是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南非种族主义统治集团在美国支持下，一方面，在南非本土继续推行野蛮的种族压迫；另一方面，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对南部非洲的前线国家不断发动军事入侵和进行破坏、颠覆活动。就在我们到达津巴布韦的前几天，南非当局指使破坏分子炸毁了莫桑比克通往津巴布韦的输油管，使津巴布韦的石油供应发生困难。

我国在南部非洲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罪恶行径，坚决不同南非当局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们一贯反对美国在南部非洲问题上与整个非洲人民为敌的立场。过去，我们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安哥拉人民和莫桑比克人民的正义斗争。今天，我们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反对南非和美国把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作为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军的前提条件，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应该联系起来。我们在赞比亚会见了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人盖恩戈布¹，邀请了努乔马²主席访华。我们在赞比亚会见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坦博³，在坦桑尼亚会见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波克拉⁴，表明我们对南非所有反对种族主义的民族解放组织是一视同仁，而不是亲一派、疏一派的。我们对前线国家面临的威胁也表示关切。我们的立场得到了非洲各国的好评。现在，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正在进行艰苦的斗争。在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这场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北非阿拉伯国家共同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中东问题。事实上，这也是

全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中东地区长期以来已成为一个火药库，这是帝国主义种下的祸根，也是超级大国争夺的结果。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东爆发了四次战争，局部性的武装冲突更是经常发生。去年以色列公然武装入侵黎巴嫩，屠杀巴勒斯坦难民，至今仍拒绝从黎巴嫩撤军。中东问题的核心是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问题。以色列虽已被迫退出了西奈半岛，但仍然占领着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几十年来，中东问题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由于以色列当局凭借美国的靠山，自恃拥有军事优势，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在阿拉伯国家内部，由于两霸插手，也矛盾重重，主张不一，使问题更为复杂。经过黎巴嫩事件，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更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去年九月，阿拉伯国家首脑在摩洛哥的非斯举行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八点方案，这是阿拉伯国家在中东问题上第一次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一个重要的新发展。

我国对中东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坚决支持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这次我在同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领导人的会谈中，重申了我们的原则立场，强调以色列必须撤出一九六七年所占的阿拉伯领土，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民族自决和建立国家的权利应当恢复；在此基础上中东各国都应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对于一切有利于中东问题公平、合理解决的倡议和努力，我们都给予赞赏和支持。至于采取什么具体方式，我们尊重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作出的抉择。对非斯方案⁵，我们明确表示支持和赞赏，指出它是合理的，求实的，是全面、公正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我国的上述立场受到了北非三国的赞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⁶还专程从突尼斯来到阿尔及尔，感谢我国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现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正处在艰难的时刻，我们相信，只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五、非洲的团结问题

在我们访非期间，非洲国家领导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非洲各国人民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历来是相互支持的。非洲各地区性组织一个接一个诞生。最重要的是，1963年5月成立了非

洲统一组织。当时有三十一个成员国，现在已发展到所有已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二十年来，非洲统一组织已被公认为非洲团结的象征。

当然，非洲团结也不是没有问题。这本来也不是为怪。非洲各国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统治，彼此之间难免存在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独立以后，各国处境不一，内外政策也不可能相同。问题是超级大国一插手，情况就复杂化了。这就不能不影响到非洲的团结，影响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活动。

非统组织按惯例每年要召开一次首脑会议，第十九届首脑会议原定于1982年8月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行。但由于西撒问题、乍得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使会议无法召开。各国领导人在同我们的会谈中都为此表示忧虑，认为这是非统组织“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但他们都表示要继续努力，积极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⁷提出“必须挽救非统组织”。刚果总统萨苏⁸说，已派人同各方接触，寻求解决途径。扎伊尔总统蒙博托⁹表示要坚决维护非统宪章。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虽然在西撒问题上相互对立，也都表示要维护非统组织。肯尼亚、几内亚等国领导人还明确地指出，是大国对非洲事务的插手，加深了非统组织的矛盾，使非统濒临分裂。肯尼亚总统莫伊¹⁰表示，他作为非统组织执行主席，将为非统首脑会议的召开继续努力。前几天有消息说，非统十二国接触委员会已在肯尼亚开会决定，非统第十九届首脑会议将在今年五六月间在埃塞俄比亚开会。我们为此感到欣慰，衷心希望会议得以顺利召开。

在访非期间，围绕着非洲团结和非统复会问题，我们作为非洲国家的朋友，尽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非洲团结，对于非洲国家来说，确实太重要了。这是同非洲的前途息息相关的大问题。非统组织万一瘫痪，对非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对谁有利呢？仅仅对唯恐天下不乱的超级大国有利。第三世界内部也会有矛盾，有争论，但这毕竟是朋友之间的问题。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则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我们对各国朋友都说，希望大家都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耐心协商，互谅互让，以解决分歧，维护团结。中国不介入非洲国家内部的争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势力插手非洲事务。维护第三世界内部的团结，反对超级大国干预第三世界内部事务，这是反霸斗争的一项长期任务和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领

领导人都对我国的立场表示赞赏。今后，对于非洲国家之间以至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纠纷，我们仍应坚持这一方针。

六、关于经济技术合作

这是会谈的重点之一。

非洲各国都在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非洲的自然条件相当好，幅员广大，森林多，草原多，可耕地多，气候好，各种矿藏非常丰富。建设是很有前途的。我们访问的十一个国家，在经济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但也遇到了困难。有些国家，像几内亚、坦桑尼亚、扎伊尔、赞比亚，困难相当大。在我们同卡翁达¹¹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的当天，赞比亚宣布货币贬值百分之二十。访问坦桑尼亚时，正值桑给巴尔独立日，他们的领导人在庆典大会上向群众宣布，坦桑尼亚的经济“生了重病”，“要吃苦药”。其他一些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些困难。他们的困难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如缺乏资金，技术落后，管理跟不上等等，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在由穷到富的前进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要探讨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也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中转嫁负担。恐怕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是不受经济危机波及的，而且仍在继续受到冲击。现在他们都在研究改革国际经济关系和开展南南合作的措施。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刚果、坦桑尼亚等国，还在总结建设经验，调整经济政策。我们在访问期间，也向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介绍了一些我们自己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

非洲国家在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正在调整经济，自己也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双边的经济技术合作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他们会提出一些什么要求，我们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双边会谈的结果会怎么样，这是出访以前比较担心的问题。国务院为此召集有关部门专门进行了多次研究。过去我们对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对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很有帮助，对加强中非友谊起了巨大的作用，影响非常大。而且应当看到：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有力地支持了我们；我们在今后的四化建设中也离不开第三世界。当然，过去在具体工作中也确有一些问题，个别项目规模过大，超出了我们的国力，经济效益也不那么理想。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国

务院对这次出访中有关经济事务的谈判作了三点决策：第一，对已经建成的项目，应该帮助他们维修，继续提供零配件，并主动向他们建议提供管理服务，充分发挥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对已经承担建设的项目，必须保质守约，认真建好。第二，对最困难的和特别需要帮助的朋友，应在可能范围内提供必要的援助。主要是搞一些投资少、效益好、影响大、直接为当地人民服务的项目。第三，总的来说，今后应当把重点转到以互利为基础的经济技术合作上来。因此，决定主动向非洲国家提出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如果主要搞单方面的援助，那是难以普遍、难以持久的。互利合作，路子就可以越走越宽。他们有我们需要的原料，我们有适合他们的技术。我们还可以提供设备，进行技术服务和管理服务。可以合资经营，也可以合作生产。打开思路，积极探索，肯定是可以找到不少门路的。上述三点决策，都不是为了敷衍他们，而是切合我国和非洲国家实际的、我们能够做到、他们又能得到实惠的办法。

在会谈中，我们提出了这些主张，反映是好的，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他们也通情达理，一般都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几内亚的杜尔¹²总统同我们会谈时，第一句话就说：“几内亚经济有困难，但中国也有困难。”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公开向自己的干部和人民说，中国过去是在自我牺牲的情况下向非洲提供援助的。有些国家，还向我们提出了合作开采某些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以及合办中小企业等具体建议。我们准备在进行考察以后，再同有关国家进一步商讨。当然，这也要经过试验，积累经验，由小到大，由易到难，稳步发展。但态度必须积极，工作必须抓紧。四项原则，是真的，不是假的。各经济技术部门，驻外使馆，都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努力探索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新领域和新途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凡是对方有需要，我们有能力，对双方都有利的事，就应当积极去研究，去探索。

在会谈中，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我们根据上述精神，一一作了处理。有些项目，已投产多年，需要维修或提供零配件，我们同意加以安排。关于坦赞铁路，我们向坦、赞两国提出了愿意帮助他们搞好经营管理的建议，不久将由三国有关部门举行专门会谈。扎伊尔今年到期的一千万美元借款，我们同意他们用当地货币归还，把这笔钱转为双方合作项目的中方投资。对津巴布韦，我们同意再增加二千万元人民币贷款。对肯尼亚体育场的建设工程，我们也同意增加约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

币贷款。这十一个国家，除扎伊尔外，我们在双边贸易中，都是出多进少或只出不进，他们希望我们多进口一些商品，我们表示将积极予以考虑。摩洛哥要求增派医疗队，我们也同意了。这次在会谈中议定的具体事项，主要就是这些。

会谈了，下一步就是落实。有的要进行考察论证，有的要付诸执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牵涉到各部门、各地区，相当复杂，一定要组织好，配合好。过去我们有些事情，效率太低。前年穆加贝¹³总理访华，谈定了几个项目，一年过去了，进展不大。这次到津巴布韦，穆加贝总理又提了出来，我们只好作自我批评。凡是办不到的事，就不应承诺，这一点，大家现在比较注意了；已经承诺了的事，我们必须采取负责态度，这一点，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今后都应特别注意。

进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对国内工作无疑是一种促进。但归根到底，要把对外工作做好，基础在于国内。自己有实力，有长处，有技术，有管理经验，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就什么都好办。因此，务必抓紧国内工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七、关于中非友好

这次访问，我们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中非友好深入人心。我们所到之处，无例外地都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隆重的欢迎。今天，我要借此机会，代表中国政府，再一次向非洲十一国政府和人民衷心的感谢。

这次访问，受到了非洲舆论和世界各国舆论的密切注意和广泛重视。他们在评论中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是一次“赢得人心”的访问。他们指出，中国通过这次访问，“再次表达了对非洲正义事业的支持”，进一步“肯定了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传统友好关系”，“为中非友好合作打下了新的牢固的基础”。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许多非洲国家，尽管我们这次没有前往访问，他们的社会舆论同样对我们的访问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一次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友好访问。许多非洲报刊，用最美好的语言称颂中非友谊，他们说，中国是非洲国家的“患难之交”、是“靠得住的朋友”、“全天候的朋友”。

确实，中国在非洲的形象非常好。这是非常可贵的，是我们多年工作积累的结果。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如此信任，是对我国长期以来对非工作的最好的验证，证明我们的对非政策，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符合非洲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当他们进行独立战争的时候，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独立。在他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积极帮助他们建设。非洲朋友们如实地指出，中国对他们的支持和合作，同某些大国根本不同：中国从来不附加任何条件，从来不指手划脚，从来不干涉他们的内政。有的国家的领导人还说：中国不仅教他们“捕鱼”，而且教他们“养鱼”。他们对中国如此友好，如此信任，使我们更加体会到中非友谊的可贵。中非友谊来之不易。我们珍视中非友谊，就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制定的中非友好的方针，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正确的方针。

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如此之好，也是同中国在非洲的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分不开的。我们在非洲的技术人员、工人处处都受到称赞，我们的医疗队员被称为“最受欢迎的人”。他们守纪律，有道德，勤奋工作，艰苦朴素，勇于克服困难，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时刻都在为发展中非友好添砖加瓦。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使非洲人民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我代表国务院向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并且希望我国今后一切到非洲和其他国家去工作和学习的同志，都来发扬这种优秀的品质和作风。

国务院认为，在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在全体人民群众中，都要进行中非友好的教育。这要成为一项经常的工作。一切中国公民，都要以中非友谊为重。我们还应该教育青年和儿童，教育我们的后代，使中非友好事业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

注 释

1. 盖恩戈布(Hage Gottfried Geingob, 1941-), 时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人组党)副主席, 反对当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西南非洲的统治, 支持西南非洲(后更名为纳米比亚)独立。

2. 努乔马 (Samuel Daniel Shafiishuna Nujoma, 1929-), 时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 1990 年当选纳米比亚独立后首任总统, 连任至 2005 年退位。

3. 坦博 (Oliver Tambo, 1917-1993), 南非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 时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国大) 主席, 1991 年当选为非国大全国主席。

4. 波克拉 (John Pokela, 1922-1985), 时任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 (非泛大) 主席, 主张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当地非洲人把南非称为阿扎尼亚, 意为黑人之国。

5. 非斯方案, 1982 年 9 月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第十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 通过了以沙特建议为基础的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八点方案, 事实上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和以土地换和平的构想。

6. 阿拉法特 (Yasser Arafat, 1929-2004), 时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曾任巴解法塔赫领导人, 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总司令, 巴勒斯坦总统。1994 年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7. 尼雷尔 (Julius Kambarage Nyerere, 1922-1999), 时任坦桑尼亚总统。曾任坦噶尼喀总理、总统。1964 年与桑给巴尔合并后, 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任总统, 1985 年辞职, 由姆维尼继任。

8. 萨苏 (Denis Sassou-Nguesso, 1943-), 时任刚果 (布) 总统。曾任刚果 (布) 劳动党主席, 部长会议主席。

9. 蒙博托 (Mobutu Sésé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 1930-1997), 时任扎伊尔总统。曾任刚果国民军参谋长、总理兼国防部长, 并将刚果更名为扎伊尔。1997 年被卡比拉推翻下台。

10. 莫伊 (Daniel arap Moi, 1924-) 时任肯尼亚总统。曾任地方政府部长、内政部长。

11. 卡翁达 (Kenneth David Kaunda, 1924-) 时任赞比亚总统。曾任北罗德西亚人民大会党总书记, 民族独立党主席, 不结盟运动主席。

12. 杜尔 (Ahmed Sékou Touré, 1922-1984), 时任几内亚总统。曾任几内亚政府主席, 民主党总书记。

13. 穆加贝 (Robert Gabriel Mugabe, 1924-) 时任津巴布韦总理。曾任津非洲民族联盟总书记、总裁、解放军总司令, 总理兼国防部长, 总统, 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主席。

军队搞点农副业生产有利于 丰富供给和减轻民负*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你们的展览很丰富多采。

军队搞农副业生产，丰富供给，减轻民负，利国、利民、利军，过去讲保障供给，现在供给已保障了嘛，应当讲丰富供给。

军队农副业生产，第一是成绩很大，第二是潜力很大。全军粮食生产平均亩产才四百斤，现在全国南北方都不是四百斤了。要在现有基础上，挖掘潜力，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发展多种经营。

军队生产也要讲究个办法，把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地方搞责任制，军队怎么搞？当然不能像地方那样，谁包收入归谁，谁包就可以先富起来。但包还是可以包的，包就是包责任，实行定、包、奖。打仗可以分任务，包山头。搞工程也可以包，承包点劳务嘛。（万里：像六十六军那样承包引滦工程）。搞生产也要有明确的责任，可以搞奖励吧！精神奖与物质奖相结合。

军队搞生产有它的特殊的规律，要靠你们很好研究。

人员要专业化，不要调来调去，锄了草就走了，搞不好，彼此不分责任。老换班，浪费很大。小平同志讲机械化，机械化搞好了，可以减少生产用兵，这也是一种节约。

* 这是赵紫阳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参观全军农副业生产和蔬菜及绿化展览时的讲话要点。

北京部队在华北平原引种“汕优二号”杂交水稻，是个新闻，“汕优”杂交水稻对气温要求很高，北方种能行吧？是不是因为去年华北地区气温比较适宜？今年可以再试验一年。如果你们的经验能推广，将对北方水稻增产起重要作用。

腌制小菜成本高吧？我在成都看了给西藏的脱水菜，不知为什么成本那么高？在外国，如保加利亚，脱水菜已经商品化，可以大量供应。伊朗大量进口的就是保加利亚生产的脱水菜。要降低成本，才能普及。这些小菜上没上市，可以上市嘛！你们的小菜到市场上卖，我就去买。

你们的绿化搞得不错，人民解放军就是要为绿化祖国多做贡献。（万里：要做排头兵！）

必须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

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对整个形势的看法。

现在形势很好，多年来没有这样好的形势。但是，现在需要考虑，这么一种好的形势如何保持它继续健康地发展下去，避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好形势好景不长”的情况，关键就是要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我们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像今天这样好的形势。当然，就其深度、程度、特点不完全相同，但是历史上不是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形势，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形势都很好，但好景不长。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形势一好，基本建设规模就大上，就失去控制，最后破坏了这种好的形势，有一些甚至被迫再进行调整。现在我们在这种形势好的情况下必须要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绝不要再重复出现形势一好基本建设就失去控制的情况，要汲取过去的教训。

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是讲总规模不能多，但是在基本建设规模里面，重点建设必须增加。不仅保证重点项目，还要加强，不如此，就不能为下一个十年打下基础，我们的四化建设就要出现困难。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这个问题，计委同志都拥护这个意见。既然重点建设规模必须增加，因此就要下决心压缩地方上和各部门一般性的基本建设，这一点很不容易，关键是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汇报时的讲话。

中央要下决心。我们中央是有威信的，中央下了决心是可以控制的。我们过去多次调整，中央下了决心都调下来了嘛，既然规模大了都可以下来，为什么不可以控制呢？关键是中央下决心，常委下决心。问题关键不在计划委员会，关键是中央常委的决心。部门的问题、各地方的问题光有计委不行，人家不听计委的，如果中央决心下了，我认为是可以控制住的，大家也会拥护的。但是，这件事也会使地方上有相当大的抵触，部门相当大的抵触，原则同意，具体不赞成是相当普遍的，遇到具体问题就很难办。

另外，为了避免过去的教训，我主张技术改造要放宽一些。技术改造也可能出一点问题，什么基本建设混进去啊，对外重复引进啊，但是无碍大局。基本建设要严，技术改造要搞活一点，避免出现另外一种倾向。而且前十年抓技术改造也是为后十年振兴做准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前十年关键是三个问题：一是重点建设，二是技术改造，三是体制改革。前十年把这三件事真正搞好了，二十年翻两番大有希望。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计委、经委要明确分工：计委主要抓两件事，第一长远规划，第二基本建设，特别是重点建设。小平、耀邦同志都批评过，我们在重点建设问题上抓得不够有力，进展不快，现在这种抓法不行，必须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抓一百五十六项那样，集中抓，那时有很大一个班子，很集中，特别前期工作做得比较好，选厂址都搞得比较好。计委必须用很大力量抓基本建设，设计问题，建设周期问题，选厂址的问题，按时投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国家关系太大了。过去一种是不搞；一种是搞了抓得不紧，拖得时间很长；还有一种搞了毛病很大，后遗症很大。所以，要改变计委的工作，明确分工，一个长远规划，一个基本建设。这两个搞不好打计委的屁股。年度计划的执行，特别是技术改造放手让经委去搞。当然，这样一来工作上会有一些矛盾，但不影响大局。现在计委工作负担太重，什么事都集中在计委，就不可能把主要的事情抓得很实在。

第二个问题，财政收入这样少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过去我们国家多年来的情况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现在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六。现在要农民富，要企业富，我都赞成，但是还有一条，你富国家也得富，光讲农民富，光讲企业富，不讲国家富不行。当然，一般讲农民富、企业富，国家就可以富，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情况。现

在是农民收入年年增加很多，企业收入年年增加很多，国家收入增不上去。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随着企业收入的增加，国家收入必须要增加。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果没有国家财政来调整投资方向，搞重点建设没有多大希望。光靠大家钱很多，大家联合干还不行，不仅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不行，就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行，资本主义国家建设周期比较长的工程，如铁路也好，矿山也好，电站也好，新型工业也好，都是靠国家投资搞起来的。财团、资本家搞的都是加工工业，包括美国，美国西海岸开发也是国家投资，日本铁路国家投资占很多，电子工业也是国家投资；至于英国、法国，这种工业是国有的。交通、大型能源建设这些大型项目想靠下面自发搞起来，那是不可能的。

在国家财政里面，中央掌握的收入和地方掌握的收入的比例也必须改变，中央掌握太少。过去我在地方是代表地方讲话的，前天我向小平同志讲了，因为中央掌握的财政过少，现在已经妨碍了中央制定的统一政策的贯彻，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现象。中央掌握的钱少，下面又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政策要中央考虑，比如知识分子要提高工资，钱谁来出？地方出还是中央出？国家进口粮食亏损的钱地方出还是中央出？进口棉花亏损的钱是中央出还是地方和工厂出？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的综合采煤机，我们花了几十亿美元，搞了一百套综合采煤机拿到山西和各地用，这就发生个折不折旧的问题。现在山西使用没有折旧，这不是笑话吗？为什么没有折旧？谁来负担？折旧可以，中央出钱，要煤矿出钱山西省委不答应，因为影响他的财政收入。又如耀邦同志经常讲的一个问题，有些地方粮食卖不出，有些地方没有粮食；没有粮食的地方向中央要，为什么？就是因为粮食多的省要把粮食调出来就得议价算账，调入粮食的省要求按牌价给他，这就发生了一个补贴问题，十亿斤粮食就要补一亿五千万万元，这个钱谁来出？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政治上的统一，影响到政策上的统一贯彻，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再发展下去，就会影响国家统一，出现南斯拉夫那种现象。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外国对中国的调整评价很高。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并不是不知道南斯拉夫的经济必须调整，一九八〇年久拉诺维奇¹到我国来，他主动讲经济必须调整，但他搞不下去。南斯拉夫经济应当怎么

搞他们是知道的，但搞不动，中央讲话要跟地方协商，讲来讲去，地方不赞成就有否决权，一直到现在调整不了。当然，他们也提出要决心调整。我认为财政问题不单纯是财政问题，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必须有财政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政治上统一将来可能发生问题。所以，国家财政收入如果不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里面中央财政不增加，一定会影响四化建设的进程。

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原则同意的话，具体办法还要进一步研究，尽量采取地方上同意的办法。

第三个问题，对企业的政策。

我觉得对企业的政策应该是两条：第一条，要承认企业的利益，要给企业以活力，调动积极性，不要把手脚都捆起来，让他们在改善经营管理，挖掘潜力方面有所作为。第二条，对企业必须要有压力，必须把担子压在身上。在我们国家改革绝不能走企业轻轻松松可以发大财的路。如果轻轻松松就可以发财，不可能调动先进企业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企业家。现在我们进行改革都是谈判，哪个方案对我有利我接受那个方案，那个方案对我不利我就不接受，不是要改变吃大锅饭吗？那我还吃大锅饭。要不然就答应我什么条件，要不然就吃大锅饭，这不行。因此，要立法，一是要这么搞。外国搞税收并不征求企业意见，国会一通过税收就加上去了。据我所知，国家对企业的条件中国是很宽大的，除了过去吃大锅饭以外，现在条件也非常宽，比较优惠。所以，说“中国对企业太温和”那个话我是赞成的。我最近看了匈牙利的材料，匈牙利对企业相当厉害，一方面开个口子，另外就逼它，所以企业不改进经营管理，不努力工作，这个企业就混不下去。外国是自然淘汰，企业家有进取心，我们改革的结果也必须是真正鼓励先进的企业，而不能随便什么企业都得到奖励。如果是随便什么企业都可以得到奖励，对我们国家不利，而且也搞不起。

一个动力，一个压力，不能随随便便就增加很多收入。这两年企业也没有改多好，但钱可比过去多多了。最近三年，每年银行存款增加一百亿元。现在银行存款一共三千六百亿元（包括积压物资），其中属于存款二千一百亿元；各级财政的存款七百亿元，企业存款七百亿元，城乡个人存款近七百亿元。有些企业没有改善什么管理，奖金发得很多，企业富起

来了，但国家搞得很穷。因此，对企业要讲两条：一个我给你活力，不能把手脚都捆起来；二是担子不能太轻，使他们有压力才行，我们改革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第四个问题，关于奖金封顶问题。

这个问题有一段过程。一九八〇年主张不封顶，那一年搞的结果效果不好。因为奖金问题在企业内部发放很不合理，不封顶，发得很多，更加剧了不合理。一九八〇年下半年觉得不行，一年增加三十多亿元，因此就要调整，把奖金就封顶了。一九八一年下半年，全国出现财政包干，由于当时财政分不下去，首先是辽宁的经验，以后是天津经验，以后北京、山东也要求，财政对企业包干，当时我也很赞成，包干以后封顶问题有一部分突破了。这个突破也要作个分析，现在看来有一部分效果好，有相当多的效果还是不好。所以，一九八二年又统统稳定在前一年的水平上。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封顶不是个好办法；二，必须具备很多条件以后才能不封顶，在条件没有具备的时候，还不得不封顶；三，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分别对待，可以不封顶的如井下工、搬运工。如果仓库没问题，运输没有问题，可以搞计件工资的，还有很多先进企业，确实管得很好的，可以不封顶。有一些现在还没有条件的地方，要先创造条件，然后才解决不封顶的问题。现在不能笼统提不封顶，如果笼统提不封顶，搞不好又是几十个亿抛出去了，这就为下一步改革工资造成新的困难。要搞一个方案，哪些封顶，哪些不封顶，准备在工交会议上讨论，然后在书记处定案。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即使将来不封顶了，国家对消费基金（工资、奖金）还必须有一系列控制和节制的办法。企业不能完全自由。匈牙利有个节制的办法，我认为是好的，我是赞成这个办法的，但是，我们的条件不具备。匈牙利什么办法呢？企业在工资上有很大的自主权，经营的好，可以多发工资或奖金或分红，但有一条，国家有一个工资总额，比如这个企业一万元工资总额，可以超过，但每超过一块钱就要交给国家两块钱；一百块钱实际上只能多发三十元。什么道理呢？消费基金扩大了，国家为了解决购买力，需要准备物资。我主张我们用累进税的办法加以控制。一，将来企业工资应当和企业经营的好坏挂钩，经营得好多发，经营得不好低一点；二，工资发多少，将来不封顶时也必须有一个节制办法，消费基金

完全失去控制就叫没有计划。对这个问题就我所接触的改革家没有一个人说社会消费基金可以不加控制。

我们现在说的封顶是对一个行业、一个企业来讲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封顶，按人不封顶。首钢也是封顶的，当然它标准高，三个月的工资。按人是不封顶的，有人得的多，有人得的少，现在全国都是这样，企业封顶，人不封顶。将来企业不封顶了，也要有一系列控制办法。采取什么办法，再研究制定。

注 释

1. 久拉诺维奇 (Veselin Đuranović, 1925-1997), 时任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曾任南斯拉夫总统。

搞好水利建设 发展旱作节水农业*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搞农业，搞水利，也要进行决策论证，进行可行性研究。

关于黄河中上游的水利工程，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初步设想，如大柳树（或黑山峡）水库，万家寨水库，龙门水库，以及小浪底水库等等。这对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解决工业用水，以及根除黄河下游隐患，会有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全面统筹，综合论证。第一要算水账，第二要算效益。水就那么多，这个水库浇了多少地，那个水库还能浇多少地？上中下游都要用，水到底够不够？如果不够，就要研究用到什么地方合算。反正就那么多水，是浇沙漠，浇丘陵，还是浇旱原？这就要论证，看哪些工程投资少、经济效益大。

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不大讲投入产出，不大讲成本核算、经济效益。工业不讲，农业更不讲，今后要改过来。无论工业农业，都要树立经济效益的观念。搞农业、搞水利，同搞工业一样，也要进行决策论证，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几个方案，加以比较，选择最佳方案。这样，可以提高我们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也不至于浪费农民的积极性。

中国农业不能都靠灌溉解决问题，要十分重视群众搞旱作农业的经验。

水利电力部的专家们说，龙门水库的地质工作已进行了八年，现在选的坝址比较可靠。把龙门水库修起来，据说可以浇一千万亩地，渭北就可以变成一个大粮仓。

* 这是赵紫阳在陕西考察时的谈话纪要。

看来，龙门水库也可能要上。但是，渭北的同志不要把宝押在修龙门水库上，因为至少在近期内用不上。即使上，这么大的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从建成枢纽工程到渠道配套，要多长时间？恐怕在二十年内不一定用得上。过去我们常常把问题看得很简单，好像一修水库，什么都解决了，其实需要很长时间，近期内指望不上。我看，渭北，陕北，都要好好研究旱作农业的经验。这是最现实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很重要。但同时要确立一个基本观点：中国的农业不能统统都靠灌溉来解决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南方的水多一点，但也不算太多。北方则严重缺水。农业，工业，都要用水。北方工业用水这样紧张，好多同志在十几年前还无法想象。那时想得很简单，发展工业，盖工厂就是了，根本没有想到工业用水也会成为问题。现在不同了，大家都认识到了，工业也要用水，没有水，盖了工厂也没有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长远规划里，要认真研究水的问题，包括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问题在内。

不搞灌溉能不能解决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解决问题。国外有一种说法，年降雨量在四五百毫米以上，就可以不搞灌溉农业。怎么办？搞旱作农业。渭北地区，陕北地区，平均年降雨量有四百多毫米，五百多毫米，种两季作物水不够，种一季作物就够了。关键在于保墒。小麦并不是低产作物，保墒搞好了，一季小麦也有很大潜力。

这里的特点是春天旱，但秋季雨水集中。秋天把雨水积蓄起来，春天避免蒸发，就可以秋水春用。从西安到韩城，从铜川到延安，走一路，看一路，找干部谈，找技术人员谈，都有许多好办法。合阳县的水浇地并不多，但小麦长得很好。他们采取的办法，同山西壶关种谷子的办法差不多：秋天深翻，土质疏松，一次施足底肥（叫做“一炮轰”），吸饱水，春天不翻，蒸发少，墒情好，种上后一亩旱原就能收小麦五百来斤。黄陵县的示范农场把保墒问题同增加土壤肥力、进行精耕细作结合起来，一百亩小麦，亩产六百斤。这个农场的技术人员杨贵本同志说，过去，总以为黄陵的问题是“旱、粗、薄”，把“旱”字放在第一位，好像不修水利就毫无办法。经过几年实践，他们的认识有了变化，把这三个字颠倒过来，努力解决“薄、粗、旱”的问题。他们着重搞轮作，苜蓿和小麦轮作，大豆和小麦轮作，油菜和小麦轮作，农家肥多了，土地由瘠变肥，耕作层由薄变厚，保墒也

搞得更好了。周围的农民向农场学，普遍提高了产量，有一户还超过了农场，小麦亩产达到八百斤。延安也有许多好经验，如山地搞水平开沟种植法，沟壑筑坝淤地等。总之，要十分重视群众搞旱作农业的经验，从选择耐旱的作物和品种，一直到采用有利于保墒的耕作制度和栽培方法，都要总结，因地制宜，一块一块地推广。农业要一块一块地搞，不能千篇一律。中国的事情，就怕千篇一律，要搞大家都搞，要不搞大家都不搞。那种领导方法，不是好办法。

秋水春用这种保墒办法，对相当一部分地区是适用的。海南岛有的地方春天旱，种甘蔗出苗不齐，改为秋季种，甘蔗产量就提高了。四川武胜县，坡地上种苞谷，也是怕春旱。他们的办法是秋天深翻，开沟，施土杂肥，春天不耕，刨坑点种，就把墒抓住了。去年在山西听到了壶关种谷子的经验，今年在陕西又听到了合阳种小麦的经验，基本道理都差不多，对春旱而秋季雨水集中的地区是适用的。外国讲免耕法，我们中国在春旱严重的地方，恐怕可以搞点秋天深耕施肥、春天不耕法。目的是保墒，尽量减少蒸发。

搞旱作农业，大旱之年怎么办，能不能稳住？稳产这件事，只能是相对的，不能强调得过分。在农业产量问题上，我看哪个国家都稳不住。澳大利亚是个发达国家，农牧业现代化程度很高，去年大旱，它也没有办法。我们考虑问题，不能要求大旱之年也能稳得住，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只能要求在正常年景得到较高的产量。渭北地区是五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如果采用好的旱作经验，三年正常，能打六百斤；一年小旱，收它四五百斤；一年大旱，只能得三百斤；那末，五年算总账，仍然可以平均打到五百斤左右。所以，搞农业，不能着眼于一年，要看平均数。我们搞计划，往往只讲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什么产量。其实，这很不科学，谁知道那最后一年是风调雨顺还是大旱大涝？有的国家现在作计划，已经改了，不讲最后一年达到什么产量了，而是讲五年平均达到什么产量。我看这种计算方法，比较合理。

节约用水应成为经济建设的重大政策。

近期内不能指望大水库。小的水利工程，还是可以靠得上的。扬程不太高的提水灌溉，在既有水源又有电力的地方，还是可以搞的。当然，

要找出一个合理的限度，比方说在渭北地区，扬程在一百米或一百五十米以下的提水工程，看来还是可以搞的。超过了一定限度，扬程过高，就划不来了。

搞灌溉农业，必须十分注意节约用水。到底采用什么灌溉方法？大水漫灌，既浪费水，效果也不好，搞得不好，还盐碱化。中国的灌溉农业到底怎么搞？我们这个国家，尤其北方，要搞省水型的农业。节约用水，国内外都有一些办法。一种是把渠道衬砌好，一种是喷灌，一种是滴灌。陕西韩城的对岸是山西万荣县，据说万荣县的办法是在地里埋瓦管，渗灌。这一带，有煤有土，自己烧窑，无非是劳力投资。要算算账，把几种灌溉方法对比一下，成本如何，效益如何？节约了水，不仅降低了用水成本，而且可以扩大灌溉面积，也就等于多修了水利工程。这个里边，很有文章可做。中国水这么缺，工业，农业，都要节约用水。这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重大政策。

一是研究节水的办法，一是实行节水的政策。不收水费，或者水费收得很少，节约用水就行不通。合阳县委书记说，他们那里的水浇地，每亩地浇一水，水费成本是六七元；浇两水，成本要十二元；还有浇三水的，成本达十八元。但有的根本没有向农民收水费，有的收了，也只是每亩收二元。大量的是国家补贴。这样不行。把灌溉建立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是不能长久的。农民没有买水的观念，节约用水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而且，旱原缺水，水是非常宝贵的，这里在等救命水，那里却在大量浪费水，矛盾也很大。

水利建设，过去成绩很大，但浪费也很大。长此以往，无以为继。今后水利建设要实行这样一条方针，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国家不共农民的产，农民也不靠国家的补贴吃饭。水利用工，应当给农民以合理的报酬，不搞无偿劳动。农民用水，必须向国家缴纳水费，不能老是由国家贴钱。也可以把水利用工作为投资，在农民用水时逐年扣除。我看，水费一定要收，而且不能把水费标准定得太低。收水费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可以推动大家节约用水。

发展农业要增强经济效益观念*

一九八三年三月

延安这几年有很大的变化，也有很好的经验。现在延安开始欣欣向荣，令人振奋。群众和干部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听了很高兴。

你们要认真总结自己的主要经验。你们说，一是政策好，二是国家支援，三是措施、办法对头。很好，希望你们从这三个方面好好总结。

关键是政策。过去有些地方也想改变落后社队面貌，但没有从政策上去考虑，只是整干部，换干部，不相信当地干部。一九七七年以前，四川江北县就采取过这种办法，结果问题解决不了，越落后越整，越整越落后。改变面貌，主要靠政策。搞了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落后面貌也就改变了。所以，首先要有正确的政策，这是第一条。

国家给了你们一些支援。要总结如何用好这笔钱。国家力量有限，这些资金只能用在最困难的地方和潜力大的地方。要一块一块地搞，不要撒胡椒面。中国的事情就怕要搞都搞，要不搞都不搞。国家力量大，就多搞几块，搞大块；力量小，就少搞几块，搞小块。这也是毛主席老人家讲的抓两头。有了好的政策、措施，加上一些支援，一块一块地搞，就可以事半功倍，一块一块地变。还要想点办法，使国家支援的这笔钱，又投放，又回收，能够周转起来，连续不断。

所谓措施对头，就是要讲效益。过去农业不讲成本，不讲投入产出，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农业今后也要搞可行性研究。就这么多财力、物力，

* 这是赵紫阳同延安地委负责人的谈话摘要。

用到什么地方合算，要比较，要论证。农业要树立经济效益的观点，因地制宜，选择最佳方案。这样，各级负责同志领导农业的水平就可以提高。

我觉得我们搞农业不能光走水利一条路。当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很重要。但是，要明确一个基本观点，中国的农业是不可能全靠灌溉的。我们国家也没有那么多水。中国十亿多人口，人均占有的水并不多，特别是北方，水就那么一些，灌溉也不能用那么多水。工业用水也厉害得很。华北在十年前还没有想到办工厂缺水。凡是不灌溉也能解决问题的，就不要靠灌溉。外国有个观点，年降雨量在四百毫米以下，才非搞灌溉不可。这里年降雨量在五百毫米以上，就要着重研究如何不灌水而夺得高产。因此，保墒很重要。你们这里有很多好办法。山地按等高线横向开垄，利于保水保土保肥，比纵向开垄产量提高五分之一，这是一种好办法。你们讲的“一炮轰”（注：秋季深翻后，把农家肥、碳铵、磷肥混合起来，一次垫底深施），我也很感兴趣。在渭北，合阳县的同志也讲了这种办法。渭北、陕北一带，雨量虽少，但集中在七、八、九月，这就为保墒提供了条件。秋季深翻，加上“一炮轰”，把水分积蓄起来，种上小麦，春季不耕，减少蒸发，度过了春旱，就好办了。四五百毫米雨量不算少，种一季作物是够用的，关键在于保墒。外国搞免耕法，我们在秋天雨水多、春旱严重的地区，可以搞秋天深耕、春天不耕法。我在渭北看了几个县，合阳水地并不多，但小麦长得很好。许多没水地的地方，产量并不比浇水的差。我看有两条，一是有保墒的经验，一是靠政策，搞了责任制。黄陵县农场有个农艺师叫杨贵本，大学毕业，他搞的一百亩试验田，小麦亩产上了六百斤。周围的农户跟他学，都增了产，有一户还超过了他，亩产达到了八百斤。他讲，他们那里过去讲“旱、粗、薄”，旱字当头，好像不修水利，就毫无办法。现在认识有了变化，把三个字倒过来，解决“薄、粗、旱”的问题。他们很注意轮作，搞油菜、大豆、苜蓿同小麦轮作，地力肥了，耕作层厚了，对保墒也有利。保墒问题，同耕作技术、施肥方法有很大关系。过去老百姓对旱地不下工夫。现在实行责任制，农民中间蕴藏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他们是舍得下投资的。听说你们这里有些地方小流域治理搞得很好。坝地也是个好东西。你们要想些办法，既搞包干到户，又要使打坝不受影响。

山区退一些耕地，逐步还林还牧，搞多种经营，路子就宽了。要制止

开荒，避免破坏生态平衡。西北要从根本上改变面貌，需要有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不可能一个早晨就都种了草，栽上树。要在由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的中转点上下功夫。平原多搞点粮食，山区才能少搞点粮食，逐步循环过来。你们这几年搞得很有成效，要好好总结一下，请西海固、定西的同志也来看看。

要搞智力投资。陕西也好，延安也好，必须搞智力投资，培养技术人员。不培养人才是难以上去的。延安地区最迫切需要的是中专，不是大学。全国大学本科多，大专少，中专也少，教育结构不合理。中专学生作用很大。现在工厂里做出成绩的，很多是过去的中专生。大学不要多搞本科，搞一些必要的大专，学二年。你们很需要中级以下的技术人员，高级的，可以同西安、北京商量，支援你们一些。你们这里重点要放在中专上。电视大学很好，去年全国毕业九万二千人，学得不错，都发了文凭，国家投资少。电视大学如此成功，是因为中国人用功。延安把转播工作搞好，许多人就可以进电视大学，你们还可以组织辅导中心，电视机一开，大家都来学。

企业改革要优先保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

你们说形势好，我也说形势好，但现在财政收入不上去，情况很严重。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财政收入，必要的重点建设如何上得去，经济怎能持续增长？八十年代不搞重点建设，九十年代能出现经济振兴吗？今年一二月份财政情况不好，工资、奖金增加，国家得小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大头，这怎么行？现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不一致，如果宏观经济没个出路，微观经济也不能巩固。财政收入的增长同国民经济的增长太不相称。去年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几，财政收入只增长百分之一一点几。电力、原材料消耗那么多，钱到哪里去了？无非是下面得多了，或者是经济效益很差。我们国家历来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一，财政增收十亿元，这还是没有强调经济效益的时候。现在，提高经济效益问题已经讲了三年，财政收入还是上不去。

我们国家这么大，又不发达，如果不通过国家财政集中资金进行再分配，大的能源、交通项目怎么搞上去，其它必要的建设项目怎么上？增加财政收入，不是财政部要收入，而是国家通过财政进行再分配。集中资金，没有这么一个渠道，光靠联合集资，能行吗？小的项目联合集资可以办，真正要把最近二十年的建设搞好，大的重点项目仅靠联合集资是办不起来

^{*} 这是赵紫阳邀集出席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的鲁、沪、鄂、粤、川、辽、甘七省市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摘要。

的。国家的财政收入是个极大的问题。总要想办法把国家财政收入搞上去。这里有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如同组织一个战役，总的方面打了败仗，你一个连、一个排打得再好，还是不行。现在是否局部讲得太多，整体讲得太少？放开眼睛一看，问题非常明显。从一个企业、一个地方看，好的例子多得很。但是，工资、奖金增加了几十亿元，财政收入没有增加，这样行吗？说民富国穷，那是虚假的，是昙花一现的。没有国家的兴旺，怎能有人民的富裕？当然我们也不能再搞竭泽而渔，重复过去的错误。但是国家财政收入不改善，国家振兴就不可能。我们国家虽然穷，但是地方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能够集中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一五”期间如果没有一百五十六项，能有工业化的基础吗？八十年代不适当集中力量搞重点建设，能有九十年代的振兴吗？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要通过财政渠道，解决一个省、一个地方无力解决或者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集中暴露的是财政问题，但这涉及到一系列问题。

过去几年，提高工资、发放奖金、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改善人民的生活福利，都是必要的，带有还欠账的性质。不如此，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调动，但应有个幅度。我们国家底子薄，现在还没有到强调福利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很多基础设施要搞，不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农民能一直富下去吗？企业一时富了能够维持下去吗？当然，我们也要牢记过去的教训，人民生活要逐步有所提高。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就不适合我国国情。我认为这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当前全国形势确实很好，但要冷静地往前看一看，把各方面的关系摆正。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教育人民看远一点，支持国家重点建设，考虑到长远利益，要像“一五”期间搞一百五十六项那样。不然，我国经济不可能有持续稳定的增长，更不可能出现九十年代的振兴。

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认为是合理的，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什么叫按劳分配？过去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对，反过来一个月一下子就增加一百多元收入，这能叫按劳分配吗？由于价格不合理，或者由于长期落后，早就应该达到的水平达不到，结果一包，企业和职工的收入一下子大冒上去，这是不合理的。一个月奖金拿到七八十元，再加上原来的工

资，相当于一个副教授的收入，这能叫按劳分配吗？有个家庭，一个儿子在先进企业，劳动纪律严格，经营管理也好，每月奖金有限，一个儿子在落后企业，搞了承包，奖金拿到六十元，一个牢骚满腹，一个“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能叫按劳分配吗？城市和农村情况不同，企业设备好坏、生产什么产品、卖什么价钱，都是国家规定的。这些情况不考虑，都“按劳分配”，合理吗？有的企业搞承包，头一年奖金七八十元，第二年没有油水，情绪又低了。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能行吗？政策要定在合理的基础上，积极性才能持久，如果不合理，积极性就巩固不下去。城市与农村的改革，原则都是要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但是城市要复杂得多。鲁西靠棉花发家，收购一百斤棉花，二十斤是牌价，八十斤是高价，所以很快就富了起来。南通长期以来就是棉花高产区，收购一百斤棉花，二十斤高价，八十斤是平价。鲁西的情况，南通的农民还不一定知道。城市就很不同。西单菜市场，卖菜的工作量最大，承包后还要扣发百分之二十基本工资，卖鸡的奖金可以拿到七十元，经理就不敢发，还得搞点平均主义。像农村“以副补粮”一样，卖菜的也要抽些人卖鸡，“以鸡养菜”。问题不是不能解决，但是比较复杂。什么叫“按劳分配”，概念要清楚。按恩格斯的说法，在同等条件下，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现在，得多得少，全是靠机会。城市改革既有迫切性又有复杂性，要经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现在的问题是要头脑清醒。城市要真正解决按劳分配问题，必须是价格体系要根本解决。这要有一段时间。

计件工资有个定额问题。我们的基础工作太差，好多企业搞平均先进定额搞不出来。计件还有个上下左右的问题。从一个厂看，实行计件好，但社会效益不一定好。因为有些产品销不出去，质量不好，有的这道工序上去了，那道工序上不去。煤炭最好实行计件，但如果运不出去，一个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社会得不到效益。现在光讲理论不行，还要考虑现状。物价很不合理，企业组织结构很不合理，调整任务还很重。不考虑这些情况，孤立地去搞一些事情，出发点好，后果就不一定好。这种情况在工业里相当不少。比如，装卸实行计件没有问题，也可以不封顶，但也有个卸了以后能不能疏运出去的问题。货物不压在船上了，但又压在码头、仓库里，也不行。实行计件工资要具备条件，有的也可以在搞的中间创造条件。

看来利改税比包干矛盾要少一些，可以调动积极性。恐怕不能两种办法随他挑。有利就干，无利不干不行。利改税基本定下来，除少数企业外，基本是搞利改税。比较来讲，税收有利于处理三者关系，不用年年吵基数。改革的方向是税收不是包干。有人还建议，在价格没有调整以前，收货物税。不同商品不同税率，利高税高，利低税少。总之，从方向上，是走税收的道路。

工业企业同农业不同，是在大锅饭里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大锅饭不能完全解决。在我国，奖勤容易（这里的“勤”还有真有假），罚懒罚不下去。到时总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让他跳楼吧！奖易罚难这个问题要看到。最后变成搞得不好的，照吃大锅饭；搞得好的，另起炉灶，去吃小锅饭去了。这就很难办。现在企业存款累计达到七百亿元，而国家财政继续困难。

我们对企业不要捆死，这一条要坚持，但也不能给企业的条件太优越。一不死，二又不能太宽。改革不能光由死变活，还要由宽变严。严了，才能挑起担子。日本小林实讲：“中国对企业的政策太温和。”这个话有道理。一个政策下来，有些企业可以搞得很好，有些企业紧紧张张、勉强过日子，有些企业很困难，这样才能促使企业千方百计改善经营管理。才能出人才。对企业又活又宽，我们搞不起；搞活给动力，搞严给压力。

现在形势很好，往前怎么搞，要很好考虑。以上讲的这些问题，都有联系。

从财政到企业，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改来改去，要增加财政收入，不然就改不下去。现在财政一年收入一千零三十亿元，基本建设三块钱顶不了过去的一块钱，问题大得很。基本建设除了战线长以外，这个问题也要认真研究。我们搞经济振兴，是真搞不是假搞，这些问题都有，要认真研究解决。现在，到处卡油，造价比过去高一倍两倍。一九五六年基建投资二百多亿元，等于现在的七百亿元。现在的五百多亿元，实际上顶不上过去的二百亿元，这个问题太大。现在的基本建设，百分之四十是非生产性建设，这也是需要的。人民拥护，大家高兴，但是这样搞下去，二〇〇〇年的振兴就没有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国情、对现状的冷静分析。例如，农村把一切都说成双包的成果就不科学。如果不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不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情况又会怎么样？广东如果不调进十二亿斤粮

食，还像过去每年调出三亿斤，你的大好形势会怎么样？这很清楚嘛！什么事情都要作科学分析。当然，在我们实行提价、进口、开放集市贸易等等的条件下，包与不包确实不大相同。我们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是正确的。形势好了，往前考虑要作很好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话又说回来，还得搞重点建设，原有企业还要搞技术改造。要使经济振兴，人民富裕，还得在八十年代正确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要在人民当中进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教育，还要靠全国人民努力。要搞重点建设，在一定时期内不能不影响到人民的消费。当然，老勒紧腰带、竭泽而渔不行，但也不能只讲老百姓富，不讲重点建设；只讲眼前，不讲长远。这样很不符合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欧洲一些国家福利上得很高，已经很难维持，感到负担非常沉重，但又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尚且如此，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更不能这样搞。人民生活水平要逐步提高，但如果不搞建设，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能再提高了。

实行利改税，先收百分之五十五以后，税后利润采取各种办法，要照顾现有留利水平。企业有积极性。总的精神是积极推广。既得利益不合理的，不能保。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留利水平低，按百分之五十五收，还得减税或免税；第二种情况是留利多一点也多不了多少、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就不再搞税后利润分配。手续尽量简化；第三种税后还有很多利润，采取各种形式承包。第二种情况的企业，数量不要搞得太少。这部分企业基本保既得利益，手续要简化。对商业包干，要加强检查，不能转嫁负担，克扣消费者。不要商业职工叫好，老百姓骂娘。

改革无论如何不能搞运动。农村改革在全国那么大范围进行，改得很好。

很重要一条是大家都沉住了气，有思考、研究自己特点的时间。问题就怕沉不住气。过去讲形势逼人，逼好的时候少，逼坏的时候多，一逼就急，就沉不住气，慌慌张张往前赶。已经讲了，不搞运动，不搞突击，就比较好。凡是沉不住气的时候，事情没有搞好过。改革态度要积极，但有的地方可以快一点，有的地方可以慢一点，不要东张西望。过去，形势一好就大上，一大上就倒霉，还得调整。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屡次出现。现在头脑不要发热，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已经讲两次了。

实行利改税，企业留利确实不合理的，要调整，不要怕影响积极性。他的积极性不下来，别人的积极性上不去。严重不合理的，坚决改。

控制奖金，生产不一定差；多发奖金，生产也不一定好。奖金不封顶，今年至少要冒出去四十亿元，给今后工资改革造成极大的困难。个人不封顶，企业总额要封顶。匈牙利的改革，有两个东西控制很严：一是工资总额超支加税，超一块钱，征两块钱税，有三块钱才能增发一块钱。这很有道理，是宏观经济问题。二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征国家建筑税。“投资饥饿症”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是造成比例失调的重要原因。匈牙利企业很活，但对以上两个问题控制很严，不控制就会天下大乱。

奖金基金封顶是笨办法，是不得已的办法。必须充分估计企业的现状，有的企业干部思想作风不那么正，钱花了不少效果并不好。封顶不合理，但不封顶要有条件。凡是控制得住，同时对超过工资总额部分实行收税，可以不封顶。各地自己也可以搞个单行法，收累进税。不具备条件的，不能随便取消封顶。总之，第一要逐步取消封顶，第二要有节制办法。工资可以浮动，但突破工资总额部分要收税。封顶问题要根本解决，还是要解决价格问题。

发展大好形势 继续抓好工交战线的工作*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开得是好的。会议期间，传达了中央常委、书记处批准的国家计委、经委党组《关于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袁宝华同志作了报告，张劲夫同志召开了一些座谈会，讲了许多意见，万里同志也对会议提出一些意见，这些我都同意。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就当前经济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和看法。

一、发展当前大好形势，关键在于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总的说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比较好的一个时期。要使好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避免过去出现过的“大好形势好景不长”的情况，关键在于要控制住基本建设规模。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一九五六、五七年的形势是很好的，但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搞大跃进就不行了。经过调整，一九六四、六五年的形势也是很好的，但“文化大革命”一来，又搞乱了。造成这种反复的原因很多，从经济上看，最重要的是基本建设规模失去控制。我们的历史经验是：形势一好，就要大上，特别是上基本建设，铺新摊子；一大上就引起全面紧张，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实在搞不下去了，就被迫来个天下。这样就形成调整——好转——大上——再调整。这种反复折腾的现象，不应该也不允许再重复了。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我们党有个好处是，当经济上出现比例失调、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下定决心，全党全国一动员，就可以调整过来。一调整，经济形势就好转了。就拿这次来说，我们国家能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〇年那种经济形势下调整过来，而且正处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的。世界上不少国家对此都很羡慕，把我们这次调整迅速取得成效看成是一种“奇迹”。其实这种奇迹以前也出现过。一九六一、六二年那么困难，全党一动员，下决心调整，一九六三年形势就有明显的好转。我们这个党搞调整还是有力量、有办法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想搞经济调整，但做起来困难重重，收效不大。

建国以后，我们两次碰到大的困难，由于全党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下决心调整，形势很快就好转了。但好转以后往往又容易忘记。这次我们一定注意不要重复这个错误，再搞大上了。近来有些不好的现象已开始露头。一九八二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猛增一百多亿元。从历史上看，基本建设投资一年增加上百亿元，除这次外有过三次，即一九五八年、一九七〇年、一九七八年，都出了问题。去年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也潜伏着一个危险。这种趋势至今还在继续发展。如果不加控制，就会重新发生基建挤生产、挤维修、挤市场、挤生活的现象；就会引起物资的全面紧张，物价上涨，使已经形成的某种程度的买方市场再次失掉；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就会受到阻碍，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当然不是说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而是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最近，邓小平同志两次讲到，形势好了，不要头脑发热。这对指导我们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十分及时，十分重要。我们在大好的形势面前，一定要接受历史教训，保持清醒头脑，做到“事不过三”。当务之急，是要控制住基本建设规模。只要基本建设的规模不铺得那么大，稳步前进，现在的好形势是可以保持和发展下去的。如果不接受教训，你上我也上，要上大家上，这样搞下去，恐怕再一次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点，全党同志要从全局、从宏观上考虑，统一思想。

国外有人评论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一种通病，叫做“投资饥饿症”，喜欢争投资，搞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很大，而经济效益很差。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科学，但从我们自己三十多年的经验来看，确实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在我国经济建设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由于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搞过了，导致经济工作发生挫折。

我们的方针是，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要控制，重点建设必须加强，技术改造还要放宽。因此，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压缩一般的基本建设，压缩计划外自筹资金搞的基本建设。打开窗户说亮话，就是压地方和部门的一般项目，保全国的重点项目。要使我们的建设规模与我国的国力相适应，并且能够集中人力、财力、物力，用于重点建设，同时用于技术进步。

基本建设规模怎样控制，需要进一步研究。现在首先要统一思想，使大家对整个形势有个清醒的、全面的认识。至于控制的办法，应当采取行政的手段，加强计划的控制，加强监督与检查，同时还要采取经济的办法制约。我是赞成抽建设税的。对计划外的基本建设，除了能源、交通等项目以外，一律要抽税，比如抽百分之三十的税，造价高了，他就少建一些了。抽建设税是一个办法，还可以采取其它经济办法。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发生两个问题：一是消费基金失去控制；二是基本建设规模失去控制。所以他们采取收建设税的办法，所有的基本建设都要抽税。这些经验，我们可以参考。总之，要千方百计想办法、下决心把基本建设规模控制住。

二、全国要支援重点建设

要使我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经济振兴，必须从现在起，大力加强重点建设。大家知道，如果没有五十年代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建成，就不可能打下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现在同样可以这么说，如果不下大力去建设一大批能源、交通以及其它必要的、技术先进的大型骨干项目，就不可能有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

为了解决多年来的遗留问题，还一些欠账，这几年多搞了一些非生产性建设，是必要的。据去年统计，非生产性建设已经占基建规模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五，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不能长期这样下去。在工业建设中，兴办一些小企业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兴办小煤窑、小水电、小火电以及技术先进的专业化的小厂，搞一些联结干线的公路支线、小型仓库等基础设施，应当予以支持和鼓励。但是要看到，对我国国民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影响经济全局的，是大型骨干工程。正像在战争年代打仗一样，地方军和游击队有很大的作用，而决定战争全局胜负，还得靠野战军。

如果我们只着重于建设中小企业，我国的经济就不可能起质的变化，就不可能完成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任务。所以，必须下决心加强重点建设，首先是保证“六五”计划中安排的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重大项目的建设，同时抓紧做好为长远发展做准备的二百七十九个重大项目的建设前期工作。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国家的重点建设，去年以来多次讲到这个问题，提醒我们注意。我认为这是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的。不这样做，我们是要犯大错误的。对于这项工作，我们抓得不紧，措施不够有力。现在应该迅速改变这种局面。

重点建设，不仅中央要抓，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抓，要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现在需要提出一个口号：“全国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了后十年的经济振兴，为了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动员全国的力量，支援重点建设项目，决不允许分散力量，各搞各的。“一五”时期，我们胜利地完成一百五十六项工程，就是由于有全党的统一认识，有全国的大力支援。一九六四年以后进行的三线建设，尽管在部署上有缺点，但能进展得那么快，也是因为全党有统一认识和全国的支援。我国是一个穷国，但又是一个大国，如果能够适当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是能够办成几件大事的。要是大家各搞各的，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前十年和后十年都会白白过去，无所作为。现在要很好汲取“一五”时期搞一百五十六项的经验，切实把重点建设搞好，这是我国经济振兴的物质技术保证，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局部服从全局，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

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我认为首先就是能够适当地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搞一些有决定意义的建设项目。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这一点尤其重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就很难办到。不管我们的经济体制怎么改革，这个优越性是不能丢掉的。

我们必须切实改进和加强对重点建设的领导。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最近，我从陕西韩城过龙门，到山西河津铝厂去看了看。这是一个投资十亿元的大厂，十年前就开始建，已经花了投资一亿一千万元，以后下了马。今年七月又要复工，但是，组织领导无人负责，建设工地很混乱，没有统一的指挥，连设计总图都没有。征地问题也很严重，老百姓听说要征地，

一夜之间在每一亩地里都要插上几十棵树苗，借此向国家要高价。这种做法很不妥当。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现在有些重点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做得很差，仓促开工，技术装备政策也没有定下来，采用什么技术和设备都心中无数。特别严重的是不少项目敞开口子花钱，是“无底洞”，浪费不知有多大。现在国家掌握的计划内的基建投资总额每年只有五百多亿元，其中用于重点建设的才二百多亿元。而不少工程的造价却成倍增加。比如天生桥水电站，原来说需要投资六亿多元，后来说八亿元，现在又说十七亿元还不够。与重点工程有关的一些地区、部门、单位和农民，都想趁机揩油。照这样搞法，我看四化就没有希望。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看来光讲调动积极性还不行，还要讲整顿、讲纪律。对重点建设必须认真加强领导，搞好整顿，配好班子，明确职责，严明纪律。不然，钱白白花了，却没有什么效果。有两点必须强调：第一，我们必须集中财力、物力；第二，必须把集中起来的财力、物力用好。重点建设属于哪个地方、哪个部门，那里就要认真负起责任来。成绩优异的，要给予嘉奖。工程质量差、工期拖得很长、投资大大超过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必要时要绳之以纪律。今后国家计委要把抓好重点建设作为一项重大任务，这就是管大事。要向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群众普遍进行支援重点建设的教育，那种乘机揩国家油的现象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重点建设在哪里，那里的党组织和所有的干部、群众，都应当大力支持。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要造成支援重点建设的舆论和社会风尚，人人以为重点建设作贡献为荣。

三、必须适当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

要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进行，必须努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现在全国财政收入太少，上不去；中央财政更是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的四年中，国民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左右，尽管有的地区财政收入是上升的，而国家财政收入（不包括国外借款）却下降了百分之三点八。当然，这中间有调整的问题，有些是必要的，但不能长期这样下去。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九七八年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二，一九八〇年降为百分之二十九点六，一九八二年降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一九八二年的财政收

人中，包括了四十二亿元国库券，如果扣除这个因素，财政收入下降的幅度更大，它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二十五。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就无法搞重点建设。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有困难，而中央财政困难更大。这几年中央财政年年有赤字，而地方财政尽管各地区之间不平衡，但总起来算还是有结余。

一九七八年全国财政集中过多，在财政收入中，中央的收入也集中得过多。为了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并且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财力，把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适当降低一些，是必要的。这个调整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减少，国家重点建设的开支不得不作大量压缩。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一九七八年为三百九十六亿元，一九八二年下降为二百一十五亿元。一九八三年采取了集中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的办法，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也不过二百七十九亿元。在国家投资中，用于电力、煤炭、石油工业和交通运输的投资，一九七八年为一百八十六亿元，一九八二年只有一百零一亿元，一九八三年计划也只增加到一百三十亿元。这样，就使能源、交通运输的建设规模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规模大大缩小了。发电装机容量，一九七八年新增五百万千瓦，一九八二年只新增二百九十四万千瓦。尽管重点建设投资减少，中央财政仍入不敷出，这几年每年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靠向地方借款、向银行透支、向国外借款来弥补。这种局面，显然难以支撑下去。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我们必须兼顾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在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要逐步使人民富起来，使企业的收入增加；同时，也要使国家逐步富起来，使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只讲人民富、企业富，不讲国家振兴，不行。只讲下放、分散，不讲适当集中，不行。只讲搞活，而不讲全国的统一性，那也不行。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不适当集中财力、物力，就办不成什么大事。很明显，如果中央不掌握必要的财力，重点建设无法安排，中央的重大决策就无法贯彻，什么三峡工程、核电站工程、大型露天煤矿工程、大的冶金工程和大的交通运输工程，都干不成就是了，必须增加智力投资

也要落空。邓小平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强调下放，但经验证明，解决问题历来靠集中。现在这种状况不改变，长期下去，带来的肯定只能是经济的停滞。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我们既不能竭泽而渔，把企业搞得干干的，把农民搞得干干的，工人多年不提工资；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福利，只讲消费，不讲建设。不搞建设，消费从哪里来？那就没有基础嘛。即使勉强搞一个时期，也是不会持久的。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党的十二大已经决定，要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一九八三年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集中得还不够，还要再多集中一些。国家计委提出，从一九八四年起，以五年为期，中央每年再多集中三十亿至四十亿元，以便配合动用五十亿美元的外汇结余，进行一批专项重点工程建设。中央已经批准了这一方案。如何集中，办法要专门研究。主要途径，是要减少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自筹基建投资。从自筹基建投资和土建工程量大的更新改造投资中抽建设税的办法，可以研究。农民和收入多的城镇居民也要为国家重点建设作贡献。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要稳定在一九八二年的总水平上，不再增加，其中很不合理的，要适当调整。在集中资金的同时，还要相应集中原材料，以保证重点。国务院已责成有关部门提出方案。总之，集中财力、物力，大势已定，办法另议，今天先吹个风。

四、改革的步伐要加快

总的来讲，我们要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还有许多新的内容，要继续进行，整顿还要花很大力量去抓。调整也好，整顿也好，如果不同改革结合，是很难进行下去的。所以，现在适时地把改革突出起来，是有必要的。要加快改革的步伐，通过改革推动调整、整顿；抓调整、整顿，也可以促进改革，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当前改革的势头是好的，问题是如何指导好改革工作，使之健康地发展下去。

当前城市的改革，工商业的改革，要像农村那样，首先解决吃大锅饭问题，克服平均主义。城市工商业要改革的东西很多，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汲取农村的经验，突出地抓住这个核心问题，就能够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

极性，挖掘潜力，增加社会财富，改善服务态度，对国家对人民都大有益处。尽管目前其他方面的改革还不配套，增加了工作的困难，但还是应当抓住这个环节，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对城市工商业的改革，既要看到它的紧迫性，又要看到它的复杂性。天津市的同志分析了城市与农村的不同点有八条。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讲讲它的复杂性。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城市工交和商业企业。它们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承担者。它们通过税利形式上缴给国家的，据统计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点就与农村根本不同，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比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复杂得多。搞得不好，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目前经济体制、特别是价格体系不合理，一下子又不能进行根本改革，加上企业之间，有机构成的高低很不相同，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很大，潜力大小的差别也很大，这些问题带来的复杂性也要看到。由于有这些因素，我们在解决违背按劳分配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病时，搞得不好，又可能出现另一种形式的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苦乐不均的现象。企业之间、职工之间，应当实行按劳分配，不应当拉平。但由于体制和价格的不合理，由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潜力不同，即使同样努力，企业提留的基金差别也会很大，这样企业之间又可能造成新的不合理的苦乐不均，这也是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复杂性就在这里。这样也不可能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也会引起其他企业、其他职工的不满。而且一下子收入冒上去的企业，积极性也不可能持久，今年上去了，明年也许就下来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农村不同，农村是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大家都习以为常，队与队、户与户差别很大，可以有万元户。工人就不同，工厂主要是全民所有制，资金、设备、产品都是国家的，工厂建在哪里，商品怎样销售，价格怎么确定，都是国家计划规定的。同等的劳动，如果收入悬殊过大，是不利于职工团结的，不利于调动整个职工队伍积极性的。在实行承包制中，普遍遇到如何合理确定基数的问题。往往是越落后的企业，基数越低，包了以后一下利润冒得很多，工人一下所得很多。这不是靠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得来的，而是发落后财，发体制和价格不合理的财。这样轻易发财，对国家、对企业都没有好处，对职工的长远利益也没有好处。还要看到一个问

题，城市企业的社会化程度比农业高，各方面联系非常密切。而我们又是在整个经济体制没有全面改革的情况下，进行城市改革，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病，解决企业自负盈亏问题的。当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有了积极性以后，要使企业能够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和社会的需要，真正在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企业潜力上去增加收入，谋求自身应得的利益，而不是去搞歪门邪道，向消费者转嫁负担，除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必须相应地有一套监督、检查的法规、制度、章程加以制约和引导。否则，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就很容易发生问题，如利大大干、利小不干、以劣充优、缺斤短两、变相涨价等。从企业、从微观看，是得到了利益；但从宏观、从整个社会看，却使国家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现在有些地方已开始出现这种不好的苗头。如不注意抓紧认真解决，改革就难以奏效。这点也比农村复杂一些。当然，城市改革的复杂性，还不只这些。我们要看到以上这些问题，想办法加以解决，逐步完善。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决不能因此裹足不前。

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讲，解决企业同国家的关系，今后主要是改上缴利润为纳税，而不是搞利润包干。农村实行的承包制，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内部的承包。在城市里解决企业同国家的关系，不能照搬农民内部的那种承包办法。当然一些小企业，不是国家企业的主体部分，可以放开，采取什么形式都可以，不影响大局。国务院确定，除了少数具备条件经国家批准的大型企业，实行首钢那样递增包干，以及某些亏损企业和微利企业可以继续实行包干办法以外，总的来讲，全民所有制企业要积极推行利改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增加企业的活力。这点必须明确，因为：

第一，符合改革的方向。现在的利改税办法还不能全部取消利润上缴这种形式，在一些企业里还要税利并存，过渡一段时间。随着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价格体系的合理调整，将来就可以进一步划分税种，哪些税归中央，哪些税归地方，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自主权和自负盈亏的问题，并有利于冲破条条块块的束缚，促进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所以，利改税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这一改革实际上改变了我们多年来仿照苏联那种管理体制的模式。

第二，能够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全国有四百多个工业企业和七百多个商业企业进行了利改税试点，结果都是好的，说明利改税的办法

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北京市有四个厂实行了这个办法，我同他们座谈，他们都认为很有成效，大大推动了企业的各项工作，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热情。那种认为利改税不能调动积极性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更有利于解决好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保证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在目前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利改税比包干的办法更有利于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减少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不合理的苦乐不均的问题。前面讲过，包干的基数很难定准确，后进企业包干基数低，很容易占便宜。包干以后，稍一用劲，利润就冒出一大截，尽管它比先进企业的贡献少得多，但奖金却比先进企业拿得多。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会影响先进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同时对这些企业来说，头年上去了，第二年又有个保护既得利益的问题。如果不保护，积极性就掉下去了。一句话，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里，不宜这样搞。比较起来，利改税的办法，可以减少发生这类问题，容易实行，没有多大的风险。反正先交百分之五十五的所得税，税后利润不多的，或比过去略少一点的，就算了，不再收也不再补了。税后利润比较多的，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分成，包干，或再加一道调节税等办法都可以。这样，使国家收入能够稳定地增长，企业和职工也能够从提高经济效益中得到好处。

利改税有以上这些优点，所以，今后推广的主要形式应当是利改税，今年的步子要迈大一些，尽量推行这个办法。现在还没有实行包干的，就搞利改税的办法；已经包干的，应尽量换算改过来；有一些包得合理，确实能保证国家得大头的，可以不予改动，明年再说。但只能是少数，不能是多数。包得很不合理的，一定要改过来，不要怕这少数单位的积极性降下来。它们的积极性不降下来，其它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就上不去，越是不合理的，越要改。小型工交企业以及修理业、服务行业和小零售商业，关系不大，可以更放活一些。但是大中型企业要抓住。当然，在税后利润部分的分配上，还是要照顾到企业的积极性，网开一面，使企业有个奔头。

今后国家对企业的政策，要有两条：一要放活，二要加压，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不可偏废。不能只讲放活，不讲加压，也不能只讲加压，不讲放活。唯其活，才能加压；加了压，搞活后才能真正挖掘潜力。过去，一方面对企业管得很死，捆住了手脚；另一方面，对企业又很宽厚，不是高

标准、严要求。日本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对企业太温和了，在外国办一个企业比中国要难得多。把企业捆得太死，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使企业无所作为，这样不好。应当搞活，让他们有用武之地。但是，如果对企业太温和，老是为企业争优厚条件，没有一点压力，使企业成为温室之花，轻轻松松地过日子，那也不利于培养企业的进取精神，不能真正锻炼出企业家。而且又活又宽，国家也负担不起。福建的一位同志在这次会上说：“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允许企业倒闭，允许工人待业。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好、多年亏损，不能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就可以让它倒闭。倒闭就是淘汰。倒闭的企业，职工发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企业如果怕倒闭，工人如果怕待业，就得好好把企业办好。”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我们在政策上放活是可以的，但要给企业压担子，使那些真正有本事、善于经营的人，能够施展本领，得到应得的利益，使那些马马虎虎、经营乏术的人混不下去。不如此，我们的企业就没有竞争性，就没有生命力。我们管工业、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树立这样的指导思想，要把它作为企业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解决。

关于今年企业职工调整工资和奖金问题，昨天书记处已经讨论了，通过了两个文件，请大家按照文件执行，这里不多说了。还有加强职工教育，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两年取得很大成绩，但不平衡，今后要改进，要抓智力开发、智力投资。完全靠国家投资办学，培养人才的速度不可能加快。还得靠地方、靠企业大家动手，自己办学培养人才。特别是电视大学、电视中专、夜校等，适合中国的情况，是一种好的形式，要创造条件搞，大城市可以先行一步。

顺带讲一下机构改革、地市合并的问题。最近，有些地方，不管够不够条件，有没有经济比较发达的中等城市，都要求搞地市合并。秘诀就在于都不愿意把地委变成虚的，一改成市，就成实的了，干部也可以安排了。这样做，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以城市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来个换汤不换药。最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已发了通知，请各地注意这个问题。我看可以采取三种形式：具备条件的，实行地市合并，城市领导农村；不具备条件的，地委可以保留，地区精简机构中，人员编制必要时也可以放宽一点，过渡一个时候；增加一点省属

市，适当扩大这些市的郊区，根据实际情况，让它带一二个县。上次我讲了增加省属市的问题，没有引起大家注意，其实这也是一种好的办法。湖北省把沙市、宜昌、襄樊改成省属市，发展就快。地市合并也好，增加省属市也好，都要紧紧围绕我们改革的方向、目标去搞，才能真正收到预期的效果。

五、努力抓好今年的生产

今年总的要求是：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快改革的步伐，一定要使今年的经济效益有明显的提高，要争取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里着重说一下为什么老是讲要注重经济效益，而不要片面追求产值速度。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一定的速度是不行的。不仅九十年代要有较高的速度，八十年代也要有一定的速度，不重视速度是不对的。但是，鉴于历史经验，片面强调速度，往往容易使人们忽视经济效益，其结果，速度上去了，但是“水分”很大，浪费严重，国家和人民都得不到更多的实惠。同时，一个时候速度上去了，基础工作不搞好，也难以持久，难以做到年年稳定增长。因此，正是为了求得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增长速度，求得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必须特别强调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我们要力争经济效益好的增长速度，力争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速度。

应当说明，迄今为止，我们还是以总产值增长额作为计算速度的唯一指标，而总产值这个指标是有很多缺陷的。首先，它把物质消耗的数量包括在内，重复计算的部分很大，不能表现新增加的社会财富。例如，工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的比重大约占百分之六十七，新增加的净产值大约只占百分之三十三；农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的比重大约占百分之三十二，新增加的净产值大约占百分之六十八。因此，就总产值来说，数量显得很大，但是真正新创造的价值则少得多；而且物质消耗越高，产值就越大。其次，总产值是按照工厂计算的，一个企业产品生产出来了，不管质量是否有所提高，能否销售得出去，都计算总产值。因此，它不能反映产品的

质量、品种的情况和是否符合社会的现实需要。由于总产值指标有这些缺陷，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曾经用商品销售总额或净产值来代替总产值，但商品销售总额和净产值不仅计算复杂，而且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以净产值的增长额作为计算速度的依据，容易刺激企业什么利大就生产什么。因此，一直到现在，在他们那里总产值指标并没有完全废除。我们的计划部门也正在研究采取什么样的计算方法，能够体现数量和质量的统一，速度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在新的计算方法没有找出来以前，只好继续沿用总产值来计算。但是，对总产值的这些缺陷，各级领导要心中有数，有清醒的认识。总产值不能作为计算速度的主要指标，因为总产值实在不能正确地反映速度，不能反映经济效益。我们往往一强调速度就压产值，一压产值就毛病百出，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要鼓地方、企业的干劲，但一定要鼓到扎扎实实地改进工作、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上，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一定的增长速度。现在我们的经济效益在一些方面虽然有所提高，但总的讲，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重视经济效益的思想，在各级领导中间还很不牢固，很容易一下子抛到脑后。看来还要经过多少年，还得通过改革才能解决。

今年一、二月份的生产是好的，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八百七十五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二，是继续增长的趋势。但也出现一些新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忽视经济效益的情况又有抬头，值得重视。这集中反映在财政金融上。今年一、二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一百三十八亿元（国内部分），比去年同期减少二亿四千万，主要是企业收入下降了。而支出却比去年同期增加十亿元。收支相抵，结余十九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十二亿元。从银行提供的资料看，一、二月份累计净投放货币二十亿八千万，比前四年同期净投放量都多。货币投放增多的主要原因：一是农业丰收，农村的投放量增加三十七亿元，这是属于正常的因素。二是工资性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二十一亿七千万，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而去年同期仅增长百分之六点九。三是今年以来，各单位从银行提取存款增加得多，归还的贷款增加得少。如去年一、二月中央财政存款增加三亿四千万，而今年却减少十四亿六千万。后两种都有不正常的因素。全国到二月末，市场货币流通量达到四百五十九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四。对一、

二月份的状况，国家统计局有个说法，就是生产增长，流通扩大，财政收入下降，关键在于工商企业经济效益差。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今年头两个月，工业企业平均每百元产值上缴利润只有十八点五元，比去年同期减少零点七五元，下降百分之三点九。商业和供销社平均每百元销售额上缴利润为三点二六元，比去年同期减少零点七九元，下降百分之十九点五。我讲这些材料，是为了说明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还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做大量的工作，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在大好的形势下，我们要察微知著，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努力做好工作，这样才能推动当前的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

为推动南北谈判和加强南南合作而努力*

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

主席先生，诸位贵宾，中国同事们：

今天，我有机会为北京“南南会议：发展战略、谈判和合作讨论会”揭幕，并且为一九八二年“第三世界奖”授奖，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

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对讨论会和授奖式的举行表示祝贺，对第三世界基金会为此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并且对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次北京南南会议，是在世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发展中国家正在为此研究对策的时刻召开的。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一次三十年代以来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影响所及，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许多国家生产停滞或下降，贸易条件恶化，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逆差，濒临外债清偿危机。这既严重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振兴，也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动荡和不稳。这是当前世界一个突出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这次北京南南会议将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南北谈判及南南合作等重要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探索，是十分及时和很有意义的。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它们正在不断探索，总结经验，继续实践。它们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是：从本国

* 这是赵紫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第三世界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北京南南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符合国情、能够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能够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发展战略，以加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当然，各国的情况不同，适合于这一国家的发展战略，未必也适合于另一国家。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长处，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子。但是，中国有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交流经验，互相切磋，肯定可以使我们大家都受到启发，得到教益。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还必须具备必要的外部条件。这首先是对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根本的改革。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统计资料证明，发展中国家是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直接受害者，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又使它们被迫承受了更加沉重的负担。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必须同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一场非常艰巨的斗争。

超级大国对于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或则顽固地加以拒绝，或则采取冷漠的态度。这就更需要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和合作，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历史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必要条件。中国愿意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道，联合一切愿意改善南北关系的发达国家，为实现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行动纲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第三个国际发展战略而共同努力。

全球谈判是谋求全面、整体地解决南北之间问题的可取形式，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良好途径。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举行全球谈判尤为必要。第三世界国家为此作了大量工作，有关方面也已进行了反复磋商。我们完全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强协商，为消除障碍而发动谈判共同努力。

当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困难深重，确实有一些紧迫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认为，应该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长期目标同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紧迫问题正确地、密切地结合起来。第三世界各国可以通过充分协商，求同存异，提出一些迫切而又切实可行的项目，在各种南北谈判的场所协调行动。

不久前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经济宣

言》、《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集体自力更生宣言》和《经济合作行动纲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对推动南北谈判和加强南南合作有积极意义。今年六月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六次大会是近期内南北对话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们希望，主要的发达国家能在这次会议上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使会议取得成果。

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已经开始取得一些进展，各种区域性和专业性的组织有所发展，贸易往来、能源合作、资金互助、劳务合作，以及合营企业和技术服务等等，有所扩大。我们也高兴地注意到，第三世界国家关于加强南南合作的种种设想，从全球性到区域性的安排以及从关税、贸易、货币金融、技术转让，到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合作，正在逐步充实和具体化。

南南合作的重大意义已越来越清楚地为人们所认识。第三世界国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不少国家已经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相似，他们之间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平等和公正的原则，具有互助互利的性质。因此，南南合作必将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广阔的前景。加强南南合作，既可以增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实力，又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对于冲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作用。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把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中国人民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一贯是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和支持南南合作，努力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不久前，我在访问非洲十一国时提出：中国政府愿意本着“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努力探索各种途径和方式，发展同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同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逐步发展，中国愿意对南南合作作出更多的贡献。

为了逐步推进南南合作，我们十分赞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实行“穷帮穷”的原则，让合作的各方都能得到好处，并且注意照顾最不发达

国家的特殊困难。我深信，循此前进，南南合作必将日益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

各位代表都是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领域内经验丰富的知名学者和专家。这个讨论会为各位代表提供了一个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的讲坛。我相信，在各位代表的积极参与下，讨论会将会提出各种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我衷心祝愿这次讨论会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先生，各位贵宾，中国同事们：

现在，我愉快地执行第三世界基金会委托我的向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授予一九八二年“第三世界奖”的光荣任务。

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自一九六〇年成立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成就，在第三世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这个研究所为协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水稻产量和质量培育出了许多水稻良种。这些良种不仅能够显著地提高产量，而且能够抵抗病虫害，缩短成熟期和节省用水量。这个研究所在水稻遗传学、生理学和土壤学等学科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成果已经在第三世界广为传播。

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农业、食品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第三世界基金会决定授予这个研究所一九八二年的“第三世界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对此是当之无愧的。请允许我向该所所长斯瓦米纳坦博士，并且通过他向该所全体科学家、专家和工作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我预祝他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对第三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我还愿意借此机会对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同我国的有关单位的友好合作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希望这种合作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

对钢材实行工贸结合和优质优价很重要*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

我同意方毅、东冶¹同志的报告。关于钢材工贸结合目前是否已具备条件，请国家经委讨论确定。钢材优质优价问题很重要，其它产品都有这个问题，能否从今年起就逐批对一些产品进行调整，请劲夫与物价小组的同志讨论议定。建议将这一报告印发有关部委。

注 释

1. 李东冶（1917-2013），山西平陆人。时任冶金部部长。曾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鞍山市委书记、鞍钢党委书记，冶金部副部长兼鞍山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 这是赵紫阳对方毅和李东冶关于发展低合金钢、合金钢工作部署情况报告的批语。

地矿部是全国地质工作的综合部门*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

一、关于实施《矿产资源法》的监督执行问题

地质矿产部应代表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督。这一条应予明确。地矿部应该是《矿产资源法》的监督执行部门。

二、关于全国地质工作分工问题

可以明确一条，地质矿产部是全国地质工作的综合部门，工业部门的地质单位和地质工作，应接受地质矿产部的业务技术指导；计划的编制与监督执行，也可由地质矿产部统筹管理。你们可以拟出几条，与计委商定。与有关工业部门的分工，原则上可以按地质工作阶段分工，具体的你们同各有关工业部门协商。也可设想将来地质部直属队伍成立另外一个独立的单位，这样你们的地位就超然了，可能好管一些。

三、关于地质部门基建投资和勘探费问题

地质部门的基建投资，应考虑适当增加，要着重把地质部的队伍的装备加强，有步骤地在六个大区各建成一个配套的测试中心。应该多给地质

* 这是赵紫阳听取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矿产部一些技术装备资金，请计委给予考虑，可以拨一点外汇给地矿部，也可以考虑向世界银行给地质部贷些款。地质勘探费不足，使地质工作量逐年萎缩的情况不应继续下去。

要认真总结三十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

有的同志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思想领域总结经验比较系统，经济领域没有认真总结，拨乱反正不够。老早有人提出，这个任务应当什么时候去完成？当然，三中全会以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五次会议，十二大，都概括了几条，也是总结。但是，经济方面的拨乱反正，总似乎不如政治思想领域集中突出。经济思想方针政策，全党还不统一，不如政治领域那样深入人心。因此，存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总结三十年经验的问题。小平同志说过，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是真正的拨乱反正，主要是陈云同志讲的十四条，但那没有展开论述。总之，经济方面的东西比较散一些。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一次，十二大一次，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五次会议一次，但没有一次非常集中。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有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说经济工作应当有一个专门的总结。这次人大会议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放到将来再解决？经济领域发生折腾的可能还存在。政治上再搞阶级斗争为纲、搞“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了。在经济建设方针方面，党内没有真正展开讨论。“大跃进”也批评了，但没有展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怎样发生、形成、发展的，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在党内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用我的话来说，毛主席在中国建设方针上有唯意志论，想创出个奇迹。现在对什么是右了，保守

* 这是赵紫阳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的谈话要点。

了，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还不那么清楚。看来，这届人大不可能解决，但确有这个问题。经济上大反复一次的危险仍然存在。有一些省市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盲目性，不大清醒。是不是有一场群众运动就可以把生产力大大发展起来？能够出现这样的奇迹吗？还是那个想法，只要路线对头，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国家就可以出现奇迹。这种想法，有多少人是作了科学分析，有多少人是凭感情用事？这种思想并不是没有市场。比如，对江苏的汇报怎么看？农民富起来是不是那么容易？有一个对历史经验总结和对现状分析的问题。毛主席有些经济思想在党内还有影响。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这几年已经提出来的方针，如经济效益，两个阶段，重点建设，集中分散，调整整顿，等等，在党内不容易认识一致。比如，经济效益很难认识一致，而要吹掉很容易。因为它是软的，而产值、速度是硬的。我本来以为，我们这些人是过过瘾的，其实不然。上海对速度就感到压力很大，辽宁郭峰¹也同我讲过。包括翻两番，作为国家的远景是可以的，但各个地方都搞，就感到压力很大，很容易把人引向追求产值。而经济效益、效率，这些东西很不牢固，很不容易确立起来。稍有一些空气，就可以吹掉。可能要经过一些反复，一年两年，两三年中可能解决不了。从一九八〇年底提出的问题，十二大提出的观点、方针，到现在还不牢固，要在这些问题上紧紧抓住。

注 释

1. 郭峰(1915-2005)，吉林德惠人。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曾任辽北省委副书记，辽西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省委第二书记，中顾委委员。

统一金融必须建立中央银行*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银行不能变成地方银行。金融不能分散，分散了天下大乱。银行必须管住。要宣传这个观点。出问题出在银行。原来我主张扩大银行自主权，现在看不能扩大。扩大银行自主权，就是扩大地方党委自主权。全国金融必须统一。集中统一，集中表现在银行。存款增加，只要银行贷款使用方向适当，不会出大问题，如果银行出问题，就管不住，要搞几年。总之，银行要集中统一，这是新情况。现在要解决，正式搞中央银行，另外搞工商银行。不要一身二任。中央银行不搞贷款，就是监督各个银行，搞资金调度。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银行问题时的讲话。

提高工业生产经济效益要见到成效^{*}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请将吕东¹同志的两件报告，以白头文件印发书记处、国务院常务会议，计、经、科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在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的调查报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情况和问题，建议由经委牵头，计委、财政部及有关方面参加，认真地议一议，逐项提出解决的措施和作出安排，然后提交中央财经小组讨论通过，在今年八月召开的全国工交会议（主要讨论提高经济效益问题）上予以贯彻。

提高工业生产经济效益问题，我认为应当由国家经委抓总，认真负起责任来，务求经过一段时间努力，能真正见到成效。

注 释

1. 吕东（1915-2002），辽宁海城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曾任冶金部副部长、部长，三机部部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国家经委主任。

* 这是赵紫阳对吕东关于提高经济效益和从银行集中资金两个调查报告的批语。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过去五年的回顾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各级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五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日益正常，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关系重新获得加强，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整个社会一年比一年安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经济、政治和其它社会生活的民主管理，在全国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特别是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国务院和省、市、自治区两级政府机构的改革，在密切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有了初步成效。全国各族人民心情舒畅，建设热情不断高涨。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贡献，正在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还复查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对被错划为右派的作了改正，对原为小商小贩、手工业者被错划为资本家的作

了改正，给已经改造成守法劳动者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了帽子，宽大释放了大批在押的原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员，妥善地解决了一系列的历史遗留问题。打击经济领域和其它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起了保证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作用。尽管现在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需要继续消除的不安定因素，但是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已经实现的安定团结局面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一定能够长治久安的。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和破坏不了这种历史趋势。

国民经济扭转了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经过这几年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到一九八二年，积累率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调整到百分之二十九，消费基金有了较大增长。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八提高到一九八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六，轻工业所占比重由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一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点四。结合着积累与消费和农轻重这两大比例关系的调整，国务院还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曾经出现的较大财政赤字问题，实现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在调整时期，既保持了经济全局的稳定，又保持了不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九八二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千二百九十一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六，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三。这说明调整经济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取得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

农业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实现了持续的全面高涨。这几年，国务院执行一系列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农村政策，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一些地区的征购任务，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一九八二年同一九七八年相比，仅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项，农民增加的收入达二百六十亿元。与此同时，调整了作物布局和农业结构，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了多种经营。特别重要的是，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长期存在的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把小规模的分户经营与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结合起来，继承了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从而使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统一了起来，并且同时得到充分发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进步。

尽管农村工作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已经尽善尽美，但是就全局来看，过去几年所进行的工作，确实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了工农联盟，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九八二年同一九七八年相比，我国粮食增长百分之十六，棉花增长百分之六十六，油料增长一点二六倍，糖料增长百分之八十三，烤烟、桑蚕茧、猪牛羊肉等都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大家知道，过去几年中严重的自然灾害并不少，而全国农业总产值仍以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七点五的速度前进，超过了一九七八年以前二十六年平均每年递增率的一点三倍。全国原来低产贫困的二百四十多个县，绝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一些出名的穷县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一跃而为新的商品生产基地。农村的逐步繁荣兴旺，为我国经济、政治形势的好转奠定了基础。

消费品工业扭转了长期落后的局面，重工业逐步端正服务方向，整个工业在调整中持续增长。这几年，我们把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地位，使轻工业比重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四年内，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八，超过重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三点四的速度。许多市场紧缺商品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自行车增长一点八倍，缝纫机增长一点六倍，手表增长一点四倍，电视机增长十点四倍，化学纤维、布匹、呢绒、食糖、皮鞋等也都大幅度增长。冶金、化工、建材、机械等重工业，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努力扩大服务领域。它们为农业、轻纺工业、市场、技术改造和出口提供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增多。重工业生产在调整中已由下降转为上升。由于调整轻重工业结构、加强能源管理和进行节约能源的技术改造，仅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两年就节约和少用了四千万吨标准煤。正因为工业结构经过调整和整顿而日趋合理，尽管前四年内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一点九，而整个工业却以每年递增百分之七点二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经济调整的一个重大胜利。

城乡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八二年同一九七八年相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一千五百五十九亿元增加到二千五百七十亿元，增长百分之六十四点八，平均每年增加二百五十三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前的二十六年平均每年增加四十九亿元，高出四倍多。长期存在的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大为缓和，

肉禽蛋的社会零售额一九八二年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一点一倍，食油供应状况有了显著改善。日用工业品绝大多数供应充裕。过去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现在已大部分敞开供应。人民群众购买消费品有了较多的选择余地。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一九七八年的三百五十五亿元增加到一九八二年的七百七十二亿元，四年增长一点二倍。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由百分之四十六点五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七九年以来，国家统一安排的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四百四十项，对促进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九七八年决定引进二十二项成套设备已到货部分所负的高利外债，到一九八二年底已经基本还清。在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区试办的经济特区，开始取得积极的成果。近年来，我们还积极发展旅游事业，扩大了对外友好往来。在当前世界经济萧条、国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的持续上升和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逐步扩大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性。

经济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有益的经验。这几年，我们在对农业体制进行重大改革的同时，还在城镇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扩大工商企业的自主权、改进城乡流通体制和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坚持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四年中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职工增加六百零三万人，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九，城镇个体劳动者从十五万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七万人。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国营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一批国营小商业、饮食服务业和小型企业开始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或者由职工集体、个人承包经营。许多原来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工业生产资料，现在实行了方便用户的灵活多样的供应办法。对过去统购包销的工业消费品，开始采取计划收购、订购、选购和企业自销等多种购销形式。我们改变了过去工业品流通按城乡分工的体制，进一步疏通了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渠道。在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打破地区和部门的界限，组织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和经济区方面，正在着手工作。对基本建设的管理办法和外贸体制，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所有这些，对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活跃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提高经济效益，都起了良好的作用，并且为进一步改革积累了经验。

长期存在的轻视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逐步得到纠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已由五百九十八所增加到七百一十五所，在校学生从八十五万六千人增加到一百一十五万四千人。五年招收研究生四万三千多人，比“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还多百分之八十三。由研究生院和大学分别经过严格的考核，授予博士学位十八人，硕士学位近一万五千人，学士学位三十多万人。正规地授予博士学位，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各种类型的成人高等学校，包括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等，一九八二年在在校生已达六十四万多人。单一化的中等教育结构初步有所改变，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三年来增加两倍。到一九八二年底，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计达两亿零七百万人。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日益深入人心，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进行重大科技项目的攻关。五年来在农业、工业、国防、新兴技术和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研究等方面，获得比较重要的科技成果一万三千多项，其中得到国家奖励的发明有四百一十八项，有些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进展。文化艺术战线的思想活跃，创作繁荣，作品质量逐步提高。这几年来，共有两千四百多件文学艺术作品在全国性的评奖或会演活动中得奖。五年出版图书十一万种，共印二百三十九亿册(张)。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发展。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全国医院床位由一百八十五万六千张增加到二百零五万四千张，专业卫生技术人员由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人增加到三百一十四万三千人。全国各地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城乡卫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对于增强人民体质起了重要作用。我国体育健儿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在国际比赛中夺得多项冠军。他们的出色成就，鼓舞了亿万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精神。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九八二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二百七十元，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一倍。五年中，农村新建住宅二十二亿平方米，有几千万农户搬进了新居。在城镇，五年安排三千八百多万人就业，加上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

职工生活也得到明显的改善。一九八二年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五百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五年中国家用于城市职工住宅的投资共四百八十亿元，新建住宅三亿五千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九七七年前十九年新建住宅面积的总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一九八二年底，城乡储蓄余额达六百七十五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二点二倍。这几年我国城乡人民生活的明显改善，是大家都切身感受到的。

国防建设和国防力量有了新的加强，保卫了祖国的独立和安全。人民解放军全面贯彻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方针，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通过初步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军队的编组、指挥向合成军方向迈进了一步。部队的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院校建设、后勤保障和军事学术研究有了加强，干部的指挥能力和专业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军政、军民关系日益密切。一九七九年春，由于越南当局在我国广西、云南边境多次猖狂武装挑衅，我军被迫进行了胜利的有节制的自卫反击。民兵组织经过改革、调整，减少了数量，提高了质量。国防科研和生产有了发展，新型战术和战略武器的研制取得了新成果。国防实力的不断加强，是我国各族人民专心致志地从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取得了外交工作的新成就。我们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发展了同各国的关系。在过去五年里，我国又同十五个国家建立了邦交。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现在已增加到一百二十九个。在此期间，我国领导人出访了九十个国家，有八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国家的团结和友谊，有了新的发展和加强。我们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我们坚持原则，伸张正义，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各位代表！过去的五年，是我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克服种种困难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五年，是人民心情舒畅、国家蒸蒸日上的五年。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指导思想和方针

上实现了根本性转变的结果。当着一九七八年初本届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得到清理和纠正。一九七八年二月国务院向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除了在政治上有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的问题以外，对我国经济建设还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使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国力允许的限度，加剧了由于十年内乱造成的重大比例失调和经济困难。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得到纠正，后果将不堪设想。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这几年来，遵循三中全会的精神，遵循五届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我们在政治上坚决清除长期存在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同时排除种种右的干扰，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上坚决纠正仍然存在的片面追求高指标、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的错误，坚持了从我国国情出发和量力而行、积极奋斗、循序渐进的原则。一九七九年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特别是一九八〇年底决定的对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是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拨乱反正，是把我国经济引上健康发展轨道的根本转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众多，物质技术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中国的国情办事，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正确建设方针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只能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既不应当超越客观条件，勉强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又要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好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过去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发生的几次比较大的曲折，除了其它方面的原因以外，都是由于脱离我国实际，在指导方针上要求过高过急所造成的。牢牢记住历史的经验，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是保证当前好形势继续发展而不至于重蹈覆辙的首要条件。

全国人民从拨乱反正的实践中进一步增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重新焕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巨大热情，这是我们取得一切胜利的力量

源泉。这五年涌现出大批的英雄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省、市、自治区劳动模范的有三万八千五百多人，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的有四万二千九百多人，被评为三八红旗手的有七万一千八百多人。赵春娥、栾弗、张华、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安珂、朱伯儒、李俊甲、张海迪等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鼓舞着全国青少年和亿万人民。在这里，我代表国务院，向艰苦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各族人民对政府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从政府工作本身来说，至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在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经济效益不高，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十分严重。市场和物价的管理工作还做得不够好，不少地方发生了某些商品特别是副食品涨价和变相涨价的情况。精神文明建设在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思想文化艺术领域中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现象。社会上的歪风邪气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有力的制止，经济犯罪和其它一些恶性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在少数政府工作人员中，官僚主义的恶习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不正之风，还没有得到有效纠正。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和认真地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

本届国务院经过对过去五年工作、当前形势和面临问题的研究，认为对下届政府的工作需要提出以下建议，请大会予以审议。

今后五年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

（一）关于经济建设

党的十二大确定，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必须分两步走。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〇年的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

从一九九一年到二〇〇〇年的后十年，争取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作出的正确决策。今后五年是打基础的关键性五年。我们一定要在这五年中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加快改革的步伐，抓紧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并为以后的发展积蓄力量，创造条件。

今后五年，首先要保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生产相互协调地向前发展。必须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争取生产的发展达到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实实在在的速度。从现在的情况看，“六五”计划规定的生产发展速度可以超过，“七五”期间的发展速度有可能比“六五”高一些。当然，我们讲速度，必须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绝对不能片面地追求产值、产量。要保证各项产品不断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适销对路，真正增加社会的有效财富。二十年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是就全国来讲的。至于每个地方、部门和企业，有的要翻得多一些，有的翻得少一些。必须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讲究经济效益，服从全国的综合平衡。为了在今后五年内保证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发展，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一系列农村基本政策，不予改变。要继续稳定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贯彻执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同时逐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积极改善农业的生产技术条件。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重点改善商品粮棉地区的排灌条件。加快发展化肥工业，逐步提高复合肥料以及磷肥和钾肥在化肥施用量中的比重。积极发展饲料工业，大幅度提高配合饲料的产量，努力加强和改善草原建设，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努力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抓紧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因地制宜地采取改良土壤、改革耕作栽培制度、防治病虫害等综合技术措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加快造林育林的步伐，合理利用现有森林资源，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现象。在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同时，必须引导重工业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和技术改造服务，坚持在能源和原材料供应、运输条件、投资和贷款分配、外汇使用等方面优先保证轻工业需要的方针。轻工业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开拓新的生产门类，保证消费品生产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使已经出现的比较好的市场供应情况得到保持和扩展。

今后五年，必须大力加强能源、交通等方面的重点建设，积极推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重点建设的成败，关系现代化的前途，关系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都要支持重点建设，全体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都要为推进重点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六五”计划安排的续建和新建的大中型项目共八百九十个，其中已开工建设的投资在五亿元以上的重大建设项目有九十三个。“七五”期间还将兴建一批重大项目。我们要从水电、火电和核电三个方面，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在黄河上游、长江中上游干支流和红水河流域，逐步建设一批大型水电站；在山西、内蒙古、安徽两淮、贵州六盘水等地的煤矿区，逐步建设一批大型坑口电站。为了扩大煤矿建设规模，一方面要抓紧山西和内蒙古几个大型露天煤矿的开发，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加快中小煤矿的建设。石油工业要重点加强陆上和海上的普查勘探，力争尽快探明一批新的油气田。解决能源问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开发和节约并重的方针，凡是新建项目都要采用节约能源的新工艺、新技术，合理利用能源。铁路建设将以增强煤炭运输能力为重点，积极改造老线，修建必要的新线。适应国内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的需要，要加强沿海港口、内河、公路和航空运输的建设，进一步改善邮电通讯设施。在着重抓好能源、交通建设的同时，要相应地进行冶金、化工、建材、电子、机械等工业的建设，积极加强地质勘探工作。大力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同重点建设一样，是全面完成“六五”计划，迎接新的经济振兴的重要条件。今后五年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以提高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为中心，加快现有企业特别是重点行业、重点城市的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使它们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一个显著的提高。

今后五年，必须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坚决控制人口增长。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城乡人民的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各种副食品的供应将不断改善，人民的穿着水平将继续提高。自行车、手表等一般耐用消费品可以基本上满足人民的需要，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将日益增多地进入城市和农村家庭。必须大力加强市场和物价的管理，继续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城镇和农村都将继续建设大批新的住宅。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与生产发展相适应，同住宅区的建设配套进行。要抓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供水能力和煤气供应能力，进一步改善公

共交通条件。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搞好环境保护。无论是推进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都要求继续把控制人口增长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这是我们的国策，是根本性的战略措施。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小孩，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认真落实有效的节育措施，坚决保护女婴和生女婴的妇女。为了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要依靠各方面的力量，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养老事业。

在执行今后五年各项工作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要十分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的进一步繁荣。

我们要完满实现上述任务，特别是实现加强重点建设的任务，当前面临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财力不足，资金严重分散。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四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六，生产的发展速度不算低，而国内财政收入却下降了百分之三点三。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统一思想认识，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使它得到迅速的改变。否则重点建设就得不到财力物力的保证，八十年代打基础的任务就要落空，九十年代新的经济振兴就没有希望。国务院认为，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认真解决好这个问题。

第一，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积极扩大财源。

这几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效益不好，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成本和商业的流通费用降不下来。工业企业可比产品的成本，一九八〇年上升百分之零点九，一九八一年上升百分之一，一九八二年也没有降低，只这一项每年就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四、五十亿元。一九八二年亏损工业企业的亏损金额达四十二亿元，加上粮食企业、商业企业的亏损，总额达一百多亿元。这种情况如不迅速改变，必将严重影响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各部门、各地方和所有企业一定要牢固地树立提高经济效益的观念，绝不能只讲投入，不讲产出，只向国家要投资，不为国家作贡献。

我们强调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决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必须成为真正有效的实际行动。不论调整也好，整顿也好，技术改造也好，体制改革也好，都必须以提高社会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目标。整顿企业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工作，必

须进一步提高质量，继续抓紧进行，确保一九八五年前把现有企业认真整顿一遍。国家计划规定的降低生产成本和各种费用的要求，必须落实到每个地方、部门、企业和事业单位，切实保证完成；凡是完不成的企业，应按比例扣减利润留成。国家规定的税利上交任务，一切单位都必须如数上交。凡是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完不成税利上交任务的单位，原则上不得调整职工工资。企业占用流动资金，必须分别情况规定合理限额，不允许擅自超额占用。凡是有经营性亏损的企业必须限期做到扭亏为盈，否则坚决实行关停并转。一切单位和全体职工要立即动员起来，努力增产节约，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工作效率，同一切铺张浪费、纪律松弛、无人负责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各地方、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都要制定提高经济效益的奋斗目标，提出具体措施，并且一一落实。

第二，合理分配国民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这几年国家财力不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集中的财力过少，资金过于分散。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二下降到一九八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由于过去长时期内积累的问题很多，这几年多拿出一些钱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和增加企业自有资金是必要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应当有所下降，但某些措施步子迈得大了一些，再加上财政管理不严，各方面漏洞很多，以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的幅度过大。在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预算外资金却大幅度增加，由一九七八年的三百七十一亿元增加到一九八二年的六百五十亿元，四年间增长百分之七十五点二。资金的严重分散，使基本建设的总规模控制不住，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现象有所增加，消费基金的增长也难以控制，特别是滥发奖金、滥发实物和补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国家的重点建设就上不去，经过很大努力恢复起来的正常经济秩序和比例关系有可能重新被打乱，中央重大决策和措施就不能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顺利地进行。

党的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都明确提出了集中资金加强重点建设和严格控制基建规模的方针，但由于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很不足，政府的措施也不够坚决有力，检查监督不严，以致这个

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国务院认为，今后必须把合理分配国民收入，克服资金分散现象，适当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我们必须兼顾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在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要逐步使人民富起来，使企业的收入增加；同时，也要使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使国家逐步富起来。职工工资、奖金和福利基金的增长，必须低于企业利润和上交税金的增长，坚决制止乱发奖金的现象。农民收入的增加，必须主要靠发展生产和降低成本。目前国家负担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其它补贴已经达到三百二十亿元，如不采取措施今后还会大幅度增加，这是国家财力无法承担的，因此必须加以控制。我们对企业不能再回到过去统收统支的老路上去。但是，在企业新增加的利润中，必须主要通过税收和规定合理的税后利润留交比例的办法，保证国家得大头。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必须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确保重点建设和其它中央开支的需要。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一定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提倡顾全大局，树立局部服从全局的观点。现在，在一些单位存在的乱摊乱挤成本、偷税漏税、截留应当上交的国家收入、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等种种违法乱纪现象，必须加以整顿和纠正。各级领导干部要勇于维护国家的利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同这类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三，正确地确定基本建设的总规模，努力保证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大力提高投资效果。

我们要为经济振兴打好基础，必须使基本建设保持必要的规模，但这个规模一定要同国力相适应，不能超过财力负担和物资供应的可能。如果违反这一客观经济规律，就会受到现实生活的惩罚。目前我国基本建设的总规模已经不小，问题是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的投资没有达到计划的要求，而地方、部门和企业用自筹资金和用各种贷款进行的基本建设控制不住，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超过计划过多。我们一定要把这种状况及时地改变过来，在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总规模的前提下，集中全国的力量建设起一批现代化的骨干工程和改造一批现有的重点企业，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打下强大基础，准备好充分的后备力量。

作为重点建设的大型骨干工程投资量大，建设周期长，还要有一系列的项目为它配套，因此重点建设项目在一个时期内也不能搞得过多，必须量力而行，瞻前顾后，统筹安排。不然的话，就会把短时间内可以见效的建设项目挤掉，就会挤农业生产、挤轻工市场、挤智力开发，严重影响经济的近期增长速度，甚至会重新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整个国家的基本建设，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由国家计委负责综合平衡。对于重点建设项目，国家计委、各个主管经济部门和有关的地方政府，都要像“一五”时期建设一百五十六项工程那样，认真做好建设前期的准备工作，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办事，精心筹划，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目前基本建设中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许多重点项目的投资超过工程概算。据对一百七十六个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的检查，现在要花的投资就比原来的概算增加一百八十五亿元，其中固然有些是原概算偏低，但大量的的是由于种种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今后必须对基本建设实行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度，杜绝各种浪费，决不允许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向重点建设单位乱收费用和敲诈勒索。国务院决定，这次大会之后立即组织必要的力量，对重点建设工程进行检查，表扬好的，揭露和批评不好的；对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必须绳之以政纪法纪。我们一定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资金真正管好用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六五”后三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现在的进展情况是：利改税的第一步，经过半年的准备，今年六月一日起已在全国国营工商企业中开始实施；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组织生产和流通的作用，正确处理条条和块块之间的矛盾，正在结合政府机构的改革，扩大试点；关于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方案，已在全国范围内试行。这三项改革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突破，目前虽已开始，但大量的工作还在后头，必须继续抓紧进行。

我国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正在加紧研究，通盘规划，争取尽早制订

出方案，进行试点和局部实行，以便在“七五”期间有步骤地全面展开。全面改革经济体制，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指导。计划体制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根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按照企业、产品和任务的不同，分别采取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管理办法。加强经济预测工作，逐步建立科学的计划决策、编制、综合平衡、考核和责任制度，健全和完善计划体系。国家在正确运用行政、立法等手段的同时，要更好地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各种经济杠杆，切实加强统计工作和统计监督，引导地方、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保证国家计划任务的实现。

第二，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生产和流通，发展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主要是：以城市为中心，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组织各种经济活动，打破地区间、部门间、城乡间的分割。按照专业化协作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继续进行企业的改组联合，逐步实现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合理化。认真消除种种壁垒和堵塞，开辟多种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做到货畅其流，逐步形成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区和经济网络。这方面的工作，首先从沿海大中城市、内地试点城市和某些新的重点建设基地做起，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可以适当放后一些进行。

第三，改革财政体制和工资制度、劳动制度。进一步完善利改税的制度，开征一些必要的新税种，合理调整税率，按照税种划分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收入，改进和稳定国家与企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改革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使职工收入同社会经济效益、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的劳动贡献密切联系起来。逐步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择优录用，选贤任能，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灵活调节劳动力，促进人才的成长和合理使用。

我们正在和将要进行的各项改革，目的是要克服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和缺陷，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经济体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但它当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不是要动摇、背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社会主义自身基础上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这种自我改进、自我完善，是在党和国家

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地进行的。通过改革，要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日益巩固和发展，使它的各项具体制度日益健全和成熟起来，推动社会生产力顺利向前发展。当然，经过一段时期的集中的全面改革，在新的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以后，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其它条件的变化，经济体制中这个环节或那个环节的改革，还是要不断进行的。

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农村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农业改革和城市工商企业的改革，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经过改革，使生产经营单位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同自己的劳动成果和整个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所有制形式不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化程度不同，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得多，我们只能从农村改革中吸取那些共同性的经验，而不能把那些只适用于农业经营管理的具体形式，照搬到城市工商企业和其它事业中来。我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城市工商业，城市改革的情况如何，对国民经济的全局关系极大。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继续调整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改革时，必须充分考虑经济的承受能力，既要态度坚决，又不能操切从事。凡是需要和能够进行试点的，都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国务院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小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但是，必须保证不出大的问题。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和措施，必须有利于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有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各项经济活动取得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利于兼顾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确保国家财政收入逐年有合理的增长。任何地区、部门和企业单位的改革，都必须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为前提。只有坚持这样做，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

当前，在部分同志中存在着一种观点，把改革单纯看成是权力和利益的分散。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有害的。对企业的具体经济活动管得过多过死，不利于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是不对的，适当放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于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应当集中的必须集中。削弱这种集中，那

就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就不能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对于企业应有的权力和利益，是必须尊重的。但首先应当明确，随着改革的逐步展开，对企业的要求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责任将日益加重。以责、权、利三者结合为特征的各种经营责任制，责任是第一位的。立志改革，不应该热衷于为局部争利争权，而应当自觉地认识和履行自己的责任，致力于改善经营管理，推动技术进步，加强劳动纪律，扎扎实实地做好各种基础工作，提高经济效益。所有企业，全体职工，都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各级经济领导机关和企业单位，都要尽力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同改革的要求相适应的水平上来。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级领导必须认清改革的根本宗旨，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原则。任何一项改革，不仅要考虑到自身的合理性，而且要考虑到同其它改革的关联和配合；不仅要考虑到近期的效果，而且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要把改革同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的整顿和技术改造很好地结合起来，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在改革过程中，要坚持和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深入细致的、有说服力的宣传教育，统一大家的认识，克服各种影响改革正确进行的错误思想。从国务院起，各级政府都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尊重和支持群众中一切符合改革方向的新创造，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因势利导，有条不紊地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三）关于教育科技文化建设

我们今后应该十分重视智力开发，把以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为重点的文化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实现经济振兴的必要前提。大力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可以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强大的原动力。这个问题，全国人民都很关心，不少同志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各级政府必须坚决克服轻视文化建设的错误倾向，把智力开发提到重要日程上来。

当前，要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加速培养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放在突出的地位。国务院最近批准了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采取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今后五年，计划将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人数由一九八二年的三十一万五千人，增加到一九八七年的五十五万人，增长百分之七十五。与此同时，采取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管理干部学院、教师进修学院等多种形式发展高等教育，使这方面的招生人数由一九八二年的二十九万人增加到一九八七年的一百一十万人，即增长二点八倍。为了保证这一计划的实现，国家将负责解决有关重大项目的建设投资和物资供应。我们还要从政策上、组织上采取措施，创造条件，鼓励自学成才，有计划地轮训中青年干部，壮大各方面的专家队伍。

我国中等专业教育多年来发展缓慢，形成中等和高等专业人才的比例严重失调，不利于加强和充实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力量，造成教育投资的严重浪费。要进一步抓紧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有计划地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五年内使职业高中在校学生数占到整个高中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为了推动这一改革，要加快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培训，提倡具备条件的科学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到职业学校兼职兼课，提倡厂矿和正规学校联合办学。

目前，越来越多的工农群众和青少年，已经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掌握科学文化和政治理论的重要，一个学科学、学文化、学政治的热潮正在兴起，各级政府、企业和社队应该努力办好职工教育和农民教育，满足他们的要求。中、小学教育是基础。要大力培养中、小学师资，帮助他们提高教学水平，在全社会养成尊重教师的良好风气。要努力普及初等教育，抓紧扫盲工作，首先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幼儿教育十分重要，要有计划地发展，并且从办好幼儿师范抓起，逐步加以整顿和提高。在各级各类教育事业中，都必须注意编写好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从今年二月起已集中几百位科学技术专家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编制一九八六年到二〇〇〇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同时制订农业、能源、交通运输、计算机、机械工业、原材料工业、消费品工业等行业的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这将为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的制订，提供可靠的科学技术依据。计划在“六五”期间进行的三十八个重点攻关项目和四十项重大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要继续逐项落实。除国家确定的重点攻关项目外，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都应当根据需求和可能确定自己的攻关项目。此外，政府正在组织有关科技力量，参加二百七十九项重

大预备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和重大建设课题的研究工作。我们还要认真做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推广工作，通过技术引进和合作生产，较快地把我国的生产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

科技人才的统一管理和合理使用，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后准备采取以下措施：（1）通过编制规划、科技攻关、建立技术开发中心等，打破部门、地区界限，集中调配和合理使用全国科技力量。（2）有计划地从一些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抽调一部分科技力量，加强能源、交通、轻工、农业等科技力量薄弱的部门；从力量富裕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抽调一部分人员，充实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师资。（3）建立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制度，使科技人员从积压的部门流向需要的部门，奖励他们到中小城市、农村、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4）对全国科技人员，建立分级和分行业、专业的双重管理制度。（5）改进对科技人员的考核、晋级、评定职称和奖励制度，促进中青年科技力量的成长。

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对建国以来各方面的成就和经验教训进行历史的总结，对国际上各方面的思潮进行有分析的研究和批评，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一个学科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各有特点、协调发展、具有现代化手段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

我们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坚持不懈地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部门应当围绕不断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这个中心，进一步安排好事业的调整、体制的改革、队伍的整顿和基本设施的建设，适应群众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兴趣的多方面的需要，努力创造和输送更多更好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组织各种适合不同群众需要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要大力加强广播电视电影、出版印刷发行、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青少年宫、体育场所等的建设，以满足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和娱乐的需要。要继续保护好历史文物。我们要努力采用现代化的制作和传

播手段，采取多种方式，向人民传播科学知识，介绍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我们的作品应该生动地深刻地反映我国人民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激发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巨大热情。我们向人民输送的精神食粮，不但要满足他们正当的娱乐和高尚的审美要求，而且首先要满足他们多方面的求知欲望；不但要使他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得到提高，而且要达到大大提高他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目的。

为了保证精神产品的质量，各级思想文化领导部门，必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必须在继续克服“左”的错误的同时，对于已经有明显表现和恶劣影响的某些精神产品不顾社会效果的完全商品化的倾向，给以足够的警惕和注意，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切实纠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它们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那种唯利是图、盲目进行的商品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多数精神产品是以商品形式进行流通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自由泛滥。一切严肃的、爱国的、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绝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和表演当作牟取名利的手段。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对作品的社会效果不负责任的倾向，是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不兼容的，必须继续批评这种倾向。我们所有的思想文化艺术工作者都要十分珍重自己对人民所负有的重大责任，十分珍重人民的期望。

要大力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在发展现代医药的同时，要注意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克服忽视祖国医药宝库的现象。继续坚持预防为主、城乡兼顾、中西医结合的方针，逐步改革现有的医疗制度，加强各级医疗卫生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继续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有效地防治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积极开展城乡群众性体育活动，重点抓好学校体育工作，努力提高体育运动的水平。

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加强文化建设的关键。各部门、各地方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切实改进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对知识分子的劳动的报酬应该逐步适当提高。鉴

于目前中年知识分子骨干的工资偏低问题比较突出，尽管国家财政还有困难，在今后也要尽可能拿出一些钱来，把他们的工资收入逐步提高到与其职务和职称相适应的等级线内。

为了进行智力开发，加强文化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艺、体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比例关系逐步协调起来，国务院决定今后逐年增加文化建设方面的投资。除了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外，要充分调动各地方、部门、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和广大群众进行智力投资的积极性。从国家、集体和个人几方面共同努力，来加强我们的文化建设。

（四）关于政法工作

为了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加强政法工作，努力消除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各种违法乱纪的消极现象，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新宪法是我国人民治理国家的总章程。要教育和组织人民认真地实施新宪法。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以身作则，坚决维护宪法的尊严，成为执行宪法的模范。希望各级人大代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这方面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监督。我们要根据宪法的规定继续改革和完善政府的机构和领导制度。省、市、自治区政府的机构改革要继续抓好，善始善终；县和基层两级政权的机构改革，将在今冬明春逐步展开。各级政府要努力改善领导制度，改进领导作风，健全工作责任制，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实行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各种有效监督，切实克服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一切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严守法纪，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那些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重大损失的严重官僚主义者，坚决执行包括降职、降级、撤职在内的各项政纪，触犯刑律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凡属无视国家法纪，肆意侵犯人民民主权利，利用职权谋私利，参与经济犯罪和其它犯罪活动的，一律依法惩处，不能姑息养奸。

要继续抓紧经济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工作。国务院准备陆续制定一批经济法规，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政府经济部门和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员，都要努力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活动，消除各种犯罪分子可以利用

的漏洞和薄弱环节，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加强和改革政法公安工作，实行综合治理，是实现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基础一环。几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社会治安虽有好转，但尚未恢复到建国后的最好状况，某些地方凶杀、抢劫、强奸、盗窃等刑事犯罪问题还比较突出。最近发生的劫机事件，暴露了我们的管理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和问题，政法机关的某些专政职能没有得到强有力的行使，有些单位政治思想上的麻木和敌情观念的薄弱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只要各级政府、政法部门和全体人民密切合作，我们就完全能够更有效地为防止和消除这些恶性案件而斗争。极少数敌对分子和不可救药的惯犯要犯，不管他们如何暗中破坏，如何铤而走险，他们终将逃脱不了应得的惩罚。我们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继续有力地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和其它犯罪活动，决不能松懈这方面的斗争。同时各级政法部门要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协同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好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的工作。要加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其治保、调解组织的建设，进一步推动群众制订街道居民公约、乡规民约和工作守则等活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自觉维护社会治安，遵守公共道德。要发动广大群众自己做思想疏导和调解工作，使人民内部的各种纠纷及时得到解决，不致激化。进一步整顿劳改、劳教场所。努力办好各种形式的工读学校。要激发失足青年的自尊心，并负责给已经悔改的失足者以正常的生活出路。

为了适应政法工作的需要，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队伍的建设，全面提高政法公安干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技术装备，加强他们的战斗力。全体政法公安干警，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必须具备对国家对人民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断地增强群众观念、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要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积极举办中等和高等政法院校，搞好在职干警的正规训练工作，把政法公安队伍真正建设成为人民热爱的、训练有素的社会治安的柱石。

各位代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动荡不安的国

际环境中进行的。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不断增强足以适应现代国际环境需要的国防实力。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政训练，努力提高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水平，提高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合成作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要有重点地抓紧武器装备的科研、试验和生产，加速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要改进兵役制度，加强民兵建设。继续发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加强国防，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神圣任务。

（五）关于外交工作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平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是当今世界祸乱的主要根源。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政府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努力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

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强大力量。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权利的斗争，是我们的神圣义务。我们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和阿富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越南和苏联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地、全部地分别从柬埔寨和阿富汗撤走，由柬埔寨人民和阿富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以色列必须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应当得到恢复。我们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人民维护独立、主权和反对外来干涉的斗争。

目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进入以发展民族经济来巩固政治独立的历史新阶段，并且已经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由于过去长期遭受外国的统治和掠夺，现在又继续遭受不

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束缚，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这一正义立场。我们认为，开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对于推动南北谈判、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一向互相支持，互通有无，近几年来，又在发展经济技术合作方面迈出了新的步子。今后，我们将继续本着“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为促进这种合作的不断发展作出更大的努力。

不结盟运动创始以来，对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最近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对解决当前世界上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我们衷心祝愿不结盟运动继续坚持它为自己规定的独立、自主、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强权政治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一向关心同自己的邻近国家保持和发展睦邻关系。

我们唇齿相依的兄弟之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以坚定的步伐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进。中国人民永远珍视同朝鲜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热烈祝贺他们在各条战线上的胜利，坚决支持他们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

中国同日本在一九七八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在一九八二年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三项原则，得到了日本朝野的赞同。世代友好下去，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深信，只要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排除干扰，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一定会日益增强和发展。

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在过去几年里，由于越南当局侵占柬埔寨，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排华反华，本来十分友好的中越关系恶化到了严重对立的地步。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愿为改善中越关系而继续努力。今年三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阐明了我国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改善中越关系的立场、主张和建议，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我们希望越南政府以越中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

我们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在维护东南亚和平与安全的斗争中有了可喜的

发展。我们还满意地看到，中国同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传统友谊和合作关系正在不断加强。中国同印度的关系近几年来也有所改善。中印两国有过两千年的和平交往，应该能够友好相处。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印边界问题，完全可以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不应该妨碍我们敦睦邦交。我们愿意继续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努力。

我国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正在不断深入地向前发展。中国人民对罗、南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光辉成就感到高兴。他们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

中国人民对东欧其它各国人民也怀有友好的感情。我们关心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近年来，我国同东欧各国之间在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往来逐渐增加。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是可以继续改善的。

中国赞赏和支持西欧各国加强联合，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同西欧、北美、大洋洲的许多发达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事实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平等合作。我们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努力扩大和加深同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中国和美国自一九七九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是有发展的，但是远未达到本来应该达到的水平。美国制定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地违背了它在历次中美公报中公开承诺的义务和双方商定的建交原则。中国政府和人民是重视中美关系的，但是决不能容许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内政受到干涉。美国政府应当切实信守历次中美公报，不再做有损中美关系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这样中美关系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中苏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中苏两国人民都关心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从去年十月开始的中苏磋商中，中国方面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我们认为，改善中苏关系，应该从解除苏联方面对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着手。这是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我们期望着苏联方面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其诚意。

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已经载入了新宪法。这些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政府将坚持不渝地贯彻执行。我们将始终如一地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为人类争取进步，为世界争取和平！

各位代表！

国家的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是我们的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在内，都急切地盼望着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能早日实现。现在海内外一切愿意看到祖国统一和富强的炎黄子孙，都在采取各种方式，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目标的实现。我们对一切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感谢。我们要继续努力，早日结束台湾海峡两岸人为的分裂局面。我们还将在适当的时候收回香港主权，并且采取适当措施维持香港繁荣。我们一定要继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大团结，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昌盛而共同奋斗。

今后五年，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其它各项工作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五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种种困难。我们一定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埋头苦干。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过目前这段仍然比较艰辛的路程，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更加坦荡的康庄大道。

节能工作要坚韧不拔地抓下去*

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

第一个问题，节约能源问题。今后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一半靠增加能源产量，一半靠降低能源消耗，两个方面任务都很重，但潜力也很大。这几年节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从今后任务来看，节能的确是任重道远。前几年，一个是搞了经济结构调整，轻工业上来，重工业下去；再一个是扫了浮财，当然，浮财还多得很。真正靠技术改造，技术进步，靠管理节能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企业，即使是在这些企业，也只是刚刚开始。随着今后节能向深度、广度发展，越来越要依靠技术进步，工作将越来越艰巨，难度也将越来越大，阻力也大。现在的经济体制，经营管理和现行经济政策的许多弊病，都障碍着节能的开展。节能的进一步深入，必然触及到这些问题，牵涉到地区、部门和企业的利益。这些问题，必须一步一步地解决。节能工作松不得，现在不能松，“六五”不能松，“七五”不能松，“八五”、“九五”以后都不能松。节能涉及到现在体制、制度上许多问题，要排除万难，坚韧不拔地抓下去。要越抓越有成效，越抓办法越多，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

第二个问题，节能机构在机构改革中不能削弱，而要加强。要有称职的机构和人员抓节能，无人负责，什么事也搞不成。现在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下面机构改革，上面一般不要讲话。但有些问题要讲话，节能就是需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全国节能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要加强的机构，这是“弱小民族”，“少数民族”，应该受到保护，其它机构可多减一些，节能机构不应该精减，要有一批人抓节能。这个话可以传出去。如果你这个单位节能机构削弱了，节能又搞不好，就证明你忽视了节能，当然，有了机构抓不好也不行。

过去讲过，要搞一个抓节能的管理体系，一直抓到企业，真正的重点在企业，节能机构要精干，节能人员要懂行，要能够胜任（万里插话：要精干，能干，敢干），不要成为安置干部的地方。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一些科研机构，实际成了安插机关，地市合并也有这个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注意。

第三个问题，节能要从上面采取计划、行政和立法干预，要有经济政策，要使节能的受到鼓励，浪费的受到惩罚，使企业感到节能有利，浪费无利，反而有害。要使生产节能设备的企业有好处，采用节能设备的企业也有好处。这个问题过去讲了多次，光有笼统的方针，不解决问题。要先抓一些大企业，一年解决它几个大问题。沈阳水泵厂生产了节能设备，去年少收入三百万元。这值得研究。生产节能设备，应当优质优价，允许节能设备价格向上浮动，如浮动百分之十。也可先搞几种产品，搞它五种、十种产品，确定下来以后，经委要下力气抓，从生产到推广，排除万难，有什么问题，就打通什么关节，包括计划干预、通报批评、奖励、扣罚等等。总之，要从经济、行政、立法甚至包括中纪委在内的各方面干预，进行综合治理。一年搞它几件事，这样抓下去，就会有结果。否则，年年讲政策，年年解决不了。

对于耗能大而又确实浪费很大的设备，也要确定限期更换，而且规定用企业的自有资金换；过期不换的，就把它的折旧资金收回来。经委对这些事要做得有力一些，一方面要立法，另一方面还要先将由国家供应能源的大企业管起来，逼企业节能。规定什么设备不能用，什么样的工厂不能生产。这样，一年抓住几个，有把握看准了的，定下来，立个法，抓住不放。光一般讲不行，等条件好了再抓也不行。

对地区、部门和企业的节能，既要有动力，又要给压力。日本为什么节能，它没有能源，日本的国民心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即国土狭窄，没有资源，所以就要设法打出去，就要抓质量，把质量看作关系生死

存亡的大问题。为什么江苏节能好，就因为能源缺；为什么天津、大连、青岛节水好，也是逼上梁山。四川天然气少了，省委下决心安装三表（气表、电表、水表），结果民用气、民用电下降很多。讲节能，这是一条经验，一个是鼓励节约，一个是严格配给，不给那么多，这样就逼着非节约不可。从地区、城市到企业，规定它一年产值增长多少，能耗下降多少，一年只给多少能源，订个考核指标，办法自己想去。协作煤可以搞，但也要规定个数量，不能超过。

第四个问题，今天只是就节能方面总的说一下，按照你们的汇报提纲，能办的事先办起来。有些问题，如征收能源税问题，还得讨论一下，今天不能具体定。

最后讲一下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问题。全国长远计划基本定下来以后，要认真抓一下企业的根本问题。提高经济效益，一要抓企业的产品质量，二要抓降低消耗，必须使企业真正加强经营管理，搞好技术进步。面上的问题要用价格、税收等经济办法，对大企业还可以行政干预。降低原材料、能源消耗提高产品质量，这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所在，同时也是对能源的节约，因为所有原材料的节约，都是能源的节约。企业技术改造，目标不是减人，主要是降低原材料、能源消耗，提高产品质量。上海工业成本构成中，原材料占百分之八十六，企业整顿也好，改革也好，都要瞄准降低消耗、提高质量这个目标。具体办法，一个是进行技术改造，一个是改进经营管理，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办法，把企业的精力转到这方面来，三面包围，网开一面。这是整个工业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原有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已经混不下去，工业不前进，就无法生存，要逼着企业进行一场革命。从国外来讲，闹一次经济危机，就垮一批企业，而另一批企业就更上一层楼。下一步围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经委的工作还要讨论一下。工业到底怎么抓，过去靠低价农产品，低价的原材料、燃料，我们还搞不好，这些东西涨了价，怎么办？看来工业不攻一下关，总的问题解决不了。对工业的政策，总的有三条：一是不走过去老路，不搞死，不搞统收统支；二是企业对国家承担的任务要加重；三是企业能否混下去，看你的本事，班子不行，整顿班子，根本无法生存的，就让路。

总之，国家一方面要给企业自主权；另一方面对企业要严格要求，要想办法把企业的工作逼到这方面来，真正把经济效益搞上去。经委要把这些想法具体化，计委要从计划上体现出来。这样做，要克服很多阻力，打通很多关节，要有计划地排排队，一批一批地加以解决。

关于平朔露天煤矿项目审批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依林、宋平同志：

小平同志批示送上，请按批示办理。

这样大的项目，当然要按基建程序办事。煤炭部的可行性报告，报送时间太迟，但此事不宜再拖，只有请计委打破常规，抓紧完成审批手续了。估计审批中会有一些不同看法，但鉴于这个项目大的问题已基本搞清，有些细节，短时又难以统一认识，因此，只要没有大的风险，我认为应该予以批准。某些小的方面即使可能吃点亏，但争取了时间，权衡得失，还是值得的。

此事工作过程中，煤炭部确有缺点，我将向他们指出，要他们今后注意！哈默¹何时来，必须给以答复，如月底不行，可考虑推到下月初。无论如何，七月份要完成这一项目的最后法律手续了，否则影响太大。

以上请依林同志直接抓一下。

如还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可由国务院开会议定！

（以上抄告小平同志阅知。）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注 释

1. 哈默 (Armand Hammer, 1898-1990), 美国企业家, 祖籍俄罗斯, 生于纽约。时任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他作为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与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 曾与列宁建立了友谊。1979年应邓小平邀请访华, 决意投资建设山西朔安太堡露天煤矿, 后因经营困难将股权转移给了中方。

加快发展我国食品工业的意见^{*}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两位胡老¹的信和民建、工商联的建议，我都看了。现转送给你们，请研究办理。我认为，两会²召开的传统食品咨询工作座谈会开得很好。他们提出恢复传统食品，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食品工业新路子，是很适时、很重要的，所提建议也是可行的，我完全赞同。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发展食品工业，有关部委和各界人士做了许多工作，使我国食品工业有了发展，传统风味食品正在逐步恢复。但由于“左”的错误和其它方面的原因，传统食品有的已经绝迹，有的质量下降，名不符实，急需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战后很多国家食品工业都有很大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利用我国传统食品的优势，发挥这一特长，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工业搞上去。这是我们各级政府应当列入议事日程的一项重要的工作。鉴于我国食品工业分散在各个地方和许多部门管理，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协调。现在已经建立的食品工业协会，应进一步充实和加强，负责做好协调、规划工作，对有关政策法规提出建议。国家经委要支持帮助食品工业协会开展工作，并对各地、各部门进行督促检查。请你们就二老的信和两会的建议深入讨论，向国务院提出报告。

^{*} 这是赵紫阳就发展中国食品工业写给张劲夫和吕东的一封信。

注 释

1. 两位胡老，指胡厥文和胡子昂。

胡厥文(1895-1984)，上海嘉定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曾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中国机械工业协会会长，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委、主委。

胡子昂(1897-1991)，重庆巴南区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曾任重庆市工商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委、主委，全国人大常委。

2. 两会，这里专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集中财力保重点 提高素质促转变*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关于集中资金加强重点建设问题，去年小平、陈云同志就提出来了，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也讲了这个问题。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了多次讨论。最近，中央常委和书记处会议又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会议的精神，刚才依林同志作了系统的说明，我完全同意。这里，再着重说明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重点建设上不去，全局就活不了。

我们必须从国民经济的全局上，认识系统解决能源、交通建设问题的重要性。能源供应紧张，交通运力不足，这是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大家都感受到了的，都认为应该解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认识、行动就不那么一致。现在基本建设总规模越来越大，一般性的加工工业越来越多，而能源交通建设却上不去。为了实现翻两番，许多地方和单位都想多上一些加工项目，包括一些耗能很大的项目。大家都在考虑翻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首先要明确：能源、交通紧张，是长期的趋势，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的重要因素。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上不去，没有动力，没有原材料，加工工业搞得再多，也是白费。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六五”、“七五”的发展速度无法保证，而且有可能还要被迫进行一次大的调整，经济振兴更无从谈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强调加强以能源、交通为中心的重点建设，控制地方加工工业的发展，那么今后各地的经济建设应当主要去抓什么呢？除了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和抓好地方的能源交通项目以外，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改善现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推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上。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潜力很大，很有可为。我认为，只要今后我们一手抓住重点建设，一手抓住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我们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好，工作就会越来越主动，整个经济建设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一定要把基本建设总规模控制住，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了。去年和今年的人大会上，都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今年再控制不住，就会影响经济稳定，也无法向人民交代。各地区、各部门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凡是超过今年国家计划的，都要及早下马。迟下不如早下，长痛不如短痛。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技术落后、消耗高的项目，要坚决停下来。要建立责任制，省、市、自治区的建设规模，由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负责；部门的建设规模，由部长、厅长负责；银行贷款突破国家计划，由银行行长负责。

在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看得远，抓得狠，当机立断。不然要误大事。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说，一九八〇年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及时地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奠定了进一步调整的思想基础，保证了这几年经济的稳定发展；那么，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集中力量搞好重点建设奠定思想基础，从而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迈进一大步。

第二，集中财力物力，势在必行。

这几年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不算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但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但没有增长，还有所下降。一九八二年财政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这种情况，只能是在一定时期的一种特殊情况，长此下去将难以为继。苏联和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之外，财政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也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有些口径不完全可比。我们的国家财政，不仅要承担重点建设的开支，还要承担文教事业经费和军政费用。现在一年的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显然太低了。解决资金过于分散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是哪一个人随意决定的。要保证重点建设，就必须集中财力和物力。不是可以集中，也可以不集中，而是非集中不可。现在许多地方、部门和企业手里的钱多了，也使国家有资金可集。

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过分集中不利。但是，也正因为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必须保持必要的集中，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性，才能集聚必要的财力、物力，兴办一些于国于民有利的事业。适当集中财力、物力，就可以办成几件大事，这已经为过去的历史所证明。要实现二十年的战略目标，必须适当地集中财力、物力，这更是理所当然的。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间，平均为百分之三十四，最高的年份达到百分之四十六。现在当然不能搞那么高。从实际情况出发，看来今后把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八到三十是恰当的。这样做，既不会走过去集中过多的老路，又能保证国家必要的开支。至于集中资金的办法，依林同志已经讲了，我原则同意，请大家进一步讨论，怎样做得好一些。不论采取什么办法，必须集中这么多。

“七五”期间基本建设总规模摆在什么数字上比较好？我看，按三千五百亿元的方案安排，大体上是适度的、可行的。从国力的增长来看，“七五”期间国民收入有可能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左右。五年基本建设投资三千五百亿元，分年投资大体上是，在一九八五年预计六百多亿元的基础上，一九九〇年达到七百八十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增长不到百分之五。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但各方面绷得过紧。“七五”期间，按现在的设想安排，应该说是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当然，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作出很大努力，才能实现。

一方面我们必须集中资金，另一方面必须堵塞漏洞。否则，辛辛苦苦集中起来的资金还会被冲销掉。现在要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必须刹住乱涨价、乱摊派的歪风。去年下半年，许多地区出现了生产资料乱涨价的现象，今年以来在继续发展，对基本建设单位乱摊派的现象也是有增无已。据有关部门的材料，全国有些钢厂，不经过国务院批准，由地方和企业自定了产品的临时出厂价，比国家规定的价格高出很多。有的企业还规定了提取管理费、劳务费等。现在议价的钢材每吨比国家牌价高出二百至三百元。木材、水泥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地方和单位向建设工程特别是向重点建设乱收费用甚至敲诈勒索，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最近，耀邦

同志连续批了两个向建设单位伸手要钱、“吃大户”的材料，国家计委已经会同有关部门去调查处理。据财政部估计，现在工业成本中原材料和燃料部分，议价比重约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议价平均比牌价高出百分之三十，一年约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一百多亿元。在基本建设工程总造价中，乱摊派的费用至少占百分之十，一年等于多支出五十亿元。

这种乱涨价、乱摊派的歪风如果不坚决刹住，就会使工业生产成本普遍上升，造成轮番涨价，带头把市场物价抬起来；就会大大提高基本建设工程的造价。违反国家规定的这种乱涨价、乱摊派所拿走的收入，都落到小单位和个人手里。而由于增加成本和提高造价所减少的收入和增加的支出，都将落到国家的身上。比如今年一月至五月，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八点二，而财政收入却只增加百分之零点一。这个情况很值得我们重视。这样下去，国家下很大决心，从各方面集中的资金，很可能又被各方面捞走了。同时，这种歪风不坚决刹住，国民经济就要遭到破坏，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经济犯罪活动也难以制止。我们主张把国民经济搞活，但决不允许部门、地方和企业违反国家规定各行其是，以致把国民经济搞乱。如果我们现在不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任其发展，那就不可收拾。

目前，有些生产资料的价格确实偏低，应该由国家通盘考虑，逐步进行调整，决不允许地方、部门和生产单位自行提价。属于国家统配的物资，必须执行国家的牌价，不允许乱搞议价。凡是自行提高了价格的，要坚决改过来，其非法收入一律没收，归国家财政，并追查责任。（邓小平：什么时候刹住？什么时候可以改呀？胡耀邦：先在我们这里统一思想，大家要去抓，要处理几件。邓小平：就是该抓的要抓，该进班房的要进班房，没有别的办法。总之，这个会所以要快开，就是要争取下半年。今天是六月二十五日，七月半能不能扭转？大家定个协议，七月半为期，还有二十天。现在开会的人就先打招呼，各地方、各部门自己心中有数。胡耀邦：该批评的批评，该撤职的撤职。邓小平：必须在七月半扭转这种局势，二十天时间。）对于乱向建设单位收取费用的，必须坚决制止，严重违法乱纪的要依法制裁。总之，对于破坏国家计划经济、破坏重点建设的乱涨价、乱摊派的歪风，必须严肃处理，不能纵容姑息。

对于乱发奖金、乱发补贴的现象，也要采取坚决态度加以制止和纠正。

今年一至五月，国营民用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实现利润减少百分之三点三，上交利润减少百分之九点九，而职工奖金支出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三。这种情况如果不扭转，不仅今年国家财政收入计划将完不成，而且消费基金的增长将失去控制，使市场供应发生问题，物价稳不住。我们坚持计划经济，决不能使基本建设规模失控，决不能使消费基金失控。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由于这两方面失控，尾大不掉，以致经济陷入困境。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记取。

关于今年的财政问题，这里多说几句。总的说，今年国家财政不容乐观。现在收入上不去，支出又不断增加。一至五月，财政收入仅大于支出四亿五千万元，大大低于前几年的同期水平（一九八一年同期为四十八亿元，一九八二年同期为三十亿元）。搞不好，全年三十亿元赤字的计划将大大突破。货币回笼的情况也比往年差，今年一至五月回笼二十三亿元，而一九八一年同期为三十九亿元，一九八二年同期为四十六亿元。如果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大量增加，经济的稳定就要受到影响。现在中央、地方和部门都要抓财政收入，并且严格控制支出，以免下半年过不去时拿起刀子砍支出。

第三，继续搞活，不走老路。

对这次集中资金，国外有一种评论，认为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强调集中的老路。国内也有些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搞死了，搞多了。必须明确，我们不是只讲集中，不讲搞活，不是回到过去统收统支、竭泽而渔的老路上去，而是要坚持改革，继续前进。这是因为我们坚持进行改革的各项基本政策不变。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农副产品的采购价格基本不动，扩大企业自主权不改变，对生产、流通领域和技术改造在政策上还是放活的，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也是继续实行的。我们讲集中，是指在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大的决策必须统一；我们讲控制，是指对不符合全局利益的经济活动加以严格限制，比如对基本建设规模和消费基金总额要严加控制，对价格、信贷的管理要严加控制等等。这是在前进的过程中用新办法来解决新问题，是放活以后加强管理，使工作跟上去，根本不是不要改革，不是不要搞活。正是由于过去几年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才有今天的形势，才有这么多分散的资金可供集中。所以，我们面临的任务，是

继续前进，是在放活以后，因势利导，存利除弊，进一步完善改革；在保护地方、单位和职工、农民的正当的积极性的同时，限制消极因素，用计划管理、行政干预、法律手段和经济杠杆把企业的经济活动引上对全社会有利的方向，使改革得以健康发展。

至于集中资金的数量，是否会搞多了、过头了，也是作了反复考虑的。现在提出的方案，是经过核算，提出了适度的要求，并且是有步骤分地区实施的。几种措施不是一起出台，倾盆大雨，也不是搞一刀切，因而不至于把生产经营单位和职工、农民的积极性打下去。

从农村来看，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我们一般不作变动，这就稳住了大头。现在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在分配上作一些小的调整。一是对某些生产资料的价格略有提高，以减少国家的亏损；二是对奖售粮和经济作物地区的返销粮，稍微减少了一点倒挂补贴；三是在农民增加收入和逐步富裕起来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点税收。这三条影响是不大的。据测算，这些措施全部实行后，每个农民平均每年少得七八元。一方面各地应努力把各方面加给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减少下来，一方面国家这头多拿一点，农民是会接受的。去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增加收入四十六元。今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农民的纯收入仍将继续增加。在一九八二年平均每个农民纯收入二百七十元的基础上，一九八五年预计增加到三百一十二元，一九九〇年预计增加到三百九十元，平均每年仍可增长百分之四到五。

从城市来看，集中资金的措施除了增加银行上交以外，主要是两项：一是把能源交通建设基金的征收比例，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十五；二是开征税率为百分之十的建筑税。两项一年约可增加财政收入五十亿元，也不算多。现在许多地区仍在纷纷要求追加自筹投资，可见过去订的征收百分之十的比例小了，大家手里还有钱，提到百分之十五并不多。当然有些行业要照顾。开征建筑税，是会影响地方建设规模的。但资金、材料就那么多，只有地方、部门、企业少搞一些一般项目，国家才能多搞一些重点项目。大家都要齐头并进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做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现在的集资方案，体现了这个精神，数额并不过分，企业、社队是负担得

起的。我们对企业、对社队采取的政策，不是不给他们增加收入，而是要使他们在增加收入的基础上，为国家、为长远利益多作一点贡献。事情本来就有两个方面，既要放活，又要管理；既要承认各单位的利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又要保证国家得大头，有力量办几件大事。这是一对矛盾，只能在经济生活的运动中不断加以调节。匈牙利在改革、扩权以后，也遇到这个问题。企业的资金多了，就想盲目扩大基本建设，盲目扩大生产，以取得更多利益，于是国家就进行控制。他们有个说法，叫做“在控制和反控制中生活”。这个说法，我看是有道理的。在新形势下，我们应当学会运用新的办法。

第四，我国工业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挑战，面临着一个如何提高素质的新的转变。

我们的企业，过去是靠低价的原材料、廉价的农副产品和较低的工资支出维持生存的，所得的利润，大部分是原材料和农副产品价值的转移。这种情况，掩盖了企业的落后面。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农副产品价格提高了，有些原材料价格也提高了，职工的工资支出也增加了。因此，造成成本上升，亏损增加，靠减少上交利润来过日子。据统计，工业企业的成本，一九八〇年上升百分之零点九，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〇年上升百分之一而一九八二年又比一九八一年上升百分之零点四。去年工业企业的亏损额达到四十七亿元，上升百分之四点三。国家的建设资金从哪里来？靠农业这头很有限，积累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靠工业。现在很多赚钱的企业都不赚钱了，赚钱多的赚少了，国家的财源也成了问题。今后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将逐步提高，职工的工资还会继续调整，这是总的趋势。客观形势向所有的工业企业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靠老办法，靠现有水平，混不下去了。如果我们的企业不来一个根本转变，不在质量上、素质上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在国内就没有生命力，在国际上就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出路。一句话，不前进，就无法生存。对这样一个重要和尖锐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引起各级经济部门和广大企业的普遍重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只是提出来，初步酝酿一下，这次会议不可能深入讨论。

造成当前企业经济效益差的重要原因，从企业内部来说，是经营管理落后和技术落后，是工人队伍的思想和技术素质下降，纪律松弛，以致产

品的质量差，消耗高。从整个社会来说，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大量兴建那些工艺落后、产品供过于求的企业，不断加剧企业技术落后和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这几年我们对企业的调整和整顿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没有触动这个根本问题，没有抓住这个要害。在解决重点建设问题的同时，各地方、各部门有必要集中力量狠抓一下企业的问题，把基础工作抓好。

我们讲要使企业实现一个新的转变，要提高素质，就是要把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降低物质消耗，提高产品质量，这是整个工业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是大有可为的。现在我们企业的能源、原材料消耗都很高，许多还没有达到历史的最好水平。同国外比，差距更大。国民生产总值每一亿美元所耗的标准煤，我国为二十一万吨，苏联为十二万吨，美国为九万一千吨，日本为三万七千吨。虽然经济结构各不相同，但我们耗能高却是事实。我们的许多工业品，质量很差，花色品种单调，几十年一贯制，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我们的工业品（也包括农产品），长期比较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过去是有无的问题。现在情况不同了，不论国内市场，国际市场，都有个讲求质量的问题。同样数量的产品，在国外高档与低档的价格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比如纺织品，我们出口的许多都是大路货，只能摆地摊。看来老是在盲目扩大产量上兜圈子，不在质量上下功夫，是没有前途的。

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一要改善经营管理，二要促进技术进步。否则，就会成为空话。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和许多政策、措施、办法，不是鼓励、引导地方和企业关心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不是限制他们盲目增加产量、粗制滥造，而是相反。今后，我们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不论计划管理也好，行政干预也好，经济办法也好，法律手段也好，应该一边促进，一边加压，迫使企业把力量转到改善经营管理、推动技术进步、降低物质消耗和提高产品质量上来。这些都是基础工作。整顿也好，改革也好，改组也好，最后都要落脚到这方面来。利改税经过进一步完善后，国家同企业的关系已经固定下来了（要抓紧完善利改税的工作，这既可进一步解决企业的盈亏自负，也有利于解决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今后企业的目标不应放在从国家财政那里挤，挖财政一块，向国家争利；而应

当攻关，把劲用在提高企业的水平上。企业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日子过得更好些，就看自己有没有本事。

必须看到，要做到以上这些，从外部条件来说，还涉及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在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条件下，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提高经济效益，都受到很大限制。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企业就不可能改变管理落后、技术落后的面貌，不可能使我们的企业实现提高素质的新的转变。我们应当立足于全局，按行业、按产品，从经济区和中心城市着手，进行规划、改组、联合和改造，坚决而有秩序地实行关停并转，把原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好。对新建的企业，要有建厂的标准，产品的质量和批量标准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准新建。

总之，我们现在的工作，一方面要从宏观上为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作好安排，搞好布局，把关系全局的重大骨干项目建设好，搞好综合平衡，避免出现大的曲折；另一方面就要考虑把作为国家经济细胞的几十万个企业的基础工作真正搞好，把经济效益搞上去。这样，我们国民经济的振兴就大有希望。（邓小平：紫阳同志讲的这篇话，下面一个问题比前面一个问题更重要。前一个问题容易解决，二十天为期。企业管理、企业改造这个问题十分大。农村问题解决了，城市问题是什么？落后！相应地要涉及商业、流通环节的改革问题。这次会议集中解决集中财力问题，那些问题以后专门研究。）

重大技术装备要开展国际合作与军民结合*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我们的效率实在太低了。关于抓重大技术装备问题讲了很久，中央财经小组也专门开了会，要赶快行动起来，不要老空议论。要抓得实在一些，把方针政策具体化。

最近我到东北，在伊敏河看到了本溪汽车厂出的68吨汽车。第一台质量还可以，后面几台质量很差，协作件质量不好，材料也不好，不能用。机械工业的产品质量的确是个大问题，总是解决不了。有什么办法才能解决呢？

还有另外一种恶性循环。现在我们采取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这是必要的，但是，搞不好，会越保越老大，越不求进步，越保越落后。澳大利亚就不保护，谁质量好，价格便宜，就买谁的。现在机械工业质量不好，但是有人自己还不承认落后，这样很不好。质量问题不能只听制造部门的，主要要听使用部门的意见。落后要认账，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当然，有些东西即使落后一些，我们自己也要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不能因保护而甘心落后。

搞重大技术装备时，要把军工的技术力量充分利用起来。有些引进技术，如密封、焊接、液压等，军工部门都过关了，要把军工力量、技术引进和科研攻关密切结合起来，在军转民的基础上，再引进一些技术，加上

* 这是赵紫阳听取林宗棠关于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自己科研攻关，有些技术问题就能解决了。重大技术装备要通报给军工部门，请他们看哪些他们能搞。要实行有偿技术转让办法，要长期搞下去。

现在有些设备制造任务，使用部门要安排在他自己的工厂生产，机械部门要安排在他自己的工厂生产，部门观点比较严重，矛盾很多。今后，重大技术装备可实行投标的办法，择优选厂，谁有能力干，谁的质量好，谁的价钱便宜，谁能保证建设进度，谁的服务态度好，任务就交给谁。

现在有的单位是先争任务，任务一到手，就开一个单子，向国家要大钱，不给他就不干。都这样开单子，那就不得了啦！重点项目重点浪费。这是一种不正之风，要坚决纠正这种不正之风。

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的屁股一定要坐正。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公正合理地处理这些问题。

宝钢二期热连轧和热连铸，要和国外合作设计，合作制造。要外国人总负责，否则使用部门不放心。这样做，国内制造部门也就认真负责了。不然，最后是无人负责的。要外国人总负责，可能价格要高一些（如3%—5%），要多花一二千万美元。这笔学费还是要花的。

货比三家，最近出了不少问题，外商很有意见。要注意，不要造成谁先让步（指转让技术）谁吃亏。

通过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要解决三个问题：

- 一是提高自己的设计制造能力，提高自力更生能力；
- 二是改变一下机械制造部门的门户偏见；
- 三是要纠正争任务、要高价的不正之风。

另外，李鹏同志建议，十大装备中增加一项铁路长大重载列车及其电子程控系统，以改变铁路的落后面貌，请你们研究一下有无必要。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值得研究和借鉴*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

匈牙利“中央管理和商品关系、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联系”，那不和陈云同志讲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样了？（廖季立¹：匈牙利的市场调节大。）匈牙利的计划管理很明确，叫“中央”。“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的中央管理”，为什么不改成把中央的计划管理和商品关系、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结合？这不是很清楚吗？就是中央计划管理嘛。第一叫中央，第二是计划，就是中央的计划管理。“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的中央管理”，还有不按计划发展的中央管理吗？文件上，这句话很费解，这恐怕是个翻译问题。中央的计划管理与商品关系、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结合，这就比较通俗易懂了。

它是一个适应了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要求，它与集约化、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甚至南斯拉夫也讲过这个观点，就像苏联这种模式的中央计划，也可能在南斯拉夫建国初期是重要的，但是以后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了。南斯拉夫讲过这个话，卡德尔²在他的文章里讲过，他没有完全肯定，他讲也可能是需要的，但是长期这样搞肯定是不行的。南斯拉夫、匈牙利，包括苏联，都是这样，进入集约化，改革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了，很不一样了。但是初期由粗放进入到集约的过程中，由片面地强调速度，依靠劳动

* 这是赵紫阳听取廖季立等考察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汇报时的讲话。

力，依靠资源，依靠大量建设新厂，把这些都联系在一起，这时候中央集中性的计划经济是需要的。这时候，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国家需要用大量资金建设新厂。在这个时候更多地采用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强调速度的时候，这种形式是可以的。等到劳动力已经少了，资源已经越开越困难了，比较远了，而且企业需要转入集约化经营的时候，需要由外延转到内涵的时候，这时候经济体制改革就摆上来了。他们或多或少的是这种看法。但我怀疑这种看法。按这种说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怎么解释？那时候，他啥也没有，他搞了新经济政策。以后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就搞成了一个模式。很显然，新经济政策在苏联是很重要的一段，那时候不是劳动力也多，基础也没有，资源也没动，那不应该采取这种形式？（马洪：过去的失误，想找个下台阶的说法。）这种解释法（指南斯拉夫、匈牙利的解释）恐怕是不恰当的。反过来，可以这样讲，到了一个什么时候，企业经济体制如果不改，就混不下去了，无法再进步了。这不等于说，原来那样搞就完全正确。其实，越是开始经济基础薄弱的时候，商品生产应该越要强调，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越要强调。我觉得，商品生产问题，越是落后的国家越应当很好地强调，因为有个发展，有个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有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社会主义胜利都是在落后的国家，都是在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小生产汪洋大海的国家，这么个时候，这种情况下，简单地都用所有制来改造，用中央计划经济管起来，有需要的一面，没有用商品生产发展的规律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小生产到大生产转变的过程，这是一面。我看，恐怕这个道理更重要一些。在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这句话，这是我主张加的。还是把它统一起来。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三句话。从我们国家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里边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纯粹的市场调节，这不是陈云同志讲的那个概念。陈云讲的自发的、盲目的市场调节，在我们国家只能是小量的，就是农贸市场、小商品、农村的三类商品，这个确实是自发的、盲目的调节，不影响大局，完全是自由价格。现在除了这个以外，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这个关系，必须包括一个运用经济手段引导、推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是我们很大的课题。不能把计划经

济和运用价值法则、运用经济手段对立起来，恰恰相反，现在完全证明了这一条，不运用价值手段，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这也不等于都废除指令性计划，有些废除，有些不废除。废除也好，不废除也好，总之都得运用价值法则、价值规律。不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你讲的那个计划、计划调节是空的，是不可能达到的东西。三十多年的事实太多了。多少年来没肉吃，多少年来没有油吃，搞得我们国家不仅进口粮食，还进口食油。价格一调节，马上就有了。后来油菜籽那么多，计划调节怎么也调不下去，价格一降不就调下来了！大豆提到三角三，一下子大豆就多起来了，多了没有办法再减价吧。计划不用经济手段不行，过去好像计划手段就是计划手段，单纯叫指令，单纯的行政手段。我们经济手段运用得越来越好，指令性的指标减少了，对生产是很有好处的。但是，经济手段运用得不好的时候，没有充分运用的时候，当然不得不更多地保留一些指令性指标，这有一些可能是暂时的，有一些可能是被迫的，不得已的，但是它是必要的。我们国家将来发展的方向，将来搞得越好，指令性指标越可能缩小；搞得越差，指令性指标就越多。生产搞得越好，票证就越少；生产搞得越差，计划搞得越糟，票证就越多。不能说，票证多、指令性的指标多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可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不是盲目的、自发的调节，这是真正讲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也就是要运用经济手段，使社会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如何达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一个是通过指令性指标的方式，一个是通过经济手段、经济政策的办法，达到有计划按比例。有计划按比例，是个客观的东西，计划是主观的东西，都按你国家的那个计划去完成，不一定是有计划按比例。这是两码事。我们很多搞计划的同志到今天对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你说计划完成得好和坏，是说按你那个计划，还是说使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有计划按比例这个规律是个客观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发展是否有计划按比例，这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个客观事实。计划符合实际了，并且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可能达到这一步；计划不符合实际，或者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和政策，你那个计划和客观经济的发展就要脱节。毛主席讲，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把价格和计划对立起来了，是第一、第二，老大、老二的问题。这个恐怕不行。你那个钢材想多生产，把价格一提就上去了。我的话说回来，我不是不赞

成搞指令性的计划，我是说我们这个经济计划，是指令性的指标越多搞得越好，还是越少搞得越好？经济手段、经济杠杆运用得自觉了，熟练了，充分发挥作用了，计划中指令性指标就可以逐渐缩小，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经济杠杆还不能充分运用，或者还不具备什么条件不能运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不更多地运用一下行政手段，也就是指令性指标手段，去控制。尽管是事倍功半，但是还是必须要采取的，不然就乱套了。我看就是这么个关系。因此，在相当时期内，在相当的产品、相当的企业，既要有指令性计划，又要研究如何运用经济手段。我们现在的发展趋势，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在减少。这几年改革的实践证明在减少。不是正在研究水果要退出计划吗？还有什么要退出。比如肉，就很明显，如果肥肉、瘦肉的价格一改变，矛盾就解决了。

二

我们的国营经济、大的工厂，大的方面若不能很好地发挥优越性，小生产的精心管理、细心经营的优点也没有，这两点都跑掉了。我前几天在齐齐哈尔，看了一个家庭养鸡厂。他讲他养鸡的密度是世界第一。生蛋的鸡一平方米四十只，当然分好几层了，养了几年了，没有生病；肉鸡一平方米七十只，就一个宿舍，挤得要命，后边开辟了一块很小的地方，养了几千只鸡。他那个房子挖了个地窖，一年四季恒温，密度大了，也不用电了，自然温度够了，也不用电照明，精心饲养啊！

看来，匈牙利是把计划和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统一了。更好地注意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同计划经济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我认为它这个观点是对的，能不能完全做到是另外一个问题，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这样，不能把这个问题当成对立的東西。

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灵活地利用调节手段，要把信息搞灵通。上半年的事到第二年上半年才知道，一年都过去了，再搞调节就跟不上了。搞信息，将来也不能光靠下边报，他给你报假的，要上当。资本主义国家靠什么掌握信息？它有一套社会研究机构，有一套专门搞信息的社会组织，它就靠这个，谁要资料它都给你提供。它有些办法，有些手段，

也不是光靠统计，加强调查啊，分析啊，各个方面。外国有些经济资料的发表，有些是国家的，有些不完全是国家的，有些信息是分析出来的。搞信息，上个月的情况，至少下个月能知道，这就可以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经济手段、调节手段要集中。计划不能光靠行政手段，不能光靠分解指标，必须要靠经济手段。指标这个东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它有办法对付你。你搞这个指标，它用另外一个对付你。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样搞，运用调节手段，必须要有信息。调节手段一成不变也不行，情况变了，你还没有动，跟不上了，这就有信息问题。计划一定要用点现代化的手段。计算中心数据储存要准确，储存的数据是假的，显示出来不可能准确。

制定计划编一年看两年，就是编一年计划，往后预测两年。（马洪：《六十条》里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春季。）那是另外一个意思，它是三年定下搞多少，三年中今年多搞一些，今年不多搞，三年怎么能完成？今年又要看今年春天，三年最后落到头年春天。

三

越是集中，越可以按马克思的本来观点办。马克思为什么搞计划经济？他就是认为资本主义高度集中，就可以为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办法又过分强调行政手段的控制，这本身就是一个战时经济的手段，就是统制型经济的手段，完全是一种强制的。日本用这个词，日本战后是一种统制型的经济。希特勒也是这样的统制型经济，那是非常时期。正常情况下，越是小生产、企业多，越没有办法用行政管理。过于强调行政管理，就必然是官僚主义，必然是非常复杂的上层计划机关，官僚主义、行政管理机关，就必然束缚生产力。正当的说法，应当是这样。对小国来讲，应当说更有条件实行直接计划经济。对大国来讲，经济越复杂，地域越辽阔，直接计划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照道理来讲，应当是这样。像我们国家，我早就说过，我们的计划只能管一些最主要的东西，其它一些事情管不管关系不是很大。现在主要是管不住，那些通常管的事情太多结果管不了。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计划性，到了什么程度？你测一测，差得很。但是我们计划的方法、计划的体制、计划的内容，又是包罗万象。

你看我们国家有什么计划性，有什么计划啊？没有多少计划性。现在真正起作用的，是国家哪些东西？实在必须要控制的，我看要控制住。归根结底，要集中多少钱，要搞些什么项目，要集中多少物资，哪些东西要服从调动。就是这么几项、几件事，其它管得怎么样，管不住。你管来管去，煤炭不就管住了几个统配煤矿，三亿五千万吨。几个统配煤矿嘛，三亿五千万吨中有些地区内部的也不能管。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一条叫做要收缩战场，不要再管那么多了。就是哪些非要管的，现在不能放，并且为了达到要管住的目标，要采取些什么经济手段。一个是必须要管的，现在搞来搞去，不就是按这个办法吗？什么集中财力啊，搞重点建设啊，为了这个东西，有些用行政手段，有些用经济手段嘛，我管住几件大事，其它的东西可以放给地方管。你地方自己去管，你要管什么我不管。另外，逐步用经济的办法来推动它，引导整个经济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再一个，有些明显的东西，要立法，加强综合职能部门、监督部门。我们还是管得太多，完全可以不管那么多。管得多了，也管不住。可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将来，我们这样搞了，其它很多东西就是要预测，不管的东西要有预测。社队企业这几年发展多少，可以预测一下。将来很多消费品指标都可以搞预测，不管。化纤搞多少，棉布搞多少，正当经济手段搞对头了，自然地会按照市场情况生产。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少管一些事，其它就是预测，用经济手段调节。我们必须管住的几件事，要有有力的措施，行政手段也好，经济手段也好，都必须有，要保证你要管的东西能够管住，必须要有有效的手段。

四

现在搞经济研究，经济部门要培养些翻译。你没这方面的翻译，到国外参观，搞一些混乱的名词，你翻不过去，他翻不过来，会增加许多混乱的概念。将来经济管理是一门大的科学领域，要培养这个领域的翻译，知道怎么翻。不然不能交流，这也是工具。现在主要是翻译不熟悉，他们用的概念，在我们这里用什么概念表达；我们用的概念，在他那里用什么概念表达。很多都是直译的东西，直译的东西多了，很费解。

他们企业现在还交不交利润给国家？（廖季立：不交）完全是税收，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它怎么搞。我们明年不是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吗？怎么完善法？他这个利润的概念没有税后利润上交，我们明年不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吗？就是把税后利润取消，统统通过税收的形式。他对企业收几道税？（廖季立：产品税、工资所得税、城乡发展税、利润税、分红基金[奖金]累进税。此外还有投资税、土建税等等）。

五

我们的企业利润，有个价格合理不合理的问题，价格不合理的问题总得解决。总而言之，企业如果不用利润来表现，企业会搞繁琐哲学，流弊很大。不用利润考核，用什么考核？用产值考核？用净产值考核？用产品质量、数量来考核？用销售额考核？总之，不管怎么讲，最后集中的效益还是利润，这是目标，改革最后要改到与利润挂钩上。但是前提必须是价格合理。什么时候才能很充分地挂钩呢？这就要价格合理，困难也就在这里，目标也在这里。想来想去，不与利润挂钩的话，改革会很复杂，指标也会很难调动。必须与利润挂钩。但是，我们这个挂法流弊很大，为什么？因为价格不合理。我们可以通过税收作适当的调节，但是很难完全改变。什么纯产值、净产值那也很复杂。赚钱多的，少给它钱；赚钱少的多给他钱，这恐怕行不通。

我们研究匈牙利的经验时，要看到它是一种特定情况下出现的，像他们工资增长的控制，搞得这么厉害，也是有原因的（它是要还债），随着情况的改变也是改变的，是活的。当然这些办法是可以用的。这些办法比搞死好，用这些控制的办法，经济的办法，不要搞死，你一搞死，企业就没有积极性了。他这些办法，不管怎么样，网开一面。

六

调节手段，集中到比较集中的部门，考虑面要比较广。调节手段都拿到财政部不行，他们考虑问题，一切都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而不是从

整个国家经济来考虑。也不能放到经委，他们是企业利益代表，为企业争利。我看中国应当把它放到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一班人，专门搞这件事，这是一个最大的事。要搞改革，要放活，又要有一套办法来控制，控制中间又不能搞偏了，要从全局出发，改革成功不成功，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的问题是没有这个调节，有的条件又不具备，得逐步创造条件，完善条件。矛盾不断发现，又不断解决。一个是集中的，一个是考虑问题又是全面的，全面调节各种关系。要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放到体制改革委员会，叫经济调节组，出个东西，经过各个部门，通过国家法令来办。没有这个东西，改革搞来搞去都不行。现在也不能放在计委，我们计委是搞控制的。财政部只要增加财政收入就行，经委就是扩权，都不行。因为我们现在职能部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放在体改委，搞个经济调节手段的行政机构，工作有的通过各部门，有的通过国务院来办。

用经济办法管计划，增加用经济的手段去加强计划的办法。我最先看到的是涅尔什³的东西，简单的说法就是改变用指令体系、用指令计划来控制企业，而是用经济杠杆和立法的手段来影响企业。当然后来搞来搞去也遇到价格问题。用经济手段最重要的是价格，价格又有限制，如消费品价格又不能动等等，所以后来他们又出现一些反复。

七

今天，听一听，基本上清楚了。把情况再兜一兜，分别把计划方面的情况，财政、税收方面的情况，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等问题，再进一步把它搞清楚。

总的来讲，我们有几个问题得解决：

第一，计划体制得改。这几年我们对计划体制的改革抓的不够，没有认真研究计划体制怎么改革，是加强指标，还是用经济手段？把匈牙利的办法进一步弄清楚以后，研究在我国怎么搞。我们这两年实际上也突破了一些东西，今后，看我们怎么有计划、有步骤地去改。

第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这个问题与计划体制的改革不可分，但又不完全是这个问题。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我认为可以走快一点，因为

事实上我们已经这样走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就是改变为税收。现在我们的利改税不行，实际上还是利润总额分成的一种变种，目的是防止包干办法大发展，先把阵地占住。

但是这种办法企业并没有自负盈亏，而是平均主义还很厉害。我看匈牙利的办法我们可以逐步采取，解决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反正是搞几种税。如果税收问题解决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利润变成税收，既解决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也有利于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样企业自主权就扩大了，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就会发生奖金等问题，当然我们也不一定像匈牙利那样，搞得那么繁琐，但是总要有个办法来管它，来影响它。现在我脑子里想一个问题，财政部恐怕要考虑一下，如果这一步走了以后，我看对我们国家会变化很大。事实上，我们原来试行利改税的五百多个企业都是好的，像北京的几个企业都是很好的。四川利改税的企业也是好的。他们所以好，就是自负盈亏了。可是目前的利改税就没那么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还有个税后利润分配问题，企业经营好、经营差都差不了多少，但要改变它，就发生个税收水平问题。原来利改税最大的弱点就是一个企业一个税率，试点是可以的，虽然制定税收都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测算的，定下来后，企业也有积极性，但是从我们整个国家来讲，就没有办法推广。如果全国制定几个统一的税率，就会发生一个究竟定在什么水平上的问题。如果定得过高，按先进企业去定，那么我们国家落后企业就会垮掉很多；如果按中间偏上来定，我是主张按中间偏上来定，就必然会失掉一部分利润。这要很好地研究，究竟会失掉多少？我倾向按中间偏上的水平定，我是主张下个决心准备失掉一部分利润。本来它们的利润是上交的，如果按中间偏上，一部分经营很好的企业就会留一部分利润，我考虑就让给它，但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控制它使用。基本建设不能搞，奖金不能发，把钱只好存到银行。这部分作为财政收入可能要减少，而银行的钱增加了，这也是暂时的。如果搞得对头，两年就过去了，而且损失不大，反正钱在银行里放着，就是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这一点不敢让，那势必发生先进的一个税率，中间的一个税率，落后的一个税率，最后大家一个样。如果中间偏上，我就可以达到，经营水平高的企业我们让一点，这就和现在的包干倒过来了，现在的包干越落后越占便宜。税率一高，先进企

业能得到的就比落后企业多了。按中间偏上来定水平，也会发生落后企业、落后地区，在一定时期还要给它点照顾，完全不照顾一下会垮掉很多。这一部分要经过批准，在若干年之内，比如西南某些企业，在一年、两年或几年之内减税，在几年之后照征。落后的企业国家再补点，先进的企业也不往外拿，财政上就是要增加一点负担。看来这一步不想搞，我们的改革就很难前进，如果这一步搞了，危害也不会很大，不外乎就是先进企业留利多一点，利润率高。再一个就是品种问题，总不能一个产品搞一种税率，但是要划分多少等，因为我们现在价格水平不同，价格又不能一下子改得很合理，价格高的利润高一些，价格低的利润低一些。下半年认真把国家与企业的税收问题研究一下，明年先在一部分城市试点，后年就把它搞开。这个问题一搞，我们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大体上就解决了。相应地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与地方有个大问题，我认为也有道理，匈牙利有这个意见，美国也是这个办法，还有小林实也提了这个意见，中央与地方问题看来得倒过来，不能地方平衡预算以后再上交，就是分享税划分之后，基本上中央要多拿，既不是要地方平衡预算确定上交比例，也不是在中央平衡基础上大家都吃大锅饭。划分税收的方针是中央多控制财源，然后固定中央税收的百分之多少拨给地方，这样才能解决钱怎么用的问题。日本也是这个办法，美国也是这个办法。美国联邦收入很大一部分都返回给地方，匈牙利也是这样。这个问题看来与地方的矛盾会比较大。我们将来研究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收时，必须贯彻这个原则。中央要把全国的税收的税源大部分掌握到国家手里。除了中央直接开支以外，还必须有一部分由过去中央向地方借钱而改为中央补贴给地方。补贴了，对地方花钱也就可以干预了。这么一搞，再加上基本建设控制，工资怎么控制，就纳入轨道了。企业这么搞就独立了，不说什么“条条”，也不说什么“块块”，实际上条条块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基础上，相应地进行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包括组织合理化，管理部门怎么超脱，企业的联合等。

第三，价格必须动。要好好研究匈牙利的经验，看来动，它也不怕。

这三个问题：第一，是计划体制问题；第二，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第三，是价格。把这三个问题如果都能搞出个道道来，有个步骤，我看我们的改革速度，就会突破了。现在看来，改革的路子比较清楚了。

你们去了那么久，可以再向下面业务部门详细介绍一下，计划、财政、工业、企业管理经验等，详细介绍一下，然后再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改。税收要抓紧搞。

注 释

1. 廖季立(1915-1993)，江西吉水人，时任国家体改委专职委员、副秘书长。曾任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局长，国务院体改办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2. 卡德尔(Edvard Kardelj, 1910-1979)，生于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市，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创立者。曾任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联邦政府副主席，联邦议会主席。

3. 涅尔什(Nyers Rezső, 1923-)，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市。在担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管经济工作的书记时，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后被免职任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复出后曾任匈社工党主席、社会党主席。

引滦入津工程是重点建设的一个好典型*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引滦工程搞得很好，打了很漂亮的一仗。这几个月来，在北京传说这里的新闻很多，很鼓舞人。引滦工程有许多很可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全国正在展开的大规模的重点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志们都知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引滦工程，对解放军参加这个工程所做出的贡献和非常好的表现，作了很高的评价。

这次我和启立¹、建秀、纪云同志，还有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到这里来，就是想告诉同志们：希望你们把经验认真总结一下，以便能够把引滦工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在全国重点建设中、在各条战线推广，这对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有重要的意义。参加引滦工程的两支部队和天津市委，都要好好总结一下。你们已经写过一些材料了，刚才也作了很好的介绍，我想还需要进一步总结提高。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目前我们正在展开重点工程建设。重点建设搞得好坏，对四化建设关系重大。如果大部分的重点建设都能够做到质量好、周期短、投资省、效率高，那么，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就可以加快。但是应当说，目前相当多的基本建设，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什么“胡子”工程，周期无限地拖长，投资几倍地超过，质量很差，效益不高，互相扯皮，互相揩油，过一道关就扒一层皮等。我们搞重点建设要集中财力、物力。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就是把人民，把各个地方、各个单位节约起

* 这是赵紫阳考察引滦入津工地时的讲话。

来的物力、财力集中起来，也会浪费掉，达不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我以前讲过，如果将来搞成这么一种结果，就对不起人民，国务院就无法交代。因此需要而且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改变这种状况要严明纪律，加强检查，揭露矛盾，追究责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些好的典型、好的作风、好的经验来振奋人心，振作人们的精神。这些年像你们这样好的经验、好的作风、好的风格，确实听到的比较少。你们的经验非常可贵，特别是现在可贵。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社会风气不好、纪律松弛的情况下，你们来了这么一个突破，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典型，特别可贵。如果在五十年代，这种情况是不少的。现在不是说我们要整顿党风，整顿社会风气，要实现三个根本好转吗？应当从各项具体工作开始抓起。一方面要表扬好的，一方面要揭露坏的。所以，我觉得引滦工程的经验很值得好好总结一下，认真推广。

经验很多，怎么总结，有多少条？我现在说不清楚，靠你们了。你们都是实践者、直接参加者、领导者，经验是你们创造的。你们负责总结，我们负责推广。对照我们目前的基本建设、重点建设，我感到有几条很重要。

第一，重点工程必须是真正重点。对引滦工程，天津市上上下下都把它真正作为重点来保，参加施工的两支部队也全力以赴，没有这一条，其它的就谈不上。重点工程必须始终是重点，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不少重点工程没有真正当成重点去搞，抓得很不得力，这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看来必须解决。重点工程决不能多。但确定为重点后就必须要保，集中力量，一鼓作气把它搞好。决不能上了马以后稀稀拉拉，那样就会误事。

第二，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重点建设没有好的组织领导都是空的，工作无法搞好。搞好重点工程首先一条是要有好的领导班子，包括各级领导班子。这个班子要有好的作风，有正确的决策，精通业务，很善于做组织工作。你们这里有很多好的经验，不断地发现人才，不断地充实健全班子，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所以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第三，正确的经济政策必须同革命精神相结合。长期以来我们在工作中确有否定正确经济政策的现象，如不讲按劳分配、“吃大锅饭”等；但现在也确有一些不重视发扬人的革命精神，不注意精神状态的问题，需要切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光讲道理不行，各级领导必须要有好

的作风。你们刚才讲了很多这种例子，如言传身教结合、关心战士等。领导要深入第一线，到最困难的地方，直接帮助那里解决问题。越是艰苦的地方，领导越应该去。要关心第一线，关心从事最艰苦工作的那些同志，包括在生活上的关心。把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就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战士、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重点建设中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最后，我还想讲一下解放军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指引下，在邓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我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比如军民共建文明村、文明镇，就是河北保定地区驻军和当地群众创造的，现已在全国逐步推广。事实证明，哪里开展了这项活动，哪里和精神面貌就发生显著的变化。这几年，部队在参加抢险救灾中也发挥了骨干作用，哪里有重大灾害，哪里有危险，军队就出现在哪里，恢复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还有在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活动中，部队也作了突出的贡献。这次六十六军和铁道兵参加引滦工程的建设，又为军队参加国家重点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引滦工程的经验看，军队有计划地参加国家重点工程，是进行四化建设的重要形式之一。这是国家的需要，形势的需要，对推动整个国家建设和部队建设都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军队，是一支组织性强、纪律严明、思想觉悟高、作风过得硬的人民子弟兵。引滦和其他许多工程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最艰巨的工程、最困难的地方，攻难点，过难关，解放军起了巨大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有计划地抽调一部分军队参加重点建设，有利于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的进度，推动四化建设的进程。同时，部队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本身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特别是政治思想上的提高，这是最重要的收获。部队参加重点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军民、军政关系，增强军民团结，有利于部队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和组织纪律性的加强，有利于培养“两用人才”，学会打仗和建设两套本领。总之，有利于提高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民团结，是我们的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军政、军民关系

曾经受到严重损害，留下了一些疙瘩。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产生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看来这些问题在我们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任务中，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据我所知，四川过去军民关系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前年四川大水灾，在非常危险、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解放军奋不顾身地帮助老百姓抢险救灾，人民从这里看到了我们军队的本质，说解放军还是解放军，仍然无愧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政治上产生很大影响，军民关系有很大变化。这次我们军队参加引滦工程以后，天津人民也是有口皆碑，说“老八路回来了”。这样一个收获是非常可贵的。“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在历史的长河中毕竟是短暂的，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出现那些问题，不足为怪。我们应当向前看，在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中，军民团结一致，并肩战斗，结成新的友谊。这里我着重讲政治思想上的收获，至于在部队建设其他方面的收获，部队的同志还可以进一步总结。

总之，应当把引滦工程的经验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加以介绍，认真推广，促进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建设，使我们经济建设战线精神为之一振，面貌为之一新，把现在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大大扫除一下，把好的东西发扬光大。

注 释

1. 胡启立(1929-)，陕西榆林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曾任全国学联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电子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搞好社会治安是全党全国的大事*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日

根据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这次政法工作会议集中讨论了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大政方针和行动部署。这是全党全国的一件大事。这次会议的时间虽短，但开得很好。刚才丕显同志已经作了很好的总结，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在外地视察工作，他委托我在这次会议结束时讲一讲。这里，我着重讲以下四个问题：

一、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是保障四化建设 顺利进行的重大决策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传达贯彻小平同志、中央常委和书记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中央认为，小平同志、中央常委和书记处提出的方针、政策、措施和部署，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解决社会治安问题，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大决策。

小平同志、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一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二是照这样办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治安，确实很不好。刑事犯罪案件越来越多越严重，不少地方犯罪分子横行霸道，无所顾忌，群众没有“安全感”，出现了“坏人神气，好人受气，积极分子憋气，基层干部泄气”的不正常现象。这主要是我们心慈手软，打击不力造成的。广大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干部和群众早已深为不满，有强烈的呼声。过去我们含含糊糊，回避问题，没有正视这个现实。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击中了要害，抓住了关键，大家感到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大快人心，大振人心。

我们与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并不是没有办法。过去我们抓得不好，主要是思想混乱，决心不大，部门之间互相掣肘，缩手缩脚。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解放了我们的思想，解开了我们的手脚，是我们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搞好社会治安的有力武器。我们有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的拥护支持，有过去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办法，犯罪分子又都早已暴露，浮到面上来了，只要认真贯彻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就一定能够搞好社会治安。我们已经看到，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传达到哪里，哪里就群情振奋，斗志倍增，显示了巨大的威力。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动员令，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坚决打击，一网打尽，就一定可以实现社会治安的好转，甚至不要两三年，社会面貌就一定会改观。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我们还必须认识，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不只是对社会治安的好转有很重大作用，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要看到，贯彻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搞好这一斗争，对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提高敌情观念，加强党纪、政纪，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不经过这场重大的斗争，党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做到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小平同志多次讲过，必须采取这样两手：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以后带来的问题，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一切坏东西的侵蚀，既要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同时又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实行开放、搞活政策，经济逐步繁荣起来以后，避免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犯罪活动泛滥、社会很不安宁、道德风尚日益败坏的不治之症，使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良好的精神风貌、思想作风、社会风气。我们应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重要性，理解中央常委指示的重要性。

二、关键在于全党统一认识

要贯彻执行好中央常委和书记处关于从重从快，坚决打击，一网打尽的指示，关键在于全党要统一认识，政法部门要统一认识。认识一致，才能步调一致，行动有力。我们党有个好传统，只要全党上下认识一致了，就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学习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我认为在以下四个问题上，要取得一致的看法：（一）现在的治安情况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应当怎么估计？这是一个前提。（二）治安情况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打击不力？（三）是实行从重从快的方针，还是从轻从慢的方针？从重从快与加强法制是不是对立的？严厉打击与综合治理是不是对立的？（四）要不要采取统一组织行动的办法，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一网一网地撒？这次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在这几个主要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基本上一致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报告和刚才丕显同志的报告，也作了回答。这里，我想着重讲以下几点看法。

关于严厉打击犯罪分子与综合治理的关系，应当看到二者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综合治理包括很多内容，有专政的手段，有行政的手段，也有教育、感化的手段等。但是，运用专政手段，依法严惩犯罪分子，是综合治理中首要的一条。首先要有政法机关的威慑力量，然后说服教育和其他手段才能起到充分的作用。在犯罪分子活动嚣张、肆无忌惮的情况下，教育、感化就不可能起多大作用。严厉打击，使犯罪分子感到这样下去没有出路，此路不通，才有可能规规矩矩地接受教育、改造。我们应当审时度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少地方仍然是犯罪活动很猖狂的时候，不加强专政的威力、不严厉打击罪犯的气焰，其它措施就无法奏效。采取坚决打击的办法，再辅之以其它办法，才能收到综合治理的效果。

关于从重从快与加强法制的关系，也应当看到二者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法制本身，就包括了宽和严的内容，体现了宽严结合。我们强调依法办事，坚决惩治犯罪分子，正是依法办事的表现。对法律，我们必须遵守。但是决不能把法律条文的含义和量刑的幅度硬往有利于罪犯而不利于人民的方面去解释，去裁决。要看到我们的法律还很不完备，已有的法律经过实践证明也还有不完善、不严格的地方，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通过立法机关或司法、行政机关作出必要的补充，或作出适应新情况的新解释，而

不应当因此束手无策，放松对人民的保护和对敌对分子的打击。我们的法制决不是要使犯法的人无所顾忌，而群众同犯罪活动作斗争则困难重重。现在的状况是很不正常的，应当坚决纠正过来。要使我们的法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政法部门、公安干警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使人民感到法律是保护自己的，因而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使违法犯罪分子感到法网森严，没有可以侥幸的机会，谁犯了法，谁就逃不脱法律的制裁。这才能伸张正气，压倒邪气，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分子才会越来越多，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充分显示出威力。

为了适应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我们要逐步搞出一套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中国的社会是很复杂的，我们进行法制建设，要看到这种复杂性，不要想得过于天真。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了一百多年，清皇朝垮台后军阀混战十多年，蒋介石统治了二十多年。新中国只有三十多年，中间又有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十年内乱。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我们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也必将长期进行下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加强，不能削弱。人民民主与对敌专政是对立的统一，我们必须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专政，产生片面性，不对敌人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我们的法制，要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资本主义的法制，搞了三百多年，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而且资本主义的法制，永远也不可能制止和消除犯罪现象，相反，资本主义世界犯罪现象正在继续恶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我们决不能对资本主义法制抱任何幻想。我们和他们社会制度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思想，千万不能照搬。目前出现的犯罪分子嚣张，群众缺乏安全感，政法干部束手无策的这种状况，决不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本来的要求。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在法制建设上搞得更完备，更健全，更加适合我国的国情，以发挥专政机关“刀把子”的作用。

这里还要说一下这次在打击刑事犯罪中对流氓团伙必须狠狠打击的问题。现在很多流氓团伙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的就是反革命小集团，他们仇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无辜群众为敌，以残酷的手段向社会报复，以杀人越货、强奸妇女、放火爆炸等来发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他们

绝大部分不是老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也不是老的四类分子，其中虽然有旧病复发的老手，但多数是在旧的刑事罪犯的影响下，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这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社会渣滓。这种社会渣滓的迅速发展，除了由于对他们打击不力以外，党内的太平观念，忽视或否认阶级斗争的观念，放松思想斗争而片面强调宽大的倾向，也是重要的原因。我们要认清流氓团伙的性质，决不要小看了他们的破坏作用，实际上他们类似“黑社会”。在这场斗争中，必须坚决予以摧毁。对其骨干分子，要统统抓起来，对流氓集团的头子，要严加惩处。一般的成员要勒令限期到派出所登记，具结悔过、拍照片、留指纹、存档案。坚决打击首恶分子，就可以挽救一大批陷得不深的失足青年，使他们迷途知返。这也是综合治理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三、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发动群众，首先打好第一仗

按照中央常委和书记处的指示，这次行动，要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有声势、有威力，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这是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定要列入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从一开始就抓得很紧很紧。党委一把手要亲自抓，及时解决行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各行各业，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都要积极投入这一斗争，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发动群众，参加到斗争中去。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动员。但是，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上，一般不要公开宣传。如何宣传，由中央宣传部另行部署。为了统一行动，及时解决问题，中央决定在此期间，各级政法机关，公、检、法、司法机关实行联合办公，集体办案。

中央常委和书记处要求我们以三年为期，解决问题。这就要抓紧行动，作好部署。我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要组织好第一个战役。时间不宜拖得太久。首先在国庆节前要普遍地、狠狠地搞一次大的行动，撒一次大网。这个决心非下不可。一定要把第一炮打响。这点非常重要，各级领导必须

引起重视。这是因为：第一，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行动的条件。党心、人心都渴望这样办，形势也要求这样办。第二，这样作，才能打开局面，出现一个对敌斗争的有利形势。现在，群众和基层干部仍有一些疑虑，还要看一看我们是不是真正下决心，能不能解决问题。在国庆节前集中先打击一批，把浮在面上的犯罪分子扫荡一次，并且及时公开宣判，才会使群众受到有力的鼓舞，消除怀疑，积极参加斗争；才会使犯罪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促使他们分化瓦解。这以后才有可能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发检举，把隐藏很深的坏家伙挖出来，把斗争引向深入。在整个斗争中，要注意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狗急跳墙。要整顿、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和治保积极分子的队伍，使我们同犯罪分子的斗争建筑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这样就能彻底扭转好人怕坏人的局面，促使社会风气大转变，使群众扬眉吐气，把坏人置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孤立境地。所以，国庆前的行动，对于整个第一个战役，对于争取斗争的全胜，都有决定的意义。

四、加强政法部门的建设

我们的政法机关不仅不应削弱，而且应该加强。现在斗争很复杂，必须加强政法部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政法公安部门要改变人们心目中软弱无力的形象，就必须在这场斗争中真正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的威力，要同仇敌忾，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服从命令听指挥，当保卫人民利益的忠诚战士。立法机关、一切人民团体、以至每个爱国公民，都要作他们的坚强后盾，支持他们，维护专政机关的革命权威。鉴于目前任务重，政法部门力量普遍不足，准备适当增加一部分干警编制，重点加强薄弱环节。

政法部门在这场斗争中，要考验队伍，整顿队伍，发现和选拔优秀的中青干部，充实领导班子，并注意加强干警的训练，大力提高队伍的素质，培养建设一支政治思想好、精通业务的过得硬的政法干警队伍。要大力表彰对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同时对队伍中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不法分子，严肃加以处理。

要发挥政法部门的职能作用，提高政法队伍的战斗力的，还必须加强他

们的技术装备和物质建设。目前处于第一线的公安干警的技术装备太落后，很不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尽管国家财政经济还存在困难，各方面都应当节约，但是花一些钱用在逐步使公安干警的技术装备现代化上，是必要的，这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当然，这个钱也要用好，不要浪费。公安部已经向国务院写了报告。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困难也要挤出一些钱用在这个方面。中央要把这笔钱列入财政预算，各地也要尽可能地拨一些经费，解决地方公、检、法、司法机关的急需。还有一些政法方面的基层建设，如派出所、交通队、消防队、边防站、民警、司法助理员、人民法庭的办公生活用房等，也要纳入地方建设规划，给以支持。

还有，抓一些犯罪分子，要有地方放，而且是长时期地关押、改造，所以必须建设一批劳改、劳教场所，注销户口人员劳动的场所、收容审查场所也需要解决。各地要想法积极予以支持，解决好这些具体问题。过去不少劳改场所都交出来了。这次应研究尽可能交回一些给劳改部门。这方面也要花一些钱，中央和地方都要帮助解决。

同志们！新的一场伟大战斗就要开始了，中央希望政法战线的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发扬机智勇敢、顽强战斗的精神，抓紧准备，抓紧行动，在国庆前打好第一仗，打出一个新局面来，夺取第一个战役以及整个斗争的全胜！预祝同志们旗开得胜！

系统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素质等 十个重要问题*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

今天是出题目，部署一下。

去年以来，我们搞长远规划。今年上半年，主要抓了重点建设方面的一些事情。当然，现在还刚刚开始落实，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大体上已有了部署。今年下半年，要开始着手研究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如何提高现有企业的素质。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很重视这件事情。小平同志说，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重点建设复杂得多。今后二十年，我们要抓紧两件事，一个是重点建设，再一个就是提高企业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重点建设也是为现有企业服务的。现有企业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部分、主要基地，吃饭和建设，都得靠这个。我们国家目前财政困难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第六次常务会议上的讲话。在审阅这个讲话以后，胡耀邦批示：“思路 and 方向完全同意。是否还可以发宽一点？每省市是否也可发一份请他们看？使他们也打开思路，多想点问题。胡耀邦 八月二十五日。”邓小平批示：“退紫阳同志。这个题目出得好，希望如期实行。邓小平 八月二十九日。”陈云批示：“紫阳同志：你去新疆前讲的一些经济问题设想，我看过几遍。我觉得要有一些设想，很必要。我有几点意见，请你斟酌。（一）中央的财政收入要达到百分之七十，才能做些大事。（二）农民收入的速度，不能太快。要继续增加收入，但幅度不能太大。（三）城市工商业改革已有几年经验，似应总结一下经验，以便继续前进。这些意见对否，请斟酌，供你参考。陈云 八三年九月十三日。”

很大，全年的收入才千把亿元，捉襟见肘，办不成多少事，根本原因是企业的素质太差，经济效益不高。企业的面貌如不改变，要解决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就非常困难。所以，这件事情，关系甚大，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谈不上四个现代化。

过去我们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但研究得不系统，没有搞透。今年下半年，要理出一个纲要来。如何提高企业的素质、质量，这是个总题目。企业的现状如何，今后二十年，路子怎么走，出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效益，都要调查研究，作出分析。这里，有经营管理问题，有技术进步问题，有职工队伍包括领导干部的水平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势必涉及整个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体制改革、企业结构调整、企业整顿、技术改造、智力投资等等。这是一项大工程，要组织一个超越部门的班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通盘研究。建议由吕东、马洪同志负责，计委、经委、体改委、科委、科学院、社会科学院、书记处研究室参加，国防科工委也要参加，广泛征求企业家和理论界的意见，好好下些功夫，用半年时间，搞出一个提纲挈领的文件来，列入长期规划。有了这个东西，就有了方向了，今后该采取哪些大的政策、措施、步骤，心里就有数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下面讲的其他一些问题，都同这个问题有关。

第二个问题，城市改革问题。

农村改革，效果很好。城市改革，现在还是初步的，探索性的。对城市改革必须采取积极态度，不改革是没有前途的。问题是按什么路子改，先改什么，后改什么。城市和农村情况不同。农村改革，主要是解决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的关系问题。城市主要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看来，首先要解决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关系问题，然后才能解决好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问题。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是解决企业内部关系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企业就会想方设法把负担转嫁到国家或消费者身上来。过去对这一点认识不足。今后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第二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职工的积极性问题。

刚才讲了提高企业素质，现在又讲企业的活力。所谓活力，一方面，必须使企业有改善经营管理、关心技术进步的权力和利益。要给他们这样做的权力，并使他们在作出努力收到效果以后，确实能够得到自己的利益。

这样，企业才会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旺盛的进取精神。这还不够。另一方面，还必须造成一种形势，使企业非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不可，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归根到底，就是国家不开大锅饭，不让企业躺在国家身上。东欧有个经济学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之一，是对企业搞那种“无微不至的”、“父亲般的”照顾。日本的一个经济学家也说，中国对企业太宽容了。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对国家，对企业，都没有好处。片面地为企业争利，听任企业挖国家的利益，不符合改革的方向。同样，把企业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企业成为算盘珠子，拨一拨，动一动，那也是没有前途的。

解决国家同国营企业的关系问题，应该抓住哪一个环节？我看，要抓完善税制这个环节：通过进一步完善税制，使企业得以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是当前解决国家和国营企业关系的主要环节。除此以外，现在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目前正在实行的利改税，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办法，虽然把上缴利润纳入了税收的轨道，采取了税收的形式，但同过去的总额分成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进一步完善税制，就是不仅要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改变上缴利润的制度，使企业在照章纳税以后，利润归己，盈亏自负。这样，企业才有可能独立核算，并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竞争。

现在，企业之间，特别是行业之间，不可比的因素很多。这主要是价格不合理造成的。现在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很严重。近期在价格不可能作通盘调整的情况下，应当更多地利用税收这个杠杆进行调节。首先要设置不同税率的产品税：价高利大的产品，以及供过于求的产品，征重税；价低利微的产品，征轻税，有的还可以免税。这样，行业之间苦乐悬殊的矛盾就可以缓和；同时，也有利于供求矛盾的缓和。在行业内部，由于资源条件不同，设备条件不同，同样存在着不可比的因素，这也要想办法，例如通过资源税、固定资产税等进行调节。在征了各种调节税以后，最后再统一征收所得税（有的同志提议，“所得税”的名称不确切，应改称为“利得税”）。因此，通过完善税制，是有可能使各种企业处于大体相同的条件下，独立核算，进行竞争的。

关键是要把税率设计好。税率定在什么基准上？我的意见，行业之间

以及产品之间，大体应以我国目前的平均利润率为基准；在同一行业同一产品内部，则以中等偏上企业的水平为基准，不按上海企业的水平设计，也不按西藏、内蒙古企业的水平设计。纳税以后，经营好的企业，利润就多，经营差的企业，有的利润少，有的没有利润，有的甚至亏损。对一般的落后企业，可以规定减免年限，给以照顾，限期赶上来；太落后的企业，就不能照顾了，只有淘汰、倒闭。这样做的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国家的财政收入可能少收一些，但两三年后，形势就会改变，因为落后企业也被迫赶上来了。至于先进企业多拿一点，这不要紧，无非是作一些规定，允许用在哪里、不许用在哪里就是了。要允许先进的企业壮大自己，搞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发展生产，扩大销路，乃至设立分厂。这种发展，可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是符合宏观要求的，对国家有利，应当加以支持。

在这个基础上，还要重新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将来，要打破隶属关系，一切企业，不论中央企业还是地方企业，一律向当地的国家税务机关纳税。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问题上，既不能回到过去的过分集中，也不能在地方平衡的基础上再来确定中央拿多少。宁可中央补贴地方，不能中央向地方借钱要饭吃。中央和地方之间，要按照税种，划分收入：有些税种，收入全部归中央；有些税种，收入全部归地方；有些税种，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共享。走了这一着棋，就必然会在经济生活中进一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有些是很大的变化，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

我们经济体制中有两条弊病是大家经常讲的：一条是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以及部门和地区之间，互相分割；再一条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以落后挤先进。这两大难题，如果想就事论事地去解决，都行不通，阻力很大，事倍功半。通过完善税制，这些问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因为所谓部门利益、地区利益，无非是企业归谁、上缴利润归谁的问题。这种“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实际上都是上缴利润制度的产物。税制完善以后，部门所属的企业和地方所属的企业都向税务局纳税，这就在经济利益上同条条块块脱了钩。这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样，以落后挤先进的现象所以能够存在，根源在于落后企业受到保护，先进企业却受到限制。实行新税制以后，全国同类企业都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竞争，先进的企业有了发挥优势的活力，落后的企业面临淘汰的危险，因势利导，就

可以大大加快联合、改组和专业化协作的步伐。顺便说一个观点，过去重复建设之风所以煞不住，除了条条块块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原因：供不应求嘛！供不应求的局面不改变，单纯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就难以奏效。这种例子多得很。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段君毅¹同志在一机部工作。那时，广东要搞小合成氨，段君毅同志就对我宣传说，不能一个省一个省搞，要全国协作，要靠上海。我听了很有道理，就去说服省计委。省计委的同志说，你不要听他的，上海至多只能给你两套设备，解决不了问题，还得靠自己。广东一大批小合成氨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因此，要防止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应该有两条：一条是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例如规定质量标准，批量标准，能源消耗标准等等，达不到标准就不发许可证，不准开业，日本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另外还必须有一条，就是要支持先进的企业，给他活力，让他发展壮大，开足马力，大批量地上去，质量高，成本低。你能满足他的需要，经济效益又好，他还去搞那种落后的东西干什么。

所以我看，完善税制是一把钥匙，可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为城市的全面改革开辟道路，也是提高企业素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税制问题，我看要下个决心。只要基本路子对，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出点小毛病，那不可怕，及时纠正嘛！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问题，条块矛盾问题，重复建设问题，企业组织结构问题，技术进步问题，节约挖潜问题，总之，影响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的一系列问题，都不好办。这个问题不宜迟，能不能早一点把新的税制设计出来，明年找一些地方开始试行？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由田纪云、王丙乾同志负责，廖季立和经济中心的同志参加，起草两个文件：一个决定，一个细则。这里有大量的测算工作，可以委托一些大学的经济系去做。有了初步方案以后，还可以找一些外国的经济专家来，请他们提提意见。

第三个问题，改革计划体制。

提高企业素质，完善税收制度，都涉及到计划体制问题。这几年，没有把改革计划体制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是一个缺点。计划体制的改革，可以先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我们的国家计划，只能抓主要的，重点要很突出，不能包揽过多。

国家计划，要抓重大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抓重点建设；抓经济调节手段。至于一般性的事情，可以不管，放开。计划究竟管什么？这个问题要研究。我们国家大，应该更合理地分配积累和消费，更好地集中资金办一些大事，等等。但是，经济文化落后，管理水平低，统计资料不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则恰恰是我们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什么都想管，一是不起作用，二是官僚主义，僵硬，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完善税制以后，企业的活力增大了，经营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了，如果计划还是管得那么死，那是不能适应的。总之，不要管那么多，少管一点，管主要的，要管就管好。

二、要加强经济调节手段的作用。匈牙利的经验值得注意。日本也很重视经济调节手段。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很大，办法就是把物价、税率、利率等经济调节手段抓得紧紧的。国家想发展什么，就用调节手段加以支持；想限制什么，就不支持，不优待。我们的计划指标，有指令性的，有指导性的，这都是必要的，但对指标的作用不要估计过高，不要以为下达了指标，就把它管住了。其实不见得。这几年，对烟叶、油菜等等，真正起作用的，是价格。将来，即使对指令性指标，也要注意发挥调节手段的作用；对面上的经济活动，更要学会运用调节手段。加强调节手段的作用，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更有条件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运用物价、税收、信贷、工资等调节手段，来达到计划规定的目标。当然，从不会到会，需要一个过程，但方向应该是更好地运用这些经济调节手段。

三、用什么指标考核企业？最近，启立同志从上海回来，写了一封信，建议主要用净产值来考核企业，这个办法，比现行的办法好，但据说也有它的局限性，计算也比较复杂。现在，我们还不能废除总产值这个指标，因为翻两番就是用总产值计算的。将来考核企业，归根到底要看它新创造的价值(m)，就是说，看它能上缴多少税，有多少利润。由于价格不合理，现在企业的税利还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但是，企业的利益必须同它的经济效益和经营好坏挂钩，这样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考核指标不能太复杂，强调“健全”考核指标不一定是个好办法。指标越繁

琐，越难办，矛盾越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会想各种办法对付你。在过渡时期，到底用什么指标作为考核企业的主要依据，很值得研究。

计划体制，建议由胡启立同志负责，宋平、安志文²、廖季立、柳随年³同志参加，马洪同志也参加，下半年提出改革方案。

第四个问题，外贸体制的改革。

中国的对外贸易究竟怎么搞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已经布置过了。总的原则是，既不能现在这样多头对外，盲目削价竞争，外汇收入归地方、部门，亏损向中央报账；又不能再回到过去那种一切统死，生产和销售严重脱节的老路上去。要抓紧研究，下半年拿出方案来。

第五个问题，价格问题。

除了理论价格要继续研究以外，在价格方面，明年准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某些生产资料要提价。匈牙利在这一方面步子迈得很大。他们是向国际市场价格看齐，宁可给补贴，也要提高生产资料的价格。我们对初级产品的价格也要适当作一些调整，主要是矿石，生铁，木材，水泥，煤炭。木材的价格太低，不提价，代用品就发展不起来。有些东西，可以一方面提价，一方面加税，把企业的收入拿回一部分到国家手里来。这些初级产品提价以后，有些企业可能吃不消，那就补贴，补在明处，至少使企业知道自己过去是在靠廉价的原材料和燃料过日子，并没有赚钱的真本事。至于农副产品价格，明年要稳定。

二是坚决实行优质优价。质量好的产品，新产品，应该优价。同时，一定要实行劣质劣价，对低劣产品搞惩罚价格。这件事明年要出台。即使不能全面出台，也要先搞若干种产品，解决一批。

这两件事，对市场物价影响不大，明年可以先做。由张劲夫、宋劭文⁴同志负责，下半年提出方案。

第六个问题，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

启立同志建议搞“两级分配”制，这个思路是对的。在工资问题上，国家不必直接搞到职工头上。国家就管到企业，由企业根据国家的政策去解决职工的问题。国家要控制职工人数，控制工资总额，也要规定出大体的工资标准。经营好的企业，职工的工资可以高于国家标准；办得不好的

企业，只能低于国家标准。具体问题，如什么时候升级，升级面大小等等，一般都可由企业自己去处理。工人有意见，向企业提。国家一是用法令进行控制，一是用税收加以节制，比方你这个企业要突破工资基金的比例，就得向国家额外缴一道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应该解放思想。建议由胡启立同志负责，赵守一⁵同志参加，研究一些新的办法出来。除了工资制度以外，劳动制度（这个问题更复杂）如何改革，也要进行研究。下半年内，一是研究改革的方向，二是考虑明年先搞些什么。

第七个问题，建筑材料工业和建筑业。

这个行业，在西方曾经被称为发展经济的支柱之一。本世纪内，中国的建材工业和建筑业应当有个大发展。搞得好，是一大财源，可以回笼大量货币。中国的建筑业和建材工业究竟怎么搞法？要组织个班子，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展望一下我国的建材工业和建筑业会出现什么形势，如何发展，如何搞活，方向是什么，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可以组织一些有见解的人鸣放一番，不要受什么框框限制，经过研究，形成一个纲要，纳入长远规划。这件事情，由李锡铭⁶、吕克白⁷同志负责。

第八个问题，电子工业。

电子工业如何振兴，也要搞个纲要出来。我讲的不是计算机攻关，那件事情已经另作部署；也不仅仅是指电子工业部所属的企业，而是指我们国家的整个电子工业这个行业。要把今后发展电子工业的重大方针、重大措施提出来，形成一个纲要，纳入长期规划。

我看，如何发展电子工业，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有求实精神，不要好高骛远。中国就这么大的力量。现在要下决心搞小型机、微型机，用来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这样做，有市场，可以赚钱，电子工业就活了，而且能够促进整个经济发展。不要热衷于搞那些大家伙。大家伙，一共用不了几台，可以买嘛！日本并没有一下子就搞那些很大的家伙。南朝鲜没有搞，香港、台湾也没有搞，但他们的电子工业相当活跃。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这个世纪我们不在大家伙上搞赶超。现在，必须把为技术改造服务、为管理服务的微型机、小型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归根到底，经济是基础。搞电子工业，搞科学技术，不能从追求最先进的东西出发，而应当从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把我

们的经济搞上去。经济实力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那个时候，什么都好办了。

这件事情，总的请万里同志负责，电子计算机办公室具体抓。

第九个问题，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

这在我们国家是个很大的问题，很有发展前途，也要专门搞个纲要，作为长期规划的一部分。要跨部门，统一规划。由王磊、袁宝华、李瑞山同志负责，下半年交卷。

第十个问题，引进国外人才。

引进人才，要统一计划，统一政策。渠道要多样化，主要是利用民间形式。这件事，小平同志已委托依林同志挂帅，方毅、宋平同志参加。考虑到他们工作非常忙，建议增加张劲夫同志，由他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上面讲了十个问题。总之一句话，为了把我们的经济工作继续推向前进，除了落实已有的部署以外，还要抓住一些带根本性、长远性的问题，组织专门班子，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拿出方案或纲要来，由财经小组审议后，报中央定案。

注 释

1. 段君毅(1910-2004)，河南范县人。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曾任西南财经委副主任兼工业部部长，一机部副部长、部长，铁道部部长，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常委。

2. 安志文(1919-)，陕西子洲人。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曾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西北三线建委副主任，六机部部长，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顾问。

3. 柳随年(1929-2002)，陕西绥德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体改委委员，国务院副秘书长，物资部部长。

4. 宋劭文(1910-1994)，山西太原人。时任国家计委顾问兼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曾任国务院财经委秘书长，轻工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建委、计委、机械委副主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

5. 赵守一(1917-1988)，陕西渭南人。时任劳动人事部部长。曾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安徽省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

6. 李锡铭(1926-2008),河北束鹿人。时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曾任水电部副部长,电力部副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7. 吕克白(1917-1999),河北宁晋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顾问。

团结各族人民开发建设新疆*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这次我和胡启立、郝建秀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同志，同王恩茂¹、司马义·艾买提²、谭友林³等同志一起，从南疆到北疆，共跑了十一个地、州、市，行程近六千公里。十几天走了这样多的地方，当然只能是走马看花，没有时间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新疆只能有个轮廓的印象，但是确实在不少问题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才王恩茂同志作了汇报，启立同志讲了话，都讲得很好，我都同意。下面就如何开发新疆，讲些初步的想法。有的只是提出问题，出题目，大家来研究，文章靠大家来做。我主要讲以下四个问题：

一、开发新疆的一些战略设想

今年五月胡耀邦同志在新疆视察时就指出，要积极开发新疆，开发大西北，使新疆和整个大西北成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基地。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共同看法，是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设想和整体布局。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美国是先开发东部，在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再开发西部。苏联是逐步由西向东开发，现在重点放在开发西伯利亚。看来我们国家也是这样一种趋势，将来也要把力量从东边逐步转向西边，开发大西北。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汇报时的讲话。

在开发大西北中，我个人的看法，新疆处于优先的地位，应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区域来考虑。这不仅因为新疆在国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六千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而且在经济上、在我国四化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新疆面积有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六分之一，物产资源丰富，开发条件好。之所以说新疆得天独厚，主要是指：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有三座大山，三大盆地，十多条河流，浩瀚的戈壁滩，发达的山岳冰川，蕴藏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加上海拔不高，日照长，辐射强，积温高，温差大，这些因素天然地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富有生机的整体，这些因素运用得当，可以形成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创造出无限的财富。它优于西北其它地方。像这样各种条件具备的地方，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

从农牧业资源看，光、热、水、土四大要素，新疆都有良好的条件。全疆全年日照平均二千五百五十至三千五百小时，太阳总辐射量全年平均为130-150千卡/平方厘米，仅次于青藏高原。虽然无霜期短一些，但积温高。积温平原地区为3000-4000℃，吐鲁番盆地高达5500℃。地面水年径流量约九百亿立方，地下水动储量约二百亿立方，共一千一百亿立方，相当于黄河、淮河、海河三条大河水资源的总和。按现有人口计平均每人占有六千六百万方，如按五千万人口计，每人平均占有二千多万方，比现在华北地区人均占有好几倍。另有草原七亿亩，土地后备资源一亿亩，相当于四川省的现有耕地。

从能源和矿产资源看，西北六个内陆沉积盆地，三个在新疆，总面积七十二万八千平方公里。据新疆石油局的初步测算，准噶尔盆地可以拿到八十亿吨石油储量，塔里木、吐鲁番盆地都已发现储油结构，远景相当可观。煤炭的储量是一百六十多亿吨（已探明工业储量三十七亿吨），居全国第三位。水能蕴藏量为三千二百九十万千瓦，仅次于西藏、四川、云南。初步研究，可开发利用的有一百六十九个站址，可装机九百万千瓦，发电六点五亿度。各种有色金属矿产也很丰富。

所以，从资源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疆是祖国四化建设中尚待开发的一块宝地。根据新疆的优势，展望新疆的前景，我们有理由认为，新疆可能成为国家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畜产品基地、经济作物（棉花、糖料、果品）基地和石油能源基地。

开发新疆，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困难和制约因素。主要有：一是资源不清；二是资金不足，国家短期内不可能大量投资；三是人才缺乏；四是基础设施差。这些需要逐步解决。因此，在开发的方针和部署上，应当积极开发，突出重点，循序渐进。根据国家的总体设想和新疆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新疆的开发，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八十年代主要是作好准备，并进行一些投资省、周期短、效益好的、国家和人民生活急需的重点建设。九十年代要逐步展开建设的规模，适当加快建设的步伐。为此，从现在起，我们就必须把新疆的开发列入全国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

新疆要发展的产业很多，作为经济支柱的行业、重点行业，将是以下五个：

第一，农牧业。这是第一产业。新疆将来的人口会增加，粮食必须自给有余，而且还要生产大量的饲料，所以要继续重视粮食生产。但根据新疆的自然条件，应当特别突出发展畜牧业和棉花、糖料、瓜果的优势。不仅牧区要大力发展畜牧业，农区也要农牧结合，积极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奶牛、奶羊。新疆要提供大量的肉食、奶制品、果品，为逐步改变我国食品结构作出贡献。一位美国华人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西北将是未来的动物蛋白质生产中心。这是颇有见地的。新疆还要利用这里突出的天然有利条件，发展棉花、糖料和瓜果，扩大商品性生产。

第二，石油和石油加工业。按照石油部和新疆石油局的设想，一九九〇年准噶尔盆地石油要产八百万吨左右，二〇〇〇年将达到二千万吨，除外运的以外，将有八百万吨留在本地加工。这就可以带动一系列的产业。这是新疆的第二个大产业。

第三，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由于新疆有发展畜牧业、经济作物、瓜果业的优势，这就为发展食品工业、饲料工业和棉毛加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行业有机构成小，就业比较多，利润比较高，发展起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第四，动力工业。主要是开发煤炭和利用水力资源，发展水力和火力发电。

第五，建筑材料工业。就地取材，发展水泥、砖瓦等工业，以满足当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这几个重点行业发展了，就可以带动其他行业，使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人民逐步富裕起来。

要发展这些产业，从新疆的实际情况看，必须首先解决两大问题：命脉和动脉的问题，即水利和交通问题。讲基础设施，这两条是最根本的，有了这两个前提条件，其他产业的开发才有条件，新疆的经济才可以活跃起来。

没有水，“天上不飞鸟，地下不长草”，新疆就可能是不毛之地，农牧业发展不起来，绿洲农业也就不存在。没有水，工业也发展不起来。比如克拉玛依油田进一步发展，就碰到水不够的问题。前面讲过，新疆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一，就是有三座大山上的冰川，这是可靠的、比较稳定的水资源，是“固体水库”。一定要珍惜这个宝贵资源，合理利用这个宝贵资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更多地造福于人民。新疆这个地方，开发到什么程度，能创造多少财富，第一个决定因素是水利。解决水的问题，一靠开发，二靠节约，合理使用。在水利建设上，要强调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加强管理，引蓄结合，井灌与渠灌结合。新疆很多地方的地形是冰山下面有一个冲积扇，一部分水在地面上流走，一部分水成为地下水。要考虑在冲积扇近处使用地下水，下游使用地面径流，这是合理用水、节约用水、减少盐碱化、提高灌溉效益的一个重要措施，应首先在生产建设兵团试点，积累经验，逐步在群众中推广。新疆整个水资源的开发和节约上都有极大的潜力，要从政策上、从科学技术上去挖掘这方面的潜力。

新疆的交通运输不发达，运输距离长，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在规划上、在经济发展的决策上、在方针政策上都要考虑这个问题。要对铁路、公路、空运作综合的经济分析，进行核算，采取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适应整个新疆经济开发的需要。

关于新疆的开发，如何确定战略步骤和发展方向，我们提出以上一些初步想法供参考。今后，自治区要研究，国家计委也要研究，最后报中央、国务院审定。

二、抓紧工作，为新疆的大规模开发作好准备

新疆下一步大规模开发，取决于近期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八十年代还剩下七个年头，这七年重点搞什么，对今后关系极大。我看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制订规划。新疆的地理环境有它的特点，三座大山、三大盆地相间组合成一个大的自然经济区，而且区域内又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一些小的经济区，所以，既要有全疆的整体发展规划，又要特别注意区内各个小经济区域的规划。如伊犁河谷地带，就应该有个小区规划。又如围绕准噶尔盆地石油的开发，包括水、煤、运、建材、农副产品的供应等，这涉及伊犁、阿尔泰等地区，也应有综合的开发规划。此外还有一些重要行业，需要制订专题发展规划。自治区要好好组织力量搞。国务院指定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的同志到这里来，帮助把新疆的“七五”计划和后十年的设想尽快制订出来。

第二，做好资源勘探和重大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要有计划地开展矿产资源的勘察，首先把重点放在石油、煤炭上，把资源的情况摸清楚。已确定和将要确定的水利、交通、能源和其他重大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要有专人负责，一个一个做好。比如南疆库尔勒至阿克苏铁路干线建设的前期工作、几条大河流的开发设计，要抓紧进行。

第三，根据可能条件，进行一些必要的建设。从新疆的实际出发，重点还是应放在水利、交通、能源、建材、食品、轻纺等方面。要分别轻重缓急，建一个成一个，切忌铺大摊子，拉长战线。比如在水利建设方面，近期内先考虑上黑孜水库、和田河两大支流引水控制工程、伊犁喀什河托海电站。同意利用叶城已开采的油气资源，建一个天然气化肥厂和相应的发电站，规模可以先小一点。乌鲁木齐到乌苏的铁路，在做好前期工作的条件下，要早一点开工。乌鲁木齐石化总厂十一万五千吨乙烯工程，已列入国家前期准备项目，争取“七五”开工。这里只举几个例子，究竟搞那些项目，搞多少，什么时候搞，哪些列入中央投资项目，哪些列入地方项目，哪些由两家共搞，将由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国家计委商定，在“六五”后三年和“七五”计划中，作通盘考虑，量力而行。

这几年，国家支持新疆的建设尽了很大努力，在“六五”期间财政包干每年给新疆十亿元，并递增百分之十。鉴于国家近期资金比较困难，自治区内的自有资金也应首先用在关键项目的建设上，把自治区自筹和国家帮助结合起来。

第四，智力开发，培养人才。要特别注意大力培养本地的各种建设人才，这是最可靠的途径。除了扩大大专院校的招生名额外，要多办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初中级技术人员。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举办电视大学、电视专科。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对现有各级干部，要认真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

要采取多种形式引进人才和技术，包括请一些外国专家来，特别是沿海各省市，要尽量给这里以支持。引进外地人才，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围绕一定的项目，一定的课题，签订合同，完成任务以后再回去。搞什么，请什么人，自治区计委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回去准备与上海打个招呼，请他们与新疆建立多种形式的技术协作关系。这方面应当制订一些政策，使技术人员乐意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使内地的省市也乐意搞“智力支边”，互助互利。

第五，十分注意讲求经济效益，充分挖掘潜力，以积累资金。开发新疆，资金从何而来是个大问题。没有国家的支持不行，但新疆本身也应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开辟一些生财之道。结合当地的特点，兴办一些盈利的产业是需要的。我认为近期内最重要的是要靠挖掘潜力，各行各业都要注意这点。

新疆的工业在全国来说还不是发达的，但已有了一个不小的摊子，拥有四千多个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五十三亿二千万元，按人平均水平在全国来说是不算低的。由于主观客观上的种种原因，现在许多经济指标还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与先进地区相比了。如一九八二年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实现的利润和税金，全国的平均数是二十四点六元，新疆是十六点四元，为全国的百分之六十六；全民所有制工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全国平均是一万二千一百三十三元，新疆是八千五百零二元，为全国的百分之七十。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潜力很大。如果能赶上全国的平均水平，财政收入就可成倍地增加。所以，要下决心整顿好企业，提高经营管

理水平，重视技术进步。必须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具备了较好的经营管理和技术发展水平，才具备进一步发展工业的条件。不久前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我国工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对新疆来说，这个问题更尖锐，更突出。一定要下大力抓，早抓早主动。

不仅工业应当挖潜，农业也是如此。新疆具有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的良好前景，但现有耕地存在着极大的潜力。近几年内应该把重点放在挖潜上，提高效益上。不论农业、畜牧业都应这样。挖掘潜力，提高效益，关键在于进一步落实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首先要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新疆的农区执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动得早一些，而牧区才刚刚开始，要继续抓。全疆现有耕地人均三点七亩，平均单产才二百多斤，只要增施肥料，科学种田，产量可以大幅度上升。提高畜牧业的商品率也有着很大的潜力。就水利来讲，现有设施的潜力也很大，用水不合理和浪费十分严重。各级渠道十五万公里，防渗漏的只有一万四千公里。全疆灌溉耕地平均引水量每亩为一千一百方，高的每亩一千五百至二千方，不仅无益，反而加速了土壤的盐碱化。如果采取必要措施，运用恰当的政策，就是现在这样多的水，至少可以多灌百分之三十的土地，投资省，效果好。需要有一个有权威的机构统一管好用水。

三、在经济决策中要注意扬长避短

我们到了新疆后感到，在经济上这里的优势很明显，但弱点也很明显。突出的是地处边陲，远离海洋，运输距离较长。前面讲过的其它困难和弱点，如资源不清，人才缺乏，水利建设跟不上等，这些都是属于可以开发解决的，唯独运距长是无法改变的，而且将长期发生影响。运距长，相应地成本就增加，产品的竞争力就大为削弱。考虑新疆的经济建设，必须重视这一问题，要千方百计避开和减少这个不利因素的作用，发挥自己的优势。

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一切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来考虑。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后，全国不是闭关自守了，各个省区也不再搞封闭式、半封闭式的自给经济了，需要而且可能在省区之间进行商品交换，以至国际之间进行商品交换，互通有无，扬所长而补自己之不足。每个地

区都应当研究设置适宜于当地生产条件的、具有优势的、可以成为经济支柱的产业，生产并输出价廉物美的商品，输入在本地区生产成本高的或没有的商品。这种地区间的专业分工，彼此交换，将使各个地区的资源、劳力和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凡是这样做的地方，就可能使自己的经济得到发展，富裕起来。这在世界上是不乏其例的。如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是这样。新疆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应当采取什么对策，特别是面对着运距长这个根本弱点应当采取什么经济决策，是很值得研究的。

新疆运输线长，输出商品成本高，但同样从外地输入商品运价也高。象轻纺工业品，上海、天津等外地出产的运进来，加上运价，成本也提高了。随着价格体系的改革，将来地区的差价会扩大，这就为发展本地的工业，特别是发展具有本地民族特点的工业，供给本地市场需要提供了条件。只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认真加以研究，多品种，少批量，花色品种不断更新，质量达到一定水平，成本也比较低，适合本地群众需要，也是能够占领本地市场的。因此，既不要搞自给经济，要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发展商品交换，输出自己具有优势的独特的商品，输入本地缺乏的质优价廉的商品；同时又要注意凡是本地市场需要、而又有条件、有技术生产的商品，计算起来比外地输入合算，就应就地生产。不仅全疆如此，区内的小经济区也可以这样做。

又如发展对外贸易，新疆诚然条件不如沿海地区。它距海岸远，却又距中亚、距海湾国家比沿海近，加上风土习俗的关系，新疆以自己的具有特点的优质产品，特别是生产一些名牌拳头产品来开拓这一个方向的外贸市场，也是有前途的，比之沿海并不逊色。新疆所需的一些商品，也可从这个方向就近进口。这方面对外经济贸易部要给以支持。

又如，新疆的特点是出产原料。棉花、羊毛，都很有名。现在有一种倾向，都想搞加工业，认为这样赚钱。这主要是现行价格不合理造成的。原材料价格低利润小，加工产品价格高利润大，这种情况是会改变的。新疆的优势，不一定在搞加工业。当然，搞一些是必要的，但不要盲目发展。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就是靠出口羊毛、糖、矿石、粮食成为发达国家的。随着国家对原材料价格的提高，输出原料也是有利可图的。像羊

毛，把它洗干净运出去，既有钱可赚，又少占运力，从社会经济效益看，也是经济合理的。

这里，还要讲一个问题：在开发中注意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新疆的植被只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一，是一个大的弱点。首先应大力抓好植树种草，保护好现有的森林和草场。新疆山上，许多是水源林，像果子沟里我们看到的云杉，很多长在石头上，长在沙砾上，砍了以后不可能重新长起来，而且后患无穷，植被会遭到破坏，气温也会起变化，对冰川也会产生不利的影晌。如果没有绿色林带，“固体水库”也会失去屏障，土地沙化会日趋严重。所以，植树种草，恢复植被，在全疆说来是一件大事，可以说关系到今后开发的成败。耀邦同志在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很强调这点，他指出，实现北方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第一位的工作是种草种树。这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森林宁可少伐多栽，绝不能只顾眼前，砍伐过量。新疆的水、土资源，要舍得拿一部分出来，植树种草。利用夏季洪水灌溉，成片造林，是个可行的办法。造林，要乔木、灌木结合，要多搞一些防护林带或成片的林区。牧区要保护好草原。要使森林、植被不被破坏，涉及到如何解决农村燃料。农村能源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应很好研究。从新疆看，要采取种薪炭林、利用太阳能、发展沼气等多种办法。阳光是这里一种非常好的资源，特别是在吐鲁番，在南疆地区具有优势。要把利用太阳能作为重要的科研课题进行攻关，力争近期内突破。为此，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国家科委、农牧渔业部和农村能源研究中心等单位要加以支持和帮助，研制出一种热效率高、成本低、使用方便的太阳灶来，在农牧区推广。只有把农村燃料问题解决了，才能逐步恢复植被，秸秆还田，保持地力。新疆的生态破坏是很值得注意的。在巴音郭楞州，州委汇报说有四个恶化：塔里木河下游日益沙化，博斯腾湖日益咸化，巴音布鲁克草原日益退化，焉耆盆地日益碱化。这种现象在全疆都存在，有的地方更严重。全疆已开垦的土地有三分之一盐碱化，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隐患。这是开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定要引起各级干部的重视，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争取生态的逐步好转，实现良性循环。新疆各地已创造了一些经验，如和田县布扎克公社建设“五好”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九团治理盐碱地的经验等，要大力推广。

在开发新疆中，生产建设兵团也有个如何发挥优势的问题。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由各族人民组成的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在建设新疆、建设边境中将继续发挥骨干作用。这几年兵团工作有很大成绩，从一九八一年开始扭转了多年亏损的局面，兵团所属的工业、农牧业和其他事业有很大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兵团农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苏联国营农场那种模式，努力探索，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形式。兵团在体制上、经营方式上要进行改革，要实行农林牧、农工商相结合，既要成为全区性的综合公司，又要起到大的工程开发公司的作用。兵团作为一个大公司、大企业，在内部要采取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特别是在农牧场内，要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说“大农场套小农场”。这种小农场是家庭农场的形式，但又不是“小而全”，而是专业化的。各个团场主要不是靠行政的手段，而是通过各种经济纽带、经济合同，通过生产前后的植保、加工、运输、储存、技术推广、物资供应等方面的合作，把家庭式的小农场同团场联系起来，组成兵团大农场的整个体系。这个改革，应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开。兵团要放宽政策，帮助各族职工安家立业，扎根边疆。在对外上，兵团也不要搞封闭式的体系，而应该向社会开放，为当地服务。在统一规划下，兵团可以和地方合作兴办各种事业；兵团办的企事业，也可以吸收当地的力量参加，通过经济合同办事，避免各搞一套，重复建设。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开发新疆作出新的贡献。

总之，这个问题还有待于研究。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个方法问题，是为了使同志们能够打开思路，更好地研究本地的特点和情况，以作出正确的决策。

四、加强团结，进一步发展新疆的大好形势

这次我们在新疆考察，大家都感到新疆形势很好，成绩很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王恩茂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新疆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显著的进步。新疆各族人民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各项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乌鲁木齐军区各部队，在军队建

设和支援地方建设上，在稳定新疆形势、保卫祖国边疆的工作中，也取得很大成绩，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整个新疆形势都很好，主要表现在：一是团结方面，二是建设方面。这几年团结增强了，建设事业发展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祖国边防也更巩固。

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加强民族团结，是第一位的大事，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关键。在新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离开了这个关键，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自治区党委和王恩茂同志紧紧抓住这个关键不放，下很大功夫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新疆各民族的团结，这是很正确的。正因为这样，才使全疆出现了安定团结、经济发展的好形势。今后要开发新疆，建设新疆，就必须继续发展这种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对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些不安定团结的因素，要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去消除它、解决它，进一步使各方面的团结合作，包括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新老干部的团结，特别是各民族人民和干部的团结，大为增强。这是大规模开发新疆的前提和保证。

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在思想上应当明确的两个观点：一是在新疆各民族之间，“两个离不开”；二是新疆各族人民一定要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之中，这种凝聚力，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在新疆，多民族共同生活，这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在我们国家里，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根本利益完全是一致的。各个民族，情同手足，休戚与共。这次我们到新疆，到处听到讲“两个离不开”，即搞好新疆的工作，发展新疆的各项事业，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时离不开汉族。这种说法，是很确切、很正确的，可以说是历史经验的简要总结。新疆的各个民族，各有长处，各有优点，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从历史上看，也是“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凡是各民族团结和睦、友好相处的时候，就是社会安宁、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时候；凡是民族之间闹纷争的时候，那就是人民受苦、颠沛流离的时候。我们应当进一步开展教育，使“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为增强团结打好思想基础。

新疆长期以来就是祖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为维护祖国的统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战略上、在经济上，新疆都是祖国非常重要的地方，新疆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勤劳勇敢的人民，将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之所以称为地大物博，就表现在有新疆，有西藏，有内蒙古，有青海这些地方上。所以，新疆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新疆的开发，新疆各族人民的富裕，也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援。从建设来说，不论在资金、材料、技术上，光靠本地的力量是很不够的，需要同内地、同全国各地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也就是说，新疆的发展如何，是同整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今后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新疆的支援将不断增加，新疆的建设步伐将逐步加快。从历史上看，凡是整个国家处于强盛的时候，各民族就友好相处，经济交流就发展，人民也就安居乐业；凡是整个国家处于衰弱的时候，也就是各民族灾难到来的时候，外来势力就会乘虚而入。这次我们走访各地，高兴地看到，不论哪个民族，都有着热爱祖国，热爱党中央，拥护十一届二中全会路线的发自内心的真挚的深厚的感情。他们一心向祖国，一心向中央，给我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应当使这种思想进一步在各族人民心中扎根，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的统一，发展大好形势。

前面讲了，形势好表现在一个团结上，一个建设上。没有民族团结这个关键的条件，经济建设就搞不好。那样，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就无法改善，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也很难改观。所以，归根到底，建设问题同团结问题是丝毫不能分开的，团结搞好了建设才可能搞好；建设搞好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了，也才能逐步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缩小和消除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上的差别。

为了积极开发新疆，建设新疆，为四化作出贡献，中央要求新疆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把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一切言行要有利于民族的团结，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对于干部来说，这是衡量德才兼备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是党性的一

个重要表现。任何有损于民族团结、有损于祖国统一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批评、制止和纠正。

最后，我还想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新疆的发展。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和中央常委作过很多指示，中央书记处也多次讨论新疆工作。希望新疆各族工人、农牧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生产建设兵团全体职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把新疆的各项工作搞好。新疆的开发，虽然比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起步晚，但是往往是后来者居上。我们殷切希望新疆的同志努力奋斗，后来居上。

注 释

1. 王恩茂(1913-2001)，江西永新人。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曾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副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二军政委，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

2. 司马义·艾买提(1935-)，维吾尔族，新疆策勒人。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曾任策勒县县长，自治区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家民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谭友林(1916-2006)，湖北江陵人。时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工程兵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政委。

国营农场可以实行职工承包办家庭农场*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你们写了这个汇报要点，不必按材料说了，主要说一下有什么问题。

去年盈利多少？（赵凡¹：除去奖金净盈利 6.96 亿元。）

过去亏损，去年盈利近 7 个亿，成绩很大。要把钱使用得当，集中资金保重点。

（赵凡：关于农垦企业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据二十一个省、市、区统计，包干到劳到户的已经占 78%。）你们这个统计高了，恐怕没有这么多。

（赵凡：这次会上，大家对紫阳同志在农七师说的农场里边套家庭农场很感兴趣，讨论得很热闹。）那好。

（林乎加²：黑龙江、新疆，大田要轮作，大面积机械化作业，还有些矛盾。）

轮作、机械化，这些问题在实践中都可以解决。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扎兰屯有一户，不是农场，承包了土地，拖拉机站把拖拉机折价卖给他。他种一千亩小麦，两季就把拖拉机的钱还清了。现在黑龙江的嫩江地区有许多农户要求承包土地开荒，划五百亩、一千亩，到银行贷款买拖拉机，收割时请康拜因来。土地多的地方包到机组，有的把拖拉机、土地都包到户，

* 这是赵紫阳在新疆乌鲁木齐听取赵凡、林乎加等人汇报农垦工作会议情况时的谈话。

黑龙江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当然，我们是不是都搞到户，要研究。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形式开荒可以大大减少国家投资。过去，我们想的是靠国营农场开荒，要国家花那么多钱，根本不需要。当然，修水利、盖房子、修道路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要一些投资。中国农民经营有自主权后，很多事想象不到。现在我们要改变过去那种官办形式，一句话，要彻底摆脱苏联国营农场的模式。国营农场内部，要把职工家庭用多种经济形式联合起来，成为有机的经济联系。可以搞承包，可以搞产前、产后服务。农场划给职工家庭一部分土地承包，大拖拉机、康拜因也可以包到户，承包一定面积，这也是专业户。土地交报酬，租用拖拉机收费。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由国营农场组织，也可以包给个人。第一，是家庭承包的；第二，是专业化的。农场与各专业户之间，通过经济合同联系起来，农场成为专业户的经济纽带，这样农场就活了。也可以说，这是“大农场套小农场”。

陈实³同志，你们兵团以后不要再吸收固定职工，可以有计划地在甘肃定西招收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来承包土地开荒。定西那里太困难了，非移民不可。定西人会种地，会打石头，当兵体检都合格。他们来后独立经营，你们支持三五年。一开始可以借房给他住，立住脚以后，结婚或接老婆来都行。这种自营家庭农场，是国营农场的组成部分。不要一来就吸收为工人，拿固定工资。这比过去那样办国营农场可以大大节省投资。第一批招一二百人就行，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赵凡：允许职工办家庭农场，大家愿意回去搞试点。）

这些事都要先搞试点，不要一哄而起。

（赵凡：石河子条田、林网、水利是配套的，黑龙江垦区推行机农合一承包，已经有两年多了，还是适合的。大条田划成小块种几种作物，不合适。）你们先划出一角给专业户，试一试。不需要一户又种这样又种那样“小而全”，还是要搞专业化，要成片包。

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畜牧业。农场对畜牧业重视不够。我说的畜牧业，是搞奶牛、奶羊，家庭圈养，农场搞奶制品加工。（林乎加：有些杂牌乳粉，现已不好销了。）销路要看到农村，全国有百分之十的人购买力提高了，市场就非常大，有百分之十的人购买高档商品，就会打开销路。特

别是农村，价钱贵了不行，化纤就很能说明问题。大家还穷，买了自行车、手表就完了。购买力一提高，有百分之十的人买加工食品，食品工业就有无限的前途。

（林乎加：大包干后，每个职工要负担各种管理费五、六百元。）

干部也得包地，层层都包，没有吃闲饭的，费用就少了。农场都得变成公司，不光是搞生产管理，还要学会搞经营。

我最近到齐齐哈尔，看到一户养三十五头奶牛的专业户。一头奶牛产奶五千公斤，一年利润七千元。当然，那里有草，他有一个儿子、一套机械，专门到外边打草，还不够，要购买三分之二的草料。交一斤奶，市里给一定数量的饲料，不足部分在市场上买玉米，也不贵，饲养成本占百分之六十。

内蒙古把草场也划到户，有两种形式，一是全部划到户，一种是把冬草场划到户。这样一划，就把草场改良落实了，农民就搞围栏，有的还施肥、打井、灌水、撒草籽，搞草场建设。牲畜包到户，冬窝子包到户，搞了草场建设，牧业就发生了变化，真正讲经济效益。养什么羊，养多少，种什么草，他自己就考虑了，草场载畜量就合理了。有的地方载畜量不是过大，问题是夏天草多，冬天不够，是个调剂问题。关键是冬春草场的建设，只要包到户就落实了，经营就合理了。牧区开始有人经商，办仓库，将来可能搞冷库，经营畜产品到城市。伊犁有一户农民包一台拖拉机搞运输，三年交四千元，我问他今年能赚多少钱，他说赚几千元。中国有很多人很会经营，过去是管死了，大家都等着，你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包下去，能人就出来了。

你们应当研究概括几句话，究竟办什么样的农场，采取什么形式，对内怎样对外怎样，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国营农场内部实行职工家庭承包办家庭农场，很可能将来是主要形式，家庭农场是专业化的。有个专业户问我，可不可以请人，一个月给一百二十元。我说可以，在城市可以请两、三个至五个学徒、二个帮手，你也可以。当然我们不提倡雇多少人。今后农村会经营的人办家庭农场，不会经营的人搞劳力入股分红。中国的家庭农场不能搞大了，三五个人，七八个人是可以的。个人收入多也不怕，可

以收税，完全有办法节制。（胡启立：南斯拉夫是用三个办法控制，一是限制雇工人数，二是限制土地面积，三是超过收入限额的收累进税。）我们也可以控制。这样一搞，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官僚式的管理经济的办法就破掉了。农场就是综合公司，这样必然涉及农场管理体制大的改革。

农场对外要向社会开放。你们可以与其他单位合营，也可以和农户搞合营，和地县合办企业，统一规划，避免重复。有的是社会为农场服务，有的是农场为社会服务。农场是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是公司。

我现在说的还是粗线条的想法，国营农场怎么办，要概括几条，你们在会上好好讨论研究一下。

（对赵凡）你们干脆就叫总公司。不过你们农垦局那么多人，公司吃得消吗？（赵凡：农垦部改为局后，人已减少，老弱病残已离、退休。）

你们人太多，但主要是使用不得当，不能把人才和资源开发利用结合起来。

职工家庭农场发展起来，不知场内能拣多少撂荒地，把它利用起来。

（赵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严格禁止哄抢国营农场财产问题。）

我去海南岛时就讲过这个问题，要把无政府主义刹住。安徽普济圩农场受水灾被哄抢，要严办。对趁天灾哄抢国家资财的为首分子，要严加惩处。

（赵凡：关于国家对农垦实行财务大包干制问题。由于实行财务包干，调动了企业积极性，扭亏为盈。使农垦能继续滚雪球。会上大家要求一九八五年以后继续实行这个办法。）

这一问题，到一九八四年即明年再说。据我知道，没有人打农场的主意。你们交税嘛！交税后利润都是你们的。

（赵凡：像工业那样利改税，影响农场滚雪球发展。）

可以对你们适当照顾一下。

（赵凡：耀邦同志视察新疆时让兵团造林种草、发展畜牧，跟你讲的意见一样。耀邦同志说：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每年给个把亿，两个部已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希望国务院、国家计委做出安排。）

造林、种草，对！

注释

1. 赵凡(1916-2010), 河南鄢陵人。时任中国农工商联合企业董事长。曾任北京市委农工部部长、书记处书记, 北京市副市长, 农林部、农垦部副部长, 农垦总局局长。

2. 林乎加(1916-), 山东长岛人。时任农牧渔业部顾问。曾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 国家计委副主任, 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农业部部长、农牧渔业部部长。

3. 陈实(1916-1993), 山东泰安人。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曾任新疆军区运输部部长, 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水利部副部长。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是提高企业素质的关键*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七日

今天把参加质量管理小组代表会议的同志们请到中南海，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见见面，并听取几个优秀小组汇报成果，以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战线各个企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关心、重视和支持。袁宝华同志汇报了开展这一工作的情况、问题和意见，我都同意。我认为，要搞好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解决认识问题

应当在全党、全体干部、特别是在经济战线的全体职工中，讲清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提高对这一工作的认识。

大家知道，提出我国经济工作要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已经三年了。今年我们又提出，我国工业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挑战，面临一个如何提高素质的新的转变。经济效益问题，企业素质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产品质量如何和物质消耗多少，是一个企业素质的主要标志。要提高企业素质，就必须、也只能围绕提高产品质

* 这是赵紫阳在接见全国第五次质量管理小组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量、降低消耗来展开工作，就是说，投入要少，产出要既多又好。当然，提高企业素质还包含很多内容。最近，经委的同志和社会科学院马洪同志组织了一个小组进行研究，拟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分析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提出解决的办法。但目标只能一个：投入要少，产出要既多又好。在经济工作中，我们还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主要去搞自动化，节约人力。我国有我国的情况。我们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就是增加社会财富，增加国民收入，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我国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个是质量差，另一个是消耗大，与国外先进水平比，差距非常大。这是我国工业的症结所在。我们讲经济效益，讲企业素质，讲劳动生产率，必须主要考虑这两个问题。刚才听了四个质量管理小组的汇报，他们的经验也说明，只要围绕这两个问题下功夫，就会取得显著成效。

经济效益问题，质量和消耗问题，搞得好不好，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我们讲翻两番，目的是要增加实际创造的财富。但是现在讲翻两番，是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的。总产值这个指标，是有很大的缺陷的，现在还没有别的指标来代替它。总产值如果翻两番，国民财富可能翻两番，也可能是翻三番；也可能只翻了一番。比如，好的灯泡、差的灯泡，产值都是一百元，但差的只用五千小时，而好的却用一万小时，实际的价值相差一倍，而统计表上产值都是一百元。这就有个质量问题，耐用不耐用的问题。又如冰箱，好的冰箱耗电低，放东西可保持两个星期不坏，而差的冰箱放东西进去一个星期就坏了。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注意力放在总产值的增长上，而应当放在实际创造的社会财富上，放在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上。

提高质量，有一系列工作要做。抓好全面质量管理很重要。宝华同志在汇报中讲，要从事后检验把关变为工序控制，从管结果变为管因素，这是一条好经验。我们知道，最后检验与每道工序都严格检验，效果大不一样。总装以前的各个工序，如果及时地严格地把关，把不合格品及时去掉，就可以减少后道工序的消耗，避免浪费，这是很大的节约。我们应当发动广大职工，运用科学方法，对生产和经营的各个环节，实行全面质量管理，道道工序都把关，保证产品的优质低耗。

降低消耗非常重要。从工业的情况看，产品的成本中，物质消耗即原

料、燃料、材料，一般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工资部分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降低物质消耗是降低成本最主要的因素。同样的产品，消耗少，功能好，就等于使用价值提高了。这样也就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国民收入，提高了经济效益。提高质量，实际上就是多创造了财富，降低消耗也同样多创造了财富。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对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对提高企业素质有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把整个国民经济提高效益、提高素质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一个好的形式，一件打基础的工作。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这样一种方法，这样一个措施，就可以使提高效益、提高企业素质不至限于一般号召，而是真正落到实处。

刚才听了四个小组的汇报，感到很新鲜。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在我国也可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这个新事物，是把我国多年来开展的群众参加管理的经验（两参一改三结合），同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相结合的产物。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东西，也不能因循守旧，完全只相信我们过去那一套。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把好的东西，成功的东西同国外先进经验结合起来。搞好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正是这样一种产物。我们过去讲群众路线，没有很好同先进的管理制度、同先进的科学方法相结合。刚才几个小组的汇报，有系统的分析，有科学的数据，体现了群众活动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先进方法光是靠自上而下的推行是不行的，但是光讲群众路线，不让群众掌握先进方法也是不行的。质量管理小组既有群众的积极性，又讲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是有生命力的，是符合四化建设需要的。要搞好这一项活动，使它持久地、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既要有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的领导，同时又必须和经济措施结合起来。

总之，一方面应看到我们工业的产品质量很差，消耗很高，浪费严重，企业素质低下，现在是一个很尖锐的矛盾，是四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从你们先进小组的事迹，从各地创造的经验又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潜力很大，大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的活动，对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四个现代化建设，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要解决政策问题

这件事要真正搞好，必须逐步地解决一些政策问题，使之有利于促进大家重视质量，重视减少消耗，有利于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现在这方面问题很多。我们的方针是要质量、要效益、要素质。我们的一些办法呢，却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鼓励追产值，鼓励重数量。我们这一套体制是成龙配套的，一下子还不好改。但必须逐步解决。政策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必须首先解决企业吃大锅饭的问题，这是个前提。大锅饭不能吃了，才能使企业不躺在国家身上，促使他们从内部想办法，考虑如何提高效益，减少消耗，提高质量。没有这一条，其他的就很难办。农村解决了吃大锅饭问题，一下子农村形势就好转，而且越来越好。工业方面，国营企业要不吃国家的大锅饭，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像农村那么简单，因为农村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必须解决。不管怎么说，就是要解决企业负责盈亏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理论界还有很多争论。叫盈亏责任制也好，叫自负盈亏也好，实质上就是要解决企业不吃大锅饭，实行自负盈亏的问题。当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自负盈亏，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政策下的自负盈亏。看来，企业搞自负盈亏，不能像农村那样，采取一般的承包的办法，那是行不通的，因为企业的水平等各个方面都不一样。看来应当主要是通过税收，各企业都要向国家缴税，缴了税之后，剩多剩少，都由企业负责。将来不仅企业发展基金、福利、奖金由企业负担，还必须负担一部分工资，工资也不能由国家全部包下来。

（二）实行优质优价。如果一个能用五千小时的灯泡是那么多钱，只能用三千小时的灯泡也是那么多钱，这就不能体现人家创造的价值，也不能鼓励人们提高质量。优质不优价，这在我国是个大的问题。优质优价不实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就很难真正解决。一方面要优质优价，另一方面要劣质劣价。在价格上既要体现鼓励，也要体现惩罚。刚才一波同志讲，沈阳水泵厂搞了很好的水泵，节约了很多电力，但是价格并没有提高，工厂生产这种产品，多付了劳动，多付出了投资，但出售价格还是一样。对社会贡献很大，但本厂那一年的各种基金还少了很多，这样，就不能调动积

极性。后来，大庆油田与他们签订了合同，给他们加了点价，才解决了问题。

（三）制订奖励政策。质量管理小组的活动，出了成果，确实检验合格，确实显著地提高了经济效益，就要有奖励。

我看，先就定这么三条政策。第一条，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解决吃大锅饭，解决国家同企业的关系问题。要使企业把整个注意力用在挖掘潜力上和提高经济效益上。第二条就是要实行产品优质优价。第三条就是奖励政策。不仅是质量管理小组，包括全体职工，凡是在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方面有了成果的，做出了很大贡献的，都要有适当的奖励。除了精神奖励外，还要有物质奖励。

第三，一定要抓紧职工的培训

刚才，听你们小组的汇报时就感到，要搞好全面质量管理，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不行。群众活动，群众路线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先进的科学方法要结合起来。这本身就有一个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的问题。你们汇报时，都讲了管理小组内的文化水平，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提高企业素质，必须提高职工素质。职工素质，除了政治思想之外，必须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我们现在很多厂的领导同志还不懂得这点。一个真正的先进企业，如果没有工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办到的。文化、技术水平很低的职工队伍，不可能掌握先进的工艺，先进的科学方法和管理技术，不可能生产出先进产品。这几年，经委在抓这件事，我觉得还应该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厂内的职工培训，全员培训，要与提高企业素质联系起来。没有这一点，企业素质是无法提高的。有位在国外工作的学者，分析了中国职工的文化水平，得出结论说，中国全民所有制现有职工的教育水平是八年左右，如果在未来二十年里职工的教育水平没有提高，那么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就只能达到一万七千亿元，完不成翻两番的任务；如果能提高到十年，工农业总产值可达到三万六千亿元，超过翻两番。这个数值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是把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我们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出问题，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很多事实都说明，没有文化的职工队伍，是不可能使我们的企

业办成先进的企业、现代化的企业的。为什么我们从国外买来的不少先进设备，不能发挥它的作用呢？除了其他原因，像思想状况、管理问题等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职工文化技术水平太低，掌握不了。所以，职工的培训一定要抓紧。要把它同提高企业素质联系起来，下大力抓好。

第四，要稳步发展，不断提高

开展全面质量管理，特别是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要稳步发展。质量管理小组，首先就要讲质量，质量第一，把这个精神贯穿在所有的活动中，不要搞形式主义。我认为这件事是很有希望的，可以给四化建设做出大的贡献。但真正要搞好并不简单。目前全国有二十七万小组，真正把二十七万小组都搞好，就不得了啊！现在才五百个优秀小组，这同二十七万小组相比，比例太小了。要使更多的小组成为先进小组。质量管理小组的作用，一是它本身出成果，二是它对全厂职工起骨干带头作用。一个企业有几个好的小组，它必然带动整个职工队伍，大家都注意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所以，质量管理小组要注意稳步发展，不要追求一定要有多少个小组，或者占了职工队伍的多少。要认真搞好，提高质量。一部分企业真正搞好了，就可以带动许多企业；一个企业几个小组搞好了，就可以带动全体职工。我们要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求发展。多年来，我们有搞形式主义的毛病，这是个不好的传统。一哄而起，讲究数量，讲究形式，要啥有啥，但是，有名无实。这种作法，流弊甚大。刚才我讲，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新鲜事物，对我们四化建设会作出很大贡献。搞得好，确实是大有希望。但是，不要把名誉搞坏了，不要去降低质量。一哄而起，巩固不住，不会起多大作用。

今天见到大家，我很高兴，也感到大家确实做了很好的工作，给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谢谢大家！

援外工作要量力而行和尽力做好*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要注意培训人员，这件事花钱不多，意义很大。我们培训的人员，他们自然对中国友好一些，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培养什么“亲华派”，最主要的是帮助他们培养人才，这是真正对他们负责。第三世界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我们要在人员培训上舍得花力气，不要光重视物的援助，而不重视人员培训。不然，搞那么多项目有什么用！苏联这一点抓得紧。今后要明确我们的援外经费不是专门搞物的、搞成套项目的，要包括培训人员在内。

最近我和崔月犁¹部长谈到医疗队的问题。我们如果多拿出几十万元，就可以帮助第三世界的人民解决很大的问题，比你给他盖工厂作用大。（陈慕华同志：医疗队的影响很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医无药，我们派了医生去没有药，所以以后还要拿点药。）是呀！有医无药，过去完全不收费，现在收费还很高。（陈慕华同志：将来要区别对待）过去，帝国主义到中国搞文化渗透，还懂得办教会、看病，争取人心，它那样做当然是为了麻醉人民。

将来，会堂、文化宫、体育场、体育馆可以搞一些，但不要搞那么大。现在我们搞的一般偏大，有的地方一个体育馆可以容纳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何必搞那么大呢？花钱很多。当然，他们要求搞大的，但是这个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搞得小一点，可以快一些，也便于管理。这个问题，以前中央和有关方面议论过多次，虽然是非生产性项目，但对人民开展文化、

* 这是赵紫阳在接见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体育运动有帮助，政治影响也好。总之，现在有一个钱少了如何用得好一点的问题。钱多固然好办事，但用不好也不一定都好。如对某些国家我们援助了那么多钱，结果搞成冤家对头。钱少一些也不一定就搞不好，越是钱少越要搞好，要讲清这个道理。钱少了就一定要用好、办好。钱多了嘛，你别的差一点也不要紧，一好遮百丑。

现在，要拿出更多的钱去搞援外是不可能的，但即使钱不多，也要把援外工作搞好。钱越少越要热心，越要负责任，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钱少了，人也松了，不重视了，那这个事情的结果肯定会很坏。钱越少越要重视，越要搞好，越要热心，这就叫量力而行，努力搞好。量力而行是指钱，努力搞好是指精神。要有这么一种精神。物质条件是变了，没有那么多东西了，精神不能变，发扬国际主义，帮助第三世界人民的精神不能变。你们所谓思想认识不一致，是否指的就是这些？我看就是要把这个思想搞通。要用辩证的观点看这个问题，不能说重视对外援助，就多要钱。对外援助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承包是一种形式，我们到国外办企业是一种形式，还有就是经援项目，这都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吕学俭²：有的经援项目可以发展为合营。）我们将来应当研究在国外与私人搞合营，不要光和他们政府搞合营，它经济上负责。

（吕学俭：承包经援项目，希望国家能免于征税。）这个税不要征了，开明一点嘛。由哪个单位承担包干，它节余的钱，可以不征税，鼓励他们的积极性，这也没有好多油水。（陈慕华同志：总的来说，还是少花钱的，它在那里拖拖拉拉，拖长了项目建设时间，增加了支出，还是要来报销。）

这个会开得不错。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你们所讲的一些方针我看很好嘛！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因此不可能向第三世界朋友提供力所不及的物质援助。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没搞清楚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我们力量所不能承担的、过大的援助任务。这是由于没有经验，经过这几年总结，这个问题认识了。我们不能提供那么大的援助，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暂时经济困难和进行经济调整，即使今后财政经济情况好一些，我们也不能提供力所不及、不能胜任的援助。当然，随着我们国民经济的好转，我们的援助数额会增加一些。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援助第三世

界国家不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可有可无的。绝不能这样看。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穷，但是个大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第三世界提供一些援助，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

我们要反对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一说要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就不考虑我们的能力；第二种是，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认为过去办了一些力所不及的事。当然，那些事办了也是好的嘛。但是看来不能长期办下去，所以现在把它适当收缩一下。如果就因此认为好像这件事情不重要了，是可有可无的，那就不对了。要进行教育。这一条，我们全党要统一认识。首先是各级领导要重视这件事，把对外援助作为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这点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变化。只要我们能够做的，一定要尽力做好。越是力量小，越要搞好。既要量力而行，又必须尽力而为。你们文件中讲的，“用有限的援外资金，力求取得最好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效果。”这个话讲得不错，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可作，重视不重视，钱用得恰当不恰当，要认真研究。

各部门一定要积极承担中央确定的援外任务，这是个政治任务。当然也不完全是政治，还是有报酬的，不要让你们亏本，赚也赚不了多少钱，至少保本嘛，保本也是光荣的。要把援外任务看成是应尽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你们文件中说，有的认为这件事是“油水不多，麻烦不少，责任重大”，我们这就叫光荣嘛。如果油水很大，没有麻烦，没有责任，这个事办起来那有什么光荣呢？总的讲，我们现在的援外任务不是太多，各省市、各部门一定要认真完成。

我们的援外资金减少了，而工作做得好，那也可能适当抵消一些由于资金少而造成第三世界朋友方面的误解。如果钱少了，也没有精神了，大家不负责任了，那确实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现在第三世界某些国家对我们就有些议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拿不了那么多钱，这不是不愿意多拿，而是确实没有力量。“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拿多少钱去援外，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勉强不得。如果勉强去做，也不能持久。但是，我们已经确定的援助任务，一定要办好。如果不去做，那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能够做的事，我们必须做好，做不好就不应该，那

确实人家就会说你中国变了，对第三世界朋友不热心了。我们为第三世界办点好事，钱少了，热心不能减退，这种精神不能减弱。一定要说清楚，援外任务是个政治任务。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我们派出国的人关系很大。这次我去非洲访问，对这点印象非常深刻。非洲朋友对中国人的印象特别好，这固然是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制订了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特别是对非洲的政策很正确，我们也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援助，但主要是中国人在那里表现得很好。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就是从在那里的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来认识我们国家的。他们对我们国家非常钦佩，觉得我们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和我们在那里工作的同志的表现是分不开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搞坏。现在，我们在国外的医疗队、施工队伍和工作人员，是否真心诚意为那里的人民服务，是否真正地把非洲人民当成自己的兄弟，这个问题很重要。过去，我们的出国人员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热心为当地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在非洲朋友的印象中非常深。所以，你们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非常重要。现在，虽然我们对外提供援助的钱少了，但要把事情办好，我们在那里的工作人员要继续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我相信，这样即使我们钱少一些，我们在第三世界人民面前的形象仍然会是好的。如果钱一少，认为这件事情不重要了，马马虎虎，工作做得很坏，再加上把国内一些不正之风带出去，特别是那些承包单位，可能更厉害一些，那就必然会使朋友感到中国的形象变了，钱也少了，工作也办得不好了，人也变坏了。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然，怎样把事情办好，有很多经验，也有些教训，这次你们已作了报告和总结。

最后，还要强调一下承担援外任务的问题。今天，中央各部的同志在，各省市的也来了。希望参加会的同志们回去向党委、向党组的负责同志汇报。今后援外任务不算很多，但关系甚大，关系到我们国家的荣誉，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大家要以大局为重，要勇于承担。担子也不重，不要推来推去的。承担了任务以后，一定要认真负责搞好（陈慕华同志：还要长期打算，不能老想着收摊子）。将来，我们也可以搞评比，凡是承包援外任务的，都可以评比一下，看哪里搞得很好，哪里搞得坏，也要比较一下，比

个风格嘛。赚钱的项目就那么积极，搞援外就那么消极，那不是向钱看吗！现在不是反对向钱看吗？你领导机关就向钱看，这个话恐怕不大好交待吧。当然，有些事要从政策上解决。比如有一个承包得的多，援外得的少的问题，这可以逐步研究。因为现在财政困难，一下也很难解决，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可以逐步研究一些办法。但不能以此为借口，一定要有多少钱才负责任。这不行。在座的同志都是搞援外工作的，你们是积极的，我今天讲的这些话也不完全是讲给你们听的，请你们回去给负责同志讲一下，给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和各部的党组书记讲一讲，然后向有援外任务的地方和工厂讲一讲。

注 释

1. 崔月犁(1920-1998)，河北深县人。时任卫生部部长。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卫生部副部长。

2. 吕学俭(1928-1999)，山东荣成人。时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曾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

团结一致 艰苦奋斗 夺取新胜利*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同志：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临今晚招待会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国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这里，我还要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和各级干部，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今年以来，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新的成就。

农业生产在全国较大地区发生水涝灾害的不利条件下，预计仍可超过去年大丰收的历史最高水平，广大农民的收入比去年又有增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在发展和逐步完善。

工业生产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稳步发展，增长速度超过了原计划，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国营企业利改税的工作全面展开，城市改革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重点项目的建设逐步展开，并将进一步加强。城乡市场更加活跃和繁荣。

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迈开了新的步伐，取得了很大成绩。

* 这是赵紫阳在国庆三十四周年招待会上致的祝酒词。

精神文明建设的进展，首先表现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正在逐步加强。为了防止和消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精神污染，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措施。

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坚决依法从重从快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这个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新闻、出版和体育事业，都有了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这些成就，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鼓舞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

我们面临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尽管还有许多困难有待于我们去克服，但是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团结一致，振作精神，艰苦奋斗，扎实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在欢度国庆的时刻，我们特别怀念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最近邓小平主任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意愿和利益。

我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我们深信，通过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面对当前动乱不已、紧张不安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们将继续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侵略扩张，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同其它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我们将长期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同其它国家的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

我们要不断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我们特别致力于同近邻国家发展睦邻关系。

我们将积极增进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交往。

我们谋求继续发展同西欧、北美、大洋洲国家的良好关系。

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根据双方协议的各项原则得到稳定的发展。

我们期待中苏关系能够消除目前存在的障碍，实现正常化。

我国执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我们将始终如一地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维护世界和平，为争取人类进步而共同奋斗。

现在，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四周年，

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

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

为世界和平，

为出席今晚招待会的各国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各位来宾和朋友的健康，

干杯！

抓紧争取教育轻微犯罪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

复之¹、广祥²同志：

此件请重视。轻微犯罪者惶惶不安，正是抓紧教育的良好机会，望一边继续深挖打击，一边争取教育轻微犯罪者，机不可失。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

注 释

1. 刘复之(1917-2013)，广东梅县人。时任公安部部长。曾任公安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司法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 李广祥(1917-1998)，山西文水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公安部一局局长。

* 这是赵紫阳就新华社对上海国棉十五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做好有轻微犯罪青年转化工作的报道写给刘复之、李广祥的批语。

关于调整化纤布和纯棉布价格 给耀邦同志和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

耀邦同志、政治局常委并书记处同志：

目前国务院正在对今年消费品生产出现的新情况和应采取的对策进行讨论。待讨论告一段落，将向常委、书记处汇报。

讨论中一个集中的问题，是降低化纤、涤棉混纺布的价格，同时适当提高纯棉布价格，以解决化纤织品的滞销、积压、限产问题，同时又不因此而减少财政收入，并可促进十亿人民衣料结构（以化纤布代替纯棉布）的逐步改变（这是早晚总得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决策，虽然影响面广，可能会有不小震动，但对整个经济会带来极大好处，对于合理改革价格，也是一个突破。

讨论中，暮桥同志有一篇发言，大家同意他的分析，现送上，可抽空一阅。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

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 和我们的对策*

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

今天请了有关方面的同志，包括沿海几个省市、国务院综合部门和一些科技单位的同志，开个座谈会。座谈一下所谓的“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或“新的产业革命”的问题，研究一下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相应地采取什么对策，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次座谈只能起到出题目的作用，开一个头，以后还要展开讨论。今天我先讲几点看法：

一、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国际上议论得很热烈。是不是有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第四次产业革命”），工业发展历史如何划分，现在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按照西方比较流行的一种分法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三次是在二十世纪初开始，以电力、化学制品和汽车的发展为标志。而这一次将是第四次。其特征是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召开的新技术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敏锐观察世界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新趋势、新动向，经过深入学习、缜密思考，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率先及时地提出要把握时机，研究应对世界新产业革命和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方针和总体构思，并组织有关部门专家组展开讨论，研究对策，陆续制订了促进中国高新技术快速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实施方案与计划，促使中国 20 世纪末及 21 世纪初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阅读他这一讲话，要与本文集第三卷所载的发展中国高新技术的“八六三”计划的规划和方针政策（见本文集第三卷第 323 页和第 360 页）等文献结合起来阅读，以了解其实施进程和战略意义。

激光、海洋开发等新技术的广泛利用。这次新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结果，将使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

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谈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日本《经济新闻》连续报道了这方面的内容。美国学者奈斯比特¹出版了《大趋势》一书，指出当前美国社会出现的十大趋势，其中主要有三大趋势，即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国家经济转向世界经济。这些趋势预示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动向。还有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²发表的《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两次文明的浪潮之后，现在依靠全新的技术、开发全新的材料的第三次浪潮即将到来，预言这个浪潮将冲击旧的生产方法和社会传统。不管叫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好，叫第三次浪潮也好，他们都认为，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达到高度工业化以后，现在要从工业社会转入信息社会，或叫做知识、智力社会。他们说，信息社会就是大量生产知识，“知识的生产力已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这些论点，都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后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一些动向。不管他们讲得确切不确切，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一种信息：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或者几十年之内，将会有这么一个新情况，现在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运用于社会，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相应地会带来社会生活的新变化。这个动向，值得我们重视，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并且应当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确定我们在十年、二十年的长远规划中，特别是科技规划中，应当采取的经济战略和技术政策。

二、为什么应当注意这一动向呢？如果确实出现那种状况，科学技术有重大突破，新的技术革命兴起，整个世界有一个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那么，对我们来说，对今后向四化进军来说，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过去我们经济的发展，错过了很多机会。十九世纪末，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日本抓住时机，搞了明治维新。而稍后一点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机会丧失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有长达十多年的繁荣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经济复苏过来，接着又来了这么一个大变化，许多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起

来。日本由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给它的机会，经济起飞了。其他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欧的，南美洲的，亚洲的南朝鲜、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利用这个机会，主要靠外资搞加工，也发展起来了。但是，我国在那时却陷在“文化大革命”中，搞“阶级斗争为纲”，把大好时机耽误了。

现在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新的技术革命来临的话，我们究竟怎么样呢？我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时机利用得好，抓紧应用新的科技成果，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使我们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缩小。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或者漠然视之，那就会使我们同发达国家，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扩大，有可能把我们甩得更远。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第一种可能，避免第二种可能。我国的经济建设、科技事业，应立足于当前，努力把目前的各项工作抓好，同时应当高瞻远瞩，展望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想一想我们从中应借鉴些什么，注意些什么，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搞得更好一些。

三、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³不久前访问上海时，对《世界经济导报》记者说：“七十五年后中国将成为亚洲的最大强国”。他有两条根据。第一条根据说，“中国经济现在已超越经济发展中的‘起飞’阶段。从历史上看，一般国家都能在经济‘起飞’以后，迅速赶上先进国家”。罗斯托把社会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指大工业出现以前的农业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等六个阶段。看来他可能把我们的情况估计高了。这一点姑且不论。他的另一条根据和理由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为借鉴，跳过某些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经济部门可以直接进入以遗传工程、激光、微型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时代。譬如中国，现在就可以同时采用所谓的第三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在较先进的经济部门尤其要注意吸收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这将对中国经济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认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也许可以不经过第二次浪潮的发展，而采取全新的路线达到第三次浪潮的文明。这个观点，我认为值得重视。一方面，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我国的经济建设，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能任意逾越那些必经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又不能亦步亦趋，一切都照人家走过

的路从头走起。尽管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比先进国家落后了几十年。但是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的今天所处的条件和环境终究是不同了，因为许多技术都成熟了。技术发展是多层次并存的。比如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既有牛车、马车、人拉车，同时也有飞机、汽车、轮船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因此我们在一些领域里，有可能跳过某些传统工业发展阶段，采用比较先进的科技成果，直接进入以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激光、光导纤维等为标志的新时代。对此要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政策，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如果利用得好，我国的经济是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的。

四、宦乡⁴同志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同志所写的《关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目前在我国，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知识技术密集等三种类型的产业都有，但比例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我们应以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为借鉴，按先进的比例建立和改进自己这三种密集型产业并存的体系。”文中还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使我国经济、特别是工农业水平在本世纪末达到世界先进工业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水平，这是正确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部分部门和产品的技术和工艺达到当时（本世纪末）世界的最先进水平。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这点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些观点，我认为是重要的。

我们国家在技术上到本世纪末要达到世界上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水平。这是从总的水平来说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情况不同，有的可能达不到，有的应当搞得更好些，把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掌握好。从全国来看，我们不可能把整个产业结构都搞成知识密集型的。我们有许多传统的工业，有相当一部分资本密集的工业，现在还需要向进一步工业化的方向发展。但同时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也应当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办一些知识、技术密集的产业，增加这方面的比重。在我国内，哪些地区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发展知识密集产业的条件比较好呢？无疑是沿海地区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今天请了上海、天津、江苏、广州的同志来一起研究，就是为了引起这些地区的重视，利用自己的优势，把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搞上去。

沿海地区这样做很有必要，也很迫切。我们应当看到当前国际分工出现的新变化。时不我待，机不可失，你不搞，别人要搞，竞争非常激烈。

正如宦乡等同志文章中指出的，目前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的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巴西、智利、南朝鲜等，都在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正在把一些劳动密集和污染严重的产业逐步缓慢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对资本密集的行业（钢铁、重化工、汽车等）进行以自动化、节约能源和不污染环境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改造；同时积极建立和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的新兴产业。可以预计，十至二十年后，由于这种产业改组，发达国家将不会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因劳动力低廉而委托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装配和加工的办法，后者因而将失去继续获得高增长的动力；同时，过去二十年中这些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主导发展经济的战略也将失去依据。现在，这些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在谋求改组自己的产业结构，纷纷设法向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开始试图建立高技术、高知识的精密产业的方向过渡。比如和我们沿海地区隔海相望的南朝鲜、台湾都在搞产业结构的改组，提出要搞知识、智力密集的产业，还有南美的巴西等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当然，我们能不能搞，那是另外的问题。面对这种竞争的形势，我国沿海地区必须注意发展新技术。以前我们提出上海要“内联外挤”的口号，这是正确的，应继续坚持。沿海地区还应当根据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来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象上海、天津、广州、大连这样的城市，应当逐步建立和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的产业，使它所占的比例逐步扩大。因为这些地方资源和能源缺乏，而交通、港口设施和技术基础比较好，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比较强。根据我国工业的战略布局，将来一些资本密集的产业，如钢铁、重化工、重型机械可能逐步集中到中部、西部原料产区。沿海地区不应当多搞大量消耗资源的产业，而应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的产业。这是“内联外挤”所必需的，既有利于向外开拓市场，又可以对内加强联合。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使我国产业结构中三种类型并存的比例关系逐步得到改善，趋于合理，从而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五、注意微型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世界上的某些新技术，如登月技术，我们不一定急于搞，也不一定马上用得上。生物技术，有些我们应抓紧研究；光导纤维，国外在大量搞，我们应当引起重视；机器人，如果用于解决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问题，是需要的，如用在节约劳动力方面，在我

国就不是当务之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认为对微型机的利用，一定要摆在重要的位置，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国外，现在微型机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就生产领域来说，它可以用于管理，用于生产过程的控制，用于技术改造等，而且效果很显著。

新技术发展的结果，企业正在向小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从集中转向分散。前面说的《大趋势》一书的结束语中，讲到由于电脑的使用，使“金字塔”或“树型”企业结构崩溃，变成了水平式的横向结构。日本、美国的很多经济学者都提到了这个概念。今后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的趋势是，纵向的“树型”结构（如大公司、大托拉斯）将减少，而横向的网状结构要增多。在西方，过去日本小企业比较多，美国大企业比较多。现在美国的大企业也在分化、减少，小企业在增加。有一个材料说，美国的小企业在五十年代每年增加不到十万家，而现在每年要新增六十万家。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是搞小的手工业作坊，小的工厂，以后互相竞争，大鱼吃小鱼，资本集聚和集中，形成大托拉斯、跨国公司。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产生了大量专业化的小企业。最近西方很多文章论述小企业的优越性。小企业很灵活，但技术是先进的，建立在社会化基础之上的，因此富有生命力。我国也有许多小的企业，江苏就有许多县社工业，看来是有前途的。问题在于不要搞“小而全”，要调整，要改造，要采用新技术。

微型机的应用，对老企业的改造，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改造，将会起到我们想象不到的作用。我看了上海《解放日报》关于微型机应用于里弄工厂的报道，感到很高兴。上海有些落后的里弄小厂，在关键地方把电脑安上，产品质量一下就上去了。所占的地方不用扩大，有的还减少了许多，厂子的面貌很快发生根本的变化。上次我参观机械工业展览时，机械工业部的同志告诉我，由于机械加工中心这种机床的出现，整个生产线大大缩小了。一个机械加工中心，就起到一条生产线的作用。采用这个办法去改造小厂，很多陈旧的机器都可以拆掉，夹具、模具也可大大简化，这适合于搞多品种、小批量。可以很快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资消耗，提高经济效益。至于大企业的技术改造，采用微型机更应重视。这样做，也有利于逐步改善产业结构。上次国务院开会时，我就提出：我国的电子工业究竟搞什么东西？当然，大型的电子计算机，必要的也应搞一些，但重点还是

要抓微型机的使用与制造。因为：第一，技术上比较容易掌握；第二，应用后创造的价值大；第三，这样做电子工业本身也有活力了。听说上海微型机已供不应求，许多企业都去订货。无论从我国工业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看，都需要突出抓一下微型机的应用问题。

六、关于信息。信息在经济建设中，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信息系统，是我国最薄弱的环节。之所以形成这样，根本问题是我们对信息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过去我们还没有信息这个概念，不大懂得信息的作用。对信息，认为有没有，早一点、晚一点，没有多大关系。信息准确灵通，传递时间缩短，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率就会大大提高，经济决策也才能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上。信息系统的发展，会把许多产业带动起来，社会进步的速度会加快很多。所以，信息对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都有巨大的作用。英国学者班雅伦⁵在香港说：信息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关键，对中国来说，掌握信息技术，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可以快十年。他是怎么计算的，还不大清楚，也可能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是可以说明，把信息系统搞好了，四化的战略目标是能够提前实现的。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对外贸易也好，国内经济也好，都要把信息当成一个大问题抓起来，投一些资，引进一点技术，制造一些设备，训练一批人才。我们搞工厂多少个亿都花了，信息系统所需要的投资，只要下决心，适当安排，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国家这么大，发展又很不平衡，一说搞信息系统，就全国都一样的搞法，那也办不到，国家财力负担不起。我看可以先从东部地区搞起，比如在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就可以先行一步，把它搞好一些，然后逐步向内地扩展。宦乡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建议成立国际经济信息中心，怎么搞法，请对外经济贸易部提出方案；国内的信息系统怎么建立，请国家计委提出方案。

七、关于统计。统计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没有精确的统计，经济建设就难以搞好。现在我们请外国专家来咨询，来研究经济问题，首先碰到的就是提供数据的问题。我们的统计工作，虽然比某些发展中国家要好一些，但总的看来，基础很差，水平不高。有不少数据，我们还拿不出来；有些数据即使能拿出来，准确度也不高，甚至还有一些是“神仙数字”。数据如果不准确，在电子计算机里储存起来也无用，信息渠道再灵通也起

不了作用。明年我们要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计算税率，就需要许多基础数字；我们要讨论价格体系的改革，进行成本核算，也牵涉许多统计数字，否则就算不清楚。统计工作这种落后的状况，很不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我们国家要现代化，首先统计工作得现代化，统计资料要准确，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看来我们的统计工作要搞好，必须拿几年时间扎扎实实地搞基础工作，要组织一些专门人才来搞。请国家统计局就如何加强统计工作代国务院起草一个决定，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后公布。

八、关于具体作法。为了使研究深入进行，提出一些有见解的东西供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时参考，建议成立两个小组，国务院一个，上海市一个，组织专家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探讨，提出对策。研究的题目就是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边进行讨论、研究、分析，一边提出方案、建议，务必拿出成果来。国务院这个小组，由马洪、张寿⁶、朱镕基⁷、吴明瑜⁸同志负责，马洪同志牵头，吸收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上海市的那个小组，由市委研究如何组成。两个小组都面向全国。上海小组一身二任，既研究全国，又可联系上海经济区的发展加以研究。总之，要研究出一个最佳方案，使我们国家在“新的工业革命”来临的时候，能够措置得当，得到一个飞跃发展的机会。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必须重视智力开发，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教育。未来的技术革命突出地说明了智力的重要性，掌握知识的重要性。有人把它称之为“知识革命”，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企业要现代化，关键是要提高人的素质。现在引进的先进设备，就有不少我们掌握不了，如武钢一米七轧机，海上石油平台，上面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我们就不懂。下一步要发展现代化的信息系统，要普遍运用电脑等，没有相当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不行的。钱学森⁹同志说，在新的时代，生产工人的劳动技能不是主要以体力为基础的，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的，因此要求他们也是专家，也是知识分子。在就业人口中，不仅要中学水平的，而且大学毕业的也要占到几分之一，要培养大量的硕士、博士。提出这样高而广泛的智力和知识的要求，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对培养人才，教育人民，一定要作为百年大计，加以重视，积极搞好。教育的改革，应当抓紧进行。这方面请教育部提出方案。“新的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

要做的事不止在教育、科技方面，它必然涉及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事先作出决策，作好安排。“凡事预则立”。只要我们把握时机，迎头赶上，中国的经济振兴和社会繁荣是大有希望的。

注 释

1. 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1930-), 美国学者。曾任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相继出版过《大趋势》、《亚洲大趋势》、《中国大趋势》等著作，曾预测网络兴起和全球一体化，并预言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2. 托夫勒(Alvin Toffler, 1928-), 美国未来学家。曾当过工人、记者和《幸福》杂志副主编，出版过《第三次浪潮》、《权力转移》等著作，指出人类经历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正进入信息社会。

3. 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1916-2003), 美国经济史专家。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顾问、主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发展经济学先驱，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和国家战略抉择问题。

4. 宦乡(1909-1989), 贵州遵义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曾任《文汇报》副主笔，驻英国代办，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驻欧共体大使。

5. 班雅伦，英国学者。曾提出信息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关键，认为中国掌握了信息技术，现代化可以快十年实现。

6. 张寿(1930-2001), 江苏常熟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家信息中心主任。曾任中国船舶工业公司总经理，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

7. 朱镕基(1928-), 湖南长沙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后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生产办、经贸办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8. 吴明瑜(1931-), 浙江德清人。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曾任国家科委委员兼科技政策局局长，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9. 钱学森(1911-2009), 浙江杭州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协主席，著名科学家、火箭专家，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工程论先驱，获两弹一星功勋章。

分步进行价格改革 逐步理顺经济关系*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

价格如果不调到基本合理，其它改革就谈不上，实现四化也不可能。价格不合理，企业难以考核，经济效益就讲不清楚。利改税走了一大步，但仅仅是利改税还不行。我们在经济方面的根本矛盾，是工厂的经济效益太差，特别是缺乏促使企业提高效益的动力、压力和活力。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经济工作中的矛盾就不会减少，财政赤字也不会减少，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就不可能。

要使几十万个企业把经济效益搞上去，关键是两条：一要自负盈亏，二要价格基本合理。价格不合理，就很难搞自负盈亏。什么时候解决了这个问题，国民经济真正的良性循环才会出现。价格改革这一关不过不行，但也不是一次革命论。第一步先要达到大体合理，就是你们说的低水平理顺。可以设想分两步解决，准备一两年先走一步，下一步再看。现在调整物价的状况是费力很大，收效甚微。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回到五十年代的情况，把一切都统死，不讲物质利益。即使这样，也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不会再出现六十年代那样，一调整，经济情况就好转，价格就降下来。我们必须使不合理的价格现状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件事越拖，矛盾越大。想完全没有一点影响来解决价格问题，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等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以后，再解决价格问题。可否设想价格大调整一次，就让

* 这是赵紫阳听取物价问题汇报时的讲话。

人民币贬一次值。把各方面的关系适当摆平一些，工资也结合搞，随物价的上涨相应提高工资，动它一次。

企业靠自己了，就能把潜力挖出来。北京十几个试点工厂搞利改税、自负盈亏，都有很大变化，说明工厂里的潜力很大。前一段有个失策，全民所有制企业没有把同国家的关系解决好就搞包干，那是不行的。因为行业之间的利润水平不合理。要先把企业同国家的关系解决好，再让企业自负盈亏，企业效益就会有很大提高。价格不改革，就包不公平。税制改革，可能把不合理的问题合理化一步。但光搞利改税，不搞价格改革，难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的利润如何考核，孙冶方主张按资金利润率，可以研究。我们不拿出一个统一标准，就会各有各的标准。

对价格改革，一是顾虑物价上涨，但价格不改，多发票子，物价也要上涨。二是顾虑调价以后，国家财政拿不回钱来。能不能拿回来，关键看你政策怎么定。退一步说，即使调价会影响一些财政收入，但能为以后提高经济效益打开一条通道，也是划得来的，不外乎暂时影响二、三年。照现在的办法搞下去，财政没有出路，经济不能理顺，而且矛盾会越来越大。物价改革是系统地有准备地大调一两次好，还是年年动一点好？看来，年年动一些，结果是动不了，问题越积压，越严重。价格改革，第一步若能把不合理的部分解决百分之五十也好，主要调整工业品的价格，农产品价格基本不动，过几年再说。因为妨碍改革的主要是工业品价格。把农产品价格稳住，调整工业品价格，国家财政不仅不减收，还能增加一些收入。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结果，使原材料工业的利润增加一些，加工企业利润会减少，甚至只有微利。这样，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后，它就会去挖潜，过几年利润可能又增加上来。如果消费品价格上涨不多，农业继续增产，国家从农民那里拿一些回来，对农民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价格改革涉及到工业如何改革。工矿企业要从吃大锅饭变成自负盈亏，价格变动影响职工生活，可以研究采取挂钩的办法，哪一年物价变动大，那一年工资也适当调整。比如物价上涨10%，就把工资当中70元的部分增加10%，抵消物价上涨的影响。对农村就不补了。初级产品提了价，企业增收，国家同时就对企业加税，把它拿回来。改革生产资料价格，要从整个城市改革的角度来考虑。什么时候能够实行企业自负盈亏，潜力就能

挖出来，财政经济状况就有可能根本好转。城市改革，就是要使企业在一定的政策指导下实行盈亏责任制。如果价格不合理，考核企业就没有标准。所以要调整工业品价格，解决企业之间利润合理分配问题，减少畸重畸轻现象。价格的合理调整，会带来效益的提高；效益的提高，又能为价格的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价格改革，我倾向于：第一，农产品价格基本不动；第二，调整工业品的价格，解决企业自负盈亏的问题，减少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当然，价格的调整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宜零敲碎打。应该是动一次之后几年不大动，不能年年都大动。把经济理顺，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把价格理顺。价格长期背离价值，又怎么能把关系理顺呢？我们讲，提高企业素质，一说就涉及价格，涉及企业自负盈亏，权责利如何结合。要使企业在同等价格条件下，搞得好的收益就可以高，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许多事实说明，吃“你”的是一种吃法，吃“我”的又是一种吃法。这是不行的，总得创造条件改变这种办法。价格改革要为城市改革创造条件，不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就不可能。第一步是价格改革，第二步解决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今后两三年价格不改革，城市改革就要推迟。明年进一步搞利改税，后年或大后年价格改革要跟上去。搞利改税，也要考虑价格改革的因素。设计税率，要跟价格改革配套，或者搞两套税率，调价前后各用一套。经常年份还是要讲物价基本稳定，只作小调整；隔上几年，有领导地比较大幅度地调一次价。现在我们人民的生活，有很多是有补贴的。按统计数字，我国国民收入每人年平均220至250美元，外国人说实际上是500至600多美元。现在最迫切的是工业品价格的改革。不宜把调价的步子分得太细。现在价格是上升的，光议价、市价上升就不少，步子太细了，实际上调不成。所以，不宜零零碎碎地搞，例如煤炭即使每年提3元，也会有反应，但是年年动3元，得十年才能调合理。

物价调整，就是暂时影响财政几十亿元，也要调。不能光从财政上看问题，要从理顺经济关系上看问题。就是国家财政拿些钱，银行存款还可以收回一部分。

总之，大锅饭不改，神仙也没有办法。不改革，就不能前进，不能提高效益，不能提高企业的素质，企业就没有动力。价格不合理，就把四化

后腿拖住了。零星改革要和两三步的大改革相结合，第一步大改可以考虑在后年、大后年进行，或“七五”的第一年出台也行，做到低水平理顺。明年可以先小调。反正一句话，没有一点震动前进不了。调整物价，阵痛是不可避免的，暂时有影响，很快就会好起来，换来主动。不能“足将进而趑趄，口欲言而嗫嚅”¹一句话，城市必须改革；城市要改革，价格必须改革。至于哪一年搞，不是主要问题，要看承受力如何，但是思想必须明确，先内部研究，把方案搞好。

注 释

1. 见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停止生态破坏 实现良性循环*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

利用冯纪新¹、李子奇²同志在北京的机会，谈谈河西、定西的问题，主要谈河西怎样搞法。

国家每年拿出两亿元作为“三西”³建设的专项资金，十年二十亿元，在当前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要认真办成一些事。就怕把钱撒下去了，什么也落不到。有些事需要花钱，有些事不需要花钱，或者不需要花很多钱。最近看到农牧渔业部畜牧局一位同志写的一封信，已经转给你了。这位同志以前还写过信，说有了“三西”领导小组，每年两个亿，如果国务院再成立一个畜牧领导小组，又有钱了。这个思想是不现实的。“三西”是个很特殊的地方，拿点投资是为了把那个地方转变过来。李子奇同志最近经过调查研究，提出甘肃中部治穷致富的近期目标和八条措施，讲得很好。

耀邦同志最近讲了西北的战略方针，要念“草木经”，种草种树，发展牧业，调整农业的经济结构，是完全对的。实现这个方针要分步骤，要创造很多条件，要分轻重缓急。哪些项目主要靠群众办，哪些项目必须靠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要点。为解决“三西”贫困问题，他亲自到现场调研，下决心每年由中央拿出2亿元拨款，10年共2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三西”地区制止生态破坏，恢复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并成立了国务院“三西”建设领导小组主持其事，开中国扶贫工作之先河，为后来设立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国家投资办，都要实事求是，很好研究。耀邦同志在甘肃讲，有一些事主要依靠群众办。如种草就应该主要靠群众，不需要花很多钱。当然种草种树有些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有投资的，如优良草籽的培育，将来发展畜牧业的畜种改良，等等。种草也要有很多条件，如解决燃料奇缺的问题，不然种了又铲，还是长不起来。

停止生态破坏，要创造条件，要分步骤。整个甘肃的农业经济结构要改变过来，我看要几十年，甚至要半个世纪。当然是逐步改变的，怎样逐步改变过来，就要很好研究。连外国人也认为，整个西北将来应该是中国动物蛋白的资源地。在指导思想上要转过来，西北的同志要下很大功夫研究如何转化的问题。

河西不修水利，什么也搞不起来，开发河西就是一句空话。当然修水利也不一定搞新工程。河西没有水，就不能种树，没有水就什么也没有，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牛羊也没法活。定西养那么多人，我看是困难的。定西的人不转移一些出来，定西的植被也很难完全恢复。以前国务院讨论的时候，万里同志提出把定西的人基本都转出来，曾经考虑过这个意见。但是后来又考虑，这个事不简单，几百万人搬到哪里去呀？定西转出一部分人，还是要考虑的。要让他们定居，来回流动不好。河西的开发和定西植被的恢复，是个相互支持的关系。河西修水利，定西的一部分人往河西转移。没有河西的开发，单纯做定西的文章，这个文章不好做。开发河西是定西恢复植被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解决定西问题的保证。

定西究竟怎样恢复过来，甘肃要很好研究。不要求多么快，只要扎扎实实一步一步走，在改变当中，就有希望。实际上那个地方的恶性循环还在继续。所以总的方针提出来以后，这个大的战略部署如何实现，步子怎么走，互为条件的因素怎么摆法，怎么创造条件，怎么分轻重缓急，恐怕要经过两、三年的摸索，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两亿元投资用在什么地方？我看主要用在必须国家支持的地方，用在那些为实现整个战略方针创造条件的项目。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说其他项目一点也不搞，是要有重点。如果完全用在定西，恐怕有些有效果，有些不一定有效果。比如修水利，如果在河西投资修水利，逐步把定西的一部分人往河西转移，这样做合适，还是在定西修水利合适？要认真比较。

至于现在大量投资用到畜牧业上，更是不顾条件，是不现实的。现在连水都没有，草也没有，还不是无米之炊！要逐步创造条件。总的战略方针定了，不仅是甘肃，而是整个西北，总要经过一些步骤，创造很多条件，才能实现。我现在还担心，你们十年以后交个什么账？这是挤出来的两亿元投资，就怕今年这么个主意，明年那么个主意，十年以后老百姓还是老样子，人家找上门来问我们，就不好交待了。十年二十个亿，这不是个小数，国家的财政状况你们是知道的。投资用的得当，而且坚持下去，坚持多少年才能见到好处。究竟怎么用，提出个总的想法，请你们领导小组和甘肃的同志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改变面貌，宁可放的时间长一点。就怕搞了多少年，还停留在恶性循环上，还是河山依旧。什么时候说开始好转了，能听到这么个报告就放心一大半了。只要是停止了破坏，向好的方面转化，就说明我们有了一定的经验了。究竟哪些措施在当地是行之有效的，定西地区还没有找到路子。延安可以说基本上有了路子了，因为陕北有400毫米的降雨，种草种树都可以，而定西有很大面积的常年降雨只有300毫米左右。至于河西是另外一种类型。

定西为了恢复植被，畜牧业的发展速度不能要求太快。如果草还没种上，就发展畜牧业，那就会继续破坏植被。为了恢复植被，为了将来发展畜牧业，恰恰在一定时期内，在生态破坏还没有停止以前，畜牧业的发展要控制，不能急功近利。特别是发展山羊要注意。你叫他圈养，他也不会圈养，当地群众没有这个习惯。本来是为了恢复植被，为了停止破坏，如果畜牧业发展太快了，效果会恰恰相反。像走路一样，目标是往正前方走，但如何走法，有时要往西或者往东走一走才能走到正前方，直走反而过不去。不然的话，植被还没有恢复，草还没有长起来，草根还没有固定下来，三年一大旱，草就退化，风一吹，牲口一扒，就是继续破坏植被，越想发展畜牧业，越发展不起来。到一定时候，植被恢复了，草长起来了，还是要发展畜牧业的。所以，在恢复植被这个时期不要压畜牧业指标，要真正提高质量，提倡圈养，否则树长不起来，草也长不起来，植被不可能恢复。退耕还林还牧给补贴我赞成，但也不要追求数字，要有计划地逐步进行。总之一句话，像定西这样的地方，要讲条件，不能急功近利。积累了几百

年的问题，几年就想变化，恐怕不行。那个地方大的前提条件不解决，想一下跳跃过去，是很困难的。现在先抓向好的方面转化，只要旧的循环停止，新的循环开始，那就是新的、历史性的转折，这就不容易。这一段下功夫走到这一步，就有希望。现在不要求草丰、畜肥。也不要因为老天爷帮了两年忙，国家扶持了一下，有了点变化，就认为是良性循环开始了。

停止生态破坏，第一是解决燃料，第二是解决饲料，还有解决滥开荒的问题。那个地方燃料问题不解决，什么都办不成，要支持一点煤炭。我们现在搞太阳灶恐怕不行，这方面的经验不多，看表演可以。当然，最坏的地方也可以选个好点，我们三十多年上了很多当。太阳灶的维修怎么样？材料是不是有问题？成本多高？能不能引进些材料，或者同国外合作搞一些质量比较高的？这涉及到成本问题，150元搞一套，是不是就过关了？什么事不要一开始就铺得很宽。开始搞点侦察性的，或者叫试验性的，搞成了，确实看准了，真正过关了，再下决心。比如太阳灶，如果确实能代替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燃料，成本虽然高一些，但为了把那个地方恢复过来，也可以搞。就怕说是很好，到时候又不是那么回事。四川的沼气说是很好，我去看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好。我问过几家农民，比如沼气的料怎么办？各家各户都把肥料放下去搞沼气了，农村要积肥，一施肥，把各家各户沼气池里的肥料都掏干了，沼气就得停。这种事，你去参观是看不到的，如果突然去了，池子里就没有料。这里边有很多制约因素，研究沼气的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个情况。沼气有个如何运转的问题，要有两套料。我们的沼气设备、维修、材料方面的问题都不小。西北包括新疆这些地方的光照条件好，是个优势，燃料又那么缺，太阳灶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现在不要急于搞那么多。先认真地搞一些点，确实过关了，真正有了效益，然后可以下决心。我总觉得一家一户搞太阳灶，维修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它也不是个孤立的東西，还要有很多条件相配合。国外用风车很多，我们的风车也没有过关，因为都是低标准。低标准的東西买来很便宜，也可以参观，实际用起来不行。试验电炊我不反对，但靠电解决燃料不可能。如果家家买了电炊设备，没电了，还是用不上，这是可能的。我主张兰州市下决心搞煤气，否则污染太厉害。我在青岛郊区看到许多农户有土暖气，就是在灶里装个管子，连接几个暖气片，烧水烧饭时暖气也热了，不另外

烧。整个屋子的温度是不是比烧炕还要好？是不是比烧炕节约？可以研究一下这种土暖气。

河西是利用雪水，春季水少，夏季水就多，很可以研究利用雪水旺季搞控制工程。基本上是以春季的水多少来确定农业的种植面积。夏季水多，上游用不了，放到下游就盐碱化，可以控制起来扩大种草。

我们讲解决温饱，不一定就是解决吃粮问题，从广义来说就是要有生活出路，粮食可以买嘛。现在有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全国的粮食形势比较好，不要求你们一定搞多少粮食，当然总得有粮食。河西也不是修了水利只种粮食，还可以种棉花。当然，河西必须搞些粮食，因为甘肃长期运粮也不是个办法，运费太高。从长远来讲，定西要做到粮食自给，很不容易。

定西修水利比较困难，但淤坝地（或叫沟坝地）要花点钱。我看那里沟坝地的产量还是比较稳定的。沟坝地优于梯田，可以蓄水、保墒，土壤也肥，还可以保持水土。有了沟坝地，从上到下就可以退耕。如果封山，有300毫米左右的雨，草也可以长起来。过去学大寨搞了很多梯田，有成功的，很多是不成功的。小流域治理包干到户，是个成功的经验。定西的沟坝地资源有多少？每人能不能搞到两三分沟坝地？

只要提高水费，节水办法就出来了。河西搞滴灌，种棉花等经济作物和葡萄、果树，搞家庭果园。滴灌省水，省水就可以扩大灌溉面积。

现在城市没牛肉吃，新疆的牛又卖不出去，原因是卖牛肉要倒挂。我在四川提倡养山羊，山羊养起来了，没有销路。四川人不喜欢吃羊肉，又运不出去。

家庭农场不要一下子搞那么多，将来是可以的。将来会出现自己有拖拉机的农户。黑龙江有了一批家庭农场，贷款买拖拉机，开荒几百亩、上千亩，种一季小麦，康拜因收割，一年就把农业机械的投资收回来了。

定西农村的计划生育不大好搞，究竟搞个什么要求合适？如果是提倡一胎，不超过二胎，这样可能在当地得到多数人的拥护，计划生育才能在那个地方真正开展起来。

李子奇同志提出，中部地区条件千差万别，采取各种措施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同类型的地区应当有不同的办法，突出自己的重点，不搞“一刀切”，不可一哄而上。这些意见，是很好的。鉴于

我们多年来的教训，就是要强调实际效果。提出的口号和要求都要实事求是。最重要的是努力迎接恶性循环的停止、良性循环的开始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性转折的到来。实现耀邦同志提出的改变西北面貌的战略方针，有个步骤问题，创造条件的问题，条件相互转化的问题。政策和步骤都要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

我很赞成林乎加同志刚才汇报的意见。你们开的会，我也没什么意见。要不断地检查效益，找出合适的路子来。周总理生前就很关心这个问题的。今后的路子靠你们走了，办法靠你们去总结。一开始不要急，只要路子对头，就会形成一种发展的形势。不要勉强去办那些办不到的事。

我再表示一下，我很担心这件事。现在国家拿出两亿元投资，解决这三块地方的问题，有些同志不理解，有意见，说清楚因为那里是最困难的地方，也就没有意见了。如果十年以后还不见效，那时候意见就大了。不要求你们一定达到多高水平，要求高不一定效果就好。动机好也不一定效果就好。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可多啦。

注 释

1. 冯纪新(1915-2005)，安徽金寨人。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农委主任，江苏省副省长，八机部副部长，甘肃省省长，中顾委委员。

2. 李子奇(1923-2014)，陕西神木人。时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曾任甘肃白银市委书记，省轻工厅厅长，省委书记，省顾委主任。

3. “三西”地区，指甘肃省河西地区、定西中部干旱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这三个特别贫困地区。

二汽要在改革开放和提高效益中走在前列*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这次到二汽，想多听听你们汇报，多讨论一些问题。如技术进步、技贸结合、联营公司以及你们的一些设想。

技贸结合，问题很大。一方面进口的东西很多，重复引进；一方面外贸亏损很大。看来要行政干预，要搞个专门小组来处理这个问题。今年进口钢材 800 多万吨，但与引进技术没有结合，需要技术时还要另外花钱引进。

你们二汽的能力很大，吃不太饱，主要是差材料，能不能按国家比价，你们向国家买外汇进口材料，那你们的生产就可不受限制。（黄正夏¹：姚依林副总理来二汽视察时，也是这个主张，并提出二汽应有独立的外贸自主权。我们计算过，二汽可以按国家规定的 2.8 元人民币折价换 1 美元，进行外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在引进技术上，欧洲开明些。过去也翘尾巴，现在市场不景气，只要你买他的东西，即可让技术，要抓紧时机。邮电部技术改造，原来有些关键东西想自己干，现在也确定引进，这样水平会高些，上得也会更快一些。

你们是全国的几个试点企业之一，工资改革的办法也可以不变嘛。例如实行岗位津贴、职务工资、对职工升级晋升及处置权等等。总之，要按劳分配、奖惩严明。

* 这是赵紫阳考察二汽时的谈话要点。

铸造二厂长桥自动线是仿造的还是自己设计的？（张广瑜厂长答：完全是自己设计的。）自己能设计这样的自动线很好。

三线建设都是采用老厂包新厂的办法，这是三线建设的方针。这个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定了的。四川的三线工厂都是老厂包建的。三线建设一线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他们把工程技术人员、“好枪好马”都调到了三线建设。（饶斌：没有一线的支援，三线建设搞不好）。

“文化大革命”中，批“洋奴哲学”。批是批，进口设备还是进。三线工厂的不少关键设备大都是进口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买专利，实际上也是为了进口设备。

当然，“文化大革命”是要否定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建设成就是不能完全否定的，比如讲成昆铁路、攀钢，那么多化肥厂等都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对建设是有干扰的，干扰大一点的单位，建设成就少一些，干扰小一些的单位，建设成就大一些。总之，“文化大革命”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建设成就不能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建设是成功的，你们二汽就是成功的一个例子。

一汽从动工建设到投产一共是几年？（饶斌：一汽从施工到投产共是三年，如果把设计和生产准备的三年加上，一共是六年）。

那么，你们这里的建设周期就长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恐怕是受了一九七〇年全国计划会议的影响。那次计划会议，全国树立了两个“典型”，一个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树你们二汽的干打垒，“四边建厂”；另一个典型是上海的马天水。这两个“典型”对全国的影响很坏，对三线建设的干扰很大，你们二汽恐怕就受了这次会议的影响。（黄知真²：二汽恢复名誉，是在1979年初汽车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后。）

目前一般机械工业产品，总装的利润太高，零配件的利润太低。产品滞销时搞联合容易，产品紧俏时搞联合就不容易，这个矛盾你们是怎么解决的？你们是不是把利润有意让点给协作厂？我考虑，开展协作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总装方面的问题，对协作件的质量不放心；二是协作厂方面的问题，协作产品重复纳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协作厂总是想自己装车，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也是一大障碍。现在全国有七十多个汽车厂，汽车还是供不应求，叫做厂多，批量小，浪费大，经济效益低。现在

都说联合好，都赞成联合，但都要以我为核心。过去是卖方市场，不是买方市场，所以很难联合起来。这在我们国家还是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你这里却有 100 多个单位，这是个很大的联合。

你们二汽是在困难中逼出来的，所以你们的服务态度好些。但是，现在机械工业有个很大的问题，一到倒霉时，服务态度就好；产品紧俏时，服务态度就不好。服务好能坚持下去就不错了，我们由于体制没有改革，还可能走回头路。这几年，凡是发展快的企业，凡是成绩大的企业，都是过去产品销路不好的企业。有的企业形势一好很快旧病复发。现在机械工业的服务态度比以前好些了。我同周建南³同志说过，机械工业要特别注意，很可能旧病复发。我们机械工业过去长期供不应求，就免不了粗制滥造。我看各种产品只有供稍过于求，才能促进进步。现在的问题是供不应求，“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所以服务态度不好。但是，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依靠体制改革。三年之内很难解决。你们在困难中求生存，为了求生存想出了好多办法，牌子一响，（黄知真：他们现在牌子就很响。）产品又俏，不但不能进步，还可能倒退，服务态度就可能不好。整个机械工业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提醒你们及早注意，我今天讲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这个目的。机械工业还有一个老毛病，东西好坏不听用户意见。我同周建南同志讲，评价你们机械工业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用户，用户说好就是好，用户说不好就是不好。不能由制造部门自己说。在我国内，这个问题还可以争，在国外争就没用，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人家就是不买你的。始终要以用户为标准，首先承认东西不好，这样才能进步。其他部门如纺织工业部，也有这样的问题，总认为自己的产品好，不听用户的意见。这与供不应求有关，与独家生意有关。过去我们不大懂，这个问题为什么老解决不了，经过这次工业调整，我们懂了，整个工业一九八一年后有了好转，现在情况又有了变化。根本问题是解决体制问题，从领导上来讲，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你们的材料我都看过了。欧洲的工业很萧条，他们就缩小产量，组织力量搞攻关，搞技术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在一次经济危机之后，都要出现新技术，不然不能生存。所以很注重开发新产品，搞新技术。美国虽然失业很多，但在产品开发方面，工程技术人员没有失业的，他们总是把

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搞产品开发。我在富拉尔基参观一重时，就向他们说，你们停产时期没事干，你们可以搞技术改造，光是找饭吃不行。为什么不去改造、开发新产品，应该把力量组织起来搞改造、开发新产品，迎接新的好转嘛。当然，国家计划也有问题，国家无计划，他们不知道找出路。过去，对新产品开发的位子摆得很不够，研究也很不够。当然，体制上也有问题。总起来讲是两个问题：第一是认识问题，第二是体制和政策问题。一台汽车有的能跑10万公里，有的能跑20万公里，这个差距很大，所以，产值很不可靠，他反映不了质量，反映不了经济效益。我们长期以来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不讲效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的超英赶美，也是指数量而言的。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确实不行。

你们这里后方厂能不能搞？与国外合作搞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目的不是为了节约劳动力，而是为了提高质量。加工中心，特别对改造一些老厂，改造城市也是适应的。两个加工中心配起来可以代替一条生产线，有的一个加工中心就可以代替一条生产线。上海用微型机改造里弄小厂起了很大的作用。加工中心不仅大厂起作用，而且对老厂、对小厂都起作用。

大一点吨位的汽车很需要。不过柴油现在很缺（饶斌：这与国家的油料政策有关系。）如果多炼了柴油，会缺少什么油？（孟少农⁴：主要是烧重油，特别是烧原油多了。）

当然要少烧重油，不过不烧重油，燃料就成问题。中国为什么烧重油？因为燃料困难，以油代煤，把节省的煤换取外汇，每年都是三四百亿美元。这些外汇用来开发煤炭工业。如果多生产了柴油，就少了汽油。而柴油价格低了，炼油厂不愿意干；但要把柴油价格提高，农民又不干。我讲这个问题，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要你们注意农用柴油有增加的趋势。按道理讲，用轻型柴油汽车代替拖拉机搞运输较好，但很难改变。因为拖拉机既可耕地，又可搞运输，你的汽车只能搞运输，不能耕地。农民很难搞两套投资，又买拖拉机，又买汽车，农民搞不起。（孟少农：将来汽车价格低了会改变这个局面）。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韩丁夫妇，但至今没有解决。（黄知真：主要是农民只能买一样，不能买两样。）还有个农村道路问题，汽车下不了公路。

为什么中国汽车运输发展不起来？外国铁路萧条，中国的铁路很拥

挤，这是为什么？中国汽车运输发展不起来，一个是铁路运费低，二是公路质量差，汽车吨位太低。中国的汽油价格还是便宜的，如果按国际油价一提高，汽车厂都要垮台。为什么公路运输车辆不多，航运也不行，利用率也很低。武钢专门修了个码头搞煤运输，他不用码头要用铁路。这样势必加重铁路的负担。国务院下文件100公里内不准用火车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汽车吨位小，公路质量太差，都是汽车发展不起来的原因。按照中国的情况，汽车根本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要发展汽车运输，减轻铁路压力。但要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公路运输发展不起来的情况。

外国对我们中国感兴趣的是两条：一条是劳动力，一条是市场；我们对外国感兴趣的也是两条：一条是技术，一条是资金。这就叫取长补短，互相利用。我们的目的是要技术，对我们需要的产品，可以合资，可以让些市场，特别是对欧洲。凡是我们需要进口的，确实是先进的技术，我们可以让一点市场，这是我们最大的王牌，他们真正愿意让技术、让资金，我们就可以让一部分市场，当然要货比三家。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是市场。我们也准备让出一部分市场，特别是对欧洲那些国家，这个方针已经定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和中国合资，外国人认为造价低，劳动力便宜。但是一干起来，往往不是这样，达不到国外的要求。因为中国的管理水平差，尽管有便宜的劳动力，最后算起账来，还不如国外昂贵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生产不出价格低的产品，所以外国人往往不愿意和中国合资，如果能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欧洲愿意干，他们是为了与日本、美国竞争。合营企业，除了你们说的，还有这么两条。

日本，有人说它是“经济动物”。不和中国搞合营，这是日本的国策，它是不会轻易把技术和资金转让给中国的。将来真正能拿到技术的，恐怕是欧洲，还有美国。欧洲可以，但是东西贵一些。美国想拉中国，怕我们靠到苏联一边去。日本那么需要煤炭，他也不和中国合营开发煤田。只要外国确实让技术，我们可以让点市场，这也是我们的国策。外国最不愿意干的是补偿贸易，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个市场问题。

你们算经营好的，整个机械工业的效益是很糟糕的。你们这里效益不错，但机械工业总的说来是不行的。饶斌同志你是前任部长，你也在这里，当然不是怪你。（饶斌：我有责任。）责任不在机械工业部门领导，要对我

们的现状有正确的认识。国外办企业，一般利润都是18%左右。外国银行贷款10%的利息有人敢借，中国只有7%的利息没有人敢借。我们落后的技术，落后的管理，经济效益低，是中国工业的特点。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你们算是先锋。什么叫现代化？光在数量上翻两番，不算是现代化。翻两番只是个奋斗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我们对现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现状就是落后。外国办企业很讲利润，科威特和南京合营一个企业，提出要保证他25%的利润，我们一算，中国不但得不到利润，还要补贴。中国人办企业，就是不讲利润。我讲这个话，是要所有搞工业的同志知道我们落后。这个问题不解决，财政上不去。一个管理，一个技术，一个工人素质，还有政策体制。到今天，搞工业的同志不知道工人的文化水平和企业效益的关系。今天我们工人的文化程度，恐怕平均只有五、六年，也就是小学水平。管理素质差，技术素质差，工人文化水平低，是企业必须解决的。再一个，中国有的人就是有奴隶主义，与外国人合作就认真，给自己搞就不认真。外国人订货的产品，就认真搞。同样一个产品，说是给国内搞的，就不认真，这不叫做“以夷制华”吗？对外国人承包的项目，中国人认真；军工产品认真，因为怕军法从事，援外项目认真，因为怕打屁股。中国人给中国人搞就不认真，这个部给那个部搞也不认真。还有一个样品是好的，小批量也可以，大批量就不行了，第一批产品是好的，第二批就不行了。

68吨汽车第一批五台不错，第二批就不能用。我问他们为什么？是什么道理？他们说：都是这样。这说明中国人的技术、管理并不是不行，就是不认真。给外国人办事精心，给中国人就马马虎虎，很多不是本事问题，而是不认真，不严格。我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过多次，我们现在进口的一些国外最好的设备，都不能发挥最好的效益。石油工业部的企业管理算好的，但他们进口了一台很好的船台，使用了两年，还有些资料未翻译过来。有一次，我到这个船台上去看，看到船台上有个救生艇似的东西，我感到很新鲜，提出要坐一坐，我倒不是有意要考他们。可是管这个艇钥匙的人却半天才找到。找到后，他却将钥匙从顶上往下边扔，这多危险，要是掉到海里怎么办？这说明我们的管理不行。还有，你们可能听说了吧，北京建国饭店工人工资很高，开始很多人想去，现在不少人想退出来。为

什么？因为工作很紧张，感到很累，不自由。有的说，宁可到北京饭店拿低工资，不愿到建国饭店拿高工资。工厂的严格管理问题很重要，为什么效益低，一个是管理问题，管理上马马虎虎；一个是劳动纪律问题。现在规定工厂的厂长有开除权，一个厂一年开除几个人，我看有好处。我讲工业，总是讲工业落后，这是事实，不讲不行，不这样讲，搞不好现代化。

对二汽利润递增包干延长时间，我是赞成的。这个问题可向国家报个计划，搞什么项目，经过中汽公司、机械工业部，报国家财政部审批。首钢开始时递增率6%是勇敢的，现在提高到7.2%，是想继续搞包干。去年听说你们二汽也要搞。我没有什么意见，现在延续几年，我原则上也赞成。是不是也要学习首钢，提高一点，可能容易通过一些。如果财政部没有大意见，我没有意见。这个想法，是为了好通过一些，并不是为了多要你们加1%。当然，这样企业的压力要大一些。

我说，企业要有压力，可能压垮一部分，只有有压力，才能变为动力，企业才能进步。

我赞成把二汽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既然张劲夫同志、宋平同志等都批了意见，表示同意了，应当列上。要看到外国汽车运输大量发展。我们国家汽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必须发展汽车。同样铁路也不多。印度有6万公里，苏联有18万公里，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时只有1.8万公里，有8000公里是日本人干的，现在是5万公里。三线办工厂，要修铁路，办学校，建医院，你这里办工厂，也办社会，办城市，也要建铁路，不办不行。现在搞建设，主要是受到交通、能源的制约。资本主义国家是先办学校，再办铁路，再办工厂。

你们应当比翻两番还要多一点。翻两番，既要从数量概念上说，也要从质量上说。一台汽车跑10万公里和跑20万公里相比，从使用价值上说就翻了一番。

汽车出口前途怎么样？我想，你们一是可以出口汽车，二是可以用人民币按照1比2.8比价买外汇，然后进口材料，这样你们的汽车生产可以不受限制。还可考虑一下另外一种方法，你们同钢厂商议，用外汇进口一些矿石，让钢铁厂加工，让他们供给你材料，这样可能比进口钢材便宜，武钢的一米七就缺少优质矿石。你们可以同钢铁厂签订协议，让他们加工，

成品材料归你们。这也叫来料加工。来料加工是好事，但如果全国都大量搞来料加工就非出问题不可。我们有些体制改革是非驴非马，漏洞百出，变成了地方加工。比如广东糖厂亏损就是搞来料加工搞的。农民把甘蔗拿到糖厂去加工，糖都叫农民拿走了。这样国家不控制怎么行？我们国家要搞产品税，只要是生产同一种产品，就缴纳同一种产品税。这样就可限制重复生产，对大批量生产、经营好的企业没影响，差的自然就存在不下去。这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企业实行利改税，是一把钥匙，可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比方上海手表销售价是80元，成本是12元，假使征收产品税60元，除去成本12元，还可得到8元钱的利润，小的表厂就发展不起来。汽车也是这样，一辆汽车征收3000元税，小厂就搞不了。同类产品谁有优势，谁就发展，谁劣势，谁就垮台，这是结果，要这样做也要两年，但可缓期执行。现在国家是国家，企业是企业，机械部不代表国家，冶金部也不代表国家，唯一代表国家的是财政部。工资也要改革，将来国家可只包到厂，不包到人，确定工资总额，超过了要收税。我抓改革从四川开始，今年是第五年了，算明白了一个道理，企业与农村不一样，复杂得多。要划清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不划清楚，改来改去，还是改在财政部身上，这个关系划清了，不会存在厂长和工人一起向国家争利，各部同工厂一起向国家争利，这样，可以促进企业内部的改革。当然，有许多企业，像你们这样的企业，可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效益。但有很多企业不是这样。根本解决办法要靠改革。实行利改税，特别是实行产品税，全国的企业可能垮掉三分之一。但是这也有好处，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活力。有淘汰，才有进步。外国厕所都安电话，为什么？因为讲究效益。中国工业的发展光靠觉悟、光靠党性不行，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正如你们所说的，叫做“背水一战”。企业一包就行，说明有潜力。谁先进谁好，谁落后谁就不行。城市改革和农村不同，首先要解决企业对国家吃大锅饭，然后解决企业内部吃大锅饭。将来普遍实行中央这一套，有的企业就只好混了，但企业的权力大了，创造效益的能力也大了。目前的利改税是过渡办法。（刘西尧：钟表如果征收60元产品税，我们四川的钟表厂都只有关门。）这个数字，我是随便说的，只是举例说明一个道理。税率、税制要研究，改产品税以外，还要适当收点调节税，是为了给效益差的企

业调节调节，把好的企业的利润调剂点给差的企业，这是过渡性质的。

你们的报告我看了。对来华的外国专家，要体谅他们的处境，不知是不是你们的报告中写的。（黄正夏：报告中有一条建议，最好通过他们的公司请他们来。）外国人来华回去后，都要向情报机关汇报，泄露了机密老板要辞退他。你要问外国人一个什么技术问题，他们一般不作正面回答，只是摇头或点头，摇头表示不对，点头表示对，不表态表示不行。他们怕回去丢了饭碗，我们要理解，要保护他们。路费问题已经解决了，国务院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就这个问题，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了一个文件，我为这个事专门开了一次国务院会议。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这个小组。外国人来华，有些可以给报酬，有的还可以给重金。

我有一个讲话，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在这个讲话中，我说了外国人说中国职工的文化水平要达到12年，也就是中专或高中水平。钱学森认为，美国职工将来要达到大学水平，否则不能搞信息社会。我们要达到中专水平，光靠国家教育不行，要靠企业自己办。你们这样的企业，哪一年要求干部达到大学水平、职工达到中专水平，要有个计划，有个目标。这个问题不解决，四个现代化是不行的。有些外国进口设备，把外文译成中文写成条子贴在上面，有时贴的条子脱落了，就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就用不成。有一次，一个船台突然全部停电，找不出原因。后来一查，就是因为一个电工戳错了部位。有些岗位，可以搞大学生来操作，搞岗位津贴，不然的话，损失太大。职务工资制未实行前，可以先搞岗位津贴进行过渡。职工培训，在厂里来讲是头等大事，不能光搞物。现在比较重视物，还没有认识到人，人和物相比，人是头等大事。要对职工进行考试，考试不及格的要从岗位上拿下来，考试好的上岗位。重要岗位要搞岗位津贴。职工培训提出来很久了，但是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

联合是个大问题，企业有联合要求，主要障碍是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不同意。搞联合要注意质量，有些关键零部件可以搞点进口。外国人讲，你们导弹都可以搞，为什么民用产品上不去？卫星都可以上天，为什么焊接和密封问题就解决不了？有些零部件国内解决不了的，可以买外国的，我赞成。你（指黄正夏）的看法，联营能否天长日久地发展下去？你们愿意这样长久地干下去嘛。（黄正夏：我们愿意长久干下去，但在目前，还存

在不少体制方面的问题。)黄正夏同志,你现在有这个想法,可能干下去,但以后别的领导有没有这个想法?恐怕很难说。我想,可不可以在联营厂利润提高的基础上,再分点利润给你们?当然,要想取之,必先予之。你们应当把联营厂抓得紧紧的,让他们离不开你们,从长远利益看,使他们有利可图。千万不能搞“小而全”,要专业化,一搞专业化就真正联合起来了,“小而全”就联合不起来。

外国的高速公路和汽车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汽车载量小,公路质量差,运输效益低,所以汽车运输发展不起来。体制不改,价格不变,汽车运输很难发展。我们的价格是违背资金利润率的规律的。最近国务院开了一个会,城市改革,要么在一个行业里改,要么全国一起改。如果价格改革分三步走的话,这个五年计划的末尾,或者下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中国价格将有一次大的改革。价格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要改变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价格,这两个不变,中国改革不可能实现。不改不行,否则,就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通过价格改革,来提高企业素质。提高企业素质,没有压力不行。改革的结果,总是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先哭后笑,最后笑的多。

技贸结合,我向来是赞成的。冶金部一年进口850万吨钢材,如果搞技贸结合,就可以不进口那么多钢材,就可以节约外汇,还可换到很多新技术。

我再讲三条意见。

第一条,我认为二汽的工作搞得是好的。二汽建设过程虽有“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也有教训,但总的来说建设是成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二汽有很大的变化。在全国来讲,二汽是一个很活跃的企业,有很多好的经验。新产品开发、联合、重视技术力量、班组建设,还有对外开放等方面,都是好的。二汽虽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设起来的,总的来讲是成功的。经营也好,有很大成绩。我送你们四句话:“解放思想,振作精神,不断革新,年年向上。”希望你们今后本着这个精神继续发展。

第二条,饶斌同志和你们讲的许多设想,我是同意的,包括改革运输结构不合理,都是正确的。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汽车运输应当加强,要搞大批量生产,发展多品种,搞新车型,这些设想都很好。关于联合问题、同国外合作问题的设想,也是好的。看来汽车工业和整个机械工业一样,

总的来讲素质差。像二汽这样的厂子(包括一汽)应当瞄准国外的一个企业来比,或某种产品来比,要有一个对手。要承认自己技术落后,管理落后,文化落后。在国内自己与自己比,与同行比,也是落后的,部颁标准就是落后的。现在我们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总而言之,世界上面临着新的工业革命。这将是飞跃,这个飞跃可能出在本世纪末,也可能出在下世纪初。对我们来讲,一是机会,二是挑战。十年内乱我们错过了,今天面临着新的挑战,搞得好,可能同世界先进水平距离缩小;搞得不好,差距还可能更大。我们要力争搞好的前途,尤其是微电子技术、加工中心等这类工业,要注意抓紧。当然,我们要进步,首先还是要抓管理,管理落后,即使有先进的技术也不行,要搞管理现代化、技术现代化、人才现代化。一定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首先要有危机感,承认自己真正落后。不能光同国内比,实际国内是落后的水平,光同国内比你们就可能会骄傲一番。要知道,我们和其他国家同在一个地球上,现在国外技术突飞猛进,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跟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走。今后几十年中国进步要加快,我们可以从中间插进去,迎头赶上去。职工队伍,一是文化水平,二是劳动纪律。我们的劳动纪律不如过去。文化水平上不去,工人阶级素质下降,必须抓紧培训。这些问题完全靠国家办学不行,企业要自己搞。技术人员也有个知识老化、知识更新的问题。听说你们对这个问题抓得不错,一定要很好地抓下去。

第三,我同意你们厂包干延长到一九九〇年。具体怎么搞法,还要和经委、财政部研究。

国外资本家办工厂,没有什么基建阶段,总是干一部分,投产一部分,力争很快收回资金。国外建设还有一个特点,投资都是找银行贷款,要支付很高的利息。生产的利润总要大大高于银行的利息,否则,资本家不干。中国过去基建投资不计利息,所以总想多要投资,投产也慢。外国还十分注意投入、产出。早投入,一定要早产出。订设备,也要讲效益,使它充分运行起来。有的先建后方,后建前方,早发挥效益;有的先装配,先出成品,以后慢慢用盈利来建设、扩充,进展都是很快的。

(饶斌同志说,技贸结合提了很久,现在是可以解决组织问题了,我给你写了个文字材料,请总理批。)

我先看看，技贸结合我是赞成的，我到机场看报告，批了后由秘书用电话传给你。

注 释

1. 黄正夏(1921-2009)，湖北襄阳人。时任二汽党委书记、湖北省十堰市委书记、市长。曾任湖北省沙市市委书记，国家科委局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 黄知真(1920-1993)，江西横峰人。时任湖北省省长。曾任江西上饶专署专员，江西省委副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3. 周建南(1917-1995)，江苏宜兴人。时任机械部部长。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4. 孟少农(1915-1988)，湖南桃源人。时任二汽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曾任一汽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东风汽车联营公司副董事长，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开创者。

关于汽车工业实行技贸结合的批语*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饶斌¹同志提出汽车工业实行技贸结合，利用汽车进口引进技术，或引进技术结合进口汽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它如机械工业、冶金工业也应利用进口成套设备和大量钢材，以此作为一张“王牌”，与外商谈判引进技术。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请劲夫同志主持，召集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待我回京后，国务院开会听取汇报确定。

二、在国际市场中，有几种主要商品，如钢材、化肥、核电成套设备等，中国已经成为大主顾，而西方又苦于没有市场，他们为了向中国出口商品，是可能转让一些新技术给我国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技贸分离，部门之间各搞各的，进口商品不管引进技术，因而未能利用大量进口的有利条件引进一些新技术。这种傻事我们过去干得不少。我多次讲过，应把技贸结合、进出结合作为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考虑以冶金、汽车行业作为突破口，先行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广。

三、关于技贸结合的具体组织形式，比较彻底的办法是在对外经贸部领导下，把钢材、汽车的进出口业务统一起来，由冶金部和汽车公司负责，经贸部可代理业务。目前如实行起来还有困难，作为过渡形式，也可以采取饶斌同志建议的办法。冶金部亦可仿此办理。

* 这是赵紫阳就饶斌关于汽车工业实行技贸结合的建议写给张劲夫、陈慕华、吕东并姚依林和田纪云的批语。

四、经委要建立一个组织，专门抓技贸结合。应明确规定：今后凡是大批进口设备、材料或其它主要商品，必须同时考虑引进技术，进货单位和部门不得各行其事。

五、陈云同志讲，外贸要略加改良。上述改进办法，就属这类性质。以上意见，请酌处。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注 释

1. 饶斌(1913-1987)，吉林市人。时任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董事长。曾任哈尔滨市市长，一汽厂长，一机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二汽厂长，一机部部长。

发挥福建优势 办好经济特区*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四日

一、对福建工作的看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的工作有很大的起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今天主要讲的是经济建设，政治等其他方面就不多讲了。这几年，就从经济工作、经济建设来讲，福建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四年来工农业生产年递增速度为 8.6%，高于全国 7.3% 的水平，工业、农业的情况都是好的。这说明中央确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以及对广东、福建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正确的，取得了成效。特别要指出的是，福建省委、省政府比较注意集中财力、物力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非常好的。你们不是把资金、物力首先拿去搞一般性的加工工业，搞重复建设，而是搞基础设施，搞一些关键性的工程，如你们讲的十大工程等，这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然，估计重复建设的问题你们也不会一点都没有，但比较重视搞基础设施，这也是福建要发挥自己优势的前提条件。福建有很多有利条件，地处沿海，又是侨乡，但过去建设落后，基础设施差，进不来，出不去，有利条件就不能发挥，很多可能性如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对外交流等，不能充分加以利用。过去由于处在一线，特别是面对台湾，有军事情况，这方面的建设也不可能摆到议事日程上。现在台湾海峡的形

* 这是赵紫阳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汇报时的讲话。

势和世界的形势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们的认识也有变化，福建省委、省政府及时把基础设施的建设摆到日程上来，我认为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你们比有些省抓得好一些。

顺便提到，你们在汇报中讲，四年来福建同台湾的差距扩大了，原来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相差五倍和七倍，现在分别拉大到七倍和十倍。你们引用这个数字来说明，四年来福建与台湾经济建设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是扩大了。我看这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科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台湾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经济并不那么好，而福建经济增长率并不低。据了解，近四年台湾的总产值的增长率逐年下降，从一九七九年的增长 8.08%，下降到一九八二年的增长 3.76%，四年平均增长才 5.86%，低于福建的增长率，怎么能说差距扩大了？再说，你们汇报中讲了，福建这几年以很大的力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并不能马上表现为经济的增长速度，它是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只讲国民生产总值，它就表现不出来。另外，台湾的国民收入究竟增加多少可供分配的？跨国公司拿走了多少？这些都不清楚，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所以，我认为这样比较不一定确切，不一定科学，而且对提高福建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信心也不一定有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了四年，做了这么多工作，同台湾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三倍，这样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认为没希望了，一是产生急性病。我主要是认为这样讲不确切、不科学，也没有好处。

再说，你们说的福建和台湾过去相差七倍，这个数字严格说来也是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的，不宜公开引用。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用一些数字同国外比，从一个侧面反映某种趋势。但必须看到，中国和境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照一些国家的统计，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折成美元只有 280 美元，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人均 280 美元能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呢？外国专家估计我国的国民收入大概在人均 500 美元左右。外面和我们的统计口径不一样，价格因素很大。当然，作为我们自己说，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有不少失误，今天在经济上还是个落后的国家，要看到这个差距。作为研究问题，可以这样比那样比，但是引用要注意，宣传更要注意。要准确，要实事求是。这是顺便说的。

总的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工作的成绩很大，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比较快，抓基础设施有很大成绩，这是我的第一点印象。

二、发挥福建优势的问题

耀邦同志去年十一月来福建视察时说：“希望福建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头。”这是中央和全国人民对福建的期望和鼓励，福建应当经过长期的努力，长期的工作来实现这个目标。

我认为，耀邦同志的这句话，最主要的是告诉福建的同志，要在今后建设中更好地去发挥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去进行建设，从而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你们汇报提纲中说：“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我们进行研究，认为一切要从福建的实际出发，才能把福建的事情办好。”这句话讲得很好。福建的经济建设要加快，要搞好，就要更好地研究福建的实际，从福建的特点出发，发挥优势，改变或避免不利条件。福建这几年总的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以很大的努力，继续这样做。

讲发挥优势，也不是要齐头并进，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轻重缓急，要有步骤。不仅福建应该这样，全国也是这样。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财政、物资都比较困难，首先要考虑怎么搞法，才能使经济效益更好。这就要求区分轻重缓急，要有重点、分步骤地进行开发、发展，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前进。

福建有许多优势，你们在汇报中也作了分析。比如地处沿海，山多水多，是著名侨乡，对外通商早，联系较多等。这些优势，有一些现在就有条件发挥，有的将来才有条件发挥。这次来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沿海这个优势。福建省有五百多万华侨在外，同海外经济技术联系比较方便，渠道多，信息比较灵通。现在我们国家要考虑发挥整个沿海地区的作用。沿海地区总的来说交通比较便利，即使要搞基础设施也不是太困难，搞个港口就可以走出去。世界上海岛国家发展比较快，就是这个原因。福建不是海岛，而是沿海，三千多公里海岸线，别的沿海地区有的条件福建大体都有。有些条件，如华侨多这一点，有的沿海地区没有，福建却有。因此福建应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引

进技术、引进资金，搞消耗能源少、技术密集的轻型加工业。我认为这就是福建的优势，不这样搞不行。我们沿途看到几种产品，觉得很好。如三明的微型电机、厦门的电容器元件、福州的微处理机，还有一些社队企业的产品。要好好地总结经验，不断发展。这样渠道会越来越多，规模会越来越大。从这些地方的情况看，引进技术、资金的项目不一定一下搞得很大，要以中小企业为主，是专业化的，但技术是先进的，产品质优价廉、款式新颖。主要是引进技术，包括引进部分关键设备，有些国内不能解决的原料也可从国外进口一部分。

沿海地区如何发挥优势，要考虑如何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同志们都知道，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世界上有相当一批国家和地区，是靠装配加工出口发家的。台湾、新加坡、南朝鲜、香港等就是趁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处于经济繁荣时期，利用自己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劳动力便宜的条件，从发达国家转移部分原料、部件来加工出口，使自己的经济得到很快发展。这一情况延续了十几年。现在这个条件不如那时了，因为西方世界经济萧条、衰退。据宦乡等同志研究，从十至十五年的长期看，西方经济不可能再出现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那样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而是将在低速增长、基本停滞、结构失调和周期频仍中渡过。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有些人说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由于新技术的采用，生产力将会有一个大发展，但近期不可能出现。在沿海地区，加工出口不是根本不能搞了，但要像新加坡、台湾、南朝鲜、香港那样，依靠加工出口使自己经济起飞，这条路走不通了。因为国际市场发生了变化。不过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经验，继续搞一些。

这里要指出的是，我们和他们不同，我们还有很大的国内市场。沿海地区引进先进技术搞轻型加工，包括机械、电子、食品、耐用消费品等，只要品种多样、款式新颖、质量优良、成本低廉，国内就会有市场。如泉州的涤纶花，如在国内销售会有很大市场，客商可以赚更多的钱，他就不会吵着要走了。现在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引进技术、原料需要外汇，有个外汇平衡的问题。在目前国际市场竞争剧烈，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沿海地区引进技术、进口原料生产的产品都要到国际市场回销，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走晚了一步，人家这样搞的时候，我们还在搞“文化

大革命”，等我们看到这是个出路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又进入一个滞胀时期。所以，我们在向外开拓市场的同时，也要研究如何利用国内市场。唯一的问题就是外汇平衡。福建要研究这个问题，国家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发挥沿海引进技术、资金的优势，生产出好的产品，一部分外销，一部分在国内市场销售。我们国家还有相当大一部分要依靠进口的商品，如能在沿海生产，就不必进口了，这部分商品的外汇平衡不会发生问题；有问题的是一部分国家并不进口而国内市场需要的商品，要引进技术、进口原料加工在国内销售，就有个外汇平衡的问题。我们应当研究采取多种途径来解决外汇平衡，不是简单地依靠加工出口、扩大外贸来解决，只有这样沿海地区的经济才能活起来。对外贸易是取得外汇的重要途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单靠贸易来解决外汇平衡，目前困难比较大。这几年外贸发展，但亏损很严重，国内抬价收购，到国外降价出售，财政负担不起。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我们赚取外汇的途径还很多，有比单纯贸易外汇还合算的，如旅游、劳务出口，还有侨汇，利用国际优惠贷款等。在你们这里，侨汇问题要认真考虑。现在侨汇实际是下降了，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争取侨汇。如果我们能在其他方面多取得一些外汇，就可以使沿海的一部分加工产品在国内销售。沿海搞的加工应是技术先进的，要为内地工业技术改造服务。沿海要为内地提供较好的零部件、基础件、元器件，同时也为满足国内市场需要服务。沿海如能从这方面走出一条路来，对积累资金，回笼货币，减少外贸亏损都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福建是可作较大文章的。

总之，沿海地区人多地少，能源比较缺乏，一般不宜搞消耗能源多的大型骨干企业，主要应搞技术密集的轻型加工业，有些既是技术密集又是劳动密集的。要多办中小厂，专业化、社会化，引进技术，生产“洋货”。轻型加工业，可以是专业化、大批量生产，也可以是多品种、小批量的，这样灵活方便，应变能力强，就业人员也多。这个办法不仅对福建适用，可能对广东、浙江、江苏等一些地方也是适合的。将来慢慢形成沿海和内地的合理分工，内地用“洋货”就用沿海生产的这种“洋货”。

福建第二个突出优势就是林业。福建有发展林业的好条件，这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木材生长周期比较短，造林条件非常好，而且群众又

有长期经营森林的经验，我看了闽西北一些林区，形成了很深的印象。我们要共同努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如果像你们说的，从现在开始，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木材年采伐量增加几百万立方米，那对我们国家将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群众的收入也会大大增加。当然营林周期长，国家可加以支持。从一些地方的经验看，营林期间也不是都没有收益，沿途都听说可以套种、间作，十年左右还可适当间伐。发展林业不仅是原木生产，还可搞林业加工、林产化工等等。

我认为以上两个优势福建要特别注意，要继续努力，把它发挥出来。中央也要给以必要的支持。福建还有其他一些优势，如水利资源丰富，可以发展小水电，耀邦同志来时也强调了这一点。此外还有渔业、建材、食品等等，也要逐步开发。

要发挥这些优势，必须同时抓好两件基础工作：第一要加强能源、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福建这几年用了很大力量来克服这方面的弱点，今后要继续加强，中央给以必要支持。解决能源问题无非两条，一条是在福建这里搞，一条是外面搞了送进来。第二必须抓紧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这方面的潜力也很大。

三、经济特区的方针

厦门特区经过几年努力，已有个初步基础，主要是搞了一些基础设施，现在已开始进入吸引外资办厂的阶段。

中国搞特区究竟解决什么问题？过去我们也不大明确。如说解决就业，我认为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不要说厦门特区只有 2.5 平方公里，就是 10.5 平方公里、20.5 平方公里，又能解决多少就业问题呢？要说是加快我们工业发展速度，又能加快多少呢？不要说拿全国来平均，就拿福建二千六百万人平均，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不是岛国，不是小国，通过搞个特区像新加坡那样，就能使整个经济发展起来，那是不可能的。特区如何发挥作用呢？这要从全国的经济建设、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考虑。现在，世界上纷纷在议论，由于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等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二三十年内，世界将发生一次所

谓新的工业革命。日本学者也认为，现在技术革新的周期在缩短，过去是“十年一小变”，现在是“三年一大变”。他们都在研究对策。不管这种说法确切不确切，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到一个信息：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现在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将会出现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我们应当注意抓紧时机，采用新的科研成果，发展我们的经济，缩小我们同世界上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因此，从长远看，必须使我国现在的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三种产业并存的结构逐步得到改进，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适当增加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沿海地区首先是特区具备这样的条件，担负着这一重要的任务。要通过特区这个窗口，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为整个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在特区，第一要给外商优惠条件，现在已开始这样做了。第二要坚持我们有所得，就是要把先进技术拿过来。将来在优惠条件中也要包括给一部分市场。现在外商与我们合作，廉价劳动力对他们已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国内还有许多环节，效率低，虽然劳动力便宜，但其他效率不高，各种服务质量也不高。对外商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我国的市场。因此要以市场换技术。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讨论对西欧的经济技术合作，我就讲过这个问题。西欧产品没销路，需要市场；我们需要技术，你只要把真正先进的技术拿来，我就允许你一部分甚至全部产品在国内销售，互通有无。

办特区，我们原来没有经验，深圳开始是搞旅游、建住房，当然那也比不搞好。后来有些同志看了后说，光搞这些不行，还是要搞工业。我看只一般讲搞工业不行，应该通过特区搞到比较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区要作为一个窗口，引进技术，再移植到其它地方。在特区我们不必着急，不必急于一下子办多少一般性的工厂，因为从增加产值、增加就业讲，意义不是太大。一般的技术可放在其它沿海城市，不必放在特区。有些技术确实先进的，没有办在特区，也可给以特别的优惠待遇。如果我们特区方针不明确，将来会发生矛盾，大家都要往特区挤，或者所有城市都要求和特区同样的待遇，那就不好办。我们要坚持拿到先进技术，这点应当明确。现在中央方针已经定了，特区不能办得太多，就是现在这么几块，将来即

使再增加一点，看来也不会多。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已办的特区，搞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这对整个国家的四化建设是有益的。

四、对省里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

胡平¹同志和省委其他同志提出的需要请中央解决的那些具体问题，宋平同志已回答了，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同意他的意见。

基础设施，特别是港口，现已开辟的福州马尾、厦门东渡港，首先要搞好配套，发挥作用。还有二期工程、煤码头、粮码头要继续建。除此以外，不必急于再铺新点。如果将来火电站要摆在湄洲湾，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就要搞煤码头，这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如果火电站摆在厦门、福州，那湄洲湾就不能马上排上队。虽然这是世界少有的天然良港，但现在还摆不上议事日程，可行性研究可以先搞。厦门国际机场既然已建立起来，就要向外通航，飞日本、香港、新加坡都可以，他们也可以飞来，就是只到厦门，不到北京，这与民航现有的航线也没有多大矛盾。铁路建设方面，要首先抓好现有铁路的改造，搞电气化，提高运载能力。已开工的漳泉铁路可以继续修建。

外贸亏损、财政赤字、自筹基建指标，要带回去研究。今年的外贸亏损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要算算账，究竟亏多少，地方能负担多少？负担不了的，只好中央挑起来。基建指标能压的要坚决压下来，确属压下来有困难的，你们提出意见，另行研究。本月十日，要开全国计划会议，有些问题在会上定。

福兴财务公司的问题，我们要回去研究。由于福建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你们的意见不会引起大的连锁反应，也可以给予考虑，就是按你们说的，在每年增加的信贷资金中拨出一个比例，用于技术改造，或者某些周期比较短的基本建设，主要是用在技术改造上。银行信贷资金，国家一定要管住，只管财政不管银行，那是空的。现在新疆等省区也是提这个问题，他们也有理由，我们还没有开口。原来有个存贷挂钩，现在取消了，这个不能再恢复。回去看看连锁反应大不大再定。我们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要不搞大家都不搞，要开了口子就越来越大。不是有这样的话吗，叫做“此

墙不许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我多次讲不能这样。要搞大家搞，最后大家都搞不成，就是好事，效果也不好。

物价问题，福建已注意了。物价上涨归根结底是两条，一是消费基金过多了，二是基本建设搞多了，这样票子就发多了。票子多了，没有那么多东西，物价自然就贵了。福建、广东两个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省，都是物价高的，直接原因是农副产品价格特别是议价提得太多，基本建设搞大了，工厂奖金发多了。你们的资金虽然用的比较集中，搞了基础设施，但从全省讲，资金还是比较分散的。你们预算内资金十三亿元，预算外资金就有十二亿元，差不多是一比一，而全国是二比一，企业利润留成放得比较宽。很多事有它的客观经济规律。资金太分散，大家都去搞，效果不会好。还是集中力量，有重点、有步骤地搞，效果好得多。搞对了后劲大，搞不对也会出现虚假的繁荣。当然我们中国现在还不是虚假的繁荣，但不注意，也会出现问题。这几年我们很好的一点是，虽然财政困难，但银行存款大量增加。不过使用时要谨慎，因为这不是财政拨款，而是老百姓的存款，主动权在老百姓那里，他看票子稳定就存着；如果物价上涨超过一定限度，老百姓感到存款不合算，就会减少存款甚至提取存款，出现挤兑现象，那我们就经受不起，就会出大的问题。这几年财政困难，银行放活一点可以，但有一定限度。票子发多了，物价就会上涨。物价完全不涨是有困难的，但年年涨、涨得太多也不行。所以物价问题要十分注意，一年、两年不要紧，长期涨下去是不行的。

最后再说几句话，福建条件很好，这几年工作有很大成绩，今后要取得更大成绩，还是要靠全省各级干部加强团结。团结很重要，这也不只是对福建讲的，我在新疆、内蒙古也是这样讲的，全国都是这样。耀邦同志在六届人大会议之前同民主人士协商时讲了两句话：“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两句话，一个是团结，一个是建设。团结加强了，建设才能搞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全党的团结大大加强了，但“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社会上遗留下的不团结的因素还是很多的，需要继续努力清除这些不团结因素，进一步加强团结。首先是党内的团结，干部之间的团结，包括新干部与老干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团结。现在我们要整党，整党最后也是要落在增强团结上。七大，

毛主席讲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路线统一了，团结增强了，所以取得了全国的胜利。现在我们整党也要达到团结的目的。要本着团结的愿望去整党，通过整党使全党空前地团结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团结步步加强，希望今后进一步努力，加强党内、各级干部的团结，发挥福建各种有利条件，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那样福建就能实现耀邦同志的希望，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头。

注 释

1. 胡平(1930-)，浙江嘉兴人，时任福建省省长。曾任福建省副省长兼省计委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特区办主任。

军工技术转民用应予鼓励和支持*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这是又一项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的重大成果，应予鼓励，并给以支持，使之用于生产，获得明显经济效益。科技领导小组对军工技术向民品转移而取得重大成果的项目和单位应及时予以通报表扬。

* 这是赵紫阳对核工业部第五研究所成功将萃取炼铀工艺移植于炼钨简报的批语。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首先要制定规划*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

三线建设¹的调整改造，就按你们所讲的那样去办。你们起草几条，报国务院批准，宣布办公室成立，就开始工作，组织力量摸情况。工作的重点要放在调查研究和制定规划上。当前三线企业的工业生产，国务院各部会抓的。但有些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生产问题，也可以摸一摸。总的要求是：三线的企业要经过调整、改造，使它发挥作用。要通过联合、协作，把三线企业组织起来，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使它的作用发挥出来。调查研究和进行调整，要从长远观点来考虑。三线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设备，花了那么多投资，怎样发挥作用，要好好研究。

二

对三线建设如何看，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三线建设问题很多，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很严重，是一个“包袱”；另一种看法认为，三线建设是个“宝”。三线建设现在不少技

* 这是赵紫阳关于设立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与鲁大东、钱敏、郑汉涛的谈话。

术人员、工人都不安心，怕搞不好，会影响士气，因而不敢正视存在的问题。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三线建设要分析，存在的问题要正视。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年复一年地往后拖，也不行。三线建设，总的讲不要笼统提配套。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看，势必有些厂子要加强，有些厂子不能再投资，有些厂子要关停，有的还要逐步搬迁，适当集中一点。对三线建设，不要一般性地讨论，议来议去，把下边的思想搞混乱了。搞个机构，静悄悄地在小范围内研究，把情况弄清楚，提出方案。

三线的工厂，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搞得比较好的。比如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是成功的。当然也不会没有干扰。这个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活了，过去的弱点得到弥补，现在发挥作用了。

第二种，在建设过程中受过干扰，但基本上是成功的，经过工作，可以巩固下来，发挥作用。如攀钢。攀钢二期工程看来还要继续搞。

第三种，确实没有发展前途的，要关停。当然也不能一阵风关掉，但领导上要心中有数。对这部分厂子，一是不要再去加强了，它的生产任务，由别的工厂去承担；但要想办法，使那里的技术力量继续起作用，可以支援别的厂子。二是有的可以逐步转移。如九院，就集中到四川绵阳市附近，方案已经定下来了。这部分厂要关、停、并、迁。迁，也不是由三线迁到一线，而是就地适当集中。有些三线工厂同上海挂钩，实际上想回上海，那不合适。对这些情况，要摸清楚，采取谨慎的方针。

三线建设，得有个方针，有个规划。不然，很多厂子，长期方向不明，那是不利的。

总的讲，三线建设是这么三句话：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现在有两种倾向要防止：一是完全肯定，要搞大配套、大投资；二是否定三线，要离开三线，掉尾巴，再回到沿海。这次不能在经济决策上大掉尾巴了。三线建设花了一千多亿资金，现在要通过调查、规划，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使它的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

三

三线工厂的调整、改造，要从全国着眼，要从长远着眼。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是跨地区、跨部门的机构，要促进军民结合；促进部门和地区的企业搞联合、协作，使它尽可能早一点发挥作用。无论从长远或从近期规划看，都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三线地区设备很多，技术人员也很多，应在这个基础上吸收外国技术，进行改造。军用技术转到民用要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军工技术水平比较高，和国外合作，起点就可能高一些。

三线工业要为全国工业的技术改造服务。军工厂也可以生产一些民品。但不要把更多的力量用在搞一般的民品上，你挤我，我挤你。军工厂为了找饭吃，用那么高的技术人员和那么好的设备去搞一般的民品，是不合算的。三线的军工企业应在设备、元器件方面，攻一些民用工业解决不了的技术关键。如果技术上还不行的话，结合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就解决了。军工应该和民用工业搞技术协作，长期建立固定协作关系。军工厂可以为民用工业生产专用设备和重要的零部件，供全国工业长期配套。这样很多技术问题可以解决，三线军工厂也不会打打停停了。最近，核工业部五所把炼铀的萃取工艺移植于炼钨，取得了成功。这项新工艺可提高回收率百分之八，生产周期缩短三分之一，质量大大提高，“三废”²大量减少。我在他们的报告上批过这样的话：“这是又一项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的重大成果，应予鼓励，并给以支持。”这类事应当提倡、支持。

研究三线的问题，不仅研究工厂，还要考虑科研机构如何发挥作用。三线的科研单位摆得不少，技术力量比较强，设备也比较先进，应把很多技术攻关任务交给他们。比如电子工业的元器件，就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如果能够解决技术关键问题，大批量生产，就可以作出很大贡献。要发挥科技人员和工人的积极性，就有个政策问题。技术人员还有个知识更新的问题。这些你们都要研究。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有大量工作，首先是搞好规划。办公室总的是计委代管。许多实际工作要依托国防科工委。这是一件新工作，搞一段再看，要不断实践，不断总结。

注 释

1. 三线建设，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为了战备的需要，把东部沿海地区视作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南和西北腹地为三线，按照“山、散、洞”（即依托山区、分散隐蔽和进入山洞）的布局，从沿海内迁和投资新建了大批军工企业，总投资达一千多亿元，统称为三线建设。

2. “三废”，指造成环境污染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

新型建材公司要搞成经济实体*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现在全国搞了不少旅游饭店，用了很多国外进口的材料。如果你们能生产和供应，就可以省很多外汇。广州、上海、南京、北京都搞了很多大旅游饭店，是用外汇搞的吧？我们的旅游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因为中国的地方大，可看的東西很多。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北京、上海旅馆紧张，卡住了，所以其他地方就去不了。发展旅游业，就要建很多旅馆。

要把建筑业、建材工业搞成赚钱的行业。但光赚国家的钱不行。现在是建材供给建筑，建筑业建了房子租给老百姓，还是赚国家的钱。（李锡铭同志插话：还是要实现建筑商品化。）一个住宅商品化，一个把建筑材料销到农村，还要供应室内的装饰材料。现在我们每年从国外进口多少新型建筑材料？要花多少外汇？不管是我国建的，合资建的，只要是在中国建的，都要统计一下用了多少国外的材料。要计算一下，用户是用你们生产的材料合算，还是用进口材料合算。

卫生陶瓷为什么我们搞不好？（有同志说：主要是由于小五金不配套。）可以进口小五金，和国内的陶瓷配套。进口小五金在国内配套，不是比全套从国外进口要好吗？（赵维臣¹同志插话：根据总理指示，经委马上组织两个组，调查研究建筑小五金，请建材、建筑部门参加，轻工部也参加。调查完了就搞规划。王燕谋²同志插话：建议也调查建筑卫生陶

* 这是赵紫阳考察中国新型建材公司和北京新型建材厂时的谈话。

瓷。)反正有一条,我们搞不了的可以进口,在国内成套供应。这里也有一个体制问题,各单位进口产品有外汇,生产企业要进口配套件就没有外汇,这个问题要解决。也可以请国外设计,或进口配件,需要的外汇由国家拨给,你们拿人民币买。这就比全部从国外买节省外汇多了。企业从国外买配件,可以拿成品换外汇,回笼人民币也可以。有些环节、有些部门搞不通的,要想法去打通它。

现在这个摊子归谁管?(李锡铭:归经委管,叫国家建材局。)一年投资多少?(杜恩训:明年安排的不到六个亿,能不能多安排些正与计委研究。)你们提出总共要两亿美元外汇、三亿元人民币,明年就要两个三千万元,是公司要的吗?(杜恩训:是公司要的。除此以外,还有几个中小基地配套,明年还要四千万元,至少三千万元。祁峻³:两个三千万元是直属的,另外四千万或三千万元是地方的。)

你们都说新型建材好,建材系统本身就要积极发展它,可以把发展水泥等的投资转移一些来发展新材料。建材工业投资总数多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投资内容分配的比例可以改变。当然,水泥等传统材料还是要大力发展的。

改革管理体制,搞活一些,我是赞成的。给一定投资,自己滚动发展,滚几年再说。新型材料是个新事物,环节太多,事情就难办。工厂要搞好生产,要进行科研,原则上应自己负责。新材料公司要的钱,准备让中国银行拨给你们贷款。贷款后你将来没有外汇可以拿人民币还,用两块八人民币还一块美元。现在新型材料还不是大量出口的问题,只要能把进口的材料顶下来,就可以节省外汇。你这个公司现在还不小,干脆搞成个经济实体,由小到大,一开始就搞成个实体公司,就是产供销、人财物统一,包括将来进口的材料、配套件等都搞起来,把卫生陶瓷甚至小五金都搞起来,要注意配套。你这个公司一定要使产品配套。当然,也不一定什么都自己搞,有的可以和别的部门搞协作、联合,搞“一条龙”。为了扶持公司的发展,公司可以五年免交利润和所得税,但工商税还得交吧?(祁峻:工商税可以交。)总之,我赞成公司的体制搞得活一些,自主权大一点,这样你这个公司就要真正负经济责任。(祁峻:那是没问题的。)今后你们就要和中国银行、人民银行打交道。

发展新型建材，可以买一点二手设备，可以和国外合作。合作的形式，有些是引进设备；有些是请外国人来帮助设计；有些是进口一部分自己解决不了的零配件，自己能解决的部分国内制造。首先要把牌子搞好，把产品搞好，然后慢慢地扩展，不要一开始自己搞不好又勉强搞，搞得信誉很差就不好了。

公司管理体制的问题，请经委和国务院办公厅研究一下，可以明确几条：一是你们这个公司实行人财物、产供销统一，是个经济实体；二是公司在银行单独立户头；三是总局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公司，扩大公司自主权。项目审批就不要通过总局（指建材局），如果需要计委、经委审查的，就由计、经委审查，不经过总局这一级。

我看大体上就是这样，国家建材局的问题，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叫总字我不管，相当于一个总局，给你这个权力。新型建材公司还是归总局，是总局下面的公司，但是要把这个公司的权力扩大，就是总局不要多干预它。局里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放给它。至于对上的口，你们局还是一个口。恐怕大体上就是这个样。苏联的公司都是这样，他们的公司都是部下属公司，归部领导。部、总局都属政府机构，公司是经济实体，不然建筑材料分两个摊子，也有很多矛盾。丝绸、烟草等公司也是这样，归部管。但是有一个扩大企业权力、扩大公司权力的问题。请经委与国务院办公厅好好研究一下。

注 释

1. 赵维臣（1929- ），黑龙江阿城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国务院生产委副主任、经贸办副主任，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王燕谋（1932- ），江苏张家港人。时任国家建材局副局长。曾任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建材局局长。

3. 祁峻（1912-2000），河南固始人。时任国家建材局顾问。曾任建工部陶瓷研究院院长，建工部副部长。

发展大好形势 理顺经济关系*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关于一九八四年计划安排

今天汇报的一九八四年计划，并不那样完善，矛盾不少，各方面还有些不同看法，但看来也只能作这样安排。还是历次计划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各地区、各部门把任务背回去，木材、煤炭、钢材指标也好，财政收入、基本建设指标也好，都背回去。大家提的要求、意见，都有自己的道理，也值得同情，但不能都解决。就是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批准这个计划，大家努力去完成。

二、关于如何发展经济工作大好形势

今年的生产形势很好。原来担心，上半年重工业速度那么高，会不会把轻工业挤掉？现在看来，执行结果比较好，重工业有较大增长，轻工业的增长幅度也不小。再是原来担心农业受灾严重，会减产。现在看，出乎意料，又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收成。总之，生产形势很好。

在我们看到大好形势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现在经济还没有理顺。要理顺经济，任务还十分艰巨。如果不逐步理顺经济，要保持和发展目前的有利形势是困难的。我们今后面临着一个如何理顺经济的问题。我们说的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理顺经济，一方面，要在计划安排上使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逐年有所改善。这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等，要一下子解决不可能，但比例关系要逐年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改革，包括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劳动工资制度，等等。进行改革，同目前财政存在严重困难之间是有矛盾的。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改革搞不好，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不改革，财政困难的局面永远也解决不了。解决财政困难，确实还有很多潜力可挖，会上大家也提出了许多办法。从根本上说，企业素质不提高，财政困难就不可能解决。现在有两个东西回不去了，一个是消费水平回不去了，一个是工业生产成本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回不去了。长期以来，我们的工业是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材料赚钱。当然，今后消费基金要控制，但总不能再把工资又减下去，把农产品收购价格减下去。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工业的经济效益，提高工业企业的消化能力和承受能力，提高企业的素质，这个任务很艰巨。提高企业的素质，包括企业进行改革的问题，也包括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改善经营管理。不改革，企业不会真正有活力。但要改革，财政又相当困难，弄不好会承受不了。所以今后几年的工作，一个是如何使比例关系逐步得到改善，一个是如何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使改革能够顺利地进行。改革要照顾财政困难，同时又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财政困难，这是一篇很复杂的、很不好做的文章。现在已经成立几个小组在研究各方面的改革方案。如计划、外贸、物价、劳动工资、税收等。明年争取利改税的第二步能够出台，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没有价格体系的改革，没有计划体制的改革，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确定进一步调整以来，这几年经济的发展总的是好的。我们面临很多矛盾，归结起来是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使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逐步有所改善，一个是如何处理好财政困难和改革的关系，在我们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搞好改革。解决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出现良性循环。我们要努力工作，能不能争取三四年把这个关过去。

这里，我还要重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讲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指思想战线。经济战线，中央没有这个提法。当然经济领域有些问题还不清楚，可以继续探讨。

有这样那样的意见都可以讲。比如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总原则是正确的。至于如何实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一个探讨的领域，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有些没有把握、敏感的问题，容易造成思想混乱的问题，尽量在内部讨论，不要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听说有些地方反映，部分群众和干部对农村政策是否要变，对企业的政策是否要变，存在一些疑虑。所以，顺便讲讲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在经济还没有理顺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要出现失控的现象。否则，不仅不能为改革创造条件，还会造成新的困难和混乱。因此，在整个经济没有理顺，没有条件进行全面系统改革的时候，对经济必须加强控制，不要这边戳一下，那边戳一下，出现失控现象，使经济困难越来越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改革就难以进行，甚至被迫再次进行调整。总之，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全面系统的改革，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一些改革；另一方面在整个经济关系没有理顺之前，绝不可放松控制。

最近陈云同志反复说了几条，一是外贸要集中，二是财力要集中，这是两把钳子。中央的财政收入要达到百分之七十。现在是百分之六十左右，一下子达到还有困难，但这是个目标。相应地，包括物资要适当集中，外汇也要适当集中。三是消费要控制。陈云同志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不能太快。最近又说，地方、企业、农民的所得不能再多了。当然，这不是说不能随着生产的发展增加收入，而是说农民不能再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收入，不能靠减少积累去增加消费，工人、农民收入的增加，不能超过生产的增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这样。四是货币发行不能到三位数，一百亿就是三位数了。最近陈云同志连续讲了这四个问题，我们理解是，既包括逐步理顺比例关系的问题，也包括为整个经济的改革创造条件的问题。如果比例不协调，消费失控，赤字扩大，钞票发行过多，带来物价上涨，改革就要推迟。如果被迫再进行一次调整，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很大的政治问题了，涉及到人民对党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问题。这是个全局，需要上上下下都重视。

三、关于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

(一) 明年的基建规模相当高了，已经达到了六百五十亿元。好处是把许多该打的都打进去了。但要说清楚，这是最大限度，到此为止，不再追加了，不能再“八月十五放光明”了。六百五十亿元，一次出台，好坏就这么多了。原来我想再压一点，但考虑到明年许多项目进入施工高峰，压多了会拖长工期，投资效果不好。所以，就不压了。但只能这么多了，到此为止。

(二) 财政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要靠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近一两年要靠大家抓紧一些，扭亏增盈，反对浪费。万里、一波、任重¹同志都讲了很多好意见。抓紧一点，搞严一点，肯定是会有有效的，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困难。分配的财政收入指标，只能超过，不能减少。明年财政增收一百亿元，甚至更多，是有可能的，这不是高指标。应当说，这方面各省市的差别很大，有的抓得好，有的抓得不那么好。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工作。大家一努力，明年的财政任务肯定可以完成。

(三) 票子问题，今年预计增发钞票一百一十亿元左右。这要好好分析一下，究竟为什么发那么多？基本建设规模扩大，农副产品收购增加，外汇顺差占款，各占多少？明年绝不能再增发这么多了。票子一年多一些问题不太大，但年年发这么多就不行。明年的信贷问题要抓紧，在减少钞票发行方面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包括多用一些积存外汇。现在外汇积存压了二百多亿人民币。明年总的是银根要抽紧。这可能要影响一点生产，但只要影响不太大，抽紧一点很有必要，不然钞票发多了，可能出大问题。现在三千多亿元银行资金中，有一千亿元是人民的存款，这是个大水库。这个水库蓄点水，有好处，但要有个安全线。如果搞不好，决了堤，全局皆输。必须维护人民币的信誉，不然物价上涨，老百姓挤兑，经济承受不住，那就可能真要发生一次“金融危机”。明年至少在某些方面要把银根抽紧一些，再把占压银行资金的东西放出一些，回笼一些票子，以减少发行量。要使票子的发行控制在一定限度，不能今年发一百亿元，明年再发一百亿元。这件事要考虑得周全一些，明年票子发行绝对不能到三位数。

(四) 钢材、煤炭等，就像计划本子上讲的那样，生产、供货单位还

没有完全接受指标，需要单位的缺口很大。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如此，背回去，发挥主观能动性，靠努力工作去完成。

（五）消费基金一定要适当控制，工资奖金不能乱来。工资的自费改革，只限于少数厂子是可以的。但现在搞那么多，整个工资改革的方案还没有定下来，就呼拉搞开了，这是有问题的。我重申一下，自费改革就是自费，国家不负责，今后也不能打入成本。你没有钱就退下来，改不起就收摊子，包括试点在内，三年之后国家也不出钱。你搞几百万人也好，一千万人也好，一概不能造成既成事实，让国家来负担。原来有个印象，纺织行业的基础比较好，我曾提出过，挡车工能否试验工资改革，经过讨论，大家不大放心，没有定下来。一个行业的工资改革，一个市的工资改革，像这样大的事，先斩后奏不行。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历来讲要谨慎。上去容易，要下就下不来。整个工资改革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定，一个行业、一个市全面搞工资制度改革，那怎么行。

注 释

1. 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中南局第二、第一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争取国际优惠条件建设好广东核电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六日

一、应该采取措施，把核电站总造价降下来，对英国人（合营公司）算一本账，对我们自己算一本账。核岛买法国的，常规设备买英国的，但我们自己是否也可以生产一部分配套设备呢？（李鹏：根据芬兰和南朝鲜的经验，核岛和常规设备国内都可以分交一部分，大约占设备价格的20%左右。）这就很好哦，设备贷款就可以少借一点呢。（李鹏：核燃料可以由国内提供天然铀或浓缩铀，由法国加工，我们只出加工费。）这又可以减少买燃料的贷款。还有商业贷款能不能少借一点，由人民币支付，广东省能不能向人民发行一点核电站建设公债，每年一亿元，整个建设期就是八亿元。（叶选平¹：可以考虑这样做。李鹏：水电部也可以从压油基金中挤出一点钱。）这很好嘛，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向外国借那么多商业贷款，少支付一些利息。浮动费用还会有的，但也可以减少，这样总造价就降下来了。不需要背那样多的债了。至于由中国银行担保或由中国银行组织借款，是可以的。哈默来开的那个平朔露天煤矿，也是中国银行担保的。广东核电站在中国土地上，理应由中国出面担保。由中国银行组织贷款，甚至自己发放商业贷款，也都是可以考虑的，我们现在外汇有结余，要看投到哪里对我们更有利。你们应该组织专家，考虑不同的条件，多做几个比较方案，例如自己能分交多少，自己能出多少钱，能养活多少借款，少付多少

* 这是赵紫阳听取李鹏和叶选平关于中国核电代表团访问英国、法国和芬兰汇报时的讲话。

利息。至于香港占多少股份，也可以计算几个方案，少占一点，也许对我们有利。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计算论证一下，便于决策。

二、广东核电站设备可以买法国、英国的，但中国要发展核电，设备要靠自己制造，如果法国核技术好，可以买法国的，通过合作生产，逐步把技术学到手。如果合作生产第一台、第二台学不到手，生产第三台、第四台总可以学到手吧？至于常规设备技术，我们是否还要向英国买呢？（李鹏：不一定需要，因为英国90万千瓦核机组是在他的66万千瓦烧煤机组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我们国内正在生产60万千瓦烧煤机组，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加以改造，但这要和一机部同志商量一下。）中央已决定开大型露天煤矿，建设坑口电站，来解决能源的需要。因此，不但要搞60万千瓦烧煤机组，还要搞90万千瓦、100万千瓦的烧煤机组。技术上自己不行的，可以引进专利。搞坑口电站，不是说不搞水电，但由于当前国家资金有限，只能逐步把重点放在水电上，中央已原则同意上三峡，小平同志是赞成的，已向陈云同志汇报过，陈云同志也表示同意。当然只能上低坝方案，不能再留有余地。一留余地投资就要增加，还会引起川东一百多万人长期动荡不安。三峡的电可以一部分给广东。（叶选平同志：能给广东多少电，时间上能否赶得上？）当然三峡电主要解决华东的需要，给广东送一点，也不妨碍广东搞核电。因为过去对红水河论证过，光靠水电不行，还必须火电或核电配合。

三、10%利率的贷款条件不算优惠，能不能争取更低一点的条件。（叶选平：和英国人已谈了三年，我们至今没有一句肯定的话，希望这次中央原则上批准这个项目上马，这样和英法谈判时，争取比现在略为优惠的条件也是可能的。李鹏：国际市场利率在下降，九国君子协定[OECD]四月份要开会，进出口信贷也可能要降，总趋势对我们有利。法国人表示，买他们的东西，密特朗访华时，可能带点优惠条件来。）

我们早就原则上同意广东核电这个项目，不是说为了搞，让你们去谈判嘛。当然，谈判到这个程度，不表示一个态度，再继续下去也有困难。你们是否已向计委汇报过。（李鹏：已和宋平同志约过，他这两天忙，答应下周听汇报。）请计委、经委开个联席会议，听你们一次汇报，并先议出个意见来。我在出国前，尽量抽时间再听一次，争取把这件事定下来。

注 释

1. 叶选平(1924-), 广东梅县人。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省科委主任。曾任国家科委三局局长, 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大型煤矿是否与外商合营值得重新考虑*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

完全同意宋平同志的意见。今后大型矿是否采取与外商合营方式，值得重新考虑。因为今后煤主要是国内用于发电、燃料，而合营则售价太高，国内补贴不起，如出口，国际市场容量并不可靠，国内煤十分紧张。因此还不如利用国外贷款自己开发，同时同国外搞技术合作（地质、设计、培训），甚至可请外国人来当经理。另外，今后引进大型煤矿设备，最好同苏、东欧国家合作生产。

宋平同志的信及批的意见，抄告高扬文同志、煤炭部党组及财经小组、常务会议各同志。

* 这是赵紫阳对宋平关于开发陕北神木煤田意见的批语。

中国的科技体制非改革不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关于中国科学院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同中央和国家机构改革工作小组《关于中国科学院机构改革几个问题的意见》，都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应该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值得中央重视。我基本同意这两个文件中的主要观点。

一、关于中国科学院的任务和体制问题

科技工作的任务，中央一向是明确的，经过去年全国科技奖励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具体化了。当时我代表中央讲了话，提出中国的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方针，无疑也应当是科学院工作的方针，科学院要切实贯彻这个方针。

关于科学院的任务，我同意两个文件中的提法，必须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开发或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中心点是加强应用研究。中国科学院这么大的力量，如果不把主要力量用在加强应用研究上，不参加开发、发展工作，那就要考虑科学院在四化建设中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第 103 次会议上的讲话。他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的三项任务是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开发或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必须着重解决科学研究与生产脱离和使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作用这两个主要问题。他的这个讲话，进一步阐明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到底应当占个什么地位了。科学院不是大学。我们对基础研究历来是重视的，当然，“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一些干扰，今后要继续重视。现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今后二十年我们国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过程中，科技人才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科学院能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要说二十年不出什么重大理论成果，二十年以后再出也可以；要说二十年在应用研究上没有进展，没有成就，那就不知道中国还要落后多少年。其实，中国的理论也不少，二进制的发明者是中国，八卦就是二进制，更不要说火药、指南针等。英国的理论也很多，但英国的经济今天处在很难跟上的地位。抽象地讲问题讲不清，唯一要考虑的是二十年后中国怎么样，这二十年中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是什么？本世纪末，中国经济要翻两番，中国的科技人员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小平同志的高明之处，在于早在前几年就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变为生产力，过去可能是二百年时间，现在可能是三年时间。一个新思想、新理论，对我们无疑是重要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是，更重要的是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即使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少一些，下个世纪再得也可以。这一点不必再多争论。为整个国家着想，为整个人民着想，要求科技人员，就是要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中国经济最落后、最紧迫、时间感最强的就是这个。当然，我完全同意，不搞基础研究，光搞应用研究是不行的。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开发、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这三句话调个顺序也可以。原来写的是“认真”重视基础研究，我改成“继续”重视基础研究，要实事求是，什么事情都要“认真”不可能，都要“大力”也做不到，都要“大力”等于不说。除了讲应用以外，还讲了开发，为什么还要讲开发？因为科学院集中了大批科技人员，国家科技人员的精华在这里。现在，很多实验室里的成果，不能很快变为真正的商品。我们从国外引进的技术不能消化，不能真正用于生产，消化以后不能创新。这些问题是转化为生产力最现实的东西，没有科学院的帮助，时间会拖得很长。当然，要有层次，不能把科学院变成一般的新产品研究所。我们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有一批人才，要重视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假如今后体制有变化，更多的研究所转到工业部门，科学院的研究所少一些，开发工作就可以更多地转出去。

任务就是以上三句话，方毅同志赞成，嘉锡¹、东生²同志赞成，两个调查组基本上是一致的意见，既然这样，书记处就把它定下来，学部委员会就好开会了。这个任务定下来之后，科学院要做艰苦的工作，不是在口头上，要真正在思想上搞通，在实际工作上贯彻。当然，要出安民告示，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同志不会变动工作，而且会继续支持他们搞下去，比如陈景润³继续去搞他的“猜想”，如能获得诺贝尔奖也是莫大的光荣。但要动员一些有条件、有精力的同志参加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很大意义的研究工作。今后十年二十年，看科学院的工作，就要以这个方面的成绩大小为主要标准。

关于体制问题，要采取慎重的态度，除几个定下来的问题以外，其它问题要慎重。关于工程科学院的问题是把科学院一分为二，设工程科学院，还是搞虚的，使专家有个讲话的地方，因为分歧比较大，今天不定，可以再研究。中国的习惯，上面一分，下面就要分。搞两个实体，搞不好就要发生问题，至少在今天没有把握，可以继续研究。总之，体制改革要谨慎，学美国不一定合适，学苏联也不一定合适。

二、关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的科技体制非改不行，主要应该围绕两个问题：

第一，要有利于克服科学研究同生产的脱离。苏联的体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是经常把加强科研和生产的联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说明苏联科研和生产是脱离的。我们有很多成绩，但总的来讲，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自己的科研成果，长期不能用于生产，变为高质量、低成本的商品，这不能不说是科研与生产脱离的一种表现。美国一个公司从科研、开发到拿出产品，投到市场竞争的时间很短，我们不行。有些地方三个月、半年能办成的事，我们要五年才能办成。由于科研与生产长期脱离，科研部门根本不考虑产品的使用价值，搞出来就算完事了。光搞出来不行，得卖出去才行。这个问题，在苏联是顽症，在我们国家也是顽症，一定要想办法克服。我主张组织专门小组，认真探讨。讨论要思想解放一点，因为这是解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这种改革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经

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效率，是关系到我们同国外的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的问题。世界上科学技术过去是十年一小变，现在是三年一大变，且不说过去是百年一小变，中国古代是千年一小变。我们现在这种体制、搞法不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出成果来。

第二，要使中国仅有的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作用。当然，首先要有政策上的工作，这方面中央一直在抓，例如落实中年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政治思想上的工作我今天不讲。在组织体制上，一方面人才不够，一方面大量积压人才，有人无用武之地。相当一些科研单位，包括高等院校，积压了很多人才。现在一方面要请外国人讲学，引进智力，一方面要把国内的智力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发挥作用。三十岁是干事的时候，外国三十岁左右成名成家，在我们这里根本排不上号，没有实践的机会。五十年代，广东的第一个沙石高坝是南雄县一个技术员设计的，这个坝当时在广东是最高的。为什么由他来搞，因为南雄县就这么一个水利技术人员，而当时广东水利设计院里很多比这位技术人员水平高的中青年技术人员，在院里多少年，总排不上用场。研究单位压人太多。学校里的高材生、尖子，到研究所里是“重孙子辈”，只好跑龙套，跑十年就老了。这是很大的浪费。

怎么改才能达到目的，要实践，但不能老是议而不改。整个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建议书记处和有关方面组织小组专门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提出方案。

注 释

1. 卢嘉锡(1915-2001)，福建厦门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曾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严东生(1918-)，浙江杭州人。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曾任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3. 陈景润(1933-1996)，福建福州人。著名数学家，曾因证明哥德巴赫猜想“1+2”获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

从中小学开始加强外语教学 和普及计算机知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送耀邦同志批示。我意此件转教育部阅处。邱纯甫同志建议的两件事，我都赞成。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便于同国际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中小学开始就加强外语教学，使大学毕业生的外语水平普遍达到外语学院毕业生水平，这是很重要的。至于如何实施，是否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增设外语课，请教育部研究提出意见。普及计算机知识尤其硬软件知识的教育，也非常必要。这对提高教育队伍本身的素质，采用先进技术，推进现代化事业，都具有重要作用。教育部应该认真重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从课程上体现出来。在教育工作上，我们要有战略眼光，考虑得深一些。

* 这是赵紫阳对邱纯甫建议的批语。

祖国建设需要精通世界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人才*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同学们、同志们：

一九八四年的新年和春节就要到了。在欢度佳节的时候，你们想念我们，我们也想念你们。我代表国务院向在国外留学的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

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大家极为关心的。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年年超额完成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现在，可以有把握地告诉大家，第六个五年计划肯定可以提前超额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转到健康发展的轨道。第七个五年计划也正在制订中。我们正在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不仅要继续开采陆上的石油，而且要开发海上油田。不仅要有星罗棋布的中小电站，而且要开发利用长江、黄河的水利资源。不仅有水、火电站，而且要积极发展核能发电。我们还要开发大型露天矿，建设行驶长大列车的铁路干线，开辟新的深水良港。与此同时，还将对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分期分批地进行技术改造，特别要抓紧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的改造，使它们首先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在农村，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后，大大调动了农民向生产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积极性，一个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正在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扎扎实实的步伐，不断向前发展。

* 这是赵紫阳新年前夕向留学生发表的录像录音讲话。

当然，我们在建设中还存在着不少困难。比如建设资金不足，经济体制不适应，经济效益不高，等等。最大的困难是人才不足。四化建设，需要知识，需要技术，需要人才。既要有各方面的初中级人才，更要有精通世界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的高级人才。当今世界技术更新的周期日益缩短，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亟需我们迎头赶上，攻克难关。祖国派同志们到国外留学，正是为了获得新的知识，博采各国之所长，以补我国之所短，从而使我国的建设能起步高一些，发展快一些。现在，举国上下，不分职位高低，不论年龄大小，大家都在发愤学习。同志们在国外，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应当充分加以利用，以期学得更多、更深、更好。所有的出国留学人员，不论是公费的、自费的，都是祖国的儿女，国家都一视同仁，寄予厚望。祖国和人民殷切地希望你们专心致志地学，踏踏实实地学，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外国人掌握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够掌握。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同志们身处国外，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传统，维护祖国的荣誉，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年代，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远涉重洋，勤工俭学，探索救国的真理，经过长期英勇斗争，终于结束了旧中国受外人奴役的屈辱历史，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现在，一个新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你们这一代的肩上，就是要学好建设国家的本领，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甩掉我们国家贫穷落后的帽子，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富强发达。

你们在国外，我们在国内，振兴祖国的共同目标把我们紧紧地联在一起。尽管远隔万里，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祖国建设日新月异，前程光明，给有志青年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同志们学成归国，大有用武之地，大可施展抱负。我们深信，在国外留学的同志们一定能够在科学领域里勇于探索，精益求精，满载而归，不负众望。

最后，祝大家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就！
谢谢。

关于推广河南省禹县平原造林 经验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杨钟、文涛¹同志：

转去原河南省林业厅副厅长徐枫同志关于禹县实现一年绿化情况的一封信。看了这封信，使人感到非常高兴，很受鼓舞。从这里，我们看到平原造林确实大有可为，很有潜力。请你们负责和报社的同志研究，在报纸上介绍这一经验。

地处平原地区的禹县能够实现一年造林，一年绿化，很主要一点是由于全县从上到下，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长期做了准备工作。在推广他们的经验时，主要应推广他们如何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而不要笼统号召一年绿化，也不要发动大家去参观。否则，反而会造成不良后果。过去我们推广经验，往往是点上很好，一推广到面上就搞形式主义。这个教训，一定要记取。

请林业部选择十几个或更多一点县，认真做好规划，参照禹县的作法，狠抓落实，把造林搞好，这些县在步骤上，也应先从若干公社、乡搞起，逐步推开，以尽快取得成效，把绿化大地的工作搞得更扎实，更有起色。以上意见请酌。

顺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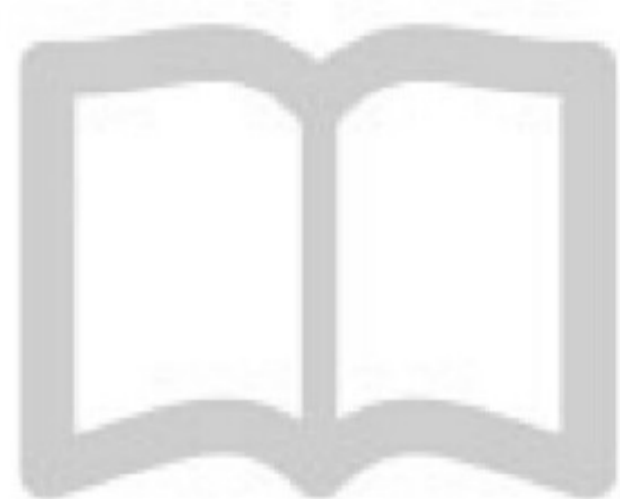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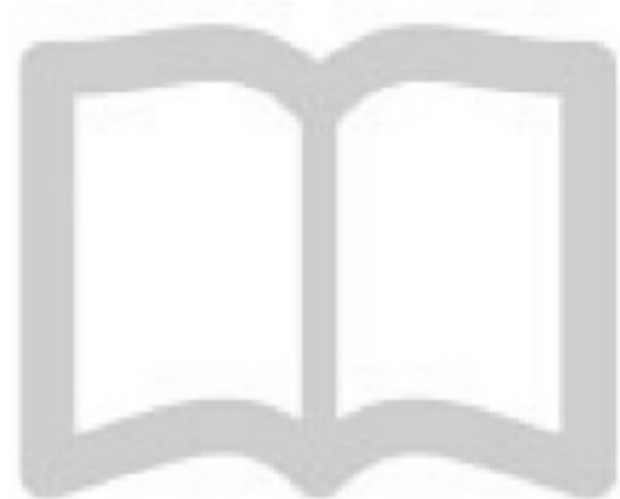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注 释

1. 雍文涛(1912-1997), 贵州遵义人。时任林业部顾问。曾任林业部副部长, 中南局秘书长, 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广东省委书记, 教育部副部长, 林业部部长。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一九八四年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增进了解 促进友好 维护和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

一、在白宫南草坪里根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的讲话

总统先生和里根夫人，女士们，先生们：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带来了十亿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我要感谢里根总统，他的盛情邀请使我有机会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

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我这次到贵国来访问的宗旨，是谋求增进相互了解，稳定两国关系，促进中美友好，维护世界和平。我想，这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全世界人民所希望看到的。

今年是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航中国二百周年。那次历史性的航行，开拓了中美之间的联系。过去两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史中有过友好相处和交往，也有过相互对抗和冲突，但是友谊的种子始终蕴藏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中。正是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领导人的政治远见，使我们两国能够结束长期相互隔绝和对立的局面，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自从中美建交以来，总的来说，我们两国关系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大大增加，相互了解进一步增进，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明显的扩大。但是应当承认，

* 这是赵紫阳访问美国时，1984年1月10日在白宫南草坪里根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和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上的两次讲话。

中美关系的发展远未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也出现过起伏和曲折，还存在着困难和障碍。

中国一向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得到发展。美国政府领导人也 不止一次表示重视中美关系，希望这种关系能够稳定和持久。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就需要我们双方互相尊重，都本着既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又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的精神来处理面临的问题。中美两国都严格遵守双方在历次公报中确定的原则，履行各自承担的义务，中美关系就能够结束颠簸不定的状况，走上平坦的道路。

五年前，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这个讲台上说过：“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我们今天依然持有这一信念。目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用你们美国人常讲的话来说，就是既面临重大的挑战，也有着巨大的机会。我们应当勇敢地接受挑战，充分地利用机会。

当前的世界局势十分动荡不安。各国人民都为世界的前途深感忧虑。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都应当意识到自己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重大的责任。在未来的几天中，我将同里根总统和贵国政府其他领导人进行会谈，就发展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我们从来不把中美关系的意义局限于一般双边关系的范围，而把它看成是影响世界全局的大事。我们主张和平，不仅因为中国需要和平、友谊和建设，而且也因为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友谊和发展。中美两国的友好相处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大因素。全世界人民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

总统先生，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我感到亿万人民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期待我们对发展中美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贡献，我们不当辜负他们的期望。

我刚才提到，今年是中美开始交往的二百周年。这是一个人们往往要进行回顾与前瞻的时刻。我相信历史将教会我们更加友好地相处。我祝愿美国人民幸福，祝愿中美关系稳定持久地向前发展。

谢谢大家。

二、在白宫里根总统举行的国宴上的讲话

总统先生、里根夫人，女士们，先生们：

我对贵国的访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今晚我应邀出席这个隆重的国宴，深感荣幸。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同事，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里根总统和夫人，向美国政府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五年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喜悦，对世界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既有多方面的发展，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障碍。中美关系的颠簸不定，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我希望这种不稳定的局面早日结束。

发展中美关系是我们双方的共同愿望。我很赞赏里根总统说过的，中美两国注定要通过合作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由于分歧遭到削弱。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都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增进友谊，而不愿意让分歧发展到破坏我们友谊的基础。中美问题的主要分歧，或者说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我希望双方能够严格遵循历次中美公报中共同确定的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履行各自承诺的义务，使我们之间的分歧得到解决。

今天的世界依然动荡不安。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更加尖锐，南北矛盾尚待解决。侵略战争的火焰在一处还没有熄灭，在另一处又燃烧起来。严峻的现实使我们大家都不能不为世界的前途担忧。同时，这也增加了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中国愿意同他们一起，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制止军备竞赛，反对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中国一向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我们早就宣布，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对歧视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评态度，但我们不主张、不鼓励核扩散，自己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其它国家发展核武器。凡是真正有助于实现核裁军、制止核军备竞赛和消除核战争威胁的倡议，我们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该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我们愿意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我这次到贵国来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探讨进一步促进中美友好关系的可能性。

我今天已经在坦率、友好的气氛中同里根总统和他的几位内阁成员进行了会谈。通过这些会谈，我们增进了相互了解，双方都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都认为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并愿意采取积极态度进一步加强合作。我衷心希望我的这次访问和里根总统四月份对中国的访问，能够促进中美关系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稳定、持久地向前发展，以造福两国人民，有利世界和平。

请允许我举杯，为里根总统和夫人的健康，
为布什副总统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所有朋友们的健康，
为美国人民的幸福，
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世界和平，
干杯！

对中央政法委“严打”部署 征求意见稿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复之同志：

此件初读一遍。总的精神是好的，完全正确的。今后一是按原定方针坚定地把第一战役继续进行下去，同时准备第二战役；二是根据形势发展，应强调政策，防止胜利形势下，头脑不清醒而产生扩大化与其它违犯政策行为；三是从长远讲，要准备长期斗争，加强有关这方面的基础与技术建设，提高技术水平和战斗能力。这最后一条，对我们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应认真重视，并吸收国外适合我用的经验。以上，请酌！

赵紫阳
二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就中央政法委关于巩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第一战役成果和准备转入第二战役征求意见稿写给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的批语。

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¹（以下简称霍），赵紫阳（以下简称赵）

霍：中国农村的改革扩大到城市工业部门进展情况如何？

赵：农村改革的基本原则和路子适用于工业企业，但做法不同，要多走几步。解决企业同国家的关系问题，用利改税的办法。为了避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去年部分企业实行利改税，部分仍实行利润上交。实行利改税是解决企业同国家之间的大锅饭问题。企业本身要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做到这点，才能解决企业内部的大锅饭问题。实行多劳多得，要根据技术水平、熟练程度、工作情况，规定级别。工资制度要改革。利改税一年或两年改完，尚未定下来。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同国家关系的问题，城市里则有企业占国家便宜的问题。

霍：进行改革之后，工人收入有差别，是否会引起大家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看法？

赵：根据农村的经验，绝大多数人拥护改革，只有少劳多得者不拥护。现在中国不是贫富不均的问题，而是平均主义问题。我们也注意到有人收入比别人多一些，要采取福利措施保证生活，农村也要征所得税，有救济金。城市改革允许存在几种所有制，小工业、手工业、服务行业，允许办私人企业。现在之所以商品多了，市场繁荣，就是因为有多种所有制。政策允许雇工，请帮工，可以有五个徒工，超过了也不禁止。还要看，还要研究。

霍：城市里有私人企业，规模多大？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变成国营的？

赵：通过征税来调节。很多人搞得好，管理得好。通过征税后，允许他们办。“傻子瓜子”一年收入三十万元，雇了几十个人，他经营得好。

霍：改革后允许办私人企业，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同以前不一样了？

赵：我们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人口多，没有经过商品经济很发达的阶段，即资本主义。列宁搞军事共产主义，后来搞新经济政策，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市场繁荣，商品增多，就是因为多种经济共存。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同时利用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霍：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意义深远，对中国对世界都有重要意义，我在澳大利亚到处讲这件事，在国外访问时也讲。但中国的政策将来会不会变。

赵：这取决于政策是否得到大家的拥护，是否能使大家得到利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家都怕变，这就保证不会变。第二要采取组织措施，各级领导都要建立第二、第三梯队。邓小平同志本来是众望所归，可以当总书记、主席，但让胡耀邦同志当。现在物色第三梯队，就不会出现个别领导人离开领导岗位后，接班人采取什么政策大家无把握的情况。

霍：同意赵总理的意见，政策会不会变，看效果，看各方是否支持。就军方来说，经济发展了才能改善军队的装备。

赵：军队不是孤立于社会，他们的家属就是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现在很拥护，起初他们不理解，不赞成，后来看到有效，就赞成了。基层干部的态度影响上层干部。

霍：听说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有阻力，情况是否改变了？

赵：主要是认识问题，多数不是什么有组织的反对。原来对老一套习惯了，对改革有怀疑，后来看到效果后就变了，变得积极拥护了。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县一级干部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开始不理解，看到效果才改变。农村工作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好做。你为我们作宣传，不会使你为难的，改革一定会成功的。

霍：你们一定会成功。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些东西，如精神污染、整党，是否会引起改变？

赵：中央规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就不怕了。我访问美国时，有人问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再次发生？我答，当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大家没

有经验，以为可以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有了那次实践经验，搞不起来了，这不是少数人的意志决定的，谁再要发动也发动不起来了。

霍：城市企业有的经营得不好，会不会被好的合并掉？

赵：有，但是少。先解决利改税，有的可以多留一些钱。

霍：多留钱分给工人，还是扩大再生产？

赵：国家规定比例，分工资、福利、扩大再生产三部分。

注 释

1. 霍克 (Robert James Lee Hawke, 1924-)，生于南澳大利亚州。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理。曾任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主席，联邦议员。2001 年任博鳌亚洲论坛主席。

理顺经济和提高企业素质 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

一、关于理顺经济和争取财经情况的基本好转要解决哪些问题，不把情况搞清楚，不能下决心。切忌“病急乱投医”，否则将会越来越不顺。要研究一下财经情况基本好转的标准是什么。

二、提高企业素质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当前主要抓什么？主要是解决企业“吃大锅饭”的问题。首先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正确解决企业和职工的关系。实行企业自负盈亏，才能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使它内有动力，外有压力，非力求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不可。如果企业不自负盈亏，老不盈利，总是亏本，它还有什么生命力，这样的企业怎么能够存在下去？

企业自负盈亏是针对企业“吃大锅饭”、“统负盈亏”而提出来的。当然，自负盈亏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完成国家的计划和各项财政上缴任务；同时，它的全部财产，包括利用自有资金扩大的固定资产，都属国家所有。它并没有而且不可能改变企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我们所说的盈亏责任制，实质上就是有条件的自负盈亏。自负盈亏应当允许有多种形式，不能拘泥于一种形式。现在还不完全具备实行自负盈亏条件的企业，要努力创造条件做到自负盈亏。这样做了，目前农村的那种好的形势，就有可能在工业企业中出现。

* 这是赵紫阳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的谈话要点。

三、要把经济理顺，必须下决心解决价格不合理的问题。要发展商品生产，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如果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商品生产就发展不起来，或者会给投机倒把提供机会。你要把经济搞活，而价格却搞得死死的，那怎么能搞活经济呢？要使货畅其流，不把价格搞合理是不行的。比如，生猪饲养和猪肉供应这个问题，有的地方认为，以县为单位统一核算不能货畅其流，要以省为单位核算才能货畅其流；其实，在价格不合理的条件下，这样做，省与省之间还不能货畅其流，要改为全国范围来核算才能做到货畅其流，这就要国家包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吃大锅饭”。这个问题如果不从价格来改革是解决不了的。农村是这样，城市也如此。当然，解决物价问题，牵涉到许多方面，既要认真考虑我们可能的承受能力，又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因此，需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经过慎重的考虑，采取系统工程的办法，提出几种设计方案，反复进行比较，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四、工业企业承包的问题。前年普遍搞了一次，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价格不合理。各个企业的任务不一样，又有利大利小的不同。有的企业技术改造的任务很重，有的企业就不是这样；有的企业要淘汰，并不需要技术改造。包干要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定，等于一个企业一个税率，几十万个企业怎么能够定得合理？

五、企业本身的发展全靠自己滚动，这不符合计划经济的原则。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的权力，应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可以搞某些技术改造和某些改善生产设施。但是像生产力合理配置这一部分，企业是不能包的。少数大的企业，经过慎重考虑，由国家批准，实行首钢那样利润递增包干（包括技术改造的包干）是可以的。但审批时，必须严格控制，否则，一放松就会层层加码。如前所说，由于价格不合理，生产任务、利润、技术改造任务的不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必要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有的同志设想，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就可以使企业主动地完成技术改造的任务，这当然是进行技术改造的一种好办法。但是有些企业利润很少，比如许多煤矿，它的技术改造任务自己并不能包得起来；要包，也只能包企业本身职工福利方面的事情。许多企业不实行利改税是不行的，否则它们就要求实行利润递增包干。总要给企业以出路，不然大企业难以维持下去。

六、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利大的企业愿意这样做，利小的企业就不愿这样做。而盈利多的企业，并不都是国家特别需要发展的企业，这种企业，自己滚大了，国家并不需要。资金这样分散使用，国家重点建设，如能源、交通等建设所必需的资金又从哪儿来呢？

七、首钢实行利润递增包干是作为特殊的情况处理的。首钢的试验是成功的，对它的经验要进行分析，看哪些具有普遍意义，才能推广。原来确定首钢有一部分生铁要调给天津和唐山的钢厂炼钢的，如果全部留给首钢自行炼钢，这样做，从首钢来看，是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从全局来看，未必有利。

八、有的同志建议，对农村的工业企业、对小的工业企业，还是放开一点，让它们有一个大的发展为好。因为这类企业建设快，经济效益比较高。这样搞它两三年，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更有利于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个意见，也请大家议议。

关于企业改革和技术改造等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扭亏增盈问题

看了你们会议简报，一是大家都很关心改革问题，给企业以活力和动力。二是很关心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三是都希望在总的改革盘子没有出来以前，在一些方面是不是允许大家去探索一下。这三条意见，我认为都是好的。当然究竟怎么办，会后还要研究。

对改革问题，去年国务院开会提出过十个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属于改革问题。各部门都搞了一些方案，刚向国务院汇报了一次，还是个轮廓。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价格问题。价格问题同企业的自主权是有关系的，是很难分开的，还有劳动工资问题。国务院还准备议几次。在国务院还没有议之前，今天还不可能谈什么意见。究竟今年步子怎样走，现在国务院正在议这些问题。

去年十月中央开了经济问题座谈会，突出了扭亏增盈问题。不管改革怎么改，不管今年是怎么搞法，扭亏增盈这个问题说起来涉及很多问题。去年大家归结了这么一条，抓与不抓大不一样。你们也讲了这个问题。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必须继续贯彻去年十月讲的扭亏增盈。

我的基本看法，我们国家的经济，作为前提条件，价格问题不改革、不解决，恐怕经济很难理顺。但是，价格问题实在太复杂，而且涉及到一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汇报时的讲话。

系列问题，我们又没有把握在很短的一两年之内就进行一次大的价格改革。现在，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况。因此，我主张今年下半年搞第二步利改税，这是定了的，不能等价格改革。当然，我也认为利改税的第二步在价格体制没有改革之前，矛盾不能根本解决。这是中外经济学家的一致看法。中国的价格积多年造成的不合理状况，恐怕短时间内没有多大把握加以解决，我们不能等。原来有个意见，现在搞利改税，将来价格调整以后又要改。但是，如果等价格改革，利改税就要推迟。利改税推迟了，企业的自主权也要推迟。所以，我倾向于利改税的第二步能不能早一点拿出来。当然，大家对利改税的第二步有一些不摸底，有一些看法。我看这个问题不要紧。出来以后不合适，再调整嘛。不外乎企业负担重了还是轻了。但是，利改税的第二步，可以肯定地讲，企业自负盈亏的性质比去年的利改税要前进一大步。作为企业来讲，自负盈亏的程度比去年的利改税要前进一大步。去年的利改税实际上是总额分成，第二步的情况就不同了。原来有一个想法，利改税按中等偏上的水平设计税率，现在看来行不通，实际上税率只能中等偏下。后进的地方，税率必须定低一点，不能定高，先进的地方要留下一块。这样，财政准备少收十几亿元到二十亿元。大体上，多数企业原来的既得利益可以保持，先进的企业可以多得一些。在这个起跑线上，解决自负盈亏。这样，动力和压力的问题至少要比现在的情况前进一大步。能不能适当缓解一下价格的不合理，还要从实践来看。要解决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不能缓解一下，使我们能争取时间创造条件进行价格改革。提出这个问题，大家都想一想。

我在这里着重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在价格很不合理的情况下，又没有税收来进行调节，解决企业自主权问题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样讲？既然要企业有自主权，它就要有生产的自主权，搞什么，不搞什么。千家万户，几十万家企业，价格很不合理。企业有了自主权以后，要想让它不根据自己利益决定多生产什么、少生产什么，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价格不合理，小企业没什么问题，因为它不负责市场，哪个利润高就搞哪个。大企业就有问题，比如说原来产生铁的，势必就要炼钢轧材，利润可以马上上去；要是出卖生铁，它没有利。实行产品税，利高的税高一些，利低的税低一些，适当缓解一下，但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

就是说，城市与农村有很大的不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自负盈亏，要创造使企业自负盈亏的条件。一句话，根本解决企业的活力和动力，归根结底还是自负盈亏。农民所以一下子有了积极性，因为农村社队原来就是自负盈亏，现在不同的是各个农户自负盈亏。骨干企业都是国家包的，叫你生产生铁，叫你生产钢材，叫你生产优质钢，叫你生产化纤、棉布，都是国家计划的。而自负盈亏以后，企业的收入、工人的收入同它的利润挂钩，实际上是以利润为标准。价格很不合理，势必阻碍企业自负盈亏。现在想通过税收的办法，创造一些条件，使企业能够早一点搞自负盈亏。在改革当中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现在，还是照你们会议讲的去办。国务院还要开会，一方面讨论价格问题，同时可能先搞第二步利改税。第二步利改税，不可能一下子全国搞成一个税率，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要照顾一下地区差别，相对地解决企业自负盈亏。这样，企业的积极性比现在更好一些。

二、关于老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问题

越是急待改造的企业，越是对递增包干没有兴趣，有没有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纺织系统，不可能吧。像鞍钢这样的企业，递增包干恐怕就不一定行。武钢是可以的，首钢更没问题。鞍钢这些企业，投资比较大，现在潜力很小。有这么个矛盾。这里有个原则要议一下，大企业大的技术改造，不列入国家计划，完全靠自己滚动的办法恐怕不行。关于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意见也不一致。小企业是没有问题的。大企业的重大技术改造，涉及到设备、材料，多少个亿元的投资，还是要列入国家计划。我讲的是大的企业，像铁路、大的钢铁企业，首钢是递增包干办法，那是当时特殊情况下允许的企业。小企业靠自己滚动是可以的，服务行业也是可以的，比如旅店，搞好了可以再开一个。整个作为一个方针来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原来我提出的十个问题里没有这个问题。基本建设项目是列入国家计划的，列入国家计划也可以采取包干的办法，我这里讲的包干不是利润包干。有一个说法，搞递增包干花自己的钱和花国家的不一样，那不是个递增包干的问题。大的技术改造列入国家计划搞包干，同

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大的基建项目不是准备采用包干的办法吗？大的技术改造恐怕也要采取这个办法，由国家规定任务，一共投资多少，包给你使用，节约归己，不够自己负责任。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将来我们国家大企业的改造走什么路子。这个问题关系到计划指导和企业自主权的界限划到哪里。现在不主张企业有自主权的意见是没有了。小企业的自主权是没有问题的，服务行业更不用说了。大的骨干企业自主权的杠杠究竟划在哪里，这是个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方向问题。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有争论，大体上是三派意见。究竟哪一派意见是正确的，应该采用哪一种意见，还看不大清楚。一派意见是孙冶方同志的主张，他是我们国家最早主张企业按价值规律办事的经济学家，但是他认为要把企业的自主权严格地控制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属于大的生产力的布局、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应当通过国家计划实行。在我们国家最早主张企业拥有自主权的、最早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就是这位老人家，而且没有随风倒，一直坚持几十年，直到临终。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赞成孙冶方的主张，大框框是这样，但是不等于说简单再生产就是在质量上、数量上维持原来的规模，除了福利、奖金、工资之外，在发展基金上应该有一定的余地，完全限制在简单生产上是不是太少了一些。第三派意见主张企业扩大再生产基本上依靠自己。这就涉及到企业将来的动力、活力，企业的自主权杠杠划到哪里。这三种意见中，现在第二种意见多一点。这是讲的骨干企业、大的企业。至于小企业，将来实际上可以实行八级累进税后的全部自负盈亏，其他骨干企业可以实行有条件的自负盈亏。十二大提出盈亏责任制，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自负盈亏。自负盈亏中，属于扩大生产能力、扩大再生产这一部分，将来发展的方向，是靠企业自己去搞，还是靠计划？农民靠自己，小企业也是靠自己，骨干企业是靠自己，还是基本上靠计划？现在大家都讲企业自主权，但往往不大一样，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正在讨论。我看了简报，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是技术改造，一个是动力、活力。技术改造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大的技术改造不列入国家计划不行。当然，也不是要企业完全等着国家，你自己有力量搞一些还是要搞的。大的改造不列入计划，主要靠企业自己去搞，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钱的不一定是真正需要改造的，需要改造的依靠

自己却没有钱。比如二汽和一汽，一比就可以比出来，二汽是个新企业，正在蓬勃发展的企业，生产力和利润每年增长很多，可以搞新的技术进步，扩大生产能力。一汽呢，递增包干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钢铁企业、铁路也是这样。

将来基本建设一定要包干，技术改造也要包干，把任务、规模定下来，把款项拨给你，实行企业负责制，或者企业自己解决多少，国家解决多少，包给你，节约归己，把国家的钱变成自己的钱。现在有这个问题，完全靠一年一年地拨款，也没有个总的一项一项地拨款，企业感到花这个钱是国家的，如果把国家的钱变成企业自己的钱，情况会好一些。

座谈会上，劲夫同志讲了个很好的意见，银行必须实行不同的利率，任何国家都是这个办法。当然不同的利率由国家来规定，不能银行自行其是。有一些企业确实利润很高，是扩大再生产的，国家也不是十分需要的，银行利率可以适当高一些，因为它有还贷能力。还有一些企业，技术改造十分需要，自己又没有钱，包干也好，利改税也好，总之它自己没有那么大潜力。比如富拉尔基的一重，设备老了，自己生活都顾不了，实行利改税也好、包干也好，积极性可能高一点，但一年也增加不了多少，而它大量的老设备需要改造，资金需要很多。像这种情况，国家就得有点优待的办法，就是实行低息的或无息的贷款。利率差从哪里解决呢？可以从财政补贴，这个利率差比较少。这是贷款的办法，把利率的补贴列入计划。不然的话，越是需要改造的企业，越是借不到钱，也不敢借，借了也无力偿还；而有些国家不很需要、自己却有条件的企业，它就敢借款，就会发展很快。比如现在的纺织行业就有点危机，化纤降价、棉花不补贴，全行业不景气，要把提价等因素的影响消化下去，没有别的途径，只有走技术进步的路子。就是要改造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它自己又没有钱，如果借利率很高的贷款，又无能力偿还。像纺织这样行业的技术改造，如果没有一些政策，任其自流，谁有钱谁就搞，谁没钱谁就不搞，这样过三年回头一看，不仅理不顺，而且问题会更严重。所以，从宏观考虑，一些行业，一些老企业，潜力大的和潜力小的，要区别对待。像纺织行业，最近我看了个材料，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三、关于外贸问题

今年外贸收购计划，我路过上海，他们也反映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采取国家收购比去年减少九十亿元，凡是各个地方自己能够解决的，可以多收一点。原来工业和外贸相互扯皮，互不公开，有些工业利润还高，外贸出口亏损很严重，过去是互相保密，现在就不能收购这样多了。但有些地方工业愿意让一点利，有些地方愿意让一点税收。这样外贸还是愿意继续多收购一些，可以不亏损或少亏损了。一种是外贸代理，一种是外贸多收购一点。这种情况，各地抓一抓是否还可以？上海说如果中央能够松动一下这个口，他们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样，迫使原来工贸互相扯皮，现在就有共同命运了。不然外贸要亏损，又不能亏损那么多，你要卖那么高的价钱，外贸就不收了。与其不收，还不如工厂降点价，把利润压低一点。外贸代理是一个办法。有些土特产品，主要是由于亏损而不是对外没销路，可以通过工业退税让利出口。亏损有真亏、假亏的问题。外贸亏损，但工业是赚钱的。像这种情况，如果从外贸这个角度硬是让它停止生产，工人就可能失业，不如让点利，让点税收，这样外贸部门还可以多收购一点。农产品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外贸不卡一下，也解决不了，还是不让利，不让税，统统都卖给你。能不能通过这个办法，推动一下，使工厂降低成本。有些工厂降低成本还是有潜力的。有的地方说，外贸不代理，企业自己可以出，这里就有很多新的矛盾。现在外贸亏损有两种产品，一种产品确实不划算，搞来搞去，搞到外国，劳民伤财。还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是集中反映到外贸亏损上，就是国家赔钱，实际上是国家财政补贴。但是工厂还是有利的，或者是有潜力的。税收还是可以降低一点的。解决的办法，一种是外贸代理，地方自负盈亏；还有一种，外贸、地方、企业三家，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共同研究一下，在国际市场还有销路的情况下，如果工厂还有潜力，工厂让点利，财政让点税，就可以多维持一部分生产。

还有一个问题，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外贸转内销的问题。为什么外贸不自己销？你没有网点，靠小商小贩也可以嘛，百货大楼可以卖嘛！直接给国营商店。外贸收购了一大批，卖不出去转内销。这部分商品质量是比较好的，在国内是高档的，价格是低档价格。有许多

很便宜的东西，简直令人难以相信。究竟钱让谁赚走了？全国各地都有出口转内销，叫“特大喜讯”，经常有人排队。出口转内销，外贸亏是一定要亏的了，因为收购价格很高，内销杀价杀得很厉害。外贸部门说是商业杀它的价，商业部门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最后是国家吃亏。每年出口转内销，全国不知要亏多少，可以算一算这个账，能减亏多少？每年至少可以减少四亿元亏损。

近几年外贸有个比较大的发展。发展当中要有个分析，传统市场、传统商品即使亏损，我们也得保，因为它是传统产品。国际市场，一个时期一个变化，过了这个阶段可能就好了。但是，我们这几年的发展，确有一些盲目性。比如蘑菇，本来在国际市场就是个饱和的东西，过去中国没有搞，主要是南朝鲜、新加坡在搞，后来我们搞起来，一下子发展很快，你搞我也搞，要搞大家搞，这个东西容易搞嘛。但是国际市场容量就那么大，搞得太多就出不去，加上外贸多头对外，廉价出口，结果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国外还有几个案子告中国倾销。蘑菇全面开花的结果，就把一开始建立的几个蘑菇出口基地给冲垮了。珍珠发生过一次，统一后好了些。要研究一下，一种传统产品、传统市场，还有这几年盲目发展的产品，超过了国外市场的需要，不仅现在超过，即使市场回升，我们的生产力也是过多的。这些产品如果不转内销，不以内销为主，再想保也保不住。这不仅是亏损问题，而且是个盲目生产问题。有几种东西，抽纱也是这样。抽纱过去有几个传统生产的地方，一个是潮州，一个是烟台。潮州本身也有盲目发展。潮州原来是多少数量，烟台原来是多少，现在是全面开花，千家万户都去搞。其他地区过去从来不搞的，现在也搞。国际市场并不存在一个很大的空额，它也是个挤来挤去的问题。五年时间内，外贸进出口总额由二百亿美元增加到四百亿美元。翻了一番。所以要做个分析。我很赞成这样一个观点，外贸亏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能单纯就外贸亏损来解决外贸问题，要分析，有一些传统产品、传统市场、传统数量，不能因为扭亏，一下子把它们搞光了，退出了市场，老百姓转业也没法转。至于那些搞多了的产品，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只有关停并转。所谓转，包括转内销，国内市场很大嘛！当然，出口转内销也有个适销对路的问题。有些高档出口商品，农村并不需要，要转一转。当然，转也不能一声号令。

外贸工作，在继续稳定和发展中间有个调整问题。这里我用了个稳定，从长期来说还要发展。当前可能是稳定。对五年来盲目发展起来的东西，我们要保一些质量好的。还要保多年来扶植起来的老出口基地，多年来老百姓靠那个生活，你把它冲垮了，老百姓吃什么？新基地才搞二三年，可以生产别的东西嘛！这个问题，光是外贸部门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外贸部门要提供信息。究竟外贸部门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要研究分析一下。我也不主张这件事突然一两个月，二三个月或者一年解决这个问题。有些要大发展，有些要稳定，有些要紧缩。这就有调整问题了。紧缩就是调整。这就有个老基地、老产品、老市场，有个质量问题。外贸亏损是个大问题，但我们考虑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纯从亏损去考虑，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外贸部要好好研究一下，各地、各级都要很好协助外贸部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避免盲目性。不要把指导思想只是放到一九八四年的亏损上，减少多少亏损。要看到我们这几年发展中间确有盲目性。你今年不转，明年也得转，今年不停，明年也得停。这就希望外贸很好分析，研究一下。

这几年，我在国务院多次讲过了，外贸部要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往往对国际市场信息没有个基本的估计。资本主义市场它有好多很偶然的因素，一下子价格就可能涨得很高，一下子又可能跌得很低，我们不能盲目地跟着国际市场跑。要考虑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现在，我们外贸越来越大，占那么大的比例，根本不考虑国际市场，国内就是自己这一套，这不行。但也不能盲目地跟着国际市场价格跑，那样国外价格很难稳定。比如不久前国际市场茶叶大涨价，原因就是印度搞了三个月停止出口，一下子价格冒上去了。现在它又开放了，价格可能又要下降。有一些商品在国外的容纳量是不太多的，但可能一次把价格抬得很高。过去，我们外贸部门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国外市场一紧，价格已经涨得很高了，国内赶快抬价收购，布置扩大生产。等到你布置了，生产搞上去了，国际市场价格又降下来了。人家把牛偷走了，我们去偷那个拴牛桩子，结果被人抓着了，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给生产单位也造成很多盲目性。高价收购刺激它，搞出来以后又停止收购、杀价，造成损失很大。上次我说过，这类产品将来必须保持相当的库存。国外价格上涨时，我也不增加多少收购，就销库存，把库存的东西拿出去；国外市场价格下降的时候，我还照常收购。通

过库存调节，来对付国际市场，这恐怕要能沉得住气。我们往往有时看着广州交易会，商人来了，开张了半个月，才知道什么东西看涨好卖，一看涨就抓，就布置生产，扩大生产，结果秋季交易会行情就变了。比如高档的工艺美术品，过去中国很有名，现在也是搞得太多了，自己跟自己竞争。高档的工艺美术品，在国外终究有多少人去买？我讲这一段，就是不要把外贸亏损总是看成简单的问题，是个大问题，长此下去国家确实负担不起。现在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一下子降多少，这要进行分析，也不能简单地从压缩亏损上考虑问题，不然明年又可能出现另外的问题。这一点，我希望外贸部门、各个地方好好分析一下，特别像上海、天津，你们掌握的外贸信息不一定比外贸部差，你们也很好研究一下，哪些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你们也不仅了解本地方，还有行业。比如地毯，天津口岸应当是有信息的，国外市场、国内生产能力究竟怎么样？通过几个口岸，结合外贸部好好研究一下，经过今年以及今后两三年，既有稳定，也有发展，同时也有调整，恐怕要这样来解决问题。我这是讲一些想法，再具体还要很好研究，要信息分类分析产品。

四、关于上收企业问题

现在下边有人反映我们向上收企业收得很多，除了几个大公司以外，各部还有收企业的吗？原来我们有过这个意见，全国只搞这么几个大公司了，今后即使再搞也不会多。除此之外，各部没有搞大公司，也在收企业，这个做法好吗？我觉得改革总得有个方向，即使有些改革一下子还实行不了，但是现在要展望一下。靠增加中央直属企业解决中央财政问题，恐怕这个路子不可取，也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方向还是靠搞税制，当然哪一天能完全实行是另一回事。将来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是分税，这个方向已经大体定了。国家和企业也是靠收税，当然税种不一样。有产品税，有八级累进税。产品税体现一种价格差别，利润的多少，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解决了，中央和地方来分税，这是世界通行的办法。哪些税归中央，哪些税给地方，哪些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这样，大家都吃税收，企业就可以独立经营了。当然，国家税收也不会很轻。如果将来是这么个方向的话，那

我们就可以不必考虑中央要掌握多少个直属企业来解决财政问题。要走这个路，就少了一条收企业的理由。再一点，我们现在既然强调大城市的作用，中心城市的作用，各部又收企业，就不利于走改组、联合的路子。有条件、有必要组织的全国性公司，或者大地区性公司，当然是要管企业的，我指的不是垂直性公司，而是从解放生产力出发的公司。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大企业中央都要收回，这种做法不可取。有色、石油化工那都是我们这儿定的，那是要搞的。

五、关于建立集体企业社会保险基金问题

二轻系统能不能有一个办法过渡一下，不要一个厂包一个厂的。国营企业有劳保福利，二轻企业退休工人是各厂管各厂。一个是小企业放开，二轻放开，这是一条，是探索性的了。第二个奖金也可以跟它的营业效益挂钩，不机械地管它是几个月。第三还是用工资总额控制。超过工资总额的收劳保福利费，慢慢地以城市为单位，把集体企业工人退休后的劳保福利问题统一解决，不是一个厂包一个厂。这就是说，奖金一放开不加以控制，将来会发生问题。新企业退休工人很少，交了税以后留下的钱很多，一下子工资奖金发得很高，过上几年企业老了，退休工人的负担都要它背，这样就背不起了。能不能在企业的包袱比较轻的时候，就开始征收一种劳保福利基金。将来是按行业还是按城市，还是按地区，这个问题在集体所有制企业里是个大问题。

小企业放开以后，哪个赚钱它就搞哪个，包括所有社队企业都有这个特点。它不承担国家计划，也不负责安排市场。所以，一放开以后，利润很低的它不干，就要掉头了，这是它的优点，转化比较快。一是经营搞活了，二是可以跟着市场走。一般地讲，会经营管理的，只要真正放开，工资就高于国营企业。像这些企业，完全不顾后，工人五十岁了以后怎么办？这部分人劳保福利谁负责？所以，像这些企业放开以后，必须筹划一部分社会保险基金。这样，一方面可以适当制约一下它的工资，不要一下子分光吃光，避免将来企业混不下去。国营企业也得考虑这个问题。以前不是出过一个题目嘛，实行两级工资管理，或者将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实行

奖金不封顶。不封顶，总还要有个节制的办法。对放开的小企业、自负盈亏的小企业，这个办法恐怕要赶快研究。

加强行业协会 发展食品工业*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食品工业要加强行业管理

你们搞的内部材料我看了。现在看来，对食品工业，要从加强行业管理上做文章。成立食品工业部不行，矛盾太多。就像机械部那样，对军工的和其他部门的机械工业还是管不了。而且，成立食品工业部后就不超脱了，对轻工业部、农牧渔业部、商业部系统办的食品工业就不好协调了。看来还是要搞好行业管理，要按照这个方向来考虑建立组织。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家来办食品工业，一个部门垄断起来不行。如果成立食品联合总公司，那同多部门管理也有矛盾。食品工业大量的是小行业小企业，分散在各地，多数行业不适宜于建立全国性的公司。而且成立全国性公司以后，忙于业务经营，精力就分散了，不利于搞好行业管理。所以，食品公司、联合公司，地方可以搞，但全国性的不要搞。

看来还是应该加强食品工业协会。食品协会是推动食品工业发展的行业组织。还可以在经委内成立一个协调各方面的领导小组或办公室。对外，就叫食品协会，对内是行政上的协调机构。主要任务是加强行业管理，搞好统筹、规划、协调，制订政策、标准，搞好食品卫生、检验、科学技术等项工作。

至于成立食品技术开发总公司，我是赞成的。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开

* 这是赵紫阳接见杜子端、韩林光时关于发展中国食品工业的谈话。

发新兴行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资源，搞好技术引进、咨询服务，发展联合等，对外经过批准后也可以搞合资经营。

可以考虑把管协调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食品协会、技术开发公司三个机构搞在一起，一套机构三个名义，三种手段都用。适合用什么名字时，就用什么名字。

二、食品生产要满足多方面的需要

食品工业的发展要考虑两个方向。

一个是搞高档食品，开发新产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提高，对食品的要求也提高了。如城乡收入高的，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就是五千多万人。如占百分之十的人收入高了，那就是一亿人，这是很大的数字。还有一些教授、专家和收入高的城市郊区农民，以及国外的旅游者等，都是需要高档食品的。这方面的要求在不断增加，很有发展前途。

另一方面，要发展城乡人民需要的大众食品。我们不能光搞高级的，还要考虑广大农村、广大城市居民的需要。这个市场潜力很大。比如现在啤酒已经销到农村，就是一个证明。食品工业大量分布在县以下的小城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农村食品工业将会有有一个大的发展。社队企业中的食品工业，要努力满足农村需要。这样发展起来后，既能增加收入，又可以安排很多人就业。

除了发展传统食品以外，要注意大力开发新产品。适应各方面的不同需要，还应搞好方便食品、老年食品、儿童食品等。特别是现在独生子女多了，玩具、服装和儿童食品的需要量增长很快，很有销路。

要研究食品工业的发展，研究上述问题。这里有质量问题，也有品种问题。要尽力满足城乡人民对食品的多方面的需要。

食品工业市场很大，潜力很大。但是食品加工以后，价格就会增加，要考虑城乡人民购买力水平的问题。除了国家规定的实行计划价格的品种以外，食品工业许多都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不可能都纳入计划。搞市场调节放活以后，也会产生一些盲目性，比如盲目建厂、重复建设等。这点

也不要害怕。县以下小城镇，举办小型食品厂和城乡的前店后厂，它们比较灵活，除了国家的专卖产品外，只要有原料、有市场，就可以让它发展。有一点重复生产也不要紧。这些小厂以劳务为主，固定资产占用得少，周转快，适应能力强，“船小好掉头”，原料、市场发生变化后，它可以很快转产。所以不要怕它有一些盲目性。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加强管理，让它们在竞争中提高，在竞争中发展。

食品工业遍布城乡，大量在中小城镇。除了专卖的产品以外，哪个厂生产什么，不要由国家来定点。你一定点，他就会躺到你身上了，今天要这个，明天又要那个，使你的精力陷到事务中去了。这不是好办法。

三、要搞好行业规划

食品工业全国性的全面规划，一下子搞起来有困难，作用也不太大。规划不宜无所不包，应围绕着以下问题来考虑：支持什么行业，开发什么行业，发展什么产品，在哪里发展，以及限制或禁止发展什么等。要提出发展的方向、政策、措施、实施步骤等，抓一些大的问题。

行业规划，要搞超部门的。要从全局出发，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来搞好食品工业的行业规划。要加强专业协会的工作。专业协会不能放在哪个部门，成为部门的协会。要使它成为食品工业各个行业的服务组织、技术咨询组织。专业协会可挂在食品协会，也可挂在公司和企业。

四、要用经济的办法促进联合

要给食品协会以经济手段。有了经济手段，就有了发言权，可以支持、促进食品各行业的发展，支持新兴行业、新产品，打开销路，并推动企业的联合。

经济的办法、行政的办法和食品协会协调的办法，三种手段应一起用。要在计委、财政部等有关综合部门开列户头，拨给一部分周转资金，或给予低息、无息贷款。另外，要拨一些外汇，搞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要搞一些试验厂，也可以收手续费。

五、注意搞好食品工业的科学研究

对各个部门的科研技术力量，如食品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都可以给任务，委托他们进行科研，拨给他们一些科研费用。也可以请专家当顾问。这样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食品工业的技术进步就会加快。

今天讲的，回去向劲夫、吕东、宝华同志汇报。请劲夫同志主持会议，计委、财政部、商业部等有关部门参加，对食品技术开发公司等问题定上几条，就好办了。

重大技术装备一定要确保质量*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关于从欧洲引进技术问题

我们要利用欧洲市场经济不景气、可能卖技术给我们的有利条件，争取多从欧洲引进一些技术。过去我们往往利用欧洲杀美国和日本的价格，最后和美国、日本成交。不能老这样，以后也可以利用美国和日本杀欧洲的价格，最后和欧洲成交。

二、关于择优选点问题

有些单位先要任务，再伸手向国家要大钱，这不行。有些什么任务，可以公布出去，大家来投标。或者不叫“投标”，叫“申请”也可以。要审查一下他是否真正有能力，条件是否优越。一定要进行审查，进行比较，选出真正好的，最后签订合同。军工部门也要参加。假如我们有两个、三个厂都具备条件，竞争一下、择优选点有好处。一定要签订合同。

三、关于保证产品质量问题

大型设备一定要确保质量。用户要派代表驻厂、主成套厂要派代表驻配套厂，严格把关。制造部门一定要对产品严格要求，确保质量，确保成套，负责到底，否则不行，不能不负责任。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四、关于轻重缓急、量力而行问题

我们不能什么重大设备都马上自己搞。有些设备需要量很多，一定要自己搞；有些设备需要量很少，就不必自己搞，可以买人家的。从长远来说，重大设备都要立足国内；但近期内则不一定就全部都自己做。大型设备研制也有一个集中力量问题，例如，我们有了一百吨大汽车，是否还要一百五十吨的？年产千万吨级的露天煤矿可以用一百吨的汽车，千万吨以上的煤矿难道就一定不能用？我不是说一定不要搞一百五十吨汽车，但若花钱很多，力量牵涉很大，就不一定自己搞。如果将来有特殊情况，非要不可，数量少也可以买嘛。

我们这十一套重大设备是都要搞的，这个方针是坚决不变的。但是要量力而行，有些项目先上，有些晚上，要好好排个队。若都齐头并进，花钱很多，我们花不起。一定要分轻重缓急，排个先后，哪些项目成熟的可以先搞，哪些现在先做准备，将来再搞。有些设备难度很大，自己研制把握不大，而工程建设又要得很急，可以先进口，不一定马上自己研制，但可先做些准备工作。

五、关于统一归口问题

搞重大装备要统一归口，统一行动。各部门之间发生矛盾，意见不一致时，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要裁决，李鹏同志、吕东同志可以拍板，我们一定支持。实在矛盾大的，裁决困难的，可以给国务院写个报告，我们来批，支持你们就是了。

六、关于经费问题

重大技术装备今年需要的科研经费，就由财政部增拨。今后要研究确定一个渠道。这些钱不是用来搞一般科研的，而是搞设备研制的，是大型设备的开发费，应列入建设项目，由基建费用中支出。有些基建项目尚未

列前期费用的，财政部可以先预拨一部分。此外，每年再另拨几千万元科研经费给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做周转机动用。你们要的机动外汇额度（指直接从国外购买元器件、仪器仪表和小设备、小工具等所需），可以同意。

视察重庆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日至五日

一、要重视推广重庆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等企业的经验

(一) 实行利改税，企业内部搞责任制，奖金可以不封顶。重庆市建筑一公司的经验不错，把企业搞活了。一公司的经验证明，企业有没有活力，效益好坏，不在于利改税还是递增包干，关键在于企业内部实行不实行各种经济责任制；责任制落实不落实，关键又在于职工工资、奖金是不是同企业效益挂钩，把奖金封顶的盖子揭掉。

一公司的经验还证明了一条，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不一定要搞递增包干。但是，如果国家与企业这一头的关系没解决好，企业内部责任制也行不通，反过来奖金和工资浮动又会搞到国家头上来。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税收关系。利改税，对国家财政收入有好处。利改税第一步对调动企业积极性要差一点，利改税第二步准备在今年第四季度出台。利改税第二步出台后，就会为企业内部搞好责任制创造条件，今年第四季度出台，明年就会大见成效。你们不用担心，财政准备少收二十亿元回来，产品税的税率按中间偏下的水平设计，这样后进地区的亏损面就不那么大了。交了产品税、地方税、所得税后，剩下的就是企业的了。对利大的企业，主要是

* 1984年3月1日至16日，赵紫阳率领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芮杏文、安志文、朱镕基、迟海滨等人到重庆、贵州、湖南等省市考察调研。这是赵紫阳在此行第一站重庆时发表的谈话。

华东、上海，在所得税之前加一个利差税。要讲清楚，这就是“鞭打快牛”，承认差别是为了消灭差别。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过几年再调整税率。调整后要稳定几年，但局部调整年年都会有的。亏损企业、微利企业可以实行包干，但要尽可能多搞税收形式。比如微利企业就是收一道比较低的产品税，不收所得税。煤炭就只收百分之几的产品税。亏损行业，甚至产品税也可以免它几年。当然这个办法说合理也不一定合理，但是可以把价格不合理造成的矛盾适当缓解一下。这就争取了一个条件，可以把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整推迟几年再搞，这样就比较稳当一点，保险一点。

真正按经济规律考虑问题，面临的第一位问题就是调整价格。因为制定“七五”计划就要先理顺经济关系，理顺经济关系，就要调整价格，而调整价格，财政就要净拿出一百五十亿元到二百亿元用于价格改革。这一关冲过了，三五年后我们的经济就会大为好转。但也有一个问题，中央再挤出一百五十到二百亿，用于调整价格，那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这几年其他什么事也不能搞了。讨论来讨论去，认为要搞重点建设，就不可能拿出一百五十亿元。原来我说过，不动价格理顺经济不可能。最近在北京开了两次座谈会，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通过税收，缓解一下生产资料价格造成的矛盾，把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整推迟一下，腾出时间，集中解决农副产品价格倒挂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流通就搞不活，买难卖难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道理很简单，谁经营谁赔钱，就没有积极性。过去东西少，补贴也少。现在农业丰收，去年全国粮食收购了一千七百亿斤，按牌价收购的只有五百亿斤，加价收购的一千二百亿斤；棉花丰收，光这一项国家就要补五十亿元。如果农业再丰收三年，财政就难以为继了。到时候没钱买，农民卖不掉了，就要减少面积。所以，价格倒挂带来的副作用很大。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也很复杂，还得有步骤地分几次解决。但倒挂的问题必须解决，什么买难卖难、交通运输、仓库等，都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是价格不合理。价格倒挂，直接影响流通，反过来又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实行利改税后，如果把企业内部的承包责任制搞好，利改税的作用会更明显。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通过利改税，解决企业内部的关系，是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相应地解决奖金不封顶，把工人的收入同

企业的经济效益挂起钩来。奖金同利润挂钩，必须有制约。将来工资实行两级分配的办法，国家规定企业的工资总额和正常的增长幅度，比如，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你可以超过，超过这个幅度，国家要征税。用这个办法来控制消费基金。现在福建正在试行这个办法。这样就可以做到企业不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内部也不吃大锅饭。国家对企业既不封死，又有制约，企业内部问题也就解决了。为什么超额要征税？就是因为价格不合理，利润水平不合理。如果不征税，就会造成企业之间严重的苦乐不均。当然，根本解决要靠调整价格，在没有根本解决价格问题前，要靠税收来调节。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某个企业的利润特别高，因为有个平均利润率的问题，平均利润率制约工资水平。我们国家缺乏调节手段，有的企业长期利润很高，有的又很低。我们不能让一些利润高的企业拿高工资。只要制约的办法拿出来，就可以放开，我看危险不大。如果全国办法一时拿不出来，各地可以先拿出办法，进行试点。重庆可以同利改税第二步一起搞，今年取消封顶，促进企业内部搞好责任制，可能很快会见效。这个办法其他城市也可以搞。

奖金不封顶，就要搞好企业内部的责任制，不然就会造成奖金泛滥，分光吃光。去年搞了利改税，但没有认真把企业内部的责任制抓起来。现在要在利改税的基础上，认真抓一抓。怎么抓？市建一公司的经验就很好。但是不是就这一种形式？我看不一定。责任制可以搞多种多样的形式。我们农村改革最大的成功，是没有什么压力，允许各种形式并存。城市改革，也要因势利导，要不断总结，不要固守一个框框，既不要保守，也不要不成熟就贸然推广。工资、奖金和利润挂钩，计件工资，浮动工资都可以试验嘛！通过两三年摸索，完善责任制。一开始先找那些经营管理比较好的企业搞，然后推开。这样，提高企业素质就有了内在的动力，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职工生产的积极性就可以结合起来了。同时，要狠抓一下大中企业的劳动纪律整顿。现在劳动纪律很差，松松垮垮。我们整顿企业要突出抓一抓劳动纪律，也得搞几条措施，一是企业要有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解决经济利益问题；二是企业内部实行各种各样的责任制，在分配上搞点物质刺激。要趁这个劲把企业整顿推动一步，企业素质就能提高。看来企业里头没有几条行之有效的东西不行。要在两三年内使企业面貌有个变化，

职工的组织纪律性明显提高，把不负责任、管理混乱造成的大量浪费加以克服，也就是把企业的潜力挖出来，近几年内我们要靠这个吃饭。

重庆建筑一公司的经验，很值得推广，要好好总结。重庆搞，省里可以试点，全国建筑行业也可以推广。现在为什么农民建筑队进城效益高，主要是人年轻，能吃苦。江苏的建筑队，全国都反映很好，主要是效益高，成本低，质量好。当然有个分配问题，只要内部责任制搞好了，效益就可以大大提高。

(二) 贸易中心是促进商品流通的一个很好的形式。重庆建立贸易中心、批发市场，集体、个体都来进货，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过去商业上有两句话，第一叫掌握货源，第二叫安排市场。那是从苏联模式套过来的，主要是商品少的情况下提出来的。现在消费品多了，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开，直接进货，直接交流。搞活流通，最重要的是减少环节，减少费用，降低成本。现在买难卖难，与流通不活有很大关系。贸易中心，大、中、小城市都可以搞，大家都可以到大中小贸易中心、大小批发中心去买东西，这样渠道就畅通了。农副产品要在集中产地搞贸易中心，工业品在城市搞批发中心。如柑桔就可以在重庆搞批发中心。除了搞贸易中心，小城镇还可以搞加工中心。

贸易中心这个办法，如果国家不有计划地搞，整个国营商业系统就势必处于被动地位。通过贸易中心这种形式代替过去的行政区划，就能打破流通领域的条条块块分割，解决行政区划调拨、分配商品的问题。新渠道一打开，旧的渠道非改变不可，最后逼出一条路子来，促进商业体制的改革。中心城市是商品集散中心，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等要相应搞起来，这就体现了经济中心的作用。

(三) 嘉陵厂的经济联合体是“很开眼界，又长志气”的典型。嘉陵厂生产摩托车，组织经济联合和专业化协作的经验很好，要迅速扩大批量，避免重复布点、盲目发展。现在拖拉机、汽车、摩托车都有盲目发展的趋势。有些行业不怕盲目发展，如食品工业，因为它没有多少固定资产。汽车、摩托车之类要有计划，不能盲目发展。我们要支持那些条件好的、质量高的厂搞联合，增加批量，站住脚。重庆嘉陵摩托车如能搞到一百万辆，就可以挤掉很多厂。避免重复布点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支持质量好的

厂扩大批量。只讲限制不行。大批量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淘汰那些盲目发展的。今后大企业同各地的联合，可以采取嘉陵同日本本田的办法，给你软件、技术设备，盈利后分成。上海帮助武汉、徐州，就是采取在销售利润中提成的办法。重庆要生产汽车，四川有这么多军工厂、机械厂，可以搞联合体，出了名，站住了脚，就可以命名为三汽。总之，要搞成一个完全协作的汽车公司，能搞成这个形式，我们就支持。

军工系统科技人员很多，要采取多种形式支援民用企业，你原来是那个单位的还是那个单位的，所有制不变，签订合同，给点报酬。这些事，在一个市里统一抓，比上面抓好办一些。你不动他的人，就不必经部里批准，厂里同意就行了。

成立专业公司后，局可以少一些，搞得更综合一些。与中央各部门对口，一个局可以挂几个牌子嘛！有些公司也可以直接对上面的部。成立公司，就要减少局，这是个必然规律。将来中央各部的方向也是要减少。你们计经委既然合并了，就不要再拆了。不要因为整党提了意见，又分开。不要走老路，合了又分，分了又合，走一步退两步，搞了多少年还是那个样子。我有个总的想法，合了就不再分了，要逼出一条路子来。

二、要充分发挥重庆中心城市的作用

我认为中心城市和直辖市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是想走不是直辖市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道路。上海、天津是直辖市，如果局限于他那个块块，也不一定能起经济中心的作用。经济上的信息、服务、生产中心同行政区划是两个概念。在重庆，因为总的体制没有改变，不搞计划单列，问题解决不了。省里各部门把得严严的，也不好动手动脚。将来省的机构要大大精简，什么时候精简很难说，也许到本世纪末。省里主要定政策，监督，检查，把教育、文化、基础设施搞好，不会影响财政收入。各厅局代表政府，最终得政企分开。政企不分，就没有国家；政企合一，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就什么也不是了。现在没有一个代表政府讲话的。中央一些工业部、委也不代表国家，只代表企业讲话，没有矛盾面，把矛盾面集中到财政部，财政部代表国家。因此，对法定的东西执行不了，对他有利的就干，

不利的就不干，没有对立面，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关。将来中央各部委也好，省的各厅局也好，前途就是大大精简，有几个综合性大一些的部门，主要是搞立法、检查、监督。企业没有独立性，不能相对地摆脱部门的束缚，就不可能出现联合体。中心城市要从这个角度看远一点。重庆是四川的一个市，在经济上起中心城市的作用。用经济办法，重庆不但可以超出重庆市的范围，也可超出四川省的范围，但这条路是漫长的。这条路子怎么走开，要慎重，要摸索前进。解决条块问题，就是要通过中心城市，使中心城市的作用进一步扩大，条块的作用逐步缩小。现在取消各局不行，但不冲一冲也走不动。重庆离昆明远，同贵州的关系要密切一些。重庆要首先辐射到贵州、川东，提供跨省的经验。中心城市辐射出去，一靠能量，二靠交通。成都也不小，是省会所在地，也是中心城市。

发挥重庆中心城市作用，省上可以成立一个重庆改革领导小组，国家体改委派代表参加。

三、开发能源交通要搞一些见效快的项目

现在对地方上的能源、交通建设要放宽点。有些地方算 2000 年翻两番的账，如果没有能源，能翻两番吗？去年翻番的风吹得很大。每个地方都去算翻两番的账，而且都去搞加工的东西，一厢情愿，那又会出现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的速度，那到 2000 年就可以翻两番。但是，到 2000 年还有十几年。简单地去翻两番，大上大的加工业，搞重复建设、盲目建设，那是很危险的。我们翻两番，要靠政策，要靠能源建设，要靠技术改造。

开发能源、交通，还有个长远和当前的问题。中央搞大的，投入时间很长，这就有一个“七五”、“八五”靠什么的问题。我们国家总得要有几亿农民搞别的东西。将来华东和沿海地区的社队可以拿出钱来搞加工业，生产一些质量比较好的产品，同城市竞争。西南、西北的农民干什么？我认为开矿是个很大的出路，山西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四川有许多小煤窑，有大量的黑色、有色金属，也不是说县以下就不可以办。广东英德县四十万吨硫铁矿就是农民搞的。中国的农民多，劳力多，特别是四川，土

地不多，可以去开发水电、煤炭、有色金属。这就要把长江搞通，把各地的水路、公路，同长江连接起来，丰水期用船，突击运输，修些仓库存起来，做到常年生产，常年运输。当然，对开矿、挖煤要进行指导，要经过申请、批准，不能乱挖，要有规划，开始规模不能太大，分期开采，逐步搞些机械化。这样搞投资少，来得快。现在我们要搞重点建设，没有重点建设就没后劲，但“七五”、“八五”断了气，也就没后劲了。所以，各地都有个技术改造问题，有个搞能源、交通解决近期需要的问题。如果大家都等着重点建设，不解决近期需要，工业就会萎缩，重点建设也没有资金了。所以，超收的能源、交通费，中央下决心不要，留给地方，作为中央对地方的投资，搞一些见效快的小煤窑、小水电、小铁路、公路、码头、节能等项目，用在什么地方，效益如何，给国家计委报个账。这样，地方需要的能源就可以不光靠中央了。

现在上上下下都讲长江没很好利用，有这么好的一条江为什么不利用，老在那里修铁路？为什么不把工厂布置在长江两岸？工业布局，一个靠城市，一个靠资源。有人说长江两岸资源不那么多。光说注意不够不行，还要找找究竟是什么原因？泸州化工厂靠长江，建了码头，也没有好好利用；武钢修建时就考虑了利用长江，还为它修建了码头，就是不用。出现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值得好好研究。你们搞船队直通上海，往返周期缩短，运量增加，这说明不花投资，或少花投资，也可以出效益，水路如此，公路也如此。你们还可以搞些短途，修高质量公路。

四、西南和四川目前经济发展主要是发挥自身优势

耀邦同志讲了，西南的开发要先于西北。中国的东西矛盾，不仅现在存在，若干年后也会有。从目前发展经济来讲，若干时间内，重点在东部，但不是绝对不搞西部。要在一定条件下转移，东部不到一定程度不可能向西部转移。苏联建设向西伯利亚转移也是如此。当然，作为战略考虑，从长远考虑，将来发挥作用是西部，因为资源在西部。这是历史的必然发展，但什么时候到来，还很难讲。现在还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自的优势。西南有着特殊的问题，就是花了一千多亿元，搞了三线建设。三线

建设就是大规模地开发西南。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加快发挥经济效益。另外，要有重点、有计划地开发能源、交通。开发西南，还要做好前期工作，现在很多资源还没搞清楚，攀西的资源就很丰富。把前期工作做好，国家说上就可以上。不然一旦确定要上，你又拿不出资料来。开发西南，要有大量投入，可以考虑利用外资。

西南、四川和重庆发展轻工业，要有自己的特点，看哪些有发展前途。如食品工业和重庆讲的玉米制药、饲料工业、饮料等都有特点。你们的农副产品，如柑桔，不要只搞罐头，要搞饮料。四川要研究一下国外的饮料品种。中国的饮料要同中药材的利用结合起来，要同食物保健结合起来。这件事，广东搞得很好。四川要搞食品，要搞饮料。

还要注意农村市场。你们要研究西南农村市场，这个问题，上次我在成都讲过，外边运东西到西南来运费高，开发西南农村市场，出路很大。中国的农村人口多，某一种东西，大家都用，就不得了。

视察贵州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至九日

一

去年油菜限产是不是狠了一点？能不能降点价？过去老百姓坐火车从重庆带玉米，从遵义带瓜子，使这趟车最挤，但很赚钱。油菜降二年看一看，看二年不行再刺激一下。油菜籽要提高单产，菜油要薄利多销，扩销路，多渠道，组织到不产油的地方直接推销菜油，减少环节。要多渠道，一视同仁。要安排好车皮，菜油多了不调出去怎么行？

川东包括贵州把陡坡逐渐退还种草，以后再种树。这里雨水多天气好。现在农村搞了责任田粮食恢复了，还草还林比西北容易。种树间种草，这在西南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人多地少，到处开荒，加上山羊乱放，不行。要恢复植被，长短结合，种树种草。湖南南山牧场搞了草场，草长得很好。草山如何消灭杂草，必须消灭后再种上豆科饲草，不然羊不吃，不要看到草多就能养羊。南方不宜放牧，收草、圈养，这样才能保护植被。山羊破坏植被厉害。西南一人一亩耕地种好就够吃，再发展山货很快能富。香港人说：峨嵋天下秀，原来是几块大石头。有的地方在风景区种茶叶，一开垦非常难看。

桐油是不是政策问题，统得太死？国家干脆不统购了。多少年这个政策没有解决好，放了就活了，也好销了。以后可能政策要下来。桐油退出统购成为自由商品，自己买卖。降价打开销路，国家随行就市收购。当前桐油积压主要是出口受限制。回去讲一下，西南、西北的桐油、生漆都是

主产区。你贵州一年国家收多少，其余你自由处置。现在棉花都已是这样，鲁西北的棉花都自由买卖。泸州、赤水河加上你们这一带酒业还是应发展一下，种高粱发展酒业，这是你们的优势。

退耕还林要有计划，搞点副业增加收入。山上种粮不是办法，要还林、还草、还药。原来说杂交水稻川东不行川东也种，川南不行川南也种上了。你们可出去学习一下。南山草场经验说明，南方改造小山，发展起来比大草原的草长得还好。

长江两岸，宜宾以下，不靠铁路，搞小煤窑，搞成短途运输，通过长江下去。民办公助搞小煤窑，先投资不要多，少一点，以后搞成十万吨，联起来运到长江两岸，分散向长江走。不要搞大码头、大煤场。乌江下游、湖北也可参加进来。长江以南从贵州到宜宾，有条件可建大矿，先搞小煤窑。还有一种方案，不外运搞火电站，确实可靠。100万吨煤可搞20万千瓦火电站。这里条件好，有水。湖北缺煤要从山西运，从长江运得不够，就是因为没有东西运。你们的煤运不出去要用长江。全省不一定一个办法，要用分流的办法。靠铁路用铁路，靠水的修小公路到长江。仁怀从赤水河到长江，几种办法都用。搞个小煤场，枯水期压一压煤，丰水期就运，五到八月大量往下运。这可搞个规划，两省协作也可以，中央铁路也规划一下。这一块搞几百万吨煤还是可以的。四川与江苏合办船队，他们可投一点资，你们订个长期合同，联合起来搞。

经营管理和技术专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有的有技术、有文化但不会经营。有的有文化、有技术，能经营。有的文化低，但有技术会经营。以后班子中要考虑这部分。日本松下幸之助¹，他并不懂电子，后来成了大企业家。外国的董事长，他不一定懂技术，但他懂经营。外国经营家是第一的，然后才是技术。将来不要分公办和民办教师，国家给你钱都一样。可搞各种基金会，国外有很多基金会。

电价全国搞个基数，价格不能大调整，这是个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东北电价一提高就要出问题。成都水电的一级电费贵，非常不合理，但这涉及到老百姓，不好变，一变问题比较大。现在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多的是。

可从钢厂、轧制厂返一部分利给铁厂，搞二次分配，以调动铁厂的积极性。这是调整目前价格不合理的暂时办法。

二

这两年你们发展速度快。过去基数低，但发展速度不快。现在的政策解放了山区，过去落后的地方以后发展会越来越快。

国家进口 1500 万吨粮食很正确。没有这 1500 万吨粮农业就翻不过身来。1500 万吨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城市暂时不吃国内供应的粮食了。这样就缓和了对农村的压力。棉花可以不进口。国内粮食收购总量 1800 亿斤，其中征购粮仅有 1000 亿斤，其余是加价收购的。这一部分可加价销出，但大部分还是要按平价销出，这样财政的负担增加了。给农民休养生息，搞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发展奶牛、肉牛一定要有优良品种。山区资源丰富，可发展林业、畜牧业，为国家提供农副产品。牛要真正发展肉牛。农区可提供肉、奶、耕三用牛，草原要发展奶牛和肉牛。搞专用牛也要专业化，专业化才能搞出优良品种。外国一头奶牛可产 6000-8000 公升奶。他们对奶牛每年都要评选一次。南方草场比大牧区来得快，因那些地方多数是高原。内蒙古草原退化严重。阿坝草甸型草原，海拔太高，要搞很多基础设施，电、路、设备。有了这些才能发展商品生产。南方关键是要发展人工草场。过去南方草场一看到处都是草，但不少是杂草，能吃的并不多，很多还是纤维粗的茅草。因而要改造草场，发展畜牧业。这件事与造林同样重要。南方人多，没有很大的草场，提倡圈养，组织人收草圈养，有计划地割草，不破坏草场。过去放任牲口自由吃，把草场破坏了。我去新西兰、澳大利亚一看，认为可以改变草场。一个草场一个品种，加上商品生产的那一套，加工、贮藏等。现在农、林、水、牧个人承包都能解决。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喊了多少年，现在搞了小流域承包治理后就绿化了。虽然是个开头，但改变了过去造林不见林、花钱不少成绩很小的状况。

中国搞计划经济没有条件，上半年不知道下半年情况，今年不知道明年的情况。去年沿海大量向日本供应廉价铁，今年又高价进口。如果有一点预见性，储备一点，就不会这样。

铁路上是不是计划内外一本账。如果这样他没有积极性，计划内多少，计划外你们要给点，他才可能有积极性。

要分别出协作煤和统配煤的计划。原下达的计划是统配煤，协作煤靠自己挖潜力。现在一本账不好办。中央从来没有反对过计划外的协作煤。

现在山东、江苏用汽车直接拉煤，回去每吨 180 元至 200 元，这些国家都不干预。山西变成了煤的自由市场，成了奇货可居，价格一天比一天高。山西省对煤价可以有一个幅度。协作煤价要有一个幅度，按照议货的品种，用提供技术服务的协作办法来搞。地方协作煤中央从来没有准备干预，地区协作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是国家计划的补充。如果搞死了，江苏活不下去。一年江苏要搞 1000 万 -2000 万吨协作煤。多开辟一些小煤窑，多开一点通道，利用长江、赤水河。能通大江的小煤窑可以搞。你们与江苏省搞好协作，但要保证国家计划的调配。运输单靠铁路不行，要打通江河渠道。你们这个地方可在小煤窑的适当地段建火电站，与大电网联起，与四川联起。贵州的煤从国家考虑，一是修铁路运煤在外省搞电站，一是在这里搞电站向外输出电力。

上攀枝花钢铁项目有个上二滩水电站的问题。由于当时三峡水电站能不能上还是个问题。搞攀钢只好上二滩。但一是周期长，二是要上三峡。国务院开会研究三峡，只有我一票反对。后来小平也坚决了。我怕一下子上去又像宝钢一样，建设周期长，十年后才见效益。后来定了低坝方案，大家都同意。150 米正常行水位，坝高 165 米，再加 10 米防洪水位。发生特大洪水时，淹上不淹下。现在移民 30 万人，不超过 50 万人，这部分人今后靠吃商品粮、种柑橘。装机 1300 万千瓦，移民 50 万人，投资 200 亿元。这是最近定的，今明两年准备，后年上马。现在要在上三峡的基础上，考虑水电的开发。以不影响上游水电和西南水电的开发为原则。上三峡、上红水河电站，二滩、乌江、红水河这一片多得很。三峡不影响上游上水电站，只是轻重缓急的问题。火电还是要上，不然有一个配套问题，还有一个“七五”、“八五”的动力问题。火电周期仅四年。可在黄河边搞小煤窑，建大电厂，利用黄河水。

将来长远发展，一定要把耗能工业放在西面。西电东送，不能在东面搞高耗电工业。西南开发要与有色金属冶炼结合起来。电力不能出口，但可通过冶炼有色金属出口，这本身就是一种能源出口。有个问题未突破，即与外国合营开发资源。从外国贷款只能买设备，最多能占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靠国内。而国内一机部的意见，合营较好，地区占一半，他们出一半，设备还可造一点。不行还可借一点高利息的贷款，把我们的

消费品卖了还贷。这个问题还未突破。国外对中国信心不足，有色金属欧洲兴趣大。搞合作开发作用大，光用国外买方信贷受限制大，国内配套跟不上。用外资只能进设备，进口他们的钢材都不行。国外借贷都是高利息的。国内无钱也可搞起来，但我们的效率低、周期长，债务大了不容易还。煤与外国人合营不行。一合营成本提高，工资也高。成本高了又不一定卖得出去，再转成内销，要大量赔钱，我们国内煤又不够。但有色金属不同，要和水电一起搞，有色金属的开发，把冶炼捆在一起，搞加工出口。这样争取外资是可以的。天然气前景好，提点价，把天然气开发搞起来。你们贵州磷矿也好办，可以搞磷铵。这里电多，可以搞电解黄磷。这个问题可以考虑，运黄磷出去也是能源出口。总之，搞电厂送电是一种办法，搞铁路运输、黄磷、洗精选煤、焦炭、搞耗能工业都是办法。这样布局和效益都要好一些。产原料的地方可先发展耗电工业就地加工，就地冶炼。沿海主要用外国原料，这样可把耗能有色金属出口，然后进口原料解决沿海的问题。应逐步改变，向这个方向调整。

三

铁路运输要改车箱，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可增加百分之几十的运力。电气化后可增加运力一倍。我们现在一列车拉得太少，一个车皮60-70吨。车皮要加长、加大，车站、线路问题不大，过桥问题也不大，搞成专门运煤的专列。铁道部长的大的列车可搞一点，大额车，地方铁路，搞双轨复线都要研究一下。第一搞铁路电气化，第二研究国外的大额车。路轨轻，车辆少，站线短，是我们铁路的不足之处。计委要研究一下，西南改善铁路和电气化要花多少钱。把原煤变成精煤、焦炭，把磷矿变成黄磷。煤要先选好，选一下就能节约百分之二十的运力，价钱也提高了。

我们很多问题在上面搞不清，到下面看一下就清楚了。如能源问题，煤与运，运是主要的。真正解决了运的问题，要多搞一点煤还是容易的。可以让社队参加开采，外国人搞煤矿急的是加快资金周转，搞一个矿周期短。我们总想把开采年限搞长，认为这才是合理的。煤矿开采不要搞上百年的。

要考虑“七五”的特点。我考虑如何能转过去。现在矛盾多，要煤，就要开矿。如强化开采，就可少一点开矿点。随着国家资金情况好转，也可以开新矿点。现在一说还可开采50-60年，为什么不能30年，30年都下世纪了。现在科技发展了，再有50年是个什么样子，有什么新技术都说不清。分期开采，国外也是这样。山西有个副总工程师讲，大矿不一定周期长，道理就是多开口子，先开一个口挖，周期就可缩短，煤炭部不赞成。美国一个长期搞石油地质专家认为，美国的石油设计思想是保守的。实际我们也完全如此。外资就是强化开采，合营以后，开采年限就在15-20年。资源开发，有色金属不一定这样，煤炭可以这样。打一个井进行强化开采，快出煤、多出煤。提前出了煤发了电，能创造多少财富。这与你新开采到底哪个效益好。小矿、余量不大的煤矿不一定这样搞。二三十年内可以这样搞，这二三十年是我国很关键的年代。又要建设，又要体改，很多矛盾需要解决，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资源丰富的为什么要开采100年？为什么不可以50年采完搬家？五十年代的矿，90年后可搞强化开采，缩短服务年限。可以集中搞电站，周围由小煤矿送煤。小煤窑可以给贷款，这样搞电站不修铁路了。不过这要看条件。有的矿开采不容易。新建矿就不要这样。

今后这十五年非常重要，这两年要搞好十五年的建设规划。如何搞得好一点，矛盾少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总的十五年，矛盾这样多，如何有效地解决。如一个小孩子背稍重一点的东西并不影响生长，如果让他去背很重的东西就把他压坏了，长不到三十岁就背不动了。整个要有规划。今后要比现在好些。计委要组织一批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耀邦和我都主张计划外协作的东西可联合起来搞，国家计划部门不要干预。耀邦提出西南经济协调会要坚持平等互利、轮流坐庄的原则，不要搞成封闭经济。华北在天津开了两次会，搞了十几个办事处。华北搞协作是成功的，他们之间展开了相互协作。你们三省四方开个会，我们派人参加，搞好后责成宋平同志联络此类事。广西希望能成为西南协调会的正式成员。三省四方搞个规划，各方最好能派人参加。开第一次会最好能有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注 释

1. 松下幸之助(Konosuke Matsushita, 1894-1989), 日本和歌山县人。跨国企业松下电器创始人, 时任松下公司顾问。曾任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他在公司经营管理中从日本实际出发, 创立了事业部制、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等, 是世界著名企业家。

视察湖南时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至十六日

一、关于粮食生产的问题

粮食情况还要看两年，大的方面要作些决策。现在与国外签定了长期进口合同一千五百万吨，不能变，从美国进口六百万吨，明年到期，去年还少购了二百万吨。

苏联和东欧都需要进口粮食，我们可以向苏联、东欧出口，但出口要签定长期合同，临时合同他们不放心。现在，在粮食上我们与外国签定长期合同是不是很有把握？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国内的粮食是不是过剩了？就湖南来讲，好像粮食多了，但也有些地方不够吃，林区就不够吃。省委就不敢多给林区粮食指标，因为有个高买贱卖的问题。从全国来讲，是粮食渠道不通，缺粮的省不愿意多调入，粮多的省不愿意多调出，一句话，就是价格倒挂，收购价高，销售价低，这就使粮食本身不可能很好地流动。粮食是商品，粮食部门经营没有很大的积极性，经营越多，亏得越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物往贵处销，这是客观规律。我们国内所谓商品流通问题，价格不合理是重要的原因。小商品放开了，但大动脉、大产品，很多是价格倒挂。过去他可以吃大锅饭，亏多了还是那么多工资，现在涉及到利润问题、利益问题，经营越少亏得越少，经营越多亏得越多。很多农副产品是倒挂，外贸也是这个问题，他没有积极性。当然，这里面还有个经营环节问题。这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好。因为，第一是生产确实多，价格不合理；第一是流通环节不通，渠道太少，环节太多，加剧了这个矛盾。但价格

不合理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今年你们的柑桔，大家说没有卖难的问题，说什么汽车出了力，火车出了力，我看最主要的是放开了，经营者有积极性，价格在那里起作用。这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如果粮食等所有的必需品都这样，那就不行。职工的工资不高，吃不消。现在价格问题，从整个来讲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助长人为困难，助长买难卖难。为什么流通环节不通，主要是经营者没有积极性。去年粮食棉花大丰收，国家收购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购销价格倒挂，要卖就得赔钱。这是一个新问题，是我们国家多年来没有遇到的问题。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多少东西，商业部门主要是两大任务，收购产品，安排市场，那时倒挂的情况没有现在这么大。不单是粮食，其他农副产品除了完全放开的外，都有倒挂的问题。

粮食问题，我们暂时解决的办法，一是增加库存。要修一点仓库。我们国家要储存一点粮食，到第二年新粮上市时，要有点后备。这就要国家投资，建一点仓库，占用一部分贷款。二是增加出口。大家说粮食多，但现在还没有把握向外国签订长期出口合同，与外国签定长期合同，没有几年很难看准。说粮食多，但猪肉又紧张，全国有十四个省吃从四川调进的猪肉，粮食多可以多养猪。苏联需要猪肉，我们跟苏联谈判，这还是块王牌，今年出口五万吨，已在北京跟苏签定了合同。在粮食出口上，现在看来可以采取转口的办法，转卖一部分给苏联。苏联需要粮食，他宁可不要美国的，要我们的，他跟美国竞争，要美国的感到丢脸，我们给粮食他可以要。

在粮食问题上，陈云同志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他几次提醒我们，无论如何不要说中国粮食多了，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一点。储粮食，也要采取多种办法，建仓库那也不是一下子能建起来的，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办法，比如，叫专业户保管，国家出保管费，正如我们国家仓库储粮有管理费一样。还要研究开辟加价销售市场，包括用加价粮食加工食品、饲料，饮食业不收粮票等办法。你们还可以与北方换杂粮搞饲料。（毛致用¹：运费高、环节多。）不通过粮食部门可以搞通，通过粮食部门环节就多。过去我在四川时，就拿小麦到河北、东北换包谷，换回包谷酿酒、作饲料，还赚了钱。

大米出口是不是有一点甜头？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比小麦高一倍，因为世界上产大米的国家不多。粮食多了总有办法解决，总的讲，现在不是粮食多了。

适合种水稻的地方还是种水稻，不能各个地方都搞多样发展。从粮食结构来讲，大米不是多了，杂粮也不是少了。从整个世界上来讲，大米不是多了。不然为什么一斤大米换两斤小麦呢。大米也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就要商品流通嘛，至于一下有困难，交通跟不上，这是暂时的因素。像美国，种玉米的就是完全种玉米，大片都是玉米。像英国，东部是小麦、西部是玉米。当然，你这个地方不适合于种大米，可以种杂粮。我看从全国交流来讲，种大米不会吃亏的。不能说流不动我们就少生产。流不动是流通的问题，要从流通上解决。也可能等你今天改了，明天流通就通了。所以，看远点，我说就不一定要改大米。商品生产就要各个地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将来国家非发展饲料生产不可，饲料也可以交换。我们国家还要进口粮食，我们可以进口饲料调换大米嘛！调不动是价格问题，这都是一些暂时的矛盾。现在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饲料把农民用于饲料的那一部分大米交换过来。如果我们用这种饲料，花费不比大米多，这种饲料喂猪比大米更合适，农民就会愿意交换，大米作饲料并不好。譬如北方的红薯，就已经跳出了口粮的范围，北方不吃红薯了，红薯变成饲料了，并且每年大量出口给日本，能出口为什么不能交换呢？将来饲料还是要搞配合饲料，充分利用豆科作物等。粮食要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水源不足的地方，保一部分水稻，另外再种一部分经济作物是可以的，如果是为了品种齐全，那就不是商品生产的观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有很多经营环节上的问题。现在粮食调进调出占的运力比正常商品交换占的运力要多得多。将来这种不合理的运输要大大减少。在发展粮食生产上，种两季水稻再种一季杂粮，都是禾科，本身是一种不合理的做法，除了掠夺性的经营，或者是实在没有饭吃，逼着非这么干不可。

二、关于林业生产的问题

湖南森林覆盖面积大，林业还是搞得好的。

大跃进时湖南是比较稳的，只是庐山会议以后头脑发热。所以，毛主席批评“见事迟，抓得慢”。但从中南五省来说，大跃进，瞎指挥，湖南不算是最厉害的。湖南毁林开荒不算严重，第一没有四川严重，第二没有

广东严重。湖南对林业的呼吁比较高，平化²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的，每次到北京开会都呼吁这个问题。广东肇庆地区，到处是“大字报”田，川北、川东到处是“大字报”田，湖南这方面的情况好多了。这与湖南粮食一直比较好有很大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中南地区，一个湖南，一个广西，农业是稳步上升的，并有较大增长。一九六五年广东比湖南的粮食多五十亿至八十亿斤，到一九七二年两省差不多，可能湖南稍高一点，以后湖南就更高了。由于这个原因，在湖南的干部中会不会带来什么想法，是不是认为可以了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从中南几个省来讲，从一九六五年以后，你们的农业、供应都比较好。一九七〇年我在湘中下放劳动，那时长沙市场的供应好，这与粮食生产好有很大关系。当然，这不是说湖南没有困难的地方。

现在只要有可能，木材还要多进口一点。木材有两个问题，有些地方是采伐太多，有些地方是路不通，运不出，都涉及到一个投资问题。如果是投资能够多点，有些地方就可以多采伐些，有些林区就可以休养生息。我们跟苏联谈判，谈到木材进口，他这是一张王牌，原来说XXX万立方米，到现在还没答应。木材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运输线很长，亏损很大。

三、关于张家界的管理与旅游业的问题

张家界要统一规划，但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上面总是强调归谁管，别人插不上手，这不好。要研究一下，哪些归林业部门管，哪些归旅游部门管，哪些归文化部门管，上面有个机构统起来。风景区与森林保护区不一样，旅游部门参加，可以搞一些旅游设施，帮助规划旅游路线。现在外国人喜欢几日游，买一张票，按照旅游路线游几个地方。张家界开放，与那些旅游点连起来好，要有所考虑，不能孤立地搞一个点。旅游有个流向，有个路线，过去南京搞了很多旅游点，但由于上海旅游点少，人家不好孤立地到南京来，结果任务不饱满。湖南比较封闭，到张家界应从哪里来，大概不会从长沙来，长沙没有多少旅游点。你们说从桂林到这里，到桃源，还可以考虑从三峡、武汉到张家界。

四、关于大水面发展渔业的问题

我们大的水面的经营体制没解决，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办法就会好些。大的水面究竟以一个什么样的管理形式比较好，要很好地探索一下这个问题。大水面我说第一个还是管理体制问题。我们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有很多问题管理体制不解决，技术问题很难解决，先进技术推广不了。大水面里面，现在是大家都捕捞，没有人放养，要用个什么好的管理体制把它统起来。大的森林可以划开，但是水面划不开，水是流动的，鱼也是流动的，你要放点鱼苗，投点饲料，它可以流动。第一是管理体制没解决，第二是捕捞问题没完全解决。这么大的水面，这么深，究竟用什么方式来捕捞？总的来讲，我觉得小塘小坝问题容易解决，只要承包到户就好解决。大河大湖，还有一些大的水库，究竟怎么利用，有个管理体制，有个捕捞的办法。大水面好多是跨行政区域的，两省之间、两专区之间、两县之间的矛盾怎么处理好？南方水的资源和荒山用得不够，一些小的荒山可以包给专业户种草、种水果。水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我们国家现在在副食品供应方面，鱼是最紧张的，价格比猪肉高，更主要的是少。海洋捕捞问题没解决好，内湖的养殖问题也没解决好。现在好像很成功的经验还不多，如果能找到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就好了。主要的问题是经营的方式，把经营方式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好解决。有人讲过，他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收渔税银子，收渔业税，你要他来领执照就可以打鱼。大家乱捕这个问题好办，就是没人去下鱼苗，去下饲料。不投饲料，有鱼大家来打，就是吃大锅饭嘛！收渔税银子是《打渔杀家》里面的一句话，我想这也有点道理。你打鱼多我收的税也多嘛！把大家的利益和税收结合起来，打鱼的只管打，我收税的负责培养渔业资源。所以，有人就说可以采取这种渔业税制的形式。总之，水面的利用问题要很好地研究，利用好了可以增加一部分蛋白质，对改变人民的食物构成有好处。

五、关于茶叶生产的问题

茶叶不好销，就放开，减少环节，让他自己去销，产区直接向销区推销。要面向农村市场，农村是最大的销售市场。如果北方农村都吃茶，市场就

大了。现在农副产品一部分是价格定高了，特别是外贸产品，根据国际市场定价，把价格定得很高，市场一变化，就销不出去，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是，经营环节多，转来转去，价格就高了，减少环节很重要，多渠道，少环节。特别要注意研究农村市场。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农民购买力高了，就是近一亿人口，等于一个日本。当然现在太贵了的东西农民还买不起。我们要减少环节，产销直接见面，薄利多销，薄税多销。

六、关于农村改革税制和发展专业户的问题

财政包干后，大家都抓收入。农村税收，从长期来讲要改革。我国农村税收，过去只一个农业税，都由土地承担，随着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也要征所得税。税收问题，一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一下搞得太多太猛，可以轻一些；再是不要乱来，乱插手，都到农村争利，农民吃不消。

有的专业户经营不下去，并不是由于税收过重造成的，要作具体分析。最近内参上讲到河南省两万多专业户垮了，我问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同志是怎么回事？刘杰说，做生意的不可能都发财，专业户，有的经营不善，有的本来就是盲目发展起来的，垮掉了是正常现象。我同意他这个看法。既然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分化。总的趋势是发展，但有分化，改行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专业户有盲目性，经营跟不上，社会化条件跟不上，规模搞得很大，搞了以后就参观，大肆宣传，好像专业户越大越好，结果助长了形式主义。专业户要量力而行，支持也要适当，主要是在政策上支持，不能拔苗助长。什么事情都有个过程，都要顺乎自然，因势利导。有一部分会经营、有本事的人，发展起来了，可能要雇工，扩大规模。有的搞一下不行，又种田去了。在一定时期，农村专业户是两头小中间大，就是说，真正搞专业的，完全离开土地，到城镇去，恐怕是一小部分；还有一部分粮食专业户，也不会很多；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以粮食为主，经营一些别的东西。总的就是逐渐分离，分工分业。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很多东西会不断分化，有发展，有淘汰。优胜者生存，弱者被淘汰，形成分工的过程，改组的过程。我国农村商品经济

不发达，交通不发达，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在沿海可能短一些，内地会长一些，这和社会化程度分不开。我们的路子算是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路子往前走是需要较长时间的。

专业户送礼是半真半假的。有的是准备将来应变的，给社队干部多少，给社员多少，一旦有事他不会孤立。

七、关于推广南山牧场经验的问题

南山牧场的经验很好，为开发利用南方草山走出了一条路子。南山牧场实行责任制后扭亏增盈，同澳大利亚搞技术合作，改良草种，提高载畜量，这又一次证明了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重要性。试办家庭牧场，这个办法好，可以保本保值，付利息，租赁制，搞好了还允许雇工，中央一号文件定了，两个帮手，三个学徒嘛。将来在国营大牧场内部，很可能有许多自负盈亏的家庭小牧场。大牧场要为这些家庭小牧场提供良种、肥料、除草剂，病害防治以及产品的收购、加工、储运、销售等产前产后的服务工作。我国南方有十亿亩草山，国家要开发这个资源。大草山可实行放牧，小草山应实行割草圈养，以免破坏植被。南山牧场要好好努力，要出经验，出人才，出技术，出草籽，出优良畜种，支援别的地方。

划给社员的丘陵，种草行不行？种草养奶牛，采取圈养的办法。农区、粮产区，如果有草，可以发展奶牛，小片经营。听南山牧场的同志说，改造的良种草场，一亩地可以产一万多斤草，能养一头奶牛，牛奶可以到城镇加工。你们有劳动力，又有粮食，加上良种草，我看可以试一试。当然，丘陵可以种树，种果树，但不能都是果树。边远的大的山可以造林，有的也可以种草。我们国家食物以粮食为主，但总得增加点奶，增加点肉，增加动物蛋白，改变一点食物构成。

八、关于农村大好形势的问题

农村能有今天的大好形势，主要是两条：实行责任制，给农村恢复了生机。多年来农民的积极性不高，搞包干到户，调动了积极性，有一

个根本的变化，这是基本的。但还应当看到一条，如果当时不下决心进口一千三百万吨至一千五百万吨粮食，农村不可能有这个形势。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城市基本上不吃农村粮。这样，才给了农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是恶性循环变良性循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加上大包干的积极性，粮食上去了，多种经营也就上去了。当然，如果只有进口粮食，没有包干，也解决不了问题。过去湖南调出十亿斤粮食，广东在“文化大革命”前调出八亿斤，后来调三亿斤，贵州基本上自给；四川那就调出更多，后来搞垮了。现在广东调进二十亿斤，如果三年前不给广东调进二十亿斤粮食，那什么都是空的。云南、贵州各调进十亿斤，甘肃调进十二亿斤，内蒙古调进二十亿斤。那时我在内蒙古，有同志说不要调进粮食了；我说不能这么讲，要调，不调怎么做到以畜牧业为主呢？过去，我们在农业上，一个是“左”的政策，一个是不进口粮食，吃进口粮就是修正主义嘛！现在看来，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关系很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陈云同志就讲要进口二千万吨粮食，不进口粮食，调整不过来。一条包干，一条进口粮食，起了很大作用。当然，还有第三条，农副产品提价，提价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价格倒挂，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大的一个成效，就是解放了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过去把许多问题都看死了，三中全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鲁西北三个地区，从一九六五年以来，农业一直是下降的，不从实际出发，都强调种粮食，越种粮食越不够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从实际出发了，把盐碱地种棉花，沙地种花生，好地种粮食，一下富起来了，棉花大发展，粮食还东调。河南省兰考县也是这样，种花生比种粮食收入高两倍，但过去就是不能种。三中全会以前禁区太多，不解放。三中全会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从实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

九、关于交通运输的问题

商品经济发展了，没有交通运输不行。能源、交通两个因素，第一是交通，第二才是能源。如果我们现在交通条件好，可以多运一千万吨煤。总的来讲，我们的铁路修得少，公路也不够，质量也比较低，但数量是增

加的。而航运相当一部分地方则是减少的。航运问题要引起我们重视，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从全国来讲，如何利用长江，还有海运问题，内河问题。中国是一片大陆，但海岸线长，如何利用海运，是个大问题。过去封建皇帝都知道修运河。湖南水运条件好，当然，与广东比，广东离海近一些，但湖南总比西北好一些，比四川好一些。你们的基本条件并不算差，四大河流，加上洞庭湖，还有铁路，这比西北、四川好多了。“七五”计划要研究一下航运，鼓励航运，支持航运。

交通问题很值得研究。湖南四条河流，都能通到山区，加上洞庭湖，然后出长江，可以使山区的物资通往上海。航运的体制问题很大，各管一段，环节多，运价就高了。但总的讲，比修铁路、公路合算。许多同志都说，长江为什么不能利用，什么原因还不太清楚。有一种说法，说工业布局不是按长江布局的。贵州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十二元钱一吨的煤，现在卖不出去，只要能够从长江运，老百姓就可以多挖煤。疏通航运的问题要很好研究。交通也要靠多种途径，水路还是能利用的要利用，不能走大船的就走小船。铁路只有那么多，大家都挤铁路，你挤我，我挤你，解决不了问题。汽车主要是跑短途，现在公路的问题，主要是质量差，效率低，吨位小。中国的交通原来就没有基础。印度三百万平方公里，在甘地独立时有六万公里铁路，我们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解放时只有二万八千公里铁路，其中东北就占去一万八千公里，关内才一万公里。美国面积比我们小，铁路最多的时候达到五十万公里。苏联在帝俄时代也有十七万公里的铁路。世界上的趋势开始用航运，以后搞铁路，搞公路。现在，铁路很不景气，又转过来了，搞航运，搞公路，美国已拆了二十万公里铁路。而我们的情况却相反，公路不景气，水运不景气。中国公路的潜力大，问题是质量差，吨位小，加上装卸问题。外国公路运输比较便宜，我们一下做不到。交通问题，我们要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条件多开辟一些渠道。我国的水运条件，特别是南方，解放以后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大大恶化了，修水库，修水电，根本不考虑航运问题，交通部门与水利部门打官司，交通部门没有不打输的。过去大家都站在水利部门一边说话，好像只要粮食多了，还怕运不出来，结果吃了大亏。

十、关于水电站建设的问题

现在正式告诉你们，修三峡已经定了，今明两年准备，后年开工。在上三峡的前提下，再处理其他问题。如贵州提出修吴罗河，四川提出修狗皮滩，湖南的五强溪。三峡一定，“七五”规划要重新考虑。三峡是一百五十米正常蓄水位，坝高一百六十五米，加十米防洪堤，共一百七十五米。防洪问题解决了，对湖南有利，万一发生像一九五四年那样的大洪水，原则上是淹上不淹下。淹上，群众可以往山上跑，回来后国家再救济；淹下，下游地势低，据有关方面估计，国家至少要损失一千个亿。三峡后年开工，八年装第一台机组。三峡一上，电的问题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电站总装机XXXX万千瓦，往东可送到华东，往南可到广东，还可往西送电。你们第一是拥护上三峡，第二要求上五强溪，有个第一第二就好办了。现在前期工作做得比较充分的，一个是五强溪，一个是四川的宝珠寺。上三峡，要投资XXX亿元，全国开人代会要通过一个决议，全国要支援上三峡，三峡的下游省份都要出钱，湖南、湖北、安徽等省都要出点钱，准备发行有偿债券，将来发电分红。现在中央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上海的宝钢，要投资XX亿元；一个是三峡，要投资XXX亿元，其他地方怎么搞，“七五”规划还没有讨论。

十一、关于“小三线”企业发展方向的问题

小三线⁴要搞活一点，让它自找出路，自己闯。小三线设备好，技术人才多，比地方厂子要好，要让它成为地方工业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要研究搞活的政策，你们的办法是盈亏包干。大三线要作为军民结合之间的企业，不是军工厂生产一些民用产品，而是军民结合型。小三线主要搞民品，现在过渡一下，分点军品给它吃，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但将来主要是搞民品。小三线要搞活就要给它条件，亏损企业搞亏损包干，微利企业也可以包干，利润多的企业，可以采取八级累进税的办法，像集体企业那样对待。总而言之，小三线要搞活，要有给出路的政策，让它自己去搞，搞几年以后，有些不行的就关了，大部分企业就会走出一条路子来。小三线的体制问题，要纳入各省的企业体制里面去。

国防工厂的家属农场也要搞大包干，“五七”农场、“五七”工厂要搞包干，不要吃工厂的大锅饭。上面负责抓管理，抓规划，农场内部可以搞家庭承包，这样农场就办好了。当然，建厂（场）时，可以投点资，支持一下，但在经营上要包干，自负盈亏。这样，就可以不要补贴，而且收入还会增加。

十二、关于军工系统科技人员的使用问题

国防工业有的单位那么多技术人员窝在那里，你们可以借用出去。知识也是生产力，也可以租赁，家属不动，有的可以离厂一段又回来，有的也可以不离厂，交给他一个任务。大家都没有事干，这是个很大的浪费，窝在那里，时间久了知识也陈旧了。军工系统的技术人员，凡是没有事干的，都可以出来，所有制不动，临时调用、借用，出题目、给任务，统统是合同关系。中央有这个方针，你们可以组织。这件事由中央各部去搞很困难，由地方去搞就搞得好。地方和国防科工办要抓这个事。承担任务、临时借用，出来搞培训，搞电视大学、培训中心，这比在厂里闲着好。现在有很多攻关任务，技术改造任务，没有科技人员去干，而军工又大量窝工，要赶快让他们出来，为四化出力。省里要好好组织调查一下，抓一下。这是个很大的潜力，很大的财富。要有偿借用，对厂子要有偿，对个人要给点补助，给予优待。

十三、关于发展电子工业的问题

现在国际上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很快，每隔五年到八年，体积缩小十倍，功能提高十倍，成本下降十倍。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像当年搞氢弹、导弹那样，把电子计算机搞上去。

电子工业引进的先进技术，定下来以后就要生产，一边生产，一边搞科研，不能像过去搞军工那样，试制完了，一看不行又改。还是不断革命论、革命阶段论。现在国外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过去叫做十年一大步，三年一小步。我们引进技术，人家给你的本来就不是最先进的，加上谈判，试制，一搞就是四五年过去了，等你搞出来，他又前进了一大步。对国外的先进

技术，我们应当赶，但不能亦步亦趋，天天在赶。要走一步、定下来，然后推广应用，再跨一大步。老是赶，产品就定不了型，只能天天变，年年变。当然，我们要密切注视国外的技术进步，进行技术研究，作好技术储备，不能闭关自守。过去军工犯过这个错误，到国外参观一次，就改一次，产品老是定不了型。我们确定了起步点，就搞一步，过几年再跃进一步。

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亿次计算机，为国家、为中国人民争了气。国防科大研制亿次机的方向是对的。现在我们强调微型机的利用，微型机的应用，和有计划地生产与研制一些巨型机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的。

十四、关于石煤利用的问题

益阳石煤发电厂从最困难的起点搞科研，九百大卡能发电，一千多大卡的煤矸石就更有条件利用了。这件事对煤矿很有意义，为煤矿利用煤矸石闯出了一条路子。各个煤矿都要用这个经验搞煤矸石发电，这既能增加能源，又有利于推动煤矿选煤，开展综合利用，增加盈利，减少亏损。发的电自己用，如果送出来，不能赔钱，电力部门要支持煤矿办这件事。

十五、关于发展食品工业的问题

对保健食品要很好研究。我们中草药多，把中草药同食品、饮料结合起来，制成保健食品，在国外可以打开市场。福建的乌龙茶在国外畅销，就是因为它有减肥的作用。

有了奶，食品工业也上来了，奶是重要的食品工业原料，有肉、奶、糖和粮食，就可以生产高级的食品。食品要有高档的、中档的、低档的。中国将来的高档食品会有销路，如果城市有百分之十的人购买力提高，农村有百分之五的富裕户，就是六千万人，比一个法国的人口还多。中国市场大，这两年很多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都出现了。农民现在有购买洗衣机、电冰箱的，将来的高档食品也一定会有销路。将来人们的购买力提高了，要多增加食用加工品，现在受购买力的制约，比如蔬菜，只能吃新鲜的，加工的吃不起，水果只能吃新鲜的，加工的吃不起，随着城乡购买力的提高，吃新鲜的要变成吃加工品。

十六、关于推广小氮肥生产经验的问题

全国小氮肥经验没有很好总结。作为行业来说，一个是纺织部，他们没有直接管企业，抓了几个机械厂，组织得很好，整个基础工作好；再一个就是化工部抓的小化肥，做了不少工作。这两个部的经验很值得注意。中央各部的工作如何做，要注意他们的经验。

十七、关于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好的形势讲了很多，也应看到，我们还存在着很多的矛盾。我这次出来给你们讲困难比较多。总之一句话，我们现在国力有多大，能承担多大的建设规模，这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要说需要确实有这个需要，各方面都要发展，很多新的项目要上，生产上的要上，生活上的要上。但是，我们财力只有那么多，地方多了，中央就少了；中央多了，地方就少了；生产建设多了，消费就不能增加；消费和建设多了，生产上的就少了。建设规模，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资，第一是木材，第二是钢材，两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只有三千九百多万吨钢，究竟能支撑多大的建设规模？木材就是那么多，水泥还好办，就是这两材。解决钢材问题，路子无非是两条，一是自己上钢铁，二是进口钢材。上钢铁可不简单，首先要上矿山，第二要上煤炭，第三要上交通，现在交通紧张，要上钢铁更紧张。所以现在不敢大上钢铁。现在都要盖房子。老百姓一年盖八亿平方米的房子，好是好事，但八亿平方米的房子要多少材料，烧砖瓦要多少煤炭？你不给他钢材，就要用木材。城市里面如果还是原来的规模，一年又是八千万平方米。这都是在我们重点建设没开始的情况下就有的规模，现在我们再开始重点建设，就有个国力的承受问题。如果弄不好，物价就控制不住，物价一上涨，我说最后的结果是转一圈又要转回来。转一圈转回来，两百元钱等于一百元钱，两百元的投资等于一百元的投资，三百元的投资等于两百元的投资，转一圈转回来并没有扩大规模。所以，要看我们国家究竟承受能力有多大。我们现在因为政策对了，带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好的形势都看到了，但要考虑到我们究竟能进行多大的建设规模。在

我们目前国家财力、物力困难的情况下，第一，能进行多大建设规模？第二，进行这个规模里头，中央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民用建设各占多大的比例？这里头就有一个局部和整体的问题。现在来看，特别是“七五”计划，甚至包括“八五”计划，只能在这个框框里面做文章。如果现在规模搞得过大，超出了我们的能力，那我们最后还要来回折腾。刚才讲的木材问题，国内要保护山林，不能采伐那么多，国外进口也不能太多，即使算上进口木材，我们的规模也不可能太大。为什么现在生产资料紧张？生产要消耗钢材，消费也要消耗钢材，各种建设都需要钢材。

十八、关于企业实行奖金不封顶的问题

我赞成这么一个意见，在利改税的同时，不一定等第二步，包括第一步现在已经实行了利改税的企业，可以选择一些行业、一些企业，实行奖金不封顶的办法。实行奖金不封顶，但前提一定要建筑在厂内的各种责任制落实的基础上。这个事情如果搞得不好，确实可以发挥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可以挖掘企业的潜力。这点农村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现在大家都欣赏首钢的经验，把首钢的效果都归结到包干问题上。我看不完全是。首钢能取得那么很好的效果，很重要的是实行了厂内的各种责任制，把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到现在还认为实行了利改税以后的企业，同样非有这个条件不可。这样的企业，内部就有了落实各种承包责任制的条件。过去我们奖金封顶是不得已的办法，奖金一封顶，本身就变成了平均主义；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实行奖金不封顶。当然，我主张有步骤的实行，过去往往有些事情是由于我们普遍号召，全面推广，结果本来是好事，却变得不那么好了。奖金不封顶和又要有奖金总额来控制，我看也不矛盾，就是国家还应当有个奖金总额。确实挖掘了潜力的，可以超过这个奖金总额，但得有个奖金总额。奖金加工资，总额如果超过了的话，还应当有个制约的办法。刚才刘正³同志讲的是又封顶又不封顶，我是讲不封顶，但要个制约的办法，不仅使它不滥发奖金，而且适当制约一下消费基金的增长。

工业这个问题比农业复杂，它有个价格的问题。主要的企业是按照国家计划生产的，你要它生产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它价格又不合理，由

于价格的因素，企业有些利润高，有些利润低。如果按利润高低来发奖金，就会造成企业之间苦乐不均，就会引起很多新的矛盾。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小企业我们放宽可以，农村放宽可以，假如是我们的国营骨干企业，如果有个企业突然冒上来，突然增加了一倍工资，就会引起社会的许多连锁反映。首先是知识分子的反映，知识分子要提高工资，一下提高不了那么多，你从事体力劳动的，一下增加了一倍，就会引起很多新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哪个工厂的利润高，那个工厂工人的工资就高，它也是有一个平均的水平。所以，我们在骨干企业里面搞的结果不能使有些工资冒得很高。北京的同仁堂去年奖金一下冒得很高，就引起很多反映。我们的骨干企业是按计划生产的，而且它生产的产品价格是国家规定的，有些利润很低，有些利润很高，有些没有利润。还有学校、科研机构，还有机关干部，由于价格不合理，往往费力大的企业利润低。如果确实是它劳动的结果，作为一个人来讲问题不大，作为一个工厂的平均水平，它一下冒得很高就会影响整个社会。所以，我主张不宜多宣传万元户，可以允许两万元的、三万元的，都可以，但是从农村来讲，不可能都这样，往往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这些万元户是允许的，但是在报纸上宣传过多也不好。现在城市工人有误解，说过去共产党是依靠工人阶级，现在是不要工人了。再就是以为我们把钱都转移到农民那里去了。我们这个社会很复杂，所以我说还是要有个制约的因素。

价格不合理，实行了利改税会稍好点。今后价格高的、利润高的，产品税要高，利润低的产品税要低些。调节一下价格的不合理，这些会好些，但是不能完全解决。价格的改革比较复杂，是个很大的问题，理顺经济，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研究来研究去，这个决心不好下。算了一个账，我们的生产资料价格走半步，解决一下现在严重不合理的状况，国家每年要拿一百五十亿元的财力，这个决心谁也不敢下。当然这样搞了以后，今后的效益要好，但是，如果在现在这样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要搞一次价格改革，那很多重点建设项目要停下来。北京有些同志这样主张：宁肯大胆缩小基本建设规模，换来理顺经济。从长远来讲是可以的，但是从现在这几年来讲，困难太大，这个决心不容易下。我的想法，我们一开始搞稳当点。这次我们解决奖金封顶的问题，也不要一下把步子迈得太大，

往上提是容易的，往下降就困难。从步骤来讲，全省不要一下都铺开，像集体企业、小企业问题不大，一些比较大的企业、骨干企业，国家还在实行计划指导的这些企业，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要有步骤地实行，不要一下铺开，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先实行。

不封顶，还得有个制约的办法。用什么办法制约？除了你们刚才讲的那些条件，还可以加些条件，譬如说奖金要怎么同上交利润的增长挂钩，和上交税收挂钩，如何控制单位成本工资含量等。在什么条件下奖金可以多发，可以超过奖金总额。除此以外，超过部分还得交税，这样也限制一下企业，使他们不过多地把钱用于奖金，而是用于技术改造。今天早上广播了福建的办法，联利计奖责任制。北京如果能出一个办法也可以，如果暂时出不了，各省自己议个办法也可以，定几条，先试行。超出的要收税，超过多的高税，超过少的低税，超过得太多，税收要重，累进的办法，不能搞得太多，因为消费资金太多，没东西给他。至于企业里面责任制怎么搞法，办法可以多样。有些适合搞计件的搞计件，适宜承包的承包，采取浮动工资的办法也可以。如果这个搞得好，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工资的改革，今年先开始解决奖金封顶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主张搞稳当点。还是一句老话，好事不要一次办完。如果提上去不恰当再降下来，比没有提以前的积极性还低。当然可以有一种办法，只要超过奖金总额就要收一点税，分几档，奖金超过工资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恐怕税收要逐步加重一些，百分之三十以下的收低税，反正没一个税收的办法不行。奖金不封顶以后，如果没控制的话还容易助长企业单纯追求利润：炼铁的不调铁，要炼钢；炼钢的不调钢，要轧材；轧材的利润大的就轧，利润小的就不轧。这样就会冲击计划。奖金不封顶不捆死，但要有个原则，有个制约的办法。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参照福建的办法，选择几个管理好的行业试行一下，然后再看情况。我在四川讲了这个问题，在贵州也讲了，回去我们也再研究一下。经济工作会议上没讲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没把握。

除此以外，厂里面某些权力可以扩大一些。关于厂长的权力有个规定，现在没落实。譬如说，可以允许厂长从自有资金里面，一年提升百分之一的工资，表现好的工人、技术人员可以提级，表现差的可以给你降。还有开除工人的问题，厂长应当有开除工人的权力。

十九、关于能源交通建设的问题

现在的“七五”计划里面，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国家的重点建设。解决能源交通的重点建设，往往周期比较长，但必须进行这种建设，如果不进行这种建设我们就没一个后劲。这些周期比较长的大的项目必须办，还要鼓励地方办一些周期比较短、投资比较少、见效比较快的能源和交通建设项目。另外，地方上也应当想办法把地方上的资金尽量多地用在这些方面来。这就是说，第一，从全国来讲，中央必须加强能源交通建设，但规模不宜过大，搞得过大，势必把地方挤得很紧。第二，地方应当尽量把自己的资金集中到周期比较短的中、小型的能源交通建设上，另外还有一个技术改造。不如此，我们的“七五”、“八五”可能问题比较大。如果“七五”、“八五”的能源交通不能不断补充，我们就不可能实现二〇〇〇年的目标，“九五”、“十五”的经济振兴就很难。所以，能源问题，完全都搞大的不行，交通完全都靠全国大的建设不行，要发挥多种渠道大家来搞，大家都把能源交通建设作为重点。中央有个适当集中资金的问题，地方也有个如何把钱更多地用在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大家都高度集中资金用到长期的大的项目上去，那我们国家的情况就是长期投入而没有产出，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这两年我们的煤炭没有那么紧张，小煤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北方小煤窑不赔钱，你们的要赔点。小煤窑的毛病是缺乏技术指导，可以帮助它。不仅是小煤窑，包括小水电，也包括其他的矿山，只要认真规划一下，是可以依靠老百姓搞的，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很多，将来农村除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搞养殖业，搞开发性的农业生产以外，要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逐步地转向其他方面，转向工业、转向矿业、转向服务业。在沿海一些地方，在大的城市周围，可以搞加工业；不是沿海这部分地区，特别是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可以搞开发资源。前不久姚依林同志到陕北，提出搞大电站、小煤窑。过去耀邦同志也讲过这个观点，中国农民的劳动力本身是一种资源，如何把这种资源变成生产力。中国农民将来应当从事开矿，有条件开矿的开矿，有条件治山的治山，有条件搞建筑的搞建筑，这个恐怕是将来中国式的一个道路。

在路上你们讲到，矿山实行轮换工，我是非常赞成的。四川已经实行了，它是三年一轮换。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国家投资。将来我们的建筑队

伍、井下工人要大部分利用民工。建筑公司可以搞一个架子，搞承包，工作可以承包给民工，各种建设单位也可以直接包给民工。这样几亿农民可以从这方面找一条出路。在讨论“七五”计划的时候，这个问题要考虑。你们的小煤窑，包括有些大煤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强化开采。我们中国几十万吨的矿井，都是上百年的服务期，要缩短服务周期。假如缩短到五十年，比新搞一个基地要省钱得多，就要考虑缩短，这方面有潜力。什么东西都有利弊，缩短服务周期可能有弊，但要全面衡量利弊。就是五十年，也不算短。资本主义国家是很注意投资收回效果的，就是我投资，多少年收回成本就行了，搞十五年，或者搞二十年，就不要了。外国在我们这里建旅馆就是这样的，它的周转快。一个矿井，譬如搞一百年，一年产一百万吨；我一年采两百万吨，就只要五十年。五十年也不短，科技进步五十年以后就大不同了。现在国际上没哪一个国家一开始就反映工业化很好，工业化过程中间环境污染很厉害，只有到工业化一定程度以后才开始治理。当然我不是反对要搞环境治理，但如果要求太高了的话，是搞不成的。资本主义最早国家之一的英国伦敦，为什么它的雾那么多，现在才搞清楚，原来主要是烧煤多，现在治理好，房子变白了。美国也是这样。

二十、关于国家财政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指导思想，不管用什么办法，至少在十年之内，我们财政非常困难，既要建设又要改善生活。如何渡过这个财政困难，又使我们的经济继续保持繁荣，以后的事就好办些。这是我考虑“七五”的一些想法。我们大项目要考虑一些，另外还有很多可以挖掘潜力的政策，包括建设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考虑。当然，这些搞法在过渡时期有困难。譬如说，你建筑队伍就比较多，再吸收民工他就没事做。四川有个地方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成了大包袱。但这是暂时的。我们搞固定的长期的建筑队伍，这个路子是不成功的。固定的长期的井下工人，也是不成功的。建筑工人搞一个大的工程都住下，完了以后又不能搬家，一大堆问题。本来中国劳动力很多，劳动后备军是一个很大的资源，但我们的政策搞死了。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措施或者一项政策来考虑一下。

注 释

1. 毛致用(1929-), 湖南岳阳人。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全国政协副主席。

2. 张平化(1907-2001), 湖南炎陵人。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 武汉市委书记, 湖北省委第二书记,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山西省委书记, 中宣部部长, 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

3. 刘正(1929-2006), 湖南长沙人。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曾任省政协主席。

4. “小三线”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根据中央“要准备打仗”的战略部署, 由有关省(区)市参照中央三线建设的做法, 在本地搞的一些战备建设项目。当时在习惯上把中央的三线建设叫“大三线”, 把地方的三线建设叫“小三线”。

给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复信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并全体同学：

谢谢你们给我来信。

对于你们在信中所表达的赞成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爱国立场，我十分赞赏。你们出于对香港前途的关心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已交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研究。

现在香港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相信你们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香港的稳定繁荣不断作出贡献。你们也可以完全相信，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会符合香港同胞的愿望和利益。

谨祝

学业进步！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三月廿六日

妥善解决经济工作和体制改革中 出现的新问题*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今天想就当前经济工作和体制改革讲几点意见。

一、在对企业实行利改税的同时，要认真抓企业的内部问题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效果是好的。现在，财政部正在积极准备，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即实行产品税、所得税等，将税利并存改为完全征税，进一步解决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问题。实行利改税，有这样一些好处：一是可以保证国家得大头，使国家财政收入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稳步增长；二是可以使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实行自负盈亏，逐步削弱条条块块行政隶属关系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三是通过征收产品税，确定不同税率，也可以使目前价格严重不合理的影响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使各个企业能够在利润水平悬殊不太大的条件下展开竞争，鼓励先进，鞭策落后。所以，实行利改税是改革的方向，应当积极推行。

在实行利改税，解决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以后，还必须解决企业内部的关系，即企业和职工的关系，使企业不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内部职工也不吃大锅饭。这样才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企业的巨大潜力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挖掘出来。许多利改税试点的企业，像北京市的十户企业，四川的老五户企业，他们之所以效益大大提高，很重要一条是企业内部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制，责、权、利分明，不搞平均主义，不吃大锅饭。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从实践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实行利改税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得到解决，这就为企业内部建立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前提；也只有企业内部落实了责任制，使企业同职工的关系得到很好解决，利改税的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企业内部的问题包括很多方面。首先要解决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问题；还要注意加强劳动纪律，加强质量管理、财务管理和定员定额工作。这些都是提高企业素质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此外，还要认真落实国务院颁发的《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中所规定的厂长的职权，真正把企业办好。这里，着重讲一下奖金不封顶和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落实厂长职权问题。

奖金封不封顶，是关系到企业内部责任制是否落实，关系到在目前条件下企业内部按劳分配原则能否体现的问题。从原则上讲，奖金封顶，是不合理的，它容易造成平均主义，有碍职工积极性的发挥。但是，实行奖金不封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是要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否则，就会发生不从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上想出路，而只从挖国家方面打算盘的作法。这点和农村不同。前两年因为条件不具备，规定奖金封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是不得已的办法，应当创造条件改变它。现在，我们已经推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并准备加以完善，在今年第四季度推行利改税的第二步，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基本上得到解决，这就基本具备了实行奖金不封顶的条件。奖金不封顶，应当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不宜一下子全面铺开。目前可以在建筑、矿山、搬运三个行业，以及各地选一批经过整顿、基础比较好、领导比较强、生产正常的企业先行试点，在今年四季度随着利改税第二步实施以后再进一步铺开。请经委和财政部提出方案，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经验。奖金不封顶，不在于奖金本身如何，而在于要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把企业内部的责任制落实，把企业的经营管理大大推向前进。

实行奖金不封顶，也并不是毫无节制。由于目前我国的价格体系很不

合理，形成行业、企业之间利润水平相差很大，即使实行了利改税第二步，这个问题仍不能根本解决。而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是同企业的经营成果，同企业的利润挂钩的，但利润又不合理，所以，还得从某些方面加以制约。还应该看到，我们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宏观上国家对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要有所制约，这是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之一。既不能再继续采取封顶的办法，也不能过多地、毫无节制地让消费基金的增长失去控制，从而使经济生活产生混乱。封顶，是捆死的办法，现在要把它解开。解开后，恐怕还得有一点“软绳子”，总得有点制约。我们的原则是：第一，职工的劳动报酬，要同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是否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挂钩，同本人劳动成果挂钩。第二，奖金的发放额，不得超过按规定比例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数。第三，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利税比上年增加的企业，奖金可以相应增加，不封顶。第四，取消封顶后，要征奖金税。幅度越大，税率也越高。征奖金税，不是向职工个人征收，而是由企业从职工奖励基金中交纳。

奖金税怎么征？大体划几条杠子：奖金发放额不超过两个半月标准工资的不征税；四个月以下的征轻税；四个月到六个月的，要征中税；超过六个月以上的课以重税。具体税率，财政部正在拟订。

上面讲的奖金额，是作为计算标准用的，并不是说都一律采取发奖金的办法。可以发奖金，可以实行计件工资或浮动工资，也可以把工资和奖金总额捆在一起，进行自费工资改革。不论采取哪种形式，都必须与实行严格的内部责任制结合起来。这笔钱用得好不好，效果大不一样。如果搞平均主义，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劳动人事部同志的意见，最好结合搞自费工资改革，真正体现按劳分配，把职工的劳动热情激发出来。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制订这些办法，就是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病，如果在执行中搞平均主义，那就失去了意义。总之，这笔钱采取什么形式使用，工厂有自主权，一定要把它用好，真正出效益。

照这样规定，是不是每个企业都要发二三个月甚至更多的奖金呢？这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奖金发不发，发多少，一定要看条件。搞得好的多发，搞得一般的少发，搞得不好的不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即企业完不成国家计划，不能依法向国家交纳税金和各种费用，就不能发奖金，直到扣发一定的基本工资，首先从企业领导人做起。

这是与奖金不封顶相辅相成的。有奖有罚，才能真正建立起经济责任制。各地要掌握这个原则，严格制止滥发乱分。

另外，有些办得很好、经济效益很高的企业，他们看得更远一点，宁愿暂时少发一些奖金，而把这部分钱转为技术改造投资，以便取得更大的效益，为职工今后更多地增加收入创造条件。对这种情况，国家无疑应当支持他们的积极性，并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

这几年，农村放活了，农民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加；小企业也放开了，那里的职工收入也大大增加了。如果不采取恰当的政策措施，真正担负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和按国家价格销售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像钢铁、煤炭、重型机械等工厂的职工收入，几年之后有可能成为锅底。对这些骨干企业，总得有个办法使他们相应增加收入。当然不能靠国家多拿钱，而是要促使他们从挖掘潜力上找出路，从提高效益上增收入，并得以持久地发展下去。现在我们制订的办法，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国家对一些劳动强度大、工作艰苦的行业，例如井下、矿山、建筑、搬运等，要予以优待。在合理确定劳动定额的基础上，可以实行计件工资或其它形式，不封顶。在征收奖金税时，予以照顾，免征或少征，使他们的收入有较多增加。

对集体企业、小企业和亏损企业怎么办？现在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是沿用五十年代的八级超额累进税，起征点是三百元，太低了。起征点应提高，下边砍掉两级，往上再增加两级，搞个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征税以后，把集体提留留够，就由他们自行分配。今后要扶持集体企业的大发展，使他们真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国营小企业也要放开。去年实行利改税时，曾规定固定资产原值在一百五十万元、利润在二十万元以下的，算作小企业。现在看，还可以再宽一些。对这些小企业，可仿照对待集体企业的办法，征八级超额累进税后让它自负盈亏，干得好多得，干得差少得。一些以劳务为主的小企业，如服装、修理、饮食、理发、浴室等，也可试行租赁给经营者的办法。对亏损企业，实行盈亏包干是有效的，要继续实行。对微利企业，可以采取征轻税的办法，或者实行包干。

我们分别企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以上办法，目的是为了把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发挥出来，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保证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

为了使企业真正有活力，必须围绕利改税和解决企业内部分配问题，相应地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之形成一个小的配套。这是发展经济工作大好形势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在产品的生产、销售、原材料采购、技术改造和人事管理等方面，都可以考虑适当给企业一部分权力。比如，在计划管理上，在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的前提下，应允许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安排一些生产。所生产的产品，超计划部分，应允许有一部分自销权，即使属紧俏物资，也应这样办。过去的经验证明，有些产品往往是越紧越统，越统越少，如果网开一面，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东西反而多了。在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上，大厂、大项目，必须管住，至于一些小的，不必过分害怕重复引进，盲目建设。这方面的审批权力，应当下放一些。在人事制度上，上级只管厂里的主要领导干部就行了，其余的应由厂里自己去管。总的原则是：当集中的集中，当分散的分散；大的管住，小的放开。现在各级主管部门具体事务揽得太多，要层层下放一部分权力，以利于抓大事。究竟企业扩大哪些权力，请经委会同有关部门，对今年能办的确定几条，以国务院名义下达一个文件执行。这算是一个最低纲领。将来随着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再搞一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最高纲领。实行利改税，落实企业内部的责任制、奖金不封顶，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这三个重要环节互相配套，狠抓落实，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为了推动企业健全内部的各种责任制，还要抓《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的贯彻落实。一九八二年颁布这个条例以后，许多条款都没有执行。这种现象必须改变。要强调厂长对全厂生产经营活动的指挥权和人事任用权。按照厂长工作条例，厂长有权对职工进行调动、任免、升迁、奖励和惩罚。对有特殊贡献的职工，有权晋级。原来规定每年晋级面不超过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一，国务院准备修改，适当提高一些。对违反纪律的职工，有权处分，直至开除、辞退。这个权用好了，会起很大的作用。要像许多先进企业那样，赏罚严明，“管理上从严，生产上抓紧，经营上搞活，生活上关心”，才能把我们的工厂办好。

我们采取上述的扩权措施后，也可能出点小乱子，比如有的企业一下冒上去，奖金搞得很多等。但我们有了制约的办法同步出台，就不至发生消费基金失控等现象，影响大局。总的看，还是利多于弊。当前，我们要

抓紧工作，认真把企业内部的责任制落实，把厂长的职权落实，进一步搞好企业的整顿。只要这些工作做好了，我们确信，在两三年内，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会有较大的提高，企业的面貌也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二、能源交通建设的几个方针政策问题

第一，能源交通建设要大中小结合，长短兼顾。

在我国能源交通建设中，大型骨干项目和中小型项目，远期发挥效益的和近期发挥效益的必须全面安排，统筹兼顾。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问题，关系到今后的投资方向。

从去年以来，我们在全党全国着重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要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要坚定不移地建设一批投资大、周期长、具有战略意义的骨干工程。这是为下一个十年甚至下个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基础所必需的。如果不这样办，那就不能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就不会有后劲。与此同时，必须继续搞一些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保证我国经济在今后几年内能够持续增长。这也是为今后的发展积蓄力量。除了中央财力集中保一些大型项目外，要引导、鼓励、支持地方和部门多搞一些中小型能源交通项目，集腋成裘，这方面也有不小的潜力。有骨干工程作主体，又有众多的中小工程作支干，互为补充，能源交通的紧张状况就会逐步缓和。为了把零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办成几件事，建议首先在兴办电力工业时发债券、股票。据财政部统计，去年征收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各地超收十四多亿元。去年超收的这笔钱就不上收了，留给地方，专款专用，用在地方性的能源交通建设上，不准挪用。搞哪些项目，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备案。这样做，可能比中央直接投资要节省，速度要加快。

第二，要正确处理新建和改造、扩建、挖潜的关系。

当前我国的财政有困难，在编制“七五”计划的时候，许多矛盾都暴露出来了。中央和国务院已确定要上几个特大项目，像三峡工程、核电站等，投资很大，七八年乃至十多年以后方能见效。电，在“七五”期间必须保证每年新增装机五百万千瓦才过得去。加上其它各项开支的增加，财政收入虽逐年好转，仍然入不敷出。鉴于这种情况，在近几年内，我们应

尽可能不把矛盾集中在一起，能分的就分开一些，能推的就推迟一些。除了保证大型项目外，现有的财力物力应考虑如何用在经费省、效益好、周期短的项目上，多从这方面想办法，找窍门，以利于渡过目前的财政难关。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我们应当具体分析能源交通的新增生产能力，哪一些宜于新建，哪一些宜于扩建，哪一些改造挖潜更合理。新建一些大型骨干项目不能动摇，但对扩建、改造、挖潜，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近几年。

比如煤炭工业，有必要重新考虑规划和部署。我国计划建井的服务年限一般都偏长，起码是五十年以上，有的在一百年以上。不少国家的开采速度比我们快得多，基建完工后采煤量比我们大。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矿井服务年限短一些，开采强度大一些；另一种主张服务年限长一些，开采强度小一些。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我认为至少在十年、二十年内，加强开采，有利于缓和我们目前遇到的矛盾。再过十年、二十年，我国的经济状况就根本不同了，我们没有必要把困难都集中到这一段。所以，在煤炭基本建设的战略展开上，设点布局，既要开发必要的大型露天矿，又要加快老矿区的开发，使近几年、十年如何能够投入省一些，产出多一些，快一些。首先要在现有具备条件的矿井加强开采，在老矿区多打一些井，多开一些工作面。在老矿区扩建，多打井，多开采，比新建投资可省三分之一，时间可提前二分之一。这样做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交通运输也要从综合经济效益、从多种运输方式去考虑。全国的运输干线应当有个基本的布局。但如果只有干线，而区域性的交通不能解决，短途运输、中途运输不解决，干线也不能发挥作用。所以要考虑多种运输方式，水路、陆路、空运，长途、短途，铁路、汽车、轮船、飞机，要综合考虑，互相配合，形成最合理的综合运输生产能力。在“七五”期间，大同至秦皇岛长大列车的铁路干线必须修通，这样能新增运煤能力七千万至一亿吨，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很大，要下决心搞。但是，到西藏的铁路，近期内就不必修了，不如发展空运。像新疆、内蒙古也可以考虑设立地方航空公司。主要的交通干线要靠国家，但区域性的、地方性的交通建设，要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乡村的积极性。最近，我到贵州遵义，那里有

条赤水河，除三个月枯水期行船比较困难外，平时通行无阻。赤水河两岸煤炭资源丰富。发动老百姓开小煤窑，在沿长江处搞煤场，用省的船队能把煤顺长江而下运到江苏。这样做产地有钱可赚，江苏也有利可图。采取这些办法来运西南地区的煤，比修铁路要省得多、快得多。这些都属于地方性的交通建设，如果我们在政策上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运输的路子就能够搞得宽一些。

第三，围绕电的发展通盘考虑能源交通建设。

我们讲以能源交通为重点，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看来，还应该进一步明确：能源交通建设要围绕着电的发展来考虑。能源、交通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发电问题，但现在压力最大的是运煤发电，我们工业卡壳就卡在电上。今天我们的能源交通最大量的是为了解决电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围绕着电的发展来统一规划、安排其他有关方面。制订全国或区域性发展规划，首先要确定电力工业规模搞多大，火电、水电、核电搞多少，相应地如何建电站，如何开煤矿，如何运输，一系列的问题，都根据电的需要来展开，同步进行建设，避免互相脱节，在决策上失误，造成大的浪费。这样，综合经济效益肯定会大为提高。

此外，还要顺便讲两个具体问题。一是要从政策上鼓励煤矿搞煤矸石发电，可收一举数得之效。在湖南益阳，国家科委办的泥河口石煤发电试验站，石煤的发热量只有九百五十大卡，发电成本每度七分四，现在卖八分。从这件事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既然石煤都可以发电，为什么热值比它高的煤矸石不可以用作发电呢？现在全国的煤矸石有十亿吨之多，用作发电既可以减少堆场，减少运力，节省开支；又可以多发电，降低煤矿成本，增加收入，是煤矿的一条生财之路。煤炭部初步打算在“七五”期间建一批小型煤矸石发电机组，装机一百万千瓦，发电五十亿度。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推广开来，关键要解决政策问题。这种煤电联营的办法，国家应大力支持，水电部应给予优惠待遇。在政策上要规定一条：联网后把煤矸石发电的利润留给煤炭部门。这样煤炭部门就有经营积极性了。

二是要加强选煤、洗煤和型煤等工作，尽量减少运输量。现在运输很紧张，应从多方面想法解决。一方面要加快运输建设，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运力的浪费，省去无效运输。拿运煤来说，从产区运到沿

海地区，运了不少石头，高的含矸量达百分之二十。动力煤一般不需要洗，但应该选。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价格是个主要因素。一定要实行优质优价、劣质劣价，鼓励就地选煤。对动力煤，要考虑按含热量计价；折算成标准煤，热值高的，价格就高；低的，价格就低。在价格上鼓励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最近耀邦同志批了一个材料，提倡搞型煤，也是个办法。

三、关于劳动制度的改革

整个劳动制度如何改革，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我看建筑、矿山井下、林业甚至搬运行业，用工制度现在就要改革。改革的内容就是要大大减少固定工，积极推广轮换工、民工包工等多种用工形式。

矿山井下，建筑行业，包括水电队伍、铁路公路建设队伍等基建队伍在内，都要尽量减少固定工。这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基本建设造价和矿山成本将起很大的作用。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城里人下井很困难，包括矿工的子女下井都难动员。看来，矿山必须走用轮换工的道路。三年到五年换一次比较好，而且要逐年分批换，以保留大部分熟练工人。建筑业也不要那么多固定工，要大量启用民工承包，搞招标。将来建筑公司还是要的，保留少量行政人员和技术骨干，主要是搞好领导、管理、设计、技术、安装等工作。实行改革后，建筑业把许多工作量承包给民工，矿山启用轮换工。特别艰苦的工作，工资可以提高一些。比如井下工人，搞计件工资，他努力干，一年大约得二、三千元，五年就是一万几千元，自己用掉一部分，还剩下大部分，回到农村老家可以盖房子娶媳妇。林业也有这个问题。当然，实行起来也还是要有一个过渡期，原来的固定工还得由企业管起来，设法开辟新的生产门路。但从发展方向看，从提高经济效益看，现在是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推行上述改革，关系到如何动员和充分运用农村几亿农民劳动力的问题。这是有深远意义的事。我们在用工制度上改革，用轮换工、临时工，用民工，对国家建设来说，比较经济节约，效益好；对农村来说，开辟了农村多余劳动力参加建设的途径，为他们找到了出路。这个用工制度，是

符合我国国情的。过去八亿农民搞饭吃，是我们穷困的一个特征。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这种局面一定要改变，否则国家富不了，人民富不了。到本世纪末，农村可能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搞种植业，有更多的人离开种植业去从事多种经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如搞林业、牧业、渔业；搞副业、手工业；开发山区、草原、海洋等。在我国东部沿海大中城市附近的农村，可能通过引进技术，同城市协作，发展一批这样那样的小工业。在比较偏僻的西南和西北，利用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可能在一水电、二开矿、三搞建筑建材上，闯出一条致富的路子。这些地方虽然加工业比不上沿海地区，但那里的农民能吃苦耐劳，在开矿、建筑、开土石方等方面有优势。将来我们国家东部与西部将有合理的分工，形成各具特色、互为补充的优势产业，使我们农村的丰富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那时我们整个国家不论城乡，不分东西，都一定会富裕起来。

顺便说一下，农民开矿和破坏资源不能当成一个概念。小矿要看怎么办，搞得好就会合理利用资源，搞不好就会破坏资源。要把它变成一个积极的事情，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只要加强对社队小矿的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搞好规划，合理布局，搞好安全生产，是会起很大作用的。这不但有益于农民，而且对工业的发展有利。事实说明，小矿也在不断变化，逐步由小到大。如能加强工作，善于引导，小矿就会发展壮大，对国民经济作出贡献。

四、城市要搞贸易中心

这次我们在重庆看了市里的贸易中心。四川把省的二级站放给重庆市，和市商业系统的专业公司合并。这个贸易中心是重庆一商局组成的一个经济联合体。它有一座七层的交易大楼，不论是本市本省的、外省外市的工厂都允许去卖货；也不论是全民、集体、社队企业、个体户、专业户，都可以到那里进货。贸易中心实行自营业务与代理业务结合，大批发与小买卖结合，可以代购、代销、代储、代运和加工订货，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把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直接联系起来，减少了中间环节，改变了过去按

行政区域层层分配商品的老办法，打破了条条、块块的界限。重庆这样一搞，中心城市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如果不搞贸易中心，不按照经济活动的流向来组织生产和流通，中心城市就很难发挥作用。同样，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也可以搞贸易中心。就地进货发货，产销见面，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公私，都可以来做生意，这样就把农副产品的流通搞活了。所以，贸易中心不只在重庆可以搞，其他大中小城市可以推广，农产品集散地也可以搞。一个地方单独建立也行，几个城市联合搞也行。先从消费品搞起。除了国家统一掌握的重要生产资料以外，其余的或计划外的，也可以参加到贸易中心去交换。上海等大城市的一级批发站也可以研究一下，能不能与所在的市搞联营批发，联营搞贸易中心，除了某些重要产品掌握起来按计划分配外，其它产品放开，进行自由选购。批发站的一些业务也参加到贸易中心里去，和大家一起搞。

我们要从建立贸易中心着手，促进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过去我们长期存在消费品匮乏的情况，当时商业部门的任务是掌握货源，安排市场（内部计划分配）。按行政区划来分配商品，紧俏商品就发票证。这是当时的情况决定的。现在，有了很大变化，除少数重要商品要安排市场外，许多商品都比较充裕，主要问题不是要安排市场，而是要开拓市场，扩大销路。商品生产一发展，就要解决流通环节的问题，使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旧的封闭式、多环节、按条条块块组织起来的流通体制已不适应，有必要改为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建立城乡通畅、内外交流、纵横交错的流通网络。看来五十年代初期，即实行统购统销前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要抓紧研究流通体制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

五、进一步注意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当前，不论城乡都面临着商品化生产迅速发展的趋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经济要搞活，就要求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从根本上讲，必须改革旧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会受到很大限制的。但全面改革价格体系，涉及的面太宽，影响太大，因此

经过反复研究，两三年内价格不宜大动。在价格体系不大动的情况下，要研究如何运用价值规律，运用其他经济杠杆，如何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可以运用以下一些办法：

（一）进一步完善利改税，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前面讲过，通过征产品税，可适当缓解价格不合理带来的问题。

（二）某些生产资料的价格调整走小步。比如生铁、南方人工造林地区的木材，适当调整一下价格，幅度不大，可以让使用企业自己消化，靠改善经营管理，抵消由于调价而增加的负担，市场销售价格可暂时不动。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有控制地给一点补贴。此外，有些小商品价格和商品的质量差价要继续有步骤地放活。

（三）农副产品要进一步放开，增加市场调节的部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市场供应的改善，有计划地减少统购派购的品种和数量。我们对农副产品要少用行政的办法去限产或增产，应当运用经济杠杆，通过市场调节的作用去影响和指导。田纪云同志建议，对粮食、棉花这些大宗产品，国家计划收购多少，其余的放开，搞市场调节，这个意见可以考虑。至于非统购派购的产品，那更应该放活一些。

（四）进一步搞好同农民的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现在农民购买力很大，农村社队存款一百四十五亿元，社员存款三百四十亿元。要很好地研究用什么商品、什么办法与农民交换，以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并增加国家财源。从农村的调查看，农民急需的，一是农用生产资料，二是建筑材料，三是某些生活必需品。针对农民购买力不断提高的情况，除了搞一些大路货外，也要搞一些高中档商品。这方面的销路正日益扩大，要采取措施跟上。

（五）农村税制要改革。解决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一个是靠商品交换，另一个就是税收。目前我国农村正处在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多种多样的商品生产日益发展。过去农村基本上是搞饭吃，征的是粮食税，而且是固定的。这种税制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现在农村真正是多种经营，应有尽有。应根据新情况，设计、改进农村税收制度，引导农民发展商品生产，为发展经济服务。这比只依靠提高供应农民商品价格的办法好，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

(六) 农副产品要搞精加工。我们长期是“低标准，瓜菜代”，不加工或粗加工。现在应当改变。在农副产品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搞一些深度加工，可以减少国家补贴，满足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国家在计划上应加以扶植，增加一些投资、贷款和材料，帮助加工厂搞好技术改造。

(七) 适当调整新区、老区的征购基数。现在不论粮食、棉花还是油料产地，新产区和老产区的矛盾都比较突出。新产区的征购基数低，收入大幅度增加。而老区基数高，感到吃了亏。前两年，我们强调不要急于改变是必要的。到现在已有三四年，应该而且可能对征购基数作些合理的调整。以省为单位核算，新产区增加一些基数，老产区减少一些基数，或实行比例价。请有关部门提出方案，从明年起陆续实施。

上述七条，都是属于在价格体系不能大动的情况下采取的过渡办法、改良办法。既可以缓解价格不合理的影响，又可以适当缓解财政困难，并使城乡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除了以上讲的五个问题外，小平同志最近讲的对外开放的问题，这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现正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落实。

上面讲的这些意见，是从这样一个思路考虑的：形势大好，财政困难，又要大规模开展重点建设，又要理顺经济关系，如何采用一些妥善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避免矛盾过于集中，使国民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增长，能够有后劲。当前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和解决，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解放思想，去改革、去创新。

关于怎样管好企业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

一、小企业可以分三种：全民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承包，经营者（个人）承包。对江苏省社队企业的生命力过去估计不足。小的要放开，集中力量把大的管好。

二、厂长负责制，应当选几百个工厂试点，看看有什么问题。外国有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大事情董事会讨论。有些年龄大的同志参与决策有好处。我们也实行过董事长，如石化、船舶、汽车，可以总结一下经验。中国有党政工团，谁来调节相互关系？都由厂长来做，可能困难。

三、坚决实行定员定额，多余的人培训，宁肯养起来。

四、企业取消奖金封顶以后，是采取提级的办法，还是发奖金办法，请劳动部与经委提出意见。但权要交给企业。采取什么形式，企业有自主权。

五、婆婆多的问题。我的想法，除了少数企业搞全国联合以外，大部分放给城市。特大型企业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单列户头。部门不管直属企业。大量合并部门（什么时候合并再说）。小氮肥厂搞得不好，并不是化工部直属。事实证明，一个部抓几个企业并没有真正管好过。基本上部门不管直属企业。大托拉斯，有的归中心城市，有的归计委、经委。像鞍钢，鞍山市解决不了，辽宁省也解决不了。一个部，有的企业是他管的，有的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听取吕东关于提高企业素质问题汇报时的讲话。

企业不是他管的，部就不能超脱，也搞不好行业规划。一个部管几个企业，搞得四分五裂。到一个市，这几个企业是部的，这几个是省的，很难协调。企业最好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部门一管，企业就联合不起来。研究清楚再动手，不要急急忙忙。

六、层层下放权力，今年就开始。比如，计委、经委，多少权放给部，多少权放给省。这个问题比较紧迫。要打破好像我管就能管好，别人管就管不好。计委、经委的权必须让出一部分给部、给省市。要权放一格。可能出点乱子，但好处比乱子多。现在还是部门过多，权力过于集中。权力少一点，扯皮就少一点，效率就高一点。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只能利弊相权，取其利大者。今年就搞这件事，这个问题是当务之急。中国怕乱的思想太厉害，而对于活起来发挥的积极作用重视不够。引进也不能管得太死。进口设备五万美元就得报批，这就得拖。完全整齐划一、一律，结果是官僚主义严重。

七、要给企业什么权？分配权，人事权（除厂长外，其他上面不要管）。产品采购要给他权。物资紧张，分配权高度集中不一定是好办法。去年煤炭很能说明问题，小煤窑增产二千多万吨。物资紧张就高度集中，一集中就少了。什么东西一放就多，越统越少。紧张物资，只要企业增产，都给他一部分分成，鼓励他多搞一点。完全放开，国家不掌握一点东西不行。因为紧就搞死，三十多年事实证明不是好经验。用计划外补计划内不足，允许有一部分自销权。中国的事情，除了重大的以外，不要太怕重复，太怕盲目，大计划、小盲目就搞活了。没有点盲目就不能活。大的不行，小的盲目一点不要紧。总之，不能捆得太死。捆得太死不是好办法。当然，不能放弃计划，大的不抓不行。

八、分配上有些道道了，能不能在计划上搞它个小配套。扎扎实实给他几条。这些跟不上去，利改税未必见效。利改税后，要发动职工去挖潜。利改税，分配上的企业自主权实行以后，搞个小配套，这样就活起来了。包括计划、劳动工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有些事情可能现在不习惯，冲来冲去就会冲出一条路子来。用苏联的模式看，现在这些办法就不对路。原来的一套已经冲破，再回到原来已经不行了。要驾驭这种形势，只能因势利导，去弊存利。

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

一、小平同志这次提出沿海城市要进一步开放，确实是个大政策，对于我们进一步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加快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以及促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都有十分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小平同志一作出这个指示，就得到沿海省市的热烈拥护，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应。

二、从这次会议看，不仅参加会议的地方的同志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中央有关的部门，对沿海城市进一步开放的政策也是积极支持的，说明这一方针充分反映了大家的愿望。经过与会同志十二天的共同努力，会议是开得好的，已取得了一个成果，就是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我认为基本上是个好的文件，体现了小平同志要进一步开放的指示精神，也从我们现在的实际出发，考虑到我们如何才能把这项工作搞好，搞成功。比如说，要分步骤，要采取不同的开放形式。这对我们把小平同志的指示贯彻好，是很重要的。我们虽然搞了几年开放政策，但是不能说我们在这个方面经验就已经很丰富了。有一些事情，看得比较清楚的，有把握的，那就先搞；有一些事情，我们现在还看不很清楚，或者还存在许多矛盾，国家还需要再创造条件的，我们就稍微缓一下。我们一方面要坚决贯彻进一步开放的方针，另一方面又一定要把它搞好，搞成功！

沿海城市的开放，总的说现在还是刚刚起步。今后的趋势，是还要进一步开放。如果某些方面今天开放得还不够，也不要紧，明年我们再继续放。同意刚才谷牧同志讲的，今后还可能有第二、第三个进一步开放的文件。但不要因为缺乏经验、没有把握，一下子搞起来而出现问题反而不好。

所以，我主张分步骤，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北海要搞特区，我看将来也是可能的，但是现在不一定马上成为特区。一个是特区，一个是经济开发区，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沿海港口城市利用外资进行技术改造、技术合作的自主权，采取这三种形式，我看比较恰当，可以不断地总结经验。我国不是岛国，也不是内陆国家。我们和欧亚大陆连在一起，但是我们有两万公里海岸线，与海外有许多联系。这个有利条件我们过去利用得不够。从将来的发展看，恐怕不仅是沿海城市的问题，很可能扩大到沿海一大片。将来很可能在整个经济管理体制上，沿海地区会建立一种和内地不同的体制。当然，这是后话，且听下回分解，现在还难讲。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觉得现在放得还不够过瘾，我们还是得一步一步走。也许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些慎重过度。这次会议的《纪要》，一定要体现小平同志提出的进一步开放的方针，同时又要说明要分步骤，采取不同的形式，以后还要继续发展。

刚才同志们对《纪要》提了一些意见，我看大体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属于具体化的意见。这是一个纪要性的文件，不可能写得那么具体，将来还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来作些规定，那是属于具体化的问题，或者是后续工作的问题。这个会只是定一些重要的改革和措施，我看后续工作的量还很大。另外一个方面的意见是要求放得更开一些，认为《纪要》现在的写法还放得不够。这里面我觉得可能又有两个方面，有一些意见是可以和应当吸收的，也就是说有些方面还可以放得更宽一些；还有一些意见从发展上讲也是对的，但恐怕还是要缓一步来考虑，将来可能一年还要总结一次，还要有一些补充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点也要和大家讲清楚。

总的讲，我觉得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这个文件基本上也是写得好的。会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再改一下，就可以提请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审阅。

三、沿海地区的开放主要是靠政策。当然，不是说对这些地区，在财政上、投资上一点也不考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沿海这十四个城市，再加四个特区和海南岛，是很长一条线，在目前这种财政情况下，要中央拿出较多的投资来支援沿海开放，确有困难。因此，主要还是靠政策，加上中央必要的支持。这一点，请大家不要希望过高。从全国来考虑，现在主要是搞能源、交通，能源和交通搞不好，沿海地区的开放也没有条件。

当然，能源、交通中有一部分是在沿海地区。比如，将来会有很多电站部署在沿海地区，包括核电站，还有港口、机场等。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靠政策，靠发挥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本来沿海地区有这个潜力，过去由于政策和制度的束缚而不能充分发挥，这是主要的问题。

政策主要是两条：

第一，要给外资、外商以吸引力，就是“蚂蚁政策”，使他一来就能够吃到甜头。这里面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市场，主要是这两个。刚才我和王丙乾同志商量了一下，会后可以再讨论一下，我看沿海港口城市的合营企业，税率可以比我们已经公布的《合营企业法》降低一些，如果搞的结果比较好，还可以整个修改《合营企业法》。究竟降多少，还可以讨论。市场怎么让，还要研究出一些办法。不外乎两条，一个是让我们现在大量进口的东西，一个是让我们国内市场供应很紧张、很需要的东西。这些将来可以搞个目录，给各地配额。给了配额，和外商谈判就有数了。

第二，扩大沿海地区对外搞经济技术合作的权力，就是扩大它的自主权，不要什么事都到北京来。外商对我们一条很大的意见就是办事太慢。只要权力下放，办事就快。比如天津市，给它划个大框框，里面的事它自己定，不用来北京审批。这样当然办事就快，效率就高。扩大权力的问题，我看这个《纪要》上反映得比较好了。还有些不够的地方，根据大家的意见，会后再研究。

四、根据沿海地区目前的情况，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如何在对外开放中积蓄力量？《纪要》中也讲了，应当把重点首先放到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上，或者兴办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中小企业。当然也不是说不搞大的，但大量的还是搞中小企业。这十四个进一步开放的港口城市，这样搞，经济效益恐怕会更好一些。不要一下子贪大，兴趣放在投资时间很长的项目上。资本家一开始也是先搞小的，尝到甜头了再搞大的。

五、沿海地区一定要利用进一步开放的条件，在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方面做出贡献。我们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内地和沿海地区发展是不平衡的，沿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好一些，信息也快一些。将来要搞一些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企业，首先要靠沿海地区。也就是说，在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中，沿海地区要做出自己的贡献。

听取中国石化总公司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十三日

现在高价油卖不出去，你们就发信到乡、镇，直接卖。商业部如果不提货，你们就自己卖，这是我定的，高价油这部分可以产销直接见面，实行市场调节。

对经济效益差的厂，应该关、停、并、转。石化总公司也要实行关、停、并、转。你们效益要是不高的话，那就把原油出口。让经济效益好的炼油厂先吃饱。否则，成立石化总公司就没有意义了。要给效益好的炼油厂多加工一些原油，对效益差的厂停产整顿。

可以从国外引进塑料加工的技术，多搞点塑料。也可以买点技术，要舍得花这个钱，把技术买回来。技贸结合的问题，可以讨论，在没有解决以前，也可以买技术。人才可以请回来，退休的专家，请回来指导。要研究这些问题，买人、买技术。我们有些技术攻关了多少年，攻不下来。如果请回人来，能提前三年就可以产生很好的效益。这些方面，看准了一项、两项，赶快下决心搞，软件、硬件都可以搞。两年前在听化工部汇报的时候，我就答应化工部搞，但到现在没见搞成。燕山石化公司也可以和国外合作，搞加工嘛，花不了多少钱。生产单位可以搞些加工试用，不搞下游产品不行，当然和轻工部要有所分工，但不能截然分开。你们可以搞部分产品，开发新的品种，为了搞好原料综合利用，可以搞产品的加工，也可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陈锦华¹等汇报时的谈话要点。

以搞关联公司，通过关联公司的办法，和轻工部、地方合搞。产品开发是个大事情。

关于一九九〇年乙烯生产规划准备搞到二百万吨问题，上乙烯生产设备钱不够，宁可上海不上，把齐鲁先搞起来，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现在有两个矛盾，一个是财政，一个是经济效益的问题。财政就是紧张，效益还不够。加工多少这是次要问题。搞到一亿五千万吨原油，到底是我们自己吃掉划算，还是出口划算？要算个账，这是个大政策。国家把石油化工看作是生财之道。你们要考虑怎么样出钱，要考虑改造、深加工。还要考虑投入产出的问题，逐年搞个表，每年投入多少，产出多少。如果你们老企业不改造，不搞深加工，你们效益就不大。但是，搞改造、深加工，投入太大也不行，要考虑投入产出的问题。

石油化工总公司要研究一下投入产出，效益要好，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情况下，搞大的产出，下一个五年要有比较大的产出才行。钱到底投到什么地方效益比较好，这要考虑。上海那套乙烯还能不能再放几年？（答：不行，放久了损失太大。）老厂的改造问题，整顿问题，调整问题要考虑，首先要把效益搞上去，这是投入少、效益高的一条路子。你们要用国际价格来计算，如果还能有盈余，才能够站得住脚，要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的标准，就是用高价原油还能赚钱，要算这个账。石油化工是个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行业。我们现在是资金密集做到了，但是技术密集没有搞上去。“七五”期间，一定要把技术搞上去，和国外合作，引进技术，改造我们企业落后的那一部分。否则，将来会投入很多，却拿不出很多的效益来。至于加工多少原油，只要解决经济效益问题，就可以吃饱，甚至还进口原油来加工。日本、新加坡，还有些地方不就是靠进口原油搞加工的嘛。没有技术或技术搞不上去的话，不但不能够用进口原油，就是国内的原油也吃不到。

我们不要什么都全部自己搞，可以买关键的部件，自己组装，还是划算的。这次“银河”亿万次计算机，我们引进的只占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都是国产的，看来还是合算的。因此，你们的设备问题也不要什么都国产的，可以买一部分。这样对我们效益还是好的。

设计院必须改成工程公司，和国外可以合作，合作设计。中国配的设

备质量差的，材料质量解决不了的，可以进口。设计可以国内外合作，设备也可以国内外采购；国内做的也要用投标的办法，按时交货，就奖励、加成。用招标的办法可以保证时间，保证质量。过去我们为什么上军工配套搞得不好？因为有个政治任务在哪里，地方的配套没有这一项，所以质量不行，也不按时，就差了。今后，咱们就搞经济办法，签订合同，质量好的我们就优待，这样尽管多花一点钱，但是对建设单位来讲还是便宜。缩短了周期，保证了质量，经济效益还是好的，宁可多给点钱，真正按合同，我们就加成，这样就有积极性。现在修船，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奖励的办法。前次中曾根²来的时候，中日友好医院有个锅炉就盖不起来，后来就包工搞计件，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结果盖起来了，搞上去了。当然，工人干活也不能无限制地干很长时间。大的成套设备的工程必须采用特殊的办法。一是质量，二是时间，质量不能坏，时间不能拖。大型的工程，必须要给点甜头，这样对建设单位的造价还是便宜的。现在有些设备厂，出的产品不好，并不是它技术不能制造，而是不认真。为什么愿意找外国的厂商做总包？关键是通过外国厂商做总包，它认真。这次冶金部搞宝钢二期，它就由西德人总包，技术上他负责，西德人再反过来包给我们的，就会保证质量。我们搞这个事情，一是要给点利，就认真了；军工订货，是政治任务，制造厂比较认真。另外是要派人验收，设备制造过程中要有验收制度，要从头到尾地检查，军工搞订货就是这个样子。宁可我们多花点钱，但是这样比国外的设备还是便宜的。我们所有配套的工程都有这个问题。

上海聚酯短丝设备制造做得不错。现在我们国内有十大设备攻关小组，应当把上海的聚酯短丝设备的经验认真总结一下。

上海那套乙烯，能不能把齐鲁那套搞上去以后再搞？石油化工基建也可以搞包干。搞二百万吨乙烯，到底怎么搞法，你们考虑一下。按你们的账上缴，多了自己搞，如果有钱，上海也可以包进去。

你们石化总公司至少要发挥关、停、并、转的优势，多搞点钱还是可能的。到底上缴多少？剩下的你们可以多搞些项目。

到一九九〇年你们能不能实现利税二百亿元？你们考虑一下。另外，逐年到底多少？你们搞得多一些就可以搞些计划外的项目。

劳动工资你们可以改。现在国家已经决定：两个半月的奖励免税；发

四个月奖金的企业要交给国家百分之三十的税；四至六个月的交百分之百的税；六个月以上的企业交给国家百分之三百。至于说你们内部怎么奖励法，国家不管。你们是搞工资改革，是搞浮动工资，还是搞奖金？由你们自己决定。

企业人员要按需要定编。超编的部分，可以组织他们学习，也可以搞绿化，年纪大的就休息，有些也可以搞卫生。不要把人都堆到车间里。不这样，企业没法紧张起来。要下这个决心，搞定员，能搞出来就好。

石油化工，要用国外贷款，是能贷到的，只要有效益就可以贷款，不受限制，你们可以对外谈。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贷款还没有用，你们可以用这些钱，只要你们还得起账，就可以用。可以搞补偿贸易，也可以买出口原油五百万吨，只付油费，挖潜加工，用余利你们自我壮大。中原油田的油质好，天然气多，全部用在国内搞石油化工，这部分油和气不要出口。中原油田的伴生气和气体的综合利用问题，由计委牵头，石化总公司统筹规划。国家经委百分之三十收回的折旧费，可以返回给你们。利税国家留百分之八十七问题不大。可以考虑利改税以后留给你们百分之十三，和田纪云同志商量一下。用包干分成的办法不太好，还是用利改税这个渠道给你们留下百分之十三，无非是把调节税压下来。

你们可以借外债搞些新的技术。另外，要给你们底下的企业相当的自主权，不然你们底下的企业没有动力，归了总公司以后感觉不到什么优越性。把权都收到你们那里去了，底下没有动力，你们总公司也搞不好。

关于借款的问题，借外债的问题，你们好好研究一下，你们石化总公司要借款是有条件的，该借就得借。

石化总公司留百分之十三，原则上可以，就看什么形式，最好用利改税的形式，无非是调节税改一下，上缴利税占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五至百分之八十七，留给你们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五，你们可以设计一下方案。如果利改税以后拿不到这么多，我们就在调节税里想办法改，使你们能拿到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五。油品可以出口，进口材料，工贸结合。外贸上要给你们几个什么权利？要给多少进口设备的额度？现在给沿海几个城市是三千万元以下，进口设备自己就可以批，总公司也得有这样的权。当然不一定有沿海那么大的权，但你们可以利用沿海这个优越条件。

注 释

1. 陈锦华(1929-), 安徽青阳人。时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曾任纺织部、轻工部政研室主任, 上海市副市长, 国家体改委主任, 国家计委主任, 全国政协副主席。

2. 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 1918-), 日本群馬县人。时任日本首相。曾任日本众议员, 自民党总务会长、干事长, 科技厅长官, 运输大臣, 防卫厅长官, 通产大臣, 行政管理厅长官。

运用科学技术加快油田发展大有可为*

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

我这次到这里来，是想看看在胜利油田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做一些什么事。经过考察，听了你们的汇报，我讲三点意见。

一、我国石油战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石油战线的工作是做得好的，石油部的工作是做得好的。

去年十二月石油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讲了石油战线经过几年工作，出现的可喜变化，提出了今后的工作部署。我们都感到这个报告令人振奋。在一九八〇年前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确实有些担心。那时海上石油的勘探才刚开始，将来究竟怎么样，心中无数。而大陆的石油能不能稳定住一亿吨，是逐年递减，还是经过几年工作可以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时也不落实。现在，四年来的工作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四年石油的产量不仅稳住一亿吨，而且逐年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还为石油工业的新发展作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对此，我们必须充分估计。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探明的地质储量增加了。这是多产油的一个前提条件。吃饭就

* 这是赵紫阳在胜利油田听取汇报时的讲话。

得找米，有米才能做饭。这几年几乎全国每个油区的地质储量都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后备储量增多了，为今后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对地质构造规律、找油规律，在认识上提高了一大步。这方面，我们的视野比四年前更广阔，认识的领域和深度都提高了。也就是说，我们找油的本领比以前大了。

第三，找油的装备、技术也都提高了。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有很大关系。通过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和部分关键性的先进设备，使石油工业的装备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四年我们采取一些政策措施，给石油战线一种机会、一种可能，使它能够稳住产量，准备新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由于石油战线全体职工的努力，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已经到来。今后我们的任务是：我国陆上的石油要在稳步增产的基础上，既要为进一步的新发展作充分准备，同时又要力争逐年为国家多作一些贡献。

总的来讲，石油战线在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在三中全会以后的四年中，工作是做得好的，有很大的成绩。当然，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任何时候都还有缺点，还有不足之处，应该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但从总体来讲，中央和国务院交给石油部门的任务，是完成得好的。否则，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令人高兴的局面。

二、石油部门要为四化建设、为缓解国家财政困难多作贡献

我国大陆石油正进入一个更大发展的新时期。但是，这个发展，一定要立足在科学的、可靠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稳产高产，才有后劲。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地质储量的不足，仍然是石油战线的—个主要问题。因此，加强地质勘探，增加地质储量，仍然是石油战线第一位的任务，是工作的重点。搞石油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秋里、世恩同志以及唐克同志，他们都持这个观点。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

我们要努力增加地质储量，但储量有多大，能拿出多少油，在这样—

个领域里，还有很大的潜力。这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不断发生变化，不要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框框。我们开采石油才几十年，经验不算很丰富，水平也不高，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要看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快，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运用到油田以后，将会极大地提高石油的产量。我们过去在技术比较落后、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所计算的那些数据，将来是会发生变化的。当然，这个变化，要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既不要把已有的数据固定化、绝对化；又不要在有了新的数据之前，把它轻易否定掉。我看不要说得那么死。由于新技术的出现，情况很快会起变化，像过去我们认为没有油的地方，不是找出油了吗？过去认为打到花岗岩就没有希望了，现在不是花岗岩里面也含油吗？认识深化了，技术进步了嘛。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并且要把解放思想和尊重科学结合起来。解放思想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尊重科学，持科学的态度，本身也包含着解放思想的问题。既不要盲目蛮干，又不要把一切东西看得很死。这几年我们利用对外开放的机会，不断地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们找储量，计算储量，找得更快一些，计算得准确一些，提供了很多过去从不具备的有利条件。这方面还大有可为。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增加地质储量，使油田的大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可靠的基础上。这始终是重点。不能说经过这四年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还需要做大量的艰苦工作，任务是长期的。另一方面，从全国四化建设的需要来讲，特别是在六七年内，在“七五”期间，石油战线应当想方设法多出一些油，为国家建设起个“雪里送炭”的作用。这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全局提出的。

当前我们国家的形势是很好的。无论农业，无论工业，发展的情况都是好的。这几年虽然处在调整时期，仍保持了相当的速度，比我们原来预计的要高，而且经济效益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转。去年就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今年一季度情况继续好转，工业、农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消费品工业都是向前发展的趋势。从国营工业来看，开始基本上做到产值、实现利润和上交税利同步增长。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使我国经济出现的好形势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同时又能为九十年代甚至下个世纪初新的发展准备条件。在今后两年和“七五”期间，为了给全国的经济建

设在下一个十年，甚至下一个世纪初的发展打下基础，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能源交通和资源开发方面，需要搞一些规模大、投资多、周期长的骨干工程。比如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就要上。这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工程，在世界上也是数前几位的。建成投产以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将长期起巨大的作用。但是它的建设周期长、投资大，估计要二百多亿元投入，而在近十年内却没有什产出。还要建几个核电站，宝钢二期也要上，这些大工程每个都是几十亿、上百亿元的投资，要七八年才开始受益。现在电力供应也很紧张，缺电百分之二十左右。再加上国民经济每年要增长百分之六七，缺电的现象就更加突出。这七八年内大的项目要投入，但是还不能产出，不能靠它。那一碗饭虽然很大，很好吃，但离这很远，马上吃不到。人，一天不吃饭不行；工厂，一天没有电也是不行的。长远的应考虑，当前经济增长的需要也应考虑。交通、通讯也是薄弱环节。此外，教育、卫生、环境保护、职工生活等等，都有许多事需要办。但现在我们又恰恰处在一个财政情况比较困难的时期。为了实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我们既要有长远的投资，又要为近期经济不断增长的需要而投入，还要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不断提高，而我们的财政又相当困难，很难担负这么多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对这种情况我讲过三句话：第一形势很好，第二财政困难，第三我们又面临着一个大规模开展建设的时期。矛盾比较集中，需要出台的东西很多，但是门很窄。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怎么能把口子、把门开大一点，让需要出台的能够及时出去。也就是说，要广开生财之道，渡过财政上暂时的困难。

最近，我们研究来研究去，看来在石油上打主意比较现实。我们希望石油战线能在为缓解国家困难方面作出突出的贡献。我看是有条件办到的。因为经过四年来的工作，后备储量的情况有所好转，今后后备储量还会不断增加，是很有希望的。而且，我们还在开发海上石油，万一不行的话，海上总是可以出些油的。近期内，我们有意识地在那些储量较多、能多采油的地方，想办法多采一些油，多作一些贡献，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近期多采一些油，适当加快开采速度，将来有三种可能：一是这一段我们多采一些油，由于我们有后备储量，以后后备储量找到更多，完全不影响今后石油的持续增长。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了。二是这一段多采了一些油，新

找到的储量又不那样令人满意，以后的增长速度可能受一些影响，不会更高。三是搞得不好，这一段多采一些油后，过上六七年，又得回头搞一次我们前面四年作过的工作，再来个积蓄力量，准备条件。我们应当避免这种可能。这里，关键是要在后备储量上下功夫。只要大家努力，我看实现第一种情况是可以做到的。当然，我们近期内多采一些油也不是无限的，还是要选择那些有条件的地方，依托现有油田和它附近储量丰富的油区去搞。这样做不需要搞很多新的基础设施，不需要新修铁路，新建港口，投资省、见效快。在近几年内多采一些油，投入少一些，产出多一些，这对国家的贡献就更大了。前面说过目前国家财政困难，口子就是那么大，如果石油部要投入的盘子很大，那就不能把本来很窄的口子打开，反而使口子更窄了。石油部门这个大个子投入少一些，产出多一些，不硬往外挤，这个口子、这个门就好过了。从全局看，东部油区要加强工作，在老油田和老油田周围多采一些油。这样可能一些油井要缩短服务年限，可以从其它方面想办法去弥补。也有可能，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适当加快一些开采的速度，对老油田的寿命不会有很大影响，那就更好了。

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方针，是从国家的全局出发，从挖掘潜力、缓解财政困难着眼的。我看这是符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

三、胜利油田大有希望

这次到这里以后，大家都感到，几年来胜利油田的工作是做得好的。油田现在的好形势，出人预料之外。记得在一九八〇年的时候，大家还有些担心，胜利油田究竟怎么样？是稳住产量，还是继续下降？现在油田的同志们向我们展现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前景。耀邦同志给胜利油田题词：“建成第二个大庆，献给开国四十年”。这对胜利油田广大职工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寄予很大的期望。胜利油田从党委到全体职工，勇于挑担子，自己给自己加压力，自觉往前赶，为国家分担困难，这是很好的。这种精神状态变成全体职工的统一意志，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我们认为，胜利油田是大有希望的。

这几天，油田党委书记李晔同志在路上给我讲，他们有个说法，叫做

两手抓：一是抓后备储量。油田对这一点很重视，今天油田总地质师刘兴材同志也讲了地质构造、勘探的情况。这里虽然地质复杂一点，是个复合式油气盆地，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对储油、采油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了。这几年，油田大力搞勘探，除了老油区外，又在加紧勘探五号桩和郑家两个新基地。二是抓“精兵巧用”，讲究经济效益。我的理解就是投资少一点，产油多一点，得到最佳的经济效果。这种抓法，我认为正确的。

我们坚信，全国石油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灿烂的，大陆石油的前景也是光明灿烂的。很有可能，大陆油田的前景并不一定比海上差，甚至比海上更好、更现实一些。胜利油田面积虽然没有大庆大，但从储油构造的深度上看，还有很大潜力。现在讲，要建成一个大庆，将来也可能是两个大庆。至于什么时候办到，要看你们的工作。全国石油队伍和胜利油田的全体职工，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改造主观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聪明，本领也将越来越大。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对自然界来讲，我们将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

最后，祝胜利油田全体职工在向四化进军中，以及在石油战线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能够起到带头作用！

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潜力很大*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

一

前不久我看了《岳阳楼记》，上面有句话：“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现在我们国家也可以说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政通人和”是讲政治局势，“百废俱兴”是讲经济文化建设。我们的政治形势很好，经济建设经过调整，各条战线欣欣向荣，正逐步展开大规模的建设。今后一段时间内，为了达到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要准备今后的后劲，需要展开重点建设。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财力不足，资金缺乏。我们河南有句土话：“罗锅上树，前（钱）紧。”我们讲生财之道，就想到石油这条战线。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就要想办法筹集资金。既要维持今后几年经济逐年增长的速度，同时又为以后十年的发展准备后劲。想来想去，我觉得石油部门在近期内是最能为国家积累资金，帮助国家渡过财政困难的。我在胜利油田讲了石油战线要为国家建设“雪里送炭”。“雪里送炭”和“锦上添花”意义不同。“锦上添花”，多一枝、少一枝差不了多少。而“雪里送炭”，是很急需、也很解决问题的。这是从整个经济建设的全局出发，向石油战线提出的希望。石油工业过去就为国家送过炭。像一九六二年前后，国家非常困难，那时石油工业起步不久，对渡过当时的困难，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经济搞得一团糟，那个局面可以维持下去，没有石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中原油田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油不得了。那些年石油一年一千万吨往上增加。石油工业是在国家很困难的条件下上去的。用你们的话说是“迎着困难上”，如果那时候大庆退下来还得了吗？过去你们是支援了国家的。我们现在的形势不同，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困难。现在是为了发展大好形势，为实现四化进军中遇到的暂时困难。希望石油工业能多出点油来缓解这个困难。

我国石油工业的潜力是很大的。原来寄希望于海上采油，当然海上前景还是好的。现在看，陆上采油的前景也很广阔，很可能陆上比海上更好一些。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开阔视野。

石油工业要多出油，第一位的工作是要多搞储量，第二是要加快建设，多打井。要多出油，就要多投入。我们要在本世纪末把石油工业搞到相当大的规模，没有相当多的投入不行。但是，近几年内，石油工业要真正为国家多作贡献，帮助国家缓解财政困难，就要很好研究如何做到既要多出油，投入又不要那么多。这对石油工业当然是很高的要求。又要增加后备储量，又要多出点油，而且投入又不要那么多。石油的产出，除了供你们自己扩大生产之外，必须在近几年内给国家提供相当数量的资金。对石油部的包干，外部条件没有包进去。随着石油的发展，还有外部条件的配套，什么电、公路、铁路，还有港口啊，都需要资金。除了为石油发展配套的资金以外，你们还要能为国家提供资金，多作贡献。这个要求当然是很高的。因此，对石油战线怎么搞，不能只从石油部门本身考虑。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不仅要考虑本世纪末搞多少油，必须考虑“七五”和“八五”的前期，除了石油工业本身的需要之外，在帮助国家减少财政困难方面如何能够多作贡献。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要求石油战线少投入、多产出、多出油的原因所在。我们相信石油战线对这个要求是一定会做到的。

二

石油工业要进一步发挥政策的威力，进一步发挥科技的作用。要真正做到少投入，多产出，提高经济效益。正确的经济决策很重要，全国的决策，每个油田生产建设的决策，如何选定突破口，这个仗怎么打，这涉及

到经济效益问题。除了正确的决策外，还必须强调靠政策，靠科学技术。

我们要靠实行正确的政策，把石油战线全体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石油战线的政治思想工作有好的传统，还有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三老四严”等，都是好的。这些好的传统要继续发扬。除此之外，石油企业内部要实行各种各样的经济责任制。如何搞，如何适合石油系统的具体情况，你们要很好研究。今天早上，宋振明同志给我讲，在钻井队搞改革，纵向搞包干制，横向搞合同制，超额奖励，效果很好。看来，必须把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企业的经济效益、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挂起钩来，奖勤罚懒，多劳多得。

第一线的钻井工人，试油队，井下作业，这些最艰苦的工种，可以先进行些试点。比如实行超额奖励，节约奖励等，完成任务好、效益高、贡献大的，工资奖金可以高一些。国家要取消奖金封顶，具体办法很快就要发下来。当然不封顶以后，还有一个超额制约的办法，要实行奖金征税。在国家限额以内的不征，超过多的多征。国务院原来考虑建筑、矿山井下、搬运工人，奖金超额不征税。石油系统内有些工人工作很艰苦，像打井的，试油的，还有地震的，还有什么队，也可以不征。你们研究一下，提出方案报国务院。首先使最艰苦工种的工人增加收入。这对工人有利，对国家有利。石油系统应该把大庆的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岗位责任制，同目前全国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办法结合起来。政治思想工作加物质利益，就能有效地把石油战线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发挥出来。

石油要想少投入，多产出，必须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这里我想指出一点，引进技术，中外技术合作，在新形势下需要大大加强。软件也好，咨询也好，关键的先进设备也好，要引进过来，消化吸收，为我所用，使石油战线能够逐步采用先进技术装备。这个领域，我们这几年有许多突破。但是要看到，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过去是十年一小变，现在是三年一大变。包括物探的技术，打井的技术，采油的技术，都是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所以，我们应根据我们的特点，我们的需要，选择经济效益最好的方面，放手来搞，拿来以后对我们有很大的作用。实际上，有些东西价格也并不贵。买

技术，买关键设备，可以放手一些，你们也有外汇，这方面要扩大石油部的自主权。

石油战线要少投入，多产出，扩大后备储量。这是首要的，是基础。除此以外，还有两条很重要：一是要抓一批高产井，二是要在提高单井产量上下功夫。这也是个设备、技术、工艺问题。当然还有管理水平、政策问题。昨天晚上同专家们座谈，他们就提出买电动潜油泵，一台七万到八万美元，进口一千台，只有七千万至八千万美元。首先选好井，选资源条件好的把它安装上，按一口井平均日增产三十吨算，一年就可多采油一千万吨，按一半算也是五百万吨。五百万吨，就是一亿美元，当然也还得扣除成本。这是很有利的。听说安装也不难，一口井几天就可以改。还有测井、压裂、酸化、采油等方面，也要重视引进先进技术。这可能是个好的办法。今天出个题目，你们再研究一下。总之，要运用先进的工艺、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装备、先进的管理，还有正确的经济政策，来提高石油的产量。一个是打出一批高产井，一个是现有油井中选择资源条件好的，加以武装，提高单井产油量。这样就可以收到少投入、多产出之效。

三

最后，我对中原油田说几句话。中原油田这几年的工作做得是好的。现在干部、职工情绪高涨，干劲很大，充满信心。中原油田确实是前景很好的地方，完全有条件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原油田的发展，也是出乎原来预料，我们都感到高兴，满意。我同意专家们的意见。专家们也认为中原油田计划在一九九〇年产油一千万吨有把握，一千五百万吨很有可能。你们按争取一千五百万吨来安排工作，很有可能实现，甚至可能超过。但是，根据我们历来的经验，把余地留给你们。

这里特别说一下，你们这里工农共建文明村、文明矿的经验很好，对整个工矿企业有普遍意义，尤其是对远离城市以外的工矿企业有普遍意义。经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四人帮”的破坏，工农关系普遍紧张。现在虽然有所好转，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你们开展精神文明教育，

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实行联防承包责任制，对油区及附近乡村实行综合治理，正确处理工农矛盾，密切了工农关系，改善了油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油田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个经验对四化建设非常可贵。当然，许多方面的工作要结合起来，如打击经济犯罪、打击刑事犯罪等，使它互相配套。这个经验报纸宣传过一下，还有进一步总结、宣传、推广的必要。

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希望中原油田全体职工继续努力，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听取建材工业发展纲要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

现在国内旅游宾馆用的卫生陶瓷和其它新型建筑材料大多是进口的，我们生产的不行，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须下很大功夫。要把质量、品种搞上去也不难，关键是建材工业要有搞活的政策。应采取招标办法，从进口卫生陶瓷、装饰材料花费的外汇中拿出百分之七十在国内招标组织生产，产品按国际价格计价，这样一定有人干，在三年内肯定能搞上去。高档的建筑卫生陶瓷、建筑小五金和灯具、室内装修材料等，这些产品工艺并不复杂，但批量小、产值小，如果没有特殊政策，就没有人愿意干。现在由一些小厂粗制滥造，搞出来在旅游宾馆不能用，结果只好大批进口。这种情况应该改变。连国防用的特种陶瓷我们都能搞出来，为什么卫生陶瓷搞不上去？高档的东西生产批量不大，要像组织军工产品那样，当作重要任务去完成。除了解决价格问题以外，还要采取与外商合作经营的办法，引进一些技术，并组织专门班子去抓，这样就可以做到“三年小配套，五年大配套”。

上次我到新型建材公司座谈时确定的几件事落实了没有？（杜恩训同志：正在落实。祁峻同志：今年给的两个三千万元花不出去，主要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发展新材料这件事，是四年前小平同志确定了的。我去年11月去紫竹院看过，当时确定新型建材公司要跳出现有的框框，给它很大的自主权。为什么还落实不了，到底有什么问题？要很快搞个班子，选个年轻的同志当经理。

我记起上次到新材料公司时，有个体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那时我说

放在建材局下面，但要求局放开手，给公司很大的自主权。如果处理得好，没有问题。现在看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请吕东同志抓一下，研究怎样解决好。

我们的一些部门处理问题不是从事业出发，而是看重你管我管，把很多事情都耽误了。去年我去新材料公司座谈时，曾确定公司是建材局领导下的一个单位，但给它很大的自主权。当时也考虑到公司的问题还要不要经过建材局党组讨论？能不能和计委、经委等直接挂钩？公司完全离开建材局有困难，很多事还要建材局支持，离开了要扯皮。不离开局，公司自主权又可能受到限制。我当时讲不离开建材局，但要放开手让公司搞。如果把公司和局分开，就会形成两个建材局；如果不分开，公司的工作又可能受影响。这个问题，请吕东同志把它进一步解决好。

你们收企业的几条理由站不住脚。纺织行业技术改造搞得最好，它的厂都在地方。机械厂也不一定收，可以与工厂签订合同嘛！小化肥这几年也搞得好，企业也在地方。国务院各部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发挥行业管理作用，越有直属企业越不能起行业管理作用。中央部门主要应起行业管理作用，一年抓几件大事。我看你们文件后面还有收企业的意见。不要收企业。要改变过去那些老的做法。

你们的利不算低：一年税利四十五亿元，去年利润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利改税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可以实行两种价格，超产加价，要想法把建材工业搞活。我感到你们这个纲要没有着眼于研究分析建材工业当前存在什么主要问题，要采取什么重大方针、政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加快建材工业的发展，改变落后状况；而是提出不少大指标，着重讲要搞多大产量，要多少投资。十七年后的指标定多大，现在定不了，等以后在“七五”、“八五”规划里才能确定。你们讲这些，不大符合我去年八月讲十个问题的精神。搞纲要不同于搞规划。当然你们也提出了一些好意见，但是提得不集中，很分散。比较起来，建筑业那个纲要抓住了几个大问题。李锡铭同志，你是建筑、建材纲要领导小组组长，看来你们两家纲要是各搞各的。

（李锡铭同志：开始是一起座谈的，以后两家分头起草。本来准备合在一起再研究一下，以后因为整党没有时间。）

整党同业务两不误嘛！历来有这个经验：各部门各搞各的，文件是不可能搞得好的。各自都想趁机会要钱要物，而不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

浮法生产玻璃上的争论解决了没有？听说有一种意见，认为浮法不适于生产二、三毫米的玻璃，而现在最急需的是玻璃。是这样吗？（杜恩训、祁峻同志作了回答。当汇报到对利用工业废渣的产品应减、免税时）减、免税是什么意思？现在建材利用工业废渣生产多少产品？利用工业废渣作原料搞低标号水泥，一年用多少？（大家作了回答。）

（当汇报到省、市建材机构紊乱，要求恢复省、市建材局时）这个问题就不要讲了。我看“紊乱”一点好。不一定建材机构“紊乱”的地方建材就发展慢，不“紊乱”的地方就发展快。你们去年机构有了变化，利润不是增长 27% 吗！我看机构是可以变化的，目前机构“乱”一些不是什么问题。

（当汇报到企业多头领导时）多头领导不好，一个头领导我赞成，但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搞又是恢复五十年代的办法，这不行。

（李锡铭同志：上次建筑业汇报时，提出要成立一个农房材料配套公司，是民办的，可以吸收农民投资。）不能是农民办的，应该是国家办的，这样才能把农民的钱回笼到国家手里。要搞通渠道，搞市场调节。这个问题要专门研究一下。

今天先定几件事：

第一，农房材料公司问题。这件事谁都可以搞，社队也可以搞。现在要定的问题是国家的公司搞一个好，还是搞几个好？搞公司，主要问题是材料而不是资金。资金可以由银行贷款，给予优惠。公司要对农村成套供应建房材料和制品。供应的办法是搞市场调节，不是按国家牌价，而是“高来高去”。农民现在实际上也是买高价材料，只是大部分钱没有回到国家手里。要给这个公司很大的自主权。农民手里钱很多，在若干年内，光靠日用消费品不可能把那么多钱收回来。建筑材料农民很需要，可以回笼很多货币。

现在国家一年供应给农民十万吨建房钢材不够，可以多拨一点，还可以专门进口点钢材。玻璃也要多拨一点给农房材料公司，多搞些市场调节。公司大家都有可以办，搞多渠道。但是要有个主渠道。主渠道是依靠建设部好，还是建材局好？

(建设部、建材局、物资局都讲了自己搞公司的优势。)

那就由建设部和国家建材局各搞一个公司吧！物资局供应他们钢材、水泥，价钱可以高一些。各方面都要支持他们把公司办好。要定几条政策，给公司创造条件。

国家办的公司，一不搞垄断，二要搞市场调节。对乡镇工业和其他部门搞农房材料不要排斥，不要阻挠、干涉。要多渠道，少环节，避免中间环节牟利过多。吴明瑜曾提出这个公司还可以包建房屋。今后要打破部门界限，建筑部门可以搞建材，建材部门可以搞建筑。

第二，建筑业的问题。建筑业要搞较大的改革，有步骤地进行。一是搞招标承包制，先从大城市实行；二是实行包工包料，材料归承包单位，不归发包单位。物资部门可以拨指标给甲方，拨物资给乙方。银行拨给流动资金。这样搞，材料便于调剂，有利于节约；三是改革劳动制度，搞民工，农民可以进城；四是有条件的地方搞统一开发，从基础设施到整体工程全部建成好后交钥匙。搞招标和包工包料，不可能全靠国家供材料，不能提“不留缺口”。不足部分还得靠市场调节，由建筑部门一家去解决，不用千家万户跑材料，总的说对社会是个大节约；五是建筑部门内部实行经济责任制，搞施工队包干，奖金不封顶、不保底，等等。有关建筑业改革的问题，由国家计委牵头研究解决。

第三，建材工业的问题。建材工业目前要大改革还不可能。主要考虑解决下面几个问题：一是农房材料问题；二是发展新型建筑材料和新材料公司体制问题；三是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问题。要给建材以活力，要拟定几条促进建材工业发展的行得通的措施。

建材的问题由经委吕东同志牵头研究解决。这两个行业的纲要研究好了，再谈一次。

在庆祝我国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 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

同志们：

我国试验通信卫星的发射已经获得了圆满成功。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都为之欢欣鼓舞，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取得了这一新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所有为这项工程的研制、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各单位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我国第一次进行通信卫星发射试验成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敢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信心和勇气。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已经跨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我们取得这次试验的胜利，就有可能为改善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的现状，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开拓广阔的前景。它对于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现四化建设的总目标，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道路上顽强拼搏，取得了许多新的科技成果。一九八〇年，你们取得了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的胜利。一九八二年，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一九八三年，“银河”亿次电子计算机通过了国家鉴定。今年，又传来了成功地发射通信卫星的喜讯。所有这些成果，也是各有关部委和有关科研院所、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数以千计的单位，数以万计的科技工作者、工人、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晶。

这一系列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力协同，联合攻关，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解决重大科技课题的有效的组织形式。尽管我们国家的科技力量比较薄弱，但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我们善于把各方面、各部门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就可以形成巨大的优势，许多本来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现在，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客观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了。我们应该在新的情况下，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地组织协作攻关，用以解决四化建设中具有重大效益的关键性的科技课题，迎接新的技术革命。

这一系列实践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必须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使广大科技工作者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各部门、各地区，都应当进一步肃清“左”的思想影响，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同时，我们也希望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树立为祖国争光的雄心壮志，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

同志们！你们的成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赞扬。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攀登科学技术新高峰，为把更多的科研成果用于经济建设，为祖国四化建设宏伟目标早日实现，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深化改革 搞活企业*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要简单明了，赶快出台

我们搞个文件，就是为了能够执行，不能够执行的东西就别提。你们（指经委）搞了这么个大本子怎么执行？我看只要简单明了，搞个一、二、三、四、五，就行了。不讲虚的，要实的东西，规定性的东西。

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本来是可以办的，许多措施也是可以执行的，但是你把问题的范围一扩大，必然引起争论，争来争去半年也出不了台。这同我的原意不一致。我的意思是，简单明了，赶快出台。

比如，你们在文件上讲“国家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应由下达计划的主管部门认真做好各项计划指标的综合平衡，并保证相应的物质条件”。这一条就做不到。其实有一句话就行了：完成国家计划以外的超产部分，可以全部留给企业或者分成，由企业自己做主，换东西也可以，议价出售也可以。当然，生活资料不能涨价。我看有这么一句话就行了，不要讲那么多的废话。我在广东工作时，广州市的工业生产，只有百分之六十的物资是国家给的，百分之四十是自己解决的。那么多年没有给足物资，它的计划也完成了嘛！你们讲得虽然有道理，但是行不通。何况，什么是指令性计划，什么是指导性计划，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不能把那些理论上的争论拿到这里来解决。否则，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写那些实质性的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汇报时的讲话。

问题，既解决问题，又没有争论，定下来，马上发下去。至于计划怎么制订得更科学，怎么下达，这些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等到这些都解决了，我们的计划体制改革也就完成了。

二、要给企业一点实惠的、能拿到手的权力

优质优价、季节差价我是赞成的，但是不要在这个文件里提。现在要解决的，是企业超产自销那一部分，准不准议价？能否纳入市场调节？企业争自销权，无非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国家不收购、又不准它自己销售的问题；一个是解决价格上的不合理，它自己销售，价格就可以浮动。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做起来很简单。

在价格问题上，要注意，不要出现大的浮动。现在货币这么多，购买力这么强，计划外的市场调节了，计划内的价格再浮动，极容易引起社会上的不安和反对。对这个问题要十分注意。我们说的浮动，是指计划完成后超产那一部分，而且是指生产资料。实质上就是搞两种价格，就像对农民那样，完成国家计划后，可以议价自销。至于优质优价，这个很难讲，因为价格同供求关系有直接联系。如手扶拖拉机，现在供应很紧张，出厂后一抢而光，它不一定是优质的。所以，价格怎样浮动，有个供求关系问题。只要供不应求，价格就要向上浮动。现在我们要解决的不是价格体系如何改革，怎么定价才合理，而是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小配套”问题。把能够解决的先定下来，没有把握的先不要写进去。有的将来可能解决，但现在还不成熟。如果都要写进去，很可能把现在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拖住了；或者勉强执行，出了乱子又得退回去。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给企业一点能够拿到手的、实惠的权力。优质优价、季节差价都不属于扩权问题，而是价格政策问题。属于企业扩权的主要是个自销权。自销权可以给两条：一条是国家不收购的允许自销。比如高价油，我这次在山东就碰到这个情况。炼油厂积压很多高价油，商业部门不收，农民要求买又买不到。我就在那儿开了个口，让炼油厂自销，农民、渔民都可以买，市场调节，敞开供应，卖完为止。第二条是属于国家调拨的物资，完成计划以后的超产部分，可以自销，计划内的也可以按一定比例自销。自销产品

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实行价格浮动，可以向高浮动，也可以向低浮动。有这两条，企业就比现在活多了。

三、不能因为外部条件未解决而影响企业内部改革

我们企业的外部条件，有许多是一下子解决不了的。但不能因为外部条件解决不了，企业内部问题就不解决。比如，我们每年都要有四、五十万复员转业军人安排到地方，许多人都要安排到企业里去。这个问题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需要从长计议。但是，不能因此就影响企业内部、车间、班组实行定员定额。也不能因为我企业人多就不接受。企业内部可以组织多余人员搞劳动服务。

四、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对待企业办社会的问题

我们国家在劳动力安排上的根本问题还是就业问题。我们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不是因为劳动力不足而鼓励企业节约劳动力，而是要在劳动力富裕的情况下，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多余劳动力还要解决就业和吃饭问题。所以，把企业减少用人而省下来的工资额留给企业用于工资改革的办法，虽然会把企业的多余人员减下来，但是减下来的人还得另外发工资，这部分人的工资从哪里出？这不是要另外增加开支吗？所以，只往外调人而不调减工资总额的办法恐怕行不通。当然，搞些试点我不反对，但都这样干，就有问题了。

我们的企业要不要办社会？这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要老抱着一个固定的观念，就是企业不能办社会。恐怕企业办社会可能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们查一查，过去中国华侨到美国淘金的时候，哪一个淘金企业不包社会？去年我到加拿大，看到一个很先进的企业，就是办社会；澳大利亚的米德尔曼特煤矿，整个一座城市都是这个煤矿建起来的，占了煤矿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职工住房的房租都是煤矿补贴的，个人拿的租金很少。如果它不办，工人就不上它那儿去。我们考虑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鉴于中国的劳动力多，比较实际的办法，是企业把多余的

工人组织起来，做各种各样的安排，使之各得其所，开辟生产门路，开辟生活门路。这比拿到社会上去解决要可靠得多，也比较容易解决。如组织服务公司，搞服务行业。至少在今天，企业办社会，不一定是错误的东西，中国的大庆就做通了，搞“五·七”家属队。大庆就是包社会，它不包谁给它包？企业也可以搞多种经营嘛！外国的大托拉斯也是什么都搞嘛！一些跨国公司也是什么都搞。工厂有很多优势，领导也强，还有技术力量，边角余料也多，可以组织各种行业。当然，绝不要塞到原来车间、班组里边去混岗。而是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也要企业化。澡堂、食堂、礼堂、汽车队等等，都可以对外开放，使之企业化、社会化，既为本企业服务，又为社会上服务。这样下去，也可能走出一条路。不然，老讲企业不办社会，也解决不了。

五、关于厂长负责制

实行厂长负责制，我看没什么大问题。但是，现在搞什么样的厂长负责制，是五十年代的，还是苏联那样的？我认为都不行。我们很需要注意一下南斯拉夫以及匈牙利的提法。南斯拉夫提的是两条：一条是反对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高度集中管理。这一点我们也在改，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强调工人自治，这个我们不能采取。匈牙利最近很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强调工人参加管理的作用。对这一点我们要注意。最近，保加利亚日夫科夫¹发表了一篇讲话，他说全民所有制企业要把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开，国家是所有者不是经营者，经营者是企业，包括车间。当然也讲了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也讲到了企业的独立的法人地位。他还说全民所有制不一定就要国家的高度集中管理，要把所有制和管理分开。这些和我们这两三年来所想的问题是大体相同的。我觉得我们的企业，第一个就是要明确党委的作用。应当明确地讲，企业党委就是起保证作用，就是管党务工作，管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什么都统一领导于党委，不是党委一元化领导。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总要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总要体现工人当家作主，明确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不如此，完全把权力集中在厂长一个人身上，是要出问题的。过去毛主席总强调工人群众

的创造性、积极性，强调工人政治上的地位，参加管理。不强调按劳分配，当然不行。但是反过来，在实行按劳分配以后，不使工人在政治上感到在企业中有发言权，工人的长期、持久的积极性也不能保持。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企业管理方法，也讲工人参加管理，提合理化建议。因此，我建议搞厂长负责制试点的企业，要注意体现工人当家作主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企业的改革方向问题。不然的话，我们的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有什么区别！过去，不能很好地体现工人当家作主。现在我们把企业的权力扩大了，如果工人和厂长还是简单的“雇佣关系”，除了多劳多分配，其他方面体现不出工人当家作主，我看不行。究竟怎么体现？应当同厂长负责制同时加以考虑。

六、权放一格

权放一格，就是层层把权力下移一格。总的意思是把一些批准权，原来属于国家计委的，可以放一些给省、市和部里，原来属于省、市和各部的，可以下放给局一级；原来属于局的，可以放给公司；原来属于公司的可以放给企业。下放一格，当然，如何放，还要具体化。

关于人事管理权，书记处会议已经定了原则：企业的上一级，只管企业的书记、厂长或者只管企业的领导班子。企业的副书记、副厂长，或者企业内部的中层干部，都由企业自己定。是书记定、厂长定，还是企业党委定，还可以再研究。因为现在还没有实行厂长负责制，企业还是党委书记当家。不管你这个企业是部管的、地方管的，上一级只管书记、厂长两个人，或者管一个班子。

企业内部机构设置，企业完全可以按照实际需要自己决定，上级机关不得干预。

七、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

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计划是必须坚持的，在这个基础上放开一些，出不了什么毛病。农村四年多的改革经验已经证明，放开以后东西就多了。

老是怕这怕那是不行的，要解放思想。我们的社会潜力很大，煤炭有潜力，铁路也有潜力。江苏买一百五十元一吨的煤，也没有天下大乱，反而把江苏的工业逼上去了，这有什么不好呀？一部分物资实行市场调节以后，显然我们的计划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占领一切阵地了，但是我们还可以搞一个预测嘛！比如，我们的年计划的增长幅度可以订到百分之六，预测可能达到百分之八。我也不按预测给材料、给东西，我也不按预测调东西。计划外的就属于市场调节的范围了。

我们这四年多来，搞来搞去，有点路子了。如果说有点乱的话，看来是乱中有治。就像一股水，冲来冲去，有的渠道不行了，有的渠道需要改进，有些渠道看来是可以的，就要因势利导，这个渠道还可以扩大。比如山西搞经济煤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小煤窑，一九八二年放开了以后，一九八三年一下子就增产四千九百万吨，其中有二千多万吨是小煤窑的。如果从原来我们那个计划观点来看，这就是乱；但从国民经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来看，这就是治。小矛盾肯定有，有也不怕。我看，就是物资局同志讲的那个意见，给你煤矿规定每年增长百分之几，比如百分之三，百分之三以外超产的是你的，我不要，让你搞经济煤。至于价格提高多少，可以研究。东西多了以后，价格就可以稳住。在农贸市场，粮食放开以后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物资管理和分配，一个是紧俏的东西实行递增包干，超过了的留给企业，有的也可以分成，上交多少留多少。再一个，国家没有计划的，或者国家不收购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安排。即使国家有计划，但国家商业部门、物资部门不收，自己又销不出去的，企业可以不生产，转产别的东西。这是当前企业扩大计划权的两个关键问题。没有什么可怕的。最多不过是它蚕食国家计划，不要紧嘛，我们还可以反蚕食。最后，东西还是多了。有些消费品，比如名牌自行车，你超产了，国家也不多调你的，但不能涨价，你可以用它去换东西，搞协作，多换点原材料。也可以进口一些材料，亏损自己负责。生产资料超产的，可以实行价格浮动。企业活了，对国家也没有多大损失。过几年生产上去了，我可以再调一次基数。总之，我们要千方百计为解放生产力而奋斗。要让企业把劲用在自己多发展生产上。计划内的不能削弱，这方面还要逐年增加一些；计划外的让企业努力增产一些，适当增加市场调节的部分。

今后我们的经济究竟怎么搞，我看是要从实践中去解决。实践证明这样搞是有效果的，它就是正确的，就是符合中国特点的。当然，这样搞可能有矛盾，但矛盾既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要进行分析。如果都躺在国家身上，都不计较，那就会死水一潭。你们看江苏搞得那么活，老百姓是满意的。如果按我们原来那个框框搞，江苏的生产一下子就下降一大块。

注 释

1. 日夫科夫 (Todor Hristov Zhivkov, 1911-1998)，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1989年被解职，1992年被判七年监禁，1996年被无罪释放，1998年5月病逝。

应用科研单位应实行 有偿合同制和课题承包制*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三日

株洲电子所试行的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课题承包制，经费由国家事业费开支改为经济自立，是科研单位，特别是一切从事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科研单位改革的方向。抓住了这一关键，科研单位长期存在的各种弊病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应积极推广。国家应给予从事改革的科研单位以大力支持。文件中所提出的几条建议，原则上都是可行的。请国务院科技小组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尽快予以落实。株洲电子所的经验应公开报道，并就此发一评论。

* 这是赵紫阳对赵东宛关于湖南株洲市电子所等技术开发科研单位实行有偿合同制情况报告的批语。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国内建设

根据一九八三年六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各级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年来，我国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形势的发展很好。

国民经济在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稳步前进。一九八三年，农业生产在连续四年增产的基础上又获得大丰收。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商品率高的专业户成批涌现，农民自愿组织的有各种内容的经济联合体日益增多，广大农村欣欣向荣。轻重工业协调发展，能源生产稳步上升，交通运输量进一步增长，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基本建设的投资结构有了改善，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进度加快。国内市场繁荣活跃，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有新的进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一九八三年，职工家庭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费收入达到五百二十六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四；农民按人口平均的纯收入达到三百零九点八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七。一九八三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点

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九点五，工农业总产值以及粮食、棉花、原煤、原油、钢、钢材、生铁、水泥、化肥等三十多种主要产品产量，提前两年达到或超过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八五年指示。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生产增长速度，上交利税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一定能够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

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试验通信卫星的研制、发射和定点成功，表明我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和材料科学有了新的突破，对于实现通信、广播和电视转播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普通高等学校、各类成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规模继续扩大。与此同时，各种函授刊授学校、广播电视学校、职工轮训学校和农民技术学校大量兴办，职工自己组织的读书活动蓬勃开展，无论城市和农村都正在掀起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的热潮。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社会科学研究等部门，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出现了一批深刻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创造性生活的优秀作品和成果。体育、卫生事业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对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和提高人口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大家知道，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去年举行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曾经指出思想文化领域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随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又进一步着重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以及党和政府规定的正确政策，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我们就及时予以纠正。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完全正当的，是应当提倡的，决不允许把它同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混淆起来。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

染，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发扬健康纯朴、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

政权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情况明显好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行政公署、省辖市政府机构的改革基本完成，县级政府的机构改革和政企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在全国陆续展开。经济立法和行政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果。根据一九八三年九月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全国依法开展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收到了很大效果，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既保护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安全，又教育挽救了一批失足的青少年。这场斗争，维护了法制的尊严，保障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已取得巨大的成绩，今后要进一步同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其它措施配合进行。我们相信，经过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必将根本好转。

我国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新的进展，国防更加巩固。部队深入进行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和后勤建设，开展学习科学文化、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活动，提高了素质，增强了战斗力。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和大力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蓬勃开展，军政、军民的亲密关系不断得到发展。

一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健康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通过实践，全国各族人民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拥护，对实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前景更加充满信心。

各位代表！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根据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艰苦奋斗，更加扎扎实实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而在各项工作中，中心的任务仍然是要把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们还存在不少困难。经济效益虽开始有所提高，但仍不理想。至关重要的是经济关系没有很好理顺，特别是价格体系

不合理，而短期内又不具备全面改革的条件，这对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影响极大，国家财政补贴负担很重，中央财政相当困难。我们面临着开展大规模建设的任务，但资金不足，矛盾比较集中，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决不能因为总的形势很好而掉以轻心。为了搞好重点建设，理顺经济关系，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我们要有为长远发展所需的投资，又要有为近期经济增长所需的投资，还要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提高，要办的事很多，而国家财力有限，这就需要挖掘潜力，提高效益，广开财源，善于运筹。特别是在近几年内，要做到少投入，多产出，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为此，各行各业都要继续搞好整顿，努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厉行增产节约，在扭亏增盈方面做出显著成绩，做到工业产值、实现利润和上交税利三者同步增长。要继续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总规模，集中财力物力加强重点建设，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并力争用较少的投资和较短的时间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在能源、交通建设的安排上，要坚持大中小相结合、长期和短期兼顾的方针，并正确处理新建和改造、扩建、挖潜的关系，在建设大型骨干项目的同时，根据可能条件，适当加快现有矿区、油田的开采速度。要鼓励地方和群众把相当一部分财力、物力用于中小型能源、交通和通信项目的建设。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顺利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既可以保证国民经济近期的稳定增长，又能够保持后劲，为今后经济的振兴打好基础。

国务院认为，今后在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农村改革，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继续改善农业结构，支持农民积极扩大商品生产。城市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要从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把适合于当前情况的各项改革措施初步配起套来，同步进行。这里着重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认真地有步骤地改革城市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更好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课题，是要彻底改变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做到企业不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不吃企业的“大锅饭”。

首先要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既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要使企业在经营管理和发展上有一定的财力保证和自主权。近几年，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试点。实践证明，在国营企业实行以税代利的制度，较之其它办法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去年已经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务院决定，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从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具体做法是：合理调整产品税税率，增设资源税、增值税和几种地方税，在征收所得税后，区别不同情况征收调节税，税后利润留归企业支配。国营小型企业，可以实行集体承包或个人承包、租赁经营，也可以依照集体企业的办法向国家交纳税金。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用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国家财政收入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稳定增长；第二，企业将从新增加的利润中得到较多的收益，从而增强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第三，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可以缓解目前价格不合理带来的矛盾，使企业在利润悬殊状况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开展竞争，有利于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第四，企业不再按行政隶属关系上交利润，有利于合理解决“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以税代利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坚决把这项改革搞好。

实行利改税后，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基本得到解决，这就为打破企业内部“大锅饭”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每个企业内部，都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严格规定职工必须完成的任务，严格按照职工劳动成果给予相应的报酬，把职工收入的高低同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贡献大小紧密联系起来，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向国家照章纳税以后，企业对工资奖金的发放有自主权。企业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按分计奖、计件工资、浮动工资或职务工资、岗位津贴等多种形式。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自费工资改革。对职工的奖金，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即企业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税利比上年增加，就可以相应增加奖金；企业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税利减少的，要减发或停发奖金，直到扣发部分工资。企业发放奖金超过一定限额，除劳动强度大的矿山采掘、搬运和建筑行业外，国家要向企业征收奖金税，

以防止消费基金的增长失去控制。上述办法，目前先在领导班子强、生产正常、内部经济责任制比较健全的企业中试行，随着利改税第二步的实施，再全面推广。

为了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必须相应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国务院已经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十个方面，给企业以应有的权力。在国营企业中逐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由国家委托厂长(经理)全权负责。与此同时，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办法，切实保障职工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审定企业重大决策、保障职工权益等方面发挥它的作用，充分体现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特征。

实行利改税，建立企业内部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职工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的一次较大的调整。各部门、各地区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简政放权，纠正和防止对企业不应有的干预，尊重企业的自主权，支持厂长行使职权，把企业办好。同时，要改进国家的计划指导，发挥财政、税务、物价、银行、审计、统计、工商行政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对违反财经纪律的，要严肃处理。真正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

二、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的管理体制，大力提高投资效益。

建筑业的经济效益如何，对整个国民经济关系极大。长期以来，建筑业缺乏独立经营的必要条件，普遍存在着工期长，消耗高，浪费大，技术上不求进步等问题。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会严重影响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城乡人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建筑业历来有承包的传统，任务比较明确，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比较容易划分清楚，牵动面较小，加以建筑产品的销路有保证，因此，在城市各业中，建筑业可以首先进行全行业的改革。

建筑业的改革，要围绕缩短工期、降低造价、提高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来进行。关键是要推行投资包干制和招标承包制。

今后，凡是有条件的建设项目，都要签订投资包干协议，由建设单位

对国家全面负责。凡是有偿还能力的项目，都要按照资金有偿使用的原则，改财政拨款为银行贷款。国家将投资包干协议规定的总金额拨给建设银行，由建设银行根据工程进度，按实际需要付款，在不超过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可以不受年度的限制。要制订鼓励缩短工期、节约投资、提前投产和达到设计能力的政策。由于提前竣工而节约的资金，应归承包单位。由于延误工期而多贷的资金，由承包单位负担。这样既可以提高建设单位、承包单位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又可以发挥建设银行统一调剂资金的作用。

要积极推行以招标承包为核心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凡重要工程和城市开发建设的承发包，都必须进行招标、投标。在国家统一计划和监督下，由发包单位通过招标，择优选用设计、施工单位。国营和集体的设计、施工单位，不论来自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经审查合格后都可以参加投标。要鼓励竞争，防止垄断。

要着手组建多种形式的工程承包公司和综合开发公司。工业、交通等生产性建设项目由专业性的工程承包公司投标，从可行性研究、设计、设备配套、工程施工到竣工试车进行全过程的总承包；然后再由工程承包公司向各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单位招标，签订分包经济合同。城市住宅区、新建工矿区及其公共设施工程的建设，由开发公司承包，按照城镇总体规划，统一办理土地征用事宜，进行设计和配套建设。要保证承包企业的法人地位，给以必要的自主权。上级行政部门不得干预其正常的经济活动，同时要切实加强质量监督和财务监督。

在整个工程、整个开发区实行承包后，建筑企业内部还应当结合自己的特点，落实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比如工业、交通项目实行施工图预算包干，民用建筑按最终产品实行小区包干、栋号包干，对建筑企业实行按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等。

要改革建筑材料供应方式，实行包工包料。过去材料供应环节多，层层设库，余缺不能调剂，经常处于停工待料的被动状态。今后应逐步改为由物资部门将材料直接供应给承包单位，并相应改革材料和设备订货程序。与此同时，要允许一部分材料和设备实行市场调节。

目前国营建筑企业固定职工的比例，已由五十年代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管理机构和后方基地庞大，生产第一线人员

很少，包袱重，拉不动，改革用工制度势在必行。要逐步降低固定工的比例，大大提高临时工、季节工的比重，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要允许农村民工建筑队伍到城市参加投标，承包施工。

设计是整个工程的灵魂。要改革设计工作，积极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修改不合理的设计规范，制订新的标准、定额。设计单位要逐步向企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设计中，不仅要注意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安全性，而且要十分注意经济效益。要实行严格的技术、经济责任制，调动设计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处理好多样化和标准化的关系，改变建筑造型千篇一律的状况。对有重要贡献的设计人员应予特殊奖励。

城市住宅建设，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通过多种途径，增加资金来源，逐步缓和城市住房的紧张状况。

在基本建设的管理上，必须简化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减少环节，提高效率。今后除限额以上、需要国家计委综合平衡的项目，报国家审批以外，其余的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平衡。需要国家审批的，国家计委拟将过去的五道手续简化为两道手续，即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有关单位在设计任务书批准后，即可先行询价和预订货。

我们相信只要把以上一系列改革工作做好了，建筑业的面貌就会改观，投资效益就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三、改革流通体制，疏通流通渠道，做到货畅其流。

我国现行的商业体制，是在过去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供应紧张和对资本主义商业、个体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在，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大多数农产品、工业品日益丰富，面临着开拓市场、扩大销路的新课题。如果不根据新的形势改革流通体制，目前农村和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卖难买难问题将很难解决，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必须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适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要求，本着促进生产、服务人民的精神，把原有的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统一收购和供货商品的流通体制，改变为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形成城乡畅通、地区交流、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流通网络，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

农副产品要有计划地减少统购派购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扩大自由购销

的范围。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副产品，在保证完成国家收购计划的前提下，实行多渠道经营，允许长途贩运；一般副产品的购销，更要随着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放活，随行就市，灵活经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加强对购销活动的引导和调节。国家要在加强市场管理的同时，运用经济手段指导各种副产品的生产和购销。

适应农村商品交换发展的新形势，供销社的体制必须改革。最根本的是要变“官办”为“民办”，把供销社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要恢复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放手吸收农民股金，取消对农民入股的限制，在经济上同农民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改革供销社的劳动人事制度，干部实行选举，能上能下；职工实行合同制，能进能出。在分配制度、价格管理、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等方面，都要有新的突破，使供销社更好地为农村的供销、加工、储运、技术推广等方面服务。

商业批发和物资供应体制，也要积极探索改革途径。要冲破一、二、三级批发的层次。所有批发企业都应办成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相互之间是平等的经济业务关系。重庆等地把省的二级批发站与市的专业批发公司合并，同时，建立了工业品贸易中心，实行大量批发与小宗买卖相结合、自营业务与代理业务相结合，不论国营、集体和个体经济单位，不论哪个地区和部门，都可以参加交易，相互竞争。实践证明，通过贸易中心进行商品交换，有利于产销直接见面，有利于打破地区、行业之间的界限，是疏通流通渠道、加速商品流转的好形式。所有城市以及农副产品集散地，都应当逐步建立各种类型的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除了某些重要生产资料和紧缺消费品仍由国家掌握并按计划供应外，计划外的和非计划的商品都可以在各种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自由购销。不准实行封锁，保护落后。

社会主义市场在国营商业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需要多种商业经济成分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应当把国营商业中的小型企业，特别是其中以劳务为主的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和小的零售商业进一步放开，改由集体承包经营或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开拓服务领域，方便人民生活。大中型商业企业内部也应结合本身的特点，有计划地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要实行全面考核，合理计奖，奖优罚劣，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

效益。所有商业企业，不论国营的、集体的还是个体的，都要遵守商业道德，开展优质服务，文明经商，不准转嫁负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此外，对商办工业的改革也应加以重视。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商办工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的状况，要在税收、投资、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在政策上进一步放宽，帮助企业搞好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

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外贸体制也必须逐步改革。对外贸易，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克服政出多门的现象，同时又要适应新情况进一步搞活，采取有力措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外贸体制的改革，要着重从有利于工贸结合、技贸结合，有利于政企分开两个方面来进行。实行工贸结合、技贸结合，是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加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要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执行。外贸系统要逐步实行政企分开。各进出口专业公司、联营公司和地方性的外贸公司，要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经济实体。公司和企业的内部事务，由他们自己放手去搞，各级主管部门着重抓统筹、协调、服务、监督，制订政策、规划和标准，颁发许可证，主要运用经济调节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立法，促进外贸事业的发展。

四、积极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打开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新局面。

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在国家统一政策的指导下，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特别是在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放得更开一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国务院决定，要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开放一批沿海港口城市。这是一个重大决策，牵涉面很广，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务求取得实效。各经济特区要不断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扎实工作，加强先进技术的引进，采取有效措施吸收外资。厦门特区的范围要扩大。同时，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扩大它们的权力。在这些港口城市，外商投资办厂，在税收方面可以按照规定享受更优惠的待遇；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和引进技术的审批权限，简化外商入境出境

手续；允许外商兴办独资企业，适当延长合资企业的合营期限；对确实提供了先进技术的产品，允许在国内市场部分销售。这些港口城市和四个经济特区，在沿海联成一线，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这样，既可以加快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在吸收先进技术、推广科学管理经验、传递经济信息、培养输送人才等方面，支持和带动内地，有力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当前，国际上正在出现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这对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场挑战。我们应该抓住时机，有选择地应用新的科技成果，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缩小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这里的关键，是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制定我们的技术发展战略，既不能亦步亦趋，一切都照人家走过的路子从头走起；也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一哄而起。要采取统一领导、全面部署、组织协调、密切合作的方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准目标，集中力量加以突破。新技术的运用，要着眼于我国现有行业 and 企业的改造，使它们较快地转到现代化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基础上来。沿海地区工业基础比较好，科学技术力量比较强，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经验比较多，应该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迎接新的技术革命和振兴我国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更加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加强智力开发，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

改革经济体制，迎接技术革命，推进经济建设，都迫切需要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的人才。现在，各方面的专门人才都很缺乏，职工队伍的思想和技术素质不高，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在适当增加教育经费、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新的人才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现有职工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技术业务水平。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把这项工作抓好。所有经济工作干部，都要努力学习经济管理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他们的学习成绩应作为考核、晋级、晋升的一个重要依据。要开辟多种途径，加快经济工作干部的轮训速度。对于厂长、经理，国家要组织统一考试(包括考绩)，不及格的不能继续任职。各企业事业单位，要在定员、定额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培训职工；要按照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和要求，以期收到切实的效果。

今后企业招收新职工，要进行就业前的培训，通过考试，择优录用，以保证职工队伍的素质，保证厂矿的劳动纪律、生产安全和设备完好。

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合理使用各种人才。要大胆地、大量地选拔中青年科技人才到科技工作的重要岗位上来。现在，一方面人才缺乏，一方面有些部门和单位又大量积压和严重浪费人才。也有一些人宁可守在大城市无所事事，却不顾国家和地方所给予的优惠条件，不愿到急需他们去工作的较艰苦的地方。为了促进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希望社会舆论能够配合政府做好工作。我们必须改革科技人员和专业干部的管理体制，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做到人尽其才。我们还要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排斥、压制、打击知识分子的事件必须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对于那些至今仍然对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思想上严重抵触，在行动上拒不执行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决调离领导岗位。要努力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以及知识的扩展，尽可能创造必要的条件。评定学术、技术职称的工作，在经过整顿以后，要继续进行。要采取适当办法，根据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和一定的职务、职称，逐步增加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并且十分认真地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尽现有可能改善对他们的医疗条件和其它条件。对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要大力表彰、奖励，破格提拔、任用。

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各级政府应当把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的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近年来在教育、科研战线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试验。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改革管理制度，层层扩大自主权，实行定编定员，人员流动，挖掘学校科研潜力，承担经济建设研究课题，制订教师工作规范，明确干部岗位责任，试发岗位津贴和职务工资，提高了教学质量，出现了科研新局面。株洲电子研究所等一百多个科研单位，面向社会，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课题承包制，由国家事业费开支经费改为经济自立。这一改革抓住了关键，使科研工作长期存在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一是有力地推动科研单位面向经济建设，急国家建设之所急；二是有利于打破部门和地区的界限，促进科研人员的合理流动，使有才干的人能够展其所长；三是大大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科研单位本身有了活力，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条件，同时对经济

建设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也能较多地增加收入。这是科研体制改革的方向。尤其是从事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科研单位，要按照这一方向，结合本身的特点，积极进行改革。有关部门要注意发现、总结、推广这方面的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认真做好上述工作，将有力地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加强重点建设、繁荣城乡市场、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打下巩固的基础。

关于外交工作

一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发展和改善了我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

我们同友好邻邦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缅甸等国的关系更加亲密。我们同东盟国家在为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和安全的斗争中，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印关系在继续改善。我国和不丹开始举行会谈，着手解决正式划定边界问题。在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中，我们同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发展。我们同其它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也不断增进。我国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合作日益加强，同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我国和欧洲共同体实现全面建交，并建立起定期的政治磋商制度。中荷恢复了大使级关系。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同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有所扩大。经过两国政府首脑互访，中美关系有了发展。中苏副外长级的磋商继续进行，两国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也增多了。一年来，我国领导人出访了许多国家，有二十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后来我国访问。高级官员之间的会晤和磋商更加频繁，民间的各种活动也十分活跃。我国新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了自已应有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一步扩大我国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开始收到了效果，显示了这种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坚持原则，伸张正义，旗帜鲜明地支

持各国人民反对侵略扩张、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积极为维护和平、促进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在国际上赢得了信誉和朋友。

在过去一年的国际交往中，我们既捍卫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又履行了自己承诺的国际义务；既发展了我国同其它国家的关系，又为维护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更加扩大。

我们所以能够取得上述的成就，是因为坚定不移地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努力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时，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进行及时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使之更加切合实际，更好地体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

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任何时候，我们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的政策，决不迁就于一时的事变，也不受任何外来压力所左右。我们珍视自己得来不易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决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我们一贯遵循国际关系准则，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正是因为这样，尽管国际风云变幻，我们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把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措施结合起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顺乎时代的潮流。

现在，我就维护世界和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这三个方面，对我国的对外政策作些阐述。

一、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我们要坚持不懈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停止军备竞赛、促进实现裁军、防止世界战争而努力。

中国要和平，不要战争。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当然需要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不仅今天需要和平，到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同样需要和平。我们绝不愿意让自己经过千辛万苦取得的建设成果遭到战争破坏，绝不愿意让自己同胞在战争中蒙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不希望看到人类再一次蒙受世界战争的浩劫。令人不安的是，当前国际局势依然紧张动荡。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性争夺继

续加剧，核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它们在欧洲的军事对峙更加尖锐，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活动有增无已。世界各地的“热点”没有降温，有的冲突还有扩大的趋势。世界战争的危险并未消除。面对严峻的现实，中国人民不能不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感到严重关切。

中国既反对热战，也反对冷战。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首先应当结束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它们在东南亚、西南亚、中东、南部非洲、中美洲等地区策动或支持的局部战争，消除由于它们的争夺而引起的动乱。我们希望美苏缓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希望它们加剧对抗，增加战争的危险。我们也赞成东欧和西欧各国改善关系，消除两个军事集团的严重对立。我们衷心希望整个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区域性的武装冲突和紧张局势，都能得到缓和。一切为此而进行的努力，都将得到中国的支持。

中国赞成裁军，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主张全面禁止与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太空武器，主张大量裁减常规军备。中国正在集中全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将和各国人民一起，为促进裁军的实现，缓和紧张局势，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

中国是个有核国家，但是我们早就庄严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保证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中国对歧视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评态度，不参加这个条约，但是并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广大无核国家普遍要求一切有核国家对它们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它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我们主张，所有的有核国家都应当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就承担互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达成协议。

我们一向认为，只有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才能够真正消除核战争的威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们主张，拥有占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核武器的美苏两国应当率先大幅度削减它们的核武器；只有这样，其他有核国家参加核裁军才是有意义的。这是我国在核裁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为了推动核裁军，我国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新的倡议，主张在两个核大国率先停止试验、改进、

生产核武器并就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库达成协议之后，召开包括所有核国家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讨论共同裁减核武器的问题。中国准备履行自己所应当承担的核裁军义务。

中国赞同核裁军应与常规裁军结合进行的主张。美苏拥有庞大的核武器库和常规武器库，它们对裁军负有主要责任，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主张。只要符合两个超级大国率先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一根本原则，一切切实可行的裁军建议，我们都支持。

目前，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核优势，正在欧洲竞相部署新的中程导弹。这样发展下去，只能使它们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轮番升级，大大增加对欧洲和全世界的核战争威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应当促使美苏两国停止这种危险的较量，恢复谈判，达成不损害其他国家和利益的协议。我们要求美苏在世界任何地区，不论是欧洲还是亚洲都不部署新的导弹，已经部署的导弹应当大大削减和销毁。

维护世界和平是人心所向。近年来在欧洲、日本和其它许多国家兴起的反对核武器、核威胁、核竞赛的强大和平运动，参加者包括了差不多所有社会阶层。这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活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它反映了各国人民反对核军备竞赛和核战争威胁、要求和平和裁军的强烈愿望。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同情和支持。

具有广泛基础的不结盟运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同它的联系和配合。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许多旨在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多边国际活动，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将继续积极支持和参加这些活动，并且遵守有关国际组织的章程，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

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霸权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特别是反对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中国决不谋求霸权，也决不屈服于任何霸权主义的压力。不管是谁在什么地方搞什么样的霸权主义，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的这一立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当前，世界和平受到的威胁是严重的，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并不是无能

为力、无所作为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我们坚信，只要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和斗争，不断地挫败超级大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防止的，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我国十亿人民将坚决站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一边，积极支持维护世界和平的一切符合正义的努力。

二、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并且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当遵循五项原则，使它真正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载入我国宪法，它是我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各个国家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别国无权干涉。这是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依据。

如前所说，我们特别重视发展同邻近国家的睦邻关系，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安全和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今天，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既存在着迅速发展的前景，又存在着使人忧虑的多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和邻近国家建立和保持稳定的良好关系，发展积极的友好合作，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同我国和睦相处的国家，我们努力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同我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分歧的国家，我们力争同它们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使相互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即使分歧一时不能解决，我们也愿意耐心等待。我们同各国和平共处的愿望是真诚的，个别国家对我们的疑虑终究会消除。对于至今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的越南，尽管它继续强化侵柬战争，侵犯泰国领土，在中越边境加紧武装挑衅，我们仍然期待它改变侵柬反华的政策。中越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两国关系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令人痛心的。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只要越南承诺和宣布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并开始付诸行动，我们就愿意同它恢复谈判，谋求改善两国关系。

我国同兄弟邻邦朝鲜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友好相处的亲密关系，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加强合作，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我们支持朝鲜政府

关于实现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主张，支持朝鲜人民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的正义立场。我们希望通过有关方面的谈判把朝鲜停战协议变为和平协议，并且赞成朝鲜南北两方和美国能早日举行三方会谈。

中日两国领导人着眼于二十一世纪，就发展两国关系作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双方共同确定“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四项原则，为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决心同日本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成为现实，使两国的外交政策都沿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

中国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友好合作关系具有坚实的基础，我们将继续发展同它们的全面合作。我们支持罗马尼亚政府为维护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正义立场，高度评价南斯拉夫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重大贡献。我国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也有广阔的前景。我们愿意为进一步增进同它们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友好往来，作出积极的努力。

我国同西欧各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发达国家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和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愿望，就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我们准备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政治磋商；在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方面，加强同它们的合作。

我们处理同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同样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们重视发展中美关系，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发展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障碍，这就是台湾问题。只要美国严格遵守历次中美公报共同确认的原则，真正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拿出看得见的实际行动来逐步地和大幅度地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导致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中美关系就有可能稳定持久地发展。里根总统不久前来我国访问时，重申美国愿意恪守美中关系三项公报。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并期待着美国政府切实履行自己的承诺。

我们真诚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愿意同苏联发展经济、技术、文

化交流。大家知道，中苏两国曾经在革命和建设中长期合作。中苏两个大国和睦相处，不但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最近中苏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有所增加。但是，苏联至今仍在中苏边境和蒙古派驻重兵，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和对中国挑衅，武装侵占中国的邻邦阿富汗。上述情况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苏联方面既然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就应当采取实际行动来排除上述障碍。

我们处理对美、对苏关系，是有原则的。我们不会因为反对它们的霸权主义，就不同它们改善关系；不会因为要同它们改善关系，就放弃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也不会因为要同它们之中的某一国改善关系，就损害另一国的利益。

今年是我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十周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越加显示出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适用于指导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指导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如果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如果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尖锐对抗，甚至发生冲突。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好坏，关键在于双方是否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相互关系中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局势就可以稳定，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就可以实现，世界和平就可以维护。

三、我们任何时候都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作为自己的国际义务，坚决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努力加强同它们的合作，积极促进它们之间的团结。

由于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它们面临着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迫切任务。我们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斗争，只要是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我们都坚决支持。不管它们的斗争锋芒是指向哪一个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我们决不会因为考虑国家关系而对

侵略和干涉行为姑息迁就。我们赞成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但是解决的办法必须是公平合理的，必须使被侵略和干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保证。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为实现世界的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进行的各种努力，都会给予坚决的支持。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已进入了以发展民族经济为中心任务的历史阶段。他们渴望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迫切要求改革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且强烈希望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主张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目标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紧迫问题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高度评价七十七国集团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中国支持南北对话，愿意积极参加南南合作。大家知道，为了发展同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我们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并且得到许多非洲国家的赞同。我们认为，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我国同一切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对于同第三世界国家原有的合作项目，我们愿意向有关国家继续提供各种服务，并和它们共同努力，充分发挥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对中国已经承担建设的项目，我们将保质守约，认真建好。对第三世界中最困难的和特别需要帮助的国家，我们将继续给以力所能及的援助，主要是建设一些投资少、效益好、直接为当地人民服务的项目。

第三世界国家是我们患难与共的朋友，长期维护这种宝贵的友谊是我们的重要义务。我们要经常对人民群众进行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的教育，使人人都尊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情况、社会制度、地位处境、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在执行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总会有所差异。但是，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谋求发展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点。第三世界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们决不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我们赞成它们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有的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同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关系比较密切，接受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援助，这并不影响我们同它们发展友好关系。我们这种以诚相待的态度，有利于我国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合作，有利于整个第三世界的团结。

加强团结是今天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等问题和民族、宗教等原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纷争，甚至发生武装冲突。超级大国又往往竭力挑拨和利用，从中混水摸鱼。对于这种状况，我们深感关切。我们历来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们之间的分歧和争执，应当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排除外来干涉，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即使一时得不到解决，有关各方也应当以大局为重，采取克制态度，防止事态扩大。我们决不介入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纷争，也反对任何外来势力插手。当然，这决不是不讲是非。对于那种恃势凌人的地区霸权主义的行径，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总之，有利于第三世界团结的事，我们就努力去做；不利于第三世界团结的事，我们就坚决不做。我们永远坚持这一方针。

一年来的外交实践，证明我国奉行的对外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今后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进一步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目标服务。

各位代表！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赞成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主张，并且正在为此作出积极的贡献。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我们的各项建议和设想，都是诚心诚意的，通情达理的。对于台湾当局任何有利于海峡两岸同胞接触来往、增进了解和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言行，我们都将表示赞赏。我们认为，只要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民意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我们坚信，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实现。一切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我国将在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坚定不移的决策。为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并在五十年内不予改变。这些政策包括：根据我国宪法第

三十一条，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人自己管理，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将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继续同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有关的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受到照顾。中国政府的上述政策，是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历史和现状后制订的，是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实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我们希望并且相信，香港问题一定能够早日得到圆满解决。

各位代表！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我们将热烈隆重地庆祝这个节日。让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加奋发努力，在国内建设和外交工作两方面都取得新的优异成绩，迎接伟大祖国光辉节日的到来。

团结起来 发展石油工业战线的大好形势*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你们这次会议开得好。石油工业形势好，石油战线高兴，党中央、国务院高兴，其他行业高兴，全国人民高兴，大家都高兴。

根据大家讲的，今后七年你们提出的石油工业发展目标，是比较可靠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国家在向“四化”进军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是个大的贡献。

现在，陆上石油形势很好。我看石油部的同志，全体石油战线的同志，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因为这么大的事业，这么有希望的事业，大家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国家多做贡献，取得更大的胜利。

世恩同志的讲话，秋里同志的讲话，唐克¹同志的报告，都讲得很好，符合这个精神。

建国三十年来，石油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近四年多来，石油战线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耀邦同志和我对世恩同志报告上批的话，都反映了这个意思。耀邦同志批语中提到这几年世恩同志带病坚持工作，石油工业取得很大成绩，这不仅是指世恩同志一个人，而且是指整个石油战线的。没有这四年的工作，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形势。这个好形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作为总理，对石油部的工作表示满意。石油工业历史上的成绩很大，国务院对你们近四年的工作是满意的。这就包括世恩同志代理部长期间的工作，唐克同志回石油部后的工作，也包括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全国石油工业局厂领导干部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宋振明²同志那一段期间的工作。一九七九年全国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现在看得很清楚，如果不进行调整，全国不会出现这么好的形势。现在全国还在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石油工业也是如此。

国务院确定对石油工业实行一亿吨产量包干。所谓包干，不外乎是给石油工业一个条件进行调整，或者叫做休养生息。要不提包干，你们也会上不来。四年的休养生息，才会有今天。当时，全国基本建设都在大量地压缩投资，石油部门也不可能给多少钱，所以给你们这个包干政策，使石油工业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多搞一些油，多搞一些资金，多搞一些勘探。

我这样讲，是符合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的。哪个人认识自然界都不可能一次就完成，既然是不断认识，有时认识得接近实际一些，有时认识得不接近实际一些，都是允许的。重要的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认识，不要坚持被实践证明是错的东西。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因为最后决策还是领导上的事情。

我还要讲一下，如果不是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引进了数字地震技术，地下情况也了解得不那么清楚，地质勘探上的形势就不一定这么好，储量也是上不去的。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你们与国外交流了经验，技术也发展了。

我希望，也是国务院的希望，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石油部门的同志，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团结起来向前看，迎接和发展大好形势。

一、今天见见你们。我看了几期简报，你们的会开得好。康世恩同志也给我谈了一下。我给世界银行的外国人讲了，一九九〇年产油一点五亿吨，指标放低一些，产量越多越好。

二、你们的汇报中，我看关键是给国家贡献七千万吨原油。

三、刚才提到的能源税问题，我看还是不改，从你们上缴的贡献油中抵扣。因为涉及面广，现在不好改。

四、（当汇报到近期要打一批高产井，同时各油田要搞好“三个接替”时）这就是说，产量可以上去，还可以接替得上。你们的账都算好了吧？外部配套条件怎么样？

你们找计委开次会，研究一下安排得怎么样？是不是安排得了外部配套条件？你们安排多少？计委安排多少？

注 释

1. 唐克(1918-2013)，江苏盐城人。时任石油部部长，曾任石油部地探司司长，石油部副部长，冶金部部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康华公司董事长。

2. 宋振明(1929-1990)，河北馆陶人。曾任玉门油矿采油厂厂长，大庆油田党委书记，石化部副部长，石油部部长，国家能源委副主任。

关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问题 致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¹同志建议²一件，请参阅。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国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集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国家立法上去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要在党的领导制度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业已走上轨道，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注在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

* 这是赵紫阳在看到黑龙江省全国人大代表陈俊生致函彭真委员长对长期稳定国家根本大法和基本法提出的建议后，写给邓小平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他看了陈俊生的信后有感而发。他从如何保持国家长治久安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出发，建议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健在的时候，为党制定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此信旨在“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这是他写此信的唯一心愿。

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起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当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访欧前夕

（并抄送陈云同志）

注 释

1. 陈俊生（1927-2002），黑龙江桦南人。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曾任黑龙江省委政研室主任，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国务委员，全国供销社理事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 陈俊生建议，即刊登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简报组 1984 年 5 月 21 日编印的《快报》第 20 期上陈俊生致彭真的信。建议全文如下：

陈俊生代表致函彭真委员长 对长期稳定国家根本大法和基本法提出建议

彭真同志：

看了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登载您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受启发。你提出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靠健全的法制；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是一致的。我衷心拥护您的讲话。照这样办，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会得到保证。党中央抓这件大事，真乃抓住了根本大计。如果我们党建国之初即抓法制这件大事，也许不会吃“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的大苦头。

现在党中央领导下的这个时期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是这样的时期，尤应清醒地考虑长治久安的大计。现在强调法制确实是抓了长治久安的根本。

在反复学习您的讲话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使我们的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真正做到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使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就应当对保证民主制度和法律本身进行立法，即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的宪法

和基本法进行立法。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还不能使宪法和基本法保持长期的稳定性，隔若干年就全面修改一次宪法。说是修改，实际上把旧的全面推翻，废除重写。这种做法有其历史原因，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给法制带来不良的后果，它使人们感到我们的各种法生命力很短，随着领导人变动而变动，甚至随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变动。因而人们不那么严肃地对待它，法的权威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现在都说目前这部宪法和若干基本法很好，但是谁也不敢保证说，隔若干年后不会再来一次废除重写。因为我国并没有就法的稳定性、连续性进行立法。在这方面还是靠人来保证，不是靠法来保证的。这样就使人们有一种担心，在若干年后，会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影响法的变动，法制能不能持续下去？当然，人们对法制是充满信心的，但是这种信心也还是建立在对现在党中央的信任上。也还是由于人们对党中央的信任，所以对在现在的党中央领导下所制定的法律就要求保持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允许今后有任何人破坏它。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无论根本法还是基本法，都有需要做些相应的修改，但这样的修改，不应该采取全面推翻，废除重写的办法。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即需要增加某项条文时，就通过法律程序增加某项条文；需要去掉或修改某项条文时，就通过法律程序去掉或修改。增加和修改之条文，应从公布之日起生效，不应追溯既往。也就是说，人们不触犯当时的法律即为合法，而不必担心将来可能通过的任何新法律。如有违法行为，也只能按当时的法律进行处罚。这应当成为一条立法原则。这一原则，对保持法律的严肃性和可信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欲实行法制，不使根本法和基本法都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并使法的尊严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和生活常规，是不可思议的。为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立法，宣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宪法和基本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今后不论再遇到什么情况，谁也无权将它们废除重写，也不能用将来的法律追溯现在，谁这样提出问题，他本身就是违法。要规定修改宪法必须经过什么程序，使修改宪法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想，这样从立法本身来解决法的稳定性、连续性，可以大大增加法的权威性，使人们对法产生严肃感，会大大坚定人们的法制观念，更加自觉地遵守法律，这使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有了法律上的保证。

以上意见，如有错误请指示。

黑龙江省代表团

陈俊生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

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九日

一、关于整党(包括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经济工作的关系,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说的,要以整党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检验整党。这两句话概括了整党和经济的关系。整党(处遗)都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做什么都不能忘记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这个大目标。我们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我看《广西日报》发表的耀邦同志讲的“广西要先翻身”这句话很好,应当用这个口号来动员广西各族人民把经济工作搞上去。

二、关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三种人”要坚决清理,小平、陈云同志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清理“三种人”一定要慎重,要防止扩大化。明显的、有把握的先定,对比较复杂的、没有把握的可以放后一点。另外,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都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要在思想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不等于凡是在“文革”中沾边的,都要打倒,都要否定。不管那时是在台上的还是台下的,他们的问题都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下来考虑。“文革”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十年之久,因此,对人的观察,要看他十年的变化,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在十年中间,有的人由坏变好,有的人由好变坏,也有的越变越坏,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历史的分析。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汇报关于整党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的谈话。

三、关于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过去觉悟迟，拨乱反正是慢了。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涉及的人是很多的，情况是复杂的。总之，我同意纯束¹同志的意见，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不要牵连太多人，否则不能团结大多数。广西“文革”中死人比较多，如果只死一个人，那就好办，现在死了好几万人。正是因为死人多，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死者加上受害者家属，有几十万人，一定要处理好，不处理好就不能安定团结；二是要看到牵连的人也多。如果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处理杀人凶手和有牵连的人时，搞过了头，同样也不能保持安定团结。我同意纯束同志的意见，今年再用一年时间，决心处理好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问题的标准，也要实事求是，适可而止，搞过头就会出乱子。这个话早讲不好，在一年前讲不好，现在可以讲了。你（指韦纯束同志）讲现在对外处遗工作有两种反映，一种认为搞过头了，一种认为走了过场。有两方面的反映，恰恰说明了情况正常；如果只有一种反映，一个方面满意，可能就不那么正常了。广西过去就有过这种情况，一边倒，一方面反映很满意，结果问题潜伏下来了。

四、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革”是要彻底否定的，不这样就不能统一思想，同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各地都要补好这一课。“文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犯错误的人比较多，如果把当时发生的事情都要作为个人的责任来追究，把沾上边的人都打倒，把犯错误的人一律都追究，那就要把事情搞乱。我在广东的时候，“文革”中也想早点站出来工作，想早结合，后来因为两派都要打倒我，站不出来。如果我当时也站出来工作，情况还不知道会怎样，肯定也会犯不少错误的。所以，要考虑历史条件，不管当时在台上台下，都要作历史的分析。同意纯束同志的意见，要团结大多数，要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特别是对广西来说，团结是很重要的。要通过整党、处遗提高觉悟，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加强团结。

五、关于如何对待反映情况不实事求是的问题。现在确实有些人反映情况不实在，有些记者和人民来信反映的情况也有些是失实的。现在就有这样一种不良倾向，要整一个人，就把一切错事都往他身上推，这是不对的。当然有意见可以提，可以反映，不让反映是不行的，不要怕有不同意

见。但是你们领导头脑要清醒，他反映他的，你干你的。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如果按错误意见办，出了问题，以后他还要找你，擦屁股的也还是你。所以，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听，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按正确意见办，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不能偏听偏信，要防止出乱子。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犯错误的人的思想感情要转过来是有个过程的，但要相信绝大多数是可以转变的。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做到在政治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注 释

1. 韦纯束(1922-)，壮族，广西象州人。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曾任桂林临时工委副书记，桂平县县长，自治区交通厅副厅长，南宁市委书记、市长，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区党委副书记。

坚持改革 加速改造 使鞍钢做出新贡献*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

我是第一次到鞍钢，应该做自我批评。这次来恰恰是鞍钢全体职工欢庆开工三十五周年，这样给我个机会，同鞍钢各级领导同志在这里见面。在座的有多年来为鞍钢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劳动模范、领导干部，还有一些年富力强的正在和将要为鞍钢建设做出贡献的一些同志。我和大家一起庆祝鞍钢开工三十五周年，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鞍钢二十万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鞍钢三十五年来为我们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三十五年来，提供了一亿四千万吨钢材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五倍于鞍钢投资的三百亿元支援国家建设，给国家提供了大量资金，调出了领导干部和熟练工人、技术人员五万多人支援全国钢铁战线建设。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回顾三十五年，确实很不平凡。当然，刚才郭峰同志讲了，我们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么一个非常艰巨而伟大的任务，下一个世纪再奋斗几十年，使我们国家真正走向世界前列、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经过这几年奋斗，从达到的目标来看还是小康指标，但是再经过十五年开创新局面，可望使我们国家走上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算了一下，大概在本世纪末，就是一九九九年，也就是你们开

* 这是赵紫阳在鞍钢开工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工五十周年。过去三十五年成绩很大，今后十五年，我们有了条件，也应该再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鞍钢已有个很好的基础，各方面条件很好，而在钢铁战线来讲，你们是最大的一个联合企业，质量、品种、人才、经验这些方面都是好的。有两句话，一个是坚持改革，一个是加速改造。坚持改革，加速改造，使鞍钢成为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用将要兴起的新的技术革命来武装和改造我们原来的钢铁工业基地。只要真正能够按这一点做，那我们鞍钢一定可以担负起到本世纪末，也就是开工五十周年的时候，在开创全国新局面的历史任务中，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使鞍钢老工业基地能够继续保持目前在全国钢铁战线的地位。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只要我们鞍钢全体职工、各级领导能够真正坚持改革，加速改造，我想这样一个目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要求，是一定可以达到的。

扬长避短 革新改造

走出一条发展我国冶金工业的新路^{*}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

冶金系统这几年成绩很大。但成绩大是逼出来的，就是宝钢这么一压没有钱了。这个经验很值得重视。如果没有宝钢压了一大片，冶金工业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宝钢现在还没有出产品，但是投资都占去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冶金工业有很大的变化。第一，从产量来讲，达到四千多万吨。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才三千多万吨钢，就这几年增加一千万吨钢。第二，能源消耗大大下降。第三，质量品种也提高了。主要就是没有投资了，无路可走，就逼出一条路，改造，挖潜，上品种，上质量，降低消耗，等等，就走了这条路。这个问题说明我们钢铁工业战线是有潜力的，就是领先原有的企业，走技术改造的道路，花钱不多，见效快，周期很短。

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看来要走这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从后边搞起来，发挥自己的长处，尽量避免自己的短处。主要是个矿石问题。过去我们都要靠国内矿石。当然，鞍钢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矿石的条件很好。从全国来讲，我们大都是贫矿，距离又很远。而且一搞就从矿山搞起，从矿山到炼铁、炼钢、轧材，投资很大，周期很长。因此，搞钢铁实在困难，“元帅”一升帐其他就压垮了。搞钢铁的这个办法要改，不能完全从开矿一直最后搞到轧钢，有些就可以进口矿石，特别像沿海没有采矿的条件，就可以进口，应该从后边搞起。国外资本家跟我们完全封闭式的搞法不同。现在经常讲是开放式的还是封闭式的。什么叫开放式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鞍钢汇报后，关于鞍钢和中国冶金工业发展问题的讲话。

的？开放式的就是对外要搞经济技术合作，哪样搞划算我就搞，哪些我能搞就搞，哪些我搞不划算就不搞。有些可以从国外进口，以国外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这样搞就快。不如此，要想在本世纪末搞到八千万吨钢我看是很难的。照过去的搞法从头搞起，那个账单一开下来不晓得要多少投资。而且这样搞的结果，钢材的质量还不行。把很多钱都用到前边去了，精力放在搞数量上，质量搞不上去，品种搞不上去，就会变成大路货，设备制造还不能过关，真正要搞一些重要设备又没有合格钢材。所以，有矿山的，条件好的，就应当依靠自己搞矿山；没有矿山的就从国外进矿石，甚至进口钢锭。反正轧材最划算，我就从后边搞起，为什么非要从前面搞起呢？“无米之炊”，从国内来讲，封闭式的搞法就是无米，开放的搞法怎么会没有米呢？比如，澳大利亚就向咱们卖矿石，你能说没有米呀！

第二条路就是，要坚决依靠原有企业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当然也要搞必要的改建扩建，这样使老企业也可以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不能搞了宝钢丢了鞍钢，搞了宝钢丢了攀钢、太钢，搞一个丢一个。难道再过十年宝钢也落后了，我们又搞一个新宝钢，丢一个老宝钢？这总不是办法。我看要坚决地依靠原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技术革新，采用新的技术。这样原有企业就可以永葆青春，水平不断地提高。这样搞实际上不仅质量上去了，数量也会搞上去。这几年原来三千万吨钢现在变成四千万吨了，这一千万吨是从哪来的？还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像鞍钢这些地方，就要坚持搞技术进步。上一次我在讨论新的技术革命时讲过一句话，就是中国要用世界的最新技术来改造我们的传统工业。钢铁工业，现在也是面临新的技术革命的前夜，究竟将来怎么样，我看难说。将来炼钢可能不要高炉，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当然材料工业我们也要想宽一点。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究竟要多少钢材，这个问题我们制订长远规划时思路也要广一点。日本就是七千万吨钢材，它出口大量的钢材，还要出口大量的设备，同时还可以支持本国相当于我们两倍的工业。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亿美元，我们国民收入是四千多亿元。为什么它国内用的只有三分之一钢材，即三四千万吨钢材，就能支持它这么大的工农业基础？可能有设备问题，有钢材质量问题，废钢铁也可能

比较多一点。另外，还有很多新材料将来可以代替钢材，如新型陶瓷材料，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能出现一个什么局面还很难说。这个东西如果搞成了，它的成本比较低，可以代替许多钢材。所以我们的视野要广一点。我们要翻两番，究竟材料怎么办？当然首先还是搞钢铁。搞钢铁、钢材，要依靠原来的基础，进行技术改造，扩建改建，再加上引进一些新技术，我看产量也可能搞上去。鞍钢的规划还可以看到下一个十年。你们设想搞一个新钢铁基地，再搞四百万吨或六百万吨，但首先要考虑鞍钢原来这样一个摊子，只要大力搞好技术改造，加上采用新的技术，到一九九〇年产量可能不只是八百万吨，可能是一千万吨，一千二百万吨。当然有些东西一下还说不清楚，可以从长计议。

我们搞建设没有资金周转的观念，就只有个投资多少的概念，这是不正确的。比如六十亿元投资，建设周期十年算上利息就是一百二十亿元，要是五年就是九十亿元。资金要从动态上看，不是静止的东西。要是搞活了的话，会经营的话，资金加在一起看来很多，但是及早得到效益，及早变为收入，投资就收回来了，就划算得多。十年不产出，和十年中间有很多产出，是不大一样的。外国资本家首先就是讲投资多少，什么时候能收回来，什么时候能还账。对老基地来说，投资后周转快，虽然投资是一样的，但效果不一样。比如你们改造转炉，三个月搞上去了，或者两年搞上去了，投资可能是一样的，但周期不同，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老基地进行技术改造，看来投资加在一起可能是多的，因为要拆一些，改一些，但实际上是周期短，见效快，总的来讲投入少，产出多。“七五”计划要很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上了宝钢，原来说是压了一片，现在是激活了一大片，叫做“穷则思变”嘛。冶金系统这几年节约能源，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成绩是很大的，实际上产量也上去了，增加一千万吨钢。

我们要从这几年的经验里，进一步认识今后钢铁工业的发展应走什么路。钢铁工业大小摊子不少，像鞍钢是最大的。还有很多小摊子，像唐山、邯郸、水钢、湘钢等等，有领导班子在那里，有些技术工人，有个基础，有个摊子。在这样的基础上要研究大的怎么搞，小的怎么搞，有条件的怎么搞。搞技术革新，走技术改造的路，有些中小钢厂也可能发展成大的基地。这是一条比较多快好省的路。

宝钢这么个摊子还是可以扩大的，反正钱已经花了，摊子已经铺在那里了，以后再搞高炉、搞轧材，就和重新搞不一样了。像攀钢、马钢、武钢、太钢、包钢、鞍钢，有先有后，都可以走技术改造的道路，技术也上去了，产量也上去了，因为它有基础。中国钢铁工业近几年，就要考虑这两个问题，就可能多快好省。一是要利用同国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条件，不一定什么都依靠国内；二是主要依靠原来的摊子来搞，走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的道路。这样的好处就是，老企业不会越来越老，不会设备技术越来越差。这两个问题很值得冶金部研究一下，这样搞肯定会多快好省，到本世纪末搞八千万吨钢，也不一定那么难。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都从矿山搞起，又加上焦炭，加上铁路，这一系列的东西，问题多得很。鞍钢“七五”规划搞到八百万吨。下一步，就是一九九〇年以后，鞍钢怎么样，是集中力量另外搞个新基地，还是搞技术改造、技术革新，那时可能出现新技术。改造高炉，搞转炉，连铸连轧，炼焦等，都有很大的潜力。

最后一点，我原则上赞成鞍钢的“七五”规划。“七五”技术改造规划，可以考虑采取包干办法，采取经济办法，具体账还要有关方面算一算。今天看了齐大山铁矿，我觉得你们这里矿山的条件是很好的。品位虽然差一点。最大的好处是离冶炼基地非常近，储量大，还有就是选矿问题。选矿如果真是采用节省能源的新办法，不是用焙烧办法，效果又和实验的效果一样的话，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就可以大矿大开，除了鞍钢用以外，多的还可以外调。现在价格不合理，搞矿山的都不愿意搞，搞生铁的也不愿意搞。今后可以搞个鼓励政策，适当提高矿价，比用进口矿要便宜一点，这样矿山也就划算了。前天我讲唐山和首钢的关系，首钢现在钱多，除它自己改造而外，还可以拿三十亿元，它就想自己拿钱开矿山，同唐山钢厂联合。一种是联合搞个经济实体；一种是搞松散联合，建立经济关系，开矿石供给唐山，唐山炼钢赚的钱要返回一部分给首钢。这样搞矿山比较划算。煤炭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将来矿山也可以做到。当然能够全国调价就更好了，全国不调价，也可以采取煤炭的办法。

对你们的“七五”规划，我讲是原则同意，因为这个账还得具体算一算。总的来讲，“七五”规划依照你们的想法，大体上是可行的。因为国家在五年之内，从你们算的总账中并没有少拿，还多拿了一点，而你们自

己还要改造，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当然，算账财政部比你们还要算得紧一点，你们自己还要挖掘一下潜力。至于调节税的问题，究竟减多少，还是全部不收，再算个账。如果你们的账已经是很积极的了，那当然也是可以的，不收就是了。如果财政部门觉得你那个账还可以算的更紧一点，那可能就比你们现在要的要少一点。这个事也不好在这里就决定，回去我再听听他们的意见。但我认为你们的“七五”规划原则是可行的。而且原来经过很多同志研究了，冶金部、王玉清¹同志、梅行同志、徐驰²同志都研究了这个问题。还有计委也原则同意了。所以回去以后再研究一下，正式对你们的“七五”规划批复一下。

矿山明年你们先搞一个选矿厂，两年可以建起来，以后就知道什么样了。如果矿山这个问题解决了，鞍钢潜力也可能将来不只是八百万吨，一九九〇年以后可能还要多搞一点。我看这个路子是对的，方向是对的，措施也是大体可以的，具体账再算一算。

关于电的问题，回去再商量一下。计委跟水电部先谈一谈，主要就是说水电部来搞，还是当地来搞。另起炉灶不太好，这个电厂又在企业里边，又有能力改造。这个意见水电部不一定不同意。现在整风，大家都注意考虑全局，只要有道理的事，还是容易通得过的。

鞍钢的领导体制问题，由冶金部和省政府自己定，我没有意见。这样一个大企业，究竟怎么搞，还没有想清楚。鞍钢问题，小平同志多次讲过，像鞍钢这样的企业，怎么能放到地方呢？如果你们两家都同意由冶金部管的话，我没有意见。

鞍钢要求扩大对外自主权，先定一下技术引进自主权。你们的“七五”规划批准以后，属于引进的部分，像谈判等等，当然有些可能还要有关部门参加，但是基本上是在这里定，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减少层次，减少手续。在“七五”改造计划以内所要引进的设备，同国外合作的事情，可以交给鞍钢，由鞍钢自己负责。有些事有关部门可以参加。

今天我讲的这些冶金工业问题，计委的同志可以回去讲讲，“七五”计划以及“八五”计划都要考虑钢铁的问题。你们的“七五”技术改造规划，我表示原则同意，具体账还要算一算。这是一句话。再一句话，我赞成老基地改造，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来改造传统工业，来改造老的工

业基地。第三句话是，鞍钢“七五”计划批下来以后，属于对外技术改造的项目，你们有自主权，这个权可以交给鞍钢。就讲这么三点。其他对冶金系统的评价等，到北京后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是必要的，在计委可以先讲一讲。这些意见不是我个人意见，国务院议论过。宝钢占了投资，使冶金工业逼出一条路，逼活了一大片。经过这几年时间，回头来看，很可以研究出一条发展中国冶金工业的新的道路。

注 释

1. 王玉清(1911-2002)，江苏江阴人。时任冶金部副部长。曾任鞍钢副总经理、冶金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顾问。

2. 徐驰(1913-2012)，山东省沂水人。时任国家经委顾问。曾任四川省攀枝花特区党委书记、攀枝花特区工地指挥部总指挥，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

靠改革开放加快我国石油工业发展*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

我这次出来，一个是到鞍钢看一看，一个是到下辽河看一看。当然，其他地方也准备去一下，但主要目的是看鞍山，看下辽河。鞍钢这么大的钢铁基地，我过去没去过。这次去很凑巧，正是他们开工三十五周年。下辽河这个油田，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地区很有希望。以前康世恩同志就跟我介绍过这个地方，而且他跟我说，辽东湾很有希望。今年以来，又听到很多关于下辽河的情况。全国年产三百万吨以上的油田，我大部分都去了，就是你们这里，还有一个华北油田没有去。找个机会到华北去一下。这样，年产三百万吨以上的油田，我都去了。

同志们都知道，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石油战线讲过很多话。石油战线的工作，以康世恩同志代表石油工业部写的报告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那个报告，是经过石油部研究，去年十二月底向中央写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全国油田出现了一个新的很好的形势。陆上油田勘探开发的步子可以加快，比原来预料的情况要好得多。今年二月，耀邦同志、秋里同志到了胜利油田。以后，我也去了胜利，去了中原。接着，石油部五月份开了一个全国局厂领导干部会议，康世恩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秋里同志讲了话。这次会议，对整个石油工业的形势，对石油工业在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如何加快发展，

* 这是赵紫阳在辽河油田同部分干部座谈时的讲话。

确定了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政策、措施。我是第一次到你们这里来，也是在中央对石油工业提出新的要求，石油部召开局厂领导干部会议以后，第一次到油田来。

昨天听了党委书记邓礼让¹同志、局长周永康同志的汇报。今天看了欢喜岭油田几个单位，还有一个钻井队；刚才又听了两位总工程师的发言。我总的觉得，下辽河的形势是很好的，正在积极贯彻石油部会议的精神，布置和落实各项措施，时间虽然不长，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油田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要求，对石油部所作的一些部署，都热烈拥护。看来这些要求和部署，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反映了石油战线广大职工的愿望。

辽河油田同志提出的目标，受到了耀邦同志的肯定。这就是到一九九〇年，你们要争取在全国油田中排行第三，叫油老三。现在你们的位置是第四，要往前排一个档次，名列第三位。体现这个雄心壮志的具体目标是，一九九〇年产油一千五百万吨，探明地质储量十五亿吨。这两天给我的印象，觉得你们这个想法是有根据的，你们为自己规定的目标是有根据的。你们提出产油一千五百万吨，可能还是留有余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们这里的地质勘探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地质储量把握比较大。你们一千五百万吨产量，用十五亿吨的地质储量作后盾、作基础，这个比较可靠。现在已经拿到了十二亿吨，今后还有几年嘛，再增加三亿吨，比较可靠。

地质储量非常重要。我在胜利油田谈过这个问题。国家希望石油工业加快发展，希望石油产量能够增加得快一些，特别在近几年能够增加快一些。但是，归根结底，要靠地质储量。当然，在地质储量比较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开采，尽可能多出一些油，这是对的，但最终还得有地质储量作基础。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够保证生产的持续增长。康世恩同志和石油部领导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布置，要求近期内尽快地把产量增加上去，同时又要保证能够持续增长，不仅不会很快掉下来，而且在几年之后，也不会又出现一个徘徊，不再停顿。这就必须把地质储量搞上去。

我觉得，你们这里各种工作，各项落实措施，抓得比较扎实。昨天我

听了汇报以后有这么一个印象。这里包括你们所讲的知识分子政策，你们挑选一位原来做技术工作的同志担任组织部长，加速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步伐。这些措施都是很好的，工作是比较扎实的。今天我从听的当中、看的当中，觉得这个地方很重视采用新技术。无论是地质方面，还是在采油方面，都在努力采用新的技术，包括技术引进，也包括自己攻关。这两天，我接触了油田的一些职工，感到精神很振作，精神面貌是很好的。我虽然第一次来，时间也不长，但留给我的印象很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通过这两天了解，我觉得，今年以来中央、国务院以及石油部关于石油工业方面的很多指示，都是正确的。这次石油部召开局厂领导干部会议，是开得很好的。从你们这里可以看到全国，看来石油战线的形势将会有有一个大的发展，我国石油工业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今后我们国家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面中，石油战线将会继续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为我们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大的贡献。最近我在石油问题上讲过的一些话，同志们都知道了，我就不再多讲了。

这里，我想讲一讲，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是采用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但实际上是党中央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今后我们经济建设主要抓两个，一个叫改革，一个叫开放。我们要迎接石油工业这个新的发展时期，加快石油工业发展，我看也要抓这两个，一定要在这两个问题上做文章。

所谓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改革的形式、政策和办法，各个行业、各个厂矿、各个企业不完全一样。但是，改革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通过政策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仅要调动部的积极性，还要调动局的积极性，调动厂的积极性，调动大队的积极性。你们大队下边是队、站、车间，这些积极性都要调动，一直调动到每个人的积极性。前方的积极性要调动，后方的积极性也要调动。

现在，石油部很注意这个问题，各级都在抓这个问题。但需要说一下，最近我在北京讲过，石油部就是一个大企业，是一个大的联合企业，虽然没叫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石油公司，因为部直接管局嘛，通过局管厂嘛，人、财、物，产、供、销，很大部分是在石油部那里定的。石油工业部虽然是政府部门，实际上是石油工业的一个总管部，一个总的经营管

理部。正因为这样一种情况，一定要分权。我这个意见还没有明确地跟石油部讲过。我讲这个观点，就是大企业，全国性的大企业，一定要分权，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最近我给有色金属总公司讲过，给石油化工总公司专门讲过。我说，他们成败的关键，搞好搞坏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把所有厂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要让归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工厂，自主权小于没有参加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厂子，不然的话，将来谁也不参加你这个总公司，都愿意独立出来。鉴于我们石油工业也是一个大企业，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大企业，所以要注意各级的自主权，要给各级以必要的权力，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改革的中心问题，是要调动各级的积极性，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使企业能够在一定程度或某种程度上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有一定的人权、财权、物权。当然，石油的产、供、销是统一的，但企业也要有一定的生产权和供销权。生产权，是没有问题了，生产嘛。将来也要有一定的销权。石油部有销权，你们有没有？应该有一定程度的销权，如计划外的。这个想法是建立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基础上的。

在中原，在胜利，我讲过石油工业过去有个传统，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好的传统，你们有丰富的经验。现在，我们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承认各级、各个经营单位，以及每个人的物质利益。搞得好的嘛，承认他一定的利益，搞好搞坏不吃“大锅饭”。所谓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二叫开放。开放的含义很广泛。沿海城市开放，是对外做生意，办合资企业，同国外进行经济技术合作，要扩大这个自主权。对我们石油工业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采取国外先进技术，把国外所采用的石油先进技术，能够及时地引进来为我们所掌握。石油工业贯彻对外开放的方针，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方面，譬如在海上搞合资经营，在陆上搞一些地质勘探方面的合作等。另外，测井技术法国比较高明，还有地球物理勘探，也可以找外国人签订一些合同。总之，通过合同的形式也好，买进技术也好，买进设备也好，请外国人帮助也好，我们自己出去学习也好，目的就是要掌握先进技术。

石油工业这个领域，是一个技术更新、技术进步比较活跃的领域。一方面是节能，就是节约石油的技术，国外这几年有很大变化，在石油使用上确实比过去节约多了。另一方面就是勘探、开发石油，石油化工的综合利用，出现了很多先进技术。今年上半年，国务院讨论过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要加强一些新兴的工业领域，如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激光、新型材料等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用新技术来开发我们的资源。这在我们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是个很重要的、主要的问题。我们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就是要及时把国外最先进的技术、新兴的技术引进来，同我们的传统工业相结合，用之于我们的资源开发，改造我们的老企业，改造我们老的工业基地。

石油工业，包括石油化工在内，在我们国家算是新兴工业。现在国外对石油工业都在采用新技术上做文章。我们石油工业贯彻对外开放方针，就要特别注意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这因为：一个是需要，你要加快发展，就必须采用先进技术，如果不采用先进技术，还是在一种封闭的、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来搞，就慢得多。一个是可能，现在中央、国务院对石油工业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使石油战线完全有条件这样做。实行原油产量包干，包干基数以外的油，你们可以出口，外汇归石油部支配，用来大量引进新的技术。最近国务院又给了石油部引进设备、引进先进技术的很大的权力。在规定的范围内，你们要买什么，只要开出单子，自己就可以买，不必层层报批。现在，石油部门搞了包干，自己可以出口超产原油，有了外汇，又给了你们引进方面的权，进口什么东西也不干预，这样，石油工业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就有了可能性。

我想，这项工作开始的时候，可能完全是买外国的，但要注意通过合作生产的形式，也就是国内机械制造厂与国外厂商合作制造的形式，不但把先进设备引进过来，而且逐步把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转移过来。这样一来，就有可能通过石油工业、石油化工这两家，还有有色金属正在准备采取这个政策，冶金工业也给了一点权利，把中国机械工业的水平带上去。

石油工业一开始，可以完全是买国外的设备，然后就可以请国外厂

商来搞合作制造。容易造的东西，外围的部分，辅助的部分，通用的部分，我们在国内配；核心的部分，最精密的部分，搞合作制造，这样用钱少、造价低。开始时国内可能只能配到百分之二十，以后可能配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最后还可能剩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需要较长时间依靠国外来配。现在，世界上的机械制造，特别是大的成套设备，很少是由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公司，从头到尾全部制造的，大多数是配起来的，是“万国牌”。一个设备里边，好多国家的东西都有，但是每一个部件，特别是关键部件，在国际上又是最优的。哪个国家的这个部件好，就用那个国家的，用来组成一个成套设备。这样，我们可以逐步地做到，既不是长期一直买外国的，也不是完全不用外国的，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今天周建南同志也在，他是搞机械的，给大家服务的。石油工业将来能够与国内机械工业很好结合起来，需要买的就买，需要国内造的就造，最好买和造两者搞在一起，叫做合作制造。这对我们国家来讲有利，对石油工业来讲也有利，因为合作制造可以保证质量，造价可以降低。如果我们有几个工业部门能够带头，好好地抓一下，就可能使我们的机械制造工业有个大的改造，水平有个大的提高。

一个国家机械制造水平上不去，搞工业化就很困难。像一些阿拉伯国家，产那么多石油，生活上比美国还要富，为什么还说是发展中国家呢？除了科学文化技术水平以外，我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的机械制造或者其他工业太差。他们就是靠一个石油资源，而且主要还是外国开采的，开采以后就拿去卖。那个地方叫石油美元，实际上就是卖资源。当然，阿拉伯国家也在用石油美元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工业，打下自己工业化的基础。阿拉伯国家采取了这个政策，北非阿尔及利亚也是这样一个政策。

我们石油战线形势很好，大有希望。辽河油田情况很好，工作做得不错，也比较扎实，比较可靠。希望按照中央、国务院的方针，今后能够继续在改革的问题上，在开放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个方面，在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这个方面，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好的经验。我们到这里来看了以后，心里更踏实了一些，感到石油部局厂领导干部会议以后，石油战线的同志正在努力落实，努力工作。根据现在形势

来看，石油部提出的一九九〇年原油产量达到一亿五千万吨的目标，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在计划上还是留有余地，准备列一亿四千万吨。搞得
好，完全有可能超过。

最后，祝大家再接再厉，加倍努力，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成就！

注 释

1. 邓礼让，湖北郧西人。时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曾任石油部地质司调度处、勘探司钻井处处长，参加了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后任辽宁盘锦市委第一书记。

进一步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至十三日

一、进一步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

一个上海、一个辽宁，是我国两个最大的老工业基地，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他们都面临着不少困难，需要很好地研究，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这是需要摆在当前经济工作日程上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辽宁是我国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四百七十亿元，居全国之首。多年来工业产值都在四百至五百亿元，仅次于上海。特别是辽南（包括辽东半岛）这一大片，经济相当繁荣，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像营口、锦州、丹东等城市工业产值都在三四十亿元以上。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相比，辽宁有不同的特点，它基本上是重型结构，重工业占三分之二，轻工业占三分之一。钢铁、机械、石油化工、建材是具有优势的四大产业。辽宁近年来在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工业产值已被江苏超过，退居第三位。全省骨干企业主要是老厂，装备老化、技术老化的问题很突出。它的四大钢厂、四大化工厂、五大水泥厂和许多骨干机械厂都是五十年代以前建的。当务之急是要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有不少企业已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上海也有类似情况，遗留的问题多，

* 这是赵紫阳在辽宁考察经济工作时的谈话。

财政任务压得重，活动余地小，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均低于全国，工作感到十分吃力。

对上海、辽宁这样的老基地，我们必须要有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要帮助它们进一步发展，在四化建设中起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让它们衰落。在辽宁听到一种说法，认为这样的老基地，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西方发达国家确实有一些传统工业基地已经或正在走向衰落。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传统工业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十亿人口的市场容量极大。在新的历史时期，老工业基地不仅不应衰落，而且应当更兴盛，作出更大的贡献。像辽宁、上海这样的老工业基地，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代替。我们不能让它停止不前，无以为继，而应创造条件，改造老基地，振兴老基地。这对全国有利，对长远有利。沈阳市提出一个方针，叫做“振兴沈阳，服务全国，走向世界”。我看是可以和应当做到的。

怎样改造老基地，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呢？我在鞍钢讲过，要坚持改革，加速技术进步，运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改造我们的传统工业，武装我们的老基地。也就是说，要通过改革，通过革新改造，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把潜力充分挖掘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依靠对老基地、老企业加以改造，比起新铺摊子效益要好得多。要铺一个新摊子，搞一个新基地，周期长、投资大。我们过去讲投资多少，都没有利息的概念。如果建设周期长，算上利息，投资会成倍增长。改造老基地、老企业，有时算投资也不一定少，但它周期短、产出快，利息负担少，实际上是很省的。这次我听了鞍钢的汇报，到一九九〇年，他们只要加以改造，花三十多亿元的投资，就可以使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很可能是一千万吨。而且可以做到不停工，生产逐年增加。比起在鲅鱼圈附近新建一个四百万吨到五百万吨的钢铁厂不知要省多少。冶金工业这几年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上宝钢，投资占用了，冶金系统只好在原有基础上改造、扩建，钢的产量从三千多万吨上升到四千万吨，几年增加了一千万吨钢，质量、品种也有不少进步。这样实际上投资省、周期短、见效快。

要改造好辽宁这个老基地，首先必须做好规划，立足全国，通盘考虑，注意保持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辽宁省委提出，要以沈阳为中心，同附近的中小城市群组成经济网络，从而在辽南形成专业化协作、互相联合、各具特点、城乡结合的现代化工业基地。这个设想是正确的。我看还要把沈阳和大连联系起来，一个是腹地，一个是前沿，密切协作，就可以把辽南城乡这一整块带动起来，成为一个相当发达的地区。这样，不仅辽南这一片能繁荣起来，而且将对东北、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一片，是可以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媲美的。辽南这一片组成以沈阳和大连为中心的城市群，有很好的条件，而且是在一个省内搞经济区，比起跨省跨市，矛盾少得多，比较好搞。希望辽宁做好工作，为全国提供新的经验。

要使老基地振兴，必须坚持进行改革，把各级、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进一步把经济搞活。辽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下放权力、改革体制、放宽政策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大体是可行的。你们可以边实践，边总结。省里要求增给三亿美元的外汇额度，国家也准备适当增拨一些。国家简政放权以后，省里也要注意，对大型骨干企业应给予应有的自主权，不要捆得太死，以免形成小企业很活，而大企业反而很死的状况，影响积极性的发挥。

发挥老基地、老企业作用的重要环节是要搞好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这一工作要同运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结合起来，重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不要再复制古董。这次我们看到的鞍钢第三炼钢厂，他们采用新技术，将平炉改为一百八十吨的转炉，改氧气顶吹为顶底复合吹炼，一边改造，一边生产，质量、产量都上去了，能耗、成本也下降了，这是成功的经验。钢铁工业应当改造高炉，发展转炉，提高连铸、连轧的比例，增加优质钢材，这是世界钢铁技术发展的方向。现在新技术日新月异，国外已在试验炼铁不用高炉，如果成功后能用于工业化生产，那将是钢铁工业技术上的一场大革命。对老企业的改造，要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一个一个厂搞，取得实效。

这次到辽宁来，听说东北三省和西北一些地区开了经济技术协作会议，开得比较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形式。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不仅要在省内搞经济联合，而且要同外省区搞协作，加强经济上的横

向联系。这方面的潜力也是很大的。在技术协作、物资交流、人才交往、联合对外方面，都是可以加强合作的。比如这次辽宁把电石生产压下来，支援能源比较充裕的宁夏发展电石生产，对双方、对国家都有好处。当然，双边的或多边的协作要两厢情愿。也就是说要扬长避短，互通有无，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此外，还要注意发展对外贸易，把商品打入国际市场。像辽宁、上海这样的老基地，还是应当“内联外挤”，开拓市场。

辽宁省的技术改造，已经有了一个初步方案，请计委、经委和有关部门及时研究办理。对上海市，也要专门讨论一次。在今明年工作和“七五”计划中，都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抓。

二、增产市场需要的产品和用活积存的外汇

从全国、从各地的情况看，这两年人民购买力增加很猛，市场显著扩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一九八〇年的两千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去年的两千八百四十九亿元，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多亿元。主要消费品的销量大幅度增长，其中有些已经脱销。主要的有三大类：一是比较高档次的消费品，如优质纺织品、新式家具、新的四大件等。彩色电视机前两年还有积压，今年上半年就销售六十万台，相当于去年的总和，许多地方已脱销。二是汽车、摩托车，特别是农村富裕起来后，农用汽车的销量急剧增长。去年生产汽车二十四万辆，进口二万五千辆，一购而空。三是比较高级的食品，如名烟名酒、奶制品、儿童食品、风味食品等也很畅销。市场的兴旺是前所未有的。

对这样一种形势，这样广阔的市场，外国资本家是垂涎欲滴的。我们必须好好加以利用，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根据这两年的趋势，对中国市场的容量，对人民购买力增加的速度，要有新的观点，研究新的对策。据统计，到去年底全国结余的购买力已达一千四百五十亿元（其中手持现金四百五十八亿元，储蓄存款九百九十二亿元），比上年增加二百七十亿元。今年还是增长的趋势，购买商品越来越要求高档的、优质的。对此如果我们运用得当，善于引导，就会成为促进经济振兴的非常有利的条件。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采取单纯控制消费的办法，商品不够就发票证。现在靠这种

办法来抑制消费，那就会把消费对生产的反馈作用搞掉了。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能刺激生产。从宏观决策上考虑，应当努力增产适销对路、质地优良、价格合理商品供应市场，缓和供需之间的矛盾。这样既可以促进生产，活跃市场；又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回笼货币，安排就业。这是关系经济全局的又一重要问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解决。

面对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如果不采取措施跟上，就有可能出现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是各地盲目发展，二是竞相大量进口。这两种现象对国家都不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国内的生产就必须相应地跟上去。不仅要有数量，而且要讲求质量，要质优价廉。现在我们有不少产品质次价高，群众不欢迎，而名牌产品批量又不足。市场要求商品要不断更新，不断升级换代。既不能靠大量进口消费品，也不能闭关自守，最根本的是要搞好技术改造。为了使产品在质量上过关，在价格上有竞争力，一定要十分重视引进技术。过去老是闭门攻关，不是办法。引进技术和自己组织攻关能够相辅相成，少走弯路。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如合资经营、合作生产、请进来、派出去、购买专利等。根据一些单位的经验，可以从后面搞起，见效快。就是先进口散装件搞总装，逐步增加国内配套的比重，依靠自身的积累，一步一步往前加，很快就发展起来，技术也消化、掌握了。造船工业是这样做的，打开了局面。这次我在营口市看的洗衣机厂也是这个办法。他们和日本松下集团签订合同，三年组装二十万台双缸洗衣机，日方负责提供技术、关键设备、人员培训等，每台抽头三点二七美元。产品属七十年代末的水平，现已投产。起点较高，速度较快，效益是好的。这样可以少进口成品，并避免了国内低水平的重复建厂、盲目发展。当然，其它一些方式，也可以采用。

轻纺产品、耐用消费品、汽车、食品等工业都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可以预料，它们将越来越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列入议事日程。就拿汽车来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它的大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它可能是今后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工业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对汽车和摩托车的需要量急剧地、持续地增长，供不应求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汽车这样的商品与小商品不同，不能在生产上出现

大的盲目性，大家纷纷办汽车厂，搞“小而全”是行不通的。要避免这种情况，就要善于因势利导，运用经济调节手段，从产业结构、管理体制、经济政策、行业管理、技术规范等方面采取有力的改革措施。要支持质高价优的汽车进行专业化、大批量生产，占领市场。同时，要有计划地进口散件，在基础较好的大厂组装，作为过渡，逐步增加国内配套的比重。有些关键性的零部件，可以长期进口。什么都想一下拿过来，全部自己制造是不现实的。对外开放是长期坚持的国策，我们利用开放的条件，与国外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也要有长期观点，长期打算。

适应引进技术、对外经济交流的需要，就必须解决外汇问题。这几年我国的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到一九八三年达到一百四十三点四亿美元，其中国家现汇结存八十九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又是上升的趋势，到五月底，国家现汇结存增为一百一十六亿美元。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考虑，把外汇压在那里，对我们正在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是不利的。而且名声在外，东欧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要向我们借，我们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也因此而受到非议。因此，如何有计划地把积存的外汇用好，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就成为当前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是一个正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发达国家，当前贸易上略有逆差、外汇上有些欠款对我们较为有利。过去我们曾经设想过，把积存的外汇用在重点建设上。这方面固然可以用出一些，但有些建设项目，可以使用国外的贷款，特别是优惠贷款。我看应作出这样的决策：这几年来放宽一点，利用这些外汇，用在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进步上，用在进口一部分商品（主要是散装件）回笼人民币上，用在商品的革新上。这样，国内市场就活了，而且可以促进国内消费品工业、机械工业和其他工业提高技术水平。有些产品的质量上去了，花色品种改进了，还可以进入国际市场，至少是可以少进口了。今后，对外贸易总的是发展的趋势，搞得好的话，外汇也并不会少，这方面担心是不必要的。这件事方向看准了以后，就要作为一项重大决策很好去抓落实，银行在这方面要发挥积极作用。请计委、经委、财政、银行研究，提出放宽政策、简化手续的意见，报国务院审定。我看这个环节抓好了，有可能使我国的市场更加繁荣起来，使国内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

关于机械工业领导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

主要讲六个问题。

一、《机械工业领导体制改革汇报提纲》的思路是对头的，措施、步骤大体可行。改革的方向、措施可先定下来，或者是步子再大些，或许会有相当大的困难，现在还说不清，要在实践中再看。

二、比较起来，机械工业是最需要组织起来的行业，最需要专业化协作。现在机械工业条块分割特别厉害，产品也复杂。其他行业产品较单一，有的可能成为全国性的大企业。所以，体制改革从商业、外贸、加上机械工业先行。机械工业部带个头，下放企业后就一身轻，超脱了，可以总归口，成为国务院管理全机械行业的部门。中心城市的政企如何分开，时间可能长一点，至于组织跨城市的协作，也好办。总之，除军工外，机械工业先走一步，各地方、各部的机械工厂即使一时政企没有分开，也都是机械全行业中的一部分。首先是你们部超脱了，你们就好说话了。机械工业包括船舶，电子工业。机械部不是通用机械部，而是面向机械全行业的部门，是国务院的机械行业管理部门。你们就是起机械委的作用，计委、经委有关机械工业的问题，可以通过机械部去管，同计委、经委、体改委一样。

三、下放企业后，要有调节手段，包括经济的、立法的手段，包括重点基建及技术改造项目，以及优惠利率贷款的建议等，先从机械部提出，纳入国家计划。没有调节手段不行，否则，规划得好，也可能不一定听。

* 这是赵紫阳和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等负责人的谈话要点。

机械工业部受国务院委托，进行有关机械行业的立法、政策、调整、改组方案的拟订。

四、先抓两个环节。一是搞活产供销，包括开放生产资料市场。企业产供销要面向市场，有相当一部分供销活动通过市场，国家重点任务可搞指令性计划，把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结合起来。二是企业下放，除军工外，所有各部的机械企业都下放，在下放中组织起来，首先是各部、省不直接管企业。可以通过三种形式组织起来，即主要在一个市内组织的公司，跨城市的公司及跨省、市、区的公司。有许多中、小企业，独立发展能力强，也不一定都要组织到公司里去。

五、“户头”问题较复杂，还需要研究。我倾向于多搞松散的公司，少搞实体性的公司。因为搞实体公司，可能成为封闭的，和地方矛盾就大，要多种形式的，如合同联系、合作经营等。愈松散愈易组织起来。松散联合不存在“户头”问题，“户头”就要所在市，所得税交那里，如都统由总公司交，则成为紧密联合了。在企业有充分自主权的基础上，跨城市的公司、跨省市区的公司松散些好，就在所在地方注册，本地的企业也可紧密些，外地的企业可松散些。二汽联营公司的组织就较好，实际上就是一种合作形式。如果“户头”一挂到部，就相当直属企业了，你们就不好说话了。都挂到计委、经委，他们也受不了。下一步全面政企分开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开了，这时候就好说了，到那时再说。指令性计划和产供销可纳入国家计划，通过部下达，不限于现在机械部的厂，也包括其他部的机械厂，一视同仁。总的先过渡一下，怕一挂“户头”，部和省、市又被牵住了。再考虑一下，也可能还有中间的形式。

企业下放中心城市后也要政企分开。中心城市如何搞法，中心城市间如何协作，经济区内如何协作还得研究。企业都要扩权，这是没有问题的。市里可能加强经委，局大大减少，中心城市内的经委、局、企业的关系，城市之间的关系问题，可先不急，再看看。

先明确部是机械行业的综合管理部门，二是企业真正扩权，并把产供销搞活，那时，城市也控制不住企业。城市很难自成块块。你们说，除国务院关于企业扩权的十条暂行规定外，企业还提了十几个扩权的问题，可以试点。

重庆的情况我了解，主要问题是省、市矛盾。重庆、武汉、沈阳一列“户头”矛盾就来了。中央各部具体工作可少管些，从几个部来突破，从中心城市突破，企业有了自主权，又有了市场，现在企业间、城市间的协作就正在发展。

六、几个具体问题。

利改税问题，企业有些反映，这是另外一个专门问题，已开会解决，可不放在这里讲了。

对企业的外贸权问题，《提纲》中写的原则上是对的，但要统一研究解决。可写明希望在外贸体制改革中定，这些都是涉及其它部门改革的一些问题，不可能单独来定。

为解决机械行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先行一步问题，赞成你们提出的提高折旧率，三年内每年递增百分之一，留给企业用于改造。

《提纲》第二十页关于制造部门与使用部门关系问题，“事在人为”也对，但制度上也要解决。可否逐步发展能连接制造部门与使用部门的公司。外国这类公司多，在中间为大家服务，直接与双方联系，有一批强的技术力量，既为使用部门服务，又与制造部门挂钩。工厂设计与工程承包要结合起来，既管设计，又管设备订货。上次开建筑业改革会议时，许多同志提出要搞一些工程开发、工程承包公司。先要让设计院独立起来，进行招标。这些可否由城乡建设部管，它可能超脱些，可再研究。《提纲》最后一段说在政企分开后可采取招标、投标办法，看来还笼统一些，要再研究。

一九八五年底前抓十件事，可以。

回去后，找有关部门议一下，加以修改，并代拟批语，报国务院，准备正式讨论一次，这也是一件大事。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对这次提的方案你们说有两种反映：一种意见认为这样会引起经济失控，一种认为还放得不够。有两种意见比较正常，一种意见反而不正常，说明提出的意见还比较符合目前的改革精神。

有一个问题，是在这次解决，还是在下次解决，下次解决也可以。就是有些大企业完全由部、地方来领导不行，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部或地方向国务院要权时，站在企业一边。权一要到手，就高度集中，把企业管死了。如煤矿、钢铁厂、水泥厂、玻璃厂，要把余地留给企业，才能搞活。部门和地方不往企业放权，而且还层层加码，加计划外的指令性计划，使生产重要生产资料的大企业得不到好处。至少一些特大型企业，如鞍钢，要把权放到企业，当然也给部里一点权。现在我们有个危险，小企业搞活了，大企业搞不活。这同农业情况差不多，原来的低产区现在活得很，原来的高产区活不起来。越是大企业，特别是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不把权放到企业，活不起来。价格肯定要上涨的。价格上涨不可怕，这是制约基本建设规模的因素。一吨钢材原来四百元，涨到一千元，由于涨价搞不起，这就制约了。问题是属于计划调节占很大比重的生产生产资料的大型企业，如何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要“松绑”松到它那里就不松了。对这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改革计划工作方案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些企业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按一定比例实行产量递增包干，一包多少年，如有新的生产能力投产再改变。这样，企业有底了，它就可以放手挖潜，只要东西多了，事情就好办，部和地方不要在大企业之间抽肥补瘦。

关键是要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价格上有市场价、调拨价。思想要解放，两种价格并存不会出多大问题。我记得当年讲粮食问题也是这样。当时有人讲，粮食一上自由市场，统购的就没有了。我说过，粮食统购任务必须完成。实践证明，粮食上了自由市场，统购任务没有发生问题。煤炭也是如此，说有计划外的议价煤，就会完不成调拨价的煤，实践证明也没有影响实行调拨价的统配煤。

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大企业搞产量递增包干，如钢材，递增多少。大型企业，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任务不要层层加码。国家计划部分，对地方、部门适当照顾，中央和省最好一本账，不然势必层层加码。指令性计划占很大比重的，特别是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要搞活一点。可以有几种办法，有的包干，有的递增包干。大企业有的由中央直接定计划，这与利改税没有关系，是物资分配问题，当然也涉及超额利润分配问题。

计划体制，总的看将来还要进一步改革，但现在条件不具备。凡不具备条件的就不要改，以免将来出问题再走回头路，走回头路不好。现在提的改革意见是不是够？可能不够。不够也不要紧，总比原来要好一点。

计划体制改革，归根结底是两个问题：一是增加市场调节比重，缩小计划调节比重。即扩大市场调节，缩小指令性计划。二是指令性计划缩小以后，使企业的活动不与宏观的需要发生矛盾。为此，必须采用经济调节手段。匈牙利也是如此。过去我们不用经济调节手段，而用批准权来卡，效果不好。你们批，不一定正确；我们批，也不一定正确。宝钢是批准的，以前不是也有很多意见吗？要防止这个，就要有经济手段。

计划工作要搞长远规划，而且要真正搞好。过去是分钱、分物、排解纠纷，现在要搞长远规划，搞总体规划。国家计划能不能实现？要靠经济手段。尽管不完善，但要利用。如不解决问题，经济调节手段可以及时改变。不要走过去的老路，先从审批权限来控制，这是消极的。要避免企业活动与宏观经济发生矛盾，就要采用立法和运用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手段。这个文件对这两个问题有所体现。

关于消费基金我没有研究，但奖金税很起作用，现在大家要求将奖金税的起征点放宽到四个月。匈牙利提出的控制消费基金办法，开始很严，现在放宽了一些。既然是调节手段，是活的东西，闸门大了开小一点，小了开大一点，要有弹性。

计划体制主要矛盾是什么？要改什么？一是计划体制过于集中，比一九五七年还集中，部的权利不如过去大，企业的权利也不如过去大。我们国家经济落后，交通又不方便，又要搞一个高度的集中管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我们的根本问题。过去高度集中，重复建设问题也没有解决。不要迷信高度集中，高度集中并不能加强计划性。我们的计划实际上对国民经济的指导作用很少，而是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多条条框框。什么“计划就是法律”，能行得通吗？计划要求多的东西发展不起来，计划要求少的东西大量发展。拆船，我说了几年，一直不落实，今年解决了，拆船拆下来的东西可以到市场去卖，这就落实了。现在农村这样活，小企业这样活，指令性计划还这么大，只能是生产发展的桎梏。但也不能一下子都变成市场调节。江苏每吨一百元的煤可以用，一百五十元的煤就用不起，如把江苏这一块纳入计划调节，财政收入、生产就会立刻下降。材料紧张，如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会更紧张。如钢材，对钢厂解决一个你给我多少，多了是你的，情况就要好些。玻璃也是如此。但全部取消计划价格，震动太大。从农村看，搞两个渠道就搞活了。一家一个月供应两斤豆腐，你要多买就高价，现在已经习惯了。生产资料也要搞两个渠道，现在企业实际就是这样干的。生产资料价格浮动部分将越来越大，官价部分比重越来越小，但也不能把价格全部放开。江苏生产很大一部分是用计划外价格，由于没有搞死，所以搞起来了。如果江苏都由国家调煤，都给二十元一吨的平价煤，又给不了那么多，那就都搞死了。一头抓死，必需的东西要控制起来，一头搞活。文件上没有讲统配部分占多少？（柳随年：占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外边一部分肯定要增加，生产资料只要国家计划内那部分控制住。供不应求的生产资料如果把价格压低，基建规模就控制不住；价格高了，基建就能受到制约。国家重点项目由国家供应平价物资来保。过去我们害怕市场调节，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敢搞市场调节，供不应求的不敢搞。

计划工作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忽视市场调节。如计划不讲市场调节，其他改革就都不行了，因为卡在计委这儿了。计划上没有一点相应措施，整个改革无法前进。（吕东：轻工市场供应的材料保持一九八四年水平不动，要带来消费品涨价问题。保重点建设，不保轻工市场，连国家计划速度也不保，恐怕不行。）（陈先¹：先把重点建设稳住了。要把企业搞活，国家增加的物资就不会太多。如增长部分统统由国家保，这就放不开了，要让一些，才能放得开。）

有一些完全靠国家低价原材料不行。搞市场调节，靠国家的经济调节手段，可以搞好，我也许乐观一些。在重庆，两个军工厂，门对门，都生产摩托车，都是五机部的。一个部的应控制住，为什么控制不住？如果军工卡住不搞重复建设，地方也会重复。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发挥经济杠杆作用不行。这种体制，三十年证明不解决问题。计委过去强调指令性计划占领阵地，还发生这么多问题。我们全国之大，问题之复杂，哪能管得了。这个规定是放多了还是放少了？有的人说是放多了，有的人说放少了。可以总的评论一下，我看不一定会出大问题。即使出一些乱子，也可以解决。规模大了，我加税，运用调节手段。

这个文件叫体制改革可以，也可叫做改进计划工作的几个问题。这个文件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大问题，一是集中分散问题；二是计划与市场问题，生产资料问题；三是开始用经济手段问题。将来也是这三个问题。计划体制搞不好，根本问题是价格问题，经济杠杆也是价格问题。市场调节扩大了，如何引导用经济手段、立法手段。市场调节发挥作用，经营不好的企业就得关门。

我们国家什么时候经济体制改革完成？我对外国人说，价格合理了，改革就完成了。否则事倍功半，理不顺，要费很多力量。

是不是这样：（一）文件改个题目²；（二）赞成这些措施，有些没把握的，有争议的去掉，早些出台。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完成，要研究进一步改革问题。现在一下子改很多，改不过来。没把握的事控制紧一点，摸着石头过河，但要有所前进。

有个提议，可否明年一方面搞“七五”计划，一方面搞本世纪的长期规划。光搞五年的不行，搞本世纪规划，很多矛盾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耀邦同志也提过这个意见。年度计划今后不要下很大功夫，今年多了明年减，少了明年再加，没关系。五年计划必须和长远规划衔接，把十五年计划议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矛盾。当然，“七五”计划必须拿出来。这是个提议，你们研究一下。这就是提高计划工作水平，不搞长远规划就难免盲目性，计委也不知将来怎样，地方也不知怎样。（陈先：原来想搞“七五”计划时，后十年一起搞，五年计划细一点，后十年粗一点。）粗一点不要紧。电的问题要解决，将来若干年都卡在电上。要把经济搞活，要把电解决，有电才能产生别的东西：上次我讲过，围绕电来考虑能源交通。有一些联系到能源交通，有一些不涉及，如坑口电站就不涉及交通；有些是有没有水的问题。从全面来讲，必须切实抓住电，电多了就好办。

廖季立从匈牙利考察回来后，就讲把计划放开，计委必须掌握经济手段。机械部带头不管机械厂，如定下这一条，国务院授权它管全行业，因为它没有亲疏了。调节问题，资本主义比我们灵活得多。法国发展新兴工业就准备好贷款，日本、南朝鲜也是如此，他们计划性比我们强。日本通产省是有手段的。我们行政办法，批准画圈，你们画了我也画，好多事是处长、科长的意见。这样搞计划，看来是高度集中，实际没集中。这几年搞出些东西，原来看不是好事，现在看是好事，江苏就是一例。

注 释

1. 陈先(1919-)，浙江宁波人。时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顾问，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区协调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国家计委计划研究中心总干事。

2. “改个题目”指的是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意见，国家计委把文件题目改为《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增加了改革的内容，放宽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审批限额。国务院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将《暂行规定》发至全国执行。

我国汽车工业面临大发展的新形势^{*}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最近，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有一个《关于汽车工业大发展和改革工作的报告》，一波同志写了一段批语，很重要。我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总公司无论如何不要形成垄断；二是不要影响企业应有的自主权。现在没有参加总公司的企业都有了自主权，如果参加总公司的企业反而没有自主权，那就不好了。总公司应当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解决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使企业感到方便，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是否可以建立汽车行业协会，搞行业管理，协调对国外的合作，提供国内外汽车工业的信息。中汽公司在协会里是主力，要起作用，但不要垄断。垄断对汽车工业的发展不利。外国人讲垄断，是讲大企业廉价倾销，在竞争当中把别的企业挤垮，威胁中小企业的生存。这样的垄断，我们这里没有。我们要反对的是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垄断。中汽公司不要把自己作为一个行业管理部门，而要办成一个企业。过去我们一讲经济实体，就是人、财、物、产、供、销高度集中。一般地说，全国性的联合不能这样搞，这样搞必然是官僚主义，这已经是外国失败了的经验。第一是要有几个公司，不要只此一家；第二是公司内部的决策权应该下放。现在日本一些公司都在这样改。凡是高度集中的大公司，基层权力太小，弹性太小，上层信息失灵，就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形势。外国的跨国公司是比较松散

^{*} 这是赵紫阳邀请吕东、黄毅诚、周建南、王品清、饶斌、李刚等座谈发展中国汽车工业问题时的讲话。

的，它在各国的分公司有很大的独立性。我们国家这么大，有的公司也相当于跨国公司，再加上我们交通、信息又不那么灵通，更不能搞高度集中。全国性的公司，石化公司也好，汽车公司也好，都不是行政，而是企业，具有法人地位，但人财物、产供销必须适当分散。总公司对一汽、二汽这样的大企业，应当给它们以很大的决策权。对其他直接参加汽车公司的企业，或叫紧密联合的企业，也要给他们以相当的自主权；至于松散联合的企业，经济上完全自负盈亏，那就更不用说了。

二、汽车工业面临着大发展的形势，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我国的交通运输结构要改变。我们的铁路不够，当然还要修，但高速公路也应有所发展。这是势在必行，因为有经济上的需要。有人计算说，一条高速公路至少等于五条铁路的运量，而投资比五条铁路少得多。所有的发达国家，铁路衰落，高速公路兴起，都不是偶然的。经济不发达的时候，货运量不多，距离又比较长，在这种情况下，用铁路合算；如果搞高速公路，运量不大，就不经济。但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必然要有高速公路出现。中国如果搞一条横贯东西的高速公路，肯定要赔很多钱。但在北京至天津、沈阳至大连、上海至南京、广州至深圳修建高速公路，肯定是赚钱的，因为货运密集，又不像铁路那样需要很多中间运输环节。我们国家幅员这么大，铁路是要修的，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就要考虑修高速公路。整个公路运输都要扩大，这就对汽车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我们国家里，不要很久，出租汽车就会有发展，招手就来的出租车是最受人欢迎的。目前，家庭私用车不会有很多人买，而出租车对市民来说是非常方便的，送人、接人、上医院等，都离不开它。这样，城市用量就不少。我看出租车还会很快发展到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它比公共汽车更方便，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很需要。

再看远一点，将来，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私人买车（包括轻型车、小汽车）也会有相当的数量。我们有些同志，对高档消费品的购买力估计不足。现在买电冰箱、洗衣机这么猛，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并不是中国人都富起来了，而是因为农村放开了，小企业放开了，大企业也扩大了自主权，这样搞下去，很快会有一部分人收入大大增加。这在全国虽然是很小的一个局部，但中国大，人口多，全国加起来就相当可观。中国

十亿人口，有百分之十的人富起来，就是一亿人口，等于一个日本；百分之五，五千万人，就是一个法国；百分之一，一千万人，也相当于人家一个国家。对市场形势要足够估计，现在我们往往估计不足。资本主义不怕购买力增加，不怕市场需求量扩大，如果哪个国家出现了这种形势，简直成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国也要搞高消费，但不要把购买力看成可怕的东西，而应当利用人们的购买力，促进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促进包括汽车在内的高档商品的发展。

三、发展汽车工业，当然要避免盲目性，但首先必须着眼于解决供需矛盾。现在汽车的需求量很大，到处供不应求。你不能满足人家的需要，人家就要想方设法去发展。如果无视供需矛盾，盲目性是很难控制的。

根本的办法是以现有的大汽车厂为基地，在专业化、大批量的基础上，大量供应质优价廉的汽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两种可能：第一，避免“你搞我也搞”，大家都去搞那种质量低劣的盲目生产；第二，也可以避免大量进口外国汽车。

汽车工业大发展，向你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不要一见到盲目生产就害怕，就急于出来限制，而要研究如何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于这种情况。不要光靠老的办法。单纯用行政手段是难于奏效的。

当然，我也赞成有点行政干预。日本的《振兴法》，是一面限制，一面大批量生产，大量供应。有个材料说，五十年代末，日本有个汽车厂当时产量和我们一汽一样，二十多年来，人家是大发展，质量也大大提高了，而我们一汽还是老样子。这也说明，无视市场的供需关系，单纯依靠计划指标，定点，行政手段，这种做法是不行的。一定要用新的办法。这样，汽车工业发展了，供需矛盾解决了，盲目生产限制了，经济效益也提高了。你们要用新的认识，新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来解决新的问题。

四、看来当前完全依靠国内生产解决不了供需矛盾。要充分利用与国外合作的条件，利用沿海开放的条件，利用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来发展汽车工业。一汽、二汽，除了自己生产以外，也可以搞一些组装车，从国外进口一些关键部件，国内组装，廉价出卖。这样，汽车工业的水平会很快提高。沿海开放城市的条件比较好，也可以让他们进口一些组装件。军工企业也可以组织进来。哪些零部件由一汽、二汽供应，哪些零部件由军

工供应，哪些零部件进口，要好好组织一下，这样就可以把一般的盲目发展抑制住。

有了这一条，然后再逐步地增加自力更生的能力，通过进口组装零部件，技贸结合，合作生产，逐步向国内生产转移，什么时候试制成功了，再代替进口。有一些散装件，也可以长期进口，比如冷气、密封件等，如果国内解决不了，为什么不可以进口呢？进口一些零部件，不要怕。即使进口百分之二三十的零部件，我们自己还有百分之七八十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总比进口成品车便宜得多。而且，质量提高了，车好用了，批量增大了，汽车工业发展起来了，供需矛盾也解决了。这样解决供需矛盾，起点就高了。不然，汽车工业水平老是上不去，供需矛盾也长期解决不了。

为了进口组装件，可以动用一些历年积存的外汇。顺便说一下，我们的外汇主要用到哪里去？看来，基本建设方面很难用出去，但可大量用于技术改造，用于引进必要的设备、技术和零部件。老怕没有外汇，总是放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种守旧的思想。可以用一些外汇，用于沿海城市的技术改造，改造老企业，发展新产品；进口一些当前市场很紧张的东西；进口一些散装件，国内组装后供应国内市场；甚至可以引进一些组装线，从最后工序搞起，逐步往前开拓。能把外汇变成人民币，也是很合算的。南朝鲜、新加坡和台湾都从组装散装件入手，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加工能力。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工业基础，比他们那个时候好，我们又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条件比他们好多了。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工业面貌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工业品的质量上去了，外贸出口换汇率就可以提高，外汇也会增加。

应该看到，让一定数量的国外产品进来，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当然，如果不加限制地大量进口，会把民族工业扼杀。但完全绝对地保护是不行的，对促进国内工业进步没有好处。

五、汽车行业要开一次会，由国家经委、计委、机械部、中汽公司联合召集，把汽车工业的形势、方针、政策等大的问题议清楚，然后作出规划，有个大体的安排。汽车行业协会也可以在这个会上产生。

有了规划以后，最后能不能实现，关键还得通过经济的办法。比如沿海城市，他们也搞汽车，他们与中汽公司之间就会有协调、有竞争。这就出现了新的关系。如果你本身搞得好的，批量大、价格低，就容易进行协调；

如果你自己比人家落后，他们就不听你的。我们希望通过竞争，通过协调，使汽车工业走上一个正确发展轨道。这样做，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开会事先要作好准备，对规划有所设想，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汽车工业确实面临着大发展的形势，但也确实存在一种盲目发展的危险性。汽车工业和小商品不一样，固定资产比较多，如果盲目发展，浪费也大。因此，又要有规划，又要有协调，有竞争。通过不断协调，不断竞争，有所前进，在前进中避免大的盲目性。

沿海城市开放以后，对他们的积极性要找个出路。一个沿海，一个军工，他们都有条件搞汽车。三线大的军工厂那么多，要把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沿海城市、军工企业和中汽公司，要有点竞争，加快发展。对大的汽车厂，没有点挑战是不行的。不能让他们把“地盘”把住，心安理得地去搞。这样没有危机感。没有危机感就很难进步。要避免低水平的盲目发展，但是中汽公司不能把“地盘”把住，要允许沿海搞，允许内地军工企业搞，中汽公司可以组织一下，因势利导。同时，相互之间要有竞争，最后“鹿死谁手”还得看一看。沿海城市可以向大汽车厂挑战，中汽公司可以用自己质优价廉的产品来抑制沿海城市的盲目性。在国内允许互相竞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不准互相拆台。既要反对盲目搞小而全，又要反对垄断。中汽公司要有意识地创造一点竞争条件。孟子有一句话，叫做“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没有强敌威胁，太安逸了，就会衰败灭亡；相反，遇到挑战，发愤图强，必有崛起的一天。国家如此，企业也是如此。像一汽、二汽这样的大企业，也得有点危机感才行。总之，既不要盲目发展，又不要死水一潭。

对《人口控制和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¹ 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

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有什么了不起。

注 释

1. 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根据农村实行一胎化的实际困难，经过仔细测算，1984年春向中央建议在农村开放二胎生育，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办法达到控制人口总量的目的。当时国家计生委干部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的马瀛通根据梁中堂的建议重新测算后，共同撰写了这份研究报告，并向中央建议城乡都可以采取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办法开放二胎生育。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也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给予肯定。后来有关部门确定在山西省翼城县进行允许农民生两个孩子的试点，从1985年7月起一直坚持至今，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山西省和全国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三线企业调整必须搞军民结合型*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

我们军工很多尖端技术解决了，但很多民用技术没有解决，现在军用技术要向民用转移。为什么军工转民用那样困难？国外行，我们就不行？因为国外的军工尖端技术向民用转移，有个叫“商业化阶段”。那就是说，新技术的开发，先要经过理论研究，再中间试验，进行商业开发，把成本降下来，过好“经济关”，然后投入生产。但我们军工搞尖端技术不计成本，搞出来了，没有进入“商业化阶段”，即技术过关了，没有过“经济关”，转到民用就用不起。军工要加强经营管理，过“经济关”要有人来组织和衔接，想办法使民用用得起才行。现在，苏联有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

三线企业调整要认真搞好，要在原有基础上发挥作用。二汽是三线企业，建设是成功的。有段时间，有的说它不行，讲它运输距离长了。我去看了，还可以嘛！运输问题，可以把公路修好一点，汽车的容量加大一点，也就解决了。贵州平坝的飞机厂，我去看了一下，也还是可以的。这里，顺便提一个事。三线地区搞了一些战备电台，我知道四川剑门关那里就有一个，谁去过问一下？计委去问一问，了解一下，要有个解决办法。一是撤掉，一是利用起来。这样的单位，也要调整改造，发挥作用。能不能利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听取鲁大东、郑汉涛关于三线企业调整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用起来转播电视？有的虽然打了洞子，洞子也是建筑物，做其他不行，用来做仓库也可以。

三线企业职工子女的升学问题怎样解决？这些企业中，有那样多的技术人员，至少可以把中学、中专办好。我到处都讲这个问题。一个企业办不行，可以联合起来办，有条件的还可以办大学。如新疆马兰基地，我去了，给他们讲，可以抽点技术人员办自己的大学。青海湖边有个221厂，我去后也讲了，可以自己办大学，至少要把中专办好，中专毕业出来，就可以到西宁，那里需要人才。光办中学不行，要大量办中专，培养中等技术人才，这样最容易就业，还可向城市输送。

对第三种情况企事业单位的调整，大东同志讲需要国家拿点钱，并提了具体意见，我看问题不大，就按大东的意见办。对解决企业调整自筹资金方面的一些政策措施，原则上都可以同意。一是有条件的企业，在一定年限内免交税利，资金集中用于调整；二是对亏损或停缓建企业，将几年的亏损补贴和停缓建维护费一次拨给企业；三是银行给予一定年限的低息或贴息贷款；四是企业的折旧资金全部留给企业。但对搬迁企业免征建筑税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开口子，不要定。这几条要区别不同情况处理，有的部门钱多一点如兵器部，有的部门则差一些，要分别对待。

今后，大三线的军工厂，除少数外，很大一部分企业要搞成军民结合型的厂。军工厂不能临时搞民品，也不能光是为了找饭吃才搞民品。军工企业能力强，问题是经营管理差，成本加百分之五的利润作为销售价对生产不利，是大锅饭。搞民品抱临时观点不行。要把军工厂的民品纳入国家计划。

还有一件事，今天说一下，就是我们在“七五”期间以及“八五”前期，主要是搞老厂的改造和扩建。今后发展生产力，提高质量，要靠老厂。这要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这样，投资周期短，产出快。我们国家如果走新建厂的路，那就发生资金是用在新建厂上，还是用在老厂改造上的问题。用在新建厂上，老厂的技术改造就没有足够的资金。结果，新厂在相当时期不能投产，没有效益；老厂的技术改造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衰退老化，不能改造，这个路子不行。我们要对老厂进行改建、扩建，生产发展了，质量提高了，生产就上去了。老厂进行改建、扩建，产出快，周期短。搞

交通运输，也是如此。煤、铁矿、铁路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国家交通压力最大的，不是不通路的地方，而是那些通路的地方。因此，交通、公路、煤炭、火电、钢铁，也是要按改建、扩建的方针去搞。这次我到鞍钢去了，鞍钢将来通过改建、扩建，很可能搞到年产一千万吨钢。第三炼钢厂，把平炉改为一百八十吨的转炉，改建后就增加一百万吨钢，而且还不停产。高炉同样可以利用大修由小改大。通过改建扩建，产量增加了，水平提高了，在十年后就会有很大改进。国外现在是一步炼钢，不经过高炉，用煤气还原铁，今后鞍钢、宝钢也可以如此。我一直表扬冶金部，这些年，投资都集中花在宝钢上，其他方面没有投资，但这几年却增加了一千多万吨钢，每年增产二百万吨。过去人们议论是“保了一小撮，压了一大片”，现在看来是“保了一小撮，活了一大片”。过去，交通方面，各建成各的网，到处先铺摊子，然后再填平补齐，这不行。要改变过去的办法，“七五”期间和“八五”前期确定了要扩建、改建老厂这么一个方针。

三线企业要选一部分工厂，打破部门界限，实行联合协作。现在机械工业部不管直属企业了，全部下放地方，它作为国务院的部门，代表国务院进行立法和制定经济政策，是管理所有机械行业的归口部门。这个问题，明天国务院就要讨论。

三线要选一批军工企业加以充实，承担“七五”、“八五”的建设任务，不要再去新建了。把现有的设备、大型机械用上去。有些在民用部门改建、扩建，有些在三线军工厂去搞，去配套。三线企业在调整、改造的基础上，选一部分好的企业，加以充实，担负大的任务。前提条件是军工企业必须是按军民结合型来办，不能只搞军品，这样可以挖掘军工企业的潜力，发挥作用，也是解决投资少、资金不足的途径。三线工厂的大中型企业，是可以承担大的任务的。

另外，出口产品问题，军工企业要好好研究。三线的出口能力很大，现在没有列入计划，国家也未纳入规划，力量不能发挥。将来要给些政策和优待，把它搞活并提高水平，以发挥三线企业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大东同志，你们可以先抓企业调整，然后再研究哪些企业可以充实、改造、改建、扩建，这里所说的充实，也就是配套的意思。军工企业搞民品，起点应该高一些，要抓开拓性的产品，要搞一般民用企业过不了关的产品。

军工搞民品，既要过技术关，也要过经济关。军工的设备技术与国内的民用企业比，要先进一些，但与国外比，还是落后的。所以，军工转民品也要抓技术引进。要从国外引进技术，因为总的来说，我们技术水平低。军工技术人员多，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能力强，要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对军工企业要提出要求，不能停留在不亏损、找饭吃这个低水平上。否则，军民结合型企业就建不成。问题是两个方面，从国家来讲，要帮助军工企业挖掘潜力，发挥作用；从军工厂来讲，要积极转变为军民结合型企业。总之，要发挥三线的作用，为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在欢迎参加第二十三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宴会上的祝酒辞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

同志们：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参加了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以后胜利归来。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代表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同志和今天在座的领导同志，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

代表团出发前，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你们，嘱咐要在比赛中多夺金牌，而精神文明这块金牌一定要夺到。你们没有辜负中央的期望，获得了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我注意到，国外的舆论说，中国体育代表团不仅在运动比赛项目上拿到了许多奖牌，特别是表现了崇高的比赛风格和道德风貌。对此，我感到分外高兴。你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四化的信心和斗志。

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和展示的崇高精神风貌。全国各族人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你们取得的胜利感到光荣和自豪。

我在一九八二年底欢迎参加亚运会回来的我国体育代表团时曾经说过，你们这次彻底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甩掉了。今天，我要说，你们不仅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已经开始向世界体育的先进水平迈进，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建国三十五年来，体育战线的成绩是突出的，有很多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

我国体育健儿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朝气蓬勃，勇于创新，平时高标准、严要求，勤学苦练，比赛时顽强拚搏，奋勇进取，不断向新的高峰攀登。党中央、国务院希望，全国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认真学习体育健儿这种精神，解放思想，奋发图强，锐意改革，积极进取，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作出更大的贡献！最后，我提议：

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胜利，

为各条战线的同志们在四化建设中取得更大成绩，

为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干杯！

对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草稿的修改意见*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总的看，涉及改革的问题基本上都讲到了，许多好的观点都提到了，作为草稿，基础是好的。但作为中央全会的文件，问题还讲得不够集中，也讲得不透，比较散一些。城市改革的内在联系究竟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给人的印象不是非常明确。中央和国务院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议论，体制改革的眉目更清楚了。草稿的架子可以不大动，有几个问题必须讲清楚：

一、改革的性质是什么？草稿的第二、三两部分应当回答这个问题。草稿中这方面内容都有，但不够清晰。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两方面互相适应，我们历来都是这个理论，搞合作化、大跃进、“一大二公”时，都是这个理论。讲不断完善和改进生产关系，苏联也是这样提的，不要泛泛地讲这些。应当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是如何提出来的，性质是什么。在进行农村改革时，当时是不很自觉的，开始只是说把一亿人口的地区放开，没有想到发达的地区也要放开。结果，这些地区变化那么大，很快超过了发达地区，后来发达地区也放开了。在四川搞企业改革时，开始也只是从提高物质利益入手。现在有必要对改革的性质问题讲清楚，不要抽象议论，不要含糊其词。

我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这是完全对的，问题是模式没有搞对。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研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对社会主义如何搞还没有

* 这是赵紫阳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起草组谈话的要点。

来得及研究。十月革命初期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围攻，经济只能集中。不久，列宁搞了新经济政策。但后来斯大林的做法与列宁的设想不同，当然有它的特殊原因，就是帝国主义的封锁，经济不发达，必须先搞重工业，勒紧裤带搞军事工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事。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就反对经济工作按政治道义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苏联当时基本上是不讲经济规律的。因此，我们的改革，只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还不行，因为那样讲也可以解释为还要搞“一大二公”，就看你怎么分析。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过去照搬了苏联模式，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按照中国的情况，改革必须搞多种经济形式、家庭承包、商品生产。这要从中国的特色讲起，从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讲起，限制和束缚生产力的障碍到底在什么地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什么前进与后退的问题。草稿中二、三两部分，有些内容可以不写。如果讲三十多年的错误，就不只草稿中的八条。这八条许多不是改革的内容。关键应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是什么性质。要从理论来讲，但要有的放矢，然后引出下面的改革来。

二、改革的中心问题是要解决企业活力，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最集中的弊病，就是企业缺乏活力。但缺乏活力不是原因，原因是整个模式不对。我们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有活力的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也不是搞没有活力的社会主义。苏联搞的就是没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弊病很大。通过改革建立起生动活泼的有活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新路子，是最正确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罪恶很多，但它战胜了封建主义，把生产力发展起来了，而且有一定活力，这是它的很大功绩。我们把经济搞得这么死，肯定不符合马克思的设想。经济工作不讲价值规律，肯定搞不好。由于没有活力，我们的浪费大得很，投入多、产出少，有的甚至投入大于产出。没有活力不可能有经济效益。列宁在论帝国主义时说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发展已经枯竭，现在看不完全是这样，它们的技术发展仍然很快。我们的技术更新慢，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毛病，而是受体制模式的限制。这就是改革的实质所在。

各国必须解决企业的活力、劳动者的活力问题。从这个问题出发，必

然涉及整个体制问题。这样就可以把一系列问题点出来。其他问题不进行相应的改革，就不可能把企业搞活。以解决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相应进行其它改革，这就是改革的要点和蓝图。

其他方面的改革，内容很多，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计划体制必须改革。计划体制不改，企业活不了。

二是必须运用经济手段，主要是价格。价格体系不改革，一切改革都无法展开。过去靠行政官僚办法分配实物，可以不讲价格；现在放开了，必然要靠价格。价格不合理，东西就没了。社会上生产的东西很复杂，价格不可能由国家一一规定，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说法不确切，把计划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了。没有合理的价格政策，是无法搞好计划工作的。现在谁讲话也不那么灵，但价格最灵。新疆的羊毛，如果按质论价，就不会大量掺沙子运到上海去。煤炭按发热量计价，就不会大量运煤矸石。这几年棉花、油料发展很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价格提高了。广东的鱼为什么增长很快，就是价格放开了。问题在于我们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还是违背它而受到惩罚。

三是改革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各级政府要管经济，问题是如何管。改革原则主要是政企分开。政企不分开，条块问题解决不了，也不可能有竞争，不可能有合理的联合和统一的市场。政企分开，企业自然就会发展横向联系了。横向经济联系，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我们搞社会主义，反而把它退回到封建割据，这是很不合理的。

上面讲的三个东西，是计划经济的主要标志。我们过去不是这样，主要靠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政府直接管企业。靠计划去卡，控制审批权，虽然也起了点调节作用，但把经济搞死了。苏联那样搞，有它的背景和包袱；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没有任何包袱，可以做到该如何搞就如何搞了。

三、关于计划体制改革问题。“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可以作以下的解释：

(1) 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2) “市场调节为辅”，指的是盲目的自发调节的部分，只是小商品、服务修理业、三类农副产品，这些都可以放开。

(3) 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 扩大指导性计划。计划经济不等于都要搞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这都是计划管理的具体形式。

(4) 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

这样, 就把计划与价值规律统一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发展商品生产, 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来为计划经济服务。价值规律是完成计划最重要的手段。

文件要有一段, 好好把计划经济说清楚, 既区别于苏联, 又区别于资本主义。体制改革根本的是要解决计划体制问题。计划不改革, 讲别的改革就很困难。现在是到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陈云同志早就说过, 中国不可能把什么都计划进去。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国家, 不能都搞指令性计划。不要把计划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这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四、文件要比较系统地讲价值规律与改革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成败, 就在于价格体系的改革。价格体系搞好了, 其他改革就事半功倍, 否则就事倍功半。如果价格不改革, 企业活力就受到制约。东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认为, 体制改革不改价格不行。价格不合理, 投入产出算不清, 谁赔谁赚是一笔糊涂账。改革的具体措施可以不讲了, 但关系一定要讲清楚。党内相当多的同志至今不懂得这种道理。企业放开以后, 必然要以利润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而利润是同价格直接联系的。在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情况下, 企业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企业的经济利益、工资奖金同经济效益挂钩, 只能是同利润挂钩。企业向哪里增加投放, 关键决定于价格。山西小煤窑为什么这几年发展快, 去年一年就增产二千多万吨, 主要就是允许它提价, 不提价, 靠计划怎么也上不去。要使经济活而不乱, 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手段, 这是最根本的办法。其它方面的改革, 包括指令性计划缩小到什么程度, 企业放活到什么程度, 都取决于价格改革的进度。

要调整不合理的价格结构。同类产品内部质量差价的调整, 要跨大步。这种调整, 一般不涉及利益再分配的问题, 要争取两三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价格改革, 是改革价格不合理部分, 不是通货膨胀。稳定物价

不是冻结物价。现在国际市场价格经常在变动，我们要搞对外开放、扩大外贸规模，价格不变是不可能的。群众的顾虑不在于物价是否调整，而在于实际生活水平是否提高，银行存款的利息能否抵销物价上涨的因素。合理调整物价，可以刺激生产的发展。

价格改革要稳步进行。文件要讲清楚价格改革与体制改革的密切关系。“七五”期间，把企业搞活了，计划体制改革了，价格合理了，三者配合在一起，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可能出现一个飞跃。

改革价格的基本路子，是逐步缩小国家定价的范围，扩大市场价格的范围。对于必须由国家定价的部分，价格也要逐步进行调整，使之接近市场价格。实践证明，什么东西的价格放开了，什么东西就多了，东西多了价格就降下来了。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能源与其他产品之间，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之间，不合理的价格都要改革。但涉及人民生活的，都要通过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险等办法，使人民生活不致下降。为了保持市场稳定，国家可以掌握一批物资，甚至进口一批货物，在必要时抛到市场上去。这方面，在三大改造以前我们有许多好的经验。

前几天，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马尔亚伊对我说，中国现在是改革价格的黄金时期。匈牙利在改革时，没有抓好这种时机。当时，他们生产增长较快，工资增加很多，但没有相应改革价格。现在生产增长幅度下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价格就不好改了。但是他们决心还要改。他认为，中国现在生产增长率高，人民生活有改善，为什么不能抓紧改革价格？要把工资和价格结合起来进行改革。

讲经济杠杆，还要讲银行的作用。社会主义应当很好运用资本主义银行作用的经验。

五、关于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解决条块问题、企业合理联合问题、国家机关的组织机构问题，方向就是政企分开，现在已经开始有了好的现象，但要解决这个问题，任务还很艰巨。

六、关于文件的题目和结构。题目可以改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是否还要加“城市”二字，也可以再研究。

第一个问题写得是好的，可以保留。

第二、三个问题，合起来，讲改革的性质。

第四，讲计划体制改革。

第五，讲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

第六，讲改革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

第七，分配，单独写一条。两方面都要说一下，一方面说社会主义要合理分配，不是两极分化，而是要真正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另一方面讲合理分配，必须要有差别，重点可以讲差别。责任制，可以放在这里面写。厂长负责制这里可以不写。讲分配中，可以把责任制展开写。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放在政企分开中写。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可以放在解决企业活力问题中写。

第八，关于人才问题，要单写一条。人才对于改革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可以围绕改革来讲人才，不是一般地讲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问题，要着重强调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经济专业的课程设置，也要相应改革。同时，联系讲几句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

对外开放，可以不写。

第九，讲加强领导，保证改革健康发展。

把上述九个问题讲透了，人们就能看到中国的体制改革究竟如何搞。这样写，内容突出，篇幅可以减少，可以有点气势。改革的方向、路子和思想，必须写出来，集中一点，扣紧一点，有理论，有方针，有大体方向。改革的具体内容可以不写。

在安徽省党政军负责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

一、关于安徽省的工作

我这次是第一次到安徽，但是我对安徽的情况、安徽的经验是很注意的。不是现在，早在四川工作的时候我就很重视看安徽的材料。比如凤阳的“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个材料，我在四川就印发了。这一次来的目的，一个是补课的性质。另外一个，我们在北京搞经济工作，比较关心煤炭、关心钢铁。黄璜¹同志在京开人代会期间，约我一定要谈一次，我答应一定要到安徽来。安徽整个形势很好。但是淮河有那么一小块地方非常困难，主要是自然灾害太频繁了。所以想来看一看，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总之，一个是补课，一个是学习，听听安徽的新鲜经验，是带着这个目的来的。

中央对安徽的看法，大家都知道。安徽的工作是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尤其是农村的改革，安徽是立了功的，安徽一直不断地创造这个经验。现在，这个问题在全国来讲已没有异议了，但开创不容易啊，万事起头难。全国有这么好的形势，安徽有一份很重要的功劳。另外，我讲改革，安徽走在前列，不只农业，比如教育方面改革也是走在前面的，尽管教育改革还刚刚开始，还需要完善，但科技大学是带了头的。工业方面的改革你们也不落后，当然工业原来基础差，工业项目过去国家投资少，昨天黄璜同志讲了，效益差，这是一方面。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在工业方

面也是积极探索的。我原来在四川时，就已经注意到安庆石化厂，那时张大为²同志在那里嘛，他提出了经理、厂长“组阁”的问题，后来我在四川相当一部分县以下企业都实行了这个制度，就是经理确定下来以后，或者厂长确定下来以后，副经理、科长一律由他“组阁”。这个“组阁”是我在四川取的名词。当然，国营企业不行。安徽的工农业生产形势一直是好的。尽管安徽这几年灾害比较多，但是没有妨碍安徽的前进（黄璜同志：这与中央的支持有很大关系）。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米二角二分一斤，我最先就是听到你们安徽大米价格这样低。这些就不多讲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很高兴地听到昨天黄璜同志讲到你们整党的情况，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断巩固发展的。黄璜同志跟我讲了，调整后的各级领导班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事业心强，干劲大，团结好，都想干一番事业，我看这个非常重要。特别是省级班子，老同志支持新同志，新同志尊重老同志，互相学习，团结战斗，讲原则，讲改革，讲效益，经常深入基层，注意解决实际问题。我来时间不长，也是这个印象。你们讲到整党，第一条抓了路线问题，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各个同志提高了执行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政策的自觉性，使各个部门把三中全会以来总的路线、总的政策同各个部门的具体政策、具体业务联系起来，统一起来了。第二条正在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这是来自于军队的经验。中央书记处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意义极大，虽然过去实际上也是这样看的，但是没有这样明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育，不仅是为了解决路线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团结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有些是早出来的，有些是晚出来的，有些是这个时候出来的，有些是那个时候出来的，有些是最后出来的。反正都是老人家发动的，很多东西是通过老人家定下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同志来讲，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处境，当然，他都有个不同的牵连。如果是一直打倒，一直到三中全会才出来，那就是一身轻。我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的没有一个人没有账，我有我的账，你有你的账，你要抓我，我也可以抓你。恩怨甚深。“文化大革命”以人排队，以派排队，这个流毒非常深广，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党不可能兴旺发达，我们给下一代，给第三代不可能留下一个很好的团结的基础。所以，军队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意义极大。

现在中央正在抓这件事，只有这个搞好了，团结才能促进，“三种人”才能正确的清理，第三梯队才能正确的建立。

我们“七大”解决了两大问题：一个是路线问题，第二个是团结问题。毛主席当时由于整风的政策正确，经过整风，党的面貌焕然一新，觉悟很高，思想非常一致，非常团结，因此，我们很快就把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消灭了，那是不容易的。那一次斗争是十分成功地进行的，团结了绝大多数，只跑了张国焘一个嘛，当时王明还是中央委员嘛！这你们老同志比我更清楚了。没有那一条政策也不行，光讲路线，你把所有沾了王明路线边的，历史上沾有错误路线边的，都排挤在外，那也不行。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批人的问题。那次整风把好人都团结起来了。当然讲团结不是没有原则的，就是先把路线搞清楚。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都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去看，不能割断历史。我经常在中央书记处讲：我当时是省委第一书记，两派都打倒，谁也不敢保；我要是个农业书记或者是工业书记，恐怕现在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讲了。那可能有一派要保，有一派要打倒。如果有一派保，如果保的这一派是当时中央文革支持的，这就可能要结合，结合以后就要办错事、讲错话，就要上台。我说不想上台的人是很少的。说句老实话，我是想上台、想结合的，问题是没有条件，人家不要你，谁也不敢沾你的边。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没有一派保，到以后反而主动一点。那时很想有一派保一保，当然我也不敢支持一派，也没有这个条件。总之，那时候如果在台上，我看这次整党大概总得要检讨就是了。当然“文化大革命”有些坏人造谣，诬陷，这是个人品质问题。如果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就要作分析了，因为你那时哪知道是毛主席的主张，还是“四人帮”的主张，我说“文化大革命”根本的还是毛主席的主张。当然，“四人帮”就利用他这个东西，造成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我没有参加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但是，在中央讨论整党时我多次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在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我就讲了对过去的事，要宜粗不宜细。当然，光讲这个不行，首先还是要讲路线，三中全会路线，在这个前提下讲团结。要讲团结，讲谅解，一切问题要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所以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现在还在争自己正确，那就不可能搞好团结。我认为有两个东西意义很大：一个是耀邦同志讲的，各个部门要把

三中全会路线和本部门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第二个是军队提出的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清理“三种人”，建设第三梯队。这样，我们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肯定会出现一个兴旺发达的景象。现在看来没有这两条，“三种人”也不能正确清理，第三梯队也不一定搞得不好。因为有派性的地方，你讨论别的问题可能没有意见，要说到干部意见就不一致。要彻底否定两派。作为具体人来讲，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作为这个派来讲，不能说哪一派就是一贯正确，哪一派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因为那时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错的嘛，错误地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嘛。现在看来，有些同志还没有完全搞通六中全会决议，本来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结论嘛。我认为，在整党中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很重要。当然不是赞成翻腾过去批两派，就是把思想搞清楚，这样大家都从派性中解放出来，往前看，搞四化，不要再争谁正确谁不正确。干部都按干部标准来衡量，“三种人”就是“三种人”，犯错误的人就是犯错误的人。我们如果能够消除了派性的痕迹，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党的建设，对我们的千秋万代意义极大。如果我们第三梯队选得不好，还有派性的残余，那第三梯队将来在选第四梯队时还会把这个东西带下去。这样危害就比较大，就不能团结全党，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所以，黄璜同志昨天提到这个问题，我就讲中央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重点就在于彻底消除派性，不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派性不能彻底消除。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将来一定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的形势，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大家心情就舒畅了。当然，具体怎么搞，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会有很多具体的指示，这里不多说了。我就说这个意义。清理“三种人”是很重要的，选拔第三梯队是很重要的，要结合整党来搞，也不一定等整党。我这是就全国来说的，当然我想这对安徽也是适合的。你们安徽这方面的情况我没有了解，不太清楚。我是就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问题的。

这次我来这么几天，省委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省委的汇报，一些单位的汇报，市委的汇报，都向中央提了一些建议和要求。提这些问题无疑都是正确的，都是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大概可分三类：一类问题这一次已经解决了，这我就不说了。第二类问题要带回去，也有可能不要很久的

时间得到解决。第三类问题在安徽虽然提得有道理，在全国现在还排不上队，以后时机成熟再去解决。我看不外乎三类。至于哪些属哪一类，就不必来讲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昨天我说对安徽没什么话讲了，因为汇报时都插了话了。今天这么多同志在，对安徽一句话不说，好像也不好交待。下边我想着重向同志们吹点风。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在北京是主管经济工作的，所以我想讲一讲经济工作方面最近北京议论的一些问题，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议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多是没有定案的，但是看来大部分可能将来是要这样做的，当然方案还没有。这一段我们开了很多会，应该说这一段议论的问题，在我们经济建设中都是相当大的问题，我想简要说一下。今天我想说两个问题：一个是建设方针问题，一个是改革问题，吹这两个方面的风。

二、建设方针问题

（一）建设方针问题。“七五”计划现在明确了。主要是依靠老企业、老基地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为重点。这包括“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间花掉一千亿元搞的大三线。不是说新的一个也不搞，关系到整个国家建设，起关键作用的某些大型项目，当然还要新上一些。不只是“七五”，“八五”前几年，也就是大约七八年的时间，要贯彻这个方针。为什么要这样来考虑？

一是从我们国家的整个生产力布局来考虑的。大概经过一九五八年，以后经过三线建设，经过“文化大革命”，应该说生产力布局这个战略问题基本上展开了，但是效益不怎么样。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再搞一次大的战略展开，就是现在不要再打一次运动战。我觉得过去我们中国经济建设吃亏，这个运动战，也可以叫摆屁股吃亏比较大。这个吃亏和打仗不同，打仗就是步行军，半个月也可以把部队调过去，扑了空还可能调回来，而经济建设不能这样。我们解放以后大摆了几次屁股，吃了很大的苦头。一开始说一线、沿海不搞工业，因为那是什么国防前线。本来我们刚刚接收摊子以后，沿海工业基础比较好的，没有很好地进一步让它发挥作用。在提出处理“十大关系”以后又重视沿海，刚刚重视不久，到了

一九六三年提出三线建设，又把沿海丢掉了，花了很多投资去搞三线。三线是应该搞的，不是说搞三线是错误的。但是，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搞那么大，这是值得考虑的。如果那个时候不是花一千亿元，拿二、三百亿元给沿海，那情况就不同了。都搁在山沟里头，有些地方根本没有人，没有生存条件，也有这样的厂啊，现在必须要转、要迁。那时毛主席讲备战，打洞，归纳说什么“山、散、洞”，好像洞越深越好，山越大越好，距离越远越好。三线一千亿元投资没有发挥作用。当时强调从备战出发，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这不能都讲了，反正是摆了一次屁股。这几次摆屁股对中国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在一块地方，把它搞起来，然后依靠这个经济实力，逐步开发。美国是从东部向西部开发，澳大利亚也是从东部向西部开发，加拿大是从西部向东部开发，苏联是从西部向东部开发。我们是东边搞一下子，西边搞一下子。我看这个不怎么样，当然那时候我们也不懂。我们这次不能再搞新的战略展开，今后就是到二〇〇〇年，只能够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当然现在也不能绝对化，新的还是要搞一点，三线还是要搞，大项目还是要搞。

二是，我们原有企业潜力很大，改造老企业是花小钱得大利。有一些如果你要是再搞新摊子，就是花大钱不得利，几年不见利。有一些就是花小钱见大利。因此，要搞老基地、老企业改造。同时，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上有一个很大的经验教训，就是搞上一个项目以后，就把它利润搞得一干二净，使它一点再生产能力都没有，然后把这钱一块拿来搞新企业。新企业搞起来了，老企业也差不多了。搞老摊子改造，可以花小钱见大利。我原来对这个有点想法，还是一般化的，这次去鞍钢具体化了。鞍钢如果不铺新摊子，就在那里搞技术改造，改建扩建，搞一千万吨能力都是可能的，甚至也有可能搞到一千二百万吨。这样，花钱大大节约，技术人员成套，领导班子成套，生活区都在那里，而且还可以不停产，边建边干。像你们淮南、淮北，也可能还有个马鞍山，有个攀钢，还有个包头钢铁厂、太原钢铁厂，也有这个条件。煤炭，如按原来的想法，花钱很多，到一九九〇年还出不了多少煤。要按现在的方针，按高扬文等同志现在的想法，同样的投资，一九九〇年可以多出七千万吨煤。你看这多划算。还有一个大教训，就是过去搞一个新企业，挤掉一个老企业，把

一个老企业老化了。现在进行老企业改造、扩建、改建，生产能力扩大了，生产水平提高了，技术前进了，提高到新水平。像原来一汽、二汽，现在都搞到几十万辆车的生产能力，技术也前进了。你如果把一汽、二汽丢掉以后，另外再搞个汽车厂，一汽、二汽就落后了，不行了。丰田五十年代跟我们长春汽车厂一样大，现在他们年产几百万辆，我们还是六万辆。现在我们不是说要搞新兴工业吗，新的技术革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新兴技术去武装老企业，这个潜力大，花钱少，见效快。

因为中国没搞过资本主义，不懂商品生产，不会搞商品生产，所以我们在搞工业、搞基本建设这个问题上，没有周期观念，只有一个花多少钱的观念。我们有些单位不注意，花国家的钱花多少他也不心疼啊！光看投资多少，这不科学，不能说明问题。你投资一亿元，是三年投产，还是五年投产，还是十年投产，情况就大不相同。现在我们许多同志搞建设，一没有利息观念，二没有投入产出观念。我花了一亿二千万元，三年建成了，过了四年，我收入了五千万，实际上支出只花了七千万。你如果花了一亿元，你是搞了十年才投产，也没有产出，你就不止花了一亿元，另外还有利息，这样一亿元搞十年就是两亿元，哪是什么一亿元啊！这个利息是个客观的东西，不是人为的东西。我们过去不加利息这个东西，对资金形成一个错误的信息。旧社会也好，现代国家也好，没有哪个国家是没有利息的。没有利息是过去土老财的观点，我有三块银洋，埋到地下，过了十年，还是三块。金融必须有利息，资金也必须有利息。我原来也不懂，是哪个事情启发了我呢？就是跟法国搞了个核电站，法方提供十八亿美元的设备，大概八九年的时间，就要还他四十亿美元。我就觉得这个怪啊！我们国家搞个核电站，用国内设备只合十八亿美元，那为什么买外国的设备，到时就还他四十亿美元？买我们的设备，过上十年，还是十八亿美元？那不过是银行、国家吃了亏就是了。银行少收二十亿美元，国家少了二十亿美元，也就是等于我们再投资的资金少了二十亿美元。没有利息的观念，没有产出的观念，带来了基本建设设计上一系列的错误。人家外国搞煤炭设计，两年出煤，三年出煤，我们要搞一个大井，八年出煤还是好的。你们的潘一矿就是十年出煤，（袁振³同志：十五年出煤。）十五年出煤啊！外国人千方百计要快产出，因为他们筹集资金与我们不同，他们都

是银行贷款，因而一开始建设一个项目，脑子里天天想的是什么时候把钱还了，还了他就解放了。我们中国就是年年给我投资，然后我搞多大规模，根本没有一个资金归还的观念。所以我们国家基本建设浪费很大。当然，除了计划，一上一下也是一个浪费原因。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改造老企业，对老企业改建、扩建，最大的好处是建设周期短，第一背利息少，第二产出快。我是一点一点扩的嘛！今天扩大一点，明天扩大一点，我又不想大量地搞三通一平，而是一件一件地改，搞了一年，第二年就有收益了，加在一起就是数量好大的数字啊！这就不错嘛。（苏桦⁴同志：我们最近改造合肥钢厂的方案就是这个办法。）那好啊，结果等于你没有投资。所以只讲投资，不讲产出，这是个死账。所以要下决心，普遍搞技术改造，充分利用国外好的技术、设备等条件。特别是大的工厂，大的项目，一定要技术改造，改建扩建，一起来搞。五年到八年，就按这个方针办事。最近讨论“七五”计划，我说，别的不多讲，主要就是把把这个方针定下来，现在正在按这个方针跟各部算账。

（二）要搞好消费品生产。国际上认为我们这几年形势好，主要看我们市场好了。他们并不看你那个增长率，因为他们不相信你讲增长多少，他就看你那个市场。如果市场上什么都排队，什么都没有卖的，你再讲增长率，他也不肯信。中国的购买力强，外国人非常羡慕我们这么大的市场，但是我们自己长期不懂得这个市场的作用。当然，讲不懂也懂一点，毛主席的文章里就有，他讲我们中国有个大市场，可作为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大市场。对重工业，我们还懂得一些，如农民需要拖拉机，我们就搞拖拉机厂；农民需要化肥，我们就搞化肥厂。但在消费品问题上，长期不懂得这个东西，用抑制消费的办法搞建设。最近袁振同志给中央发了个电报，主张适当鼓励消费。这个中央是同意的，最近几次议论过这个问题。当然，在我们国家，我们也不必提倡什么高工资、高消费，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这个条件。就是发达国家，现在按这个路子走的结果也并不好。但是我们要适当鼓励消费，要运用市场这个优越条件促进建设。低工资、低消费的办法，不利于加快建设速度。所以我们最近研究，首先要把外汇用活。为什么呢？我们国家现在压了一百亿美元外汇，把这么多外汇放在那里实在是蠢事，不但没有发挥作用，还压了银行的资金。原来我有个想法，要

从外汇中拿出五十亿美元搞重点建设，现在证明用不出去。再一个，我们搞一些重点建设，对成套设备，往往外国还提供一些优惠信贷，所以我们的外汇压着。我们现在定了个方针，就是要在几年之内，把外汇用出去，放手一些。在北京我讲过这个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要怕将来没有外汇，到没有外汇时再说。（袁振同志：咱们不是黄金很多嘛？）黄金有，但黄金现在不好卖，我们也不保密，还没有卖，价格就降了。当然也包括黄金在内，黄金也应当要卖的。你比如说金子啊，铜啊，你就可以搞一些别的消费品来销售。不要光考虑战备的需要，打起仗来还是有办法的嘛，可以收啊，动员老百姓交嘛。你放到仓库里干什么，你搞成制成品卖了，到时候要用再收嘛。反正都是中国人，还在中国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压缩库存。我现在不讲这些了，要讲用活外汇。把外汇用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在北京定了这个方针，用于技术改造，甚至可以用于进口散装电子件。如果我们搞个组装线，我一下子搞不起来，可以进口散装件，进行组装。这样，第一满足人民需要，第二可以回笼货币，第三通过这个东西，我们可以逐渐往前搞。这样市场繁荣了，人民需要满足了，财政收入增加了，企业的面貌改变了，将来外汇也会有了。我们现在要下个决心，准备拿个七八十亿元来搞这项工作。就这么个指导思想。这当然有些风险，关键是这几年我们要把经济搞活。

（三）“七五”计划要突出电力。我原来讲过，能源、交通要围绕着电力，我们现在经济建设的主要矛盾还是电力不足。现在还是要突出电力建设。交通很重要，但是主要是电。像坑口电站就没有交通问题。交通也不是没有潜力。另外，交通结构是个大问题。这几年我们中国交通结构没有搞好，主要是条条为主，铁路系统要搞铁路，公路系统要搞公路，不是考虑整个运输网，这也是重复建设，浪费很大。现在我们要突出一个公路建设。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今年人代会期间，有个政协委员，我找他谈话，他要在广州修高速公路。这个人是香港的地产企业家，五十多岁，很有点魄力，他讲话不会外交辞令，直来直去。这次我跟他谈了谈，探讨交通问题怎么搞，他就跟我当面讲了，交通啊，你们的指导思想我看还是三十年代的指导思想，因为我还是讲铁路怎么搞，煤怎么搞。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没有研究，现在外国、发达国家为什么铁路会衰退？三十年代，铁路景气；进

入四十年代以后，铁路就衰退了。你为什么不研究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外国铁路都衰退了，你还在这里搞铁路？他这个话很有道理，我们是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啊！他然后就跟我讲，他说一条高速公路等于五条铁路，高速公路加集装箱优越性很大。但必须有个条件，就是货运很紧张的地方，而且不是单一的品种，光是运煤还是铁路划算。我后来听说我们哪个综合运输研究所有个数据，如果一天有一万辆载重汽车通过，修高速公路比修铁路划算得多。所以，至少在长江三角洲，在沈阳、大连、广州，在珠江三角洲，要搞那么几条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最大的好处是在工厂把集装箱装上去，哪里需要就运到哪里去，没有什么中转环节，损耗可以减少。用铁路运输，从首钢到西直门外，要两天到三天，如果用大吨位汽车，那只用几十分钟就到了，差多少啊！所以在运输结构上，海运要发展，河运要发展，特别是公路要发展。公路一定要提高质量，提高公路质量是非常划算的，可以节约能源。

（四）我们国家“七五”规划以后的发展战略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家，一个是要搞新兴工业，一个要搞传统工业，一个要搞第三产业。因为我们国家大，有不同层次的结构，当然各地方不完全一样，像上海、沿海，它们的新兴工业就要多一些，但我们考虑的重点，是用新兴工业的技术改造老企业。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条。这次张劲夫同志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个厂，机械也不太行，他们就是加了一个数控机床，加了一个电子计算机，马上质量就不一样了。

我在这里想着重讲一讲第三产业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到处是第三产业不够，第三产业是容纳人员最多的。昨天黄璜同志讲，人家到黄山旅游，吃的、住的还很困难。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多人去，本来是最好的发财机会，但是没有人去发这个财。你一开始不能盖大饭店，可以先盖小饭店嘛。我这次在路上给黄璜、袁振同志讲，去年国家给北戴河一百四十万元，今年也只有二百八十万元，他一下子宾馆也盖不起来。那里的老百姓就搞旅馆，已有二百家，四千个床位。我访问了三家，三个月的收入就是六七千元。这些小旅馆一个床位一天两元，一间不大的房子可以摆四张床，稍大的可以摆六张床。这样一间房子一天收入八元到十二元。服务项目也在增加，有的打算买彩电，看一场收几分钱。我还看了一个旅游户，搞了太阳

能洗澡间，不用烧火，洗一次一毛钱，真发财呀！现在旅游是热门啊，谁搞谁发财。但是我们国家搞就赔钱，主要是价格搞得太死。我对北戴河的同志讲，你北戴河要大搞第三产业，一个为港口服务，一个为旅游服务，你们是小城市，怎么搞都不影响大局，可以变来变去，随行就市，只要买者愿买，住者愿住，卖者愿卖，就可以。这样一搞就活了。

工矿区搞第三产业也有很多门路，可以养活很多人，解决就业问题。这方面我们过去想得很单纯，没有重视发展第三产业，所以老讲就业困难。其实不仅旅馆、饭馆，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搞，除了商业以外，在服务业方面，比如城市双职工现在洗衣服都很不方便，但是没有人去帮助洗，为什么不能组织搞洗衣服呢？我最近在北京讲，中国要大搞出租小汽车。这个谁搞了，肯定发财。现在职工送个病人，老婆半夜生孩子，老人出门，都很不方便，搞出租小汽车呀，只要一招手就来了，那肯定赚大钱。这个不仅在城市，将来发达的农村都可以搞。（王光宇⁵同志；现在有的供销社搞了出租彩车，谁娶媳妇谁用。）这是个开始嘛。这个搞起来肯定方便群众。同时，现在老百姓有钱没有地方花，都存到银行，这样搞他不就花钱了？也就是增加了消费了嘛。将来还有信息服务。现在外国各种各样服务性公司多得很，都养了很大一批人，这都是第三产业，为大家服务的嘛。

发展食品工业是个大事，这方面的路子非常宽广。黄璜、王光宇同志都讲了这个问题。我看安徽发展食品工业的条件很好，问题就是要搞先进技术设备，搞开发中心，不能光停留在生产传统食品上。你们有丰富的原料，可以加工出很好的东西。要由低逐步到高，不能一下子好高骛远。有些太高级的东西，现在也卖不出去。但是按这个路子走下去，将来肯定前途无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搞第三产业的占百分之七十，搞工业、农业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他们还讲，下一个社会是“服务社会”，有的叫“信息社会”，像美国、日本等国家，将来就可能不多搞工业、农业生产了，主要靠第三产业，为其它国家服务，赚这个钱就够了。过去讲工人有蓝领阶层、白领阶层，将来蓝领阶层越来越少，白领阶层越来越多，坐在办公室工作了。我们国家既有新兴工业，也有传统工业，过去对用新兴工业改造传统工业，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重视不够，同时传统观念上也有问题，许多人不愿意搞这个事情，现在慢慢有点转变。我有个孩子，可能要去饭店里

面的餐厅部工作，带个头嘛。第三产业大有作为。当然，要由低档到高档，农村乡镇企业不能搞那么高级的东西，而是要面向农村市场。现在，我国的食品真正经过工业环节制造的不到百分之十。将来，人民购买力提高了，他就要买制成品。外国食品中，一般都是制成品。现在我们也有了方便食品了。我认为将来就业没问题。农民就业，除了种粮食，就是挖矿、筑路，搞轮换工，去造林，去养鱼，搞乡镇企业，搞建筑材料，等等。在城市，我看主要就是搞第三产业。乡镇也要搞第三产业，现在乡镇群众在很多方面都不方便，放个电影都没有地方。目前，我们发展经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价格搞得太死了。由于这方面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服务行业、公用事业都是亏损企业，没有活力，谁办谁赔钱。但是，要调整价格，特别是对一些东西涨价，很不容易，往往要挨骂。过去有一段时间，广州骂得也很厉害，后来逐步搞活了，东西上来了，现在都讲好话了。解决这方面问题，上海要困难一点，我跟陈国栋同志讲，你这个班，别人是不好接的呀，你什么价都不敢涨，什么东西都比全国便宜，这怎么得了？这样搞发展不起来。群众的生活水平要逐步提高，有一些公用事业我们要随行就市，公园也好，煤气也好，不要搞得那么便宜，但也不能提得太高。你使企事业有了活力，能够获得利润，有了收入，国家不干，集体可以干；集体不干，个人也要干，结果是大家都一起干。现在是国家不干，没人干。例如，现在一些城镇洗澡还排队，建成一个澡堂子要上面给多少钱，这是一种把自己捆死的办法。对这一类事，地方上要大胆一点，广州、福建都敢干嘛。

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这个问题讲简单一些，讲几个观点。我们农村的改革非常成功，正在完善，向广度、深度发展。现在我们主要是搞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的中心是企业活力问题，使企业都活起来。企业活了，什么都好办。我们讲要搞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征之一，就是使企业有活力，或者叫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我们就是要搞这么一个社会主义。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一个教训，就是没有活力，搞得死气沉沉。对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下定义，要概括很多条，其中有一条，就是企业要有活力，没有活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我们搞改革就是要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这就要解决企业自主权问题，使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还要解决好企业内部的各种问题，包括企业利益、职工利益、企业经营同个人劳动挂钩等。要真正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可不简单，必然要涉及到现行体制的一些重大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三大问题：

（一）计划体制问题。在计划问题上有几个观点要讲清楚：首先，中国现在还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第二，我们所说的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市场调节，只是指的那小商品、小企业，不关系国计民生的。盲目的、自发的调节，这叫做市场调节，“为辅”只是指的这一部分。我们有个口号，叫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三，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而指导性计划，主要是通过价值法则来实现的。这是最重要的观点。通过价值规律，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计划，不是通过指令，而是通过指导来实现计划。这个观点同过去相比是个大变化。将来这个问题作了决议后，在中国是个创举。我们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只能是越来越少，指导性计划应当是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价格手段、经济手段、通过信息来实现我们的计划。这将越来越成为我们的主要手段，越来越成为主要的部分。

（二）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计划和运用价值规律是一个统一的东西，不是矛盾的东西。不能把计划和价格看成是对立的东西。运用价值规律，这个比谁的讲话都灵。哪些东西供应紧张了，把价格一提，马上就不紧张了；你说哪个东西多了，卖不出去了，把它降一点价，马上就卖出去了。你说你要优质产品，把优质产品价格提一下，马上优质产品就多了。如果不懂价格，天天讲提高产品质量，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但至少是事倍功半。要是运用价格手段，运用经济调节手段，那就事半功倍，不用操那么多心。过去讲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我个人认为恐怕不科学。它们不是老大老二的关系，价格是实现计划的主要手段。当然，我们是公有制，也正是由于我们是公有制，计划占主导地位，就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价值规律完全盲目地、自发地起作用。我们是可以加以运用，加以调节的。斯

大林讲过价值规律不能创造，但是，我们能够运用它，限制它的消极作用。我想从缩小指令性计划开始，然后再来加强经济调节手段，这是计划改革的两个要点。要增加企业活力，就要改变计划体制。

企业权力扩大了，独立自主经营了，计划体制又改了，下面的问题，就是对价值规律的运用。我们必须注意运用价值规律，运用以价格为中心的经济调节手段。企业自主权扩大了以后，又让它利益和职工挂钩，肯定是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作为企业来讲，那很简单嘛。你总不能当一个经理、厂长，利小大干，无利大干，利大小干，这不可能啊。问题是我们对利大利小要调节得合理，这个东西如果跟不上去，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前进。因此，现在集中的问题是个价格问题。当然，价格体系很复杂，解决价格问题要很慎重。目前，我们暂时用税收来调节，用税收的办法来缓解价格的不合理。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从现在起，真正把价格体系的改革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用几年的时间，把价格搞合理。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最后要看价格体系改革。如果价格体系的改革没有搞好，我们的改革也很难发展、很难成功。这是外国人的以及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大家都感到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了。我们中国的价格体系的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社会很需要的东西，它可能价格很低；社会不怎么需要的东西，它可能价格很高，就是这么个问题。因此，我们老讲什么长线啦，短线啦，喊了这么多年，问题解决了吗？还是没解决，越喊越差。加强短线、缩短长线，谁听你的？没有用。就是说，我们的价格不能反映供求关系。总之，我们要改革，已经研究定了。怎么改？要去研究嘛，总能研究个办法出来。中国的价格体系改革没有很大的危险，大家不要太怕，因为我们不属于通货膨胀，而属于结构不合理的调整。结构不合理，不可能带来你提我也提，而是有的提有的不提，到一定的时间，它就大体上合理了。

稳定物价，不是绝对的稳定，不是冻结物价。过去把稳定物价看作是冻结物价，这是错误的，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外国人听到中国建国二十多年以来物价没有变动，直吐舌头，讲不可想象。为什么要讲价格，为什么要讲价值规律，我们现在已清楚了，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还是商品生

产，这个价值规律就是商品生产规律。哪有搞商品生产而又不让价值规律起作用呢？这根本就行不通嘛。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总是别别扭扭，我看就是这个问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价值规律就是商品生产的规律。问题是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盲目地在起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地运用它。我看就是这么个差别。过去我们既承认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又不承认价值规律起作用，这不是自己跟自己作对吗？至于价格怎么改，现在还没有现成的方案，正在研究。我们已组织了一个研究价格的班子，新老合作，有老的经济学家、新的经济工作者，还有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今年年底以前要把方案拿出来。我开了一次会，出了一些题目，现在继续在研究。看来有希望，意见比较接近。价格改革的迫切性，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我在那次会上讲了，长期讲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活而不乱的关键问题是合理价格，能够反映供求关系的价格。这是关键，其他的都靠不住。

（三）政企分开，解决条条块块问题。就是要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管理经济，这个问题我觉得社会主义国家也未搞清楚。根本问题是要改变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现在我们的各级政府，都等于是一个大公司经理，各部也是个大公司经理。条条经理、块块经理干涉企业，这个要改，根本问题就是要政企分开，企业独立经营，政府管政策的事，当然要逐步实现。我在国务院常说，我们这个桌子上坐的代表政府的，我是一个，万里是一个，几个副总理也算，另外加个计委，财政部，他们也还算政府，其他都不能代表政府，屁股都坐在他那一边，不是坐在轻纺工业一边，就是坐在机械工业一边，或者坐在他的那个直属企业一边，他不是政府，又有政府的权力，所以就有一个限制别人、发展自己的问题，因此就变成条条块块。这个块块都不是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人家来这里搞企业，然后收税，而是直接干预企业。外国的州长总是设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吸引人家来投资。当然，这要有个长远的规划。我们现在大体是这样的：产品单一的如冶金部，已经变成公司。其他稍微面广的，机械部带了头，下放企业，报上登了，这是个大改革。我说，你只要带个头，你就是国务院对机械工业的总管，可以代表国务院，因为它没有轻重之别了，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了。屁股变了，脑袋也变了。

另外，外贸部政企分开，也开会定了，就是说今后外贸部不管公司了。公司完全自负盈亏，外贸部对全国公司一视同仁，执行政府的职能。交通部改革，书记处会议也讨论定了。交通部将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没有一个自己“亲生的儿子”，它也可以代表国务院。我讲，凡是政企分开的，它就可以代表国务院，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凡是政企没有分开的，就不能给它这个权力。国务院的政企分开，现在还在搞，要把企业都放在中心城市。下一步，还要在中心城市搞政企分开。不然，你放给它，它仍搞政企合一，那不行啊！条条块块不破除，搞商品生产，加快发展中国经济是不可能的。

（四）人才问题。我们要搞这样一套，人才是个大问题。我们原有的知识、经验显然不够了，就是刚才袁振同志讲的，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我们原来会的那一套已经不适用了，如农业就是什么时候栽秧，什么时候收割，催耕催种，工业就是调度等等。作为党委、作为政府，应当管的事情没有管，不应当管的事情管得太多，结果管得不好，官僚主义很厉害。除了官僚主义以外，还有一些人为的问题，在这次整党中，应当很好地揭露一下，抓紧处理一些典型案件。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不改革，国家机关不可能实行根本的改革，官僚主义就解决不了。当然有些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这次整党中，对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还要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官僚主义那么多？因为在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驾驭自己的机构，为机构体制所制约着。

说到人才问题，我们今后不能光要搞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必须注意培养经济管理人才。这个问题很重要。你们现在技术人才很缺，经济管理人才更缺，有些甚至还是空白。袁振同志不是说要办商校吗？就是要抓这个问题，要培养人才，特别要注意培养经济管理人才。这样，从学校就要作些改革。现在课程也没有，教师也没有，讲经济管理讲什么？这里还有个培养师资的问题必须解决，有些方面。我们可以跟国外合作，慢慢形成自己的一套。

还有个金融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银行的作用还要大大扩大。一九八〇年，我刚当总理不久，新西兰总理马尔登⁶来访，我和他会谈，简单说了一下我们的经济改革问题。他说，你这个改革好是好，就是你没

有银行人才。他比我们懂，过去我们不懂这些，现在知道了银行的重要。那次会谈，马尔登还说，我们新西兰银行还是很有名的，我们可以同你们合作，帮你们培养银行人才。

总之，我们的体制改革过去几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整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展望未来，任重道远，还有很多问题。中国人是聪明的。美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苏联一样，但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比较灵活，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比苏联灵活。我们比较注意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就这几年来看，我们的农业改革搞得非常成功，路子越来越明确了。城市体制改革大体上也有个初步的轮廓，包括出发点是什么，落脚点是什么，还要围绕着什么搞，最后大概是个什么结果，或者叫做什么样的模式，通过各地这几年摸索，也逐步清楚了。这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很有希望的。中国很有可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搞得好，对其他国家也是一个贡献。

注 释

1. 黄璜(1933-)，江苏涟水人。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任霍邱县委书记，六安地委副书记，江西省副省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

2. 张大为(1932-)，河北抚宁人。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曾任安庆石化总厂厂长，合肥市市长。

3. 袁振(1917-2003)，山东莱州人。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曾任山东泰西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鞍钢党委第一书记兼经理，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河北省承德市委第一书记，安徽省顾委主任。

4. 苏桦(1922-1989)，安徽全椒人。时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滁县专署专员，蚌埠地委副书记，马鞍山市委副书记，安庆石化厂厂长，安庆市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

5. 王光宇(1919-)，安徽霍邱人。时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任皖东北区委书记，阜阳地委书记，安徽省委秘书长、农工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书记、副书记。

6. 马尔登(Sir Robert David Muldoon, 1921-1992)，新西兰前总理。爱尔兰移民后裔，19岁参军，曾参加过二战盟军太平洋战争的一些重要战役。

中国科技大学要为国家建设输送更多人才*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

科大办得好，教育改革、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很有成绩，科大在教育改革中要更上一层楼。人才问题是发展经济的重大问题，缺乏人才的问题不解决，经济建设是无法发展的。科大要为国家经济建设输送各方面的人才，当前要着重培养应用技术方面的人才。

科大有多少系？（答：共十三个系，六个理论系，七个应用系。）发展新技术学科好。科大学制几年？（答：五年。）许多外国人说五年长了，搞四年好。国家急需人才，学生毕业，做两年工作再学习。科大什么时候实行五年制的？（答：创办时即是五年。）一直五年，就不要改，六年太长。（答：六年是缩短，包括研究生学习的两年。）那不能搞六年的呢？（答：一部分不适宜作研究生的仍五年。）（汇报到青年教师要接老教师的班，新兴新学科要年青人去搞时，）赵总理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要年轻人去搞新的。

在科大，赵总理首先来到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在听取汇报后，赵总理说：“这台加速器是搞应用的，很好”。接着问：“什么时候能够建成？”回答：“一九八八年可以建成。”赵总理重复好几次说：“一九八八年建成，四年时间，好！建成后是否马上可以应用？”回答：“建成后即可应用。”赵总理点头说：“好！加速器建成了是你们自己用，还是全国用？”赵东宛

* 这是赵紫阳视察中国科技大学时的谈话。

插话：“是全国用的。”赵总理说：“好，要全国用。你们是否派人学习去了？”答：“已派人出国学习，有的已回来了，正在这里工作。”赵总理满意地说：“要提前培训人才，否则建成了没有人做实验。”

在参观时，赵总理问：“你们自己有加工力量吗？”并多次强调说：“你们要注意，关键的、重要的设备可以引进，只要划算就进口，不要什么都是自己做出来的才叫自力更生，不要沽名钓誉。关键的东西，我们用外汇买进来也是自力更生，因为外汇是我们自己用劳动挣来的。”

赵总理问：“你们这台直线加速器是全国最大的吗？”回答：“是全国最大的电子加速器之一。”当汇报到台湾也在搞这一类加速器时，赵总理说：“台湾主要与你们比，而不是与北京比，是吧？！”

参观时赵总理问加速器总工程师何多慧：“你们的钱落实了没有？”何多慧说：“国家计委正在办审批手续，这七千万元还得赵总理您批！”赵总理说：“我批，我批，给钱就是了。”

赵总理来到科大新建的教学大楼接见少年班学生。在一片热烈掌声中，赵总理健步走上讲台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和小朋友大学生打交道，很高兴。”然后指着八三级学生周峰问：“你是哪儿来的？今年多大？”周峰回答：“来自江苏海安县，今年十四岁。”接着赵总理又关切地询问了几个同学家在哪里，想不想家，生活会不会料理。

赵总理问同学：“小朋友上大学吃得消吗？”当前排同学回答吃得消后，赵总理满意地点了点头。赵总理接着又幽默地问了一句：“要不要保姆啊？”教室里顿时一片欢声笑语。

校领导和少年班班主任简要地汇报了少年班情况：少年班自一九七八年创办以来共招收八期智力超常的少年大学生 279 人，头三届毕业生 117 人中有 81 人考取了国内外研究生。今年又招收 48 名高考平均成绩 533 分的少年大学生。当汇报到十六岁的干政已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谢彦波十五岁时考取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生时，赵总理问：“他们都学高能物理吗？”回答：“不是的，前几年少年班学物理的多一些，这几年同学们开始转向应用学科了。今年少年班还开设了软件专业。”赵总理说：“这就对了，要搞电脑。”

赵总理接着指出：“我们要注意搞应用，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然现

在同时也要搞些基础研究。把我们的智力用在四化上，一个目标就是本世纪国民经济翻两番。下个世纪再奋斗几十年，站到世界前列。本世纪只要翻两番，那时教育科技不仅要大搞应用，也要大搞基础。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如果不这样办，就不会有那么好的效果。但是，我不反对搞基础，不要误解，也不是都搞应用。”

赵总理称赞少年大学生们说：“你们这些人，照中国过去的说法叫‘神童’，智力发展早，成才也比较早，特殊材料，不简单。将来各个领域、各个岗位都要有年轻的科学家做出贡献。你们少年班一开始大家就认为比较好，前几年有些议论，经过这几年实践证明，这样搞是对头的，要继续办下去。中央很关心你们，胡耀邦、邓小平同志很关心你们，我代表他们来看望你们，并向你们问好！”（热烈鼓掌）

“你们正处在发育时期，照理讲是应该多运动少读书，要特别注意身体，以便学成本事能有更多时间为国家做贡献。你们智力发展很早，学习也好，如果将来身体不好未老先衰就不好了。建议你们（指学校领导）不要把他们的课程压得那么紧。”

赵总理题词勉励少年大学生们：“希望少年大学生同学们为迎接新的科技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题完词，赵总理又补充说：“没有写完全，我的意思是在前面加上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将来请校长解释清楚。”

赵紫阳总理为中国科技大学题词：“希望科技大学在教育改革中更上一层楼！”

在江西考察听取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

本来想在江西多呆几天，自从到北京后还没有来过江西，从来没有到过安徽，这次在安徽呆了八天。我现在出来有一个困难，先要看外事安排。我和耀邦同志有个约定，出来了，只要没有外事活动，我就不回北京。先念同志十一号回北京，我必须赶回去接。

一路上，栋材¹、增益²同志介绍了江西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也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地方。总的看，江西的形势很好，也有不少新鲜经验。我完全相信，江西今后的发展速度会更快一些。过去耀邦同志对你们说过一句话，（栋材同志：耀邦同志说江西干部的进取心要更强一点。）总的是希望你们搞得更好一些。从栋材、增益同志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江西今年的工作搞得相当活跃。接触了几个单位，感到现在干部、群众都在想问题。景德镇是个老城市，要考虑采取什么政策、措施来改造。贵溪冶炼厂、洪都袜厂的改革想法都是好的。洪都袜厂把科学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责任制这三个东西都结合起来了，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自己的特点，我看可以总结一下。还有江西宾馆的改革是成功的，效果是好的。对外开放搞得不错，你们那句话（指“解放思想，门户开放，互惠互利，甚至让利”）很好，围绕开发资源，引进技术，引进资金，这恐怕是国内搞活经济的一个重要形式。你们提出解决两条短腿，克服两个不足，这些想法都是很好的。省委对经济情况的分析，提出的战略设想和发展方向，都是正确的。总的感觉，江西的工作比较活跃，过去不很清楚。

现在全国正在抓两件大事，一个是整党，一个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

也有两件事，就是改革和开放。整党，我理解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通过整党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得到更好的贯彻，提高各个单位贯彻执行的自觉性；一个是彻底否定“文革”，消除“文革”产生的派性、隔阂、恩怨，增进团结。这两个问题的意义都很大，一个是路线问题，一个是团结问题，我在安徽也讲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党的“七大”也主要是解决这两个问题，当时解决团结问题，主要是消除山头、宗派，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这样党就会兴旺起来。很明显，一九四五年以后，我们党发展很快，胜利地进行了解放战争，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这次整党搞好了，就一定会大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里我着重说一下彻底否定“文革”，最早是军队提出来的，尚昆³同志在军队有个讲话，中央书记处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提得很好。中指委第九号通知开始没有这个内容，后来加上了这一条。彻底否定“文革”的意义，主要是要消除派性，进一步促进团结，达到团结的目的，不是要把“文革”中的问题重新翻腾出来。因此，彻底否定“文革”，我认为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消除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派性影响，多作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文革”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有的人往往容易想到自己正确的一面。要消除派性，就要避免再分什么谁正确、谁错误。江西“文革”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要紧紧掌握这个原则，就是彻底否定“文革”，是为了消除派性，消除隔阂，进一步安定团结，不能把“文革”中的问题再翻腾出来评个是非。

经济建设的问题，中央最近议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七五”计划的方针问题，较为重要的是要在原有企业基础上改建扩建，当然不是讲新的项目一个不搞。现在看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总的讲，我们经济建设的布局展开了，有一个很大的摊子。因此，“七五”计划不是要搞一个新的布局，新的摊子。要做到投入少，产出多，也要求改造原有的摊子。如果我们丢下原有的企业不管，去搞新的，恐怕等新的搞起来，老的也差不多了。老企业的潜力很大，煤炭也好，铁路也好，钢铁也好，各个方面的潜力都很大，今后主要是搞技术改造、改建扩建，当然不是完全不搞新的。铁路光讲通车里程不行，现在一条铁路的年通过量不过

二千万吨，经过改造至少可达七千万吨，差多少呀？鞍钢在目前这个基础上改造一下就可以搞到一千二百万吨。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周期短，投产快。资金的概念，没有建设周期，概念是不准确的。一个项目，周期十年，投资十亿元；另一个是八年，投资也是十亿元，另产出三亿元，这实际上只花了七亿元。另外，中国由于商品生产不发达，经济建设普遍没有利息观念。今后基本建设将有个改变，项目定下来后，就一次拨款，拨到建设银行按工程进度付款，基建年度不受限制，主要控制总的概算。为什么要讲挖潜力改造？至少可以周期短一些。周期短，受益就快，相对地讲，就节约了投资，这是“七五”计划一个重要的方针。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消费品工业的问题。在我们国家，搞高工资、高消费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但低工资、低消费，抑制消费也不行。过去这样做，把很多可以成为经济支柱的产业变成了福利事业。外国人很羡慕中国的市场，而我们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市场，害怕市场购买力，不是利用市场购买力来促进经济发展，像房地产、食品、建筑业、各种服务业发展不快，这个大家都感觉到了，特别是第三产业是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把人民的购买力压得很低，积累资金用于基本建设，基本建设又往往用之不当，所以就搞得很穷。我们国家大，市场大，要适当地注意消费，自觉地运用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交通结构在我国问题也比较大，这与过去的部门所有制有很大关系。搞铁路的只搞铁路，搞公路的只搞公路，铁路、公路、水运等都没有形成综合运输网，花了很多冤枉钱。空运要发展，水运要重视，铁路要挖潜，但是要特别注意发展公路。美国过去建了很多铁路，后来拆了不少，改建公路。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像英、法等，公路发展，铁路倒萧条。中国不能走人家的老路了。我们国家公路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一是质量差，二是车型小，再是铁路运费太低。搞高速公路，加上集装箱，一条高速公路每年货运量可达一亿吨，等于我们现在五条铁路，而且中间环节少，时间快。首都钢铁公司从西直门运货到厂区，用火车得花两天，可是用汽车运顶多半小时。今年人代会期间，香港一位代表提出要建高速公路。我说我们国家幅员辽阔，铁路少。他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对交通的指导思想还是三十年代的。他说，高速公路比铁路划算得多。我们自己组织专家算过账，结论和他的一样。襄渝铁路投资花了三十七亿元，一年

货运量不到一千万吨。还有水运问题，我们有很长的海岸线，但过去修铁路一搞就是南北线，为什么不搞东西线通到海边，再搞海运？秦皇岛就是可以通九江嘛。过去我们不注意运输结构，这也是“七五”计划方针方面的问题。

改革问题我不准备多讲。中央确定十月中旬开三中全会，主要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文件已经起草好了，我先在这里吹吹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围绕解决企业的活力为中心的。要使企业有活力，就要扩大它的自主权，建立经济责任制，不吃“大锅饭”。要解决这些问题，又涉及到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第一是计划管理体制；第二个是运用价值规律、价值法则；第三是改变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即实行政企分开。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城市经济改革就搞不好。中国是什么样的计划体制？第一中国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第二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三是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在我们国家，指令性计划不能多，范围要逐步缩小。指导性计划主要不是靠指标，是靠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实行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就要运用价值法则。因此，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要充分注意价值规律、价值法则的运用，这就涉及到价格问题。价格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合理的价格，就很难做到活而不乱。所以价格体系的改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经济改革的最后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价格问题的解决。我们价格体系的调整，属于结构性的调整，调整价格不会引起物价失控、通货膨胀，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我们的价格不合理，调整到一定程度就会合理了。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谁讲话都没有价值法则灵。新疆羊毛为什么一百斤有四十斤沙子？还不是价格不合理！煤炭中含煤矸石的问题也是因为差价小，我们统统都是讲原煤，没有按质论价。广东和你们赣南种甘蔗，群众就喜欢种糖分少、产量高的品种，但澳大利亚就是按含糖多少论价。所以说，价格不合理，浪费了很多社会劳动。如果羊毛有沙与无沙的分开论价，煤炭按大卡、甘蔗按含糖量论价，我看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目前工业企业都面临一个产品质量问题，质量好的可以提价，不好的就要降价。“利大大干，利小小干”，你说它不合理？如果没有利还生产什么？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问题关键是一个价格问题。价格

不合理，什么思想政治工作都不行。价格体系的改革，虽然难度大些，但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要讨论这些问题。改变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实行政企分开，还要解决条块问题。

调整价格，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的，粮食最能说明问题。价格上去了一点，生产发展了，东西多了，调整到一定程度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路子，一是放开，小商品放开，大产品计划外的放开；二是国家计划管理的价格正在作逐步调整。当然计划管理内的调整要和工资改革结合起来，按物价指数调整工资。

我在北京讲过，我们的改革，就是要解决各个企业、各个单位、每个人都有活力的问题，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这至少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

注 释

1. 白栋材(1916-2014)，陕西清涧人。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曾任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吉林省工委书记、组织部长，江西省委第三书记兼南昌市委书记、市长，江西省委书记、省长。

2. 赵增益(1920-1993)，山西平定人。时任江西省省长。曾任二野三兵团作战处处长，昆明市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省顾委主任。

3. 杨尚昆(1907-1998)，重庆潼南人。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秘书长。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后方委副书记，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 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

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同志：

去年八月六日，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出了十个需要调查研究的题目。向政治局常委报告后，常委各同志都有指示，肯定了进行调查研究的必要，也肯定了提出这些问题的思路 and 方向。

按照小平同志批示“希望如期实行”的精神，一年来，各专门小组和有关部委就上述十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议过多次。除电子工业发展纲要尚待进一步组织讨论外，其他九题都已理出一些头绪。

具体的进展情况是：（1）引进人才工作正在逐步开展。（2）建筑建材业和食品饲料业的发展纲要，已有一些初步设想，拟通过编制“七五”规划，进一步研究并加以落实。（3）在讨论提高企业素质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条规定，已于今年五月公布实施。（4）利改税，去年已实行第一步，第二步也有了实施方案，待人大常委审议批准后，即可在今年第四季度全面推行。（5）计划工作改革（第一步），价格改

* 赵紫阳在这封信中就中国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和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三个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建议，得到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胡耀邦、陈云、李先念的一致赞同。后来，赵又在这封信的印刷稿上明确批示：“‘计划经济为主’的‘为主’两字可考虑删去。”他的这些重要意见，为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目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革(今明两年),外贸体制改革,劳动工资改革已有初步设想;机关工资改革正在草拟具体方案。(6)除了十个问题以外,在此期间,还讨论了建筑行业体制改革、机械行业体制改革和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分别形成了一些文件,正在付诸实施。

一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是从提高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出发的。以利改税作为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利于解决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关系,使国营企业逐步做到自负盈亏,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得以稳定增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可能避免大的社会震荡,较为平稳地顺利推开。

下一步,是要具体落实“扩权十条”和其他业已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由于经济体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看来,有以下三个原则问题需要进一步确定,以便在统一的方向下,使各项改革配起套来,互相协调,尽量做到同步进行。

第一个问题：计划体制问题

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关于这个问题,《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已有原则规定,现在需要进一步加以具体化。根据多年和这一段的实践,反复考虑,建议把我国的计划体制概括为以下四层意思:

(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二)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三)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我国幅员辽阔,现代化手段不发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

(四)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

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应该如实地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

看来，明确以上四条，可以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既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相区别，又不与苏联模式雷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但苏联模式清规戒律太盛，把企业捆得死死的，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企业失去了活力。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企业有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应该是自觉依据并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

第二个问题：价格改革问题

这个问题，必须同计划体制改革配合起来考察。放，绝不是撒手不管。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比计划指标灵得多，这已为多年来的实践所反复证明。价格不合理，必然给人们以错误的信息，引导企业走上错误的方向。过去“一放就乱”的症结正在于此。今后要做到活而不乱，关键是要有合理的价格体系。因此，计划体制改革的步子到底迈多大，也不能以主观愿望为转移，而应取决于价格改革的进程。

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同类商品内部，质量有优有劣，差价没有拉开。这个问题对社会效益影响极大，但不难解决。完全可以在稳定该类商品总的价格水平的前提下，积极拉开档次。第二个层次是不同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特别是煤炭、生铁、木材等初级产品（同时也是短线产品）与加工产品的比价不合理。

第三个层次是同类商品的购销价格倒挂，主要是粮食和油料。第四个层次是房租等公用设施收费过低，使这些本应成为经济支柱的产业无法发展，甚至趋于萎缩。后三类问题比较复杂，但都必须解决，也有办法解决。现在正在进行论证，年底以前有可能提出改革的方案和大体的步骤。

除了调整价格体系以外，还有一个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现在小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粮棉除了集市贸易价格以外，计划收购价格和超购加价已合并为一种价格（比例价格）。燃料和原材料过去是一种价格，现在已出现多种价格（国家规定的价格和企业超产自销的价格），将来的趋势很可能是：（1）国家定价的范围逐步缩小，放开的比重逐步扩大；（2）国家

规定的价格，通过调整，逐步向市场价格靠拢。这种趋势，大体上将同计划体制的改革相适应。

有一点需要说明：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的比价不合理，而不是由于财政性发行；因此，它是结构性的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在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的条件下，国民党时代那种恶性货币膨胀的现象是完全有可能防止的。当然，在调整物价时，一定要积极慎重，采取负责态度，把工作做细，把生活指数算准，以便同时对工资、社会救济金、储蓄利率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务必使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仅不降低，而且尽可能有所提高。

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一条是计划体制改革，一条是价格改革，这两条奏了效，对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将是又一次大解放，很可能要引起一次飞跃。近几年来，国外许多不同学派的经济专家，都建议我们在适当时候进行价格改革。最近访华的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马尔亚伊同志也说，改革价格最好选在经济发展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现在有此条件，正处在改革价格的黄金时代，而匈牙利则错过了机会。这个论点值得重视。

第三个问题：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在这方面，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这也需要一个过程。准备从外贸商业系统和机械行业开始。实行利改税，加上政企分开，发展经济上的横向联系，条块分割等一系列的老大难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

与此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公司的体制。这几年成立了许多公司，有的办得好，有的办得不好。经验是两条：（1）公司必须是企业性的，不应是行政性的。（2）全国性的公司也不应垄断；而且一般不宜过“实”，不应把所属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权收上来。主要的经济实体应是大企业，应以大企业为基础，以城市为中心，在互有需要的基础上发展企业之间的横向

联系，进行改组联合，可以是紧密的联合，也可以是松散的联合。不符合这两条的，要进一步改革。

以上三个问题，都涉及方向、原则，对今后改革关系较大。现将一些看法报告如上，当否，请指示¹。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

注 释

1. 中央政治局常委看过赵紫阳的这封信以后，分别作了批示、复信，或就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

邓小平批示

我赞成。这个文件可印发三中全会，连同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并讨论。

邓小平

九月十日

陈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给赵紫阳的信

紫阳同志：

你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我完全同意。

关于计划体制的四层意思，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了。因此，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即使在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们采取的是分步骤进行，即从“加工定货”直至“定息”的做法；对资本家、小店主、小摊贩，采取的政策也不相同。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年并不是这样做的。

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上次化纤降价，棉布提价没有引起社会震动，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

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领导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有时间议大事，加强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

这几年，农村的改革已取得极大的成功，城市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因此要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务使改革健康发展。

以上供你参考。顺致
敬礼！

陈云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三日

李先念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给赵紫阳的信

紫阳同志：

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很好，概括了这几年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我都同意。这三个问题确实是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了，将会大大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价格改革。我国的计划经济，要自觉地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很需要把价格体系改革好。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逐步成熟。看准了，就要抓紧进行。虽然价格问题很复杂，很敏感，但是又非改不可。只要设计周密，价格结构合理，步子稳妥，就会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推动经济的大发展，得到人民的拥护。

以上意见，供你参考。

李先念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

胡耀邦关于物价问题的重要批示

一、课本可以适当提点价，但只能限于“保本微利”，绝不许在小孩身上赚钱。这一条务必同各省市同志说清楚。出了乱子要追究责任。

二、过去由于我们没有经验，物价全由国家统一定，因此谈不上按价值规律办事。今后物价怎么管，国家只管什么，地方能管什么，三中全会决定会有明文规定，大家必须遵守。

三、中央已决定要有步骤调整物价，这是正确的决策。但到了某些同志面前，就以为什么都要涨，有些部门的同志正在计划涨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不下苦功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甚至是一股准备出笼的歪风。大家要警惕。

胡耀邦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

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这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经过了几年的酝酿和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那次全会以后，全党在拨乱反正和调整国民经济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在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近两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推动了各项改革的广泛深入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

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目前农村的改革还在继续发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这种形势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开拓市场，同时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几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使经济生活开始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是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目前，城市企业经济效益还很低，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的种种损失和浪费还很严重，加快改革是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只有坚决地系统地进行改革，城市经济才能兴旺繁荣，才能适应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需要，真正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还应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

当前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国家财政状况逐步好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大为增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愿望更加强烈。特别是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全面整党的健康发展，已经和正在端正各条战线现代化建设的业务指导思想，明确改革的方向。现在，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利于统一和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认识，使改革更加卓有

成效地进行，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进一步得到发挥。中央希望并且相信，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行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那样，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必将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

二、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一百多年人民灾难深重的历史，消灭了剥削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我国各族人民从长期的历史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必然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建国三十五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

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原来为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大会前后，党中央特别是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某些改进措施。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经验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特别是由于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结果就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

其间多次实行权力下放，但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中央认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要消灭贫

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必须下定决心，以最大的毅力，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愿望。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

三、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现在，我国城市企业，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商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已有一百多万个，职工共达八千多万人。仅城市工业企业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城市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八千多万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就是说城市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活力，对于我国经济的全局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对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关键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所以，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围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为了使各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必须通过计划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通过税收等形式从企业集中必须由国家统一使用的纯收入，委派、任免或批准聘选企

业的主要领导人员，并且可以决定企业的创建和关、停、并、转、迁。但是，由于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企业条件千差万别，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错综繁复，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这些情况。如果全民所有制的各种企业都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和管理，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压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理的前提下，企业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这样做，既在全体上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统一性，又在局部上保证各个企业生产经营的多样性、灵活性和进取性，不但不会削弱而且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又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生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正确解决职工和企业的关系，真正做到职工当家做主，做到每一个劳动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工作，人人关注企业的经营，人人重视企业的效益，人人的工作成果同他的社会荣誉和物质利益密切相联。现代企业必须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生产指挥，必须有高度严格的劳动纪律。因为我们的现代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行这种集中领导和严格纪律的时候，又必须坚决保证广大职工和他们选出的代表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领导者的权威同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是统一的，同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发挥的必要前提。

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方面的正确关系，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要实现这个基本要求，势必牵动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需要进行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国家机构

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中央认为，这些改革，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别轻重缓急和难易，有先有后，逐步进行，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达到这个目标的步骤，另行部署。

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使生产符合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建国以来，我们实行计划经济，集中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应该是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制。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考虑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完全改变，考虑到我国目前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实际情况，建立这样的计划体制的需要就更加迫切。如果脱离现实的国情，企图把种种社会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并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在计划的指导思想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计划同实际严重脱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在制订电气化计划的时候产生这样的思想：“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今天我国同当时俄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的实践证明列宁的这个思想不仅适用于当时条件下的俄国，而且具有长久的意义。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是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

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应该对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进一步作出如下的概括：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按照以上要点改革的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计划工作的重点要转到中期和长期计划上来，适当简化年度计划，并相应改革计划方法，充分重视经济信息和预测，提高计划的科学性。

五、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他历史原因，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不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就不能正确评价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不能保障城乡物资的顺畅交流，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就必然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也会严重妨碍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随着企业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价格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调节作用越来越显著，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更为急迫。各项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计划体制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们的成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当前我国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是：同类商品的质量差价没有拉开；不同商品之间的比价不合理，特别是某些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主要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倒挂，销价低于国家购价。必须从现在起采取措施，逐步改变这种状况。

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同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有密切的关系。在调整价格的同时，必须改革过份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 and 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比较好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革价格体系关系国民经济的全局，涉及千家万户，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力负担的可能，在保证人民实际收入逐步增加的前提下，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的原则是：第一，按照等价交换的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不合理的比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第二，在提高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时候，加工企业必须大力降低消耗，使由于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造成的成本增高基本上在企业内部抵销，少部分由国家减免税收来解决，避免因此提高工业消费品的市场销售价格；第三，在解决农副产品购销价

格倒挂和调整消费品价格的时候，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确保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因价格的调整而降低。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工资还要逐步提高。必须向群众广泛宣传，我们在生产发展和物资日益丰富的条件下，主动改革价格体系，解决各种比价不合理的问题，决不会引起物价的普遍轮番上涨。这种改革，是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迫切需要，是符合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的。一切企业都应该通过大力改善经营管理来提高经济效益，而决不应该把增加企业收入的希望寄托在涨价上。决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任何人趁改革之机任意涨价，人为地制造涨价风，扰乱社会主义市场，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我们过去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推动经济运行，而长期忽视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学会掌握经济杠杆，并且把领导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一方面来，应该成为各级经济部门特别是综合经济部门的重要任务。

六、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

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就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能。建国三十多年来，总的来说，我们的国家机构履行了这方面的职责，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国家机构特别是政府部门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以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是一个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过去由于长期政企职责不分，企业实际上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揽了许多本来不应由它们管的事，而许多必须由它们管的事又未能管好。加上条块分割，互相扯皮，使企业工作更加困难。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可能发挥基层和企业的积极性，不可能有效地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联合和竞争，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而且势必严重削弱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应有作

用。因此，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是搞活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

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计划、方针和政策；制订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的方案；协调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发展计划和经济关系；部署重点工程特别是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汇集和传布经济信息，掌握和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制订并监督执行经济法规；按规定的范围任免干部；管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等等。这些职能，需要各级政府付出极大努力来履行，而过去有些没有做好，有的还没有做。但就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说，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至于少数由国家赋予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责任的政府经济部门，也必须按照简政放权的精神，正确处理同所属企业的关系，以增强企业和基层自主经营的活力，避免由于高度集中可能带来的弊端。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公司，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互有需要的基础上建立的联合经济组织，它们必须是企业而不是行政机构，不能因袭过去的一套办法，而必须学会现代科学管理方法。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在进行这种改革的时候，有必要提起各城市的领导同志们注意，城市政府也必须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不要重复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老做法，以免造成新的条块分割。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整治，指导和促进企业的专业化协作、改组联合、技术改造和经营管理现代化，指导和促进物资和商品的合理流通，搞好文教、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各项服务事业，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搞好社会治安。同时，城市政府还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当地的条件，做好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互相协作、互相支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排斥竞争。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竞争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其实，只要有商品生产，就必然有竞争，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制度

下竞争的目的、性质、范围和手段不同。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根本不同，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计划和法令的管理下，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优胜劣汰。这样做，有利于打破阻碍生产发展的封锁和垄断，及时暴露企业的缺点，促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各级有关领导机关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加强教育和管理，认真注意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国家立法机关要加快经济立法，法院要加强经济案件的审判工作，检察院要加强对经济犯罪行为的检察工作，司法部门要积极为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改造。体制改了，组织机构和思想作风也要改。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为人民服务 and 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改造机关作风，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改变那种长期形成的领导机关不是为基层和企业服务，而是让基层和企业围着领导机关转的局面，扫除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职责不明、互相扯皮的官僚主义积弊，使各级领导机关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切实转移到为发展生产服务，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为国家的繁荣强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服务的轨道上来。

七、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这几年城市改革的试验充分表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提高广大职工的责任心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在企业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在把农村经验运用到城市中来的时候，必须考虑城市企业的特点，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农村的具体做法。由于行

业性质、企业规模和生产条件各不相同，城市企业实行责任制也不可能有一划一的模式。这就要求我们的同志，特别是企业的领导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适合自己情况的具体形式，使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

现代企业分工细密，生产具有高度的连续性，技术要求严格，协作关系复杂，必须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系统。只有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才能适应这种要求。企业中党的组织要积极支持厂长行使统一指挥生产经营活动的职权，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加强企业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对企业工会、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必须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权力和作用，体现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绝对不容许有任何的忽视和削弱。

随着利改税的普遍推行和企业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的普遍建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将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这方面已经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企业职工资金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自行决定，国家只对企业适当征收超限额奖金税。今后还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挂起钩来。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充分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差别。当前尤其要改变脑力劳动报酬偏低的情况。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要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的原则是使职工工资同本人肩负的责任和劳绩密切联系起来。在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工资制度的同时，还要加快劳动制度的改革。

长期以来在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上存在一种误解，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收入比较多，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就认为是两极分化，背离社会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

会生产力。当然，社会主义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实行社会救济，对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积极扶持，对经济还很落后的一部分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其他贫困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并给以必要的物质技术支援。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的差别，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绝不是那种极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两极分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我们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形成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这个传统。在新时期坚持这个传统，主要是发扬不怕任何困难，为祖国为人民顽强奋斗的献身精神，在各项生产和建设事业中十分注意节约，反对挥霍国家资财的行为，力求避免造成浪费的决策错误，而不应该把坚持这个传统错误地理解为可以忽视人民消费的应有增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是整个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它决定消费，而消费的增长又是产生新的社会需求，开拓广阔的市场，促进生产更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又决定生产。我们一定要在生产发展、经济效益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和正确处理积累消费关系的前提下，使我国职工的工资收入逐步有较大的提高，使人民的消费逐步有较大的增长。不顾生产发展的可能提出过高的消费要求，是不对的；在生产发展允许的限度内不去适当增加消费而一味限制消费，也是不对的。

八、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 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

我们要迅速发展各项生产建设事业，较快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互守信用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对于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决不应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发展为条件。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领域的生产建设事业都可以放手依靠集体来兴办。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不同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当前要注意为城市和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特别是在以劳务为主和适宜分散经营的经济活动中，个体经济应该大力发展。同时，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决不会动摇而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在当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尽管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国际性的经济技术联系仍然很密切，闭关自守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

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今后必须继续放宽政策，按照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实行统一对外的原则改革外贸体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规模，努力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

对外要开放，国内各地区之间更要互相开放。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比较不发达的地区，沿海、内地和边疆，城市和农村，以及各行业各企业之间，都要打破封锁，打开门户，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横向经济联系，促进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合理交流，发展各种经济技术合作，联合举办各种经济事业，促进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的合理化，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九、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 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现代化的经济、技术知识，又有革新精神，勇于创新，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企业管理干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的状况同这个要求很不适应。这支队伍中的大批老同志，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表现出来的优良作风、组织才能和恪守党内生活准则的坚定性，教育和影响着广大中青年干部。但是，他们大都已到老年，不能要求他们再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大胆起用和积极培养成千上万中青年经济管理干部。

应该看到，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整党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和正在成长大批优秀人才。各级党委一定要细心地深入地去发现和考察他们，务必不要为那些过时的老观念老框框所束缚，务必不要搞烦琐哲学、求全责备，务必不要受派性和种种闲言碎语的干扰。只要我们这

样做了，大批优秀干部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当然，中青年干部有缺乏领导经验的问题，但这种经验可以而且必然能够在实际锻炼中逐步取得，决不能以缺乏经验为理由压抑年轻干部。对经验应该采取分析态度。我们的同志在过去革命和建设积累起来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在新时期的崭新任务面前，不论老中青干部，总的来说都缺乏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知识新经验，都要重新认识自己，都要重新学习。那种抱残守缺，老是停留在过了时的经验上的态度，是不对的。

中央要求，在一九八五年底以前完成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是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调整任务，并且订出规划，采取切实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造就出大批能够卓有成效地组织和指挥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厂长（经理），能够有力地加强企业的技术管理、推动技术进步的总工程师，能够切实加强企业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总经济师，能够严格维护财经纪律、精打细算、开辟财源的总会计师，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团结企业广大职工的党委书记，形成一支包括这些人才在内的，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宏大队伍。

中央已经多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行为作斗争，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必须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进行智力开发的积极性，有利于鼓励广大青少年，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速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对有重大发明创造和特殊贡献的，要给予重奖。

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任务。中央将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将在相当广阔的领域内和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展

开。这个改革，关系国家的前途，关系亿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全党同志要站在改革这个时代潮流的前列。改革是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和创新的事业。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这就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持清醒头脑，进行精心指导。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进行，尤其应该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特点。改革中的一切做法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经验。失误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要尽一切努力去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失误。当发生失误的时候，必须力求及时发现，坚决纠正，吸取教训，继续前进。改革的步骤要积极而稳妥，看准了的坚决改，看准一条改一条，看不准的先试点，不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全国性重大改革的实施，由国务院统一部署。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进行改革的探索和试验，但一切涉及全局或广大范围的改革要经国务院批准才能进行。

明年将有更多地方和大批企业的党组织进入整党。改革工作要与整党密切结合起来，以整党促进经济，以经济检验整党。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整党的领导，切实保证整党不走过场。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确的政治生活。在新的时期，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紧密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对于锐意改革的干部和群众，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除了严重违法乱纪者必须依法处理外，都要采取疏导的方针，批评教育帮助的方针，而不要戴政治帽子。改革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和不同理论观点，可以展开讨论。不要在干部和群众中分什么“改革派”、“保守派”，要相信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的同志会在改革的实践中提高认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过五年时间，许多原来抱怀疑态度的同志都在事实的教育下转变过来。中央在指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耐心教育的方

针，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是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极为宝贵的经验，今后一定要坚持这样做。要结合改革的实际，对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生动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充满活力，既区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自觉投身于改革的伟大实践。

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陈规的习惯势力。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同志说过：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生动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人以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反动统治下，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为推翻旧制度而奋斗；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进行改革，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当前改革的形势很好。广大群众在改革的实践中有伟大的创造。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一定能够胜利实现。

团结起来 开创科委工作新局面*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

要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次科委的人事变动，是中央决定的，是正常的调动。不是哪一个同志不能在科委工作，更不是犯了什么错误。现在有人说“谁是谁的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以人划线，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流毒。我们为此已经吃了苦头，绝不能再重复这种错误。我们要看每个同志本人的工作情况，不能是因为与哪一个同志共同工作过，或与哪一个同志关系密切些就不用。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也一定有共同工作过的同志，那么就是他的人？以后绝不许说“谁是谁的人”。谁讲也是不对的。要通过整党肃清这种以人划线的流毒。这种流毒不消除，我们就永无宁日，就无法团结奋斗。坚决不能听这种话。不搞五湖四海，无论是科委，还是全党、全国的工作都是不会搞好的。科委要通过整党，认真学习中央文件，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隔阂，搞五湖四海，团结奋斗。

要给科委的各位领导同志做工作，他们应该自觉地起积极作用，不要把过去的隔阂向新班子传，不要造成一批同志思想不通，给以后的工作增加困难。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起模范作用。希望在团结大多数这个问题上，老同志、领导同志能更自觉一些，否定“文化大革命”，带头消除隔阂。隔阂如果不消除，就不可能团结好，这对科委有什么好处呢？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呢？对他们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希望大家出于公心，加

* 这是赵紫阳在宋健汇报国家科委工作时的谈话要点。

强科委干部的团结。处理问题一定要公正，今后新的班子一定要团结起来开创新局面。

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存在个别问题也是可能的。但是，对干部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要历史地全面地考察干部。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用其所长。好人也会有缺点，有些事，前几年看问题很大，过一段时间看问题就不大了。我劝同志们对别人的缺点不要加码，不要用显微镜找毛病，而对自己则认为一贯正确。我们要持相反的态度，对自己要严格一点，对别人要宽容一些。否则，我们这个党、国家就会无安定之日。把事情搞得很复杂，绝不是好事。

你们以后的工作要有新的起点、新的面貌，不以人划线，要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家，不论是和谁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和谁比较密切的同志，都要看他本人的水平、能力和其他条件。我赞成你独立思考。将来新班子组成后，应该使大家放心，使大家有信心，出现一个团结的局面，对委内、委外都要有一个好的形象。千万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做不利于团结的事，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好。

关于科委的工作方针，要在整改过程中进一步明确起来，科委的任务就是协助国务院管大事，管方针、政策、立法、协调等等。凡是别人、各部委能做的事，你们不要揽权。你们要团结各部委、科学院、科协等一切部门，组织大家共同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不要有亲疏之分。否则，别人是不会尊重你们的。你们科委的方向对头了，形象好了，我们都会高兴，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计委、经委都会支持你们的工作。总之，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要引导同志们向前看，从积极的方面看，要着眼于改革，按照中央的要求，走向正确的轨道，进一步发挥作用，提高科委的威望和办事能力，这是我们改革的目的所在。要引导同志们面向全国、面向未来，团结起来向前看，大家努力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设方针*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九日

最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了“七五”计划的建设方针问题。与此同时，我又先后到辽宁、安徽、江西等地调查，征求了地方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七五”计划中，应当采取以下一些方针。

一、以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为主，充分挖掘潜力

“七五”期间，是我国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我们既要保证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又要为下一个十年经济的振兴理顺关系，打好基础，同时还要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而我们的资金又不足，国家财政仍然存在困难，矛盾比较多。因此，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方针，关系极大。国务院初步议定，“七五”计划基本建设总规模大体上定为四千亿元，每年平均八百亿元。投资就是那么多，能不能解决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矛盾，这就需要从投资少、效益大的方面多想办法。这是在制订“七五”计划时，需要很好研究的总题目。看来在整个“七五”期间以至“八五”前期，必须首先采取这样一个重要方针：坚决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原有企业、原有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凡是能在原有基础上改建、扩建增加生产能力的，就不要搞新建。当然，也不是说不搞新建项目，关系经济全局的重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点项目，还是要上一些，但重点必须明确。这是关系“七五”计划能否搞好的关键。

为什么必须采取这个战略方针呢？

第一，从我国整个生产力的布局来看。建国以后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包括一九六三年以后开展的三线建设，应当说生产力的战略布局已经展开，不论沿海和内地，不论一线和二、三线，工业都有了一个不小的摊子。虽然仍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要逐步解决，但从总体上说，在生产力的配置上，今后一段时间主要不是要再搞一次新的战略展开，而是要在现有基础上着重提高能力，提高水平，把现有几十万企业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从而加快我国的建设。

第二，采取这样的方针，周期短、产出快、效益好。要铺一个新摊子，搞一个新基地，周期长、投资大。改造老基地、老企业，加以改建扩建，有时算也不一定投资少，但最大的好处是建设周期短，不需要一下铺很大的摊子，有不少是边建设、边产出，实际上是很省的。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许多同志不懂得商品生产，也不会搞商品生产。长期以来我们在搞建设、办企业中，缺乏资金周转的观念、利息的观念和投入产出的观念。搞经济工作的同志一般只注意建设项目投资的多少，但是对建设周期的长短、利息的多少、产出的快慢却不重视。这样来计算投资是很不准确的。广东核电站，安装两台九十万千瓦的机组，加上基础设施、安装费用等全部投资是20亿美元，但因为周期是十年，算上利息需要40亿美元。外国企业家搞建设项目，普遍的特点是周期短、产出快。开煤矿，三、四年就开始出煤。如英国帮我们设计的济宁二号井，岩井掘进少、巷道少，三年出煤。他们搞石油化工、搞钢铁等，也不都是从头搞起，而是从生产过程的后面一段或从中间搞起。因为，他们的钱是贷款来的，一开始就要考虑利息和如何偿还。而我们缺乏这个观念。其实，一个建设项目，如投资一亿元，五年投产还是十年投产，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五年投产，加上利息，整个投资就是1.5亿元；投产后如每年获利一千万元，五年就是五千万元，那么实际投资就只有一亿元。如果十年投产，投资过程中完全没有产出，加上利息整个投资就是二亿元。两者差别是很大的。资金必须计利息，这是理所当然的。周期短，利息负担就少；产出快，效益也就好。

我们过去很少考虑这些因素，吃大锅饭，在基本建设的设计和施工上，造成的浪费不知有多大。建设的周期长短、产出的快慢，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周期短，投资少，产出快，国家就富得快。相反，如果周期长，投资多，产出少，就难以富起来。

最近，我到了鞍钢、马钢，对这个方针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鞍钢只要加以改造和扩建，花三十多亿元投资，到一九九〇年钢的生产能力就可以达到八百万吨，很有可能上千万吨，而且基本上可以不停工、不停产，钢产量逐年增加。比起在鲅鱼圈新港附近新建一个四百万吨的钢铁基地，要省几十亿元投资。我们看过的鞍钢第三炼钢厂，采用新技术，将平炉改为180吨的转炉，改氧气顶吹为顶底复合吹炼，一边改造，一边生产，一年要增加一百万吨钢，而且质量、成本都有显著改善。冶金工业系统这几年由于上了宝钢，把绝大部分投资占用了，无路可走，就逼出一条路，对现有企业搞改造挖潜，上质量、上品种，在宝钢没有投产的情况下，钢的产量从三千多万吨，上升到一九八三年底的四千万吨，五年来产量增加近一千万吨，质量品种有很大变化，全行业的能耗也大大降下来。这个经验值得重视。

据煤炭工业的材料，吨煤投资开统配大矿新井是225元，老井改造是120元，地方中小矿是75元。依托老井改造扩建要省得多。煤炭部最近根据国务院确定的方针，在计划中调整了新建和改建扩建大型矿井和中小型矿井建设的比例关系，加大了改建扩建和中小矿井建设的比重，工期短，出煤快。“七五”中基本建设投资由372亿元减少到315亿元，而到一九九〇年统配煤产量将由原来的4.75亿吨增加到5亿吨，地方煤产量将由原来的4亿吨增加到4.45亿吨，全国煤炭产量比原来的计划增加7000万吨，并能确保“七五”期间每年平均递增4000万吨。因为我们的煤炭资源丰富，矿井设计的服务年限一般都是几十年，上百年，这样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说明两种不同的方针，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铁路建设我们过去重视建设新线，这是必要的，但对老线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重视不够。今后应当把改造老线作为重点，这方面潜力非常大。据统计每万元投资新增能力，修新线为七万吨公里，改造旧线为27万吨公里。我国现有铁路52000公里，真正运输繁忙的是几条干线和卡脖子区

段。铁路的技术是相当落后的，认真进行改造，如加强信息管理，采用重载列车，改变牵引方式，提高行车密度，改造站台等，能够使运载量加大，一列货车可以由原来的二、三千吨，增加到四、五千吨。这不是很困难的事。如石(家庄)太(原)铁路，在铁道部调查组的帮助下，采取了三项改造措施，投资一百多万元，只用了四个月时间进行初步改造，年运量就由四千五百万吨提高到六千万吨，增加运力近三分之一，远期的年运量可达七千万吨。要是修一条同样长度、同等运力的新线，就要花投资三、四亿元，时间也要三、四年。

这些都说明，在原有企业的基础上，走技术改造、改建扩建的路子，事半功倍，花小钱，得大利，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多快好省的路子。

第三，采取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把重点建设的任务和技术改造的任务结合起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些老企业、老工业基地，它们都欠账很多，破旧不堪。尤其是上海、辽宁这样的老基地，迫切需要进行改造。如果我们只注重建设新的，新的企业可以是先进的，而众多的老基地、老企业却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上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建成一个项目后，把它的利润搞得一干二净，使它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而把这些钱集中起来拿去新建企业。等到新摊子建起来以后，原来已建的企业在各方面又落后了，不能使企业建成以后，不断新陈代谢，不断进步。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未很好解决。如一汽原来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起步时差不多，现在丰田年产几百万辆，产品花样翻新；而一汽的“解放牌”汽车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技术落后，年产只有六万辆。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了汽车工业公司和一汽的汇报，决定改造一汽、二汽，上水平、上质量、上生产能力，到一九九〇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使一汽年产二十万辆，二汽年产二十万辆。采取改造老厂老企业的方针，不仅能扩大生产能力，而且能用新技术武装老企业、老基地。这样，新老企业都能在技术上不断进步、比翼齐飞，实现现代化就更有希望。

我们讲依靠原有企业进行改造扩建，也包括三线地区的企业在内。三线建设投资一千多亿元，建成了一千九百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事业单位。总的来讲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效益很差，需要改

变这种状况。在三线有相当一批企业装备比较先进，技术力量比较强，是经济建设一支重要的力量，应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过去我们已不只一次讲过这个方针，但没有真正落实。这次要下决心来一个转变，使“七五”计划真正体现以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为主的方针。不论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还是加工工业，不论轻工业还是重工业，不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必须坚决贯彻这个重要方针，狠抓落实。这是“七五”计划的主要问题。今后准备对钢铁、石油、煤炭、石化等部和公司，在计划方法上加以改变，实行投入（投资）产出结合的包干制。给多少投资，形成多少生产能力，调出多少产品，包给各部和总公司。你把投资用在哪里最有效益，有自主权。这样就进一步促使投资使用单位，把钱真正用在现有企业的改造和改建扩建上。

二、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

在“七五”期间，我们必须把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活跃城乡市场，满足社会需要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随着生产的发展，近年来出现了人民购买力大幅度提高、市场显著扩大的新形势。到去年底止，全国结余的居民购买力已达到 1,336 亿元，其中手持现金 443 亿元，储蓄存款 893 亿元。在消费品的需求上，吃、穿、住、用、行等五个方面，传统的消费习惯开始改变，消费构成发生明显变化。吃的商品中，副食品的比重迅速增长；穿、用的商品中，高中档商品的销量迅速增长；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由老“四大件”，转向家用电器新“四大件”。农村的消费需求，也逐步趋于城市化。预计这种趋势，在“七五”期间将继续发展。这对发展消费品生产是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市场、对消费、对购买力，我们要有正确的观点。国际上认为我国这几年形势好，并不是看我们产值增加多少，主要是看我们市场繁荣了，人民生活改善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城乡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中国的市场将更繁荣，容量将更大。这点外国企业家非常羡慕。我们过去不大懂得市场的作用，用抑制消费的办法来搞建设。商品不够，就发票证。靠这种办法来抑制消费，就会把消费对生产的反馈作用搞掉了。生产决定消费，而

消费的增长又会产生新的社会需求，是促进生产发展的推动力。当然，高工资、高消费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根据我们的观察，即使是发达国家走高工资、高消费路子的，结果也不见得就好。但是低工资、低消费、低物价的办法，也不利于促进生产，不是好办法。我们应当适当鼓励消费，运用市场广阔这个优越条件，积极发展消费品生产，加快建设的步伐。不但“七五”期间应当这样，在长远规划中也应当这样。

现在不少优质高档商品都十分紧俏，供不应求的矛盾比较突出。我们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抓住重点，发展优势行业。看来食品工业，家用电器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以及建筑建材工业，这四大行业都呈现出大发展的趋势，很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几个支柱产业，这种势头越来越明显。纺织工业是我国传统的支柱产业。过去出口、内销，满足市场需求，增加积累，大部分靠它，现在仍然有很大的活力。但是纺织行业技术落后，设备落后，必须进行改造。要看到目前我国纺织品越来越不适应国内市场的变化，更不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在西方市场，已经成为低档货，甚至面临被挤出来的危险；在苏联、东欧市场，有可能进不去，或者进去后成为中低档货；在国内市场，大路货也销不出。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敏感，采取相应对策，保持我们的传统优势。

食品工业，在国外它的产值一般都高于农业产值，而我国仅及农业产值的27.6%。我国人民消费的食品，包括粗加工的在内，制成品只占30%左右，而在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可见食品工业潜力大，大有可为。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已经由吃粗粮向吃细粮发展，下一步将向增加肉禽蛋、增加奶制品、增加水产品方面转化，制成品也将越来越多。现在各地都在反映卖粮难。但我国人均粮食才七百六十多斤，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人均792斤的水平。单从口粮上看，目前确有一些剩余，可以说是低消费水平下的剩余。如果使粮食转化为饲料，用去发展畜牧业，改变食物构成，那么，这点粮食不是多了，而是不足。现在由于价格不合理等因素，妨碍了这种转化。我们要研究如何使粮食转化、增值，把畜牧业、食品工业发展起来。建筑建材工业，在很多国家都曾经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柱，而我们一方面供需之间很紧张，一方面建筑业又没有活力。现在，

实行了改革，可望好转。中国的汽车工业肯定会出现一个大发展的形势。我国交通运输日益发展，城市用车、农用汽车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在城市、在郊区和沿海农村，出租小汽车可能会盛行，婚丧嫁娶，送人、接人、上医院、甚至旅游，都很方便。这些都为汽车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必须跟上这种新的形势。

发展消费品生产，要着重在质量、品种方面下功夫，使产品不断更新升级，力求做到品种多样，花色新颖，质地良好，价格优惠，适销对路。为了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在价格上有竞争力，一定要十分重视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把引进技术和组织攻关结合起来，使二者相辅相成。引进技术，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合作生产、合作经营、购买专利、购买关键设备、聘请人才等等。对一些市场紧俏的商品，国内相当一个时期生产又跟不上，可以有计划地进口零部件组装，从后面搞起，一步一步往前加，逐步增加国内配套的比重。这样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技术也消化掌握了。如营口洗衣机厂，就是这种办法，建设速度快，效益比较好。采取这种办法，既可以满足市场需要，又可以避免国内低水平的盲目发展，在起点比较高的情况下，使国内的生产较快地发展起来。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在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的时候，要重视机械制造业，特别是纺织机械、轻工机械制造厂的改造。据反映，上海纺织机械制造厂很多是五十年代的设备，设备老化、技术老化的现象很严重。不把纺织机械制造厂改造好，就不能提供先进的纺织机械，那就不可能生产出好的纺织品。此外，还要重视引进测试、检验的技术和设备。没有这些基本条件，消费品工业要想搞上去也是困难的。

三、突出电力建设，改变交通结构

“七五”期间，我们要继续搞好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等的重点建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我认为要突出电力建设，围绕着电的发展来通盘考虑能源、交通建设问题。这个意见，今年三月我就讲过。电力必须先行，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当前电力供应不足，拉闸限电频繁，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七五”期间不仅生产用电，而且人民生活用电会大

量增加；不仅城市用电，而且农村用电也会大量增加，供电不足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因此，必须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七五”期间，必须保证新增装机三千万千瓦（年装机六百万千瓦）。要根据电力发展的要求，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其它方面的建设，避免互相脱节。

电力工业的发展，要贯彻大中小结合、近期与长远兼顾的方针，千方百计多安装一些机组，多发一些电。除了尽可能新建一批水电、火电、核电站以外，特别要重视现有电站的技术改造，凡是具备条件的，都要进行改建扩建。核电站也可以考虑，是多布点好，还是布点后多装设备好？比如在广东核电站的基础上，再装两台90万千瓦的机组，投资可能会省，产出可能会快。这个问题可以研究。电力工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也是比较落后的，电的质量差，周波电压不稳，物资消耗高，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

由于电力工业建设的加快，今后发电设备的供应将会出现缺口。应组织力量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攻关。同时要以生产发电设备的骨干企业为中心，组织各企业进行专业化协作，生产优质低耗的发电设备。军工企业、三线企业也应当组织进来发挥作用。全国可以考虑形成几个制造体系，分别生产30万、60万、80万千瓦的机组。各制造体系之间还可以交叉，有些厂生产的零部件可以供应全国。这样，我国发电设备的制造能力，将会大大提高。

交通运输结构在我国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重要问题。过去以条条为主，各自强调成网，只分别考虑铁路网、公路网、水路网、空运网，没有从整体出发来建立综合运输网。这样各行其是的结果，造成的浪费极大。比如襄渝铁路，基本上是沿长江同向走的，投资三十七亿元，年运量不到一千万吨，而解放以来我们用于长江航道的投资不超过十亿元。如果把修襄渝路的钱，拿来投入长江航道，可以肯定长江的运输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应当是陆运、水运、空运，河运、海运、公路、铁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互相配合，搞好联运，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独特优势，在全国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经济合理、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除了铁路运输外，内河航运和海运，也应大大加强。这里着重说一下公路运输。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的是铁路衰落、高速公路兴起，公路运输占了很大比重，这决不是偶然的。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运量不多，运距很长，用铁路合算。但在经济繁荣的地方，运距不远，运量大而集中，用高速公路就比较合算。据科研部门的材料，100公里运杂货，200公里运高档货，1,000公里运鲜货，直接使用汽车，中间不倒腾，这样方便、合算。现在我们短途运输都压在铁路上，一装一卸，费时很长，损耗又大。过去首钢把钢坯运到西直门的第一轧钢厂，用火车要一两天，用汽车几个小时就运到了。一条高速公路年运量达一亿吨，相当于五条铁路的运量，投资却比修五条铁路省得多。据专家计算，如果日流量超过一万辆车次，修建高速公路就合算。像北京到天津，南京到上海，广州到深圳，沈阳到大连，这些地方应研究修高速公路。至于其他地方，可根据需要多修一些特级公路、一级公路，把路面搞好一些。“七五”期间，我们要提高公路货运量在整个运输中所占的比重。过去公路发展不快，除了铁路运价低外，主要是公路质量差，运输车型小，又没有采用集装箱，加上经营不善，成本就相当高。今后应当改善路面等级，配备大吨位的载重汽车，使用集装箱，有了这三条，公路运输就会改观，社会效益也会大为提高。为此，要制定一些政策，解决公路建设的基金问题。比如，修了高速公路、特级公路、一级公路的，要允许收不同等级的“买路钱”。就使用单位来说，他的汽车在高级路面上走，加快了车速，节省了油料，减少了损耗，也不见得多花钱。这样修高级公路就有积极性了。

要因地制宜发展空运。到西藏的铁路可以缓建。这些地方修机场、买飞机搞空运划算得多。将来应把更多的客运转为空运，把铁路腾出来运货。专家计算，在京沪之间只要增加三架170人座的大型客机，每天来回飞两趟，就相当于一系列特快的客运量。而少开一系列客车，可以通过三列货车，一年的货运量就可增加二百万吨。如运用合理，空运效益是好的。

总之，综合运输网要作为专题，通盘研究，务期在“七五”计划和以后的长远规划中，尽快解决好这个问题。

四、用活积存外汇和库存物资

“七五”期间，由于资金不足，有必要利用一部分外资，但首先要把我国这几年积存的外汇用好。这是促进“七五”期间经济迅速增长、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之一。

这几年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到一九八三年底达到143.4亿美元，其中国家现汇结存89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国家现汇结存增为117.5亿美元。这种趋势可能还要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考虑，把外汇积压在那里，对我们正在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是很不利的，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占用了人民银行的资金。要想办法把这些“死钱”变成活的生产力。我们国家是一个正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贸易上略有逆差，外汇上有些欠款，这对我们较为有利。

如何把积存的外汇用活，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呢？以前我曾设想，拿出五十亿美元外汇用于重点建设，事实上用不出去。重点建设的一些大型设备和成套设备，往往可以使用国外提供的一些优惠信贷。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在几年之内对外汇的使用放宽一点，把七、八十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外汇用出去。用在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进步上，提高生产能力，提高技术水平；用在进口一部分换回人民币多的高档商品上，主要是进口散装件进行组装；用在沿海地区出口企业的改造和产品更新上。这样的好处，一是可以满足人民需要，二是可以大量回笼货币，三是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四是可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企业的面貌也将发生变化。既活跃了经济，又开辟了生财之道，有利于形成经济上的良性循环。所以，一定要下决心按这个方针办，不要怕将来没有外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事实上，只要把产品的质量和花色品种搞上去，就能够提高竞争能力，开拓国际市场，至少有些本来要进口的商品，以后可以少进口、少花外汇。何况我国对外贸易总的是发展的趋势，非贸易外汇的收入，如旅游业的收入也是增长的，搞得好的话，外汇也并不会少，不会有大的风险，不必过多地担心。这件事要及早动手，作好规划，制定政策，组织实施，在“七五”期间才能收到效果。银行在这方面要发挥积极

作用。外汇使用时还是以贷款的形式，审批手续要简化，加强检查监督，小的东西不要怕重复引进、重复生产。我们设想，按上述方向在三几年内把七、八十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外汇用出去，收到好的效益，不出大的盲目性，就是一个大胜利。

另外，战略物资库存也需要进一步压缩。世界大战近期内打不起来，把那么多物资压在仓库里，占资金，背利息，物不能尽其用。不如把它使用了，用商品形式储存到社会上，实现这些物资的使用价值，使这些存在库里的死东西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转化为活的东西。如果将来打起仗来，全国总动员，把它拆下来还是可以用。外国的许多高速公路，就使用了大量的钢材、铝材，等于战略库存。把库存物资拿出来，是会产生很大作用的。一九八一年的时候，我国最大的镍生产基地——甘肃金川镍矿老矿区枯竭，新开的第二矿区尚未形成生产能力，面临矿山脱节的危险。当时，国务院批准从国家战略库存中借给八千吨镍，作为建设资金把二矿区建成。这条“借镍还镍”的措施对这个矿产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一九八三年产量第一次突破一万吨，实现利润一亿元；今年预计产镍一万五千吨，实现利润1.45亿元；一九八五年产镍二万吨，实现利润二亿元以上；一九九〇年将达到四万吨。最近他们与甘肃省合作，准备大矿大开，到一九九三年使镍产量达到八万吨，副产铜四万吨，硫酸七十二万吨，尽快把这些地下宝藏开发出来为国家建设服务。我看应当重点支持。去年以来，压缩库存作了不少工作，今后的步子还要迈大一点，这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五、逐步调整产业结构，采取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七五”期间，信息技术飞跃发展与日益广泛的应用，生物工程进入实用化，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工程等在某些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和开辟出新的应用途径，将使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必须相应采取对策，围绕着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积极地、合理地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迎接新的形势，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我们国家幅员广大，经济不发达而发展又很不平衡，应该有多种层次

的经济结构。一个新兴产业，一个传统产业，还有一个“第三产业”，我们在“七五”和以后的五年计划中，都必须予以重视，使之得到协调发展。

从经济发展的进程看，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工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任何忽视和放松传统产业的观点和作法，都是不对的。与此同时，必须注意跟上世界的潮流，有重点地发展新兴产业，逐步提高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的产业结构。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应利用自己的优势，多发展一些新兴产业，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城市要在这方面多下力量，以便向内地移植。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运用新兴技术，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在新形势下，我们有可能利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经验成果，使传统产业跳过某些发展阶段，在技术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有可能借鉴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运用新的技术手段，特别是借助于电子计算机、信息网、信息库，加快推进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应用微型机改造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效果很显著。这是加速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传统工艺的革新，把我国工业逐步转移到现代化基础上来的一条有效途径。我们一定要十分重视，认真研究，做出规划，扎扎实实地、有步骤地去推行。

发展“第三产业”，也就是发展各式各样的服务行业，应当在“七五”计划中占一定的地位。对这个问题，现在宣传和认识还很不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第三产业”将迅速发展。在一些发达国家中，“第三产业”占了就业人口的60-70%，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了50-65%。我们国家的经济不发达，“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据统计仅占就业人口的15%左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现在城镇里一方面还有很多人等待就业，另一方面服务行业人员又很少，处处感到不方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促进生产，方便生活，有利于安排就业。“第三产业”的门类繁多，容量极大，能够安排很多人。所有的城市和集镇，不要老是把注意力放在办地方工业上，以为办工业才能安排就业，而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搞基础设施，放在“第三产业”上。上次我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讲，你们的发展战略，第一要注意发展新兴产业；第二要搞第三产业，

面向全国，为全国服务。在秦皇岛，我也对市委的同志讲，你们的特点是港口、旅游城市，应当为港口服务，为旅游服务，这两项抓好了，城市经济也就繁荣了。去北戴河旅游的，一九八三年是一百四十万人，今年是二百八十万人，住宿十分紧张。去年九月我去的时候，给他们讲，可以允许老百姓开旅馆，当旅游专业户。今年我去看，一下就发展到二百九十多家，拥有四千床位。我访问了三家，几个月的收入就是六千元至八千元之间，很快就把投资收回了。我国的各种服务行业，包括文化娱乐、旅游业等，前途无量，发展之快，将会出人预料。过去服务业、公用事业发展不起来，有一系列的问题。主要在于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企业，而是当成福利事业甚至慈善事业来办，谁办谁赔钱，根本缺乏活力。这种办法必须改变。要使“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就需要从政策上解决一系列问题，使发展“第三产业”有“名”有“利”。今后，统计产值，也要统计“第三产业”，这样谁发展的多，产值也高，不要让“第三产业”入另册。要进一步把“第三产业”放开，许多都可以实行市场调节，使经营者有利可图。只要我们政策对头，大家就有了积极性去办，“第三产业”将出现一个飞跃发展的新局面。

六、坚持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的国策。我们利用国际形势的有利条件，同国外进行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也必须具有长期的观点，长期的打算。这个问题我们在认识上还没有解决，不少作法并不是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方针看待。我们应注意从国外引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积极地加以吸收消化，不加区别地完全引进成套设备，连通用机械、普通管道都买进来，那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要匆匆忙忙，急于在短期内什么都“国产化”，想全部立足于国内制造。对“国产化”要作具体分析。有些设备，可以而且应该做到国产化；但有一些机器设备，比较复杂或专业化程度很高，用量也很小，不一定要国产化，一切都自己制造并不一定经济，不必花那么多力量。国际上许多设备都是多国生产的。需要某些关键的、专业性的设备，可以进口，甚至长期进口，国内配套的占到百分之九十就很不错了。造船工业的经验已说明了这点。有些同志怕这样做影响自力更生。其实，我们

用自己的货物去交换，用钱去买，就是自力更生。还有对国外产品的测绘仿制，也要作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有些机器比较简单，把它测绘下来后可以仿制成功；有些机器很复杂，虽然测绘下来，但就是那点诀窍你掌握不了，往往费时很长，花钱很多，走了不少弯路，仍不能仿制成功。正确的办法还是应当把技术引进和技术攻关结合起来，这才起步高，发展快。以上这些问题，说明我们思想还不够解放，对长期坚持对外开放还认识不足。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这几年对外开放、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经验教训，使“七五”期间在深度和广度上把这一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我们国家要对外开放，就省、市、地、县来说，就各部门来说，也要门户开放，不能搞封锁和闭关自守。近年来，各地的经济技术协作不断开展，据统计，一九八三年各地商定的协作项目，就有八千五百多项，其中技术协作占一半以上，经济联合项目占10%，物资协作金额近五十亿元。现在已从以物资协作为主，逐步转为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协作；从临时性的单项协作，发展成为长期性的多项协作和经济联合。除了地区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中央一些部门同地方合作或相互合作。如石油部、煤炭部、水电部、铁道部、有色金属公司、船舶公司等，同地方集资或部际之间集资联合开矿、修路、办电、炼钢等，今年资金总额已达到四十多亿元。这是值得重视的新情况。看来，这几年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加工业发达地区与资源丰富地区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在经济上增加横向联系已经走出了一条路子，这是搞活经济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这种经济上协作和联合的势头，正在全国蓬勃兴起。最近在天津召开了全国经济技术协作和对口支援会议，交流了这方面的经验，签订了一大批协议。在“七五”期间，我们要积极倡导和加强这种横向联系，形成不同特点的经济网络和经济区。一个实行利改税，一个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一个政企分开，再加上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按照扬长避短、互惠互利、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原则，在经济上进行交叉协作和联合，发挥优势，互相补充，将更加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阻碍经济发展的局面，促进人才、资金、物资、技术的合理流动和转移，从而使我国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的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这种经济技术协作是计划经济中非常生动而又丰富的一种新形式，是国家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在计划中不应把它当成“异己”的东西。我们必须加强计划指导，搞好综合平衡，制定经济政策，抓紧经济立法，保障协作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方毅同志开发有色金属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九日

金川镍矿要积极建设，大矿大开，八万吨方案希计委早日审批。有色金属总公司与甘肃及各省联合的办法好，煤炭、钢铁、电力也可以这样办。还有些问题已批注文中。

（在开发大西北要把有色金属放在重要地位旁批）同意这个看法。

（在地质科学上支援新疆旁批）这是开发新疆最重要的一项准备工作。

（在可否考虑将省里的信贷存差及其增长部分按一定比例留给省里使用旁批）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由银行研究。

（在有色总公司采用联合的办法调动各地办有色的积极性旁批）联合的办法好。

给李德生¹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

德生同志：

我从辽宁回京以后，又看了一下你们关于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我认为会议开得很好，提出的各项意见都是好的。防治地方病的工作对人民生活、生产、国防关系极大，希望你们会同各地继续抓紧落实，务期必成。

顺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

注 释

1. 李德生(1916-2011)，河南新县人。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曾任十二军军长，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军衔。

接见出席中外经济合作 讨论会来宾时的谈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

这是个盛会啊！这么多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企业家、银行家、经济学家、法律专家，还有一些世界知名人士共聚一堂，参加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总经理举行的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多知名人士，还是第一次。今天在这里见到这么多老朋友、新朋友，机会难得。我听说，今天上午邓小平主任已经同大家会见了，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这是不多的。因为，你们知道邓小平主任已经八十高龄了，我国领导人为了照顾他的健康，为了减少他的日常事务，让他今后能够集中力量考虑一些大事，一般外事、外宾来中国就不多让他出面了。邓小平主任很高兴见你们，所以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也是不多的，说明他非常重视你们这个会议，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到中国来。

今天我有机会和一些老朋友重逢，也认识一些新朋友感到非常高兴。我没有更多的话讲。因为，上午邓小平主任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只在这里代表中国政府表示：第一，对这次来中国参加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的各位外国朋友和港澳地区来宾表示欢迎、致意。第二，这个会开得很好，向你们表示祝贺。

希望各国的企业家、银行家能够更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来。我希望你们到中国投资的步子加快一点，步子走大一点。希望

* 这是赵紫阳在接见出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荣毅仁召开的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来宾时的谈话。

在座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和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多向我国提出一些建议，多帮助我们。上午邓小平主任讲，我们现在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是确定下来的一个长期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如果说将来会有变化，它只能是沿着这个方向来变化，而不会离开这个方向来变化。就是说，将来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而不是相反。但是，我们究竟怎么搞，还没有经验。开放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个新课题，我们要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可能会有很多缺点，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希望听到你们的建议、批评，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十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我们大家很好地合作，使我国的经济能够繁荣起来，使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取得成功，我看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会大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

关于我国的改革问题。我们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已搞了五年，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五年中间，我们城市改革也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和探索。在我们这个国家，城市的改革比农村要复杂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农村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历来中国的计划经济对农村来讲实际上是间接计划，不是直接计划。但是，我们城市的主体是全民所有制，是国营经济，它大部分是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而且，产品的生产、供应、销售全部是纳入国家计划范围内的。因此，城市改革要比农村复杂一些。我们改革的重点，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调动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扩大企业自主，增强企业活力，使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这样就发生了一个计划怎么搞的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企业活了，计划怎么办？完全没有计划也不行，完全像过去那样把计划搞得很死也不行。计划搞死了，企业也就不活了。企业搞活了，搞不好国家计划就难以实施了。这对我们来讲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城市改革在前五年没有全面展开，主要就是要探索一下改革的道路。经过几年的试验和探索，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为城市改革制订出一个蓝图。不久，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将反映出我

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眉目和它的蓝图。它的要点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城市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把企业搞活。要把所有的企业单位、工厂、商店，这些生产单位、经营单位搞活，使它们成为一个能够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单位，或者说成为一个具有法人地位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将是具有充分活力的。这样就涉及一个问题，必须改革我们的计划体制。我们今后的计划将少采取行政手段，少采取指令性的办法，主要运用立法手段、经济手段影响企业、指导企业的活动。除了一小部分必须要保持指令性计划之外，大量的计划将变成指导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指令性计划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主要是采用经济手段，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企业向着国家的计划目标去做。当然还有一部分商品将来就完全开放，由市场去调节，用你们的话叫自由经济。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价格政策，有一个价格改革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价格是很不合理的。我们过去主要不是靠价格，而是靠指令性计划，靠指令性指标，我们今后想主要依靠价格，当然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个方向。我们今后的价格将要反映投入情况，反映价值，而且还要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也就是说，紧缺的东西要提价，供过于求的东西要降价。这样我们的计划和价格将会成为一个统一的东西，而不是对立的東西。国家将正确运用价格来达到国家计划的要求，价格将成为我们达到计划目标的一个手段。我们国家今后仍将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但是，这样的计划经济将不同于我们过去搞的那样的计划经济，当然，也不同于苏联，不同于东欧。我们的计划经济将来就是一个依据和充分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也可以翻译成为依据和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你们都是行家，你们会意识到，这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改革的方向已经定了，而且充满信心，我们将坚定地、有步骤地实行改革。相信用三年、五年的时间，我们的城市改革将会像农村的改革一样取得成功，为城市、为工业、为商业、为所有企业开创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

给王震¹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王老：

您十月十二日夜的来信，和前寄给耀邦及常委诸同志的信，我都仔细地看过了。首先，我对您的这种“烈士暮年”仍“壮心不已”的精神和气概甚为感佩！

关于西南经济开发问题的确是我国四化建设中的一个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当认真思考您老人家的一些想法与愿望。鉴于以什么样的规模与速度进行，势必涉及整个“七五”的建设方针及部署（大规模地展开，放到国家计划之外，恐难以办通），因此我需要把它提到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结合“七五”计划（明年五月前要把大盘子定下来）一并讨论。讨论情况容后向您汇报。

国庆节前后有机会几次和您见面，看到您老人家身体康健，精力仍然旺盛，甚为高兴！

致以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注释

1. 王震(1908-1993), 湖南浏阳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曾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 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 中央新疆分局书记, 新疆军区司令员, 铁道兵司令员, 副总参谋长, 农垦部部长, 国务院副总理, 中顾委副主任, 国家副主席。1955年获上将军衔。

贯彻中央《决定》 稳步推进价格改革*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谈谈价格问题。我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已经发表了，其它问题我看都好办，主要问题是物价问题。我把最近国务院关于物价的一些想法说一下。

昨天，耀邦同志向中央常委汇报，说目前我们国内有四件大事：一是整党，二是干部调整，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四是“七五”计划的制定。他说分个工，他抓两件我抓两件，他抓整党和干部调整，我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和“七五”计划的制定。当然，这四件事由中央常委统一领导，耀邦同志抓总。所谓分工，是各有侧重。这四件事中，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了。各地方、各部门都要集中精力把这四件大事抓好。

对我们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小平同志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很同意这个评价。我们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但是在理论上有很大的突破（万里：“美国之音”昨天晚上就广播，说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了）。我今天早晨也听了，他们讲了两条：第一，中国要削弱计划的控制；第二，强调价格改革。我看它抓住了要点。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其它我看都好办，而价格改革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也是《决定》上的一句话。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外国人是这样看，中国

* 这是赵紫阳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会议上就贯彻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发表的讲话。

人也是这样看。这一点，今天跟大家打个招呼，你们也琢磨琢磨。价格改革要真正搞好，小平同志讲需要五年，我看用五年的时间过了价格改革这一关，我们就可以对外宣布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个问题，一年来我想得比较多。

最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你们都看到了。《通知》的主要精神：

第一，《决定》公布以后，物价要稳一段时间。具体时间没有讲，因为各地具体情况不完全一样。现在我们党内没有秘密，如果讲稳多长时间，老百姓马上就知道，就要抢购商品，所以只说稳一个时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内价格不能动。《决定》公布以后群众的疑虑比公布以前可能要少一些。我主要是讲北京，因为北京的消息最灵通。《决定》上都是讲大问题，没有讲什么东西提价，什么时候提价，提多少，什么东西降价，降多少。但是《决定》公布以后，我们要切记一九四七年土改的教训，文件还没有吃透，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就到处冒烟，自己把自己搞乱。关于物价宣传我还要说一下，《决定》一发，群众一看讲的是价值法则，“该降的降，该升的升”，而且把降放在前边，他们的疑虑就会消失。你们注意这个话没有？不能一说物价改革就光涨价，该降的还是要降。另外《决定》里还讲了“七五”计划，说到比价不合理。当然，群众认为总的是要涨，实际上总的也是要涨，价值规律嘛，但确实有升有降，不是说什么都涨价。我们讲一个时期不动，也不是绝对不动。有一些小产品要放开，多数地方放开了，还有某些地方没有放开，我看也可以放，不要把问题都积压起来，如火柴，还有北京的煤气，就要涨，那是早就定了的。如都积压起来，欠账越多最后越困难，现在有些地方就有这个问题（万里：今天早晨北京来了个报告，说已经决定的煤气涨价也不出台了，因为出现了一些抢购的情况）。当然不一定这两天就动。但是，如果一紧张就不动，往后压，最后更动不了，现在就有一些省份，被拉得掉了队。但总的来讲，要稳住。凡是原来没有确定的，或已经确定的但全国多数地方没有动的，先不要动；还未出台的，不要急着出台；已经确定了要出台但还没有通知各地的，先不要通知；已经确定了，而且通知了各地，但多数地方还没有实行的，现在也不要实行（除了煤气以外）。煤气我主张非要涨价不可，不涨价没有道理。烧煤球比烧罐装液化气要贵，烧罐装液化气比管道煤气要贵，这完全

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煤气发展不起来。第一句话，叫做在一个时期要稳住。

第二句话是，今后，即过了这个时期以后（至于时期多长，各地不一定强求一律，我现在不确定，将来国务院还要研究这个问题），除了放开的产品（有两种：一种是小商品，完全放开了；一种是物价管理权限完全放开了），或者是确定可以实行浮动价格的以外，大的部署一定要由国务院统一制定。这也是《决定》上明确了，一定要全国统一部署，各地不得自行其是。最近一些地方随便把猪肉提价，是不得了的。猪肉是大商品，你提他就提，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猪肉提价会带来什么问题，怎么能提价？在价格问题上，一两年之内不能自己把自己搞乱，要统一部署。（强晓初¹：暗补变成明补可以不可以？）总而言之当前不能动，暗补变明补也不行，这是超越你的权限，这个权限在中央，不在各省。中央正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讲的那个暗补变明补是要解决的，一个城市变了，各地方都变，变得又不一样，最后使得整个大的调整不起作用。对这些大的商品，不能自行其是。不合理的要逐步解决，但是有一条，要统一考虑。为什么要这样？主要是怕引起你搞我也搞，大家互相看，这样势必搞乱。今后一两年之内，至少今年和明年上半年，主要的危险不在于价格改革引起什么问题，因为价格改革还未出台，还没有定。主要的问题有两条：一是领导机关，自己在那里轻率地行动；二是机关团体带头抢，这就势必搞乱。搞乱的结果，就为这次整个体制的改革设置了很大的障碍。因此，为了价格改革，现在必须控制住，全国要适当地控制，有些允许各地方动的，可以动；凡是大的商品，一定统一部署，所以国务院就这个问题专门发了《通知》，这对稳定人心很有好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要稳住。你们回去只是传达学习文件，至于整个价格问题，大的东西，什么粮食、油料、生猪、煤炭等等，都要稳住。

第二个问题，要沉住气。昨天小平同志在全会闭幕时讲的两句话很重要。全会开始之前，在休息厅，小平同志还说过《决定》写得好，“还是中国人胆子大！”我们这次的《决定》是有很大突破，我们心中是有数的，不是盲目的。我认为，只要我们全党认识一致，而且步骤上又比较谨慎一点，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因为我们对基本情况有个分析。现在我们的经济情况很好，东西还是有的，有一些东西由于事先估计不足，可能库存不够。

如果市场需要了，还可以增加生产，原料不够可以进口，因此抢购也好，脱销也好，即使发生，也是暂时的。如抢呢绒，抢到一定的程度，没有了，我们就生产嘛，进口原料嘛，我们用点外汇，而且可以回笼货币，也可以把工厂开动起来。如上海的肥皂，有什么了不起？油脂现在有的是，生产就是了。为什么我说火柴各地方可以提呢？因为一方面影响不太大；另一方面，木材涨了价，工厂对火柴的生产实在没有积极性。对现在的情况，第一，我们必须得顶住，抢购也好，脱销也好，不要怕，脱销就脱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几十年都脱销嘛！况且，这个脱销是暂时的。第二，我们可以把三十年来的老办法拿出来，凭票、发证，都可以用。那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肯定要发生问题。抢鸡蛋，我们可以定量。过上几个月，问题就过去了。棉布不怕抢购，粮食也不怕，他抢就抢，反正你稳坐钓鱼台。有些东西，他抢完就完了，一天卖多少，到时候关门，不外乎排队，把这种现象说成中国的形势又坏了，我看不一定。总之，我今天就是跟各省同志打招呼，要硬着头皮顶住。这一段稳住，沉住气，给我们有计划地改革、出台新的改革措施，争取个时间。你们不要怕，形势大好，没有问题，现在不是一九六〇年，我们仓库里的东西多了。银行储蓄，提款也不怕，提就提，不外乎流动资金受点影响，他提走以后放到家里，过一两个月连利息也没有，还是要存起来。《决定》一公布，我看就是两条：一是稳住；二是沉住气。不要怕抢购和脱销，这是暂时的，对中国的形势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两条你们要注意，这样我们的大局就稳住了（胡启立：机关单位不准带头抢购）。有两个东西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第一，机关、团体不能乱搞，要加强检查（万里：要严格制止，这是纪律）。现在有些团体要制装，怕涨价，去大批地抢购，这个要制止。每一个地方都抓一些这样的典型，刹一刹这股歪风，该没收的就要没收。

第二，抢购以后就地高价拍卖的，以投机倒把论处。长途运输的不算在内。我看就搞这两条。机关、集团，是指国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审计署要组织一些部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把这两条控制住。

顺便说一句，离休干部不准搞民间公司。离休以后搞民间公司，实际上是“国营公司”。老干部、老红军、离休干部去搞民间公司，都是自己

发财致富。为什么不能搞？不是别的，这些人搞实际上是利用特权，找到老上级、老部下，主要是找老部下，要求批钢材、批材料、批尼龙丝，然后转手去赚钱，这都是不正之风。这不是今天才讲，是早就发了《通知》的。过去的没有关系，现在已经发了通知了，再搞怎么能行呢？离休老干部可以在咨询、业务方面搞。这个再研究一下吧。（万里：在职的、离休的都不能搞。顾秀莲²：还有一条，解放军不能搞。）这样搞流弊很大，实际上是按国家的牌价转手赚钱。（万里：退休的老工人被乡镇企业请去，待遇高一点不能限制。）利用工作的关系，利用特权，这不行。解放军退伍的干部、战士、连排长，他们这个不能算。（胡启立：通知下去之后有的地方就改头换面，老婆孩子出来了，干部退出来了。）主要是老干部，我们规定一下，主要是有权的，以权谋私的问题。这是指在职的。（胡启立：日本的公务员法规定，退休以后二年之内不能经营与自己退休前五年内工作有关的任何一项，如果在职的公务员经营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处一年以下徒刑。）我们也立个法，搞个条例，搞个具体规定。不然的话，对社会风气的影响相当的坏。（胡启立：瑞典的公务员法规定本人不准搞，家属也不准搞。）改革是提倡自由竞争，而利用特权赚钱，是“四大家族”，是官僚资本主义。（强晓初：高干子女做买卖也是不行的，靠老子的特权去赚钱。）高干子女私人做买卖赚钱也是不行的。各地在国家没有统一规定前可以加点限制，做点规定，将来再按中央统一规定去办。不然流弊太大。（田纪云：越看这个弊病越大。万里：越看弊病越大，应该作为党的纪律来要求）。

另外还有一点，商业部门、物资部门、计划部门，要加强对市场信息的研究，对市场紧缺的东西，要及时组织生产，必要的时候进口一些原材料去满足供应。这样我们生产也搞上去了。抢购很厉害，要想个办法，脱销时间长了不好。还要加强调拨。有些商品，仓库里面多得很，没有及时调拨。这次会议可惜我们有关部门没来，光跟各省打招呼不够，纪云同志，负责跟中央各部门打个招呼。

第三个问题是报纸宣传。关于改革的宣传，耀邦同志有个非常重要的批示，这里我就不讲了。我建议把这个文件发到各部委，发到各省市。（胡启立：各新闻系统都发了。）我这里着重讲一个在宣传方面如何处理物价问题。我们的干部对经济体制改革要展开讨论，讨论里面往往就讲到物

价，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很敏感，看看什么东西要涨价，比如说农副产品价格倒挂。今后报纸是不是定这么一条，纯理论性的探讨是可以的，凡是涉及到什么东西要涨价的文章和信息一律不上报纸。讨论会和机关内部研究可以，但不能上报纸，包括《经济参考》、《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这三家。（陈国栋³：还有各种经济、信息报，多得很。）这个问题，请《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几家报纸提个意见。（万里：今天恐怕也得对地方报纸讲这个意见，你们都是掌握报纸的，报纸不能起哄。你们也给你们自己的报纸、杂志打个招呼。改革不能起哄，一起哄就坏。凡是不成熟的经验，不要向外介绍。）过去晋察冀召开的土地会议，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会议还没结束，到处传开了，到处点火，到处冒烟，扫地出门，甚至乱打乱杀。所以后来中央接受了这个教训，建国以后搞土地改革，报纸宣传工作就改进了，那是毛主席、少奇同志他们下的决心，避免了错误经验的传播。我们党内，好就好在一声号令，千军万马齐上，但是确实有闻风而动、一窝蜂而起的问题。我看这不是个好作风，在经济工作中更是如此。在经济工作中我们应当提倡头脑很冷静，很好地分析研究自己的情况。但是，我们有的地方多年来形成的一个风气就是听风，闻风而动。这样做会使好事变成坏事。（万里：“文化大革命”是“不过夜”。）这不叫跟中央保持一致。当然，中央已经定了的东西，三令五申，顶着不办那不行；但是中央还没有正式决定，或者中央定了以后允许各地根据自己情况办事，事情还没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往前赶，很多好事变成了坏事。这个风气现在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

这里我还要讲，农村改革所以成功，没有走弯路、没有倒退、没有发生曲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没有压各个地方，完全允许各个地方独立思考。这次《决定》上专门写了农村改革的这一重要经验。我觉得不论办什么事都得给各地一个思考的时间，应当有一个把正确的东西真正变成他自己的东西的时间，这样他才能够正确地执行。没有在思想上真正理解，唯恐人家说他落后而赶风，这样往往搞不好。我们这次改革，很重要的也是这个问题，不要闻风而动，要沉着点，搞到后边的可以借鉴前边的各种经验，可能搞得更好一点，后来居上嘛。过去我们经常讲形势逼人，但又不注意稳步前进，搞成了人逼人，你逼我，我逼你，上面逼下面。结果许

多好事办坏了。所以这次耀邦同志讲，报纸宣传改革无论如何不能多登动态性的东西，非常重要。报纸一搞，这里搞什么东西了，那里登什么东西了，他就沉不住气了。当然这是我们上边的问题，要冷冷静静地去总结经验，少登动态性的东西，少登大造舆论的东西。舆论已经够了嘛，不要再造什么舆论了。这次陈云同志非常强调这个问题，陈云同志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但是认为我们主要的还有一个总结经验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文件发了，这个文件确实表现了中国人的勇气，也表现了中国人的思想确实是解放了。我们必须按照《决定》把工作搞好，搞不好，今后对国内外都是不好交待的。报纸宣传要注意一下，不要在物价问题上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审稿要严格一些，宁可少发一些，不可因为工作上的疏忽给社会造成动荡。我看物价问题就是这样。当然，属于基本理论问题，什么计划经济、价值规律，商品生产，这些理论的东西可以探讨。但是要注意里面不要带个例子，给人一个信号。要注意这个问题。（胡启立：还有工资问题，所有敏感问题不要在报纸上造气氛。）所以，这一次《决定》上本来加上了什么基本工资、年功工资什么的，后来就笼统了一下，实际上我们还是准备这样做，方案正在制定，但是这一次没有写。还有一个问题，文件原来有“我们每一次调整物价都要同工资挂钩”这么一句话。后来陈云同志意见还是圈掉。做当然还是要这么做，将来我们调整物价而影响到人民的消费品价格，要适当跟工资挂钩，但是不写上去。中央没有定下来的东西，没有实行的东西，没有部署向外讲的问题，不得讲。要严格这个纪律，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改革能够有步骤地、健康地进行。

第四个问题，有必要把我们物价改革中大体上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可能做些什么的考虑说一下。究竟怎么改，大家还要进一步讨论。

物价改革大概是三个字，第一个字叫“放”，第二个字叫“改”，第三个字叫“调”。什么叫“放”？现在我们已经有的了，有一些小产品就是将来逐步放开了，国家不管了。现在已经有些在做了，有些做的效果也是好的，只要不过于集中，效果都是好的。小商品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新产品。完全是新产品和集体搞的一些新的行业，我们根本不管它，价格他自己去定，自负盈亏嘛。

像将来的一些第三产业，集体的、个人的第三产业，你可以不必管它，

老百姓嫌它的价格高，可以不到他那儿买嘛。比如说咨询，价格你管他怎么管，技术服务怎么管？你也可以自己定价，群众、使用单位也可以自由选择，可以找你，也可找另外一家。像这些都属于放的东西，不要统统国家背起来。（万里：都是两利的问题，不两利他不干。）协商、两利。这叫一个“放”的问题。

第二个“改”。这次《决定》上写了，就是改革物价管理体制。我们现在物价管理过于集中，有一些将来放到省、放到市，有一些将来恐怕还得放到县，有一些完全放给企业，比如说试制根本没有的新产品，企业可以自己定价。还有市场上供过于求的东西，也可以企业自己定价，这叫改革物价管理体制。对这个问题，看法还不一致。最近，体改委的调查报告就提出了广东的经验，以改为主，以调为次。这个东西，我看也不一定完全就是这样，广东仅是一个局部。全国如果统统放开，可能出现互相来搞，互相影响，这个要有步骤地来搞，按《决定》上讲的，走一步还得看准下一步再走；如不行，就先停一下。一下子大放恐怕不行。解决的途径要这样，因为地区的差别也很大。现在总的来讲，中央的物价管得过于集中，应该放，分散一下。分散一下，矛盾小了，冲击力小了，承受能力也好一些。统统什么都由北京来定，然后算账，算的不会很准确。比如粮价，可以按一定的标准包给各省，由各省自己去定。你们愿意把价钱搞高一点就搞高一点，愿意把价钱搞低一点就搞低一点。搞低一点就可以向外卖了，搞高一点就多贴补一点了，中央只是按一定的收购量，按一定的价格包给你。这样有利于各地的调整，充分发挥各地方的优势。

另外，本来应当还有一个内容，我原说是“参”，这样说可能不很准确，意思就是我们价格放活以后，国家必须参与市场调节。比如说钢材，现在市场价格是每吨一千二、三百元，国家就应该有一批钢材，一百万吨也好，二百万吨也好，我按一定价格往外抛。当然按六百元向外抛就不行了，抛完了就完了。有些价格很高，就是通过随行就市进行吞吐，使一些紧俏商品不要搞得过高。当价格到一定的幅度，我就不参与调节了；当你的价格低的很多，我还要收。我们五十年代三大改造以前就是这个办法。那时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那时的市场，除了加工、定货以外，主要是通过国营经济进行参与市场调节来稳定物价。这个很重要。将来国家要准备进口物

资参与国内市场调节。现在市场木材价格高得厉害，如果我们能进口一批木材，就会好一点。还有电视机，特别是汽车。我今天给你们打个招呼，汽车要提高关税。你们不要紧张，还要给地方留一点利，我们关税不会把你们的超额利润全部拿走，要拿一半。另外，国家要直接掌握进口汽车，平抑物价。如果一辆汽车赚一万元，通过税收要把五千元上交国家，你还可以赚五千元。解决的办法就是“放”、“改”、“调”这三个字，加上国家参与市场调节。国家物资部门、商业部门，以及各个掌握物资的中央各部，像煤炭部、石油部、化工部，将来我们除了一部分按指令性计划，按牌价分配的以外，还要有一部分要拿来参与市场调节，不要使放开的那一部分失去控制，无限制地涨价，搞投机倒把。

刚才讲了一个“改”、一个“放”，现在讲一个“调”。“调”就是调国家指令性这一部分，牌价这一部分。主要是生产资料，如煤炭、生铁、矿石、木材、电力这一类东西，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这个调整只能是小调，不能大调。应该采取小步，就是大体上使企业能够消化，不至于带来连锁提价。就是这么几个字：“放、改、调、参”。我们今后物价就是这么一个路子，是一个多种方式解决物价的路子。

注 释

1. 强晓初(1918-2007)，陕西子长人。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曾任松江地委第二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松江地委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秘书长，机械部副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副省长、中纪委书记。

2. 顾秀莲(1936-)，江苏南通人。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曾任化工部部长，计委副主任，计生委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陈国栋(1911-2005)，江西婺源人。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部长、财委副主任，粮食部副部长、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上海市顾委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给薛暮桥同志的信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暮桥同志：

半个世纪以来，您孜孜不倦地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做出了大家公认的贡献。我谨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

您坚持的求实精神和严谨作风，是非常可贵的。在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时候，我希望您和所有的经济理论工作者，进一步发扬这种优良学风，面向实际，不断研究新的课题，取得新的成就。

敬祝
健康长寿！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中国曾经被视为“非开放的”国家。但闭关锁国是违反中国人民的意愿的。

早在三十五年前，即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昭告世界：内外交流是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之一。

遗憾的是，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相反，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某些大国先后对中国采取了封锁或压抑的政策。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使进出口总额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长期处在很低的水平，中国人民被迫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从事建设，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也在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国内的一种忽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间曾盛行一时。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错误的政策和观点业已被事实所否定。那种认为可以用封锁和压抑来遏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在国际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不明智的。不同十亿人口的中国打交道，实际上只能把自己排除在这个广大的市场之外。在中国国内，实行对外开放的正确性和必

* 这是赵紫阳访美前夕应约为美国《大西洋》杂志而作，原载该杂志 1984 年 11 月号。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宣布对外开放是中国富民兴邦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进一步“放”，不是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前进，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要性已为中国人民和干部所普遍认识，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不可动摇的政策。

七十年代末是一个转折点。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一般只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¹。但在四年以后，即一九八三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比例提高到了百分之十八。现在中国利用外资的总额已达一百四十六亿美元，相当于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国内基本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十五。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的四年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而进出口总额则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也就是说，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超过了国内生产增长的速度。这一趋势，今后将继续保持下去。

实行对外开放，同实行对内搞活一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已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不久前，我在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学会的演讲中指出：

——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富民兴邦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中国同世界各国经济合作的发展。

——在对外开放上，我们的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进一步“放”；不是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前进。中国已经开放了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再关上。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中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中国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将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这些论断，已被证明是符合实际的。

有些外国朋友对中国能否持久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持观望态度。他们还要看一看。应该欢迎他们继续观察。需要指出的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能够得到实惠的政策，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是不可逆转的。

积三十多年的经验，应该不应该实行对外开放这个问题，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解决了。现在我们正在探讨的是，如何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使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收效更好一些。今年年初，中国政府作了一

项新的决定：进一步开放东部和南部的十四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这十四个城市，包括天津、上海、广州在内，拥有七千多万人口，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精华地区，交通方便，基础较好，工作效率也比较高，能够为外商提供各种方便和优惠条件。这是一个大决策。这些地方的对外开放工作做好了，不仅可以大大加快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东部地区的发展，而且可以为进一步开发中部和西部地区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关键性的设备，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利用国外的资金，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当然也包括美国在内。中美两国人民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欢迎美国的企业家到中国来做生意，投资办厂，开展业务，参加竞争。在这种交往中，美国企业家将会发现，来中国做生意是有利可图的。中国人民是恪守信义的。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上各具优势，在许多方面可以互通有无。只要双方各自作出应有的努力，中美之间经济技术交流的前景无疑是非常广阔的。

注 释

1. 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当年国民收入的比例，1950年是9.8%，1959年是12.2%，1969年下降到6.6%，1979年回升到13.6%。

广东要继续在改革开放和 特区建设中走在前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

一、广东可以在开放和改革两个方面为全国提供更多的经验

广东，我在一九八二年来了一次。那次来，珠江三角洲没有看。特区的建设还刚刚开始。隔了几年，这次主要看珠江三角洲。又看了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一路所看到的情况，确实变化很大。开放和改革确实大大加快了这些地方的建设速度。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社会秩序和人们的精神风貌总的讲也是好的。我觉得你们开放和改革的实践为全国其它地方提供了一些很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这是总的看法。

我来到这里，一个很突出的、最深的印象，就是许多建设项目周期很短。从破土动工到投产，有的半年，有的一年，两年的就算长了。当然，投资数量并不省。但因建设周期短，能早投产，这就很划算。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建设项目搞得周期很长，效益很低，而这里却搞得很快。中山港从破土到使用总共才八个月时间，是相当快的。赤湾港的建设时间也相当短。这个经验很值得重视。

另外，我感到广东开始搞活后，在改革方面的承受能力增强了。特别是在价格改革方面。希望你们继续提供经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讲到，改革能否搞好，关键在于价格体系。许多外国人评论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胆子

* 这是赵紫阳考察广东期间和听取省委常委汇报后的谈话要点。

是大的，但有风险。希望中国改革能成功。他们担心的主要是价格问题。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改革的一系列问题联系起来。如讲到企业活力，就必须改革计划体制。如果光讲企业活力，不讲计划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就是一句空话。过去我们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不搞指导性计划，一切捆得死死的，这样企业就活不了。而要搞指导性计划，要搞活，价格体系不改革，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的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影响企业生产。国家给企业自主权，企业要搞活，它就要按利润来生产。如果价格不合理，市场需要的，企业不愿意生产；市场不需要的它却生产，造成产销脱节。这对小企业来说，问题不大。因为它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是自由价格；但大企业不同，国家要求它按计划生产，要是价格不合理，企业就拣有利的生产，社会的需要就不能满足，就会发生产销脱节。所以，价格体系改革是个关键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金融问题。经济搞活后，金融制度不适应，不改革，也不行，这个问题现在正在研究。你们广东在价格改革方面有一些好的经验。由于人民收入增加了，搞价格改革，承受能力也增大了。那天讲的广州蔬菜购销完全放开问题，如果在北京，价格一下子提高30%，就会成为问题。但广州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要按小平同志讲的，在局部地区先搞，成功了再扩大。一步一步走，走一步看一步，一步走好了，再走下一步。哪一步走得不好，再改回来。小平同志这个话很重要。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处于试验、实践的过程。《决定》把改革的路子指出来了，但尚未具体化。到底如何走，还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广东在改革方面，很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包括反面的经验。广州市蔬菜放开，就是好的经验。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都应当为开放和改革提供经验。

这几天我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利用特区和沿海地区把外引和内联结合起来。这是开放的概念。同时也要通过沿海地区创造改革的经验。我们可以通过特区和沿海地带，对引进来的外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方法起筛选的作用。外国的东西，一下子拿到内地还不适应，不能发挥作用；通过沿海地带和特区，看哪一些适合，哪一些不适合，起筛选的作用。日本人讲是过滤，我讲的是筛选。沿海地带和特区，一个是开放的结合部，一个是把国外的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制度等在这

里进行筛选，再转移到内地去。比如说，可以搞一些跨部门、跨地区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和成套工程服务公司。这在国外是一种很普遍的形式，通过中间商，也就是我们讲的“皮包公司”，把一个个企业联合起来。这种公司，可以总承包某项工程，然后它去找承包商，从设计到成套设备都包起来。通过投标承包，然后组织成套设备供应，谁的设备好，就买谁的。广州珠江外资建设总公司就是这种形式，它现在是搞民用建筑，还没有发展到搞工业建筑。我和深圳的同志讲，你们也可搞这种公司，最好搞中外合营的，这样可以把国外的信息、技术、管理同国内的服务连结起来。公司搞起来，可以承担北京、上海的工程。这种公司，在沿海搞比在内地有利条件较多。

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有一套适合它的情况的经营管理制度、形式和知识，我们要引进来，得有个地方进行消化、筛选，通过沿海，就可以找到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情况结合的东西。刚才仲夷同志讲的我很赞成，沿海的开放，不单是在沿海的作用，而是在全国都要发挥的作用，沿海要为内地提供经验。我看除了沿海十四个进一步开放的城市外，要考虑从辽东半岛到广西北海市整个沿海地带的逐步开放。将来我国的经济会出现不同的模式：一是特区，二是沿海地带，三是内地。这样，在管理、价格等方面，将会有先有后地出现这种那种新的形式。整个改革也就会形成一种滚动的形式，从外到内、从沿海到内地滚动。现在我们就更要更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要利用特区、开放城市和沿海地带创造推进改革的经验。

二、关于广东的电力建设问题

广东前进中的困难，突出的是电。你们集资，首先要把力量放在这个方面。你们的宾馆越盖越多，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加工工厂越办越多，迫切需要解决电的问题，我主张你们首先在发展电力方面发债券。发债券办电，可以按债券分电，也可以分利息。债券，可抵押，也可以在银行贴现。我们还没有定出搞交易所，但可以通过银行来搞。除了发债券办电外，我还主张你们想办法把海南岛的天然气用管子引到大陆来。这一点你们要下大决心，要下大力量。这是一本万利的事。电价是要提高的，但不能用提

高电价的办法来搞基本建设，来搞天然气管道。搞电的基本建设还是要靠发债券。此外，中央一部分企业也可以到你们这里办电。总之，我主张你们把资金集中一点用于办电，通过发债券、引进外资的办法，还有别的集资办法，或者把这些办法结合起来。有了电，别的就有了。要千方百计增加发电能力。

你们还可以研究一下，在核电站再加一台机组，发的电供你们自己用，目前计划的是两台机组，在这个基础上让你们再增加一台。有了基础，再加一台就省钱。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和风险，可能就是将来核电站的电费贵一点。此外，还有红水河，也可以利用外资来办，这个没有什么不好。

对于广东来说，交通和电力都重要。但对比起来，电力比交通更重要，你们要想办法。不然，工厂开得越多，停工时间也越多。解决这些问题，光依赖中央不行，要发动大家集资来办。

三、关于广东的外汇平衡问题

广东前进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外汇如何平衡。一路走一路看，感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各地都是用外汇多，创外汇少。引进设备用外汇，引进技术用外汇，甚至连大宾馆的食品、水果都用外汇。但引进项目所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是内销赚取人民币，而不是创汇。这样下去，我看广东外汇平衡就有问题了。从全国来说，中央目前还积存一些外汇。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有那么多外汇，不是正常现象。我估计，三年以后，国家的外汇会出现逆差。我们国家不应当把外汇积压在银行，要采取措施用到建设上。从广东的情况看，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搞得很多，引进了不少设备和技术，这是好的，但产品很多都是内销，这就必须考虑将来的外汇平衡问题。平衡在珠江三角洲我注意了这个问题。进口原料和零部件，加工装配后内销，当然非常好销。但是，你们这个地方，人民币多，外汇少，要拿人民币去高价买外汇。因此，从发展来看，你们的外汇平衡就是个大问题。在广东，人民币值跌得厉害，如果不注意，就会从广东发展到全国，冲击人民币。我原来只担心特区发行了特区货币冲击人民币，现在是广东的外汇自己不能平衡，外汇出现黑市，冲击人民币。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搞外汇。

用什么办法搞外汇呢？原来想靠工业品打出去搞外汇，现在看来这个路子不会太宽，包括特区也是这样。要看清这么一个形势，今天我们沿海开放，跟过去新加坡、南朝鲜、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同。它们过去搞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加工出口，很快把经济发展起来。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市场条件不如过去。现在的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保护主义盛行，引进设备、进口原料加工成产品后拿去出口，当然不是不可能，但这个前景并不太好。要把产品打出去，会遇到相当多的困难。所以要自己想办法创汇。如果光走来料加工后出口的路子，三年或两年以后，抢购外汇不知要搞到什么程度，因此，必须另找一条路子才行。

另一条路子是什么呢？我在中山市讲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将来出口前途比较大的大概有两类：一是传统的轻纺工业，二是新兴的食品工业。我们的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要认真搞技术改造。食品、轻纺工业能够通过沿海的技术、设备，提高质量，改进包装，就可以增加出口。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输出原料，别人拿去加工赚钱。中国的蚕丝，香港拿去加工，不知赚了多少钱。现在要把后面这些加工转到国内来，首先转到沿海，使产品增值，然后出口，多创汇。一个是把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到沿海和特区；一个是把内地的东西在沿海加工增值后再出口。这方面广东有很大的优势，这里信息灵通，交通方便，关键是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产品质量，搞好速冻、密封，改进包装。这样，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上去了，然后把沿海加工、机械业搞上去。这样，外国占我们的市场，我们也占国外的市场，外汇的平衡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还能创造更多的外汇，就循环起来了，可以引进更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我有个想法，除了特区和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外，还准备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开放地区。两个三角洲都有大三角和小三角之分。具体划多大范围，恐怕先搞小三角好，试一试，搞二、三年，搞好了再搞大三角，然后再扩大到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我看这个没有什么危险，而且有利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中国的纺织品不是数量问题，根本问题是提高质量，搞增值。搞好了，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外汇不成问题。搞低档产品在国外挤来挤去，是没有前途的。引进设备、技术，一开始就要把起点搞高一点。我们的轻纺产品，

到苏联还有很大的市场，但苏联也不是 50 年代的苏联了，东欧也不是 50 年代的东欧了，人家的产品也是有改进的。我们的传统的东西不改造不提高是不行的。波兰、巴西、墨西哥都碰到一个钉子：引进大量工业设备，但产品打不出去。我们要搞高档产品，打出去。除了继续发展旅游、来料加工、通过落实华侨政策促使华侨投资和捐赠、劳务出口等，多搞一些外汇外，主要的是改造传统的轻纺工业和搞新兴的食品工业。我们的产品要创自己的商标，也可以利用外国的名牌，等到出了名，外国都知道是中国的产品以后，就可以打自己的牌子。

至于你们的外汇分成问题，这次外贸会议把全国外汇留成比例从 13% 提到 25%，大家都高兴，就广东和福建两家要求提高比例，保持比全国高 7% 的差距。外贸会议的这个盘子，总的来讲留成比例是提高了，不分计划内、计划外。但考虑到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外汇包干，广东用外汇又比较多，可以用别的办法照顾一下。请郑拓彬同志回去研究一下，在全国基本办法的前提下，找个照顾的办法，体现一点特殊政策，以示区别。

还有侨汇的比例，留给侨乡多一点，中央不拿了，省里也不要拿，都留给侨乡，让侨乡利用这些侨汇来加速侨乡的建设，落实侨房政策。土改、“文革”占的侨房很多，要加紧侨房政策的落实。侨汇政策、华侨投资优惠政策，原来中央书记处讨论过一次。华侨投资优惠待遇搞了一个条例，还没有来得及通过，要催促办理。

关于广东办理个人外汇存款，外汇存取自由问题，我原则上是赞成的，由人民银行刘鸿儒同志回去研究提出办法。

四、关于广东的财政体制问题

落实广东包干绝对数，我看没有什么问题，我在北京已经讲了这个问题。不会因为明年实行新的财政制度，而一下子使广东多上交中央几亿元。这个你们可以放心。我可以先定这么个原则。总之，广东的既得利益不会受影响。全国的政策都是保护既得利益。

这次财政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不是中央克扣地方，不会增加地方的

负担，因而也没有使中央集中更多的财力。今年中央财政赤字是 50 亿元。明年的赤字还会增大。我们现在先给你们打个招呼，今后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大致有三个，就是“多借债，少拨款，银行挑重担”。第一个办法就是借内债，发国库券。国库券可以搞中期的，也可以搞短期的，利息可以高一点，可以到银行抵押、贴现。第二个办法，就是中央少拨款，由各地自己集资，很多事情自己办，特别是能源、交通。有的项目可以集资去办，然后收费补偿。第三个办法，银行多挑重担，许多事情通过银行资金去办。总而言之，地方的钱，企业的钱，中央不想多拿，把钱留给地方和企业，让地方自己多办事。当然，重大的项目还是由中央来办。

关于退税问题，我还是这个态度，绝不会因为实行新的财政制度而增加你们几亿元的上交数，我相信财政部也不会这样。总的原则就是这样。

五、关于广东的外贸问题

这几年外贸为什么会亏损？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多出口了高亏产品。如果今年初不下决心缩减高亏产品出口，今年的外贸亏损恐怕不会少于去年，还可能会比去年增加。今年初下决心把高亏产品缩减 30%，全国出口亏损就减少了 20 亿元。但是，开始时各省都哇哇叫，说失业工人有多少，出口要减缩多少。各省纷纷给国务院打电报要求增加出口。明明是高亏产品都要争着出口，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有个利益问题，得利归地方，亏损由中央包。后来国务院表了一个态度，如果你一定要出高亏产品，我就不承认，亏损我不负责任，可以实行代理。结果今年出口也还是增加了，但亏损却比去年大大减少了。不然的话，高亏产品照出，亏损由中央包。所以定了这一条，高亏产品中央不出口了，要出你们自己出，自己负担亏损，中央不负担。

我主张珠江三角洲，地方外贸要有直接经营出口权，但要有一个管理办法把价格管住。价格怎么管？可以采取管低不管高的办法。低价竞销我就管它。比如说，确定某个产品要卖五块钱，你出口可以卖到高于五块钱甚至可以卖到到十块，也准你出；低于五块钱就不准出。这样珠江三角洲的鲜活产品，基本上可以放开让它直来直去，直接到香港，根本不用采取

外贸收购办法。你可以直接去卖，也可以找代理商，只要你有本事就多出，没有本事就少出。广东有条件，内地的省份就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有一条必须要管住。价格必须往上增，不能往下降，低于规定的价格就不准出。只要有这条就可以放开。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例如欧洲共同体，在钢材不景气的时候，它就走这条路。它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好几个国家，为了不降低钢材价格，就必须减少出口。还有石油输出国集团也是这样做，甚至有几个国家虽然没有参加石油输出国集团，但它们基本上也都采取统一行动。为了输出石油，它们有时也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使价格下跌，但只能降到一定价格（现在降到一桶 29 美元）。低于这个价格就不准出口。一个国家也好，跨国公司也好，国家集团也好，都是采取这个办法。我看有了这一条基本上就可以管住。当然，还要有配额，不然会自己挤自己。

珠江三角洲放开鲜活产品直接出口很有好处。现在很明显，蔬菜放开后，质量提高，损耗减少，管理水平也提高了，还可以提高产品的换汇率。珠江三角洲可以先放开。香港市场的鲜活产品，逐步由广东或主要由广东来占领。现在香港市场，台湾、南朝鲜、新加坡的食品还占很大的比重。只要符合刚才我讲的原则，香港食品市场可以由广东占领。我们何必从很远的地方把鲜活产品运到香港市场？没有必要。香港市场的水果，广东也可以去占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靠提高质量，搞好包装，提高竞争力，才有可能占领香港市场。我在珠江三角洲已讲了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这种试验。组织地方公司，民间公司也可以，鲜活产品可以直来直去，国营专业公司逐步地不直接经营鲜活产品。香港需要什么东西，要由地方直接经营。将来哪一个公司搞得最好，就多给配额。南朝鲜全国性的外贸公司有六家，国家赋予它出口的权力，但它六家公司不像我们的专业公司那样一挂起牌子就永远是它经营了，它是三年一换，三年搞得好就可以继续搞下去，搞得不好就轮换，这样有利于提高对外的竞争能力。我们现在也有竞争，但不会一致对外，对外竞争的能力很差，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国内的竞争要有利于提高对外的竞争能力。国内的配额，谁经营得好就多给，谁经营不好就减少。各个直接经营对港澳出口鲜活产品的公司，可以组织个协会，管理配额和价格等问题。这个问题，请广东外贸局同经贸部商量个办法，由广东省组织实施。办法一开始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方向应当是

这样。第一步搞鲜活产品，像蔬菜、塘鱼、花卉，还有荔枝、香蕉等水果，直来直去，地方经营。先搞这几样东西，搞个试验，搞成功了，再扩大。总的来说，香港这几百万人吃的东西，广东要去占领市场。这样一来，就把广东的、珠江三角洲的食品工业带起来了。这个问题，原则就这样定。办法由你们去研究。

关于出口许可证问题。将来有些产品的许可证可以授权给省发，不一定都统到经贸部，可以给省一个控制数，由省来发。这个问题，请郑拓彬同志回去研究。我看来料加工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由部批，第二类由省批，第三类不发放许可证。对国际市场的变化，我们还不适应。有些需要发许可证的没有发，有些需要放开的没有放开，造成很大的混乱。这个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来决定。国际市场天天变，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对许可证问题要灵活掌握。

关于鲜活商品的边境小额贸易，原则上都应允许。广东有本事到外国去办企业，我也赞成。

外贸体制改革不是后退了，而是前进了。主要是实行政企分开，企业自负盈亏。现在下面感到卡死了，一是由于有些原则还没有具体化，二是还没有经验。我讲过，第一，经贸部不能把政府的权交给专业外贸公司，而是要把权收归政府，否则就不是政企分开；第二，政府的权有的要分散；第三，中央、地方的政府对专业外贸公司与对地方的外贸公司应一视同仁。现在有的问题还未具体化，有的可以先搞几个月，看一看，实践一段。总之是政企要分开，不是划分条条、块块，像过去那样搞法。

六、关于珠江三角洲农业结构问题

在粮食暂时过剩的情况下，你们这里一些地区可以少种粮食。现在粮产区的粮食没有出路，非粮产区特别是山区又还得种粮食。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形势，就是在粮食暂时过剩的情况下，能解决调整农业结构的问题。宁夏河套地区粮食丰收，压了十三亿斤粮食。他们的办法是由供销社经营计划外粮食。按三七开的价格收购粮产区的粮食供应山区，运费和手续费国家负责。农民按收购价买粮，山区不用种粮食了，可以改种别

的，这样山区农民就能增加收入，比种粮食划算。我这次到珠江三角洲，就是宣传这个主张。你这个地方需要粮食，可与湖南、江西签订合同，一年供应你多少粮食。按什么价格呢？按国家收购价，你们也不要财政赔钱。

我们的粮食其实并不多。发达的国家人均需要一千五百斤粮食，苏联人均也需要一千多斤粮食，中国平均只达到八百斤粮食，为什么又多了呢？作为口粮来说多了，光是吃饭吃不了这么多，就是因为没有加工成为饲料，没有转化为肉类。这里也有价格问题。

适当少种粮食，改种其它作物，要有一个逐年实施的过程。不可能把几百万亩土地都种了香蕉，只能逐年调整。可以采取佛山市委提出的办法，以促进农业结构的改革。愿生产粮食就生产粮食，不适宜种和不愿意生产粮食的，就不生产粮食。

珠江三角洲调整农业结构，还要考虑适应外贸创汇的需要。要看国外需要些什么东西，我们就种植什么，就加工什么，把珠江三角洲变成出口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全国不能讲贸易立国，但珠江三角洲可以讲“贸易起飞”，以进入国际市场为主要目标。为此，珠江三角洲的生产方针，应当是贸—工—农，而不是农—工—贸。不是你种什么就加工什么，加工什么就出口什么，而是倒过来，由外贸牵头，看国际市场最需要什么，然后考虑加工什么，再考虑种植什么，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结构应围绕这个来调整。首先考虑港澳吃什么东西，然后来搞什么食品加工。这里交通方便，信息灵通，要引进先进设备来搞加工，这样就会有竞争力。光明畜牧场的经验就是证明。就是说，要按贸—工—农来安排。这个搞好了，完全可以占领香港市场，然后打入东南亚、日本，还可以进入阿拉伯。

顺德的同志说到的出口蚕丝亏损问题，我的印象蚕丝不能出口那么多，卖不出去；可以转一部分内销，又需要补贴。你们这里有这个问题，江苏、四川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丝绸公司统得太死的问题又当别论；如果是生产结构问题，你们就可以改过来，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来安排种桑养蚕。过去珠江三角洲也有挖桑种蔗的例子。国际市场的蚕丝好销，就挖蔗种桑；不好销，就挖桑种蔗。珠江三角洲种蚕桑不一定很划算。不划算就少种。

关于生猪问题，猪肉要提价，再不提价，明年就没有猪肉吃了。根本

的问题是粮价高，猪价低，农民不愿养猪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水平，还是猪肉为纲。没有猪肉吃，别的顶不上，人民不赞成。广东生猪取不取消派购任务，你们自己考虑。你们如果放开，一斤猪肉补贴消费者五角钱，这不增加国家负担了吗？你们职工工资水平高，放开也可以考虑，但从外省调进的生猪的差价，就保持目前的水平，不再增加。

七、关于经济特区问题

特区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做得很好，最重要的是进行了改革的探索，为内地提供了经验。管理体制的改革，你们是先行的。特区是起“窗口”的作用，也是改革的跳板。你们的经验内地可以借鉴。现在国内外都对特区一致叫好。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特区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非常重要。是否物质多了人就变得不文明了？我看不是的。日本的社会风气就比美国好。香港的社会风气也不好。新加坡的社会风气却比较好，他们提倡儒道，提倡孝敬父母。连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¹也说，物质文明要学西方，精神文明要保持东方的传统。我们在经济上要赶上发达的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要引进来，但千万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东西全盘搬过来。我们不提倡封建道德，但要把中华民族固有的文明和优良传统保持下来。

特区不要笼统地讲以“块块为主”。属于政府职能这部分的权力，你是块块为主；属于企业的，你就不要去干预，否则企业就不能指挥生产了。你们讲的应该是立法权这个“块块”。特区政府的功能是什么？要研究清楚。然后才好考虑你要的是什么权力，哪些权力要扩大，哪些权力要缩小。直接管理生产的权力恐怕要缩小。要靠价格，靠市场调节，这样扯皮的事就少了，很多矛盾就解决了。过去我们把很大的精力花在这个方面。今后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围绕市场信息转，谁搞得好谁就发展。特区要以市场调节为主。你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办事。有了法律就应该按法律办，如立法不完善可以修改，有纠纷就到法院去打官司。部门之间的利益靠市场调节，关键是个法律问题。什么叫重大方针？重大方针主要表现在立法和

法律上。法律是很具体的东西。你们那个税率是百分之十五，就是百分之十五。搞市场调节，特区政府领导经济根本是两条：一是为企业创造好的环境；二是企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企业“组阁”、“聘任”后，将来党委对干部也少管了。当然现在还需要有个过渡。政府管理经济的概念要来个彻底的革命，尤其是特区。当然，中央各部和海关都要支持你们。将来就是个配额问题，哪些能进出，哪些不能进出，都要写在法律上。现在要有个过渡，最后过渡到立法这个环节上。立法本身包括你们的权力，也包括中央的权力。你们不要侵犯中央的权力，中央也不侵犯你们的权力，都按法律办事。所以，目标要搞明确，这次三中全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叫做“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这句话不要小看，是个大方针。这同我们过去传统的管理办法有很大的不同。

特区的经济是“外向型”的还是“内向型”的呢？这个问题也要很好研究。大量搞加工装配、进口原料，我看相当一部分产品外销的前景并不乐观。我同中央几个部的同志说过，是否可以利用国内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搞些产品打出去。现在外国人到中国投资，第一，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的市场；第二，是廉价劳动力。他们垂涎的是市场。我们要让出一部分市场。我们利用外资引进设备、技术和进口原料，产品要全部出口或大部分出口的希望是不大的。如果依靠国内工业基础，加上你们的有利条件，引进国外技术和关键的零部件，搞技术开发，也许有较多的产品能够打出去，比如皮鞋，沿海城市搞得好的，就有可能进入国际市场，至少一双皮鞋可多卖五美元。意大利卖五十多美元，而我们的皮革质量比它的好，却只能卖五美元。主要是加工和样式问题。这一点内地不容易做到，但特区和沿海城市条件较好，可以做到。依靠国内的原料，通过技术改造，把加工产品搞好，使内地的粗加工，到你们这里变成精加工，有些是把包装搞好就可出口赚更多外汇。日本就是把从中国进口的东西改包装再卖出去赚钱的，我们的特区和沿海城市也可以这样干。你们这里要研究后方工业，要利用后方工业的基础，要给它提供信息。

特区，通过加工搞产品增值很重要，不是简单地搞转手买卖。特区，包括沿海城市，是我们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通过这个桥头堡，一是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内地，二是把内地的东西在这里加工增值再出口。现在军

工方面已在特区这样做。特区这个窗口，就起了枢纽的作用、交换机的作用。这样搞，特区也就不孤立了，沿海城市也就不孤立了。外引和内联就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做好了，我们就可以通过特区和沿海把全国的经济带动起来。

特区的财政包干问题，我们对省里的包干不动，省里对你们动不动，我不好干涉，这是你们省里的问题。

对中央各部驻深圳的企业所获利润，你们可以收地方市政建设税，不要收所得税。如果所得税收了归你们，就有一个要不要调整包干基数的问题。收地方市政建设税是合理的。特区的建设费用比较大，投资环境比较好，市政建设税征多一点我赞成，这没有连锁反应的问题。为了使地方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将来可以不用包干的办法，可以划分税种，哪一种税收归地方收入，哪一种要上交，哪些是共享税，将来可以研究，这样做可能比较合理一些。

八、关于广州蔬菜全面放开经营问题

五十年代初，广州没有感到什么蔬菜问题。那时候都是市场调节，旺季价格便宜一点，淡季价格高一些。淡旺季是用价格、供求关系来调节。一九五五年以前，那时候主要是菜栏的形式，农民一家一户到城市，把蔬菜卖给菜栏，由菜栏来经营。一九五七年在省委五楼开会，魏今非²提出蔬菜问题以后省委一直讨论蔬菜问题。

你们选在冬季放开，这个时候是蔬菜旺季。这个季节选得好。过去这个季节供过于求，国营蔬菜公司收了以后又不卖出去，国营公司赔钱主要是赔在这里。现在这个时候实行放开，国营公司不用赔这个钱了，农民自负盈亏了，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的角度来讲，旺季放开有利于使蔬菜价格不至于向上浮动过大。

蔬菜放开后，总的价格水平会向上浮动，但从全年来讲，不会浮动很高。为什么呢？全部放开以后，蔬菜价格有时向上浮动，会刺激蔬菜生产增多。因为现在生产蔬菜比生产粮食划算，这样，在蔬菜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它的结果就会促进蔬菜生产。价格的浮动是正常现象。问题是头几年

不能浮动太大。因为这个东西比别的东西影响大，关系到每一个人。广州每人每天要半斤蔬菜。蔬菜一放开，价格浮动是不可避免的，淡旺季差价也肯定存在。这对我们调节余缺，调节季节差价、品种差价、质量差价都有好处。只要不发生大的波动就行。从道理上讲，蔬菜放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小城市蔬菜市场一直是放开的，近几年来几乎所有的中等城市也都是放开的，像湖南岳阳，也是放开的，结果没有事。

北京研究过这样一个问题，看来这个趋势不可避免，就是蔬菜从近郊向远郊转移。远郊种菜，比种粮食的经济效益好。如果农民自己经营，自己用汽车来运输，不经过中间环节，装了车就运走，大概二百公里以内没有问题。拂晓装车，大清早就可以上市。现在北京的蔬菜往远郊转移，过去蔬菜的主要产地玉渊潭，还有四季青，现在这些地方对种蔬菜毫无兴趣。近郊土地搞什么都比种菜好，搞工厂比种菜好，建仓库比种菜好，种花也比种菜好。因此它不愿意种菜，千方百计对付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控制面积？你不能天天去丈量。过去还可以靠行政命令，现在这些不行了。过去还可以靠扣粮食。现在粮食也控制不住了，稍赚点钱就可以买到粮食。所以面积是控制不住的。广州可以到远郊，还可以到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签订蔬菜合同。南海、番禺、中山、顺德，还有清远、花县，都可以。签订合同也可以，让开一部分市场也可以。广州蔬菜紧张，除了其它一些原因之外，与条块分割也有很大关系。过去南海东一乡、东二乡、大沥都是种蔬菜的；番禺的大石都是种蔬菜供应广州市的；后来花县也种蔬菜，但以后改种粮食了。蔬菜要向外县发展，可以更远一点。

为了方便农民卖菜，城市可以搞一些网点，可以搞一些菜栏，农民运来后自己交给菜栏。这样慢慢地来解决城市蔬菜供应，调节旺季淡季。旺季，近郊的蔬菜比较多，远郊知道这个时候价钱比较低，他就不会来了。淡季，广州蔬菜价格水平最高的时候，外面的菜就来了，价格就不会涨那么高。当然必须保留一点季节差价，否则淡季人家就不种菜了。这样搞的结果，有利于调整广州郊区的农业结构。近郊将来不一定种菜，要种的话，就种些细菜。

广州的蔬菜放开以后，要采取一些措施解决淡季的问题。旺季放开，要设法做到淡季不发生大的波动。放开以后，淡季的持续时间会缩短，农

民会想办法提前上市，他们适应市场需要的步子会快得多，过去国营的反应很慢。价钱一高，外面蔬菜都来了，价钱一低就不来，它会自动调节。要是淡季价钱涨得很高，国家要随行就市收购一部分蔬菜，调剂余缺。过去补贴，就补在旺季和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造成很大浪费。现在把过去补贴亏损的钱补在调剂余缺，平抑价格，有利于蔬菜的稳定供应，这是一个办法。另一个是要从外地组织菜源进来。这样，淡季的蔬菜供应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注 释

1. 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Romuáldez Marcos, 1929-),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曾利用其在娱乐界和政界的关系力挺马科斯连续执政，终因贪腐和奢华导致马科斯下台流亡美国。

2. 魏今非(1903-1983), 江苏句容人。时任国务院财办副主任，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商业部顾问，国家工商总局局长。

深圳特区要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经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你们这几年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做得很好，最重要的是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为内地提供了经验。你们改革先行一步。如工资改革、物价问题的解决。这里搞了广州搞；管理体制的改革，你们也是先行。内地叫改革现行体制，对你们，我过去讲是完全跳出现行的体制。特区是技术引进等的“窗口”，也是改革的跳板。你们的经验内地可以借鉴。不少外国朋友称赞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又担心我们搞乱，劝我们稳一些。这么大的国家嘛。整个改革你们要研究。深圳到底起些什么作用？就是两个任务，一个是“窗口”作用，另一个是为全国的改革提供经验。你们的地方不大，但你们的任务很大，可以说是尖兵，是开拓者。

你们特区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非常重要。是不是人一富就变得精神文明不好呢？我看不是的。日本的社会风气就比美国好，美国很糟糕，特别是好莱坞。香港的社会风气也不好。新加坡的社会风气却比较好，他们提倡儒道，提倡孝敬父母，物质文明要学西方，但要保持东方的文化。我们在经济上要赶上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要引进来，搞起来，但千万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东西全盘搬过来。我们不提倡封建道德，但要把中华民族固有的文明和优良的传统保持下来。

* 这是赵紫阳在接见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成员时的讲话。

现在国内外对你们特区都一致叫好。对此，市委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过去压力大，你们卧薪尝胆，压不垮；现在一片叫好声中，你们更要夸不垮。你们特区担负的任务很重，要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又要为全国改革提供借鉴，很有点名气。最重要的是市委班子要团结，要同心协力，不能互相抵消，要发挥各人的长处，像机器一样，部件要配套，统统都成为关键部件就成不了机器。人无完人，要各自发挥所长，长短搭配，取长补短，互相支持，互相谅解。深圳市委的班子以梁湘¹同志为核心，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班子。梁湘同志工作是很好的，大家要支持梁湘同志，梁湘同志也要放手让大家干。在改革中，深圳特区要为全国提供经验，不仅提供建高楼大厦和服务员也穿西装的经验，更重要的还要提供领导班子团结的经验，搞好改革的经验。要记住，领导同志之间，团结和友谊非常重要。

注 释

1. 梁湘(1919-1998)，广东开平人。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广东韶关地委副书记，广东省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海南省委副书记，首任海南省长。

振兴上海 充分发挥全国经济中心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九日

振兴上海的问题，七月间就提出来了，现在快半年了。上海的同志和北京的同志一起，作了很多调查研究，开过一次上海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上海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我看这个文件基本上是好的。至于其中一些具体建议和要求，依林同志已经回答了。这个文件讲了上海对内对外开放，讲了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技术、发展第三产业，也讲了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可以作为振兴上海的一个系统性的文件。就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把这几次讨论的东西补充进去，作一些修改，定下来。当然，这个文件只能是初步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这次我们到上海来，主要想研究一下为改造上海、振兴上海所必需的经济政策和重大措施。刚才我讲的那些大的战略，文件基本上都写了，要实现那些战略，就必须解决某些经济政策和某些重要措施，也就是说，要给上海一定的条件。我讲的是一定的条件，目前还不可能是充分的条件。前天听了上海的汇报，昨天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又与上海同志具体交换了意见。大家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就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利于上海，又要有利于全国；既要使上海过得去，也要使全国也过得去，这是一致的。上海的地位决定了这一点。上海过不去，全国也很难过得去；反过来，

* 这是赵紫阳在上海经济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

全国过不去，上海也过不去。因此，大家在主要问题上，看法是比较接近的，不是差得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依林同志都讲了，我完全同意。

中央和国务院对上海目前的处境是非常关切的。上海目前的情况，我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来概括：第一，上海对全国四化建设来讲，地位极为重要，作用非常大，是其它地方所不能代替的。第二，目前上海确实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如果不适当加以帮助，困难就难以顺利渡过。昨天国栋同志讲得很恳切，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对上海的困难，如果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那确实是对四化不负责任。第三，同时也要看到，上海确有很多优势，很多有利条件。在北戴河一开始我就谈到这一点，只要搞得好的，上海振兴是大有希望的。过去对上海有利的条件、上海的优势，看得多些；对上海多年积压的问题，看得不够。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上海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看不到上海很多优势，很多有利条件。“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这样对鼓舞全市人民的信心有好处。

现在，改造上海，振兴上海，开始摆到全国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上海正处于关键的转变时刻。我说这个话，有两方面的依据：一个方面，上海到了不转变不行的时候了。现在不转，将来会困难更大，当然也不是说再拖两年就不行了，但总及早考虑、及早着手为好。另一方面，全国的情况，也可以开始为上海的转变提供一定的条件。如果全国没有这个条件，你要转也不行。如果全国进行大调整，那你还转什么，恐怕还得挤一点出来。但是，究竟给上海多少条件，能给多大，还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可能。现在还没有条件充分满足上海的要求。这个条件要逐步创造。将来全国条件更好一点，中央就有可能再为上海提供点条件。上海已进入了关键的转变时刻，如何开始给上海一些条件，帮助上海逐步克服困难，使上海转上良性循环，从而改造上海，振兴上海，使上海为全国作更大贡献，这就是我们到上海讨论的目的所在。总的来讲，从北戴河，到你们的研讨会，到这次，讨论得很好，在思想认识上进一步明确了很多重要问题，也切实地帮助上海解决了若干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

下面，我说几点：

第一点，上海的地位和作用。

上海的作用在什么地方，我看就在于它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产值

占全国九分之一，收入占全国六分之一。上海的作用，是其他省、其他城市都没有办法代替的。今年八月在北戴河，十月在北京，我都讲过，不要把经济中心的作用，仅仅看成是，或者等同于，或者局限于工业基地的作用。上海当然是全国最大最老的工业基地之一。但是，不能把上海仅仅看成工业基地，它同时是最大的港口，最大的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中心，最大的科技中心，它本来是也应该是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也应该成为我国最大的信息中心。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的。改造上海，振兴上海，必须从这些出发。如果仅仅从工业基地来想问题，思路就不可能那么宽广，也会使它对全国的贡献受到限制。如果从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出发来想问题，眼界就开阔了，思路也就活了，路子也就宽了。这次研究上海的发展战略，总的来说体现了这一个指导思想。

应该指出，在过去条块分割的情况下，三十多年来，上海对全国尽管起了很大作用，但它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的功能，客观上受到很大的限制。解放以后，体制的限制使上海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逐步减弱。但在对内对外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已经和正在起变化，上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尽管目前上海开放和改革的程度、政策特殊的程度、措施灵活的程度，还没有其它某些地方快，但要充分估计到开放和改革将会对上海带来什么变化和什么好处，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一时可能讲不清楚，五年以后回过头来看，就清楚了。今天是提出一个问题：开放与改革，外引与内联，将会对上海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好处？（陈国栋同志：科技交流会、人才交流会、信息交流会、各种交流会蜂涌而来。现在是我们主观条件跟不上，工作跟不上，房子也没有。）我说造房子要放开，只要房子能赚钱，就会有人来盖房子。允许外国人来盖，也允许外地人到上海来盖。举个例子，江门人和广州人合作，要在北京建几十层大楼，已经签了合同。他要来赚钱，你就可以收税。你是经济中心嘛，不是简单的上海的一个圈。

正是根据这一点，我说过，考核上海经济工作，应该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首要指标，这比工农业总产值重要，世界上都用国民生产总值。要把上海对全国四化建设作出的贡献，作为评定上海工作的主要标准。实际上，上海把经济中心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经济越活跃，本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不仅不会受影响，而且可能发展得更快。单纯从工农业总产值出发想问

题，可能是费力大、效益小，用力很大，不一定很理想。我们过去以钢为纲，钢上不来；不以钢为纲，钢上来了。过去我们在鲁西南不让种棉花，结果是粮食也没有吃，后来放手种棉花，棉花上来了，粮食也上来了。很多东西，我们从内在联系上想得不够，因为过去我们不懂商品经济，不懂商品经济的互相作用。这两年，中央、国务院没有强调速度，没有给各地压指标，结果速度还可以，都是这个道理。

上海地位重要，作用很大，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考虑上海问题，要从发挥这个经济中心的功能出发，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上海的困难。

中央与国务院都知道，上海的财政负担过重，住房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市政建设欠账最多。就这一点而论，你们可以说是全国最大的困难户。说到这个程度，可以了吧！大家都公认，三十多年来，上海在支援全国建设上是出了大力的。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支持全国已经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上海也是出了大力的。我不是讲上海的改革本身，我是讲上海支持了全国的改革。

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路子是怎么走过来的：大体上是从农村到城市，从集体到全民，从小企业到大企业，从小商品到大商品，从新基地到老基地，总之是从易到难。小平同志最近讲了，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改革只能先易后难，只能一步一步过渡，走一步看一步。这里有一个经验的探索问题，也有一个社会承受能力的问题。所谓承受能力，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两个方面。小城市，小的特区，先放开，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出了问题也不会影响全局。小地方改不好，甚至还可以改回来，大城市就经不起折腾。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影响就不是半壁河山的问题。中国人聪明就聪明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事先制订一个完整的方案，全国一声令下，宣布从哪一天开始，全国统统去改。那样搞法，如果下不来台，就要大乱。农村改革好就好在这里，没有一声号令如何搞，可进可退，有些弹性。就像走冰凌一样，第一个人走的时候，总是把后面一只脚站稳，迈出前脚试探一下，着力点仍然在后面的脚上，前脚站住了再挪后脚，万一不行可以退回来。改革也是这样。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步改，这是我们的经验，今后也是这样。这样做，我们的改革是可以成功的，可以减少振动，避免

大的曲折。改革是先易后难，所以现在农村的日子好过，小企业、小城市的日子也好过，相对地说，大企业、大城市的日子不大好过。如果倒过来，一开始就把大企业、大城市放得很活，在中国条件下，恐怕是办不到的。刚才我讲的是要用过渡的方法，走一步看一步，既有一个先易后难的问题，又有一个承受能力的问题。上海一九八三年财政收入一百五十三亿元，上交国库一百三十一亿元，再加上其他一些老基地、老企业的上交，中央手里有了这些钱才能过得去，才能把农村放开，把几个小特区放开，把小企业、小商品放开。我们知道，放开以后，收入最终是会增加的。但是，在开始放开的一段时间内，上交收入是可能减少的。这里减少了，总得由那里来背。农村粮食提价，要有人背；没有人背，农村怎么提价？我在嘉定与县里同志讲过这话，中央手里如果没有这笔钱，恐怕解放军的军费、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行政经费都开不出，更不用说重点建设了。所以说，上海的人民在建设和改革中支持了全国。对上海的困难，我们要作历史的分析。

现在，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来了。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已在逐步好转，上海的活力已经并即将进一步扩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上海的困难不可能马上消失。上海过去的负担是很重的，现在只能适当减轻一点负担。今天还不能说轻装前进这个话。只能放开手脚，适当减负，发挥优势，逐步改变局面，转上良性循环。五年够不够？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

我同意国栋同志的估计，今后五年，特别是今后两三年内，上海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从外地进来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是上涨的趋势；上海的工业品，其中至少相当一部分将是下跌的趋势。当然，在物价作重大调整而引起利益的再分配时，中央会对各地、各企业的收支作出调整。所以也不必人心惶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过去吃廉价原材料和廉价能源的时代快要结束了。全国如此，上海也是如此。今后上海的企业靠什么吃饭？当然，不能说上海工业过去纯粹靠吃廉价原材料，那个说法也不对，上海吃廉价原料，别的地方也吃廉价原料，同样吃廉价原料，为什么上海的效益比别人高，可见你们也有自己的本事和优势。但今后毕竟越来越吃不上廉价原材料和廉价能源了。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靠什么？建议上海各个企业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认清这个形势。今后靠什么？靠进一步提高技术，靠进一步提高质量，靠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靠信息灵通，靠优质服

务。你们过去也是靠这些，但那是在价格低廉的情况下。今后材料价提高了，如果这些因素不提高，你就消化不了，效益就会下来。我们讲改造上海的迫切性，如果原材料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改造就不那么迫切了。上海的录音机厂是很好的了，我问了一下，我们的销售价格高于国外四倍，主要是技术上的问题，可见还是要进一步提高本领。可能最困难的是今后两三年。估计五年之后，这一关过去了，可能达到良性循环。总的说，既要看到上海面临的严峻挑战，又要切实抓住开放和改革对上海带来的新的振兴的机会。开放和改革将会把上海所蕴藏的各种优势释放出来，发挥出人们在今天所想象不到的威力。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对这一点，在今天的条件下，只会估计不足，不会估计过分。

第三点，为了使上海渡过暂时的困难，中央必须帮助上海解决一些问题。

中央的困难，你们也知道：一个是要搞重点建设，一个是要理顺物价，一个是要改革工资制度，这些都要钱，但又不能搞通货膨胀。这是中央面临的困难。全国的经济形势，比五年前好多了，但也只能说是逐步好转，还不是根本好转。过去粮棉一丰收就形势大好。这两年粮棉大丰收，却有相当一部分压在仓库里。在全国当年新增加的产值中，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国家在收购农产品时把钱给了农民，但东西堆在那里，卖不出去，国家不能把这笔钱拿回来。所以不要以为农村形势好，国家手里就宽裕了。中央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尽管如此，也要尽可能帮助上海解决点问题。现在只能对上海的一些关键问题作一个初步的解决。依林同志刚才讲了，给上海支出基数增加十五亿元。其实，我们原来在北京时，没有准备给这么多，当时考虑，大体是十亿至十三亿元的盘子。现在除了原来已经确定的降低上海调节税二亿元以外，再把支出基数提高十五亿元。上海支出基数增加十五亿元后，可以占上海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以上。刚才你们几位发言，要求把上海的分成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要求很强烈。我看，这件事暂时先按依林同志说的定下来。你们的要求，现在留个活口，回去再研究。虽然道涵同志讲的那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对全国来说多两亿元少两亿元没有什么了不起。¹但是，现在是在十五亿元的基础上再加两亿元，这就不同了！昨天，你们开了常委会，我们也开了国务院办公会，还打了电话给

北京，不好一下骤然变，还得回去看看情况。倒不是怕连锁反应。比如说，每年给你三亿美元贷款延长到一九九〇年，其它地方延长不超过三年，肯定也会有连锁反应。那就告诉他们，没有多少别的理由，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这样定了。为什么？就说上海大，上海困难，上海重要，需要解决。现在就有两种考虑，一是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能不能再提高一些；二是再过一年，到了后年，对上海的企业再减一点调节税，不从你们这个十五亿元中减，而是从中央收入中减。因为关键是要把企业搞活，企业搞活了，其它情况都会慢慢好转。企业搞不活，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将来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多年来的经验教训。（陈国栋同志：我们拥护这个意见，企业搞活了就行。）这个问题留作下一步考虑，现在不能改，暂时先按依林同志讲的定。

我还是要说，有了这些办法，有了十五亿元，有了每年三亿美元的外汇搞技术改造，再加上把金融中心办好，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我们毫不怀疑上海市委、市政府一定会把这笔钱用好的，用在刀刃上，用出效益来。希望这批钱，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用在上海，能对全国产生最大的效益。

银行问题，这次讨论没有展开，没有具体化。我是很想让银行在上海多办点事的，我们将来主要靠金融啊！将来基础设施也可以用点银行贷款。（汪道涵¹同志：你在听取技术改造、技术进步汇报时讲金融的作用，我们非常拥护。）周期比较短的，不太长的，可以用银行贷款。有的还可以贴息，一亿元的投资，贴息只要五百万元，地方财政拿五百万元贴息，就可以干一亿元的规模。基础设施搞起来了，你就收费，很多桥梁、隧道、高速公路都可以这样。所以你们要办好银行，发挥银行的作用。全国也准备这样搞，不能什么都由财政负担，财政上没有那么多钱。我在广东讲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可以考虑三条办法：一是借内债；二是减少财政负担；第三是银行多担担子。当然银行力量也有限度，不能靠发票子。

金融中心问题，我简单说一下，要把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恢复和发展起来。我主张三条：一是扩大中央银行和四家专业银行在上海的分行的自主权，包括中央银行的上海分行，也包括专业银行的上海分行。这些上海分行的职权应大于其它分行。二是在中央银行之下，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

银行，与四个专业银行平起平坐，总行设在上海，任务是拾遗补缺，经营对内对外长期短期存放款业务，可以与其它银行业务交叉，允许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三是银行也要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市政府也不要过多干预，不要把这些银行办成上海圈子内的银行。具体怎么搞，请你们提出方案。我认为，这件事办好了，其作用大约不亚于财政拨款。

第四点，要改造、振兴上海，就要把上海搞活。

要把上海搞活，首先要把上海的企业进一步搞活。希望市委、市政府再认真研究一下，如何把企业搞活。企业活了，上海就活了。这里涉及很多问题。北京来的几个同志认为，这里由于组织形式的关系，公司啊，局啊，中央已经作出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企业应当得到的权力和利益，还没完全落实到企业，且不说再进一步扩大了。搞活企业，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从企业内部条件来说，一定要把经营好坏同本企业职工的收入挂钩，与工资基金总额挂钩。这一条可以放手一点搞。对大企业来说，还有个外部条件问题。大企业怎么搞活，是改革中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希望你们这里能出一些经验。你们汇报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指令性计划不仅要留有余地，而且要逐步缩小；大企业超产部分的产品，要允许高进高出；大企业也可以搞多种经营，以辅补主；生产资料要办公开市场；除少数影响国计民生的产品外，大部分日用工业品要允许企业自销。今后，凡是不影响国计民生的商品，可以不经过商业部收购，由上海自己去销售。你们自己可以向外地去推销，外地也向上海直接订货。这样，上海的优势就容易发挥了。有些商品的价格可以放活，有些价格不能放活。我看，彩色电视机目前如果放开，价格马上就会涨得很高，不利于市场。再过一段时间情况可以好一些。我们国家将进口一些高档消费品，供求关系会起变化，问题就不大了，那时把价格放开，不会大乱。因此，这里还有个步骤问题。

我认为，上海搞活，主要是两条，一是企业要搞活，第二是要有重点地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必须搞。没有电、没有路，没有土地商品化，就没有办法开发。现在上海欠账很多，但总得有个重点，钱就是那么多。投资环境改善了，外商就会来，开放的好处，外引内联的好处就会大量涌向上海。随着这些问题的改善，其他情况都会逐步改善。

污染治理问题，民用建筑问题，要搞，不搞是不行的。但是不是一下子就搞那么多，这要平衡一下。我也知道住宅问题是上海的爆炸性的问题。如果大家看到企业搞活了，工人工资增加了，外商来了，路也在修了，大家就看到了希望，承受能力就会增加。（陈国栋同志：一个市场物价适当，一个工资福利提高，视线就会转移一点。）比较起来，为生产服务的、为开放服务的基础设施恐怕要摆到第一位。其它方面的设施，欠账固然多，但这一方面钱用多了，就限制了外引内联，光搞住房和治理污染就会没有后劲。我知道上海住房的尖锐性，但只能逐步来，当然房子也得造，使人们看到问题确实在一步一步解决。但钱就这么多，总得有个重点。搞活上海，我还是讲两条。一个叫做搞活企业；一个就是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增强对国外和内地的吸引力，同时也给人民以希望。

第五点，最后一点，讲一下今后五年上海的发展重点。

传统工业要改造，新兴工业的比例要高于全国，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根据这样一个战略方针，最近几年内，最重要的是要搞好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传统工业的改造问题，同时也包括一些新兴工业。新兴工业本身，很多也不一定要另起炉灶，还是要通过技术改造，提高技术水平，增加一些新兴工业的比例。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今后几年内，大量的资金要用于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今后三五年内，上海的经济速度究竟怎么样？如果抓得好，在考虑到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的时候，还要尽量研究一下怎么搞法，上海就可能有一个较好的速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有三条理由：

第一，技术改造周期比较短，并不都是五年以后才能生效的，而是逐步投入、逐步生效的。要特别有意识地注意一下，把比例分配得恰当一些，搞一些周期比较短的、见效比较快的技术改造项目。这样，这几年技术改造的效益本身就会出速度。

第二，上海的商业和第三产业今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对内对外搞活以后，商业是大有可为的，流通搞活了，上海会增加很多税收，增加收入。不仅是服务行业，不仅是饮食业，不仅是旅游业，就是商业，万商云集，到上海来买进卖出，成交量越大，你的收入也就增加得越快，收入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也增加了。商业和第三产业的问题，刚才道涵同志讲

的我是赞成的，上海第三产业现在占百分之二十一，到本世纪末，很可能发展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东京现在光服务行业，不包括商业、科技、教育，光是从事饮食、旅游、澡堂、理发的，就占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今后上海的第三产业会有很大的发展（汪道涵同志：要放手支持个体），国营、集体、个体，大家一起上。

第三，你们有这么大一个郊区，有这么多乡镇，再加上上海经济区，以及和全国的经济联系，有许多有利条件。要充分挖掘郊县的潜力，在内联上好好做点文章，这可以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发展。上海可以把一部分产品扩散到农村，或同乡镇企业协作，这样你们市区的工厂就可以腾出力量来了。利用农村的资金，利用农村的场地、城市的技术，这样结合起来，联营也好，协作也好，光十个县就是相当大的力量。另外，还要认真抓一抓改变农业经济结构的问题，这个产值也是了不起的。

这些方面抓好了，今后几年上海的发展速度不会很低的。

今天就说这些吧！主要就是要搞活企业，要看到有利条件，要把上海经济中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要搞好技术改造，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技术改造方面作出显著的成绩。这样，困难就可以逐步克服，转上良性循环，上海大有希望。

注 释

1. 汪道涵（1915-2005），安徽芜湖人，原籍安徽嘉山县，时任上海市市长。曾任华东工业部长，一机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外国投资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书记，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 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尊敬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阁下，尊敬的杰弗里·豪外交大臣阁下，尊敬的英国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同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一道，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¹。我们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为此，我要向首相阁下和其他英国朋友，以及应邀前来参加签字仪式观礼的香港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祝贺！

* 这是赵紫阳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上正式签字以后的致辞。《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赵紫阳参加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谈判。1982年9月22日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9月2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与撒切尔夫人进行会谈。撒切尔夫人陈述英国政府立场，强调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以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以单方面废除。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赵紫阳断然拒绝了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主张，声明中国政府决定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的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赵紫阳强调，国家主权与经济上的考虑相比，始终是第一位的问题。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圆满地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又为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它受到了包括五百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普遍支持，也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广泛赞扬和欢迎。

《联合声明》的达成，是我们两国共同努力的成果。两国政府在两年的谈判过程中，都能以大局为重，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状，显示了相互谅解和友好合作的精神。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特别提及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所表现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家风度。她为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所作的重大贡献是值得称颂的。我还要向不辞辛劳两次前来北京的杰弗里·豪外交大臣以及所有为中英会谈的成功作出辛勤努力的英国朋友和中国同事表示感谢。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一项国策。根据这一构想，中国政府制订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已经体现在《联合声明》及有关附件之中。实现这一伟大构想，意义将十分深远。我们欣赏英国朋友对这一构想的理解和赞誉。

确保《联合声明》不受干扰地全面贯彻实施，是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我们双方共同的责任。中国政府愿继续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同英国政府一道，力促这一目标的实现。我们也希望广大香港同胞和各界居民同心协力，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为中英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开拓了新的前景。中英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将会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发展中英友好，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愿望，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让我们为此而继续共同努力。

谢谢各位！

注 释

1. 时任中国总理的赵紫阳与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分别代表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满意地回顾了近年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一致认为通过协商妥善地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有助于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有助于两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此，经过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同意声明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如下：

- （一）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 （二） 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 （三）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
- （四）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警务人员可以留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政府部门可以聘请英籍人士或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
- （五） 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
- （六）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
- （七）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中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继续流通，自由兑换。

- (八)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
- (九)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
- (十)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
- (十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
- (十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自本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联合王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予合作。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为求本联合声明得以有效执行，并保证一九九七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在本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二的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关于香港土地契约和其他有关事项，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三的规定处理。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同意，上述各项声明和本联合声明的附件均将付诸实施。

八、本联合声明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应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前在北京互换。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约束力。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赵紫阳(签字)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代表
玛格丽特·撒切尔(签字)

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上旬，我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去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查，先后到了广州、佛山、江门、中山、珠海、深圳和上海、嘉定、无锡、沙洲等地，参观了一些工厂、港口、商店、农村，同各地负责同志、基层干部、技术人员进行了座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开放和改革，这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社会秩序和精神面貌也很好。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进一步实行开放和改革以后，对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将带来什么影响，什么变化，从而采取正确的决策，迎接这一新的形势，促进这一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

一、必须坚持“外引内联”的方针

我国沿海地区大约有二亿人口，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地处沿海，交通方便，信息比较灵通，工业基础较好，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历史上就与国外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这是赵紫阳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考察时的讲话要点。他通过这次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实地考察，提出了著名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对于中国进一步抓住机遇，扩大对外开放，形成沿海经济开放带，带动内地经济发展，使中国迎头赶上世界经济国际化、现代化的潮流，发挥了关键作用。

实行开放政策，首先把门户打开、把经济搞活的是沿海地区。我们应当使沿海地区成为一个开放地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着，有极大的意义。

从珠江和长江三角洲这几年的实践看，要发挥它们的作用，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关系。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目的是通过经济特区，通过开放城市，通过沿海开放地带，把对外引进和对内联合、把沿海的发展和内地的开发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解决我国东西关系问题，使全国经济振兴、人民富裕起来。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应当是我们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要起跳板的作用。一个是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引进来，加以吸收、消化、创新，向内地转移；另一个是要把沿海生产的“洋货”向内地销售，把内地的原料、初级产品在这里精加工，梳妆打扮后再出口，打入国际市场，取得更好的效益。形象地说，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特别是像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应当是“两个扇面，一个枢纽”。即形成对内辐射和对外辐射两个扇面，开放城市居中起枢纽的作用。应当使它们在对内对外经济交流的辐射扇面更宽广，能力更强。这是一篇大文章，如果做好了，将不仅使沿海地区先繁荣起来，而且会带动整个内地经济的发展。

我们已经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我看还应该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进而陆续开放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北起大连港，南至北海市，构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地带。这是我们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是进出口的重要基地。它们应该主要是外向型的，要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增强竞争能力，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为此，必须在这一地带认真搞好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不如此，就休想在国际市场立住脚。在外贸上也要搞活一些，给予应有的权力，使他们能放开手脚到国际市场去竞争，占领市场。

特区、开放城市、沿海地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的对外辐射力越强，越需要有后盾，越离不开内地的合作和支持。沿海和内地各有优势，如能加强经济上的合作和交流，扬长避短，就会发挥出巨大力量。要看到，在内地包括三线地区，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有大批科技人才，有丰富的资源。如能和沿海地区结合，弥补信息不灵、知识老化、管理落后

等缺陷，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搞好技术改造，就有可能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and 经营管理水平，进入比较先进的行列。外引和内联结合得越好，沿海和内地的繁荣也越快。

发展沿海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内容是广泛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技术、资金、人才、物资、信息等方面都可以进行合作和交流，如共同开发资源、联合办厂、联合对外对内销售等。凡是中国和外国合作采取的形式，都可以仿照采用，如合作生产、合资经营、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技术咨询、工程承包等。特区、沿海城市应当热情欢迎内地的企业来投资，兴办企业，并积极支持本地企业与内地联合开发资源，联合生产名牌优质产品，交流人才和技术。要有气魄使万商云集，近悦远来。从内地特别是大三线来说，也不是要把工厂都搬到沿海来，那样做是不妥当的。但是内地的大企业应当把“触角”伸到沿海，派一些得力的经营人员和科技人员到沿海开放城市或特区，开设窗口，依靠后方基地，把触角伸到前沿，洽接业务，收集信息，使人才得到锻炼，技术得到提高。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些内联的好形式。我们参观的由航空工业部系统组织的深圳工贸中心，独资和与客商合资经营了十八个企业，形成了一个企业集团，主要经营航空精密仪器、光电仪器、微型计算机及各种应用软件。航空系统的许多企业包括三线的企业，派人参与这里公司的经营，从中获得信息、技术和订货。应当有更多的部门或地区组织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在沿海城市、在特区，建立据点。通过各种形式，加强沿海和内地的横向联系。

搞好外引内联，需要解决好有关政策问题，最重要的是在经济上要做到扬长避短，互利互惠，互相支援，以求得共同发展。国家统计局已作出决定，今后除了统计“在地区产值”外，还有一个项目叫“属地区产值”。比如广东在贵州投资办企业，“在地区产值”算贵州的，但“属地区产值”仍然算广东的，这样互相有利。

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电力建设

从广东看，经济发展中突出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能源不足，电力缺乏；二是外汇短缺。不仅广东，上海、江苏和所有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

带都共同面临这两大困难。这些问题制约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我们在两个三角洲看到，加工工业越办越多，宾馆越盖越多，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停电拉闸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少工厂是每周上四天班甚至上三天班。如果不及早解决，矛盾会更加尖锐，工厂办得越多，停电停工时间越长。这显然是不行的。中央当然要下大力帮助各地解决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问题。但光依赖中央也不行，必须发动大家办。地方各级也要首先把力量放在这个方面。可以采取集资的办法，或发电力债券的办法，千方百计增加发电能力。我在江苏说过，新增电力，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招股？比如华东电网明年预计新增装机120万千瓦，其中绝大部分理所当然要保新建成的重点项目用。与此同时，要考虑能不能挤出一部分比如几十万千瓦，像商品房子那样拿来招股，谁出钱就给谁用，然后把这笔钱又返回来用于电力投资。这样就可以促使大家把资金转到能源建设上来，谁要办加工工业，首先必须考虑电的投资。国家得了这笔钱，用于加速在建电站的建设，地方也用不着盲目去办经济效益很差的小电站，而把分散的资金集中到建设效益较好的电站上。

电，也有一个商品化的问题。采取目前的办法，办电的，一并网，就是低价出，高价进，不仅无利，而且吃亏，影响了办电的积极性。在政策上要研究能不能想办法使办电的也得到平均利润率，甚至略高一点？要使它把电卖给电网，有利可图；电网为它服务，也取得合理的收入。这一点，小水电比较难办，火电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电厂和电网都是法人，相互之间应是合同关系。办电的单位把电并入电网，第一，能得到合理的利润；第二，又能优先用电。有了这两条，办电就会有积极性。当然电网自己需要有一些骨干电厂，使电网调度有可靠保证。

沿海各地区一定要重视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办企业创造条件。要及早动手，做好区域性的规划，因地制宜积极解决电力、交通等问题。比如广东，由于南海海洋天然气的开发出现了新局面，就应当想办法集资把天然气管道从海南岛铺设到大陆来，用以发电，发展天然气化工工业。这对广东经济的起飞将起重大作用。规划，要近期与长期结合，大中小结合，有重点地抓一些关键措施、关键项目，以便尽快收到效益。

三、开辟创汇途径，解决外汇平衡问题

外汇紧缺，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另一个困难。这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表现得更突出。在这些地方，工厂设备和原材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而产品的大部分却是内销的，用出外汇多，而收回的外汇增加并不多。由于外汇短缺，广东黑市的外汇价格高出牌价一倍多，要六、七元人民币才能换一美元，港币也比牌价高50%至80%。从这里就提出必须解决外汇平衡问题。靠国家增拨外汇，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不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外汇收支平衡问题，再过两三年，就会捉襟见肘。像现在这样进口设备、原材料，生产“洋货”内销赚钱的办法就玩不转，就难以保持经济的良性循环。还要看到，在广东，人民币值跌得这么厉害，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冲击人民币，那就成为重大问题了。所以，解决外汇问题是当务之急。过去不顾一切地取得外汇，用以进口高档消费品到国内牟取暴利，已经好景不长了。应当立足于发展壮大自己的创汇能力，开辟创汇新途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增加创汇的路子在哪里？以前那种靠加工装配，再大量出口挤出去的时代，从总体上说已经过去了。现在，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竞争非常激烈。靠引进设备，进口原料，加工后返销国外，可以搞一些，但前景并不宽广。波兰、巴西、墨西哥就碰了钉子，大量工业设备引进了，而产品打不出去，外债累累，经济困难。我们应当开辟一些创汇的新路。过去的一些办法，如“三来一补”、劳务出口、侨汇、旅游等，我们要努力巩固现有阵地，进一步扩大成果。我认为中国将来出口商品前途比较大的，一是传统的轻纺工业，二是新兴的食品工业。我们有很多商品是输出原料、半成品，如坯布、生丝等，让香港、日本等地外商去加工赚钱。现在要把在国外加工那道工序转回到国内来，首先转到特区、沿海城市来，使产品加工增值，然后出口，这样就可以多创汇。我们出口的纺织品，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档次。同样数量的商品，如果低档变高档，外汇收入可以增加五、六成甚至一倍以上。由于出口配额的限制，我们的产品只有在花色、品种、质量上下功夫，才能在世界市场站稳脚跟，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阵地。

中国的食品在世界上久负盛名，问题在于我们要引进世界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搞好速冻、密封，改进包装。还有个原料的品种改良问题。首先要占领港澳市场，进而占领东南亚、日本以及中东的市场。

另外，还必须重视软件行业、劳务出口的发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软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并直接影响计算机及其应用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据有关专家预测，由于中国人多手巧，软件行业很可能成为出口的一个重要行业。这是有道理的。劳务出口、在国外搞工程承包，目前正在发展，我们要认真解决一些政策问题，这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可以预料，如果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上去了，将会带动沿海地区加工、机械工业，带动各种服务行业。这样，外国占领我们一部分市场，我们也占领外国一部分市场，路子搞对以后，外汇平衡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就可能形成。

四、改变沿海农业生产结构，按贸、工、农安排生产

沿海地区的农业，过去也是自给或半自给的，近几年才转上商品经济的轨道。随着对外开放出现的新形势，现在要求进一步转到以对外贸易的需要来考虑生产，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应当如此。为此，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抓紧改变农业生产结构。

珠江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结构怎样改变？围绕什么来改变？从调查的情况看，应当利用珠江三角洲濒临港澳的有利条件，把珠江三角洲进而把长江三角洲改变成为出口农副产品的基地、食品工业的基地。就是说，要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根据出口的需要来考虑农业结构的改变。三角洲的方针，应当是贸—工—农，而不是农—工—贸。不是你种什么，就加工什么，加工什么就出口什么，而是要倒过来，看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就考虑加工什么，种植什么。就全国看，不能讲贸易立国，但珠江三角洲可以讲“贸易起飞”，按市场需要特别是国际市场需要生产。我们搞产品“一条龙”，要以出口的最终产品为龙头，往前推。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是发展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当然，这也不是说盲目跟着市场转，而是要面向世界市场，分析市场变化趋势，作出预测，有些要与外商签订合同，使产

品的生产同市场需要衔接，把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上。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重点是要缩小一部分粮食作物的面积，恢复传统的优质大米（如丝苗、马坝油粘、血糯米等），增加一部分出口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发展养殖业。这些地方历来有出口的经验。珠江三角洲的农民说，种经济作物，就是要先“经济”，后作物，看什么最划算，就种什么，按价值规律办事。五十、六十年代，我在广东，曾提倡过发展多种经营，“立体农业”，“一步三元”。就是说一步远的地方，可以收益三元钱。这次我到新会，据说实现了“一步六元”，到中山古镇，听说已达到“一步十元”。现在港澳的食品、鲜活商品我们占的比重还不大。甚至珠江三角洲的一些高级宾馆，供应的水果，也是外国的。在北京的一些高级宾馆，要吃牛排，要吃外国品种的蔬菜，还要到香港去买。这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这个钱我们不会赚？在沿海，首先是两个三角洲，要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第一步要争取把港澳所需的鲜活商品基本上包下来，其次要逐步进入日本、东南亚市场、中东市场。我看是有条件办到的。这样做，也有利于使三角洲，使沿海地区尽快富裕起来。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要解决粮食问题。现在有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全国粮食出现了低消费水平下的相对过剩。在珠江三角洲，在苏南地区，适当减少种植粮食，改种其它，是划算的。广东佛山市准备采取农民交“代金”的变通办法，以钱代粮，顶国家任务。即把公粮、余粮、三超粮加在一起，计算一个平均价，再与市场议价粮价相比得出差价，由农民补差价，不用交实物。据试点反映，群众是欢迎的，国家也不吃亏。这些地区所缺粮食，可以和邻近生产粮食多的省签订合同，由他们负责供应。这是两利的事。宁夏采取的是另一种办法，那里河套地区丰收了，积压了十三亿斤粮食。他们由供销社经营计划外的粮食，按倒三七的比例价收购粮产区的粮食供应山区，运费和手续费由国家负担。这样山区农民就少种粮食，改种别的价值高的东西。这个办法也可以参考。总之，要解决好粮食问题，以利于农业内部和农林牧业之间的调整。

珠江三角洲放开后，外贸上要支持这里把鲜活商品直接到港澳出口。鲜活商品从别的地方运到香港市场，运距长，损耗大。今后除个别品种外，应当主要由广东直接供应。珠江三角洲可以组织地方性的公司直来直

去，减少环节。这次我去看了深圳光明农场，他们生产的鲜奶，直接用汽车运到香港，占领了香港70%的鲜奶市场。鲜活产品放开由地方经营以后，要注意统一协调，防止各地各自为政，自己人与自己人打架。应当使所有对外经营的单位了解，只有在提高质量、搞好包装上提高竞争力，才有可能占领港澳市场。竞相削价出口，挖自己的墙脚，那是自杀政策。一方面要放活，一方面也要加强统一协调。广东省和经贸部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全省性的食品工业出口协会，进行协调，管理配额和售价。出口去香港的鲜活商品的配额，也由广东省掌握，经贸部不再管了。我主张谁经营得好，就多给配额，谁经营得差，就少给配额，一年评一次。这个办法，先在珠江三角洲试验一下，然后再在长江三角洲、辽东半岛等地推广。这几个地区也要各有侧重，珠江三角洲要对准港澳；辽东半岛要利用与日本有历史关系的有利条件，发展鲜活商品和食品，打入日本市场。

农业生产掉头比较快，两三年就转过来了。只要我们方向正确，政策合理，措施得力，经过几年，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就会大见成效。随着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这些地区就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象顺德、东莞以及无锡等县，从事农业的劳力和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力的比例，已经是对开，以至四六开、三七开。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正在缩小，经济收入和消费正在向中等水平发展，我们应当加快这个进程。

五、特区、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 要为全国的改革提供经验

中国总的趋势是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开放。在经济结构、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等方面都将引起一系列深刻的改革。这就要求不仅要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而且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方法。由于特区、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所处的地位，它可能而且应当对国外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形式和方法，起到筛选、过滤的作用，使这些有用的东西，经过扬弃，经过消化、吸收，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结合起来，为我所用，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够充分地发挥出

来，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将通过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滚动式地由外到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这样可以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步过渡，一步走得不恰当，还可以退回来，是积极稳安的万全之策。从这点说，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开放和改革上，担负着为全国提供经验的探索者、先行者的重要任务。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决定，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描绘了改革的蓝图。但具体怎么走，还有待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现在我们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体系的改革。价格不合理的问题不解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加企业活力的问题就无从谈起，理顺经济关系就成为空话。我们对此既不能掉以轻心，轻率行动；又不能犹豫不决，错过时机。我认为，五年内能不能过关，主要看这一条。这次我到珠江三角洲调查，感到广东在开放以后，在改革方面的承受能力加强了，特别是表现在价格改革上。广东这几年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对物价管理逐步放开，如前年放开鱼的价格，今年九月广州市又放开蔬菜价格。放开以后，经历了“一放就活，一活就多，一多就稳”的过程，物价的趋势由上升转到稳定甚至逐步下降，塘鱼原来三元钱一斤，今年已下降到一元二角。蔬菜价格也较为平稳了。广东人民在这点上已经有了经验，思想上不是那么紧张，加上开放以后，经济活跃了，人民收入也普遍提高，从经济上、政治上，社会承受力都比其它地方强。像广州市的蔬菜，购销都完全放开，前一段价格一下提高30%，这在北京、上海就会成为问题，但广州却没有多大波动。我们相信，利用这个难得的条件，在广东、在沿海地区先实践，进而推广，物价体系的改革也是可以找到办法的。

这次到广东了解，不论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各县市，都已进行了若干改革，其中有不少可供参考和借鉴。比如：

（一）在物价改革上实行调、改、放、参相结合。即分别商品的不同情况，有的实行调价（有升有降）；有的把过于集中的物价管理权限下放给各级；有的完全放开（如小商品、部分农副产品），实行市场调节。我看还应当加上国营商业参与调节，通过吞吐一部分商品稳定物价，抑制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实行“调、改、放、参”相结合的办法，就较为妥善了。广

州市和武汉市，把蔬菜价格放开是成功的。放开初期，菜价上涨百分之三十，但菜的质量好、丢抛少，实际上差不多，所以产、供、销三方都较满意。只要在淡季国家注意余缺调节，用过去补贴亏损的钱来弥补淡季供应蔬菜的差价，完全可以在淡季解决菜的供应问题。看来可以先在南方大中城市放开，逐步在北方大城市也放开。猪肉、粮食等的价格，广东也准备陆续放开。可以让其先走一步进行探索。

（二）围绕缩短基本建设周期，改革基本建设体制。到广东参观后给我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许多基建项目周期很短，投资虽然不很省，但投产快，资金周转快，所以经济效益是好的。如年产腈纶膨体线 750 吨、“拉舍尔”毛毯 40 万条的鹤山毛纺厂，只花了十一个月就建成投产；年产涤纶长丝五千吨的新会涤纶厂，十七个月建成投产，投资比国内同样工厂省 25%，三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中山新港第一期已建成码头四个，可泊五千吨轮船，年吞吐量一百万吨，只用了八个月时间。在深圳、珠海、中山等地，六天就修建一层大楼，许多宾馆都是上层还在建设，下层就已开始营业。他们建设周期短的主要原因是：实行了招标承包制和投资包干制；包工包料，避免停工待料；县市加强领导，统一征地建设等。

（三）组建工程承包开发公司、咨询服务公司、成套设备工业公司，为社会服务。如广州外资建设总公司先后承包了十四项现代化项目，对建设单位实行一揽子承包，再分包给建筑专业队伍，负责交“钥匙”。他们负责设计、承建的白天鹅宾馆，获得了国家质量审定委员会颁发的金质奖章。这是一种好的专业化、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可以更好地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为工程的建设和资源的开发服务。

（四）集资修桥修路，改革公用事业的投资办法。珠江三角洲河渠纵横，公路车辆增多，常常几百部车等待过渡，浪费极大。他们改变一切依靠上边投资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采取集资修桥，收费回收投资的办法，先后修通了广深公路的中堂、江南两座大桥和广珠公路三洪奇、沙口等大桥，大大方便了车辆行驶，而且三年左右即可收回投资，为今后公用事业的投资开辟了一条新路。

（五）多种方式、多条渠道经营，搞活流通。到珠江三角洲各地，大家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城乡市场繁荣活跃，商品琳琅满目，几乎是应有

尽有。主要原因，是让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个体商业已发展到 53 万户、70 多万人，相当于国营商业职工的 80%，还有十万人从事长途贩运。去年全省集市贸易就达 42 亿元，占全国集市贸易总额的 11%，居全国之首。互相展开竞争，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服务态度也大为好转。

（六）开拓技术市场，促进技术的转移。珠江三角洲的许多企业都注意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是他们成功的诀窍之一。技术也是商品。他们根据引进技术的先进性及其经济价值，付予对方相当的费用。对向内地转移先进技术，也同样采取有偿转让的办法。这有利于扩大技术的交流。

（七）大胆放手启用经营型、开拓型人才，改革人事、劳动制度。对企业干部改委任制为选举聘用合同制；对劳动用工实行“报名考试，择优录取，签订合同”的办法，改固定工为合同工。把一批勇于创新、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大胆破格提拔到各级岗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他们注意引进人才。他们说，不仅要重视引进电脑，更要重视引进人脑。根据工作需要情况，有的请一两个外国专家，有的则请一个“管理集团”。如广州中国大酒店就聘请德国人为总经理的管理集团，他们有一整套办高级宾馆的经验。我们配上副职，很快也就学会全套本领。实践证明，培养这种“管理集团”的人才群体，是个较好的办法。

以上所举，只是一些方面。随着开放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还会有许多新鲜经验涌现出来，我们应当注意发现、总结，结合各地实际推广。

促进农业协调发展

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农业要有一个协调的发展

当前农业生产总的形势是好的，粮棉等各种作物连年增产，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全国农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比如现在粮食和棉花都大增产，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的现象，而某些社会需要的产品又发展不快，不能满足需要。目前除四川、湖南等少数省以外，生猪是下降的趋势，猪肉供应紧张。其它如药材、禽蛋、水产品等也供不应求。归根到底，是农业的产业结构还不那么合理，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很协调，农业的生产同社会的需求有某种程度的脱节。

这几年粮食和棉花生产发展迅速，预计今年粮食将达到八千亿斤，棉花将达到一亿一千多万担。当然，也不是说已经多得不得了，而是低消费水平下的相对过剩，一时超过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种情况是我们原来所没有想到的。我们对农业结构的改变，对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对农业应当逐步地由量到质的转化，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及时跟上形势。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同我们的农业计划体制有很大的关系。过去在商品匮乏的时候，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有它一定的作用，

* 这是赵紫阳与出席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

但由于产品统购包销，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农民用不着根据社会需要来安排生产；自上而下的生产计划和收购计划也很难订得准确，很难真正和及时反映市场的需要。

现在，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商品生产的新阶段。既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就得面向市场，考虑社会的需要。而旧的农业生产结构显然不相适应，这就要求适应商品经济的新形势，来改变结构。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内部的各品种之间，以及农业与畜牧业、林业、渔业之间，都有个调整的问题，协调发展的问题。我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查时，就讲了这个观点，强调三角洲要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围绕出口的需要来改变农业的结构。不仅沿海地区农业结构要调整，现在全国农业战线都面临着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

农业只要按商品经济的规律去办，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分工。像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过去按照上面的计划指标，只是追求高产，不讲质量，不管销路如何。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就不愿意种粮食了。佛山市就提出取消统购统销，采取农民交“代金”的办法，不交粮食。他们腾出田来种甘蔗，种花卉，种蔬菜，垒鱼塘，种香蕉和其它水果，赚更多的钱。我国沿海地区发展食品工业，很有前途。港澳和国外市场需要什么品种、什么规格的商品，就生产什么，完全按国际市场的要求去办。像深圳光明农场，和外商合作，把消毒搞好了，鲜奶三年就占领了香港 70% 的市场。广东、苏南出现的这种情况，当然在江西、湖南等内地省份就不会出现，他们的优势是生产粮食。还有些地方，适宜于发展林业，畜牧业，他们就搞这些，不一定要求粮食都要自给自足。沿海、内地、山区、丘陵，应该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发展优势产业，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交换，协调发展。此外，对一些农产品，还应当开辟新的应用领域。比如薯干，加工成淀粉后可做成异构糖，经济价值很高。像皖北、豫东南，就可以保留种一些白薯，产量也高，收入也多。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结构也发生变化。广东、苏南商品经济发达，有 60-80% 的劳力都转入工副业和第三产业。而内地这个进程就慢得多。改变农业结构，需要掌握信息，提高技术，增

加资金积累，进行人才培养，因此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应当从各方面努力，加快推进这一过程。

调整农业结构，是利国利民的措施。多年来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使农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卡壳就卡在粮食问题上。现在粮食多起来了，各方面对农业的需求增多了，市场日益扩大，这是很好的时机。农业掉头比较快，只要因势利导，认真做好工作，几年就可以大见成效。

二、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势在必行

调整农业结构，使农业本身协调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实行市场调节，逐步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现在农产品多了，粮棉出现了暂时的相对过剩，具备了放开的条件。因此，增加市场调节部分，实行市场浮动价格，可以从农村先开始。农副产品，首先是鲜活商品、生猪、蔬菜可以有步骤地放开，粮、棉等作物也可以逐步放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进而把这个基本经验推广到工业，到城市。这次价格体系的改革，也要先从农业开始，从农副产品开始。这样就会注入新的活力，使农村经济更活跃。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搞好了，具有重大的意义，将创造一个奇迹。

当然，价格放开，不等于国家不参加市场调节。对于粮、棉等大宗产品，国家对其大部分仍然按优待价收购。粮食就按倒三七开的比例价，收购一千五百亿斤或者更多一点，超过部分实行市场价格，自由浮动。但低于统购价时，国家还是要收。这就是保护价。国家要参与市场调节，吞吐物资，平抑物价，避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而造成价格的大起大跌，既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猪肉、蔬菜、水产品逐步放开以后，可能一段时间价格要上涨。根据广东等地的经验，放开以后，开始涨一段，东西多了以后，价格就由上升逐步转向平稳。为了保证城市供应，有些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猪肉，可以对定量部分实行平价供应；对有些商品，国家参与市场调节，通过补贴经营环节、低价出售，使消费者利益不受损害，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放开以后有没有危险？会不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生猪、蔬菜、鲜活商品等放开以后，肯定会使农民得到好处，积极性大为提高。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粮食，我看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因为国家按优待价已经收购一千五百亿斤以上，占了商品粮的大部分，而且这个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变。剩下的几百亿斤参加市场调节，只占一小部分，随行就市。市场价高就卖高价，市场价低就卖低价。但低到统购价时，国家就保护，予以收购，有多少收多少。这样农民是“两头保险”。种粮食多的地方，就不会愁粮食没有销路，谷贱伤农；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的地方，改种别的价值高的东西，也可以增加收入。这样可以各自发挥优势，尽快富裕起来，对国家、对农民都有好处。

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实行改革，仍按过去的老办法，统购包销，种什么就收购什么，农民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产需脱节，那就会给农民带来错误的信息。粮、棉等产品都已大量积压，还要全部按倒三七开比例价包下来收购，刺激农民大量去种植，结果又收不了那么多，或者收了以后压在仓库里，甚至露天堆放，内销也销不掉；有支付能力的国际市场也有限，出口出不了那么多，那就会使损耗大量增加，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农民所投入的劳力、资金等于白花了，而且占用了国家许多资金，影响了资金的正常循环和周转，从全局来看是很不利的。现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要作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农业增产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好处。但并不等于增加得越多，对国家的经济循环越有利。相反，有些东西过多以后，既占用国家资金，造成浪费；又不利于促进农业结构朝合理的方向转化，实际是一盘死棋，不是活棋。所以，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全面衡量一下，还是改变统购包销的办法，把价格放开，利大于弊。从根本上来讲，这是把农业进一步搞活的重要措施。这样做目前可能遇到困难，但这是前进中的困难，转变中的困难，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也要使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认识这个问题，上下左右、群策群力去战胜困难，使农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起来说，当前农业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农业一定要按照商品生产的要求，搞好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产品是通过市场交换，使农民的劳动得到社会承认的。要引导农民关心市场变化，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安排

生产，使生产和社会需求互相衔接。二是要把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国家要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参与市场调节，加强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以克服盲目性，引导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关于国家尽力支持农业结构调整

会议的简报我看了，同志们提出的问题，集中起来是两个：第一，大家都赞成农业结构非调整不可，是大势所趋。但又感到转得陡了一些，有些地方困难大，怕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在农业进行结构调整时，希望国家多给一些支持，帮助农业实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对第一个问题，大家感到陡一点，主要是指国家对粮食的收购量，是不是不要减得那么多。这件事，国务院是经过反复多次考虑才定下来的。棉花，明年国家计划收购 8500 万担，实际上只要 7000 万担就够开支了，这个数字中已经多收了一部分。粮食，按优待价收购 1500 亿斤或更多一点，这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多收。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一下，不能说这是“限购”，应该说这是放开。搞了几十年的统购统销，今天有条件改变一下，把粮食的价格放开，这是很好的事。粮食放开以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品种质量，市场价格会有升有降。如优质米价格可能上升，劣质米可能要下降；产粮区可能要下降，缺粮区可能要上升，总的趋势可能往下浮动一点。国家按优待价收购后，剩下的部分，在市场上如果低于统购价时，国家仍按统购价收购，加以保护。某些产粮区，在一定时期内还要适当照顾，过渡一下。我主张将优待价收购的 1500 亿斤，按三年安排，省与省之间有个变化，广东、福建、浙江、苏南等地，一九八五年购多少，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还可以少购一些，把这个数字加到产粮的省区，如湖南、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四川、东北三省。总数不变，但地区之间有增有减，搞个“三年早知道”，便于及早安排。各省区之间还可以签订供应粮食的经济合同。这样有利于各地发挥优势，改变结构，调整农作物品种，提高农产品质量，活跃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对大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国家当然要尽力帮助农业实现结构的改变，明年国家计划中，已经作了一些安排。但什么都想国家拿钱也不行。

帮助农村，不仅是财政问题，归根到底，还有个货币投放的问题。估计今年票子要比去年增发二百四十多亿元。明年究竟怎么样，票子再发行多少，这关系到经济的全局。所以，要通盘考虑。各地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比如苏南、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一斤粮食，要补五分钱，少生产一斤粮食，就少补五分钱。只要一放开，农民会转得很快，改种别的作物，那里的应变能力很强。把他们那里减少的粮食收购任务，转到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去，发挥这些地区种粮食的优势。有些产粮多的省，想多出口一些粮食，如果能自己找到门路，经贸部应当支持和协助，不一定都要经过总公司出口。问题是要有一个控制价，不能低于控制价倾销，自己挖自己的墙脚。有些山区半山区很不适合种粮食，应当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种草植树。但要有一个时期才有收益，而调进的粮食又要钱买。这也得有个解决的办法。除了国家已经决定拿出一笔粮食、棉布、炸药，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群众修公路外，还决定再拿出二、三百亿斤粮食，贷给山区、丘陵区，支持他们两三年，等他们经济上转过来以后归还。这样既解决了山区调整农业结构中的困难，又不增加贷款指标，同时也把仓库腾出来了。可以促使那些很不适合种粮食而又被迫种的地区，改种别的东西，换来个经济上的良性循环。问题比较大的是东北三省，那里主要是玉米多了。长期以来是东北玉米调往关内，关内猪肉调往东北，运输非常紧张。东北把粮食、猪肉放开以后，猪肉价格会上涨，农民感到卖猪比卖粮食合算，就会多养猪。过两三年猪多了，猪肉价格也会下降，使粮、猪的比价趋向合理。东北农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有利自然条件，要大力养猪、养牛、养羊，使东北猪肉能基本自给。浙江省想把粮食购销完全放开，进行试验，我们也赞成。条件是钱由省里出，自行负责，不要到中央报账。可以搞个具体方案，有关部门帮助研究一下。

总之，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转化。门路是很多的，比如调整品种，劣质改优质，潜力就很大。优质米虽然产量低一些，经济价值却高得多，是合算的。要根据不同情况，找出办法，给以不同形式的支持。

棉花问题，明年国家收购的数量已经不少。棉花多了转化比粮食还要困难。所以希望各地从大局出发，多做工作。听说鲁西北等地困难大，要

从多方面想办法，广开门路，尽量使那里的农民能够渡过困难，实现转化。

这次会上，各地同志对国务院对粮棉所采取的措施都表示支持，我代表国务院向大家表示感谢。大家提出的要求，原则上都是合理的，能够解决的就立即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也请同志们谅解。实现农业结构的合理化，迎接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形势，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关于改造和振兴上海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同志并书记处、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同志：

十二月上旬，我和依林同志到上海去，目的是和上海同志一起，研究一些为改造和振兴上海所必须解决的政策措施问题。因为涉及的面比较宽，组织了九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同行。在上海，听了市委和市府的汇报；各部的同志分别就有关问题和上海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最后和同行的同志开了一次办公会，议定了一些事项。看来，这些办法能够帮助上海解决一部分问题，上海同志基本上是满意的。现将主要情况和研究结果简报如下：

一、上海地位重要。人口占全国百分之一，工业产值占九分之一，财政收入占六分之一。三十五年累计，全市财政收入占全市国民收入百分之七十六。投资效益居全国第一位。在十四个沿海城市中，国外投资者最感兴趣的还是上海。上海繁荣，全国受益；上海衰落，损失巨大。上海的改造和振兴，是全国四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二、今年八月，国务院听取了上海经济工作汇报，随即派出调研组，和上海同志一起，组织各方面的干部、专家、学者，共同研讨，提出了《关

^{*} 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根据上海的重要地位，首先提出了改造和振兴上海的战略构想和实施举措，对于恢复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充分发挥上海国内外贸易中心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为上海后来发展的实践所证实。

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总的设想是：充分利用对内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广泛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这个文件，比较系统地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原则上可以先这样定下来，待今后在实践中再逐步完善。

三、实现这个经济发展战略是有可能的。上海的优势，不是个别的、单项的优势，而是综合的、相当全面的优势。它在历史、地理、经济、科技、文化、人才、信息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有利条件。而且可以肯定，开放和改革，外引和内联，必将给上海注入新的活力。综合运用各种有利条件，上海就完全有可能成为全国四化的开路先锋。上海的前景是光明的。

四、现在上海正处在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的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在缺乏原材料和能源的情况下，一般加工工业发展过猛。对第三产业注意不够。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欠账过多。人口过于密集，住房紧张，交通阻塞，污染严重。就这些方面而论，上海的困难确实是很大的。特别是技术改造任务很重，资金短缺显得更加突出。

目前上海财政负担确实过重。我们的改革，是先易后难，一步一步推开的。农村，小企业，小城市，新基地，这几年已逐步放开，日子比较好过。相对地说，大企业，大城市，老基地，承受的负担比较重。特别是上海，去年全市国民收入为三百零三亿元；而财政收入（不包括中央直属企业）即达一百五十一亿元，上交一百三十一亿元，地方支出只二十亿元，地方支出占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国各省市。

今后，在调整和改革物价过程中，外地进入上海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一般是上涨的趋势；上海加工产品的价格，相当一部分是下降的趋势，这对上海也是一种压力。

如不采取措施，今后两三年内，上海的处境可能会更加困难。

五、因此，有必要为上海创造一些条件，帮助上海渡过困难，转上良性循环。

这次在上海主要议了这样几条：

(一) 上海的财政体制，由目前的统收统支，改为“核定基数，总额分成，六年不变”（国家对物价、税收等进行重大调整时，上海的财政基数也要作调整）。收入，以一九八三年的一百五十一亿元为基数；支出，在一九八三年的二十亿元基础上，增加十五亿元，共三十五亿元。这样，上海的分成比例，将由目前的百分之十三点二上升为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上海同志要求把分成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

(二) 过去确定每年给上海引进技术用的三亿美元外汇额度，将于明年到期；决定延长到一九九零年，可以跨年度使用，并核拨相应的人民币贷款。

(三) 上海贸易外汇留成比例，同意按全国统一规定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地方性以进养出和物资串换而增值的外汇留成，同意由目前的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七十。

(四) 以一九八三年底上海银行存放款差额为基数，同意把今后增加吸收的存款全部留给上海的银行周转使用。

(五) 恢复上海金融中心。原则是三条：一是扩大上海各个分行的自主权。二是在中央银行之下，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允许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任务是拾遗补缺，经营对内对外长期短期存放款业务，可以与其他专业银行业务交叉。三是市政府不干预这些银行的业务。此外，允许外国银行到上海开业，但要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把金融中心办好，其作用不亚于财政拨款，上海的回旋余地就大了。

以上几条，是为了解决上海的特殊困难。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其它地方不得援例。这样，上海可以真正解决一些问题，中央财政也可以过得去。

六、对上海来说，除了负担过重以外，还有一个捆得太死的问题。要把上海搞活，主要是两条：第一是搞活企业，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要把经营管理的自主权真正放到企业，而不要揽在行政性的公司手里。同时，在企业工资基金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方面，在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方面，应该更放手一点。企业的经济效益上去了，财源就活了。第二是改善基础设施，首先要改善为生产服务和为开放服务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改善了，可以增加上海对内对外的吸引力。开放的好处，外引内联的好处，就会大量涌向上海，这样后劲就大。上面说的那些融资措施，应主要用于

进行技术改造和改善投资环境。总之，放开手脚，适当减负，发挥优势，上海是能够较快地转上良性循环的。

七、解放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忽略了经济中心的多种功能。以上海为例，它不仅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最大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中心，最大的科技中心，今后还应该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所有这些为全国服务的综合功能，单纯用“工农业生产总值”这个指标是很难反映出来的。很多经济学家建议，考核上海经济工作，应以“国民生产总值”为首要指标，这个意见有道理，可以促使上海把注意力放到为全国服务上来。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应该把上海对全国四化建设作出的贡献，作为评定上海工作的主要标准。对其它经济中心，也应该这样要求。把经济中心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经济越活跃，本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不仅不会受影响，而且可能发展得更快。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关于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给中央的请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同志并书记处、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同志：

最近我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先后到广东、上海和江苏调查，大家认为有必要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开辟为经济开放区，利用开放和改革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优势，加快建设步伐。现将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珠江三角洲地濒港澳，长江三角洲环绕上海，两个三角洲都顺江临海，交通方便，信息比较灵通，工业基础较好，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历史上就与国外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开放和改革，这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把门户打开，把经济搞活，各项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显示了开放和改革政策的威力。这两个三角洲，面积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一；人口六千五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五；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五亿元，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但是，由于没有作为经济开放地区，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仍受种种限制。当地干部和群众纷纷要求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当前两个三角洲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如能因势利导，像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那样，把这里开辟为经济开放区，在政策上进一步放宽，既可以加快这一地区的开放和建设；又有利于通过外引和内联，促进与国外、与内地的经济技术交流；同时对稳定和繁荣香港，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我们的方针，是要通过开放和改革，发挥这两大三角洲的优势，在全国最先建设成为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的、开放式

的文明富庶的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金三角”。如果试验成功，下一步将陆续开放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进而使北起大连港、南至北海市的沿海大约二亿人口的地区，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地带。在这一地带，改革的步子可以走得更快一些，经济政策更灵活一些，市场调节的部分更多一些，同国外的联系更便利一些，信息更灵通一些。通过特区、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的筛选和过滤，把国外先进技术和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引进来，加以吸收、消化、创新，向内地转移。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将通过特区——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滚动式地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这样就把对外引进和对内联合、把沿海的发展和内地的开发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解决我国的东西关系，带动整个内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全国经济振兴，人民富裕起来。这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着。

开放两个三角洲，在步骤上，可以由小到大，即先开放“小三角”，再扩大为“大三角”。初步意见，长江三角洲先开放：上海市所属各县，江苏张家港和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及所属十二个县，浙江嘉兴市及所属嘉善、海宁、桐乡、平湖、海盐等五县。珠江三角洲先开放：佛山、江门两市和中山、番禺、增城、南海、顺德、新会、台山、开平、宝安、斗门、东莞等十一县市。这样较为稳妥。

三、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是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是进出口的重要基地，应该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增强竞争能力。为此，必须认真搞好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同时，要把内地的原料、初级产品在这里精加工，增值出口；把沿海生产的“洋货”向内地销售。要改变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结构，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根据出口的需要来安排生产。不是生产什么就加工什么，加工什么就出口什么，而是要倒过来，看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就考虑加工什么，种植什么。就是说应当是贸—工—农，而不是农—工—贸。要把传统的轻纺工业和新兴的食品工业的优势发挥出来，打入国际市场，扩大阵地。第一步争取在几年内把港澳市场所需鲜活商品基本上包下来；其次逐步进入日本、东南亚市场和中东市场。这样有利于增加外汇收入，促进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

四、我们的开放，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四个特区，是一个层次；十四个开放城市，是一个层次；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又是一个层次。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两个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可以参照十四个开放城市实行的政策，给予一定的权力（比开放城市略小一点），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拟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五、上述意见经中央批准以后，再按立法手续，报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¹。

赵紫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注 释

1. 1985年1月1日，邓小平与谷牧谈话。邓小平问：紫阳同志关于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报告你看了没有？谷牧说：我看过了。邓小平说：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嘛！谷牧说：紫阳同志今天下午要找我谈，我想提个建议，再加一个三角洲，泉州、漳州、厦门那个闽南三角洲。对台工作很需要这个三角洲。这样，广东有个珠江三角洲，上海经济区有个长江三角洲，福建有个闽南三角洲。邓小平说：好嘛！再加上闽南三角洲。

赵紫阳同意谷牧的建议。

后 记

一、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者检索查看，这部文集以时间顺序编排，按年份分为四卷：第一卷（1980-1982年），第二卷（1983-1984年），第三卷（1985-1986年），第四卷（1987-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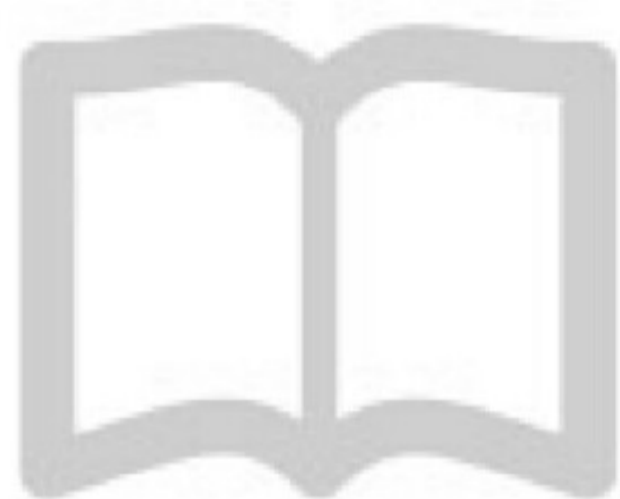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二、编入本书的所有文稿，均系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为了保存文稿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只对原稿进行了文字订正和必要注释，有的添加了标题。文中的数字和计量单位等，亦沿用当时的习惯表述，未按新的规定改动和换算。

三、参加文集收集、整理、编辑、录入、排版、校对工作的同志，都是一批热心改革开放事业和关心党史国史研究的志愿者，还有许多老领导和老同志给予了热情鼓励和鼎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四、限于条件和水平，在本书编辑中难免有疏漏、错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知情者批评指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5年10月17日



此頁空白
Blank Page